

丝绸之路

河

交通线路

(中国段)



历史

地理

研究

编 (永宁县) 周俭
 主 旧县村 李毅
 副主 任云英
 总 审 定 周伟洲
 课题组长 李建超

丝绸之路交通路线 (中国段) 历史地理研究

编委会
委员

李健超 孙福喜 李久昌 田亚岐
雍际春 罗 丰 李并成 王炳华

丝绸之路

交通线路

(中国段)

历史

地理

研究

主 编	周俭
副 主 编	李毅 任云英
总 审 定	周伟洲
课题组组长	李建超
策 划 编 辑	李智 董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丝绸之路交通线路 (中国段) 历史地理研究 / 周俭

主编.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7-214-08404-0

I. ①丝… II. ①周… III. ①丝绸之路—历史地理—研究—中国 IV. ①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33051号

丝绸之路交通路线 (中国段) 历史地理研究

周俭 主编

责任编辑: 刘焱

特约编辑: 潘华 冯林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天津凤凰空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 1/32

印 张: 17.5

字 数: 30万字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4-08404-0

定 价: 98.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发行公司调换)

目录

前言	004
序	006
第一章 长安至洛阳路线的历史地理研究	
一、 长安洛阳段概述 (李建超)	008
二、 长安至潼关古道考证 (孙福喜)	014
三、 崤函古道历史地理调查与研究 (李久昌)	028
四、 崤山南道考察记 (李建超)	072
第二章 长安至甘肃东段路线研究	
一、 长安溯渭水至陇山段路线考察研究 (田亚岐 杨曙明)	078
二、 甘肃东段交通线的形成、变迁与走向 (雍际春 苏海洋)	100
三、 丝绸之路与汉唐驿道——以甘肃、宁夏为中心 (罗丰)	122
四、 从西安经固原至武威丝绸之路北线考察记 (李建超)	136
第三章 河西走廊与青海道路线研究	
一、 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形成、变迁及走向 (雍际春 苏海洋)	142
二、 唐蕃古道走向的再考察 (雍际春 苏海洋)	166
三、 汉代河西走廊交通道路考察 (李并成)	184
四、 唐代河西走廊交通道路考察 (李并成)	208
第四章 丝绸之路新疆段古道研究	
一、 丝绸之路新疆段研究 (王炳华)	220
二、 葱岭道调查 (王炳华)	262
致谢	276

前言

丝绸之路是世界文化传播的桥梁，是古代四大文明发源地交往的道路。这条道路，不仅使世界各大文明得以传播，而且推动着世界历史的进程。因此，学者们对它有許多称誉：或称之为“人类文明的运河”、“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或称为“一条最伟大壮观的中西贸易商道”、“一条最古道最辉煌的人类文化运河”或称为“欧亚非洲的动脉”，等等。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最初的含义是中国古代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因大量中国丝织品多经此道西运，故称为丝绸之路。而“丝绸之路”这个名称，是近代才有的，古代并无此名称。最早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亲程旅行记》一书中，提出来的。他最初是指中国汉代与中亚河中地区、印度直接以丝绸为主的贸易交通线。到20世纪初，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 Herroman）所著的《中国和叙利亚直接的古丝绸之路》（1910，柏林）中，经过作者对多种文献的进一步研究，将丝绸之路从中国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并确定了它的基本内涵。同时，一批外国探险家在中国西北地区考察，发现了大批与丝绸之路有关的遗物。他们著书立说，使用丝绸之路这一名称，并将丝绸之路研究内容更为扩展。因而，丝绸之路这一名称遂固定下来，称为学术研究一项主要的课题。

近几十年来，随着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入和“丝绸之路热”，丝绸之路的含义更为扩展。按照丝绸之路原来的含义，是指经中亚（西域）到南亚、西亚、欧洲、北非的陆上交通道路。可是，近几十年来，又出现了一种更为广义的“丝绸之路”。现今的说法是：原来所说的经中亚陆路丝绸之路，被命名为“绿洲路”、“沙漠路”；另有经北方蒙古草原的游牧民居地至中亚的“草原路”（狭义的丝绸之路）；经海上西行的“海上丝绸之路”，经云南入缅甸、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等。上述各种名词的丝绸之路，仅沙漠路、草原路可算作原来含义的丝绸之路，其余的均非原来意义的丝绸之路了。然而，这些提法已逐渐为人们所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丝路考察即是一例。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些丝绸之路视为广义的丝绸之路，而加以认可。

另有一些学者，在上述个条中西贸易的道路上冠以主要流通商品的名称，于是就是称海上丝绸之路“瓷器之路”或“香丝之路”；称从青海经西藏至印度之路为“麝香之路”，称草原之路为“皮毛之路”；称早期丝绸之路为“玉石之路”，等等。

随着新的21世纪的开始，丝绸之路研究及“丝绸之路热”更是经久不衰；振兴丝路，开辟新的欧亚大陆桥，称为丝路沿途各国共同的期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丝绸之路沿途各国开展了申报“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的工程。中国丝绸之路沿途各省、自治区也积极行动起来，丝绸之路更加深入人心，称为家喻户晓的事了。

然而，古代中国的丝绸之路的交通道路的地理环境和几天道路走向如何？沿途至今还存留有哪些重要的遗址、遗物？历史上沿途有何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一列重要的问题，过去中外学者虽多有研究，发表的论著甚多，可是上述重大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且意见分歧，众说纷纭。有鉴于此，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组织全国有关的研究丝绸之路的专家，在实地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这部《丝绸之路交通线路（中国段）历史地理研究》的专著。此书的宗旨，是从丝绸之路（指狭义的“丝绸之路”）中国段交通道路的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理清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不同历史时期、纷繁复杂路线的地理位置和里程（特别是在今天的地理位置、道路和里程），以及沿途依存下来的有关丝绸之路的遗址和遗物，以为今天的旅游和文化事业以及申请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提供可以依赖的资料和数据。

此书以丝绸之路的起点——汉唐京城长安（今陕西西安）为中心，将丝绸之路中国境内线路分成四段（或称为四个部分、四章）分别详细论述之。

（一）长安东至历史上一段时期曾作为丝绸之路另一个起点的古都洛阳段路线的历史地理研究（第一章），包够四篇论文：即首先是《长安洛阳段概述》，后依次为《长安至潼关古道考》、《崤函古道历史地理调查与研究》、《崤山南道考察记》。除了对先秦以来，这段道路的地理环境及形成、汉唐驿馆、行宫园囿遗址等的叙述外，特别对这段道理中最险峻、变化最多的崤函古道研究最为深入，且多有新的发现。

（二）长安至甘肃东段路段研究（第二章），包括四篇论文：《长安溯渭水至陇山段路线考察研究》、《甘肃东段交通线的形成、变迁与走向》、《丝绸之路与汉唐驿道——以甘肃、宁夏为中心》、《从西安经固原至武威丝绸之路北线考察记》。这段路程有多条道路，较为复杂，过去研究多从文献入手，意见分歧。这四篇论文则多为以作者本人亲自调查和见闻，结合文献，撰写而成。其中对陇山段的研究较为深入；而过去为学者忽略的固原至武威北线的考察，则有更多新的发现。

（三）河西走廊和青海道路线研究（第三章），包括四篇论文：《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形成、变迁及走向》、《唐蕃古道的再考察》、《汉代河西走廊交通道路考察》、《唐代河西走廊交通道路考察》。甘肃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重要的路段之一，论文作者长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多次亲自考察，收获颇多。此书所载的两篇关于青海路和唐蕃古道的论文，则更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道路的走向和里程。

（四）新疆段古道研究。包括两篇论文：《丝绸之路新疆段研究》、《葱岭道调查》。新疆古称“西域”（狭义西域），是丝绸之路中国段中最为艰巨、最为重要的路线；其标志性的地理环境沙漠、绿洲，甚至成为狭义的丝绸之路的代名词，即“沙漠路”或“绿洲路”。两篇论文的作者为著名的考古学家，在新疆从事考古工作40余年，对丝绸之路新疆段有深入、细致的研究，结论具有权威的性质。其对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古称“葱岭”）丝绸之路道路的调查，更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总之，此书是集全国著名的研究丝绸之路的专家，在充分发掘有关文献、考古资料，亲身考察丝绸之路的基础上，以历史地理学为切入点，综合地理学、考古学、民族学、经济学、古都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撰写的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的专著。我们相信，它的出版必将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

但是，无可讳言，由于此书是多位专家分别执笔，且限于体例，书中每段（章）中，重复即繁杂之处有之，个别错讹之处与在所难免。望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最后，感谢参与撰写的各位专家的辛勤劳动，感谢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

2012年8月

序

《丝绸之路交通线路（中国段）历史地理研究》是我中心（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度立项开展的一项科研课题，历时两年。

初衷：开展此项学术研究的初衷是为了基本理清丝绸之路中国境内纷繁复杂线路的地理位置和长度，为我国申请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提供可以信赖的资料与数据。

内容：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野外实地考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一系列新发现。如：从长安到洛阳的线路上的唐代皇室行宫和重要驿站；长安西行丝绸之路南道上，汧渭之会与漕储码头建筑遗址的发现；榆中考古新发现新石器时代、秦汉隋唐遗址等。其中新疆境内的冰山沙漠中的道路，有相当多的路线是王炳华教授亲自考察的新发现。此外，这次学术研究还填补了丝绸之路的一些空白。丝绸之路北线，从甘肃靖远县到武威，其间四百余里，过去研究者少有涉足。除资料中记载的“今图景泰至武威间之长城盖自沿此道而筑也”之外，完全空白。通过此次学术活动的深入研究，证实了这四百余里丝绸之路内容非常丰富，有汉明长城、烽火台、古农垦遗址、汉代县城遗址等，是一条贯通腾格里大沙漠与黑松山之间的自然通途。

意义：此次学术研究时间有限，但成绩巨大。它是由历史学、地理学、交通运输学多学科的老中青学者所组成，是学术研究群体组成的成功范例，应当是丝绸之路研究一次开创性学术活动，可以无愧地载入丝绸之路研究史册。

此书有李久昌、李健超、罗丰、雍际春、李并成、王炳华等专家的大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其突出的特点是在充分发掘有关文献、考古资料的同时，应用亲身考察丝绸之路的所得，故多有创见。其中王炳华长期从事新疆考古工作，并有丝绸之路专著《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出版，所论多有新见，为国内第一人。他的两篇论文也为全书重中之重。经过作者修改和编辑细心处理，相信会是一部成功的丝绸之路专著。衷心感谢诸位作者对我中心工作的倾力支持！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丝绸之路研究中心

文德皇后之四子及太子承乾

（唐高宗）高宗皇帝之太子承乾

（唐高宗）高宗皇帝之太子承乾

（唐高宗）高宗皇帝之太子承乾

（唐高宗）高宗皇帝之太子承乾

长安洛阳段概述

（唐高宗）高宗皇帝之太子承乾

（唐高宗）高宗皇帝之太子承乾

（唐高宗）高宗皇帝之太子承乾

（唐高宗）高宗皇帝之太子承乾

（唐高宗）高宗皇帝之太子承乾

（唐高宗）高宗皇帝之太子承乾

（唐高宗）高宗皇帝之太子承乾

（唐高宗）高宗皇帝之太子承乾

（唐高宗）高宗皇帝之太子承乾

从夏商周至隋唐的3000多年间（前2070-904），黄河中下游两岸是全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历代王朝版图的地理中心。在这个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中，有两个平原：一个是伊洛河平原（盆地），一个是关中平原（渭河平原、关中盆地），这两个平原各自形成了两个中心城市洛阳与长安^[1]，自周公开创丰镐与洛邑东西两京后，直至唐末，除国家分裂年代外，洛阳和长安交替作为全国的国都。沟通和连接两京的道路，是我国有史记载最早、最重要的一条国内东西主干道。《尚书·武成》记载周武王伐商，“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但比历史文字记载更早的夏代，夏启伐有扈氏（今陕西户县），商与崇、周等方国的联络均往返于这条道路。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多次提到周人纳贡于商、通婚及相互征战。西周建国后，这条大道成为宗周镐京与成周洛邑（王城）间的驿传之路。秦始皇由咸阳“大治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秦始皇五次东巡，三次行经此道。汉唐时以长安、洛阳东西二都为枢纽，东达沧海，西逾葱岭，成为万国朝天之路，宾使川流、駉骑云至，极为繁荣。以后历宋、元、明、清直至现代。那么这条道路是在怎样的地理基础上形成的？

长安与洛阳均位于北纬34° 15'~ 34° 39'，东西相距400公里（长安东经108° 55'，洛阳东经112° 24'），也均地处我国南方与北方的地理分界线秦岭之北，黄河支流渭河与洛河两岸。山河形势使两地交通最便捷的径直路线是沿秦岭北麓和黄河南岸。由于自然地理特征，大致可分为以下三段。

①从长安到潼关约130公里，道路沿秦岭北麓、渭河南岸黄土台塬，线路平直开阔，路基稳定。沿线农业发达，供给充足，邑聚稠密，易置驿站。但由于地质构造不同，秦岭抬升，渭河地堑下沉，造成地震、山崩、泥石流灾害堵塞道路。据史书记载，东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华山崩。唐武则天垂拱二年（686），骊山北麓有山体涌出，名曰“庆山”（在今西安临潼区）。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华州少华山埠头崩，沙石阻塞道路，“华州东有乱石十余里，蔽野横路，马阂几不可行，其大者皆如岗埠，而不成山。问之，人云少华山崩也。遂考诸宋史，熙宁五年九月，知华州吕大防言，少华山前阜头火山岭摧陷，其下平地，东西五里，南

北十里，溃散坟裂，涌起堆阜，各高数丈，陷居民无社，凡数百处林木庐舍，亦无存者。”（元·李好文撰，《长安志国》卷中“华州乱石”条。选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洛阳伽蓝记》外七种中的）。还有明嘉靖三十四年（1556）关中大地震。这些自然灾害，特别是泥石流，对这条通道造成了不利影响。

②从潼关至陕州，约130公里。黄河在山峡之间咆哮南下，为西岳华山阻挡，急转90°大转弯东流，而秦岭从华山向东延伸于河南灵宝西南向东北分支称“小秦岭”，黄河与小秦岭之间除山体外，全为黄土覆盖。黄河下切侧蚀，使南岸形成高出河床30~50米的陡岸，无有阶地可以东西畅通。而源于秦岭的河流注入黄河，穿切黄土地形冲出河床与黄土塬面高差约300~500米的陡岸，而东西行旅也必须横越条条冲沟与塬面。战国后期秦国在稠桑原（西原）与弘农涧西设立“函谷关”稽查行人，易守难攻，成为险关。由于从潼关到函谷关的黄土塬上桃树成林，而命为“桃林塞”。自函谷关东行黄河南岸阶地平缓，易于通行，直达陕州。在历史时期亦曾由阌经虢州（今灵宝市）再折向旧灵宝县城东达陕州。

③从陕州到洛阳，有南北两道，北道称“崤山北道”，南道称“崤山南道”。陕州故城（陕州城毁于黄河三门峡水库建成前）处于环水台地上，“西控函谷，东控崤坂”。其中，崤坂亦为秦岭主脉向东北的一条分支，主峰在陕县硤石东，由于断层，山势高峻，沿断层裂隙形成南北两条通道。南道由陕州故城沿青龙涧东南行，过交口，溯雁翎关水（古称安阳溪水）穿过崤山垭口雁翎关，沿源于雁翎关的永昌河东而下至宜阳县三乡汇入洛河，长约180公里，由三乡沿洛河平原直达洛阳；隋唐时期，崤山南道亦有变化，隋初废三崤道（在崤山北道上）开莎栅道，即在崤山南道上的兰峰宫东的莎栅城东南行经唐永宁县城（今洛宁县北，南北旧县标），又东南到三乡驿；莎栅道不绕行永昌河谷，径直达三乡驿，缩短了路程。崤山北道从陕州故城沿青龙涧河东南至交口，再溯青龙涧河支流交口河（古称浹谷水）而上至崤山，沿崤山峰间隙狭道于崤山东沿源于马头山的谷水河谷，经澠池、新安穿越低山丘陵，直达洛阳。东汉末年，曹操西讨巴汉，另在崤山北道开“北山高道”。对于北山高道的行经线路，有待实地探查，此条线路全长约140公里。西汉武帝时，将秦函谷关移至新安县城东二里称“新函谷关”^[2]。

长安至洛阳的道路历史发展。从春秋时期秦晋争夺函谷关，东西各地的战争均为夺取据有此道。公元前628年，秦晋崤之战，秦师袭郑（河南新郑）路经晋境，晋军埋伏阻击，秦师全没。战国时期秦国势力不断东进，已据有魏国的崤山地区，秦王与赵王曾会于澠池城（今澠池县城西池底乡朱城村），澠池城地处崤山北道的东端。崤山南道也是秦国与韩国和周的通道，周都成周（洛阳白马寺以东）处于韩国境域。秦窥周室，先伐韩，韩国为抵御秦军，曾于崤山南路要冲建立宜阳城（今宜阳县韩城镇东北）。秦武王四年（前307），甘茂攻取宜阳，秦国就“车通三川”（三川指黄河、洛河、伊河）。秦统一全国后，以咸阳为中心，修筑驰道，其中最重要的干道就是从咸阳到三川郡（洛阳），再由三川郡分驰原关东六国旧地。汉定都长安，长安洛阳间道路沿用秦驰道。张骞通西域后，长安至洛阳的道路成为丝绸之路重要的一段。隋唐两代定都长安，而建洛阳为东都，京都之间官吏、使臣、商人来往络绎不绝，皇帝也视京都为东西二宅，经常往返。为了加强京都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联系，沿途设置馆驿，逐渐形成完善的驿路。据《唐会要》记载：“从上都（长安）到汴州（今开封市）为大路驿”，从上都到汴州，中经洛阳，即两都交通为第一大驿道。今据史籍记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唐代长安与洛阳间的馆驿，皇帝往返两京设置的行宫表列于下。凡经现场考察有遗址的加以注释说明^[3]。

长乐驿——长安城东第一驿。长乐驿遗址未发现，约在今西安城东北十里铺附近^[4]。

滋水驿——即灞桥驿，今灞桥镇，西距长乐驿15里，东行30里至昌亭驿。

昌亭驿——即昭应驿，今临潼区（骊山镇），东行14里阴盘驿。

阴盘驿——今临潼区新丰镇西4里，沙河村南，今已为铁路局新丰编组站建筑。

戏水驿——今阴盘驿东13里，戏水西。

杜化驿——西距戏水驿27里，今渭南西13里。

渭南驿——西距杜化驿13里，即今渭南市。

东阳驿——西距渭南驿13里。

赤水驿——西距东阳驿13里。

普德驿——西距赤水驿25里，今华县城内。

敷水驿——西距华县30里，今敷水镇。

长城驿——西距敷水驿28里，今华阴市西二里。

潼关驿——西距长城驿约40里，今潼关县港口。

阌乡驿——西距潼关驿30里，今灵宝县豫灵镇南原村附近。

盘豆驿——西北距阌乡驿25里，今灵宝市故县镇盘东盘西二村北，已没于黄河。

湖城驿——西距盘豆驿28里，今灵宝市阳平镇寨子村黄河南岸。

稠桑驿——西距湖城驿28里，今灵宝市函谷关镇稠桑村北。

桃林驿——西距稠桑驿20里，今灵宝老城大王镇老城村西北，没于三门峡水库。

甘棠驿——西距桃林驿70里，今三门峡市区内陕州故城内。

碛石驿——西距甘棠驿50里，今陕县菜园乡石门。

嘉祥驿——地址不详，陕州故城以南，宜阳县三乡驿北，地址无考。

鹿桥驿——西北距碛石驿60里，今洛宁县城北旧县村，唐永宁县城。

三乡驿——西北距鹿桥驿40里，今宜阳县城西三乡镇。

福昌馆——西距三乡驿25里，今宜阳县城西韩城镇福昌村北口。

柳泉驿——西距福昌馆34里，今宜阳县城西25里。

甘棠馆——西距甘棠驿30里（一为25里），今宜阳县城内。

三泉驿——西距甘棠驿25里，今宜阳县城东35里苗马村。

甘水驿——西距三泉驿口里，今甘水入洛河口附近。

临都驿——西距甘水驿口里，距唐洛阳城西5（6）里处。

都亭驿——西距新安驿80里，距临都驿5（6）里。

芳桂宫驿——西距甘棠驿120里，今渑池县西5里黄花村。

渑池南馆——西距芳桂宫驿5里，今渑池县城内。

新安驿——西距渑池南馆80里，今新安县城内。

唐长安洛阳道上的行宫：

华清宫——今西安市临潼区骊山下。

游龙宫——今渭南市西。

神台宫——华县城东北3里。

琼岳宫——华阴县西18里（今华阴市西）。

金城宫——华阴县东13里（今华阴市东）。

轩游宫——今灵宝市豫灵镇附近。

上阳宫——今灵宝市东北阳平镇附近。

桃源宫——今灵宝市大王镇后地村。

陕城宫——今三门峡市区陕州故城。

绣岭宫——今陕县菜园乡绣岭坡上绣岭村。

紫桂宫——今渑池县黄花村西南。

兰峰宫——今陕县宫前乡宫前村北台地上。

莎栅宫——今陕县宫前乡宫前村东。

崎岫宫——今洛阳县城北30旧县村西五里圪塔庙。

福昌宫——今宜阳县韩城镇福昌村北（隋福昌宫，唐高宗显庆三年复置）。

兰昌宫——今宜阳县三乡南寨村（唐福昌县西17里）。

连昌宫——今宜阳县三乡村五花寺（唐寿安县西29里）。

兴泰宫——今宜阳县赵保乡西赵保、上沟村间（唐寿安县西南40里）。

显仁宫——今宜阳县西（遗址不详）。

甘泉宫——今宜阳县东（遗址不详）。

连曜宫——今宜阳县（遗址不详）。

北宋建都开封，洛阳为西京。长安虽然失去全国政治中心地位，仍是西北地区军事重镇。为了开封、洛阳、长安间的政治、军事的联系，曾重视道路修整。宋建隆三年（962）“诏西京修古道险隘处，东自洛之巩（今河南巩义市），西抵陕之湖，悉命治之，以为坦途。”北宋与西夏的战争长达百余年，关东的军需物资，均由此道或黄河水道转运到沿边各地。南宋绍兴九年（1139）三月，宋、金议和，“以河南地与宋”后又“复取河南陕西地”，南宋派遣书枢密楼炤宣谕陕西，秘书少监郑刚中随行，自临安（今杭州）至凤翔府（今凤翔县）。其中从洛阳至长安即行经这条驿路，郑刚中此行撰有《西征道里记》一书。元代建都于大都（北京），当时从北京通往陕西、甘肃、四川的驿道，从洛阳河南府路至奉元路（今西安）设置站赤：河南站正西七十里新安站、九十里沔（澠）池站、七十里硤石站、七十里陕州站、九十里灵宝站、七十里湖城站、五十里阆乡站、七十里华阴站、七十里华州站、五十里渭南站、八十里临潼站及七十五里奉元站。明代沿袭元代驿路，在新安与澠之间增加一个义昌驿。清代所设驿站是：周南驿（洛阳县驿）、函关驿（新安县驿）、义昌驿（今澠池县东义昌）、蠡城驿（澠池县驿）、硤石驿、甘棠驿（陕州驿）、桃林驿（灵宝县驿）、鼎湖驿（阆乡县驿）、潼关驿（潼关厅驿）、潼津驿（华阴县驿）、华山驿（华州驿）、丰原驿（渭南县驿）、新丰驿（临潼县驿）、京兆驿（西安府驿）。此外在这条路上还设有铺递。明清这条驿路不仅是洛阳长安之间的主要通道，也是西通陇、蜀，东北通京师的大道。

（本文是据史籍记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2008年与李久昌博士、韩海梅女士等，从西安历潼关，经三门峡至河南宜阳三乡、河南澠池段实地考察。洛阳至澠池、洛阳至宜阳三乡段，撰者历年多次实地考察）。

注释

- [1] 洛阳包括夏都斟鄩、商都西亳、汉魏洛阳城、隋唐洛阳城。长安包括丰京、镐京、秦咸阳、汉长安城、隋唐长安城。
- [2] 长安洛阳道的三山：① 华山，又称太华山，古称西岳，属秦岭东段花岗岩断块山，海拔1997米，有壁立千仞之势。山阴华岳庙为封建帝王祭祀场所。② 陕原，即陕陌，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西南。为小秦岭分支形成的黄土岭。西周成王时，周、召二公分治。《公羊传·隐公五年》“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陕东、陕西与关东、关西，山东、山西含义略同。③ 崤山，秦岭东段支脉，一名嵯吟山，今名金银山，主峰在今硤石东。
- 三关：① 潼关，在今陕西省潼关县北。三门峡水库修筑后毁弃，是唐潼关。地当山西、陕西、河南三省要冲。汉潼关古为桃林塞地，东汉未设置，地址在今潼关东北杨家庄城南北村一带。唐天授二年（691）移至今港口，历宋、元、明、清，直至1960年。② 函谷关，战国时期秦置，在今灵宝市东北，因关在谷东，谷深险如函得名。为东西两京必经之地，军事要隘。公元前241年，楚、赵、魏、卫合纵攻秦，至此败还。公元前207年，刘邦西入咸阳，遣兵守此，以拒关东诸侯军。汉置关都尉戍守。元鼎三年（前114），徙关于新安县东，于此地置弘农县。③ 新函谷关，在今河南省新安县城东，汉元鼎三年（前114）移此，去故关三百里，故名新关。新函谷关是一道防塞，北起黄河，南逾洛水。东汉中平元年（184）置“八关”，此为八关之首。三国魏正始元年（240）废，但遗址尚在。陇海铁路从关旁经过。
- [3] 据王文楚《唐代两京驿路考》《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严耕望《唐代长安洛阳驿路考》《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作者2008年与李久昌博士、韩海梅女士现场考察记录。
- [4] 宋，宋敏求《长安志》万年县下“长乐驿在县东十五里长乐坡下”是指长乐驿在长安城宣阳坊万年县廨之东十五里。《唐两京城坊考》“通化门东七里长乐坡上有长乐驿，下临沪水。”通化门是唐长安城东出自北面南第一门。遗址在今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医院门南约100米。

长安至潼关
古道考证

关中平原又称渭河平原和关中盆地，位于陕西中部，介于秦岭和渭北北山之间，西起宝鸡峡，东至潼关港口，东西长约360公里。关中平原是由河流冲积和黄土堆积形成的，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水源丰富，在春秋战国时期为秦国故地，所以又号称八百里秦川。在这方肥沃的土地上，很早就有人类栖息、繁衍，它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西安至潼关这段路程位于关中平原的东部，自西安向东，经过秦岭之北、渭河以南的东西狭长走廊，其中潼关南阻华山、北濒渭河和黄河，扼山河之咽喉，是关中平原东西走廊的门户，也是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这段古道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形成，大抵关中向东的交通自古以三关为重。武关（今陕西丹凤县东南）通向江南的江汉流域的广大地区；临晋关又称蒲津关（今山西永济西黄河），东北通黄河以东以北地区，到达幽、冀、辽东地区，现在山西、河北、辽宁地区；正东方向则通向黄河以南的平原地区，进而到达山东半岛。又可沿汴河、宋河或大运河到达广大的江南地区。此地在秦汉时期以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地区）为阻，魏晋以来则以潼关为险要。西安和洛阳是周秦汉唐时期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两者之间的交通历来都是通途大道，而西安到潼关这段路程是其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汉唐时期丝绸之路繁盛，西安不仅是丝绸之路的出发地，同时也是各地丝绸和商品的汇集地和外来物品的发散地。其中西安至潼关这段古道主要承担中原地区丝绸源源不断地运往长安的任务。古中原地区从广义上讲，是指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狭义的中原地区主要是指河南大部、山西省南部一带。隋唐时期狭义上的中原地区，主要是指河南道，它包括29个州，其中丝绸方面的主要贡品是：文绫、纱，绢，双丝绫、缙（丝织品的总称）、丝布、方纹绫，葛等等。据《隋书·食货志》记载，“时（文帝初）……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至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目¹¹。”由此可知，河南道是中原通往长安的主干道，同时也是丝绸之路上一段不可忽视的路程。

一、秦汉时期的古道

秦汉是我国历史上相继建立的统一的封建政权，秦代形成以驰道、直道为主干的全国统一交通网，以国都咸阳为中心向四方“辐射”为其基本特征之一。其中通向东方的直道是三川东海道，到达山东半岛的海边。西汉的国都长安与咸阳仅一水之隔，其交通中枢作用与秦咸阳并无差别。秦汉时在交通要道上设立亭，亭是过往商旅休息的地方，每10里设置一亭，每亭设有亭长。如汉高祖刘邦在年轻的时候就是沛县泗水的一个亭长。汉代又在大路上设驿，主要是传送文书的机构，使者要骑马传递公文，所以又称为驿骑。每30里设一驿，驿有驿卒，同时还设有传舍，供政府官吏或使者住宿。

秦代在咸阳东南架设横桥，以便利渭水南北交通。在《史记·孝文本纪·正义》引《三辅旧事》云：“秦于渭南有兴乐宫，渭北有咸阳宫。秦昭王欲通二宫之间，造横桥，长三百八十步。”横桥，秦昭王始建，汉代重修。因与汉长安城北面的横门相对，亦名横门桥。从东西渭桥建成后，又有中渭桥之称^[2]。但是，自秦汉以来，渭水每年平均向北移动2.4米，所以横桥遗址已被渭河水淹没，无法确定它的具体位置。一些学者估计，它的遗址应该在今咸阳市窑店镇东龙村东南，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北这一范围之内。秦兴乐宫，汉高祖改为长乐宫，在汉长安城东南角，由咸阳通往渭南的大路，必过此桥。汉长安城东面自北而南依次有宣平门、清明门和霸城门三个门，其中宣平门是东出的主要城门。《三辅黄图·卷一》载：“长安城东出北头第一门曰宣平门，民间所谓东都门。”《雍录·卷七》载：“自长安城东渡，必由此门（东都门），古西都之地而标以东都也。”^[3]宣平门的遗址在今青门口村，北距汉长安城的东北城角约1150米。出此门向东是东去的交通要道，汉时长安人到灊桥送往迎来，都要经过此门^[4]。过了横桥，出了宣平门到潼关主要经过以下几个驿站和县城。

①宣平门外七八里处，有桥跨昆明渠（该段渠道亦称七里渠），时称饮马桥，为大道所经。西晋潘岳由洛阳赴职长安，曾经过此地^[5]。十六国时称饮马桥为石桥。

②过饮马桥，去城13里处有外郭亭，名积道亭。《史记·高祖本纪》记载：“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积道旁。”西汉吕后、西晋潘岳均曾由霸上经过此地进入长安^[6]。积道，亦作轺道，亭名。在今西安市东北，灊河西面，是宣平门东去15里的驿亭。《索隐》载《汉宫殿疏》云：轺道亭东去霸城观四里，观去灊水百步。苏林云：在长安东13里也。^[7]

③积道亭东面四里，距灊水百步左右有霸城观。灊桥附近又有霸馆，王莽曾更名为长存馆。汉时观、馆互通。《括地志辑校·卷一》中的万年县条记载：“汉霸昌厩在雍州万年县东北三十八里。”从唐万年县（今西安市李家村）向东北推三十八唐里，霸昌厩和霸昌观约在今西安市灊桥东北，昌陵遗址附近。

④灊水原名滋水，春秋时期秦穆公称霸于西戎，为显示他的霸功，改滋水为霸（灊）水。灊河流经长安之东，是东西交通必经之地。灊桥是秦汉时期横绝于灊水之上的唯一桥梁，东出函谷关、武关和蒲津关三路的行人都要经此桥。灊桥来历很古，然而何时初建，尚无文证。王莽地皇三年，即公元22年发生了灊桥火灾，所以可以肯定西汉时就有灊桥。《水经注·渭水注》云：“灊水又北经轺道，在长安东十三里……水上有桥，谓之灊桥。”据此可知，秦汉时通向东方的大道——轺道通过灊桥而过灊水，灊桥应在汉长安城宣平门东的轺道亭之东，可能在今西安市灊桥区灊河东岸上、下桥子口。今灊桥在西安市东郊灊桥镇西之灊河上，汉灊桥当在今灊桥西北约六公里处的灊河上^[8]。《汉书·王莽传》记载：“地皇三年三月，灊桥灾，数千人以水沃救，不灭^[9]。”由此可知，当时的灊桥肯定是木质结构的。

⑤灞河的渡口或灞桥之东，古人称之为霸上，为长安战略要地。在古代交通史上居于重要地位，但是关于它的具体位置，各位学者却有不同见解。据《水经注》记载，霸上位浐河和灞河之间的白鹿原上。辛德勇先生认为《水经注》里面的记载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他认为霸上应该在灞河以东，而霸上在白鹿原上的说法没有证据；李健超先生在他的《霸上与长安》中详细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霸上应该在灞河以东，霸城附近。我们采用两位学者的意见，过了灞河到达霸上。

⑥霸上置有霸陵亭，供函谷关、武关、蒲津关三路过往行人住宿休息，是三路的具体交汇点。西汉李广曾沿武关道从南山夜归长安，途经霸陵亭时为县尉所呵止。^[10]

⑦霸上东侧有汉时的霸陵城，本战国时秦置芷阳，汉文帝时改名为霸陵，并置霸陵县，魏晋时期改称霸城。今陕西省临潼县西南谢王庄一带有汉城遗址，可能是古霸城的遗址。

⑧从霸陵亭向东，经曲邮。汉高祖十一年，东征黔布，张良送行至此。^[11]曲邮的位置，迄今不太明白，仅略知在霸上以东、新丰县城之西。汉霸陵县有“曲亭”，成帝曾打算在其南侧营建昌陵，据《关中记》载，昌陵在霸城东20里处。^[12]今西安市北郊与临潼县交界地带有一面积约3平方公里的大土丘，丘顶内凹，当地称“八角玻璃井”，当是昌陵遗迹，它是历史上最大的没有完工而被废弃的帝王陵墓。曲亭或曲邮应该在其北面的陈村、温家寨一带。从灞桥向东来到大道上，至此遇骊山山麓洪积扇阻挡，折而向东北行进，曲亭、曲邮或即得名于道路曲折之意。

⑨由曲亭东北行，至今新丰镇沙河（古阴盘水）西岸长骛村东，经新丰城。此城是汉高祖七年为了解太上皇思乡之苦而筑。《元和郡县图志·卷一》载：“汉七年，高祖以太上皇思东归，与此置县，徙丰人以实之，故曰新丰。原是秦国的骊邑城。”^[13]《史记·高祖本纪》曰：“汉高祖十年（前197）……更名骊邑曰新丰。东汉末徙安定郡阴盘县侨治于此。”^[14]因此，又有阴盘城之称。

⑩由汉新丰城东渡阴盘水前行5里至南坂口有鸿门亭，南去秦始皇陵约10里，鸿门亭西有坂长约1里，塹原通道，坂口有如门状，故名鸿门。鸿门坂在县东17里，汉旧大道北下坂口名也。《关中记》曰：“鸿门在始皇陵北十里，即沛公会项处也。”^[15]秦末项羽入函谷关，驻军在此，刘邦自霸上来与其相会，在此演绎了历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幕——鸿门宴。

⑪经鸿门亭向东北行，经戏水（今戏河）西岸的戏亭。《水经注·渭水注·卷十九》记载：“渭水又东，戏水注之。水出丽山冯公谷，东北流，又北经丽戎城东，又北……经鸿门东，又北经戏亭东。”^[16]由此可知，戏亭在戏水西岸。《史记集解》记载：“孟康曰，水名，今戏亭是也。”“苏林曰，”邑名，在新丰县东南30里。”《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也记载：“古戏亭在（照应）县东北30里。周幽王为犬戎所逐，死于戏，即此也。周章军西至戏，秦将章邯拒破之，亦此地也。”^[17]据这些史料可知，戏亭离新丰县的距离约30里，在今临潼县东北戏水西岸。

⑫郑县。古郑县城在州北，即郑国城。《陕西通志·华州·卷十二》曰：“平王东迁，桓公从，改封新郑。后秦有此地，武公十一年，初县郑^[18]。”《汉书·彭越传》曰：“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洛阳。有司治反形已具，请论如法，上赦以为庶人，徙蜀青衣。西至郑，逢吕后从长安东，欲之洛阳，道见越。”^[19]即今华县。

⑬由郑县东北行15里左右至汉沈阳故城。沈阳废县在州东北15里。汉县。旧在渭水北，后汉安帝初移于此^[20]。又东北行28里至古长城，春秋时期秦晋分界处的长城。

⑭再东行至华阴县，即秦时的宁秦县，战国时秦惠王置。汉代因为其在华山之阴，于高祖八年（前199）改为华阴县。

⑮西岳庙，又称华山祠、华岳庙。为历代帝王祭谒五岳之一华山神祇的庙宇，位于华山北麓五公里。庙初创于春秋战国时期，至汉朝已经初具规模。

⑩由东至定城，《读史方輿纪要》曰：“定城去潼关三十里，汉末镇元将军段煨造，夹道各一城，渭水经其北^[21]。”《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九·华州》中的“华阴县”记载：“定城，郭缘生《述征记》云，或云段煨所造。未详。夹道各一城，城下有泥泉水出焉……后魏孝武帝永熙三年，于城中置定城驿。”^[22]在今华阴县煨峪乡西、西杨村南、赵坪村西。

⑪东行30里至潼关，两汉时期此地称为船司空。潼关最早见于史料是在建安十六年，曹操破马超、韩遂于潼关。《元和郡县图志·卷一》记载：“潼关在县（华阴）东北三十九里，古桃林塞也，春秋时晋侯使詹嘉处瑕以守，桃林塞是也……谨按：秦函谷关在汉弘农县，即今灵宝县西南十一里故关是也。今大路北，本非钤束之要。汉武帝元鼎三年，杨僕为楼船将军，本宜阳人，耻居关外，上疏请以家僮七百人徙关于新安，武帝从之，即今新安县东一里函谷关，自此以前，其关并在灵宝。其后二十年，至建安十六年，曹公破马超于潼关，则是中间徙于今所。”^[23]《水经注·渭水注》云：“河在关内南流潼击关山，因谓之潼关。”^[24]《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九》载：“潼关有潼水焉。按《三辅记》云，关因水得名。水去关一里。”^[25]在两汉前期没有关于潼关的记载。

二、隋唐时期的古道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发展的鼎盛时期，当然交通也不例外。隋唐时期在各水路交通大道上广泛设置馆驿，构成了以首都长安为中心的、遍布全国各地的驿站系统。唐代在通途大路上设置驿站，非大路上则设置馆，但是在唐代的诗文中大多是馆驿通用的。唐制每30里设置一个驿站，驿站设有驿长，配有马匹和车辆，驿站的规格不同，配置的马匹和车辆的数目也不同。但是，根据史书的记载，唐时各驿之间的距离没有什么严格的标准。在交通繁忙的大道上或许不到30里就有驿站，而在偏远的地区，或许80里以上还见不到一个驿站。平均下来，各驿站间的距离在40里以上。除了供官方的驿馆供来往行人休息外，民间还有许多私人开设的酒店和客舍，以方便来往商旅，同时沿途的寺院也有客舍的作用。所以，对唐朝人来说外出还是比较方便的。

京都长安城内设置有都亭驿，在朱雀街西，城中心地带；然城东南隅曲江池北亦见都亭驿。都亭驿为使臣、官员出入之总汇。^[26]现在有学者已经证明都亭驿就在朱雀街上，曲江池那并没有所谓的都亭驿。《长安志·唐京城》载：“朱雀门有南北大街，曰朱雀街，街东西广百步，万年、长安二县以此街为界，万年领街东五十四坊及东市；长安领街西五十四坊市及西。”^[27]从长安城内部都亭驿出发向东行驶，首先经过万年县境内，出通化门东行。《长安志·唐京城》目载：“唐京城东面三门，北曰通化门，门东七里长乐坡上有长乐驿，下临灞水。中曰春明门，当门外有汉太子太傅萧望之墓。南曰延兴门。”^[28]隋唐长安东面三门中，通化门出入最为频繁，春明门次之，延兴门则极少使用。

①出了通化门，东行到达的第一个地方是长乐坡的长乐驿。《元和郡县图志·万年县》记载：“长乐坡在县东北十二里。即浐川之西岸，旧名浐坂，隋文帝恶其名，改曰长乐坡。”^[29]据《资治通鉴》胡三省注里记载的长乐坡的条目大体与之相同，他补充一点说，因为长乐坡北面对着汉时的长乐宫，所以才有长乐坡一名。《长安志·万年县》记载：“长乐驿在县东十五里长乐坡下。”《两京道里记》曰：“圣历元年，敕滋水驿去都亭驿远，马多死损，中间置长乐驿，东去滋水驿13里，西去都亭驿13里。”^[30]由前面所引的资料可以得知，长乐驿距通化门7里，今西安市长乐坡，距通化门故址约7里，长乐驿的故址应该在此地。长乐驿又称长乐水馆，有唐代诗人李商隐的《雨中长乐水馆送赵十五滂不及》，诗曰：“碧云东去雨云西，苑路高高

驿路低。”长乐驿武后圣历元年置。在京师长安城东墙北来第一门通化门外七里，长乐坡上，东临灞水，西去都亭驿、滋水驿各约13（15？）里。以其为京师东行主干驿道第一驿，潼关、武关、蒲津关三道之总道口，故公私送行筵饯皆集于此，至为热闹^[31]。由于长乐驿重要的地理位置，所以史书上留下了很多关于它的记载，如《旧唐书·回纥传·卷一九五》记载：“至德二年十一月，叶护至东京至，敕百官于长乐驿迎。^[32]”同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乾元元年七月，破贼河上，擒……安守忠以献，遂朝京师。敕百僚迎于长乐驿，帝御望春宫待之。”^[33]除了正史以外，还有许多文人墨客也留下许多在此送别的诗篇，如柳宗元的《为杨湖南谢赐设表》，刘禹锡《为东都韦留守谢赐食状》，白居易的《劝酒诗》等。

很多学者都认为长乐驿是东出的第一个驿站，但王文楚先生认为东出的第一个驿站应该是城东驿，在长安城东面四里。严耕望先生认为城东驿和太宁驿是一个驿站。太宁驿、城东驿在京师东城门外草市，西至秦川驿四里，东至昭应县四十六里。所谓城东驿者，盖此驿欤？^[34]而秦川驿在长安城南门外，因此它是向东南出行的一个驿站，而不是向东行走必经的驿站。《长安志·万年县》也记载：“太宁驿在县城东草市，东至昭应驿四十六里，西至秦川驿四里。”^[35]辛德勇先生认为其实秦川驿并非唐驿而是五代或宋驿，在韩建改筑后的长安城西北角。太宁驿首见于《长安志》，在“城东草市”，“西至秦川驿四里”，正当韩建新城东郭之下，却在唐城城垣之内，但唐长安城内外并无草市之置，城中除了都亭驿外也没有其他的驿，太宁驿应该是宋代的驿站。^[36]

②从长乐驿出发，渡过灞水，行大约15里到达滋水驿。道路在此向东北陡折，近乎南北走向到达灞桥。灞桥是在隋开皇三年迁居大兴城时，被南移到灞水和灞水的交接处，重新建立的新桥。在唐唐隆元年，又重建为双桥，南北相并。桥石柱红栏，隋唐时期多在此折柳送别，所以《蜀道驿程记》上记载：“灞桥，桥旁两岸皆植杨柳，古名销魂桥。”灞桥东端为滋水驿。滋水驿、灞桥驿隋开皇十六年置，盖以水受名。滋水又名灞水，架石为桥，即有名之灞桥，置灞桥镇。驿近桥、镇，故又名灞桥驿。^[37]其地为京师长安城东面交通之咽喉、军事之要冲，长安祖饯，情谊笃厚者，更至此驿。《雍录·灞水杂名》载：“此地最为长安要冲，凡自西东两方而入峽、潼两关者，必由此路。”^[38]灞桥驿在今西安市东灞桥西北，与长乐驿之间的距离在前面介绍长乐驿时已经提到过，这里不再赘述。

但也有学者对滋水驿和灞桥驿有不同的看法，王文楚认为滋水和灞桥是两个不同的驿站为名，灞桥驿在今西安市东灞桥村，滋水驿在今西安市东灞桥镇，灞桥驿在滋水驿西边。由前面所引的长乐驿的资料可以知道，长乐驿的设置是因为滋水驿和都亭驿之间距离过远才设置的长乐驿，所以之前二驿之间应该没有其它驿站。增置长乐驿后，滋水、长乐驿间也不过十五里远的距离，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再设置其他驿站。北宋钱易《南部新书》称滋水驿在长乐驿东，可以说明终唐一代滋水、长乐二驿之间没有其它驿站存在。^[39]

③由滋水驿向东北行约30里至昭应县（今临潼县）。《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昭应本新丰，垂拱二年曰庆山，神龙元年复故名。天宝三载，以县去宫（温泉宫）远，析新丰、万年置会昌县。7载省新丰，更置会昌县及庆山曰昭应。东35里有庆山，垂拱二年涌出。”^[40]驿在县西南50步，或即称为昭应驿。《长安志·临潼县》记载：“昌驿亭在县西南50步，东至华州渭南驿八十里，西至本府秦川驿五十里。”^[41]《旧唐书·杨慎矜传》记载：“先令卢铉收太府少卿张萱于会昌驿，系而推之。”^[42]辛德勇先生认为，置会昌县后，从县城东北汉阴盘城徙阴盘驿在，改称会昌驿。可能随着县城名字的变化，驿站的名字也随着改变，所以它又称为会昌驿、昌亭驿、昭应驿。

④从昭应城东北出发，行十四五里到汉新丰故县、阴盘故城，这段路是循着汉代的旧路前进的。唐初有阴盘驿，应在此。《长安志》目记载：“阴盘城在县东北一十四里，汉溪……

《两京道里记》曰，汤泉水，阴盘故城东门外，去昭应十五里。故城，汉高祖与太上皇所置新丰邑。汉灵帝改封段颖阴盘侯，即此是。阴盘城高一丈三尺，东西南北各三千一百步，往来大路必经此城，行人憧憧，无所留疑。”^[43]《元和郡县图志·卷一》记载：“新丰故城在（昭应）县东八十里，汉新丰故城也。”^[44]辛德勇先生认为在会昌驿设置后，阴盘驿就被废弃，把它向西移，使其到滋水、戏水二驿间的距离大体相当。

⑤再往东北方向前进约3里到隋唐时期的新丰县城（今新丰镇），隋大业六年自其东南七里北周故城迁徙至此，唐武则天垂拱二年改称庆山，神龙元年复为新丰，天宝七年并入昭应。^[45]严耕望、王文楚二位学者均提出新丰城有“新丰驿”（或“新丰馆”）之说，辛德勇先生认为这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商榷。王文楚根据《旧唐书·姚崇传·卷九十六》载“玄宗讲武在新丰驿”^[46]进行判断此地应该还有驿站。严耕望指出此句应读为“玄宗讲武在新丰，异召元之代郭元振……”而《旧唐书·玄宗纪上·卷八》记载此事为“（玄宗）幸新丰之温汤，癸卯，讲武于骊山”^[47]，所以辛德勇认为玄宗讲武实在新丰骊山，而非新丰县城，认为玄宗在新丰县城之新丰驿讲武是错误的。他还指出昭应驿和戏水驿之间的距离尚不及30里，所以这段路程上不应该有其他驿站。

⑥继续向东，走大约十一二里到戏水店，《长安志·临潼县》记载：“戏水驿，《两京道里记》曰：大业六年置，在戏水店。”^[48]严耕望先生认为这个驿站设置很早，且在整个唐代都能见到。戏水驿在今临潼区新丰镇的东戏河口。

⑦东渡戏水，经北魏重置阴盘县城。北魏后期有阴盘驿，当在此地。驿亭在山上，北魏末骊道元经此被围，穿井不得水而遇害。^[49]由阴盘驿过零水东岸，经北魏重置新丰。据《太平寰宇记》载：后魏太和九年移阴盘县于今县（昭应）东32里，零水西，戏水东，司马村故城。其新丰县移于故城（汉新丰县）东30里，在零水侧。零水又名冷水^[50]。《水经注·卷十九》：“渭水又东，冷水入焉。水出肺浮山……历阴盘、新丰两原之间，北流入渭。”^[51]

⑧向东行约10里至零口。这里是零水入渭处，一名冷水。关于零口，很多唐代的史料中都能见到，如《新唐书·五行志·卷三十六》记载：“永徽元年六月，新丰、渭南大雨，零口水暴出，漂庐舍。”^[52]《太平寰宇记·昭应县·卷二十七》记载：“天授二年，于县界零口置鸿州……于郭下置鸿门县……久视元年废州并县。”^[53]在零口曾经设置过州，可知它应该在通途大路上。《长安志·临潼县》目记载：“冷水一作零，在县东35里。零口镇在县东45里。”^[54]

⑨继续东行，到达杜化驿，离戏水驿约27里。《长安志·渭南县》云：“东阳驿在县东13里。”书中又曰：“西魏大统十四年置。在东阳谷侧，因以为名。杜化驿在县西13里……”书中又曰：“亦大统十四年置，在杜化川。二驿今废。”^[55]杜化驿在今渭南西面的良田。

⑩再走13里到渭南县，又东13里到东阳驿，在东阳水谷侧（今有东阳桥），与杜化驿同时置。唐末省杜化、东阳两驿，置渭南驿于城内。《长安志·渭南县》记载：“渭南驿在县郭内，东至华州佑顺馆三十四里，西至临潼县驿六十二里。”^[56]在唐中前期还能见到有关杜化驿和东阳驿的记载，如《新唐书·路嗣恭传·卷三十八》记载：“转渭南令，主杜化、东阳二驿。时关畿用兵，使人系到，嗣恭储具有素，而民不扰。”^[57]这是玄宗天宝末年的事情了。东阳驿在今渭南东面的东阳桥。

⑪又向东走约12里到赤水店，在赤水谷，盖在西侧。唐末见有赤水驿（今赤水镇），大概东阳驿废弃后在渭南和华县中间设置了此驿站。《水经注·渭水注》载：“东得东阳水……又东与竹水合。水南出竹山北……历广乡原东，俗谓之大赤水，北流注渭。”^[58]由此可知，赤水在东阳水东不远处。《长安志·渭南县》载：“赤水镇在县东15里。”^[59]由《九域志》的记载可知，在华州的郑县有赤水东镇，而在渭南县有赤水西镇。赤水应该在大路所经之处，水东西皆有村镇。关于赤水的记载史书中也有很多，如《新唐书·叛臣传·卷二二四》记载：“李忠臣提兵入华州，所过大掠，自赤水距潼关200里无居人。”^[60]赤水驿在今华县西赤水。

⑫再向东行25里到华州下辖的郑县（今华县），距长安180里。置佑顺馆，盖在县郭内。^[61]关于佑顺馆，在前面介绍渭南驿时曾经提到过，至于详细的资料，现在还没有人提出。《元和郡县图志·卷一》记载：“郑县本秦旧县，汉属京兆。后魏置东雍州，其县移在州西七里。隋大业二年，州废移入州城，隶属雍州。至三年，以州城屋宇壮丽，置太华宫，县即权移城东。四年宫废又移入城。县西南十里有少华山。”^[62]可知郑县在华州府内，但也有说，在唐中叶时郑县在州城西三里，官道之南。

⑬华州，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华州，《禹贡》雍州之域，周为畿内之国，郑桓公始封之邑。其地一名咸林，春秋时为秦、晋界邑。长城在州东72里。或说秦、晋分祠华岳，故筑此城。战国时属秦、魏。八到：西至上都180里。东到东都680里。东到潼关120里。”^[63]“华为京东第一州，邮传馆驿之务至繁。有普德驿，规制甚壮，称为‘邮亭之甲’，盖在州治。”^[64]崔祐甫的《滑亭新驿碑阴记》中记载：“华之普德，薰之闾乡，自昔为邮亭之甲，今兹白马可以抗衡。”也有学者认为在华县和华州城内分别设置有驿站，这么近的距离内是否有两个驿站存在，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⑭州东西10里或14里各有石桥，称为西石桥（今石桥铺）、东石桥，为大道所经。据《水经注·渭水注·卷十九》记载：“渭水又东，西石桥水东出马岭山……北经郑城西，水上有桥。桥虽崩褫，旧迹犹存，东去郑城10里，故世以桥名水也……渭水又东经郑县故城北……渭水又东，与东石桥水汇，故沈水也。”^[65]可知，关于这两个桥的资料很早就有记载。

⑮出华州，向东北行走，经过东石桥15里到汉沈阳故城。据《太平寰宇记·华州郑县》记载：“沈阳故城在州东北15里驿路南，石桥东。”^[66]此桥应该是东石桥。

⑯再东行15里到敷水店，此处有敷水驿，在敷水西岸（今敷水镇）。关于敷水驿的记载在一些史料中可以见到，但是具体它是什么时间设置的，没有明确记载。据《旧唐书·元稹传·卷一六六》记载：“元稹为监察御史，由河南还京，宿敷水驿，内官刘士元后至争厅，士元……箠击稹面。”^[67]相关的诗篇有刘德舆的《敷水驿诗》，刘禹锡的《途次敷水驿伏睹华州舅氏昔日形县题诗有感》等。有人认为在敷水驿东面还存在一个罗敷东馆。

⑰再向东北走28里到古长城，唐置长城驿。关于古长城的记载，前面在介绍华州时已经提到，这里不再赘述。至于长城驿什么时间设置的史书没有具体记载，但是留下了相关的史料，如《旧唐书·文苑传·卷一九〇》记载：“贬为泉州司马，行至华州长城驿，赐死。”^[68]长城驿在今华阴县西。

⑱继续行大约2里到华阴县，据《元和郡县图志·华阴县·卷一》记载：“华阴县西至州六十里。本魏之阴晋邑，秦惠文王时，魏人犀首纳置于秦，秦该曰宁秦。汉高祖八年，更名华阴，属弘农郡。太华山在县南八里。永丰仓，在县东北三十五里渭河口，隋置。”^[69]又据《新唐书·地理志·卷三十七》中记载：“华阴，有岳祠。有潼关，有渭津关。”^[70]有学者认为除了长城驿以外，在县城内还有华阴驿存在。

⑲从县城出发向东行，经华岳祠。旧道在祠北，开元十二年移到祠南。县与祠之间，大历中似有驿馆。^[71]据《唐会要·行幸》记载：“（开元）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幸东都。十日至华州。命刺史徐知仁与信安王祗勒石于华岳祠南之通衢上，亲制文及诗。”本注：“旧路在岳北，因是移于岳南。”^[72]唐玄宗先天二年（713）曾封华山神为金天王，北宋时期又加封为金天顺圣帝。西岳庙现在华阴县岳庙乡北街村东侧。王文楚先生根据《通典·州郡三》记载的驿路在开元十二年（724）移动到华岳祠之南的史料，认为在此地应该有一个东驿。

⑳又东行到定城，定城在秦汉古道中已经介绍过，这里不再叙述。

㉑再向东北行走经野狐泉店，行大约26里至永丰仓，当渭水入河之口。有渭津关渡，北通朝邑。仓东四里至潼关。去长安约280里。^[73]野狐泉店在史书上经常能够看到，应该在大道旁边。《南部新书》戊记载：“野狐泉店，在潼关之西，泉在道南店后坡下。”《资治通鉴·卷

二五四》记载：“广明元年十二月，黄巢攻潼关，张承范不能守，变服率余众脱走，至野狐泉，遇奉天援兵二千继至。”^[74]也有一些诗文留下来，如元稹的《野狐泉柳林诗》，白居易的《狐泉店前作》等作品。野狐泉店在今华阴市东北的西泉店。

永丰仓在前面介绍华阴县里已经提到，隋朝的时候设置的，在唐代一直沿用。

②潼关，南北朝后周文帝破东魏军，杀大将窦泰于此，因名潼关谷。隋大业七年，移于南北镇城间坑兽槛谷，去旧潼关四余里。唐天授二年，移近黄河，实立潼关。^[75]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一》记载：“河山之险，迥迤相接，自此北望，川途旷然，盖神明之奥区，帝宅之户牖，百二之固，信非虚言。”^[76]关于潼关故城的迁徙，史念海先生在他的著作《河山集》第二集中有详细的论述，即唐以前的潼关古城在现今旧潼关城（现名港口）东南两公里处的杨家庄附近，1972年还能见到相当完整的城墙，高出旧黄河岸边260米。隋代的时候又向南迁移，旧址在今天杨家庄南半公里的城北村。古代此段黄河紧靠南原脚下，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通行，因此从东面来的行人经过黄巷后，向南走到远望沟，在折下来到南原，所以在此地筑关，以扼守东西交通。唐朝时期，把关城北移到黄河岸边。可能是因为黄河不断下切，河床水面日渐下落，原来的河畔显露出来，来往行人可以在此通过，不必再绕到南原上。为了这个军事要冲之地，所以关城也随着北移。关路“俯视洪流，盘形峻极，实谓天险”，为长安东道第一隘。关门开两洞，置四扇门，备出入。隋置关都尉，盖统南北两城。唐开元世，上关仅六，此即其一。中叶屡置节镇，而华州刺史及历代潼关防御使。^[77]据《唐六典·刑部司门》记载：“京城四面关有驿道者为上关。”《资治通鉴·卷一八四》记载：“义宁元年，（隋）将军刘纲戍潼关，屯都尉南城。屈突通欲往依之，王长诸先引兵袭斩纲，据城以拒通。通退保此城。”^[78]

③关内置驿，曰潼关驿，又名关西驿。《旧唐书·封常清传·卷一〇四》记载：“边令诚至潼关，引常清于驿南街西，宣敕示之。”^[79]《资治通鉴·唐纪·卷二一八》记载：“至德元载，崔乾祐进攻潼关，克之。哥舒翰至关西驿，揭榜收散卒，欲复守潼关。”^[80]此外还有很多关于潼关的诗篇，如薛逢的《潼关驿亭》，吴融的《关西驿亭即事》等。还有学者认为关西驿和潼关驿是两个不同的驿站。隋唐时期的古道相对与秦汉时期的古道而言，前段路程整体上向南移了。因为隋文帝建国后，重新在汉长安城的南面建造了一座新的都城——大兴城，所以道路随着城址的变化而变化。

三、宋元明清时期古道的沿革

宋代是60里一驿，长安到潼关间的很多驿站被废，一般在县城内设置驿站。主要经过长乐驿、滋水驿、临潼县、戏水驿、零口镇、渭南县、华县、华阴和潼关。元代时这条古道上的驿站主要有奉元站（即西安站）、临潼站、渭南站、华州站和华阴站，明代基本上沿袭了元代的驿站设置，主要的驿站有新丰驿（即临潼驿）、丰原驿（即渭南县驿）、华山驿（即华州驿）、潼津驿（即华阴县驿）。这些只是名字的变化，其道路的主要走向并没有发生变化。与现今的交通路线比较可知，其中临潼到渭南这段路程基本就是现在陇海铁路沿线，而渭南至潼关基本是沿现今的省道前进的。

四、古道旁的离宫及两地间的实际距离

大道上除了设置驿馆供来往的官员、行人或商旅休息外，旁边还常设有离宫，以方便君主临幸四方。特别是在长安和洛阳这两个政治、经济中心之间更是离宫别馆林立。秦汉时

期，由于年代久远，所以很多离宫的资料都已经丢失。有记载的仅有下面几个：秦朝在芷阳县（汉霸城县）内设有芷阳宫、步寿宫和步高宫。根据何清谷的《三辅黄图校释》里记载，步寿宫在老渭南县城西南的张胡村；步高宫可能在渭南市南崇凝乡新尚村。西汉时期沿用了秦的步高宫，在汉新丰县东南，在华阴县南建有集灵宫。这里主要记叙隋唐时期长安到潼关间的离宫及其路程。

隋唐时期，长安到洛阳离宫大多是隋炀帝留下来的，唐代继续沿用或者废弃，当然也有唐代新建的一些离宫。据《贞观政要·卷十》中记载：“隋炀帝广造宫室，以肆形幸，自西京至东都，离宫别馆相望道次。”^[81]唐前期，君主常往来于长安与洛阳之间，所以道旁的离宫还经常使用，唐中后期由于战乱或是国库空虚，君主基本上不再两都之间往返，所以大多数宫殿都被废弃。下面就西安到潼关这段路程上的离宫做一下简要介绍。

①从长安城出来，经过的第一个县城是万年县。据《新唐书·地理志·卷三十七》记载：“万年县有南望春宫，临沪水，西岸有北望春宫，宫东有广运潭。”^[82]万年县在长安城内，所以不应该算在行幸范围之内。出了长安城，首先到达昭应县，书中又记载：“昭应，有宫在骊山下，贞观十八年置，咸亨二年始名温泉宫。”此外又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一》记载：“华清宫在骊山上。开元十一年，初置温泉宫，天宝六年改为华清宫。又造长生殿，名为集灵台，以似神也。”^[83]温泉宫大多数人都知道，因为里面有杨贵妃与唐明皇的爱情故事。它离大路较远，在骊山脚下。

②渭南县：据《新唐书·地理志·卷三十七》记载：“西10里有游龙宫，开元二十五年更置。东十五里有隋崇业宫。”^[84]《长安志·渭南县》记载：“隋崇业宫在县东十五里，隋大业二年置。”^[85]

③郑县（今华县）：据《新唐书·地理志·卷三十七》记载：“郑东北有神台宫，本隋晋德宫，咸亨二年更名。”^[86]前面在介绍郑县时还提到，隋时在州城内设置太华宫，后来废置。

④华阴：据《新唐书·地理志·卷三十七》记载：“华阴，西18里有琼岳宫，故隋华阴宫，显庆三年更名。东13里有隋金成宫，武德三年废，显庆三年复置。”^[87]两宫分别在东西方向上，相距不过30余里。在这六个离宫中，其中四个是隋朝的旧宫，只有温泉宫和游龙宫是唐朝时新置的。

关于长安到潼关的距离，根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的华州的“八到”，其中西至长安180里，东至潼关120里，那么长安到潼关就是300里。据严耕望先生的《唐代交通图考》中记载的各个驿站和县城之间的距离（按最远计算）来计算，即都亭驿到长乐驿15里，长乐驿到灊桥驿也是15里，灊桥驿到昭应县驿为30里，昭应驿至戏水驿为27里，戏水驿至渭南驿为40里，渭南驿至赤水驿为25里，赤水驿到华州下辖的郑县为25里，由华州出发30里到敷水驿，由敷水驿至华阴县为30里，由华阴到潼关为39里。长安城到潼关的总距离为276里。唐代的里数与我们现在通常用的里数还不尽相同，胡戟先生在他的《唐代度量衡与亩里制度考》这篇文章中考证了唐代的里与现在里的换算关系。他认为，唐代的里有大里和小里之分，大里为360步，小里以6尺为步，尺也为大尺（24.578厘米）。他推算的结果为：大里1里为531米，相当于今的1.06里；小里1里为442.5米，相当于今天的0.88里。根据《元和郡县图志》里面长安到潼关为300里，以大里换算为今天的里，应该是318里，即159公里；以小里换算为今天的里，应该是264里，即132公里。再根据严耕望的《唐代交通图考》的276里来计算，以大里换算的结果为292.56里，即146.28公里；以小里换算的结果为242.88里，即121.44公里。现在西安至潼关交通非常便利，除了有省道101、国道310和西潼高速公路外，还有陇海铁路线。其中省道101表示的西安到通关的距离是165公里，陇海铁路线表示的是135公里，由此可以看出，按大里来换算是比较符合实际距离的。

五、古道旁丰富的文化遗存

关中平原是人类最早的栖息地，所以这段古道上留下人类丰富的文化遗存，从新石器时代到近现代，各个时期的文化现象都有存在。下面简要介绍一些文化遗迹。

长安城内的文化遗存遍地都是，我们从长安城外开始介绍。

①出了长安城到达的第一个驿站是长乐驿，现存有长乐坡遗址，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面积约30 000平方米，位于浐河西岸的二级高地上，是在1957年调查发现的。附近还有著名的半坡遗址，它也在浐河东岸的二级阶地上，此外还有十里铺墓群，包括战国、秦汉、北朝、唐宋、明等历代墓葬300多座。

②灞桥遗址，现在位于灞桥区的灞桥镇柳巷村。这座桥就是隋开皇三年建造的，一直沿用到元代。是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4月发现的，出土了一些隋唐时期的瓦片以及“扶风郡王赠司徒马府君神道碑”。

③再前进，就到了现在的西安市临潼区。在戏河河北岸二级台地上有庞岩遗址，即现今的纸李乡庞岩村南面，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个灰坑，面积约50 000平方米，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存。在戏河西岸的台地上还有一个崖赵遗址，也是新石器时代的，位于现在的新丰镇赵村东面100米处。在零口乡零口村的东北侧还存在一个，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零口遗址，位于渭河南岸的台地上，1955年发掘的，面积约490平方米。

④秦汉时期的骊邑、新丰故城，位于现新丰镇沙河村南侧，属于渭河南岸的二级台地上。它是1987年和1990年调查发掘的，城址平面略成长方形。临潼区的文化遗存特别多，著名的有秦始皇陵和华清宫，此外还有骊山镇明代的临潼故城遗址和清代的临潼县衙大门，零口乡还存在有清代的戏河桥和零桥。

⑤郑县（现华县），有新石器时代的南沙遗址，唐代李元谅碑，元代禅修寺大殿以及清代的桥上桥等。

⑥华阴县（现华阴市）内的文化遗存也很丰富，有新石器时代的横阵遗址，战国时期的魏长城遗址，现存的在华阴境内的有6公里长，以及战国时期的阴晋故城，1957年调查、发掘的，城址平面呈南北长、东西窄的椭圆形。战国至秦时的宁秦故城，西汉时期的华阴故城和定城故城，西汉粮仓遗址以及明清时期的西岳庙。

⑦潼关周围的一些遗址，有唐至清时的潼关城遗址。唐代修建的潼关城，被宋元明清一直沿用，且有修补和扩建。在1937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期间，遭到日军的炮击、空袭和驻军的拆毁，潼关城破坏严重。1959年修建三门峡水库时，县城被迫搬迁，在搬迁过程中，城门建筑及部分城垣被拆除。在城关镇东面约3公里的禁沟土原上有唐代至清的十二连城烽火台遗址，在港口镇凹里村北面600米处有清代金陵关遗址。关址北临黄河，南依牛斗原，是古潼关东面的门户。

西安至潼关这段古道，虽然在路程上没有大的起伏和变动，但是它处于关中平原的东部，而潼关又是陕西的门户。所以有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在这里发生，因此弄清古道具体路线对于研究汉唐丝绸之路中原路段的情况，以及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都是非常重要的。

六、小结

近年来关于古代交通道路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课题，特别是丝绸之路和各大城市之间的交通。西安至潼关这段古道也备受关注。通过实地考察可知，秦汉时期的这段

古道相对来说比较平直，而且最靠北；而隋唐时期的古道在临潼来了一个大转弯，因为在此地有着著名的华清宫存在，过了临潼后基本上与秦汉时期的古道大体上相同。与现在的交通道路相比较而言，古道靠北，与乡县级的道路大体相同。整体上而言，长安至潼关这段古道，从形成到现今，它的路线变化都不是很大。它主要是沿渭河南岸及秦岭北侧平缓的地带前进，大体的路线没有变化，只有具体的县城或驿站的位置的变化。它不像潼关到洛阳的路程，有崤山南路和北路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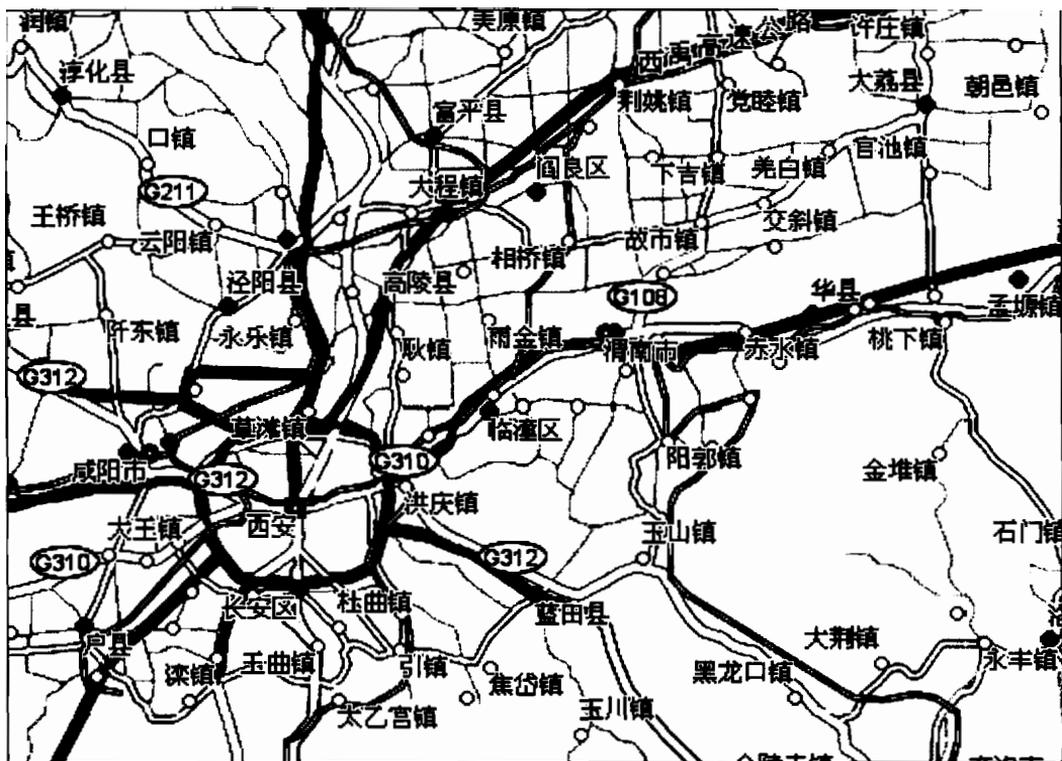


图1 今西安至潼关的交通简图

注释

- [1] 魏 征：《隋书·食货志·卷二十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
- [2]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中华书局，2005年版。
- [3] 程大昌：《雍录》，中华书局，2002年版。
- [4]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一》，中华书局，2005年版。
- [5] 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
- [6] 班 固：《汉书·五行志·卷三十七》，中华书局，1975年版。
- [7]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一》，中华书局，2005年版。
- [8]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一》，中华书局，2005年版。

- [9] 班固：《汉书·王莽传·卷九十九》，中华书局，1975年版。
- [10] 司马迁：《史记·李将军列传·卷一〇九》，中华书局，1975年版。
- [11] 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卷五十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
- [12] 酈道元：《水经注·渭水注·卷十九》，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 [13]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
- [14] 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
- [15] 赵延瑞：《陕西通志·临潼县·卷二》，三秦出版社。
- [16] 酈道元：《水经注·渭水注·卷十九》，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 [17]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
- [18] 赵延瑞：《陕西通志·华州·卷十二》，三秦出版社。
- [19] 班固：《汉书·彭越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 [20] 赵延瑞：《陕西通志·华州·卷十二》，三秦出版社。
- [21]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中华书局，1975年版。
- [22] 乐史：《太平寰宇记·华州·卷二十九》，中华书局，2000年版。
- [23]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
- [24] 酈道元：《水经注·渭水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 [25]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九》，中华书局，2000年版。
- [26]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 [27] 宋敏求：《长安志·唐京城》，民国二十年铅印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 [28] 宋敏求：《长安志·唐京城》，民国二十年铅印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 [29]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
- [30] 宋敏求：《长安志·万年县》，民国二十年铅印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 [31]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 [32] 刘昫：《旧唐书·回纥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 [33] 刘昫：《旧唐书·郭子仪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 [34]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 [35] 宋敏求：《长安志·万年县》，民国二十年铅印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 [36] 辛德勇：《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四期。
- [37]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 [38] 程大昌：《雍录·灊水杂名》，中华书局，2002年版。
- [39] 辛德勇：《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四期。
- [40] 欧阳修：《新唐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76年版。
- [41] 宋敏求：《长安志》，民国二十年铅印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 [42] 刘昫：《旧唐书·杨慎矜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
- [43] 宋敏求：《长安志》，民国二十年铅印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 [44]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
- [45] 刘昫：《旧唐书·地理志·卷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
- [46] 刘昫：《旧唐书·姚崇传·卷九十六》，中华书局，1975年版。
- [47] 刘昫：《旧唐书·玄宗纪上·卷八》，中华书局，1975年版。
- [48] 宋敏求：《长安志》，民国二十年铅印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 [49] 李延寿：《北史·酈道元传·卷二十七》，中华书局，1975年版。
- [50] 乐史：《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

- [51] 酈道元：《水经注·卷十九》，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 [52] 欧阳修：《新唐书·五行志·卷三十六》，中华书局，1975年版。
- [53] 乐 史：《太平寰宇记·昭应县·卷二十七》，中华书局，2000年版。
- [54] 宋敏求：《长安志·临潼县》，民国二十年铅印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 [55] 宋敏求：《长安志·渭南县》，民国二十年铅印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 [56] 宋敏求：《长安志·渭南县》，民国二十年铅印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 [57] 欧阳修：《新唐书·路嗣恭传·卷一三八》，中华书局，1975年版。
- [58] 酈道元：《水经注·渭水注》，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 [59] 宋敏求：《长安志·渭南县》，民国二十年铅印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 [60] 欧阳修：《新唐书·叛臣传·卷二二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
- [61]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 [62]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
- [63]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
- [64]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 [65] 酈道元：《水经注·渭水注·卷十九》，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 [66] 乐 史：《太平寰宇记·华州郑县》，中华书局，2000年版。
- [67] 刘 昫：《旧唐书·元稹传·卷一六六》，中华书局，1975年版。
- [68] 刘 昫：《旧唐书·文苑传·卷一〇九》，中华书局，1975年版。
- [69]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华阴县·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
- [70] 欧阳修：《新唐书·地理志·卷三十七》，中华书局，1975年版。
- [71]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 [72] 王 薄：《唐会要·行幸目》，中华书局，1975年版。
- [73]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 [74]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
- [75] 赵延瑞：《陕西通志·潼关卫·卷七》，三秦出版社。
- [76]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
- [77]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 [78]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75年版。
- [79] 刘 昫：《旧唐书·封常清传·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
- [80] 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卷二一八》，中华书局，1975年版。
- [81] 吴 兢：《贞观政要·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 [82] 欧阳修：《新唐书·地理志·卷三十七》，中华书局，1975年版。
- [83]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一零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
- [84] 欧阳修：《新唐书·地理志·卷三十七》，中华书局，1975年版。
- [85] 宋敏求：《长安志·渭南县》，民国二十年铅印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 [86] 欧阳修：《新唐书·地理志·卷三十七》，中华书局，1975年版。
- [87] 欧阳修：《新唐书·地理志·卷三十七》，中华书局，1975年版。

崤函古道历史地理 调查与研究

崤函古道是我国古代“襟带两京”即长安、洛阳的锁钥，也是中原通关中、达西域的东西干道上的咽喉，它在连接长安、洛阳两大都城，沟通中原与关中和西域等方面起过关键性的作用。历史文献对崤函古道有许多记载，但对其线路及沿线经地都比较笼统，唯西晋潘岳《西征赋》、《旧五代史》及《通鉴·二七九》述后唐潞王起兵凤翔，经长安入洛阳即位行程，以及南宋初年郑刚中《西征道里记》中有较详细的记载，但它们所记均是当时的崤山北路和函谷道，行程大略相同。因此，对整个崤函古道的具体走向，学术界一直不甚清楚。20世纪80年代以来，严耕望、王文楚、辛德勇及胡德经等学者对崤函古道的路径及其变迁做了许多研究，^[1]提出了比较具体的复原方案，对于阐明这条古道的历史面貌起到了重大作用，读后令人景慕不已。但是就崤函古道的总体状况而言，其复原方案仍有待细化和深化之处。

近年来，笔者先后多次前往该道沿线及若干支道进行系统的调查，发现了一些新的古代遗迹和资料，这些遗迹和资料，或与崤函古道有直接关系，或可间接证实崤函古道的运行状况，或可作为理解崤函古道的背景资料，从而使我们对这段古道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对其交通线路、发展脉络和沿线所经及其历史地位与价值有了新的认识。现结合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对崤函古道试做综合研究，以就教于方家。

一、崤函古道的形成

崤函古道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有其特定的含义，它是历史时期为沟通长安（西安）、洛阳这两大古都而形成的东西交通要道——“两京大道”和“两京驿道”在今三门峡及其毗邻地区的总称。其东端分别始于古都洛阳西出口口的新安、宜阳县，西至关中盆地东侧门户陕西潼关。因其沿线主要穿行于崤山之中，所经之途，山势高峻，谷深委曲，又有号称天险的函谷关，故而被称为崤函古道。丝绸之路开通后，崤函古道又与其它通道组合，由原来的境内通道，而发展成为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重要的干线路段之一，故而又被称为丝绸之路崤函道。

崤函古道东西全程约200多公里，中间有合有分。以古陕州（陕县）城为枢纽，崤函古道分为东、西两段：即“函谷道”和“崤山道”。函谷道是自潼关进入豫西丘陵山地，沿黄河南岸东行，经阌乡、盘豆、稠桑、函谷关、沙坡、灵宝老城、曲沃、新店抵陕州故城，因其道路主要沿黄河南侧而行，又称为“黄河南岸道”。“崤山道”则分南、北两两条支（路）线，即“崤山南路”或“南崤道”和“崤山北路”或“北崤道”。崤山南路是自陕州城沿青龙涧河东南行，经今交口、菜园，再溯青龙涧河支流雁翎关河穿崤山，经雁翎关、宫前，沿洛河支流永昌河东南行，经洛宁之河底、鹿桥，再循洛河谷地，经宜阳之新乡、韩城，北上入洛阳。崤山北路则是由陕州城，沿涧河河谷东行，经今交口、张茅、硤石、石壕，东过七里入滏池，经义马、铁门、新安，顺谷水至洛阳（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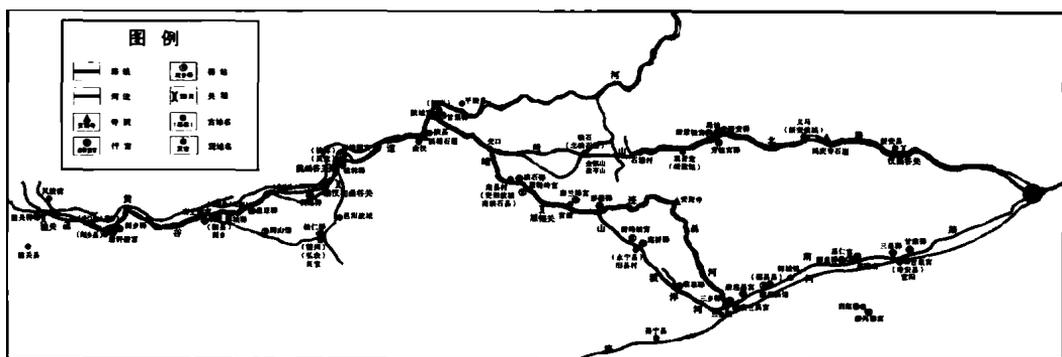


图1 崤函古道交通线路（陆路）示意图

崤函古道并非一日形成。有学者根据《尚书》等的记载，认为黄河南岸道和崤山南路分别形成在大禹治水和启伐有扈氏时期。而崤山北路则迟至商代后期才开通。^[2]事实上，这条道路开通利用的历史极为久远，根据考古资料以及部分文献记载，崤函古道早期开发大致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因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时代开始，崤函古道地区便开始与西面关中东部的华渭地区的居民、东面崤山以东的伊洛河流域的居民存在着某些直接和间接的往来和交流关系，并一直持续不断。崤函地区是著名的仰韶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发祥地和中心分布区。距今5000—7000年的仰韶文化，是分布在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最早发现于崤山地区东端的滏池县仰韶村而得名。距今4400—5500年的庙底沟文化则以最早发现于青龙与苍龙两涧河交汇处的庙底沟而得名，后者又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的庙底沟文化称作庙底沟一期文化或庙底沟类型，属仰韶文化中期，而晚期的庙底沟文化则称作庙底沟二期文化，属龙山文化早期。崤函古道地区仰韶文化和庙底沟文化遗址分布十分密集，粗略统计，在二三百处。从古遗址分布图看，许多重要遗址都分布在崤函古道沿线（图2、图3），如市郊的庙底沟遗址、三里桥遗址，交口的杨家沟遗址、南交口遗址、小交口遗址，陕县的菜园遗址、原店遗址、七里铺遗址、硤石遗址，灵宝的三圣村遗址、五帝村遗址、北阳平遗址、西坡遗址，滏池的仰韶村遗址、西河南遗址等。从考古遗址分布的特点看，此时期氏族聚落的分布密度明显在增大，各民族聚落间的空间距离明显在缩小，原来仅建立在单一氏族内部和有限的氏族外部的道路和交通网也因此得到更大幅度地拓展。仰韶文化和庙底沟文化曾影响了大半个中国。而在伊洛河流域，考古学家已相继发现大量的仰韶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遗存，在华渭地区也同样发现有大量的此类遗存。^[3]这些情况表明，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由崤函地区往东部伊洛地区、西部华渭地区的东西通道，在当时大致已基本形成和被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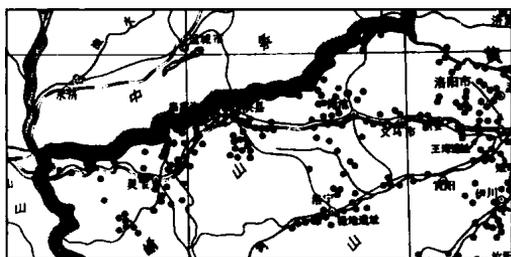


图2 崤函地区仰韶文化遗址分布和交通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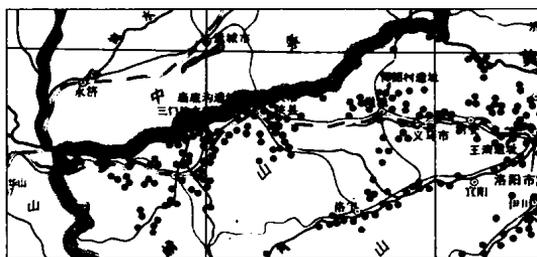


图3 崤函地区龙山文化遗址分布和交通示意图

关于崤函古道很早以来就是一条今崤函地区与东、西邻近地区古代氏族人群进行交往联系的重要通道，这一事实，不仅从考古文化遗迹上得到充分的说明，从部分古代文献中同样可以得到有力的佐证。中国最早记载行走的神话故事集《山海经》一书中录有“夸父追日”的传说：“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这则神话故事可能是一个反映了中国最早的史前民族迁徙活动的神话故事。或认为“夸父追日”很可能正是反映了一支源自西北的远古部族所进行的溯河、渭而上的迁徙活动。部族迁徙是原始时代最大规模的交通活动。其中的所谓“弃其杖，化为邓林”的地方，据注《山海经》的郝懿行说，就在灵宝的东南夸父山的北面，又叫桃林，也就是古代有名的桃林塞。《山海经·中次六经》中云：“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是广园三百里，其中多马。”黄帝族生活在渭水上游的支流——姜水旁边。后来，向东部扩张和迁徙，沿着渭水、黄河南侧河岸的交通走廊，游徙于嵩山之外。《史记·五帝本纪》云：“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开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文中提到的“熊”，即熊山，在今河南西部与陕西商南交界处。灵宝铸鼎原是司马迁笔下的黄帝铸鼎铭功升天之处。近年考古发掘证明，灵宝铸鼎原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中心区域，^[4]其北端即为崤函古道。而庙底沟类型存在的年代正涵盖了黄帝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后。依据《尚书·禹贡》中记大禹治水路线，其中说：“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砥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纳，至于大伾。”也就是自积石山导河，曲折到山西、陕西的龙门，南到华山的北面，再向东便到了三门峡砥柱山、孟津及洛水入河处，然后经河南浚县东南大伾山。上述文献记载均说明崤函古道至迟在新石器时代后期这条道路就已经被古代人类所开通和利用，并成为今陕西、河南乃至更大地域范围远古氏族人群迁徙流动及文明传播的重要孔道。

根据古遗址的内涵和分布，最早开发并相互形成组合关系的东西向通道应当是函谷道，而崤山道则略晚些。从古遗址的分布看，崤函地区仰韶文化遗址形成了7个大聚落群，即陕县（含湖滨区）、灵宝川口、铸鼎源、豫灵镇、五亩和朱阳以及澠池仰韶村、卢氏洛河谷。^[5]其中以陕州故城及其以西的黄河南岸走廊河谷附近分布最为密集，前5个大聚落都分布在这一区域，且聚落群与聚落群之间相对距离较近，从大范围看已经联结为一个整体。而关中地区仰韶文化遗址又以渭河两岸及潼关地区最为稠密。现有考古材料表明，在仰韶文化时代，崤函地区的文化传统和文化面貌似乎与关中地区联系更为密切。在已判定的陕西仰韶文化类型的遗址中，半坡类型占28%，庙底沟类型占59%，其他类型占13%。晚于半坡类型的庙底沟类型文化，早期曾与半坡类型的史家类型东西对峙，中期已将势力范围向西扩展到渭河流域甚至更远。在408处庙底沟类型遗址中，关中地区就有208处。^[6]而庙底沟类型文化虽与半坡类型文化有明显的区别，但又存在一定的共同因素，这种现象在经济生产、器物特征、房屋的建筑以及埋葬习俗上都明显地表现出来。如庙底沟类型彩陶中的蛙纹、鸟纹有可能就是受半坡类型彩绘花纹的影响而出现

的。这说明距今5000年前后的今崤函地区，原与关中间有着相当密切的文化和经济联系。

与此相比，崤函地区的文化传统和文化面貌与伊洛地区的区别则较为明显。从崤函地区仰韶文化与关中仰韶文化的共性关系，以及它们对甘肃地区和河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影响情况，表明了此时期崤函地区居民与外界交流和往来的重心显然是向西。而前引的《山海经》、《尚书·禹贡》及《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所记夸父、黄帝、大禹等的行走路线也大致是由西向东，与考古资料所证实的函谷道时间上最早形成正相吻合的。因此，以黄河走廊为主体的函谷道是最早开发并相互形成组合关系的東西向通道，崤山道的形成与形成组合关系可能略晚于函谷道（这里指的是崤山北道，崤山南道又略晚于北道）应是完全可信的。

这两条道路自开通后，一直到夏商时期仍在应用。因为文献记载，夏初启征有扈氏便是取道崤山南路而向甘（今陕西户县境内）进军。相传夏王朝的第十四世帝王皋死后葬于崤山，后代称为南陵，今墓尚存，此地处于启征有扈氏行军走过的大道旁。而北陵即周文王避风雨台，地在今陕西东碛石村东北，位于商末周文王前往商都朝歌朝奉商王的大道上。而先周与商的联系，至迟在商王武丁时期便已建立，并作为藩属国臣服于商。依据殷墟卜辞及有关文献，商王朝时期，在今崤函地区可考的方国部族主要有夹方（今陕西一带）、泚（今陕西）、亘方（今澠池一带）以及楚（今灵宝）、澠（今澠池）、宫（今陕西宫前）、莘（今陕西）、擊（今陕西西北至山西平陆西南）、莞方（今河南、陕西、山西交界处）、卢方（今卢氏）等。^[7]这些方国与商王朝存在着臣属或战争的复杂关系，似乎从未停止过经济、文化的相互交往，如卢方以盛产猪和犬闻名，商王祭祀先祖大量使用卢方进贡的此类物品，并多次到卢方田猎。^[8]当然，新石器时期和夏商时代的上述通道与后来的崤函古道的走向和性质并非完全相同，但其长期使用并不断调整和更新沿线所经，使之更加适宜于崤函与邻近东西地区的交通，这为崤函古道的最终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崤函古道大规模的开通和兴起是在西周初期。西周初年，基于对西周首都丰镐偏于西北一隅以及伊洛地区商朝遗民的忧虑，周武王在天下初定之时，即决定另行兴建东都洛邑，开创了东西两都制度，为此造成了对两都间交通需求的骤增。这导致了由西周中央政府直接介入、有计划地在两都间开辟修建宽阔平直道路的兴起。秦汉时期，出于解决关中地区的粮食和物资运输问题和满足京师巨大的消费与西北边关的军粮供给的需要，又造成了大规模的黄河漕运和黄河古栈道的兴起与修建，成为崤函古道上的特殊道路工程。崤函古道至隋唐时期臻于极盛。所谓“两京间驿家，缘使命极繁”，^[9]“来去腾腾两京路，闲行除我更无人”，^[10]崤函古道不仅是连接东西两京之间的一个庞大的交通运输网，而且是一条政治和文化纽带，同时也是连接东西两京之间的一个重要的经济纽带，一条通西域、达中原的中外交流的友谊纽带，一条重要的军事交通战略线，它对于密切和加强东西两京的关系乃至东西部及中外友好关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北宋以后，随着政治中心移向东南并最终定位于北京，崤函古道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其交通功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它仍然是受当时人注重青睐的横贯东西的大动脉，历代多有维修。如《宋会要·方域》中记载：“太祖建隆三年正月九日，诏西京修古道险隘处，东自洛之巩，西抵陕之湖城，悉命治之，以为坦途。”直至民国初期，随着陇海铁路、洛潼公路等的修建，崤函古道才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崤函古道形成的地理和历史条件

崤函古道之所以能够成为连接洛阳、西安东西两京的“襟带咽喉”与通关中、达西域的中

原要冲，有其地形和社会历史的因素。

首先是受地形的制约。众所周之，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和摇篮之一。自新石器时代晚期直到北宋以前，我国的政治舞台和军事活动的主要场所在黄河下游和黄河中游的泾渭平原，但是这两个地区之间有豫西山地阻隔，交通不便。

长安位于关中中部，自此向东，必经由秦岭之北、渭河以南的东西狭长走廊。位于关中盆地的东端的潼关北临渭水、黄河，南阻华山向东延伸的余脉，当河山的咽喉，自然成了关中盆地东西走廊的门户。潼关东去，西岳华山向东延伸的小秦岭直抵弘农涧河西岸，耸峙于黄河之南，形成黄河长廊谷地。从潼关到灵宝老城，古称“桃林塞”，是一个南接小秦岭、北临黄河的敞阔的高原，覆盖着深厚的黄土，发源于小秦岭的沟谷河流向北注入黄河，敞阔的高原经这些沟谷河流长期侵蚀切割形成无数壁立陡崖。春秋时期，大约在晋文公称霸时，在崤山至函谷的谷口设塞。弘农涧西面山地雄峙，峰崖壁立，崖壁之上松柏茂密，遮天蔽日，道路深险，狭窄如函，人称“函谷”，战国时期秦在函谷的东口设置了“函谷关”。自黄河以东道路沿着黄河南岸的阶地行进，比较平坦。陕县故城在一环水高地上，西扼函谷，东控崤坂，地当陆路要冲。

由陕县故城向东沿着青龙涧河的支流交口河继续向东，必须穿越崤山。自西南向东北伸展于陕县与渑池之间的崤山，因受两侧断层影响，山势格外陡峻，山间有不少小型盆地和起伏的黄土丘陵。这里的道路蜿蜒曲折，不时穿行于绝壁之间，故有“崤塞”“渑淆狭间”和“渑隘”之称。崤山是黄河与洛河的分水岭，源于崤山的河流或向北注入黄河或向西注青龙涧河再入黄河，而东流的称谷水，今称涧河，古代的东西大道就是沿着源于崤山的交口河和谷水而通往洛阳。交口河东自张茅，西至交口，入于青龙涧河，山地受交口河的切割，裂开了隘路。交口河以东，自张茅东至观音堂山地豁开，成一谷道，山路盘曲如羊肠，二旁峭壁林立，中间硖石东西尤甚，顽石嶙嶙，绝谷深委，道曲而狭，是潼关以东最险峻的一段。

自此以东陆路沿涧河河谷而行，涧河源出渑池西马头山，东过渑池、新安至洛阳西入洛河，崤山受涧河的切割，裂开了一条河谷隘路，其位置正与西面崤山连成一线。崤山向东延伸，逐渐低落分散，至新安县城东而止，是山脉的浅山丘陵地，正当涧河谷道之冲，地处东西孔道之口，汉武帝元鼎中移函谷关于此。此为崤山北路。

崤山在陕县东南雁翎关附近低落分散，成为低山丘陵。永昌河发源于山岭，东南流向宜阳三乡镇入于洛河，永昌河的西北恰与青龙涧河的支流雁翎关河相对应，崤山丘陵受此二河的侵蚀，裂开了一条隘路，沿雁翎关河、永昌河谷，经洛河北岸和南岸东至洛阳，构成了崤山南路。^[11]

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称：“自新安以西，历渑池、硖石、陕州、灵宝、阌乡而至于潼关，凡四百八十里。其地皆河流翼岸，巍峰插天，绝谷深委，峻坂迂回，崤函之险，实甲于天下矣。”又云：“洛阳西至新安，道路平旷。自新安西至潼关，殆四百里，重冈叠阜，连绵不绝，终日走硖中，无方轨列骑处，其间硖石及灵宝、阌乡，尤为险要。古之崤函在此，真所谓百二重关也！”^[12]如此艰险，交通不便，但舍此别无选择。崤山北麓逼近黄河，隔河就是中条山、王屋山、析城山和太行山等。崤山南麓以洛河为界，洛河以南有熊耳山、外方山等。无论是崤山以北或是以南，河流纵横，重山叠嶂，行旅极为困难，因此，避开崤函绕道南北联系长安、洛阳两大古都及其区域都是极为困难的，唯有崤函古道是东西往来的捷径。

仅仅有独特的地理优势，并不能成为声息相通的交通脉络，崤函古道的形成和发展，还取决于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地理形势和都城格局的演变。自夏商至隋唐的3000多年间，黄河中下游两岸既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又接近各王朝版图的地理中心，一个政权若能牢固掌握这一片地区，也就足以控制全国。在这个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形成了两大中心城市长安（包括丰镐和咸阳）和洛阳。自西周初年，周公开创丰镐和洛邑东西两京制度后，直至北宋，只要国家不陷入分裂，历代建都基本上是洛阳、长安轮换作为全国政治中心之国都。更为神奇的

是，在历史上首都交换的同时，又以长安与洛阳为东西都，即当一方作为国都时，另一方也往往成为与之并存并重的国都或对方的陪都。在唐末以前，以洛阳为陪都的6个朝代中，只有商、后赵分别建都在郑州商城和邺，其余四朝皆都长安，时间合计186年，占这一时期洛阳陪都史的67.3%。而“在以长安为陪都的六朝中，也只有后赵、赫连夏国分别建都在邺和统万，其余各朝全部都于洛阳，共计271年，约占长安陪都史的94.43%。”^[13]据《汉书·地理志下》中曰：“初洛邑与宗周通封哉，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长安、洛邑东西两京制的建立，在千里王畿之间，形成了东西“双都轴心”，尽管最初出于巩固周王朝政权的考虑，但一旦这一“双都轴心”的东西两京结构形成之后，便会对当时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诸方面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而也不可能不引起交通的连动效应，尤其是对沟通和连接东西两大都城之间的王畿通道——崤函古道。对于王朝版图而言，“两都轴心”就如一个哑铃，东西两都分处哑铃两端，在周围分别构成东西两大都城圈，双都之间的王畿通道——崤函古道即是连接两铃的铃杆，由此将东西两大都城圈连为一体，彼此相互呼应，相互补充，相互配合，一同构成范围更大、力量更强的都城圈，并一同在全国版图中发挥轴心作用。而对交通版图来说，亦因此形成向天下四方伸展的交通格局：以连接长安、洛阳两京的古道为枢纽，自此轴心向四方“辐射”，构成一个巨大的交通网络。如果把把这个巨大网络比喻为密布人体的血管，那么两京之间的王畿通道——崤函古道就好比联通心脏的那条最粗壮的管道，在整个交通体系中居于关键位置，成了沟通和连接东西两大都城之间声息相通的脉络，不可有一日阻塞，历来备受重视。

崤函古道的形成和发展，走向与布局，即取决于上述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地理形势和都城格局的演变。西周建立后即将这条道路规划成干道。杨升南先生认为史籍和西周青铜铭文恒见的“周行”“周道”之语，即是指王国中心地区成周通向各地的平直宽阔的道路，其中，从丰镐到成周之路，中经郑（今陕西华县），穿崤山谷地而进入伊洛平原。“周行”“周道”是由周王室修筑，通向王室各地（各诸侯国境内）的一种道路的专称，具有平直宽阔的特点，可容四马驾的大车通行。《诗经》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四牡騤騤，周道倭迟”，此外，在大道两旁还种植有树木以“表道”和蕃蔽。道路上还有亭舍、供食宿一类的设施等^[14]。崤函古道的早期开发大致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但是，西周初期对崤函古道的修筑整治，使之更加适宜于东西两都之间的交通，也使崤函古道的最终形成。“周行”“周道”既是西周王室的生命线，也是甸服交通的中轴线。由于这条周道具有独特的历史地理和人文环境的优越性，致使西周而后的东周、秦汉和隋唐等朝的政治文化重心，都特别刻意地置放在这条轴线上。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大规模修建这条道路，道宽50步（合今69米），路面一般都高出两侧的平地，还用金属的椎子夯筑坚实，每隔三丈栽种一棵松树。唐贞元二年十二月，朝廷更明文规定了这条道路全国第一的法定地位，“从上都至汴州为大路驿，从上都至荆南为次路驿。”所谓“大路驿”的西段即我们所说的崤函古道。该道处在京畿重地，是大陆中、杂部通向京城众多道路的总汇，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目的地。自洛阳、长安辐射出去的道路，可达两河、山东、江淮、荆湘、岭表，可通中亚、西亚诸国，故而古道上商旅不绝。《东阳夜怪录》描述说：“长安城东洛阳道，车轮不息尘浩浩。争利贪前竞著鞭，相逢尽是尘中老。”其交通的繁忙，由此可见。柳宗元《馆驿使壁记》有“由四海之内，总而合之，以至于关；由关之内，束而会之，以至于王都”的话，恰到好处地指出它在交通上的巨大作用。北宋以后，随着政治中心移向东南并最终定位于北京，崤函古道也逐渐衰落，但它仍然是洛阳、长安之间的重要通道，也是西通秦、蜀，西北通京师的大道。

这样的重视程度即便是在古史上所言的分裂时期也同样不减。东西对峙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突出的地理现象。据史念海先生研究^[15]，在隋唐以前的中国历史上，东西对立或分峙的局

面曾一再地发生：整个先秦时代是如此，楚汉相争，西汉王朝和东方诸侯国的对立，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的分峙，也都表现为东西的相抗。而在这些延续不绝的东西对峙中，地理上的山（崤山、太行山等）、河（晋陕黄河等）、关（函谷关、潼关等）、塞（桃林塞等）之险，又往往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从地理上看，东西对立或分峙主要是在我国第二和第三阶梯之间进行，其争夺的关键是两级阶梯之间的边缘地带，但是两大阶梯之间的边缘地带带有豫西山地阻隔，周秦以来，又在山地险要地段设置函谷关、潼关等关隘，使之形势愈加险要，交通极为不便，故而崤函地区便成为双方争夺的中间轴线的交汇之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西周时期，周召二公以陕原为界分陕而治，历史上曾将陕原以东称陕东，陕原以西称陕西，但其自然分界线仍在崤山。战国和秦汉时期，人们又以函谷关为界，把西起关中泾渭流域，东经齐鲁以达海滨的黄河中下游地带，分为“关东”和“关中”，或以崤山或华山为界，分为“山东”和“山西”，由函谷关西行，崤山山脉尽头，秦岭以北，就是关中。函谷关遂成为东西分野的标志，直到东汉末年，潼关取代了函谷关，成为东西分野的分界线，不过潼关虽在函谷关以西，却离函谷关不远，也属崤函地区，可视为函谷关道的延长。崤函地区正处在“关东”和“关西”或“山东”“山西”之间，这两个地区的交通往来，不论是从陆路还是水运都是必经之地。因此，尽管在东西方对立形势下，对立双方尤其是地处西部一方都十分重视崤函古道的开发与建设，将此作为重要的军事交通战略线。秦设立函谷关以及函谷关侧翼武关、临晋关的设立，东汉后期潼关的设立，北周通洛防的建立，都是古道建设的重要部分。正是有函谷关这样一些关隘的凭借，上述所提到的四次东西对立的局面，其结果都以西方取得胜利而告结束，其中对崤函地带的掌握和利用，自然是一个原因。

崤函古道的发展和繁荣还受到了中外交流与往来的推动和促进。丝绸之路是贯通中西方的商贸和文化交流之路。公元前138年，西汉王朝派张骞出使西域，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由此正式开辟。丝绸之路的形成是由线造成了点，由点连成了线，纵横交叉的线又形成了网络。在漫长的岁月中，丝绸之路的起点和走向常随中国中原政权都城的迁徙而变化。西汉时丝绸之路的起点在都城长安，东汉时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而延伸至洛阳。魏、晋和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国境内经常存在多个政权对峙的局面，随着政治中心的多元化和洛阳的盛衰变化，洛阳也常常失去起点中心的地位。但无论怎样，曹魏、西晋和北魏都洛之时，特别是隋唐时期，洛阳都在发挥丝绸之路起点的作用。2006年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和国家文物局共同在新疆吐鲁番市召开了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国际协商会，进一步明确了丝绸之路（中国段）源于汉代东、西两京——洛阳和长安。在洛阳作为丝绸之路东部起点的曹魏、西晋、北魏和隋唐时期，崤函古道也成为中原政权使者出使西域和西域各国使者前来朝贡的必经之地，也是商品、人口和思想跨国交流的主要通道，崤函古道亦由原来的境内通道，而发展成为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重要的干线路段。

三、崤函古道所经线路及线路的变化

历史时期，崤函古道西段——函谷道受黄河南岸河川地形限制，道路变化不甚复杂。而东段——从陕县故城至洛阳的“崤山道”由于地形条件的制约，主要穿行于山势险恶的崤山之中。但各个历史时期政治背景有所变异，适应2000多年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经济与军事等方面的需要，崤函古道线路发生过重大变化、改易，相互间也出现过诸多横向联系，并因此形成一些新的线路，使彼此联系更加紧密，交通更加方便。现对历史时期崤函古道所经线路及线路变化按东西两段分述如下。

（一）崤函古道西段——函谷道所经及线路的变化

崤函古道西段——函谷道，因其主要路段行进于黄河长廊谷地，谷道深险狭窄如函，战国秦设函谷关于此而得名。又因其道路主要沿黄河南侧而行，故而有人将其称作“黄河南岸道”。函谷道西端起自潼关，东端终于陕县故城。

1. 崤函古道西端的起点——潼关

潼关在今陕西潼关县北，西距长安三百里^[16]。潼关始建年代不可考，所可考者乃是东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曹操西征马超于此，这时潼关始见于史册，^[17]其筑成当在这一年之前^[18]。自此以后，潼关城址几经变迁，其原因皆与控制通往关中腹地的东西大道有关。潼关初置时的关址，在今潼关县港口镇（旧潼关）东南原上的陶家庄至杨家庄之间，残留有南、北城墙遗迹，未发现东墙和西墙。这是因为东汉潼关城东临远望沟，西临禁沟，两沟深壑壁立，故东西两侧很可能是以深壑为墙，所以没有再筑东、西城墙。隋大业七年（611），又将关城南移4里（唐里）余的“坑兽槛谷”^[19]，形成南、北两座关城。隋关城今已荡然。根据文献和地形判断，隋潼关城应在汉潼关城南城墙的西南坡下，地处禁沟和潼水河谷交汇之处，崤函古道从汉潼关城西行下坡必经这里，故隋亡后，唐仍在此设关防约80年，直到唐天授二年（619），因黄河不断下切，水位降落，黄河南岸与塬之间可以东西通行，崤函古道沿河边行进更为方便，不必再绕道塬上，因此，又将关城北移，“近河为路”^[20]，唐关城也废而不存。但据《元和郡县志》称，“关西一里有潼水”^[21]，据此，唐潼关城西门距潼水1里，北墙紧挨黄河岸边，南墙应在南塬半坡，东门应是远望沟口东侧黄巷城内的金陡关。如此，唐潼关城既可控制东西大道，又可控制绕道原上的古道，还可控制黄河水道。宋、元、明、清时期的潼关城，其位置没有多大的变化，都是在唐潼关城的基础上维修、拓展、加固。现存的关城建于明代初年，系依山而建，南高北低，周长约8公里。其西门紧靠黄河，北墙立于黄河岸边，东门接近原望沟口，南墙蜿蜒于南塬半腰，潼水穿城而过注入黄河。这个关城既可控制崤函古道，又可控制南北通道，比汉城和隋城更为科学适用。1959年因修建三门峡水库，潼关城搬迁、废止。

众所周知，潼关的设置是为了替代函谷关。但其设置的原因恰与函谷关相反，潼关不是为防御和出击东方的敌人，而是堵塞西方关陇地区的进犯。东汉首都在洛阳，为了首都安全，设置了许多关隘。新安县的函谷新关就是其中之一。但东汉末年，关陇地区的军阀董卓等起兵作乱，常常威胁洛阳。这时从函谷关向西，河山之险，迤邐相接，险狭蹊径有百里之遥，到潼关这个地方，再往西是关中平原，西望川途旷然无险可据，所以就在平原进入豫西山地的险要位置上，设立了潼关。这里“上跻高隅，俯视洪流，盘迁峻极，实为天险”。^[22]控扼着河山之间的黄河长廊谷地通道。而潼关所在的麟趾原，高出旧潼关200多米，东有望远沟，西有禁沟，属于控制这条通道的关键地点。由东方西来，经黄河岸旁的黄巷坂，再缘着依傍绝涧的山路，才能到达潼关。穿过潼关，再往西便是关中平原，既是渭河南岸的平坦大道，穿过潼关西行，既是渭河南岸的平坦大道了，所谓“河山之险迤邐相接，至此西望川土旷然，该神明之奥区、帝宅之户牖”。^[23]这就是潼关替代函谷关战略地位成为关中东部门户的地理因素。而其关城从东汉到唐代两次迁徙，三地设防，城址也由麟趾原上移至原下，其直接原因就在于通过城址地点的调整实现更有效地控制通往关中腹地的东西大道的目的。自曹操西征马超起，潼关就经常成为兵家争夺的焦点。据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可知，在其周围发生的重大战事，有史可稽考的达40余次，其间得失颇关战争双方的存亡安危。由此可见，潼关军事地位之重要。

2. 阆乡县故址

由潼关故址（今港口镇）出发，沿黄河南侧东行5里，横穿“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涧道之峡，车不方轨”^[24]的黄巷坂^[25]，约25里便来到阆乡县故址。《水经注》云：“河水又东北，

玉涧水注之……又北迳阆乡城西。”《郡国志》中又曰：“宏农湖县有阆乡。世谓之阆乡水也……其水北流注于河。河水又东迳阆乡城北，东与全鸠涧水合。”文中所言阆乡城，其故址在今灵宝市豫灵镇南源村西北三华里的黄河岸边。阆乡历史悠久。文献记载，阆乡县本汉胡县地，始置年代不详，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更名湖，属京兆尹。北魏时改胡县为湖城县，北周明帝二年（558）置阆乡郡。隋开皇十六年（596）废郡为县。义宁元年（617）复置湖城县，仍置阆乡县。唐武德元年（618）改凤林郡（原弘农郡）为鼎州，移治阆乡。元至元二年（1265），省湖城入阆乡。明洪武元年（1368），移治于唐湖城县旧址。据民国《阆乡县志·卷一·城池》载：“旧治在县西阆底镇，明洪武初移今治。”于此可知，唐至明初，阆乡县在阆底镇，即今灵宝豫灵镇南源村。唐代的阆乡驿馆，規制甚壮，与华州普德驿并称为“邮亭之甲”。1954年，阆乡县与灵宝县合并，原阆乡县城改置阆乡镇。1960年，因修建三门峡水库，阆乡城居民分别搬迁至距城3公里的塬上，称阆西村和阆东村。现存古城遗址仅有远在城内东南角的一段城墙遗迹和一座城隍庙基址，除此之外，城址内建筑所用残砖、瓦等随处可见，有的厚达数十厘米。

3. 湖城县故址

由阆乡县故城向东南行10公里，经过著名的驿馆盘豆驿^[26]，又东约14公里便可抵达湖城县故址。湖城县距阆乡县城约20余公里，同样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镇，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晋侯使詹嘉处瑕。据《左传》文公十三年载：“春，晋侯使詹嘉处瑕，以守桃林之塞。”文公十三年即晋灵公六年（前614）。这是崤函古道西段也是整个古道上设置的第一个关塞。在此之前，据《尚书·武成》载，周武王灭商，“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堰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史记·周本纪》中也有类似记载，但将“桃林之野”改为“桃林之虚”。“野”和“虚”都有“大丘、土山”的意思。在《山海经·中山次经》中云：“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广员三百里。”可见，尽管经过桃林西去关中的大道早已打通，但当时并没有在此设立关塞，而是一处东西长150公里，地域广阔，草木茂盛，桃花遍野，道窄难行之地。

那么，“瑕”关的具体位置又在何处？据《左传》郑玄注云：“瑕之言胡也。”说“瑕”即“胡”，两字相通，为通假字。顾炎武的《日知录·卷三十一》中亦谓“瑕”“胡”音同，认为“瑕”即《汉书·地理志》之“湖”。“瑕、胡”是同地异名。汉之湖县，原本为建元元年（前140）前的胡县，汉武帝于此年改为湖县，属京兆尹。北魏时改为湖城县。据《水经注·卷四》载：“河水右会盘涧水。水出湖县夸父山……河水又东，迳湖县故城北……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湖水又北迳湖县东，而北流入于河。”湖水即今阳平河，发源于今灵宝市阳平镇南5公里的夸父山，北经阳平镇，然后北流入黄河。胡县、湖城县，皆是因湖水绕县城境而得名。^[27]又据《元和郡县志》载：“湖城县，……东南至州26公里。”这里所言之州，即指虢州，其郡治在今灵宝弘农涧河西岸，也就是说湖县故城在今灵宝市城关镇西北26公里。按此方位和距离，湖县故城当在今灵宝市阳平镇阆西村东北约1.5公里的黄河南岸，阳平河（湖水）西岸王家岭北的南寨子村。南寨子村，北依黄河，东临阳平河，西南两面紧靠高达百余米的王家岭断崖。其西部距南寨子村北150米处，有一条宽10余米、高100余米，两壁峭立的壕沟通往岭西。当地老人将此壕沟称为周秦古道，亦叫老洛潼公路。在壕沟的南、北两侧断壁及地面上，发现有大量战国和秦汉时期的筒瓦及板瓦残片，并在其南高塬上王家岭秦汉墓地发现带有“胡市”印记的战国陶釜。上述筒瓦及板瓦残片，与王家岭秦汉墓发掘出土的陶器无论质地或纹饰都相同。另外，在老洛潼公路附近还发现了部分夯土城墙遗迹。考古发现证实了文献记载，湖县旧址当在南寨子村附近的古道之中。

瑕与桃林之塞又有何关系？据《三秦记》载：“桃林塞在长安四百里。”又据《元和郡县

志》载，潼关距长安三百里，再加百里，则为阆乡县。阆乡本汉胡县地。自隋开皇十六年（596）设阆乡县，直到明洪武元年（1368），其县治一直在湖县旧址。从前引《水经注》中“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可知桃林塞当在今灵宝市阳平镇南5公里的夸父山之北，湖县（阆乡旧址）及湖水一带。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四十八·陕州·灵宝县》载：“稠桑驿，在县东三十里……高祖诏李密招抚山东，至稠桑驿，复止之，密因入桃林以叛。”光绪《灵宝县志》云：“牧饔岭，在县西南十五里，即桃林之野也。”按牧饔岭即衡岭，秦函谷关即建在此岭上。民国《灵宝县志》中又云：“西原，即秦岭。南接女郎山北麓，北抵黄河南岸；南北四十里，东西十余里，高五里……旧志所谓衡岭、牧饔岭均指西原而言。”于此可知，桃林塞是指秦函谷关以西至阳平河（湖水）西岸湖县旧址之间的古道，而瑕正在桃林塞的西口上。春秋初期，晋国灭虢国，崤函一带成为晋国的版图，从而控制了黄河南岸自潼津到崤山的通道，遂派兵驻守，阻止国势日趋兴盛的秦国与中原地区交往。由于交通和地理位置的重要，春秋末期，这一带遂成为秦晋争夺最激烈的地区。公元前615年，秦康公为了打开东通诸侯的道路，欲伐晋，派西乞术到鲁国去进行聘礼，以取得鲁国的声援。同年十二月，“秦师复侵晋，入瑕”^[28]。晋国对此非常重视，第二年即公元前614年，“晋侯使詹嘉处瑕，以守桃林之塞”。关、塞互通，自古已然。关于瑕和桃林之塞的战略地位，《史记正义》说得非常清楚，“桃林之塞在南河之南，远处晋之南境，从秦适周乃由此路，使詹嘉守此塞者，以秦与东方诸侯远结恩好，及西乞聘鲁，亦应更交诸国，虑其要结外援东西图己，固守此扼塞，欲断其往来也。”

1999年，考古学者在南寨子村南王家岭发现一处秦汉时期的大型公共墓地，经初步调查，墓地面积约125万平方米，在随后发掘的5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共发现秦汉时期墓葬700余座，墓葬排列有序，形制规整，可分为明显的四期，其中三、四期与一、二期无论葬制以及随葬品的数量和形制均有较大的变化，特别是在三区一座墓葬中还发现了带有“胡市”印记的战国陶釜，发掘者认为，一、二期墓葬主人应为守关之兵士。^[29]据文献记载，自秦惠文王九年（前329）秦使樗里疾攻魏降魏，今灵宝、陕县一带已经纳入秦国的版图。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重要边境关塞，都有常备军队驻守，并设官吏管理，因而缘关就出现了较大的居民点，人口滋息日盛，城池的规模就出现了。据《史记》载：“范雎入秦，至胡。”^[30]范雎入秦是在秦昭襄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71年，此时战国群雄已经争战了200多年。于此可知，原来春秋时期的“瑕”在其之前，已更名为“胡”。在原来作为关塞的“胡”关内，也设立了用于货物交易的市场，称“胡市”，原来单纯作为战争防御工事的胡关，其性质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而逐渐演变为人口集中、货物贸易的城池。是否设县，也未可知。秦以后，湖县、湖城县建置延续不断，直至元至元二年（1265）入阆乡县。

4. 稠桑附近西行诸古道

湖城以东，有两条道路，其中北路仍然沿黄河南岸而行。由湖城故址东北行，约15公里至稠桑。稠桑是一个大的黄土原，位于沙河口东侧，西倚衡岭，距函谷关约10公里，因曾生长着茂密的桑树而得名。附近有仰韶时代的文化遗存，属荆山黄帝铸鼎原聚落群的一部分。春秋时属虢国地桑田，虢公败戎于桑田即在此。隋唐时在这里设立驿馆，称稠桑驿，后发展为一个小镇，称稠桑镇，著名的骠砚和澄泥砚就从这里远销全国。

隋开皇九年（589），晋王（炀帝）自扬州返回长安，至稠桑西，因原秦汉河边古道坍塌，于是自稠桑西另辟一条新路，直达阆乡（汉湖县城），长38里，在秦汉河边故道之南约5~10里，较河边故道近3~4里，斜向阆乡，故史称“晋王斜路”。此路自稠桑西去，经西坡、肖家营、桃花营、杨家槽、呼沱营、大字营、吕家营，在阆乡东十里的双坟头与原来的秦汉古道合轨，进入阆乡城，全长约14公里。有部分遗迹现尚可辨认。唐初，“晋王斜路”曾经废弃不用，仍然取河边秦汉故道。后因河边故道无井汲水，河岸崖头又高而难下，取水困难，常使驿

马渴死，天宝八年（749），馆驿使、御史中丞宋浑又重新修通了“晋王斜路”，以此道为函谷道的主道，并在稠桑村西5里的地方设置驿馆。今西闫乡黄河岸边的东、西古驿村，据说就是从稠桑驿搬迁来的。在《南部新书》中有：“天宝八年，馆驿使宋浑奏移稠桑路向晋王斜。王斜者，隋炀帝在藩邸扬州，往来经此路，盖避沙路费马力也。”光绪《灵宝县志》亦记载云：“在稠桑西原，先是行旅遇暑，人畜多渴死。馆驿使中丞宋浑开新路，自稠桑西由晋王斜，人皆便之。”清代末年，这条大道仍为行旅和商贩要道，大批驮队和牲口队均在此道上往返，直到陇海铁路通车，民国三年（1914）后始废。

北宋定都开封，建洛阳为西京，长安是西北地区军事重镇，为便于开封、洛阳与长安间政治、军事的联系，对黄河南岸道进行了整治。《宋会要·方域》十之一，建隆三年（962），“诏西京修古道险隘处，东自洛之巩，西抵陕之湖，悉命治之，以为坦路”。湖城以东当就唐天宝时开修的稠桑路重加整治。此后又将黄河南岸道二次进行改道。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四》中记载，大中祥符三年（1010），“复以稠桑旧路，缘崖西南有峭壁，或霖潦多摧圮，乃徙路自灵宝县南入虢州路；至函谷关，与汉武帝前旧路相合”，即改走从灵宝县（今灵宝老城）向南沿今弘农涧河经故函谷关至虢州（今灵宝县）。据《雍录·卷六·函潼关要志》载：“自华而虢，自虢而陕，自陕而河南，中间千来里也。”从华州而东至陕西，即经由虢州了。但北宋时实际上仍以稠桑路为主路。大中祥符四年，宋真宗西行到河中府宝鼎县（今山西万荣西南荣河），从洛阳至潼关行程经慈涧、硤石县〔宋乾德五年（967）自今南陵县移治硤石镇东乾豪，太平兴国二年（977）移治今硤石镇〕、陕州、灵宝县、湖城县、阌乡县（今灵宝阌底）；返程自宝鼎县至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西永济老城），渡黄河至华阴县，经阌乡、湖城、灵宝、陕州、硤石、澠池、新安县，至西京。这两次都不经虢州，可见灵宝至湖城一段仍经稠桑路。此后直至明清，仍然如此。

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西巡时，又在“晋王斜路”和秦汉故道之间修了一条新路，此路由阌乡杨家湾起，向东经北营村，南至东、西古驿村之间的古驿岭斜入黄河岸边，再沿函谷关路至稠桑，全长15里，名曰“龙路”。据光绪《灵宝县志》载：“康熙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圣祖仁皇帝西巡回銮，至灵宝西三十里铺，忽白兔起田间，圣祖勉强跃马应弦而得，遂由东古驿岭过沙河桥，出函谷关至。今名其路曰‘龙路’。”光绪二十七年（1901），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由西安回銮北京，恶古道槽深，车马难行，令蹕路大臣黄履之督修“龙路”，路宽12米，用黄土铺地，每6米左右，支银50两。故当地人把它称为“皇差路”，意谓当“皇差”所修。

5. 弘农县（郡）、虢州故址

自湖城县故址向东南，沿华山脉北麓而行，约25公里抵达弘农县故址，是为湖城向东而行的南路。弘农县（郡）建置历史悠久，城址先后发生多次变迁，隋大业三年（607），复置弘农县，并将弘农郡由陕州城迁回，一并移治鸿胪川（虢略），即今灵宝市城关镇，义宁元年（617）改郡名为凤林。唐贞观八年（634）又将虢州由卢氏移治这里，直至元至元八年（1271）省虢州入虢略，至元十年（1273）又改虢略为镇。弘农县（郡、虢州）故址在今灵宝市西区、弘农涧河西岸。唐虢州长史岑参曾用“原驿西路挂城头，客散红亭雨未收”的诗句赞美虢州城。

隋置弘农县后，自弘农开辟一条西北驿路通往阌乡（即湖城）。此路在“晋王斜路”之南5~10里，经今焦村、西闫、阌东达阌底（阌乡，即湖城）。另一条驿路则由弘农县治折而东北，沿弘农涧河河岸至灵宝老城，与北驿路汇合。据《新唐书·崔衍传》云：“虢居华、陕间，为邮传剧道。”意思说，虢州治所是东通陕州、西通华阴、南通卢氏的三岔口。《新唐书·韩休传》亦云：“虢州东、西京为近州，乘輿所至。”《白氏长庆集·卷六三·东归》又

有诗云：“前夕宿三堂，今旦游申湖，残春三百里，送我归东都。”三堂在虢州，申湖在陕州。足见州当大道，邮传冲要，通行畅达。此外，《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亦有类似记载。不过，由陕州至潼关的函谷道，并不需绕道弘农县城（虢州治所），而是沿黄河南岸或稍移而南直接西行。就重要性而言，弘农通向阌乡的道路不能与前者相比。

6. 函谷关旧址

自稠桑出发，向东北约10公里，便来到了著名的函谷关。这里的函谷关有两处，一为秦函谷关；另一个是魏函谷关。其关址和设置原因、时间均有所不同。由此也引起古道走向发生变化。

（1）秦函谷关

战国时期桃林塞连同渭河下游的华阴等地属于魏国。随着秦国势日张，极力向东发展。秦孝公十九年（前350）将都城由栎阳（今临潼）迁至咸阳，利于交通，水路可浮渭水、黄河东下，陆路直指桃林塞和崤函道。秦惠文君六年（前332），秦向东越过魏国的西河长城，占据了魏国的阴晋更名宁秦（今华阴东北），秦国再次打通了渭河南岸向东发展的东路。至九年（前329）攻占了魏国的焦（今陕县老城）。至此，秦国已打通了从咸阳通往中原的交通大道桃林塞。随着战局向东部的发展，原来设置在桃林塞西口的胡关，显然已不能适应需要。于是，秦国便将关塞调整到桃林塞的东口，建函谷关。据《元和郡县志》中引《西征记》云：“函谷关城，路在谷中，深险如函，故以为名。”苏秦所谓“秦有崤函之固”，即指此而言。在《元和郡县志》中称：“秦函谷关在汉弘农县，即今灵宝县西南十一里故关是也。”具体位置在弘农涧河西岸、稠桑塬东坡下，今灵宝市函谷关镇王垛村的梁家沟口。

秦函谷关的最初形态不得而知。西汉人桑钦在《水经》中云：“门水北经弘农县故城东，城即函谷关。”门水即今弘农涧河，按此说法，关城夹在衡岭与弘农涧河之间的函谷东口。西晋时潘岳在赴长安途中，路过函谷关，看到“其城北带河，南倚山，周回五里余四十步，高二丈”。^[3]唐人颜师古在《汉书注》注中也云弘农涧河之岸尚有古关遗迹，其位置与桑钦、潘岳所说同。据近年考古勘探，其关城位于函谷关古道的南侧，东至弘农涧河西岸，西至王垛上院和南头自然村，南至上院与北店头交界大沟油瓶沟。城内地势西高东低，呈半陡坡状。除了城址北边临古道沟边，可能以沟代墙未设城墙外，其东、西、南三面都分别筑有夯土城墙。城墙多是依地形地势而筑，北宽南窄，呈楔形。东城墙沿弘农涧河的西岸蜿蜒起伏，长1800余米，西城墙沿衡岭（当地人称西原）下顺势而筑，长1300余米，南城墙长900余米，北为与孟村交界的深沟，沟深300余米陡峭壁立。关城总面积约270万平方米，这与文献记载基本相同。

函谷关关楼早已荡然无存，仅可从四川青羊宫出土的画像砖中可以窥见汉代函谷关东城门图案。而关城城墙也坍塌已久，仅保留有少量遗迹。其中，西城墙墙基全部被湮没在地下，南城墙墙基则暴露在地面之上，保存较好的有东西两段，东段长15米，宽5米，高2.6米，夯土总厚度1.4米，共4层。西段长65米，宽6~9米，高4.4米，夯土有17层。东城墙墙基的北端被埋在地下，南端暴露在地面之上，在关楼东南部的断崖上，有残存的墙基长20米，宽6米，夯土层厚1.5米，夯层明显，有平夯和竖夯两种，夯层间夹杂有粗绳纹灰陶大瓦和蓝砖块，应为战国时期的城墙遗址。在城垣内，东侧和中部，特别是靠近关楼附近的地层中，发现有1~3米的文化层，内中含有大量的砖瓦碎片，以汉代和唐宋时期的数量为多，也有部分战国时期的陶片。而在西城墙北段地表的断面上，发现有上下两层的路土，东西长15米，土层厚0.2~0.3米，从路土中采集到的陶片观察，这些路土的年代应为汉唐时期，而从路土厚度推测，这里应是古代守城将士巡逻或人们活动较为频繁的地方。

近年来，在函谷关城内还发现了其他有关的遗迹，如在东城门楼南侧发现一个战国时期守关士兵储存兵器的竖井式箭窖遗址、在东城门楼北侧城内发现一座古冶遗址、在东城门楼南侧和西关楼附近发现战国地下陶制排水管道等。此外，在城垣范围内，还出土有汉代瓦当（其中有的上有“中侯”

“千秋万代”“天兴无季”和“长生无极”等字样），汉代封泥（其中有的刻有“口口家丞”和“新安右尉”）以及汉代胡人红陶佣灯、弘农灰陶筒瓦、唐代牵驼三彩佣、三彩女佣等。这说明当年函谷关的范围和规模相当大，附近的军事和民用建筑也相当多，东西人员往来是很频繁的。

从关楼向西行，就进入了函谷关道。《元和郡县志》云：“函谷关入函道。”^[32]这个函道专指“其中劣通，东西十五里，绝岸壁立，崖上柏林荫谷中，殆不见日，关在谷中，深险如函，因名函谷”^[33]的函谷关道。该道东南低，西北高，沿关城下西北行漫上，经西寨村到达岭巅。从地形上观察，这实际上是一处沟深坡陡且距离较长的大峡谷。东西长2800余米，两侧多为悬崖峭壁。以今天所见论，峡谷中部的沟面宽有95~130米，底宽2~5米，垂直深度50~70米。峡谷东端出口处沟面较中部宽，两壁的坡度有所减缓。由于这里水土流失非常严重，古道路已被湮没在淤土下，或被洪水冲毁，仅在沟口的西端南侧，距西寨村东170米的两道断崖处，发现有厚达1.6米的路基，距地表5.4米左右，长约130米。路土中有两条明显的车辙碾轧轨迹，东西走向，间隔1.6~1.8米，两车辙之间有坚硬的踩踏面，应为人畜踩压所致，已清理出不同层次和时代的车辙印痕近40段。车辙凹槽宽7~35厘米，深7~10厘米。根据路土中出土的筒瓦、板瓦和绿釉陶片等遗物和地层年代，这些车辙主要是汉代和唐宋时期的。1926年，洛潼公路修通后，这段古道才被废弃。

与函谷关古道相关的遗迹在灵宝境内还有烽火台和大字营古道门洞。^[34]前者反映了古代的关防，后者反映了古道继续西去。特别需要提及的是烽火台。自函谷关西至稠桑西沙河边，全长7.5公里的函谷关古道旁残存有3座烽火台。一座在关城内古道北侧石门洞上北面，现为一四方锥体的土台，高5米，上部边长7米，夯筑而成，其时代应为春秋战国。另一座位于函谷关西寨村古道旁，其台东为村舍，西临断崖，北至大沟，南为古道。台高5米，周长19.7米，夯土筑成，夯土中夹杂有战国时的陶片和汉代瓦片，故该烽火台应为西汉时所筑。由该台向南400米，距新寨村500米处的古道旁，还有一烽火台，台高8米，周长21米，亦为夯土筑成。由新寨烽火台向西下坡，坡底即是著名的稠桑驿。据光绪《灵宝县志》记载：“稠桑，在县西二十里，春秋虢公败戎于桑田，唐屈突通与刘文静相拒皆于此地也。”这三座烽火台形制相仿，建筑时代相近，且东西连成一线，遥遥相望，从其建筑和所处位置看，应是古道上用于传递军情的设施，其中，新寨和西寨烽火台还分别是古稠桑驿和函谷关的制高点。

函谷关位居崤函古道之咽喉，以关为城，地理形势十分险要。这里北面是滚滚东去的黄河，南面是一片崇山峻岭，山谷中两边悬崖峭壁。历史上将东自函谷，西至潼关，统称为函谷，道路狭窄，天险自成，谷中崖壁之上，松柏茂密，遮天蔽日。从关口梁家沟至稠桑7.5公里的古道沟，是唯一翻越衡岭的通道。秦于此置函谷关，正是“一人当关，万夫莫开”的咽喉位置，关东、关西（或关中）即以此关而得名。战国时期，秦国凭着函谷关，屡退东方诸侯联军，最后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刘邦进关中灭秦时，回避函谷关险道，绕向南面攻取武关而入关中，这是进入关中的另一条路。另外从北面由临晋关到朝邑也可进入关中，不过要两次渡黄河。

古代由关东入关中虽有三条道路可行，唯有函谷关这条大路较为便捷。由于这条通道甚为险要，易守难攻，扼守函谷天险，可据建瓴之势制驭东方。西汉贾谊的《新书》中有云：“所谓建武关、函谷、临晋关者，大抵为备山东诸侯也。天下之制在陛下，今大诸侯多其力，因建关而备之，若秦时之备六国也。”因此，函谷关在政治斗争和军事冲突中，对于加强军事防御，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关中地区的安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学者们普遍认为，唐朝以前历代王朝往往在关中长安建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关中以东有函谷关、潼关之险可以防守。先秦的秦国有“百二河山”之称，指函谷关以西的秦国地势险要，秦两万足以敌东方诸侯百万之众。函谷关在秦汉时一直实行着“日入则闭，鸡鸣则开”的制度。汉代还专门设置了关都尉在此驻守。

（2）东汉末曹操“运粮道”与魏函谷关的设立

东汉末，占领黄河下游的曹操与占据陇西、关中的马超、韩遂发生战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年）七月，曹操帅兵西征，因函谷关道崎岖艰险，行军不便，为解决粮草转运问题，即于函谷关道之北5公里的黄河南岸边，命大将许褚别开新道，“滨大河以转运”。这条新路从衡岭北端迤迤西上，直至西塬顶上，西行至今西寨新村，与秦函谷关道的西北口相投后，经西寨村的西北，下狼皮沟沿黄河南岸西行，至潼关。这就是曹操所辟的“运粮道”。道路既改，原来的秦函谷关已非钤束之要地，故关随路移，原设于秦函谷关的弘农县向北移十余里至东原的西崖下，^[35]这就是后来的桃林县，唐天宝时改为灵宝县。函谷关也移到县城西弘农涧河西的谷道两崖间。魏正始元年（240）弘农太守孟康又在此即曹操运粮槽道的入口处正式修建了关城、墙垣、楼阁，名“大崤关”，又名“金关”。这就是后来所说的魏函谷关。这也是继秦函谷关、汉函谷关后历史上的第三个函谷关。

魏函谷关关址在今灵宝市函谷关镇孟村北，原陇海铁路隧道的南侧，北距黄河0.5公里，南距秦函谷关6公里，东南距灵宝老城2公里，西距函谷关镇西寨村7公里。北移后的崤函古道从关城门楼通过。这条大道以及关城，自东汉末以后直到因建三门峡大坝，洛潼公路南迁以前，一直未变。历史上，曹操西征韩遂、马超，途经这里；安史集团进出长安经过这里；哥舒翰军与安史集团潼关大战的主战场在这一带；李自成军从北京返回，进关中途经这里。《元和郡县志》云：“今历二处而至河潼”^[36]，讲的是经秦函谷关和魏函谷关两条路可达潼关。可见，魏函谷关仍然是军事要地，其险要之势与秦函谷关相仿。在清代，魏函谷关被称为“新函谷关”。据《重修灵宝县志》及民国《灵宝县志》等记载，清康熙和同治年间灵宝县令曾对关及关卡加以整修。民国初年亦有修复。关门洞顶横书“天下为公”，系民国十二年（1923）康有为来灵宝时所书，后来改为“紫气东来”。此关楼后毁于抗日战争时的兵火。

7. 函谷关东通陕州故城的古道

函谷关以东，沿黄河南岸而上，通往陕州故城的道路，分为南北两条。

偏南的一条是由秦函谷关出发东行，过弘农涧河，经沙坡村，在沙坡村坡根东北，现有一深1.5米、宽5米的路槽，路土层厚72厘米，距崖顶1米，槽长200米，槽底和槽顶均较平坦，已栽上树木。古道继续向东北，过西王村、好阳河、五帝村龙王庙。在龙王庙保留有一段古路槽，槽深约10米，宽5米，长72米，路槽两端陡峭。古道继续东去，从东南朝、西南朝两村庄中间通过，经上官村后入陕县境。过曲沃（今大营镇黄村苗阳河东岸、南曲沃）、新店（今大营镇辛店村）、温塘、桥头沟（又名曹阳墟，俗名七里涧，今七里铺）、太原仓（今张湾乡七里村东、黄河南岸、苍龙涧河西），至陕州故城。这条道路主要是在周秦时期形成，直到魏函谷关形成前一直是当时东西交通的干道。

偏北的一条则是由魏函谷关出发，过弘农涧河，经桃林县故址（灵宝老城）。桃林县一名如同桃林塞，皆出自夸父追日的古代传说。桃林县始设于隋开皇十六年（596），后改为弘农县，又复为桃林县。唐天宝元年（742），因于函谷关尹喜故宅掘得灵符，遂改桃林为灵宝县。据《元和郡县志》记载：“东北至州七十五里”，其中的州指陕州。民国《河南省·灵宝县》载：“东距陕县、西距阌乡皆六十里……北濒黄河，城周三里为门四。建于黄河南岸，与古函谷关隔弘农河东西相望……夏秋水涨时临时架小桥以通行人车马。”于此可知，桃林县故址（灵宝老城），位在今大王镇老村村西北黄河南岸。桃林县的建立与魏函谷关的设置有关。正是由于魏函谷关的设置，并逐步取代了秦关，成为东西交通的孔道，其关前地面也逐渐繁荣，为后来在关前设县奠定了基础。在灵宝老城至今还流传着一句俗谚：先有三清殿，后有灵宝县。意思是说有了魏函谷关，关前地面较开阔，应近水陆码头，交通便利，久而久之，这里就有了居民商旅，发展为居民镇点，并建有祭祀老子的三清殿。后来建桃林县城时，即将原有的三清殿圈入城内，置于重要位置，其殿后即北城墙，殿门直对南城门。当地群众说，1959年前，灵宝老城城墙基本完

好，西城墙与南城墙部分城砖犹存。1959年后因三门峡大坝蓄水，灵宝县城南迁至虢镇。距桃林县故址西北1.5公里即是著名的黄河津渡浹津，隋末曾置关，由此渡河至山西芮城。出桃林县故址，过北营、北村，渡好阳河东去，经小北村、曲沃、新店、温塘、桥头沟、太原仓，至陕西故城。这条道路形成于东汉末期，在隋唐时期十分繁荣。

函谷关东通陕西故城的古道上所剩古代遗迹不多，除桃林县故址外，还有曲沃城故址、温塘石窟需要特别提及。

曲沃城在春秋时期有二，其一在今陕县大营乡黄村菑阳河东岸，黄村一带，地表城垣多毁，面积不详。现存黄村南天门东侧300余米处有一夯土台基，高约3米，面积400余平方米。其北有没云台，残高约4米，长约50米，宽30米，系采用集束木棍夯实而成，历年发现有大型丛葬坑，附近的文化堆积物以隋唐时期居多，早的也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据当地群众讲，在修宅院时，往往发现有春秋时期的灰坑和鼎、豆、壶等陶片。《史记·秦本纪》载：“（惠文君）十一年，县义渠。归魏焦、曲沃。”《史记正义》中引《括地志》云：“曲沃在陕西县西南三十二里，因曲沃水为名。”又据《水经注·卷四》载：“河水又东，菑水注之，水出常烝之山。西北迳曲沃城南，又屈迳其城西，西北入河。”菑水，即今菑阳河，源于陕西张汭乡卢庄一带，北流经南曲沃、黄村入黄河。菑水转弯处恰在今黄村南天门之南不远处。于此可知，今陕西黄村一带当为春秋时期的曲沃城。

温塘石窟位于陕西大营乡温塘村南，又名温塘摩崖造像。石窟雕凿在俗称王莽寨的山阴石壁上，原有东、西两处，有造像55尊，现东窟已毁，仅余西窟，长约7米，有佛龕6个，分上下两部分，造像36尊，较大的4个龕东西一线排列，龕内造像有佛、菩萨、弟子和供养人等。龕内及侧旁分别有大周长安二年（702）、唐大历九年（774）及宋宣和、政和年间的题刻。关于温塘石窟，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该石窟造像规模虽然较小，但盛唐时期的雕刻风格均有所体现，堪与洛阳龙门石窟的部分作品相媲美。二是石窟附近有温塘温泉，可除污消困治病，故唐宋时期香火不断，游人甚多，并多刻石纪念。题刻中的大历九年陝、虢观察防转运使皇甫温的题刻，亦颇为引人注目。凡此疑其与崤函古道运营有关。

综上所述，崤函古道西段——函谷道，自新石器时代晚期最早被开发并相互形成组合关系后，相继经过7次大的线路建设和调整，其中3次关隘建设属于交通线路控制工程，4次属于交通线路调整，形成了一条西端起自潼关，东端终于陕西故城的東西交通干道。因其主要路段行进于黄河长廊谷地，谷道深险狭窄如函，故可称作函谷道，又因其道路主要沿黄河南侧而行，故又可称作“黄河南岸道”。函谷道西端起自潼关，往东经过黄巷阪、阨底（阨乡旧城）、盘豆、湖县故址（阨乡老城）、双坟、杨家湾、东西吕店、东西古驿、稠桑、函谷关，渡过弘农涧河后，分为南北两股，其中偏南的经过沙坡、西南朝、曲沃、新店、桥头沟、太原仓，至陕西故址。偏北的经过桃林县（灵宝老城）故址，在曲沃与偏南一股汇合，至陕西故址。函谷道作为东西交通干道直到民国初期仍在发挥着作用。

（二）崤函古道上的枢纽和东西段的交汇处——陕西

陕西是崤函古道上的枢纽，东西两段均从陕西城交汇。历史上无论崤函古道交通线路如何变化，陕西始终是这一古道陆路和水路的必经之途。

陕西城故址位于今三门峡市西偏北约3公里处，即今陕西风景区。《直隶陕西志》中称该城为西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所建，周围十三里一百二十步，时为陕西县治所在。北魏太和十一年（487）设陕西，以后隋、唐、宋、金、元、明、清及民国时代均为州治所在，并同为陕西县治，直至1959年三门峡水库建成蓄水后废弃。陕西“南倚山原，北临黄河，悬水百余

仞，临之者皆为怵慄”。^[37]“郡带洪河侧，官临大道近”。^[38]该域北有古茅津渡和大阳桥连通黄河两岸，为南北交通之要。春秋初期，晋“假虞灭虢”即由茅津渡渡河。开元年间，大阳桥曾置水手200人，仅次于河阳桥。东面有黄河三门峡谷，是漕转关东粟米西入关中的最艰险河段。隋唐两代皆采用于三门峡谷东、西置仓，以陆路转运绕过峡谷险阻的方法，以保关中漕粮供给。陕县西南四里有太原仓，隋文帝开皇初年置，地势高平，周回六里，此仓“控两京水陆二运，常自仓车至河际，然后登舟”。盛唐时，陕州城下漕船盖以千数，足见转运之盛，其州官往往按例兼任水陆转运使。其战略地位自古为人称道。西周初年，封神农氏之后和虢仲于此分别建立焦国和虢国。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中云：“州内屏关中，外维河洛，履崤阪而戴华山，负大河而肘函谷，贾生所云崤函之固也。戴延之云其地南倚山原，北临大河，良为形势……唐之中叶，陕州尤为重地……三面险绝，攻之未可岁月下也……盖据关河之肘腋，扼四方之嚆要，先得者强，后者至散，自古及今不能易也。”

远在5000多年前，陕州一带就出现了像庙底沟文化、三里桥文化这样大型且时代延续极长、影响广泛的古人类聚落遗址。陕州之所以能在如此早的时代就产生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其原因就在于陕州是位于今晋、陕、豫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孔道，而且又处于这一孔道上最重要的枢纽地区。我们从庙底沟文化、三里桥文化中即可见到关中、伊洛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与特点，又可见到晋东南地区原始文化的某些影响，同时亦能发现其自身的特点。这就充分说明庙底沟文化、三里桥文化具有非常浓厚的复合文化的特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邻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联系与交流。西周初年，周召分治，“陕以东，周公主之，陕以西，召公主之。”分陕之地，即在今陕州城故址西南12.5公里的陕原，^[39]南接崤山，北抵黄河。由潼关东来洛阳，或由洛阳西去长安的古代道路均要经过陕州，在此交汇。唐张九龄有诗云：“驰道当河陕，陈诗问国风。川原三晋别，襟带两京同。后殿函关尽，前旌关塞通。行看洛阳陌，光景丽天中。”^[40]薛稷亦有诗云：“驱车赴陕郊，北顾临大河。西登咸阳途，日暮忧思多。”^[41]孟郊诗云：“陕城临大道，馆宇屹几鲜。”^[42]上述特点，正好说明当时的陕州一带是位于今晋、陕、豫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孔道，而且是这一文明传播孔道上最重要的枢纽地区。

（三）崤函古道东段——崤山道所经与线路的变化

崤函古道东段——崤山道，因其主要线路穿行于崤山脉之中，故而被称为崤山道。崤山道可分为两条，起点皆在陕州城故址，终点有所不同，故而分为两道，即“崤山南路”或“南崤道”和“崤山北路”或“北崤道”。

1. 崤山道南北两路的分合点——交口

交口是崤山道南北两路的分合点，位在陕州城故址东约8公里，湖滨区交口乡交口村，古称洩谷口，因灋水与洩谷水交汇于村南而得名。灋水即今青龙涧河，发源于今陕县店子乡盘陀山，在交口汇合上游四条支流安阳溪水（今雁翎关河）、洩谷水（今交口河）及崖水（今香油河）、干山水（今）为一水，西流经陕州城故址，南入黄河。洩谷水（交口河）东自张茅，西至交口入于青龙涧河，山地受洩谷水（交口河）的切割，裂开了一道隘路。洩谷水以东，自张茅东至观音堂山地豁开，成一谷道，沿涧河河谷而东可至洛阳。自交口循青龙涧河支流雁翎关河、洛河支流永昌河谷道东南行，复循洛河而东亦可至洛阳。于此可知，交口位处崤山山区西部，地当崤山南北两路路口，故而成为南北两路的分合点。新石器时代后期这里就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小交口、南交口、杨家湾等古人类聚落遗址。元至正十六年，“贼西陷陕州，断穀、函，势欲趋秦、晋……察罕帖木儿即鼓行而西，夜拔穀陵，立栅交口”即此地。

据《太平寰宇记·卷六·陕州硤石县》载：“后魏太和十一年分陕县东界于冶垆置崤县，在冶之郊，属宏农，取崤山为名。”崤县即后来硤石县的前身，其所在，一般认为在古安阳城所在的今陕县菜园乡南县村。《寰宇记》中强调崤县“在冶之郊”，即在陕州治所之郊，或可说崤县应当紧挨着陕州治所，而古安阳城所在的今南县村距陕州有25公里左右，显然是不宜称之为陕州之“郊”的。辛德勇先生认为，陕州城东南、交口以西的“野鹿”，傍古之橐水，与“冶垆”音似，地望与《寰宇记》陕州之“郊”亦合，当即北魏崤县所治。^[43]据该村清同治九年墓志载，此地古为冶炼场地，故名“冶垆”。后冶炼业渐衰，而村外常有野鹿出没，遂易名野鹿。崤山南北两路在交口交汇，进入陕州城之前，都要必经冶垆，表明其治所的选择，显然与强化对崤函古道枢纽陕州和崤山南北两路分合点交口的控制具有一定关系。

2. 崤山南路所经与线路的变化

(1) 安阳故城、南硤石县故城和大通寺遗址

由交口向南，约18公里可至今陕县菜园乡南县寺坡村。据《太平寰宇记》中载，硤石县安阳城，“安阳城，唐贞观八年以崤县在此城内置，十四年移治向南，改名硤石县。”也就是说，从贞观八年到十四年，复置后的唐崤县县治在安阳城。又据《水经注》载：“橐水北流出谷，谓之漫涧矣，与安阳溪水合，水出石崤南，西经安阳城南。”石崤，接近今雁翎关。安阳城由安阳溪水（今雁翎关河）得名。据此，安阳城当在安阳溪水北岸，今安阳溪水之北为寺坡村，由古萧寺（唐玄宗更名大通寺）处其地得名，之南即今南县村。南县村本名安阳，即《西征赋》中“我徂安阳”，又称安昌^[44]。唐刘长卿的《硤石遇雨宴前主簿从兄子英宅》一诗有“县城苍翠里，客路两岸开”句，为当时写照。现地表城垣不存，平面形制亦不能详。据观察，南县村的隋唐文化层沿今三洛公路长度，800余米，宽500余米，断崖处偶可见夯土墙基，城内面积约25万平方米，至今当地群众仍可指示其城门和街道的位置，河水北岸一处废弃的窑洞顶部暴露有一层铺地方砖，似为当时衙署所在地。地表散存有布纹大瓦、黄釉瓷片。于此可知，今寺坡村和南县村，即安阳故城所在，因河道长年冲刷已非原貌。

文献记载，唐硤石县（初称崤县）曾在义宁元年（618）和贞观十四年（640）两次移治古硤石坞，直至宋北宋乾德五年（967）^[45]，并因此在贞观十四年改崤县为硤石县。硤石坞即今南县村东南六七里的石门（现修有石门水库处），亦即民国《陕县志·古迹》中的所谓的“石坞”。《元和郡县志》中云：“硤石县西北至陕州五十里。”据1983年冬季在陕县张茅西崖姚懿墓中出土的《唐古崤州都督赠吏部尚书姚公玄堂记》载：“玄堂在陕州东硤石县东北二十里。”所言的硤石县地望均指南县村一带。南县应为后人所称，是相对于北硤石县而言。

在寺坡村后山坡上一坍塌庙宇遗址上，发现一通唐碑，通高1.5米，宽约0.45米、厚0.2米，螭首，龟趺，碑阳额刻一座佛，下部雕刻一供养人夫妻像，文13行，行20字，刻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楷书，字体清晰规整，疏朗大气，落款“大周长寿元年（692）九月廿三日”。碑为唐朝散大夫行陕州县令上柱国敬仁玄及其妻樊氏造立。碑阴则为“新修敬府君真形之碣”，是后人为纪念敬仁玄而镌刻的“新修大通寺阁下故硤石县令敬公真形之碣并叙”，碑额双龙缠绕，碑文16行，行约40字，“长城陈用海字明道撰”，字稍有漫溢，但仍可达句不失其意。落款“大唐开元元年（713）七月廿三日建”（图5）。这说明，唐代大通寺就在今寺坡村。



图5 大通寺拓片

由寺坡东南行约三公里，在石门村南绣岭坡，有唐显庆三年（658）所置的绣岭宫。《明皇杂录》中有：“上幸东都，至绣岭宫。”绣岭宫依山带水，为一形胜地。现场考察虽然未发现任何遗迹，但史籍记载与地理形势完全相符。

（2）雁翎关旧址和夏后皋墓

从南碛石县故址出发，东南行，穿行于群山峡谷之中，约10公里，便来到了雁翎关旧址，关址位于陕县菜园乡与宫前乡交界处。雁翎关是崤山南路上的一个重要关隘，当地人称其为崤陵关，后因口语有讹，讹传至今，通称雁翎关。关口海拔851米，最宽处200米，最窄处仅30米，状如马鞍，关口东西均为陡坡，东坡陡峻，西坡较缓。关口东坡自关顶到关底不足300米，高度下降约60米。石崖高耸，灌木丛生。雁翎关西为青龙涧河源头，向西沿崤谷西段直至菜园汇入漫涧。关东为永昌河支流源头，沿河谷东段流至宜阳三乡入洛河。关东、关西之河谷为春秋后至汉末和隋唐时期东西交通干道。唐时在今南县村设置硤石县，管理守护关口及附近地区通道。明代有兵戍守雁翎关。关口所处山岭，春秋时称其为南陵。关西北附近一山巅上有一古冢，墓呈圆丘形，高约1.5米，土石冢、墓旁有栎树数棵，附近草木茂盛。《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载：“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即谓此。相传夏朝第十四代帝王夏后皋在此关附近与敌对部落战死后葬于此。

（3）莎栅城与莎栅道^[46]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零》，隋纪大业元年纪：“（三月）丁未诏……营建东都……废二崤道，开萋册道。”胡三省注：“洛州永宁县，本熊耳，西五里有崎岫宫，南（应为西）三十里有兰峰宫。此皆东西二京往来缘道离宫，杂出于隋唐所置，不载所谓萋册道，不知此道起於何所，入於何所。《山海经》曰：‘夸父之山，在湖县西九里，其山多萋柎，其北曰桃林，或者萋柎此而后讹为萋册，逐为萋册道欤！’”萋册道（后称莎栅道）于大业元年（605年）开辟后，又屡有兴废。《唐会要·卷八六·道路》曰：“贞观十四年七月三十日，移五崤道于莎栅，复旧路。”《通典·卷一七七》河南府永宁县条三崤山二陵道：“大业三年废，武德初又通此道，贞观十四年又废此道。”以上记载说明：大业初废三崤道，开莎栅道，武德初又废莎栅道，重开三崤道，贞观十四年复废三崤道，再开莎栅道。隋末和尚慧常由东都被系往西京，“行次莎栅”正值莎栅道通行之时^[47]。

莎栅道的开辟是崤山南路交通线路的一次重大变迁。但因史籍记载语焉不详，历来对其线路起止、经点等说法不一。我们随李建超先生进行实地考察，结合文献记载，对此有了新的认识。据《太平寰宇记》中载“莎栅谷在县西三十里，唐有莎栅城，韩愈、孟郊有莎栅联句诗。”据《资治通鉴·卷二二一》中载，乾元二年（759），安史之乱，李忠臣追击史思明部将李归仁“战于永宁、莎栅间，屡破之”。胡三省注：“永宁县……武德三年移理同轨，贞观十四年移理莎栅，十七年又移理鹿桥。”这说明贞观十四年（640）开莎栅道时曾移永宁县于莎栅。按《新唐书·地理志》载，“永宁县西五里有崎岫宫，县西33里有兰峰宫，皆显庆三年置。”由此可知，兰峰宫在永宁县西33里，莎栅城在永宁县西30里，那么莎栅城应在兰峰宫东3里之地。陕县宫前乡宫前村北有武则天行宫遗址，按史籍记载，从地理位置、地理环境与现场实地考察，陕县宫前乡宫前村北的“武则天行宫”是唐代的兰峰宫。

莎栅道与三崤道相比有哪些优点？崤山南路历来的路线是从陕县东南沿青龙河谷至唐硤石驿（今陕县石门水库，即硤石坞），再溯雁翎关水越雁翎峡谷沿源于此地东流之永昌河至三乡驿（今宜阳县三乡镇），再顺洛河东去洛阳。但永昌河从兰峰宫东向大致沿纬度线方向约20公里至龙脖水库大坝，又东南沿永昌河至今宜阳县三乡入洛河。永昌河从柳树沟至龙脖水库间曲流发育，即弯道多。从永昌河起点到注入洛河，大体上是西北向东南弯曲的“弓背形”。

莎栅道起自永宁县城西30里莎栅城，即兰峰宫东3里，东南行经今池头、头峪后入洛宁县境到旧县村相距是30里。确为唐制30里一驿。从旧县村东南经今照册村，沿河谷东经大宋（东宋）直抵三乡驿。旧县村与三乡驿之间也约为30里。据说“照册村”即为“莎栅”，^[49]今为一大村，应与莎栅道有关。新开莎栅道既东南斜行近乎直线走向为“弓弦”，自然道路便捷，减少路程，再加以避免曲流，又减少路程，量算莎栅道比古崤山南道减少路程约20余里。再者莎栅道从起点到鹿桥驿，大体沿黄土丘陵原面或小分水岭，道路比较平直（高差不大）。这样莎栅道既便捷又较为平坦，所以自唐贞观十七年之后，从陕州东南至洛阳的大道就改为莎栅道，而崤山南道就废弃了。由此不难看出，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后，从莎栅城沿莎栅道，并移永宁县城于鹿桥，这就是莎栅道。路线是莎栅城（驿）、永宁县城（鹿桥驿）、三乡驿。此后唐高宗显庆三年，又于莎栅城西3里置兰峰宫、鹿桥驿西五里置崤山宫。兰峰宫至崤山宫也约为三十里，即当时在山区行走的一日程。

（4）安国寺

从雁翎关出发，向东，过宫前，沿永昌河谷，约20公里至安国寺。安国寺，又名琉璃寺，在今陕县西李乡东南方向约6公里的瑞云山下、元上村西。据该寺正殿廊下承檐石柱上雕刻的《安国寺小序》载，寺院始建于隋，自唐迄清历代多次敕封，屡经修葺。当年为修建安国寺，方圆附近之良木、精料全部用完。现存建筑多为明清时翻修改建。现存面积5000余平方米，寺内有房屋33间，寺外东侧还有僧房27间。其主体建筑坐北朝南，为五进院，中轴线上有山门、前殿、三佛殿、二佛殿、火墙门楼、后大殿，其中被火墙门楼界为前、后院。另外还有东西掖门、钟楼、西配殿、东西廊房、莲花池。安国寺北依瑞云山，南临永昌河，在莎栅道开通以前，这里是崤山南路的必经之地。在其周围，有不少隋末瓦岗军领袖李密等的活动踪迹。

（5）唐永宁县城故址

从莎栅城出发，东南行经今池头、头峪后入洛宁县境，约15公里到旧县村。《旧唐书·地理志》中载：“义宁三年置永宁县，治永固古城……武德三年移治通轨城……贞观十四年移于今所，十七年移于鹿桥。”自义宁三年（618）置永宁县于永固城后，又先后迁移到同轨城、今所和鹿桥，前后20多年间有四个城址。“今所”所指据《资治通鉴·卷二二一》中载，乾元二年胡三省注引宋白曰：“贞观十四年移理莎栅，十七年移鹿桥。”于此可知“今所”即莎栅，即贞观十四年（640）永宁县城在莎栅，贞观十七年（643）移永宁县城于鹿桥，之后，直至唐末迄无变动过。如《资治通鉴·卷二二二》中载，上元二年，安史之乱时，史思明、史朝义皆败退永宁“思明在鹿桥驿……朝义宿于逆旅”。下文胡三省注：“鹿桥驿，永宁传舍也。”据民国六年《洛宁县志》所载，金正隆六年（1160）永宁县城由鹿桥南迁至洛河河畔，民国二年（1913）更名为洛宁县。原鹿桥的永宁县城即今洛宁县北约50里的旧县村（南旧县、北旧县）。关于旧县村的地望按陕州至洛阳南道（崤山南道）是350里，《元和郡县图志》记述永宁东至河南府200里。则陕州至永宁县城应为150里。《太平寰宇记》陕州条“东至河南府永宁县116里，东南至河南府永宁县界160里”，疑《太平寰宇记》上条“县”字下应有“界”字，而下条的“县”字下之“界”字当误^[50]，即陕州东南至河南府永宁县界为116里，东南至永宁县城160里。《读史方輿纪要·卷四十八》记载，永宁县在河南府西南200里，北至澠池县120里，西北至陕州200里，则唐永宁县城无疑在今洛宁县北大约五十里处的旧县村，旧县村就是唐代贞观十七年永宁县城的治所鹿桥驿。

（6）战国宜阳城故址

从唐永宁故城出发，东南经今照册村，沿连昌河谷，约15公里抵同轨城（今宜阳三乡城头村），从此始，南路循洛河河谷行进，东北行5余公里至战国宜阳故城。《括地志》载：“故韩城，一名宜阳城，在洛州福昌县东十四里，韩宜阳城也。”该城位于今洛河北岸韩城乡东关

村与城角村之间。战国时，韩国为防御秦国，在此建置宜阳城，“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粟支数年，公仲之军二十万”^[51]，是控扼崤山南路的军事重镇。秦国多次出兵，经由南路攻伐宜阳，武王四年（前307），甘茂攻下宜阳，打通崤山南路。城址呈“匚”字形，南北长2220米，东西宽1810米，面积约为366万平方米。四面城墙均系夯筑而成，夯土坚实，夯层显明，但保存较差。城墙现存高度最高处达10米，最低处约0.5米。在北、东城墙大致中间的位置，各有一个豁口，当地群众分别称其为“北门口”和“东门口”，应为当时的北门和东门，而南门和西门，因城墙已被洛河和韩城河冲毁而不见踪迹。根据城墙的墙筑形制和夯土内的遗存，宜阳城并非同期筑成，而是在原来规模甚小的旧城东边，又扩建了规模较大、筑造规整的新城区，二者相互衔接并沟通，使之成为一个规模更大的“匚”字形城廓。在该城附近及其城内，当地群众经常挖到板瓦和铜瓦及铜镞、铜矛、铜戈等兵器，主要是战国时期的，也有少量春秋的。另外在故城西约3公里，有一秦王寨村。《宜阳县志·卷二》称：“秦王寨为秦代宜阳村，秦兵安营扎寨之处”。今村内有土寨，三面临沟，深不可越，一面有路，地形十分险要。在宜阳故城东北约5公里的山坡上，有村名曰“连楚”，村东有一大冢，人称“楚王墓”。《宜阳县志》：“县西北有村曰连楚，村东有冢，相传以为楚王墓”。此记载与《史记·周本纪》所记“赧王八年，秦攻宜阳楚救之”有紧密联系，不一定是“楚王”亲自带兵救韩，是抗秦救韩，参加宜阳之战的“楚将墓”，也不无可能。这种情况说明，该城可能始建于春秋时期，战国时又做了大的扩建，大概在公元前347年“秦拔宜阳，斩首六万”后遭到破坏与废弃^[52]。

宜阳是东行入洛阳的南道口。在宜阳故城之西约七公里，有一村名曰“福昌”，村北原上有一故城，有多种文献记载，此即唐福昌县故城。从福昌出发，沿洛河东北行，经柳泉（今宜阳县西柳泉）、寿安（今宜阳县城）、三泉（宜阳东苗村），抵达洛阳。

3. 崤山北路所经与线路的变化

（1）张茅董达桥遗址

由陕州城出发，过交口沿涧河东行，约19公里至今陕县张茅乡张茅村，村东有董达桥，为五代时董达所建，宋元明清代有修葺，桥以砖砌成券洞式，上设石栏板，两旁有石柱，毁于20世纪60年代公路改建时，沿用1000余年，为崤函古道北道必经之地香油河（据《水经注》所述，似为崖水）上建筑物。桥左右两侧石栏板用石柱20根间隔，题刻为：恒农郡、董达桥、东距珪（虢公为王筑于珪，今澠池王都）、西邻焦（古焦国）、南排漫、北距茅、连二陕、数三崤、韩魏境、豫冀交、仙话李、相传姚、道转峡、水如膏、藩篱固、锁钥昭。文字传递了董达桥所在的位置和重要性，也概括了在附近地域所发生的历史故事。有一方石栏板上刻题临江仙一首：见说物华曾毓秀，崤函古道彷徨，何年金兔石间藏。异香泉待饮，直刺枣堪尝……是说赵匡胤早年与郑恩在此卖香油，途中油篓翻倒，油流入河，郑恩又扒瓜园，被打后溜入坡下，手拉酸枣树，将刺捋直的故事。董达桥西的张茅，亦为崤函北道一重要村镇，唐相姚崇及其父唐初名将姚懿，祖居并受封于此地。张茅地名即裂土封茅而张大之意。

（2）北碛石县故址

由张茅出发，向东行8公里，至陕县碛石乡所在地碛石村。该村东西狭长，四面皆为崤山环绕，一条道路从村中通过。当地群众称其为老路。《太平寰宇记》云：“唐义宁元年再置崤县，理碛石坞，二年省。武德元年再立。三年移理鸭桥故镇。贞观八年移于安阳城。十四年移于碛石坞西，即今县是也。”《旧唐书·地理志》亦有类似记载。碛石坞、安阳城在今陕县菜园石门南县村一带。武德三年至贞观十四年二十年中的县治鸭桥故镇，在石崤水与崤水上源合流前的崤水上。《水经注》崤水注：“河之左则崤水注之，水出南盘崤山，西北流，水上有梁，俗谓鸭桥也。”盘崤山即今碛石山，一名崤山，崤水即今碛石水，水上有桥，桥当在碛

石。今陇海铁路碛石站西面由东向西接连两座桥梁，东面一座跨古千崕水，西面一座跨古崕水，有学者指出，古鸭桥应当就在西面这座桥山下。^[53]旧志说指甘壕，不确。于此可知，义宁以后的崕县，在武德三年至贞观十四年的20年中曾移治于鸭桥故镇，即今碛石。在此之前，鸭桥已是一时重地，北周“三崕镇将”的治所，故《太平寰宇记》中称其为“故镇”。这也为建立县治奠定了基础。时隔433年后，鸭桥再次成为县治。《宋会要辑稿·方域·五之三九》载：“陝州碛石县，乾德五年移治石壕镇，仍割河南永宁县之胡郭管隶焉。”宋的石壕镇即今碛石。石壕镇和鸭桥极近，几乎就在一地，石壕稍偏东，鸭桥稍偏西。相对于位于南崕道的碛石县，这里称北碛石。宋熙宁元年（1068）省碛石县为石壕镇^[54]，后又改为碛石关、驿所。民国时期碛石寨门上题联，横批是“碛石旧县”。流经碛石之水即崕水，水东侧即金银山（崕岑山）。在该村范围内，没有发现唐宋时期的古代城池遗址，但据当地群众讲，早些年地表上还散存有板瓦，黄釉、黑釉、白釉瓷瓶、壶、罐、碗等。断壁处偶见夯土层。在城外附近崕水两侧岸边发现唐宋文化遗物，石料场和采石场附近有唐宋墓群，碛石北面的三嘴寨等处为北宋晚期石壕尉李彦仙与金兵对垒处，碛石东5公里处，即北崕道石壕古道遗存。

碛石还是诗人杜甫著名的《石壕吏》的诞生地。《全唐诗·卷二一七·杜甫〈石壕吏〉》，本注：“陝县有石壕镇。”自北宋以来都认为《石壕吏》作于石壕镇。石壕镇在宋初已有，前引《宋会要辑稿》及《宋史·地理志》可证。但在唐代这里尚未设镇，县下大量设镇是在宋代以后。所以，在杜甫经过此地时，石壕还只是单称石壕，或石壕村，而不称镇。后人将《石壕吏》说成是在今石壕村有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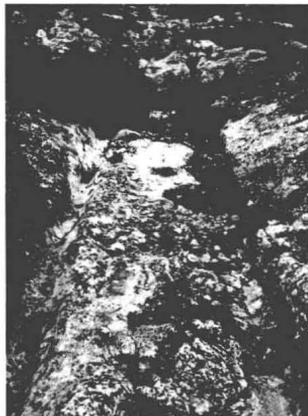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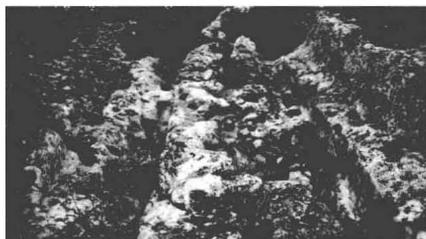
文王避雨台，即春秋时期称谓的北陵，在碛石村东街北，面临古崕水。台为一长约50余米，高度约8米的石坎，坎东上部有柏树一棵，民国版《陝县志》中原有文字照片，为该坎上部岭顶的一处坡平地，原有柏树、庙宇、八卦琉璃井，石刻碑碣等，1965年前后被毁，现已辟为耕地。《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载：“崕有二陵焉……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也”，指此。

《括地志》中有：“崕山又名崕岑山，按文王所避风雨即东崕山也，俗亦号文王山。”崕岑山即今陇海铁路南侧群众称为金银山者，在文王山及碛石南，海拔968米，为崕山主峰。著名的秦晋崕之战，晋败秦师于此。

（3）石壕古道遗迹

石壕古道位于碛石乡石壕村西南的山坡上，西距碛石村2.5公里，北距石壕村2公里。古道的东端接一山沟，北端与1920年前后修筑的洛潼公路相重合，一部分被洛潼公路或破坏或叠压。最高处海拔高度676.8米，北坡下最低处海拔669米。现存的古道遗迹位于山坡中部，保存较好，系借助于山坡中部自然形成的岩石上修筑，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全长230米，宽窄不等，最宽处达8.8米，最窄处5.2米（图6）。古道上遗留的车辙印痕有一车道（二条车辙印痕）、二车道（四条车辙印痕）和三车道（六条车辙印痕），其中，一车道是主车道，二、三车道为会车辅道。车辙印痕宽窄不等，有宽有窄，深浅不一，最宽处0.4米，最浅处仅有数厘米，最深达0.41米。两车辙印迹外宽相距一般在1.32米，最宽可达1.56米，最窄处1.06米。两车辙印迹辙心相距1.15米（应为两车轮之间距离）。依据古道走向从北到南分为以下三段。

图6 石壕古道遗迹



第一段，为古道北段，呈东西走向。西端与老洛潼公路相连，东至蓄水池（当地群众称其为坡池），长30米、宽5米。道路中部有两条宽窄不一、深浅不等的车辙印迹，该段为一车道。

第二段，为古道中段，呈西北—东南走向。北端从蓄水池处起，向东南逐渐上坡，越过山顶至南坡下坡处，长170米。其中北坡150米为上坡，坡度较陡，坡顶20米坡度略平缓。此段道路宽窄变化较大，北边坡池以南约20米长为古道最宽处，宽8.8米，车道有一车道和二车道，最窄处为一车道。北坡中部古道东西两侧，各有一处人工刻凿的痕迹，西侧有三个不同时期刻凿的台阶形断壁，以求道路两边与中间相平，每个台阶高0.5米。在古道东侧至今仍保留有人工使用钢钎刻凿的痕迹。在两车辙印痕的中间，还残留有因马蹄或牛蹄等多次踏踩而形成的蹄形石印。坡顶一般是两车道，中间一条主车道，道侧间有会车道。在山坡顶部南段有一段为三车道，中间有一主车道，主车道两侧各有一条会车道。

山坡顶部的古道修筑在一条长约40米、深2~3米的壕沟内。壕沟是古人以自然形成的山坡为基础，加之人工刻凿、自然风化和长期的车轮碾压而形成。壕沟上部最宽处约13米，一般在8米左右。壕沟下部宽窄是依据道路的宽窄而定，最窄处1.65米（一车道），一般宽度3.9米（二车道），最宽处5.7米（三车道）。

第三段，为古道南段，走向由南北转为偏东西方向。从山顶向东转折下坡处起，直到东西向山沟西边止，长30米。山沟的东边，半坡村山路两侧也发现有古道遗迹。由于被山路叠压，呈两段，其中，一段长约4米。据当地群众讲，该段古道与山顶古道原是接连的。这说明，石壕古道的南段是由西经山沟向东一直延伸，过半坡村后与老洛潼公路相接。

此外，在古道北坡下和坡顶路两侧还发现有三个蓄水池（坡池），是人们利用自然形成的坑凹地形并在此基础上，略加整修而成的蓄水设施。石壕古道因地势较高缺乏水源，加之坡陡路险，人、畜劳累流汗，为解决饮水，人们使用这种蓄水设施借助蓄存自然雨水，以供来往行人以及驾车、驮货的牲畜饮水之用。

北坡下蓄水池：位于石壕古道北坡下东北角，古道拐角处。水池近圆形，口大底小，坑口直径约5米、深1.4米。坑壁规整，底部较平。坑内淤土为红褐色，土质纯净、坚硬。据当地村民讲：该水池从人们记事起就已存在，是个古池。

坡顶蓄水池：一个位于南坡古道西侧，为自然石坑加之人工刻凿而成。水池呈椭圆形，四壁较直，底部东高西低。池口南北长2.45米，东西宽1.55米，池底长2.2米，宽1.5米，坑深0.5~1米。池内填土为黑褐色，系一次性堆积而成。另一个位于坡顶古道壕沟东侧3.75米处，亦为自然石坑加之人工刻凿而成，有池体与排水沟两部分组成。池体为一座口略大于底部，近似椭圆形袋状。坑壁及坑底均为石灰岩质，底部较平。池口东西长2.65米，南北宽1.2米；池底长3.05米，宽1.4米，深1.2米。排水沟口设于蓄水池西壁口部向下0.6米处，再由排水沟口向下延伸至路壕底部古道东侧一个近长方形的接水池内。排水沟长4.36米，宽0.4米、深0.9米。接水池东西长2米、南北宽1.5米，池深0.2米。排水道的作用是，当降大雨时，为蓄存更多的水，就通过排水道将溢出的水，借助高差排入古道东侧接水池内，这样不仅可有效蓄水，且便于行人及牲畜饮用。

据考古资料，战国韩国境内的车轮轮距为1.06米，秦代的车轮轮距是1.5米，汉代车距轮距则为1.32米。石壕古道现存车辙印痕的外宽一般在1.32米，最窄处1.06米，最宽处1.56米。据此，可以断定石壕古道在战国时期及以后都在不停地长期使用。

在古道及其附近还发现和出土有关的出土文物，计有大小铁马掌、圆帽铁栓、蘑菇状残铁钉、铁质长方体车轴配件、残铜铃以及湖南省造光绪当十铜元、褐釉瓷碗残片、青花瓷片等。此外，在坡顶路壕东侧有一个清代石灰岩质龟形碑座，座近圆形，直径1.1米、厚0.4米，碑身已失。按其所在位置，碑文内容当与古道修凿有关。从出土遗物看，除坡顶蓄水池内出土的褐釉瓷碗残片及一块青花瓷片为清代遗物外，绝大多数为民国中、晚期遗物，有的则晚至20世纪50

年代至70年代。初步可以断定，这段古道废弃年代应当在民国初期以后。

(4) 石壕村

从石壕古道向东约2公里，抵石壕村。古道原本从村中通过，俗传名称尚有老路壕、古路壕，村东道路上亦有车轮碾轧石板形成的车辙印迹，后修路拓宽时被毁。据该村老年村民讲，村中道旁原设有茶亭，亭旁有碑数幢，今已失散无存，记述内容当与道路有关。该村本称干壕或甘壕、兴隆镇，即《西征道里记》中的乾壕，也是后唐清泰元年潞王东入洛阳所经之地。后该村村委因《石壕吏》一诗，将村名改为石壕村。

(5) 崤陵镇故址

从石壕村出发，东行4公里，便来到观音堂。据清嘉庆二十年（1815）重修观音大寺和关帝圣庙所立石碑记载，观音堂古称崤陵镇，因西依崤陵而得名。明嘉靖年间，灵宝书生徐阶在此建造观音大寺后改名。观音堂街上原建有观音大寺和关帝庙，寺内有鼓楼和钟楼，分立南北两侧，为三层六面带斗拱的砖木建筑，其上各有10米高的铁斗旗杆。鼓楼毁于1968年，现仅存钟楼。寺院旧址现为一学校占用。

(6) 北山高道

《水经注·千崤水下》载：“汉建安中曹公西讨巴汉，恶南路之险，故更开北山高道，自后行旅率多从之。今山侧附路有石铭云，‘晋太康三年宏农太守梁柳修复旧道。太崤以东，西崤以西。’明非一崤也。”曹操“更开北山高道”事，又见于《左传·襄公三十二年》杜预注，所记内容与《水经注·千崤水下》同。北山高道是崤山道一次重要的线路变化，以至有人把它与崤山北路和南路并列为自古以来崤山的東西三通道^[55]，足见其重要性。北山高道指在崤山北道之北别开山路，其所谓南路，实指通常所说的北道。但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一直没有人能准确做出复原路线。胡德经先生在《两京古道考辨》中考证说，这条道路自今新安县铁门西北，经辞主坡（柿树坡）、坨坞、韶山南坡、大小扣门、大蛇湾、舜王庙、辛家湾（硤石北）、牛坡，然后经张茅北平顶山、大小历山，而进入陕县老城，后又经新店、曲沃、灵宝老城，过弘农河，登稠桑原，与秦汉旧路合。全长293里。这一复原影响很大，至今被许多人引用。但具体也有疑问。曹操“更开北山高道”的原因是“恶南路之险”，而原来道路的险仄，主要是在东、西二崤之间的地段，因此，新开北山高道只要能避开这一段路途也就应该可以了，而东、西二崤，按戴延之《西征记》的说法，只有30里，何必去开辟一条长达293里的新路呢？更何况，曹操开辟北山高道的背景是为西征马超、韩遂的军事需要，在战事紧张环境中，又有多少充裕时间可以等待甚至今天看来都相当费时的筑路工程的贯通呢？在当时情形下，又有多少人力、物力可骤然调集到人烟荒芜的崤山北路去筑路呢？可见胡德经先生的考证还得再商量。辛德勇先生在《崤山古道琐证》一文中，根据历史文献，将北山高道走向复原为：从盘崤山西侧即今硤石西开始离开旧路，向东则至千崤水，沿千崤水谷地上溯南行，至千崤山下与旧路合。因为《水经注·河水·千崤水下》云“其水北流，缠络二道”，说明新旧两路都有一段是与千崤河谷并行的。而晋太康三年宏农太守梁柳修复的“旧路”是原来的崤山北路，而不是北山高道，起讫地段是太崤以东，东、西崤以西，千崤山是其东界。辛德勇先生的复原有其合理处。北山高道只是曹操为避开“南路之险”而别开的一段短距离道路，否则，无法解释曹操的“更开北山高道”的目的。今观音堂煤矿（矿务局）傍兴隆涧河（清水河），我们在李健超先生的带领下，从观音堂煤矿沿兴隆涧河北上，行十二三公里，河面豁然开朗，硤石河自西南而来汇入兴隆涧河，前行，河面开阔，约6公里，至弥陀寺，该寺位于柴洼乡柏树村北，始建年代不详，原寺建筑规模较大，现存建筑均为清代重修，有中殿、正殿等共9间，东西廊房8间，戏楼一座，建筑面积600余平方米。据当地群众讲，当年这里较繁华，从兴隆涧河北上的行人在此停留。弥陀寺北面便是柏树山、刘家山，山北侧有道路通支建煤矿、庙沟。兴隆涧河

至张上村注入黄河。在碛石西一带似只有兴隆涧河一带地理环境与辛德勇先生复原的北山高道线路地理环境相似。那么，推测当年北山高道是否为沿今兴隆涧河河谷北上欤？因课题时间所限，有待进一步调查。

民国《陕县志·卷十九·南北二崕道》中称曹操所开北道“当自宫前以西，北通碛石至陕州”，这也是一些地方史志中称崕山南路至宫前蔡家湾一分为二，其中一条沿太子沟北上至碛石的所谓高道之所本。雁翎关是崕山南路最为险峻的一段，碛石、石壕则是北路最为险峻的地段，雁翎关虽然险峻，但通过后即进入了青龙涧河河谷，地势较缓，道路易行，且距陕州仅有约26公里，比碛石距陕州的距离少二三公里，加上北上的路段，则更长。既然已经好不容易通过了雁翎关，又有什么理由再折而北上走更为险仄的碛石路呢？这样既险仄又迂远，是违背常理的。根据实地调查，从蔡家湾北上，经太子沟，的确有路可通，但道路设计总是选择易行而不费力的地方，古今如此，不会自找麻烦在通过一段险峻道路又有路可走的情形下再折而选择走另一段险峻且距离更长的路。

（7）澠池县故城

从观音堂出发，东行经甘壕、英壕，至澠池故城。城址在今澠池县西7公里的朱城村，面积约37 800平方米。该城址为公元前279年秦赵会盟之地。因会盟时双方各据一城，东西并立，东曰赵城，西曰秦城，秦王击缶，赵王鼓瑟，俱称有利而称俱利城。《元和郡县志》中云：“谷水南去县二百步。东经秦、赵二城，俗谓之俱利城，东城在县西十三里，西城在县西十四里。昔秦、赵会于澠池之处。”秦汉时期，曾为澠池县治及北魏、东魏时期之俱利县城。现地表城垣不存，经调查，当地群众反映在城址内常常可以发现战国时期的筒瓦、板瓦等建筑构件残片，也时常可以捡到铜镞等遗物。唐贞观元年后澠池县城移治双桥（即今城关镇）一直沿用至今。

（8）新安故城

由澠池故城向东，约十二三里至新安故城，城址位于今义马新市区南6公里的二十里铺村，南临涧河，陇海铁路东西横穿而过，面积约15万平方米。呈长方形存在的古城遗址，东部边缘大部分被涧水淹没。距该城址约1公里处有一村名称“马岭村”，传说是在秦赵会盟时，赵惠文王在此驻军放马而得名。《史记·项羽本纪》中云：“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于此可知，新安故城当形成不晚于秦末时期。西汉初在此置新安县。《括地志》又云：“新安古城在洛州澠池县东一十三里，汉新安县城也。即坑秦卒处。”北魏、东魏和西魏时的西新安县治亦在此。隋大业元年（605）澠池县移治新安古城，十二年（616）移治大坞城（今澠池县西阳乡崕村沟附近）。清光绪二十七年慈禧太后从西安返回北京，曾在此修建有行宫。今新安故城地表城垣已不存，但在城址范围内，经常出土有陶器残片、铜镞及秦汉时期的筒瓦、板瓦和陶制排水管道等建筑构件。

新安故城西南有“楚军坑杀秦卒处”。秦二世三年（前207）项羽西进入关伐秦，行至新安，坑杀已投降的秦卒二十余万于城南，俗称“楚坑”。现在楚坑轮廓仍清晰可辨，呈东西走向，长400米，宽250米，面积约10万平方米。据当地群众讲，在楚坑遗址上，夜晚偶尔可以看到“鬼火”。759年，杜甫途经“楚坑”，留下“项氏何残忍，秦兵此处坑。愁云终古在，鬼灿至今明……”的诗句。民国二年（1913），修建陇海铁路时，施工者在坑内还发现有累累白骨。直到20世纪70年代，当地农民在坑内平整土地时，也常常挖出人骨。遗址右面原来还有一座白龙庙和一口八角青石井。1912年修建陇海铁路时，“楚坑”全部被毁，原貌不复存在。

（9）鸿庆寺石窟

从新安故城出发，向东约9公里，至石佛村。鸿庆寺石窟开在该村西北白鹿山东端的岩石壁上。据镶嵌在一号石窟中心柱上的明嘉靖四十二年的《重修白鹿山鸿庆寺古佛龕碑序》可知，该石窟原名三圣庙，大周圣历元年（698）安乐公主来此，易名鸿庆寺。石窟开凿年代，史无确切

记载，但从窟龕形制、造像题材、艺术风格等方面所展现的面貌，推断其开创时代不晚于北魏景明年间，以后历代多有修缮。石窟依山势高下而凿，原有洞窟6个，现存4个，有佛龕46个，大小佛像120余尊，浮雕佛传故事4幅，碑碣8通。其中，第一窟是整座石窟显存精华所在，其北壁、西壁和南壁分别雕刻的是释迦摩尼生活、修道及出行的故事。鸿庆寺石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总体上的规制严整。无论是单窟还是窟群，它的总体布置都很规则，互相连接，紧凑严密。可见它是经总体规划，一次性施工完成，其营造者应系官方或权贵。鸿庆寺石窟从形像到技艺与巩县石窟极其相似，如出一人之手。可以说，继龙门宾阳洞之后，在洛都东、西出现了两颗佛教艺术的明珠，即巩县石窟和鸿庆寺石窟，它们是中原地区北魏中小型石窟的杰出代表。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特别是东晋至唐代末年这一时期，凡丝绸之路所经诸地，皆有石窟寺或千佛洞，这已经成为常识。石佛村地当崤函古道北路上，出现石窟寺是不足为奇的。

（10）新安县城和汉函谷关旧址

由鸿庆寺石窟向东，经千秋、铁门，汉函谷关，抵新安县城。新安县城地当洛阳西出道口。《元和郡县志》卷五：“（河南府新安县）县城本名通洛城，周武帝将东讨，令陕州总管尉迟纲筑此城以临齐境。”唐贞观间移治于今新安，后不复变。王筠的《新安令元瑾颂德碑记》云，新安“郭抱连麓，门开故关，当洛阳西偏之境，接长安东狩之区，日候万乘，岁贡百役。”^[56]

汉函谷关旧址位于今新安县城关镇东关村，或称金墉镇，西距县东门1公里。《汉书·武帝纪》：“元鼎三年，徙函谷关于新安”。关于迁关的原因，据《元和郡县志》载：“汉武帝元鼎三年，杨仆为楼船将军，本宜阳人，今福昌县也。耻居关外，上疏请以家僮七百人徙关於新安，武帝从之，即今新安县东一里函谷故关是也。”^[57]长期以来，人们对汉代函谷关的认识较为模糊。据《新安县志》记载：“汉函谷关在县城东500米处，遗址尚存。”这种把函谷关仅作为交通要道上的一个关口的看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1998年3—9月，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在小浪底水利枢纽上游12公里处黄河南岸的新安县盐东村附近，发掘了一座西汉仓库建筑遗址。^[58]该遗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179米，东西宽29米，四周有宽6米左右的夯土围墙，围墙内地面上分布着密集而整齐的柱础石。其建筑形制与汉长安城中的武库和渭河南岸的京师仓十分相近。遗址中出土了数十件模印“关”字的瓦当，可以确定它应是西汉函谷关的组成部分。这表明，汉代迁至新安县的函谷关决非仅限于县城附近的一处关口，而是一个横跨洛水，北至黄河，绵延数十公里，除关塞外，还包括城垣、仓库等设施在内的完备的军事防御体系。西汉仓库建筑遗址即是一处与函谷关防御体系一体的仓库建筑遗址。《水经注》称：“自南山横洛水，北属于河，皆关塞地，即杨樛家童所筑也。”也就是说，汉函谷关周围的广袤之地均属关塞地。它由关城、黄河、大山组成一体的防御体系。于此可见，函谷关的动迁绝非杨樛的个人行为，而存在着更重要的政治原因。汉函谷关为西汉东关，起着屏障关中的作用，东汉时期为西关，起着屏障京都洛阳的作用。关城位于崤函古道上，“本非铃束之要”^[59]，但它“带以河洛，重以崤阻，抚四夷而守境”^[60]。

杨樛所修的汉函谷关城仍在崤函古道上，关城南有青龙山（原龙头山），北有凤凰山，大道从两山之间穿谷而过。涧河由东南经关城前向东北流去。皂河西自而东在关城前与涧河汇流，形成三水环绕之势。关城南北两侧有高厚城墙延伸山间，形成屏障，唯有通过城门，才能出入关内。

汉函谷关城池已毁。存世的函谷关城实为汉函谷关城的东门，是1924年在明清关城的基础上维修保留至今，上下共三层，下一层为砖石结构的门洞，洞宽4.1米，长18米，高6.1米，是东西交通要道，可通行牛马车辆。门洞的东西两面各有一组石刻对联，东面门联为：“功始将梁今附骥”“我为尹喜谁骑牛”，门额为“汉函谷关”；西面为“胜迹漫询周柱史”“雄关重观汉楼船”，门额仍书“汉函谷关”，门额侧旁刻有：孔子二千四百七十四年癸亥秋南海康有为

书。第二层建筑亦为砖石结构，为边长各10米的正方体，整体高8米，四面门洞十字交叉，门两侧镶嵌石刻门联共4幅，西门联为：“夹其皂涧”“弘我汉京”，门额为“西望崤岭”；东门联为：“四面青山三面水”“一层紫气万层烟”，门额为“紫气东来”；南门联为：“紫气犹存贤令尹”“青牛重度古汉关”，门额为“中州屏障”；北门联为：“巍乎直同百二险”，“焕然重筑一丸泥”，门额为“晓月楼台”。第三层为砖木结构，结构建筑的四面楼阁，毁于1958年，只留下“关”字瓦当一块，现存关外张学智家。

新安是东行入洛阳的北道口，出新安，过汉函谷关，向东，顺谷水，经磁涧，便可抵达洛阳。

综上所述，崤函古道出陕州后，便进入了其东段——崤山道。崤山道因其主要线路穿行于崤山山脉之中而得名。崤山道起点在陕州城故址，虽然目的地是东向至洛阳（或可曰西向长安），但在进入交口后，在具体走向上变化较大，因其所经地点不同，故分为两道，即“崤山南路”或“南崤道”和“崤山北路”或“北崤道”。崤山南路是自陕州城故址沿青龙涧河东南行，经今交口、菜园、雁翎关、宫前、宜阳三乡、韩城，沿洛河东北抵洛阳。崤山北路则是由陕州城故址，沿涧河河谷东行，经今交口、张茅、硖石、石壕、澠池、义马、新安，至洛阳。崤山道的开通略晚于西段的函谷道。由于各个历史时期政治背景有所变异，南北两路的使用情况亦有所不同。然而，无论是南路还是北路，它们都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直到民国初期，陇海铁路和洛潼公路修通，该道不复存在。

（四）崤函古道上的隋唐行宫和古驿馆

行宫亦称离宫别馆，是古代帝王为了出外巡幸、游玩、避暑和处理政务而建造的。驿馆则是专供传递公文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歇宿或换马的地方。考察行宫及驿馆的分布情形及数量多少，可知帝王行幸及一般行旅，二者的设置皆与交通线路的走向及运营有密切的关系。

1. 隋唐行宫

崤函古道是隋唐时期连接长安、洛阳两大都城最重要的东西交通干道，隋唐两代诸帝特别是唐太宗、唐高宗、武后、唐玄宗经常通过崤函古道往返于长安和洛阳。洛阳与长安相距800里，帝王们往返长安和洛阳，一般要经历数旬的时间。为了沿途驻蹕的方便，隋炀帝时“自西京至东都，离宫别馆，相望道次”^[61]，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也曾为两京路行宫各造殿宇及屋千间。^[62]隋唐时期长安与洛阳两京道上行宫的数量、地点及置废情况，诸学者的研究多有差异。^[63]崤函古道上究竟有多少座行宫，考诸文献和实地调查，隋唐在该道沿线设置的行宫至少应在16所，由西向东为序，分别为函谷道上的轩游宫（别院宫）、上阳宫、桃源宫、弘农宫（陕城宫）、崤山南路上的绣岭宫、兰峰宫、莎册（柵）宫、崎岫宫，福昌宫、兰昌宫、连昌宫、兴泰宫、崤山北路上的紫桂宫（见表1）。

（1）轩游宫（别院宫）

《新唐书·地理志》中谓，虢州阌乡县（今灵宝市西豫灵镇一带）有轩游宫，本隋别院宫，唐咸亨五年（674）改名。《全唐诗·卷三》中有唐玄宗的《轩游宫十五夜》一诗。轩游宫具体地点及兴废情况待考。

（2）上阳宫

《新唐书·地理志》中谓，虢州湖城县（今灵宝市东北阳平镇一带）有隋故上阳宫，贞观初置，咸亨元年（670）废。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卷四十八》云：“上阳宫，隋初置于桃林县。唐贞观中，移置于湖城县。高宗又改置于东都禁苑。《一统志》云，上阳宫，在废湖城县西北一里。”其具体地点及兴废情况待考。

（3）桃源宫

《新唐书·地理志》中谓，陕州灵宝县有桃源宫，武德元年（618）置。《一统志》云：桃源宫在灵宝县城内。唐灵宝县旧址，即原桃林县旧址，地在今灵宝市大王镇老城村西北黄河南岸。桃源宫名可能与桃林县名有关。《灵宝县志》有云，在县北黄河南岸，唐则天后东幸驻蹕之所，今城址尚存，俗称沙城。经调查，在今灵宝大王镇后地村西南部，有一城址遗迹，现尚有南城墙，长约300米，中部已被居民建房破坏，西段保存基本完好，高1~3米，多为风沙掩埋。城墙墙基呈梯形，上宽7米，下宽10米，黄土夯筑，夯层6~8厘米，夯窝明显。当地群众将该城址称为武则天行宫，亦称翠微宫，言该宫仅修建了一半就中途而废。

（4）陕城宫（弘农宫）

《新唐书·地理志》中谓，陕州陕县有陕城宫。陕城宫本名弘农宫，隋大业初年置，唐初改名。文献记载，“隋末杨玄感围东都，不克，西去潼关，至陕县，欲围弘农宫”，可知弘农宫在陕县城内。

（5）绣岭宫

《新唐书·地理志》中谓，绣岭宫在陕州硤石县，显庆三年（658）置。另据《南部新书》卷庚，绣岭宫有御汤。民国《陕县志》云：“按绣岭宫在陕州城东南六十五里安阳东南之高阜上，为唐帝如洛道间之行宫。其地广平，旁无峰障，前临山涧，与莘原南北对峙。莘原之南半岭有广平处，冈陵环亘，与行宫正对，为唐大通寺。”据调查，绣岭宫遗址在今陕县菜园乡石门村南的绣岭坡上，面积5000平方米，出土有唐代布纹大瓦等遗物。唐人郑处海《明皇杂录·唐玄宗幸绣岭宫》云：“玄宗幸东都，至绣岭宫”，即指此。距绣岭宫遗址北约200米处，有一扁平圆丘状墓，俗称“公主坟”，面积约50平方米，冢高3米，当地群众指其为唐玄宗幼女。民国《陕县志》云：“唐大通寺内有三生公主祠，其阶下有金大定年间碑，且载公主为玄宗幼女，其生也口喑，左手拳而不能开，洎帝驻蹕绣岭宫，谒大通寺，公主遂能言，左手亦能开，内有三生字，旋即夭殁，遂葬东凡社宫地，今名绣岭坡。”

（6）兰峰宫

陕县宫前乡宫前村北的武则天行宫遗址，《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标记“武则天行宫”^[64]。2002年出版的《陕县宫前乡志》在亦记述为“武则天行宫”^[65]。“武则天行宫”不是该宫的名称，该宫到底是什么名字？宫前乡师振殿先生主编的《宫前神韵》一书中，据《唐书·地理志》认为是兰昌宫，后称崎岫宫。^[66]村内清乾隆年间残碑上称之为“紫薇宫”。但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兰昌宫在福昌县，即今宜阳县境，崎岫宫在永宁县西2.5公里，也在今洛宁县境。而所谓“紫薇宫”，史无记载，清乾隆年间的残碑不足为据。按史籍记载，从地理位置、地理环境与现场实地考察，宫前村北的“武则天行宫”是唐代的兰峰宫。

《新唐书·地理志》谓，永宁县西三十里有兰峰宫，显庆三年（658年）置。唐永宁县城即今洛宁县旧县村。旧县村西33里正是今宫前村所在地。从地理位置与地理环境观察，旧县村西或西北30余里为崤山山区，沟壑纵横，唯永昌河谷地形平坦、开阔，又系交通必经之孔道，因此兰峰宫非此地莫属。从兰峰宫一名含义有高耸林木茂密的山峰为特征。今宫前村永昌河谷南有座南唐山，山上有座菩萨庙，山顶海拔高948.9米，宫前村海拔高约360米，高差500余米。从宫前村抬头南望山巅如锥，直插云端，加以植被茂密，青翠如黛绿复兰，这一枝独秀的特有景色是沿路的绣岭宫景观、崎岫宫景观所不具备的。

兰峰宫遗址在宫前村北高岗上，面积约百余亩，今为耕地，宫室座北面南，北依万寿山（人工堆砌高数米），南对南唐山，东西两侧各为一条南北沟所限，地面地下曾出土圆形、方形石柱础，铺地素面方砖（边长50厘米，厚2厘米），这些柱础石及方砖分散存放在宫前村群众家里，是他们在遗址上耕作时采集的。至今遗址地面上残留的唐代筒瓦残片、长砖等在田间地头俯拾皆是。据当地群众反映，每年初夏小麦将要成熟时，站在万寿山上，俯瞰宫坪小麦长势

和颜色不一，长在宫殿室宇地基上的小麦因地下基础土质坚硬，水分少，小麦长势浅而瘦；宫殿屋室之外的地方，土层深厚，含水量充足，小麦长势好，颜色浓绿。由此大体能辨识出当年的宫室的建筑轮廓，宛如一副城市平面图，规模宏大，结构复杂，错落有致，让人能够遐想到兰峰宫巍峨壮观的形势。宫前村也因此而得名。

兰峰宫东去，33里，是永宁县城鹿桥驿，县城西5里有崎岫宫。兰峰宫西北穿过雁翎关是陕县的绣岭宫，相间约30里。这正符合《新唐书·地理志》所记载的唐代崤山南道上的每个行宫的布局。

（7）莎册（栅）宫

《全唐诗·卷三十五》中有许敬宗《侍宴莎册宫应制得情字》一诗。许敬宗是高宗、武后时人，莎册宫亦当兴于此际。但该宫在何处？有学者认为，唐河南府永宁县（今河南洛宁）境内洛水上游有“莎栅”一地，疑是莎册宫所在地。^[67]前已说明，莎栅道起自永宁县城西30里莎栅城，莎栅城在永宁县西30里，那么莎栅城应在兰峰宫东三里之地。据此，莎册宫当在莎栅城附近。但其具体地点待进一步考证。

（8）崎岫宫

《新唐书·地理志》中谓，崎岫宫位于河南府永宁县西5里，显庆三年（658）置。唐永宁县城治所鹿桥即今洛宁县北约50里的旧县村（南旧县、北旧县）。永宁县西五里之崎岫宫，按其地望应在今洛宁县旧县村西五里，其地有庙圪塔，经调查，其地有一处唐代建筑遗址，地面上至今还存留有大量的唐代板瓦、筒瓦、绳文砖、石块等遗物。其地望与文献记载的崎岫宫相同，应为崎岫宫遗址。

（9）福昌宫

《新唐书·地理志》中谓，河南府福昌县原名宜阳，武德二年（619）更名福昌，因隋宫为名。有故隋福昌宫，显庆三年（658）复置。《全唐文·卷三九二·李贺〈昌谷诗〉》本注中有：“福昌宫在谷之东”。李贺诗所载昌谷，是指昌水之谷，连昌河（唐称昌水）在今宜阳县三乡乡北由河谷流出，是谓昌谷。昌谷水即今连昌河，三乡镇在河之西，福昌宫在河之东。昌谷亦是唐代诗人李贺的故里。

（10）兰昌宫

《新唐书·地理志》中谓，河南府福昌县西17里有兰昌宫。《古今图书集成·卷四三六·河南府古迹》云：“兰昌宫，在宜阳县西上庄保。”兰昌宫又名玉阳宫^[68]。今宜阳县三乡乡南寨村，在连昌河的西岸，村内曾发现《玉阳宫铭并序碑》。南寨与唐福昌县治今韩城乡福昌村的直线距离15里，与唐17里相符，唐兰昌宫当在此地。但因该村距离洛河较近，河水淤积严重，遗址在地面上已无迹可寻，据说玉阳宫碑座也埋在地面以下近1米。

（11）连昌宫

《新唐书·地理志》中谓，河南府寿安县西29里有连昌宫，显庆三年（658）置。《肇域志·三十八册·河南府宜阳县》云：“连昌宫在三乡”。乾隆时期的《宜阳县志·卷四·艺文》中引元稹《连昌宫》文后云：“考昌水在三乡镇东、柏坡村西，其宫在三乡之滨，故曰连昌。邵雍《连昌故宫》诗曰：‘昌水来西北’，又曰‘正对三乡驿’，则三乡寺为连昌宫无疑也。”此三乡寺当指五花寺。光绪《宜阳县志·卷五·建制》曰：“五花寺，三乡镇北，后有塔，相传为唐连昌宫故址。”按《新唐书·地理志》所云，连昌宫在寿安西29里，当为19里之误。五花寺在今三乡村的北部，连昌河西岸，现存宋代九层密檐式砖塔一座。遗址内发现有唐代板瓦、筒瓦、条形砖、砖雕等遗物，存在着大量的砖瓦堆积，于此可知，五花寺很有可能就是唐连昌宫遗址。

（12）兴泰宫

《新唐书·地理志》中谓，河南府寿安县西南40里万安山有兴泰宫，长安四年（704）置。《旧唐书·卷一八三·武三思传》载，武三思以武则天厌居深宫，乃请营造兴泰宫于万安山，请则天每岁临幸，“前后工役甚众，百姓怨之”。《资治通鉴·卷二〇七》载，长安四年“春，正月，毁三阳宫，以其材作兴泰宫于万安山”，胡注：“万安山在洛州寿安县西南四十里。”光绪《宜阳县志·卷三·舆地》载：“万安山，在赵保南，山下有唐武后兴泰宫故址。”兴泰宫遗址多年前已被考古发现，地址就在今宜阳赵保乡西赵保村的上沟村与下沟村之间的山凹里。坐北面南，平面方形。南门夯土门阙残高2米，南垣西段、东垣地面上可见遗迹。行宫正中为一处水池，南北两侧有两处大殿基址，夯上筑成，断崖处可见夯层。在行宫内近年内不断发现唐代的遗物，有板瓦、筒瓦、陶水管、莲花纹方砖等。

（13）显仁宫

《资治通鉴·卷一八〇》载，大业元年（605），隋炀帝“敕宇文恺等营显仁宫，南接阜涧，北跨洛滨”。据《隋书·地理志中》载，隋显仁宫位于河南寿安县（今河南宜阳县西）。隋显仁宫，唐因袭未改。贞观年间，唐太宗两次至显仁宫。

（14）甘泉宫

《通鉴·卷一八八》中谓，武德三年九月，“‘史万宝进军甘泉宫’胡注云：‘史万宝自新安进军逼洛阳，不应至汉之甘泉宫’。《隋志》中载：‘河南寿安县，后魏之甘棠县，有显仁宫。或者以显仁宫为甘棠宫也。泉恐当作棠也’”。笔者认为，“泉”字未必误，盖此地有甘泉，甘泉宫非甘宫，亦非显仁宫，更非汉之甘泉宫。唐甘泉宫当在河南寿安县东（今河南宜阳）。

（15）连曜宫

据《南部新书·卷戊》载，“开元二十五年西幸，驻蹕寿安连曜宫”可知，玄宗时有连曜宫，在河南府寿安县（今河南宜阳）。

（16）紫桂宫

《新唐书·地理志》中谓，河南府浉池县西5里有紫桂宫，仪凤二年（677）置。调露二年（680）曰避暑宫，永淳元年（682）曰芳桂宫，弘道元年（683）废。《唐会要》卷三〇《诸宫》则云，仪凤四年（679）五月，唐高宗令营紫桂宫于浉池县。《资治通鉴》记载，调露元年（679）五月置，弘道元年（683）十二月诏废。后两书所记与《新唐书》略有不同。紫桂宫旧址在今浉池县西1公里的黄花村（原名紫桂村），现遗迹无存。紫桂宫或芳桂宫宫名，是因当时这里桂树较多，缘“桂花味芳香”和“桂花色紫墨”而得名。

综上所述，史籍可考的崤函古道上的隋唐时期行宫约有16座，其中轩游宫、上阳宫、陕城宫、福昌宫、显仁宫5座绍继隋代，唐代另创新建了11座。16座行宫中，兴泰宫、紫桂宫是避暑宫，其他14座属于两京道行宫。正如诸学者所指出，在16座行宫中，崤山北路有一个浉池的紫桂宫，而南道则有绣岭宫、兰峰宫、莎册（栅）宫、崎岫宫、福昌宫、兰昌宫、连昌宫、兴泰宫、显仁宫、甘泉宫、连曜宫等11宫。^[69]可见当时道路之主次。在这16座行宫中，主要集中在阌乡、湖城、灵宝（此三座行宫亦可视为在今灵宝一地）、永宁、福昌和寿安等地。其建造年代以唐高宗时期最多，其中又以显庆年间为最，玄宗时期主要是增建。这一时期也正是唐皇往来于长安、洛阳之间最频繁的时期。唐代行宫在安史之乱中，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唐代以后鲜见于文献记载。这种现象，显然与崤函古道交通发展及功能演变存在耦合关系。

表1 隋唐崤函古道行宫（16所）

名称（别称）	地点	置废年代	资料来源
轩游宫 （别院宫）	虢州阌乡县 （今灵宝西豫灵镇一带）	隋—唐末	《新唐书·卷三七》 《地理志》
上阳宫	虢州湖城县（今灵宝东北 阳平镇一带）	隋—唐末	《新唐书·卷三七》 《地理志》
桃源宫	陕州灵宝县（今灵宝大王 镇后地村西南）	唐高祖武德元 —唐末	《新唐书·卷三七》 《地理志》
陕城宫 （弘农宫）	陕州陕县 （今陕县故城内）	隋—唐末	《新唐书·卷三八》 《地理志》 《大清一统志·卷二二〇》 《陕州》
绣岭宫	陕州硤石县（今陕县菜园 乡绣岭村）	唐高宗显庆三年 —唐末	《新唐书·卷三八》 《地理志》
兰峰宫	河南府永宁县西30里（今 陕县宫前乡宫前村北）	唐高宗显庆三年 —唐末	《新唐书·卷三八》 《地理志》
莎册（柵）宫	河南府永宁县 （当在莎柵城）	唐初	《全唐诗·卷三五》许敬 宗《侍宴莎册宫应制得 情字》诗 《寰宇记补阙》 卷四《河南道》
崎岫宫	河南府永宁县西5里（今洛 宁县旧县村西五里庙圪塔）	唐高宗显庆三年 —唐末	《新唐书·卷三八》 《地理志》
福昌宫	河南府福昌县（今宜阳三乡 东连昌河入洛河附近）	隋—唐末	《新唐书·卷三八》 《地理志》
兰昌宫	河南府福昌县西17里（今 宜阳县三乡乡南寨村）	唐	《新唐书·卷三八》 《地理志》
连昌宫	河南府寿安县西29里 （今宜阳县三乡村北五 花寺）	唐高宗显庆三年 —唐末	《新唐书·卷三八》 《地理志》

兴泰宫	河南府寿安县西南40里万安山（今宜阳赵保乡西赵保村上沟村与下沟村间）	武周长安四年 一唐中宗神龙元年	《旧唐书·卷六》 《则天本纪》 《新唐书·卷三八》 《地理志》
显仁宫	河南府寿安县 （今宜阳县西）	隋大业元年—唐初	《隋书·卷三〇》 《地理志》 《通鉴·卷一八〇》
甘泉宫	河南寿安县东 （今河南宜阳东）	唐初	《通鉴·卷一八八》
连曜宫	河南寿安县 （今河南宜阳）	唐初	《南部新书·戊》
紫桂宫 （避暑宫、芳桂宫）	河南府浥池县 （今浥池县黄花村）	唐高宗仪凤二年 —弘道元年	《新唐书》卷三八 《地理志》

注：行宫仅置于隋代者，用隋代政区，余依唐代政区；置废时间无确切记载者，书大致年代。

2. 古驿馆

驿馆，又称驿站，始于周，秦时置驿舍，汉代改驿舍为站。大道“三十里一驿”，一般道路“十里一亭”，专供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歇宿或换马。在古代交通和通讯条件下，驿馆担负着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信息传递任务，是一种特定的网络传递与网络运输。崤函古道是古代连接长安、洛阳的最重要的东西交通孔道，历代王朝都十分注重其驿馆建设。汉代在崤函古道西段今灵宝境内设置的“亭”，可考者即有柏谷亭^[70]和曹阳亭^[71]。在经历了先秦驿馆制度的萌芽和制度化时期、魏晋南北朝的发展与完备化时期后，到隋唐时代，崤函古道的驿馆设置呈现鼎盛的局面，成为一条交通设施完备信息传递通畅的驿道。《新唐书·卷三零》《新唐书·卷三八》记载长安至陕州（今三门峡市、陕县）东之崤阪置驿二十有三，崤阪东行至浥池、新安到洛阳的驿路，由于东都建有东都苑（隋会通苑，武则天时名神都苑）周一百二十六里，西至孝水，东抵宫城，谷洛二水会于苑内，除行军外不得通行。从陕州、硤石县（今陕县菜园子）东南沿着青龙涧翻越雁翎关，经永宁（今河南省洛宁县）沿洛河至洛阳的崤山南道交通繁盛。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置驿十所。根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已知中唐时期崤函古道沿线驿馆22个（见表2）。当年白居易有《从陕至东京》一诗云：“从陕至东京，山低路渐平，风光四百里，车马十三程。”这些驿馆自西向东依次为：潼关驿（一名关西驿，今潼关旧城）^[72]、阆乡驿（一名阆乡逆旅，今灵宝豫灵镇南源村）、盘豆驿（一名盘豆馆，今灵宝市故县镇盘东、盘西二村所处原下，已为黄河淹没）、湖城驿（一名湖城逆旅，今灵宝市阳平镇阆西村东北约1.5公里黄河南岸，阳平河西岸王家岭北南寨子村），湖城驿以东分南北两条驿路，北路仍沿黄河南岸行，依次为稠桑驿（今灵宝市函谷关镇稠桑村）、桃林驿（今灵宝老城，大王镇老城村西北黄河南岸），南路自湖城线县向南，复沿华山山脉北麓东至弘农（虢州），驿馆依次为荆山馆（湖城、弘农之间，一说在阳平镇张村）、柏仁驿（一名虢州公馆，今灵宝市）、红亭

(今灵宝市西1公里西华村塬上)。从弘农(虢州)东北行,沿弘农涧河河岸至灵宝老城,与北驿路汇合,复沿黄河南侧东行,至陕州,驿馆为甘棠驿(今陕州故城内)。出陕州,路自交口分南北两路,崤山南路沿青龙涧河、永昌河、连昌河东南行折而北上至洛阳,沿途所设驿馆有碛石驿(今陕县菜园乡石门)、嘉祥驿(陕州以南、三乡以北)^[73]、鹿桥驿(今洛宁县旧县村)、三乡驿(今宜阳县西三乡)、福昌馆(今宜阳县西福昌村)、柳泉驿(今宜阳县西北柳泉)、甘棠馆(又名寿安南馆、寿安水馆、寿安山馆,今宜阳县城内)、三泉驿(今宜阳县城东12.5公里苗马村),过三泉驿,便进入了洛阳城郊。崤山北路沿涧河河谷东至洛阳,沿途所设驿馆有芳桂馆驿(今澠池西2.5公里黄花村)、澠池南馆(今澠池县城)、新安驿(今澠池县搭泥街,一说今新安县)。

表2 崤函古道古驿馆(22所)

名称(别称)	地点	资料来源
潼关驿 (关西驿) ^[74]	在今潼关旧城	《旧唐书·卷一〇四·封常青传》《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全唐诗·许浑〈行次潼关题驿后轩〉》(卷五二八)、《秋日赴阙题潼关驿楼》(卷五二九)、《秋霁潼关驿亭》(卷五三一)、薛逢《潼关驿亭》(卷五四八)、《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全唐诗·吴融〈关西驿亭即事〉》(卷六八七)
阌乡驿 (阌乡逆旅)	县设驿,在今灵宝豫灵镇南源村一带	《因话录·卷三》 《太平广记·卷三四一》引《河东记》
盘豆驿 (盘豆馆)	阌乡县盘豆,在今灵宝市故县镇盘东、盘西二村所处原下,已为黄河淹没	《全唐诗》武元衡《使次盘豆驿望永乐县》(卷三一七)、权德舆《盘豆驿》(卷三二五)、李商隐《出关宿盘豆驿对丛芦有感》(卷五四〇)
湖城驿 (湖城逆旅)	县设驿,在今灵宝市阳平镇阌西村东北约3里黄河南岸,阳平河西岸王家岭北南寨子村	《全唐诗》刘禹锡《秋晚题湖城驿上池亭》(卷三五四)、《西阳杂俎前集·卷一五·诺皋记》下、《太平广记·卷三十八》
稠桑驿	在今灵宝市函谷关镇稠桑村	《新唐书·卷八四〈李密传〉》《全唐诗》岑参《稠桑驿喜逢严河南中丞便别》(卷二〇〇)、白居易《小白马乘馭多时奉使东行至稠桑驿溘然而毙》(卷四四八)、《往年稠桑驿曾丧白马题诗亭壁今来尚存又复感怀更题绝句》(卷四五五)、《太平广记·卷一六〇》

桃林驿	县设驿，在今灵宝老城，大王镇老城村西北黄河南岸	《新唐书·卷八四〈李密传〉》《全唐诗》韩愈《桃林夜贺晋公》（卷三四四）
荆山馆	湖城、弘农间（一说在阳平镇张村）	《太平广记·卷四一六》
柏仁驿 （虢州公馆）	虢州弘农县驿，今灵宝市	《全唐诗》岑参《虢州郡斋南池幽兴因与阎二侍御道别》（卷一九八）、《北梦琐言·卷九》
红亭	今灵宝市西1公里西华村塬上	《全唐诗》岑参《虢州西亭陪端公宴集》（卷二〇〇）、《暮春虢州东亭送李司马归扶风别庐》（卷二〇一）、《虢州后亭送李判官使赴晋绛》（卷二〇一）
甘棠驿	县设驿，治所之南，今陕州故城内	《全唐诗》刘禹锡《送王司马之陕州》（卷三五九）、《北梦琐言·卷九》《旧五代史》卷八二《晋少帝纪》
硤石驿	今陕县菜园乡石门	《李文公集》卷一三《傅辆弼神道碑》《资治通鉴·卷二四九》
嘉祥驿	陕州以南、三乡以北	《全唐诗》孟迟《题嘉祥驿》（卷五五七）、卢渥《题嘉祥驿》（卷五六六）、《太平广记·卷一六八》引《卢氏杂说》
鹿桥驿	今洛宁县旧县村	《资治通鉴·卷二二二》
三乡驿	今宜阳县西三乡	《全唐诗》刘禹锡《三乡驿楼伏睹玄宗望女几山诗小臣斐然有感》（卷三五六）、陆贞洞《和三乡诗》（卷七二六）、《全唐文》（卷九二三）王太瀚《元珠录》
福昌馆	今宜阳县西福昌	《全唐诗逸》绍伯《题福昌馆》
柳泉驿	今宜阳县西北柳泉	《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南部新书·乙》
甘棠馆 （寿安南馆、寿安水馆、寿安山馆）	县设驿，今宜阳县城内	《全唐诗》刘禹锡《题寿安甘棠馆二首》（卷三六四）、杜牧《题寿安县甘棠馆御沟》（卷五二三）、司马扎《宿寿安甘棠

		馆》（卷五九六）、王建《题寿安南馆》（卷二九七）、薛能《寿安水馆》（卷五六一）、罗邕《春日过寿安山馆》（卷六五四）
三泉驿	今宜阳县城东12.5公里 苗马村	《全唐诗》元稹《三泉驿》（卷四二一）、 《太平广记》卷三四八引《传异记》
芳桂宫驿	今澠池西五里黄花村	《旧唐书·卷一八五·韦机传》
澠池南馆	今澠池县城内	《河朔访古记·卷下·唐卢元卿澠池县南馆 记碑》
新安驿	今澠池县搭泥街，一说 在今新安县	《太平寰宇记·卷五》

唐代对两京间的驿馆极为重视。开元二十五年（737）五月，“监察御史郑审检校两京馆驿”。大历十四年（779）“两京驿御史一人知馆驿，号馆驿使”。上述21所驿馆，当然不是中唐时期崤函古道上驿馆的全部，如灵宝、陕县间，文献记载中无有驿馆，据《括地志》载：“曲沃古城，在陕县西南三十二里。”而新店更稍西些，就地望而言，曲沃、新店必有置驿者，^[75]惜因缺载，不得而知了。在这21所驿馆中，崤山南路共设置驿馆18个，而北路所设驿馆仅3个，这三个驿亦非常设。

北宋时称驿馆为铺。北宋对黄河南岸道进行整治，崤山道以北路为主，因此，唐在北路所设驿馆大致被宋沿用，而南路则至宋并废。到了元朝，由于疆域辽阔，发展交通，强化了驿馆制度，这也成为它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这时驿馆也叫“站赤”，实际“站赤”是蒙古语驿馆的译音。元代在崤函古道设置的站赤依次为：阌乡站、湖城站、灵宝站、陕州站、硖石站、沔池（即澠池）站、新安站。崤山南路没有设站。

明代沿袭了元代驿馆，并在新安与澠池之间添设了义昌驿。其主要驿馆有：函城马驿，又名函关驿，属河南府新安县，在今新安县城内；蠡城马驿，属河南府澠池县，在今澠池县城内；义昌马驿，属河南府澠池县，在今义马市；硖石马驿，属河南府陕州，在今陕县硖石；甘棠马驿，属河南府陕州，在今三门峡市；桃林马驿，属河南府灵宝县，在今灵宝市虢略镇，一说在今灵宝市东北枣灵镇；鼎湖马驿，属河南府阌乡县，在今灵宝市西故县，一说在灵宝市内。^[76]

清代所设驿馆是：函关驿，即新安县驿；义昌驿，在今澠池县东洪阳乡义昌村；蠡城驿，即澠池县驿，在今县武装部后灯光球场；硖石驿；甘棠驿，即陕州驿；桃林驿，即灵宝县驿；鼎湖驿，即阌乡县驿；潼关驿，即潼关厅驿等。这条线路基本上就是今310国道干线，与春秋战国以来的崤山北路相仿。

元明清的驿站事业是发达的，但从崤函古道的情形看，它与唐宋并非没有因袭关系。以往的站道多数被利用了。

四、三门峡黄河漕运——崤函古道特殊的道路系统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沟通长安和洛阳的陆上交通要道，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崤函古道的一种约定俗成的认识和理解。事实上，除了以上陆路交通道路外，崤函古道还应包括三门峡黄河漕运。

自先秦至隋唐，全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国都大多建于长安或洛阳，中原与关中的经济联系十分重要。因为朝廷有大批官员和庞大的军队，若京师在关中，需要把中原的物资特别是粮食运输到关中；都城在中原，则要把关中的赋税输送到中原。所以运输的通道是朝廷的经济命脉。由中原到关中，水陆两路都可以运输，也都很困难，“水运有三门之险，陆运有崤陵之艰”。在古代，驴驮马载、双辕木轮畜力车辆的陆路运输，比水运的费用更高昂，运输量也颇受限制。在唐代曾有“一斗钱，运一斗米”之说。显然这一境况是不能满足统治者需求的。于是人们便把目光投向了黄河水运，动用国家的力量大搞漕运。漕运有比陆运运输量大、时间短、耗费少等优点。所谓漕运，主要是指由关东各地转输粟米等物质接济关中的需要。当然，也有一些时期关中的粮食曾沿河而下，运到中原，不过不居重要的地位。漕运本意是指水路运输，但对以水运为主，间有陆运的运输亦统称为漕运。

开启黄河漕运，险阻重重。这险阻便是三门峡天险及其以下“百二十里”的峡谷险滩“阙流”。黄河出潼关，东流113公里，至“三门峡”，入豫西峡谷。豫西峡谷，两岸夹水，壁立千仞，怪石嶙峋，湍流险急。《水经注·河水四》中云：“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当水者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既决，水流疏分，指状表目，亦谓之三门矣。”而在三门峡以东，尚有百余里峡谷险滩。“自砥柱以下，五户已上，其间百二十里，河中竦石架出，势连襄陆，盖亦禹凿以通河，疑此阙流也。其山虽辟，尚梗湍流，激石云洄，滢波怒溢，合有十九滩，水流迅急，势同三峡，破害舟船，自古所患”。三门峡是人所共知的天险，其下又有如此长的“阙流”险峻河道，就给古代人们利用黄河实施漕运，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恰恰是这一段河道，能够很好地连接古代中原与关中这两大基本经济区域，是古代漕粮经由黄河水运的必经要道。

为保证漕运正常运行，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对黄河三门峡河道的疏治。综观各个历史时期的三门峡黄河漕运史，可以浓缩为古代人们对黄河三门峡峡谷百二里间十九滩的征服过程，其主要措施便是凿修栈道和漕运转运，二者相辅相成，在维护和发展黄河漕运、保证古代国家总体运营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门峡黄河漕运栈道西起三门峡的人门栈道，东至澠池县与新安县交界处的“八里胡同”，包括山西平陆、夏县、垣曲黄河北岸。1955—1957年，考古学者对三门峡长达625米的人门栈道和散落在大坝下游的7段栈道遗迹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发现了开元新河、汉代至清代的题壁刻石及唐代仓址等漕运遗迹^[77]。近年来，河南考古学者又在河南新安县西沃村西北的黄河“八里胡同”峡发现了大量栈道工程遗迹以及与漕运有关的盐仓遗址、故城、渔淋城（运粮城）、古渡口等遗迹。^[78]山西考古学者则对三门峡以东的黄河北岸进行了考古勘察，在山西平陆、夏县、垣曲沿河98公里区段内，发现古代黄河栈道遗迹45处，累计长4517米。^[79]这些发现说明三门峡黄河漕运栈道是一个包括三门峡及其以下“百二十里”河道，工程规模巨大、时间跨度长、影响深远的系统工程。

三门峡黄河漕运栈道的具体开凿时间现已很难考证，目前发现最早的记录是新近在山西垣曲县五福涧栈道岩壁上的东汉建武十一年（35）的题记，其中有“建武十一年，……时遣石匠□□石师千人”的记载^[80]。其次是20世纪50年代在三门峡栈道岩壁上发现的东汉“和平元年”

题记。两地相距约50公里，表明东汉在三门峡以东的黄河两岸已大规模修建栈道。显然这并不是黄河漕运栈道最早的开凿时间。根据文献记载，从秦始皇开始，由关东转输粮食，溯黄河西上，运往关中和邻近地区时，运粮的船只就已经通过三门峡了。楚汉战争之时，张良劝刘邦建都关中时，亦曾经说过，“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作为一种交通道路设施，栈道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如《战国策·秦策》载：“栈道千里，通于蜀汉。”又如《汉书·高祖纪》云：“张良辞归韩，汉主送至褒中，因说汉王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亦视项羽无东意。”说明修筑栈道的凿穴植梁技术，早在汉初，甚而在战国时期已经掌握。既然黄河漕运开始于秦汉时期，沿河而上又是逆流重载，古代栈道的利用时间又在此之前，有理由推测，黄河漕运栈道的修建和使用应与漕运开始的时间大致同步。再参证张良建议刘邦建都长安时说“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表明在秦汉之际溯河西上，纤引漕船通过三门峡航道，必有便于拉纤的简陋栈道可行。

自此之后，黄河栈道的修治工程似乎一直未停止过。根据文献的记载和考古调查的发现，汉、魏、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都有所为。从东汉建武十一年到唐开元十八年前，仅对三门峡以下有资料可查的栈道修治工程就有7次：东汉建武十一年，曹魏明帝景初二年（228）；西晋武帝泰始三年（267）；唐太宗贞观十六年（642）；唐高宗显庆六年（661）；唐高宗总章三年（670）；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前。^[81]除东汉建武年间修治人数千余人外，一般都是五六千人，投入人数规模在当时都是很大的。

与其他地方的古代栈道遗存不同，黄河古栈道大多数地段采用先在岩壁上向内开凿出通道，然后再凿壁孔、插木梁、铺木板的开通方式。牛鼻形壁孔以及栈道转弯处均有发现的立式转筒遗迹，也是这里独有的。据考察者分析，立式转筒的发明、推广时间当在唐代漕运兴盛时期。它的发明推广对漕运有如下积极作用：一是使纤绳避免与岩壁摩擦，降低了纤绳的磨损程度；二是减轻了纤夫挽船的劳动强度，提高了挽船和潜运效率；三是减少了纤夫因“绳多绝、挽夫辄坠死”^[82]的危险，增大了纤夫挽船的安全系数。^[83]架设好栈道，则三门峡以下的航运基本上就可以维持，漕船就能通过三门峡一带。栈道的第一个用处是逆水行船时，挽船的纤夫在上面行走。峡谷地段，水深流急，在古代用人力牵挽是必须的。但纤夫一定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峭壁上开出来的栈道主要的用途就是这个。中原向关运输，走黄河水运就是逆水行舟，而汉唐的都城在长安，修栈道最是急切。史书和栈道上的石刻题记都证明是这样。然而在黄河的这一段，顺水行船也须要牵挽，水势特急，又有礁石险滩，顺流而下时牵挽的作用是控制船速，帮助调整航向，避免触礁撞滩等事故。这是栈道的另一个用途。^[84]

因有黄河漕运，西汉定都长安，漕运规模日益扩大。据《汉书·食货志》载：“岁给关东粟四百万斛以给京师。”后又“益岁六百万石。”三门峡漕运栈道的不断修凿，对通航条件大有改善，但因漕船上溯三门峡谷，航行极其艰险，而且损失也很大。汉武帝时，由于“漕从山东西来，岁百余万石，更砥柱之艰，败亡甚多，而亦烦费。”^[85]因此，汉武帝时，河东太守番系曾经提出开发渠田，以减少“砥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的弊病，但是没有结果。后来张卯亦提出开凿褒斜道以避开关东粮食西运途中经砥柱所造成的浪费，也没有成功。从西成帝鸿嘉年间开始，兴创了疏凿三门峡航道的工程。在《汉书·沟洫志》云：“鸿嘉四年，杨焉言，‘从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镌广之。’上从其言，使焉镌之。镌之裁没水中，为害甚于故。”这是西汉时惟一一次对黄河砥柱的治理，但因技术水平的限制最终失败了，河道状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为害甚于故”。

魏晋时期，人们对三门峡河道进行了持续的修治。据史书和栈道上的石刻题记，从魏明帝景初二年至西晋泰始三年的29年间，长期以5000多人的力量坚持“岁常修治”。^[86]但直到郾道

元著《水经注》时，三门峡河道通航仍很艰难。他说，“虽世代加功，水流崩奔，涛波尚屯，及其商舟是次，鲜不踟蹰难济。”为了避开三门峡水道的艰险，在晋武帝时甚至出现了开辟新航道的想法。《晋书·武帝纪》载，泰始十年（274）“是岁，凿陕南山，决河，东注洛，以通运漕”。学术界有多种著述认为晋武帝时有引河注洛的举动，然而，根据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该地区复杂的地形来分析，这实际上可能只是一种设想。《通典·卷十·食货·漕运》中认为“虽有此议，竟无成功”，杜佑的分析是颇有见地的。

始于秦汉时期的三门峡漕运，在隋唐时期臻于高峰。唐代建都长安后，机构日渐庞大，人员增多，京师所需也日益增多，但西运关中的漕粮和物资，全靠从洛阳陆运至陕再转水运，则“无由广致”，而且“陆运至陕，才三百里，率两斛计佣钱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陆之直，而河有三门砥柱之险”，若能广开漕运，变陆为水，则所支有余，动盈万计。于是，从显庆元年（656）开始，大力疏浚三门峡河道。先是在显庆元年，“苑西监褚朗议凿三门山为梁，可通陆运。乃发卒六千凿之，功不成”。^[87]总章三年和垂拱四年几次开三门河道，修凿栈道，企图走三门水路，但结果都未成功。^[88]其后，中宗神龙元年（705）以后，又有“将作大匠杨务廉又凿为栈，以挽漕舟，……人以为苦”。^[89]至唐贞元时期，舟船漕运经砥柱，仍然多覆。《新唐书》上说：“岁漕砥柱，覆者几半，河中有山号‘米堆’。运舟入三门，雇平陆人为门匠，执标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谚曰：‘古无门匠墓’，谓皆溺死。”所以，唐代初期漕运仍沿袭隋代旧制，在洛阳至陕州一段，仍以崤函陆运为主，即“江淮漕米至东都含嘉仓，以车或驮陆运至陕而水行”，^[90]但陆运费用浩大，如开元初河南尹李操为陆运使，从含嘉仓至太原仓置八递场，每场间隔40里，每递用车800乘，80万~100万石的租米，需时二个月方能运毕。

疏浚三门峡河道的努力大都效果不佳，反映了三门峡区域风险最大，航运价值也最小，而三门峡以下“百二十里”“阙流”段虽然亦险，但仍有航运价值，“阙流”以下河道平缓，航运价值更高。于是，隋唐两代在秦汉时期形成的河渭转运线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漕运转运仓系统，根据需要中途进行水陆交替联运或水路分段转运。崤函古道陆路和黄河水上漕运更加密切起来，组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水陆联合的有机运输网络。

隋开国不久，于开皇三年（583）在黄河沿岸设置了六大官仓，其中，常平仓建在陕州西南4里，其地临焦水，西俯大河，地势高平，故又名太原仓，是当时漕运中河、渭转运线上的重要转运仓。当时，从关东经陕州常平仓转运长安的漕粮，一路是溯黄河西上通过三门峡水运至陕，一路是从洛阳经由崤函古道东段，“以车或驮陆运至陕”^[91]。当时朝廷规定，如有人能自洛阳运米40石，经砥柱之险而至京师者，免其征戍，^[92]以示奖励。开皇四年（584）又采取水陆接转运输的办法，在黄河南岸从洛阳陆运陕州再转黄河西溯渭水至关中。^[93]开皇十五年诏凿砥，想通过三门直接通漕西运。所以位居洛阳与长安之间的陕州常平仓，自隋初成为河渭转运线上的主要转运仓以后，对古代漕运起过重要的作用。

唐前期转运仓的布局是以东都为中心的时期，以洛阳含嘉仓和陕州太原仓两大仓为主体，构成了关东与关中之间的水陆转运线，其中，含嘉仓是由水运转陆运的中转仓，太原仓则是由陆运（或部分水运）转水运的中转仓。中宗即位以后，朝廷自洛阳返回民安，政治中心复归关中。这时，高宗初年一度尖锐的漕粮不足供长安的矛盾便又尖锐起来。玄宗四次被迫再赴洛阳就食。到开元后期，漕粮短缺愈甚。于是，开元二十二年（734）朝廷根据裴耀卿的建议对转运仓布局进行了调整。《新唐书·食货志》云：“二十一年，耀卿为京兆尹，京师雨水，谷踊贵。玄宗将幸东都，复问耀卿漕事，耀卿因请罢陕陆运，而置仓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输粟于仓而去，县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仓三门东西，漕舟输其东仓，而陆运以输西仓，复以舟漕，以避三门之水险。玄宗以为然。乃于河阴置

河阴仓，河清置柏崖仓；三门东置集津仓，西置盐仓；凿山十八里以陆运。自江、淮漕者，皆输河阴仓，自河阴西至太原仓，谓之北运，自太原仓浮渭以实关中。……凡三岁，漕七百万石，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裴耀卿建议以分段转运，改善三门峡的通漕情况。在河汴之间新置河阴仓，在河阴、太原两大转运仓之间，又在三门峡河道北岸“置仓三门东西”，作为舟、车换装转运的中转仓。这是一条新的转运线，“江淮舟运悉输河阴仓，更用河舟运至含嘉仓及太原仓，自太原仓入渭输关中”。^[94]从河阴仓运至陕州太原仓的一路，当时“谓之北运”，并与三门峡东西，分别置集津仓和盐仓（三门仓），两仓之间凿山18里用于陆运，以避开三门峡天险。从河阴仓运至洛阳含嘉仓的一路，仍沿用唐前期“以车或驮陆运至陕”，输入太原仓，再转水运西输长安，即当时称为“南路陆运”。这种转运新布局的特点，就是以河阴仓和太原仓为主要枢纽的南北两路水陆并举，有时主要依靠南路陆运，有时主要依靠三门水运或北运，以提高向关中的漕运能力。

在裴耀卿的改革中，除了河口置仓外，有两点特别引人注目。一是把“置仓三门东西”作为加速漕船周转的重要措施，用开辟三门峡陆路相辅、缩短车运距离的办法，以取代南路陆运。三门峡东面的集津仓遗址，据考古调查约在今三门峡东5余公里黄河北岸的平陆龙岩村（又名鳌盖）附近；三门峡西的三门仓，又名盐仓，遗址在今三门峡西约2.5公里黄河北岸的平陆县三门乡下仓村附近。当时修凿山路9公里陆道，在三门峡水库修筑之前，尚有一小段遗迹可寻。唐代三门东西两仓的设置，不但有利于漕粮西运，还有利于河东池盐顺河而东，供应河南、河北等地，不仅对三门峡上下之间的物资转输作用显著，而且也进一步沟通和加强了山西与崤函古道的连接。在《大唐河东盐池灵庆公神祠颂并序》碑中就有河东盐“其漕砥柱”的记载。唐德宗以后，河东盐固定地向洛阳、开封等地运销的路线，主要是通过三门转漕而到达的。^[96]

另一点是太原仓地位的提高，成为仅次于河阴的第二大仓。由于在关东向关中转输租粮的航线上，太原仓地处河阴仓和永丰仓之间，是从河阴到长安的中继站，所以，对于“停米易舟”或从陆路转水运的转运作用日益重大。一般情况下，每年由河阴仓转输到太原仓的70万石中，有30万石留贮于此，累年积成了很大的粮仓。《旧唐书·玄宗纪》载，天宝十年（751）正月，陕郡运船失火，一次就烧毁了停泊在太原仓码头的米船215艘，商船100艘，死者600人。可见，每年来陕州太原仓的租米船是相当多的。太原仓仓城6里，“地控两京水陆二运”，乃“蓄巨万之仓”。^[97]当时漕运全线以三门峡一段最为艰险，如果漕米通过三门峡到达了陕州太原仓，就等于到达了关中。所以，贞元二年（786）四月，关中因运河长久阻塞不通，长安城中仓康枯竭。时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州，唐德宗闻知后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98]话中充分表现出唐王朝对关东租米的依赖程度，以及陕州太原仓在漕运全线上的重要地位。所以先天、开元以后陕州刺史多兼水陆运使，以便管理这一带的漕运。

后来水陆联运罢废，开元二十九年（741），“陕郡太守李齐物凿砥柱为门以通漕，开其山颠为挽路，烧石沃醯而凿之。然弃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门，候其水涨，以人挽舟而上”。^[98]李齐物在三门峡左岸人门半岛上开凿的这条长300多米，深、宽各6米多的人工运河，即“开元新河”。天宝年间的漕船可以全由水运。这一次三门峡河道的通畅，主要便是因为进行了疏凿河道的大工程。安史之乱后，刘晏“上门填阙船”，专门在河阴至三门峡之间航行通漕。陕虢观察使李泌恢复水陆联运的方式，在贞元二年（786）再次在黄河北岸，自集津（仓）至三门（仓）之间，凿山开车道9公里，以避砥柱之险，致使“漕米无砥柱之患，大济京师”。^[99]

据《通典》记载，唐天宝年间，京师粮仓的年入总数为700万石，而通过黄河漕运，

每年运入长安的漕粮竟有400万石。黄河漕运对唐政府的重要性由此可以直观地反映出来。黄河漕运是古代连接我国东西部地区的重要经济命脉，历代统治者出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考虑，无论定都长安或定都洛阳，不得利用漕运保证东西部地区粮食、物资的交流，尤其在西汉和唐代，漕运对稳定京师、救灾备荒、巩固统治等，都起到积极的作用。历代凿修栈道和设置转运仓的根本原因是它关系到黄河漕运的成败和效率。栈道往往是纤道，故同时又是增添水路动力的水上交通辅道。可见，三门峡黄河漕运实是陆路崤函古道的另一种形式，三门峡黄河古栈道是崤函古道上的特殊筑路工程，二者相互贯通和联结，在线路上有交叉，在运输上有联运，功能和作用有相同之处。因此，历史时期的三门峡黄河漕运也应包括在崤函古道的范围，崤函古道自古以来就是水陆“双轨”之途。理解这一点，对科学认识崤函古道乃至开发和利用崤函古道都是十分重要的。

五、余论

自西周开创长安与洛阳东西两京制度，直至唐末的2000年间，长安与洛阳便形成了古都史上著名的“双都轴心”都城地域结构，联袂主导了我国古代最为辉煌的文明发展阶段。而联接和沟通两大都城，使“双都轴心”一同构成更大范围、力量更强的都城圈，并一同在全国发挥轴心作用的，便是先秦以来盛称的崤函古道。崤函古道介于两大古都之间的独特地理位置以及与周围地理环境的特定关系，使其成为长安与洛阳东西两京之间沟通和交往不可或缺的中间地带和主要通道，同时又是东进中原、西出关中的门户和中原王朝锐意经营的黄河漕运上的重要中继站，在古代都城地域结构和运作空间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崤函古道是适应长安、洛阳“双都轴心”地域结构的需要而出现的，两大都城发展与崤函古道交通发展的全过程息息相关。历史上无论是“关东”“关中”或“山东”“山西”的分界，还是古史前期上东西对立的分野，也大都以崤山或函谷关为标志。丝绸之路开通后，崤函古道又进而发展成为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重要的干线路段之一。北宋以后，随着政治中心移向东南并最终定位于北京，崤函古道的交通功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它仍然是受当时人注重青睐的横贯东西的大动脉。古道蜿蜒数百里，存在数千年，遗迹星罗棋布，实是我国古代文明的一条“传送带”。

如今，崤函古道的绝大部分路段都已消亡或迷失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后世道路叠加在前代道路上，特别是现代道路，如310国道、陇海铁路、连霍高速以及省道、县道、乡道等，都或多或少地穿行在古道之上，掠去了古道曾有的“东西锁钥”的风采。然而，作为曾经承载了极其厚重的历史，拥有极其丰富文化内涵的崤函古道，其沿线的遗存与景观，都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很值得研究和保护。

参考文献

- [1]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M].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2] 辛德勇·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M].中华书局, 1996.
- [3] 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M].中华书局, 1996.
- [4] 李健超·汉唐两京及丝绸之路历史地理论集[M].西安:三秦出版社, 2007.
- [5] 胡德经·两京古道考辨[J].史学月刊[M].1986(2)。

- [6] 宋杰·先秦战略地理研究[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 [7] 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M].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 [8] 史念海·河山集[M].有关历史交通地理部分.
- [9]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门峡漕运遗迹[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 [10]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建设管理局移民局,黄河小浪底水库文物考古报告集[M].黄河水利出版社,1998.
- [1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学考古专业,运城市文物工作站·黄河漕运遗迹——山西段[M].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
- [12] 三门峡史迹[M].张怀银,贺兰君,王宝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
- [13] 崤函古道申遗文本[M].(陕县文化局内部资料,2008).
- [14] 秦函谷关申遗文本[M].(灵宝市文物局内部资料,2008).

注释

- [1]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辛德勇:《崤山古道琐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4期;王文楚:《唐两京驿路考》,《历史研究》1983年6期;王文楚:《西安洛阳间陆路交通的历史发展》,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胡德经《两京古道考辨》,《史学月刊》1986年2期.
- [2] 胡德经:《两京古道考辨》,《史学月刊》1986年第2期.
- [3] 《河南文物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8年;《陕西文物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许顺湛:《河南仰韶文化聚落群研究》,《中原文物》2001年第5期;《河南龙山文化聚落群研究》;《陕西仰韶文化聚落群的启示》,《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李友谋:《论郑洛地区的仰韶文化及其相互关系》,《中原文物》1992年第3期;杨亚长:《试论“华渭文化区”》,《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4期;《略论“郑洛文化区”》,《华夏考古》2002年第1期.
- [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灵宝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灵宝铸鼎塬及其周围考古调查报告》,《华夏考古》1999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灵宝北阳平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99年第1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试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11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灵宝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荆山黄帝陵管理所:《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2001年春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队等:《河南灵宝西坡遗址105号仰韶文化房址》,《文物》2003年第8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灵宝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山市帝陵管理所:《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发现一座仰韶文化中期特大房址》,《考古》2005年第3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灵宝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荆山黄帝陵管理所:《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墓地2005年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1期;马萧林、李新伟、杨海清:《河南灵宝西坡遗址第五次发掘获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2005年8月26日;李新伟、马萧林、杨海清:《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发现仰韶文化中期大型墓葬》,《中国文物报》2007年2月16日;魏兴涛、张小虎、胡小平、宁建民:《河南灵宝铸鼎塬史前聚落调查取得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07年6月29日.
- [5] 许顺湛:《河南仰韶文化聚落群研究》,《中原文物》2001年第5期.
- [6] 许顺湛:《陕西仰韶文化聚落群的启示》,《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
- [7] 李久昌:《远古至西周时期魏国地区的人文环境及其演进特点》,《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 [8] 李雪山:《商代分封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99-201页
- [9] 《全唐文·卷二十七》玄宗《简察驿路妄索供给诏》.
- [10] 《全唐诗·卷四四八》白居易《京路》.
- [11] 崤函地形参见李健超:《三门峡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氏著《汉唐两京及丝绸之路历史地理论集》,三秦

- 出版社，2007年；王文楚：《西安洛阳间陆路交通的历史发展》，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
- [12] 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六·河南二》，中华书局，2006年。
- [13] 吴宏岐：《历史上西安所建的陪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1期。
- [14] 杨升南：《说“周行”、“周道”——西周时期的交通探索》，《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从刊第二辑，1984年8月。
- [15] 史念海：《论我国历史上东西对立的局面和南北对立的局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期。
- [16] 《元和郡县志·卷二·华州》。
- [17] 《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纪》。
- [18] 杜佑《通典·州郡三》：“至后汉献帝初平二年，董卓胁帝西幸，出函谷关。自此以前，其关并在新安。其后二十年，至建安十六年，曹公破马超于潼关，即是中间徙于今所。国之巨防，不为细事，史官阙载，斯亦失之。”据此，潼关设置的时间应在东汉献帝年间。献帝初平二年（191），董卓胁迫献帝西幸长安，出函谷关，自此以前关在新安县，其后二十年，至建安十六年（211）曹操破马超于潼关，则潼关设置时间应在191—211年。
- [19] 《通典·卷一百七十三·华州》。
- [20] 《通典·卷一百七十三·华州》。
- [21] 《元和郡县志·卷二·华州》。
- [22] 《元和郡县志·卷二·华州》。
- [23] 《元和郡县志·卷二·华州》。
- [24] 《水经注校·卷四·河水》。
- [25] 《元和郡县志·卷六·阆乡县》：“黄巷坂，在县西北三十五里，即潼关路也。”民国《阆乡县志》：“黄巷坂在城西四十五里，杨震影堂之侧。”据此，黄巷坂当在今潼关东、风陵渡与灵宝豫灵镇交界一带、黄河南岸。
- [26] 民国《阆乡县志》：“世传汉孝武微时经过湖城，遇仙翁以盘飧豆，羹而进之。后因名其地为盘豆，今盘豆镇是也。”盘豆镇为历代驿站。1958年合并于阆底镇，1962年又分出，建立故县乡，后改为故县镇，治所在故县，管理原盘豆镇之辖区。1959年因三门峡大坝蓄水，盘豆镇淹没，原镇居民分迁东西两原，即今盘涧水（枣阳河）两岸的盘东、盘西二村。
- [27] 《汉书·地理志》京兆尹湖县：“有周天子祠二所，故名胡。”按三门峡市志办武铁成先生的观点：按传统礼仪，祠名必与祠主姓名有联系。胡祠祠主必为周人子名胡的人。而周天子名胡者仅有周厉王和周禧王，二人之中若对社会发展影响而言，首推厉王姬胡。也就是周天子祠，必为厉王姬胡之祠。而胡祠之地则遂称为胡（武铁成《胡县二题》，《三门峡史志》1997年第4期）。
- [28] 《左传·文公十二年》。
- [29] 张怀银、何耀鹏：《灵宝王家岭秦汉墓地的发现及其意义》，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中原文物考古研究》，大象出版社，2003年。
- [30] 《史记·卷79·范雎蔡泽列传》。
- [31] 《太平寰宇记·卷六·虢州》。
- [32] 《元和郡县志·卷六·河南道二》。
- [33] 《元和郡县志·卷六·河南道二》。
- [34] 大字营古道门洞在距函谷关西6公里的灵宝市西闫乡大字营村东，是函谷古道上的一个古道门洞，也是原灵宝县与阆乡县交通必经的唯一道洞。东西走向，洞长12米，宽5米，高5米。南北两端有高10米的寨墙。洞为砖石建筑，拱券顶，下为石头垒砌，中上部为大砖券砌。在东西两端门洞上部各镶嵌一石匾，东门石匾上刻“中土首镇”，下有“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冬季立”；西门上刻“三藩要地”。洞上原有重檐悬山顶楼阁，已毁。洞上北侧原有一座关帝庙，亦毁，仅留有明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所立石碑两通。
- [35] 《元和郡县志·卷二·华州华阴县下》：“秦函谷关在汉弘农县，即今灵宝西南十一里故关是也，今大路在北，本非铃束之要。”唐时灵宝县城即今灵宝旧城，唐时大道已在古函谷关之北，什么时候北移的呢？据《重修灵宝县志·卷三·古迹条》：“函谷关在邑西南里许，曹操征张鲁时开粮道于此，后遂置关，基址久湮，前令江鹜重建，去周置旧关十余里。”《重修灵宝县志·卷六·秦汉函谷关考》“……曹操尝以铁骑数十万，西讨马超，命许褚凿道于函谷旧关之北十里，滨大河以转运……”由此可知，曹操西征张鲁时，大路北移，关亦北徙。
- [36] 《元和郡县志·卷二·华州》。
- [37] 《元和郡县志·卷六·河南道陕州》。
- [38] 《张说之文集·卷三·途次陕州应制奉和》。

- [39] 《元和郡县志·卷六·河南道陕州》。
- [40] 《全唐诗·卷四八·奉和圣制途次陕州作》。
- [41] 《全唐诗·卷九三·秋日还京陕西十日作》。
- [42] 《全唐诗·卷三七八·寄陕府邓给事》。
- [43] 辛德勇：《崤山古道琐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4期。
- [44] 民国《陕州志》引金《重修陕州故硤石县大通寺碑》。
- [45] 《宋会要辑稿·方域·五之三九》：“陕州硤石县，乾德五年移治石壕镇，仍割河南永宁县之胡郭管隶焉。”
- [46] 据李健超先生《崤函南道考察记》（未刊稿）。
- [47] 《续高僧传·卷三十一·释慧常传》。
- [48] 隋代时称崤山北路为三崤道，而不称二崤道。参见辛德勇《崤山古道琐证》一文中的考证。
- [49] 胡德经：《两京古道考辨》，《史学月刊》1986年第2期。
- [50]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长安洛阳驿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 [51] 《战国策·东周秦攻宜阳》。
- [52] 《战国宜阳故城调查简报》，赵安杰，《中原文物》1988年第3期。
- [53] 参见辛德勇《崤山古道琐证》一文中的考证。
- [54] 《宋史·地理志》陕州：“熙宁六年，省硤石县为石壕镇入焉。”
- [55] 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
- [56] 《全唐文·卷九五二》。
- [57] 《元和郡县志·卷二·关内道二》。
- [58]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黄河小浪底盐东村汉函谷关仓库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10期。
- [59] 《元和郡县志·卷二·关内道二》。
- [60] 《四库全书·玉海·卷二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
- [61] 《贞观政要·卷十·巡幸》。
- [62] 《唐会要·卷三十·杂记》。
- [63] 严耕望先生统计唐代设置在洛阳与长安两京道上有15所（《唐代交通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介永强统计唐代也是15所（《唐代行宫考逸》，《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1期），但名称等与严先生有所不同；吴宏岐先生统计，隋时两京道上有行宫11所，唐时增至18所（《隋唐帝王行宫的地域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期）；严辉先生说，隋唐在两京大道上设立的行宫大约有17处（《洛阳地区隋唐离宫遗址调查与考证》，《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 [64]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 [65] 陕县官前乡党委政府：《陕县官前乡志》（内部铅印本），2002年。
- [66] 师振殿主：《官前神韵》，银河出版社，2006年。
- [67] 介永强：《唐代行宫考逸》，《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1期。
- [68] 李濂：《通志》；光绪《宜阳县志·卷六·古迹》。
- [79]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云南路有8座行宫；吴宏岐《隋唐帝王行宫的地域分布》云南路有9座行宫。
- [80] 《水经注·卷四》：“河水又东，合柏谷水，水出宏农县南石堤山。山下有《石堤铭祠》云：魏甘露四年，散骑常侍、征南将军、豫州刺史领宏农太守、南平公之所经建也。其水北流，迳其亭下。晋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适齐、楚。狐偃曰：不如之翟。汉武帝尝微行此亭，见愤亭长妻。故潘岳《西征赋》曰：长傲客于柏谷，妻睹貌而献餐，谓此亭也。”于此可知，柏谷亭在柏谷水下游。柏谷水即今沙河，发源于今灵宝阳平镇南秦岭，东北流经西闫西坡村入黄河。《水经注》云：“其水北流，迳其亭下。”则亭当在西闫乡一带。今西闫乡大字营北有岭古称柏谷岭，柏谷亭当在沙河西岸柏谷岭下东古驛村一带。
- [71] 《水经注·卷四》：“河之右，曹水注之。水出南山，北迳曹阳亭西。陈涉遭周章入秦，少府章却斩之于此。魏氏以为好阳。《晋书地道记》曰：亭在弘农县东十三里。（守敬按：《续汉志》，弘农有曹阳亭。《汉书·陈胜传》注，晋灼曰，亭在弘农东十三里。为《晋书地道记》所本。《括地志》认为，在桃林县东南十四里。《元和志》，在灵宝县东南十四里。《灵宝县志》，曹阳亭即今好阳铺，在县东十里。）其水西北流入于河。”由此可知，曹阳亭即后来的好阳铺，当在今好阳河东，大王镇西五帝村附近。
- [72] 据《资治通鉴》等文献记载，潼关有关西驿。严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图考》中认为关西驿即潼关驿，盖潼关驿在

关之西，故名，非别一驿也。

- [73] 唐代诗人吟咏之作有嘉祥驿。嘉祥驿在哪里？无定论。《太平广记·卷一六八·郑还古》条记叙郑还古在东都，钟情于柳将军歌妓。及入京除国子博士，“柳见除目，乃置入京。妓行及嘉祥驿，郑已亡歿，旅讫寻到府界。”旅讫寻到府界，其时只有洛阳称河南府，似应仍在河南府内之永宁县境。但《唐诗纪事·卷六七·王祝》（亦曰王祝）条：“会昌时有题三乡者曰：余本若耶溪东……从良人西入函谷，寓居晋里第（唐长安城慈恩寺所在的晋昌坊）。……不意良人已矣，邈然无依……东迈，涉浚水，历渭川，背终南，陟太华，经魏略，抵陕郊。揖嘉祥之清流，面儿女之苍翠，凡经过之所，皆曩昔燕笑之地，遂命笔聊题。”据上述两条记载嘉祥驿应在陕州之东南，三乡驿之西北。然，三乡驿之西北三十里鹿桥驿，鹿桥驿西北三十里莎柵驿。莎柵驿西北三十里为硤石驿（今陕县菜园乡石门，非今陕州东三十五公里硤石镇）硤石镇又西北五十里达陕州。在崤山南道上似无嘉祥驿？但耶溪女题三乡者，又是从长安去东都曾抵“陕郊”。再者从唐诗描写嘉祥驿风光有泉水木清。唐·薛能《符亭》二首：“山如巫峡烟云好，路似嘉祥水木清。大抵游人总应爱，就中难说是诗情。”（《全唐诗》九函二册）似只有今陕县官前乡东这一带地理环境相似。那么，嘉祥驿推测是否为莎柵驿之异名同地欤？待考。
- [74] 严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图考》认为关西驿即潼关驿，盖潼关驿在关之西，故名，非别一驿也。
- [75]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 [76] 杨正泰：《明代驿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7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门峡漕运遗迹》，科学出版社，1959年。
- [78]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建设管理局移民局：《黄河小浪底水库文物考古报告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8年。
- [7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运城市文物工作站：《黄河漕运遗迹——山西段》，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年。
- [80] 张庆捷、赵瑞民：《黄河古栈道的新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98年第8期。
- [8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运城市文物工作站：《黄河漕运遗迹——山西段》，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年。
- [82] 《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
- [8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运城市文物工作站：《黄河漕运遗迹——山西段》，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年。
- [8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运城市文物工作站：《黄河漕运遗迹——山西段》，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年。
- [85] 《史记·卷·河渠书》。
- [86] 《水经注·卷四·河水注》。
- [87] 马端临：《文献通考·国用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
- [88] 《三门峡漕运遗迹·附录一·三门峡漕运简史》。
- [89] 马端临：《文献通考·国用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
- [90] 《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
- [91] 《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
- [92]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 [93]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 [94] 《读史方輿纪要·卷四八》。
- [95] 卫斯：《唐代时期的三门峡漕运》，《卫斯考古论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
- [96] 《旧唐书》卷一八五《姜师度传》；《朝野僉载·卷二》。
- [97] 《资治通鉴·卷二三二》。
- [98] 《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
- [99] 《太平广记·卷三十八》引《邨侯家外传》。

2008年5月1日，笔者与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李久昌副院长、科研处谢广山处长、学报编辑部倪玲玲主任、樊莉娜老师等一行驱车从三门峡市出发向东南行，经交口，沿青龙涧水到陕县菜园乡南县村，约距三门峡市18公里。在南县村实地考察安阳城遗址，这里也曾为崤县、硤石县的县城所在地。随后到雁翎关水北岸的寺坡村采访，并发现开元元年所立的大同寺碑，寺坡乃唐代之大同寺。由寺坡东南行约3公里，在石门村南绣岭坡现场考察唐代绣岭宫（唐代行宫）遗址。虽然未发现任何遗迹，但史籍记载与地理形势完全相符。由绣岭坡回到三门峡至洛宁县公路，沿公路前行10公里，在雁翎关西北查看一高台上的夏后皋墓。中午12时继续东南行，穿过雁翎关峡口，沿源于此峡口东流的永昌河谷到陕县宫前乡，这里西北距三门峡市约40公里。宫前乡所在地宫前村北高台地上有所谓“武则天行宫”遗址，访问了当地村民与学者，在宫前村看到行宫出土的唐代柱石、方砖、长砖等，并到遗址进行调查。下午3时驱车东南行经头峪村后，离开公路偏东，东南方向到洛宁县南、北两旧县村，据说这里是唐代贞观十七年之后直至金代的永宁县城所在地。下午4时从旧县村沿着黄土丘陵沟壑经照册村，又东南沿杜阳河谷经大宋镇到洛河平原，折向西南到洛宁县城。下午7时40分离洛宁县城返回三门峡市。

这一天考察的线路是古老的崤山南道。崤山道（包括崤山北道、崤山南道）是古长安（今西安）东通洛阳的道路中最崎岖艰难的一段路程，即在三门峡市与澠池、洛宁间。北道虽然便捷，但确险峻异常，南道仅越过雁翎关一段石板，易于行旅，所以唐代皇帝来往东西两京多走南道，遗留沿途的行宫、驿站历经沧桑多不可考。但通过实地考察，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从宏观地理形势，微观地理特征，将崤山南道的走向、路况基本理清，并使1000多年来淹没在荒山野岭之中的沿途行宫、驿站浮现出真容。

一、唐永宁县城城址的认定

《旧唐书·地理志》中记载，河南府“永宁，隋为熊耳县所治。义宁二年（618）置永

宁县，治永固城，属宜阳郡。武德元年（618）改属熊州。武德三年（620）移治通轨城，改属函州。武德八年（625）复属熊州。贞观元年（627）改属谷州。贞观十四年（640）移于今所，十七年（643）移治鹿桥。显庆元年（656）谷州废，改属洛州”。自义宁二年置永宁县于永固城后，又先后迁移到同轨城、今所和鹿桥，前后20多年间有四个城址。“今所”所指，据《资治通鉴·卷二二一》，乾元二年胡三省注引宋白曰：“贞观十四年移理莎栅，十七年移鹿桥。”于此可知“今所”即莎栅。即贞观十四年永宁县城在莎栅，贞观十七年移永宁县城于鹿桥，之后，直至唐末迄无变动过。《资治通鉴》卷二二二，上元二年，安史之乱时，史思明、史朝义皆败退永宁“思明在鹿桥驿……朝义宿于逆旅”。下文胡三省注：“鹿桥驿，永宁传舍也。”那么，永宁县城所在的鹿桥在哪里？唐·李泰《括地志》卷三，谷州永宁县“二崱山又名嵌岑山，在谷州永宁县西北二十八里，即古崱道也”。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五河南道河南府“永宁县，畿，东至府二百里……义宁二年（618）置永宁县，属宜阳郡，贞观元年（627）改属河南府……二崱山，又名嵌岑山，在县北28里……熊耳山，在县东北45里。”按以上所记唐永宁县城应在嵌岑山东南28里，熊耳山西南45里。嵌岑山，又名“金银山”在今陕县硤石乡东南，西距三门峡市约34公里。熊耳山在今陕县西李村东北，西北距今三门峡市54公里。揆其地望如果在熊耳山西南48里，已经是在嵌岑山之西南，而非西北。如果永宁县城在嵌岑山东南或南28里，距熊耳山绝无45里。如果按《元和郡县图志》记述永宁东至河南府200里，陕州东至东都350里，那么永宁县城应在陕州东150里。《太平寰宇记·陕州条》载“东至河南府永宁县116里，东南至河南府永宁县界116里”疑《寰宇记》上条“县”字下应有“界”字，而下条的“县”字下之“界”字当误^[1]；即陕州东南至河南府永宁县界为116里，东南至永宁县城116里。这恰在今洛宁县北部旧县村附近。这里西北至嵌岑山是50里，东北至熊耳山35里。据民国六年《洛宁县志》所载，金正隆六年（1160）永宁县城由鹿桥南迁至洛河河畔，民国二年（1913）更名为洛宁县。明《读史方輿纪要·卷四十八》记载，永宁县在河南府西南200里，北至滏池县120里，西北至陕州200里，也说明唐永宁县城无疑在今洛宁县北大约五十里处的旧县村，即旧县村是唐代贞观十七年永宁县城的治所鹿桥驿。至今在旧县村南有鹿山、鹿山寨，村东有上鹿河、下鹿河。这些与鹿有关的地名绝不是偶然的。历史上遗留的地名应与鹿桥有关。在南旧县村北约1公里的原面上有大量的瓦片碎砖，当地群众指为原永宁县城址。洛阳文物二队也曾在北旧县村东已经发现有夯土城墙、房基及唐代瓷片砖瓦等^[2]。

崱山南道上有关唐代行宫、驿站的位置，据历史文献记载结合实地调查和考古发掘大多能够确认。至于永固、同轨、莎栅的地望，史书记载与学者研究认为，永固城在洛宁县东北，同轨城在今宜阳县三乡镇城头村，莎栅在今宜阳县河底镇。^[3]但我认为莎栅定位在河底镇误。

二、莎栅道在两京交通史上的意义

《资治通鉴·卷一八〇》，隋纪大业元年纪，“（三月）丁未诏……营建东都……废二崱道，开萋册道。”胡三省注：“洛州永宁县，本熊耳，西五里有崱岫宫，南（应为西）三十里有兰峰宫。此皆东西二京往来缘道离宫，杂出于隋唐所置，不载所谓萋册道，不知此道起於何所，入於何所。《山海经》曰：‘夸父之山，在湖县西九里，其山多萋柎，其北曰桃林，或者萋柎此后讹为萋册，逐为萋册道欤！’”此即废崱山北路，辟南路，诸家已有定论。萋册道后唐代史籍均称莎栅道，大业元年开辟后，又屡有兴废。《唐会要·卷八六·道路目》载：“贞观十四年七月三十日，移五崱道于莎栅，复旧路。”《通典·卷一七七》记载，河南府永宁县条三崱山

二陵道：“大业三年废，武德初又通此道，贞观十四年又废此道。”以上记载“二崤道”“五崤道”实指“三崤道”即崤山北道^[4]。大业初废三崤道，开莎栅道，武德初又废莎栅道，重开三崤道，即复崤山北路。贞观十四年复废三崤道，再开莎栅道。隋末和尚慧常由东都被系往西京，“行次莎栅”正值莎栅道通行之时（《续高僧传·卷三十一·释慧常传》）。

为什么废三崤道开莎栅道？莎栅道起于哪里？经过哪里？又到哪里？莎栅道是不是崤山南道？如果是，为什么不恢复旧路，又开莎栅道呢？《太平寰宇记》“永宁县莎栅谷在县西三十里，唐有莎栅城，韩愈、孟郊有莎栅联句诗。”《资治通鉴·卷二二一》，乾元二年，安史之乱，李忠臣追击史思明部将李归仁“战于永宁、莎栅间，屡破之”。胡三省注：“永宁县……武德三年移理同轨，贞观十四年移理莎栅，十七年又移理鹿桥。”这说明贞观十四年开莎栅道时曾移永宁县于莎栅。按《新唐书·地理志》所说：“永宁县西五里有崎岫宫，县西三十里有兰峰宫，皆显庆三年置”。于此可知兰峰宫在永宁县西33里，莎栅城在永宁县西30里，那么莎栅城应在兰峰宫东三里之地。

莎栅道与三崤道相比有哪些不同？崤山南道历来的路线是从陕州东南沿青龙涧河谷至唐碛石驿（今陕县石门水库，即碛石坞）再溯雁翎关水越雁翎峡口，沿源于此地东流之永昌河至三乡驿（今宜阳县三乡镇），再顺洛河东去洛阳。但永昌河从兰峰宫向东大致沿纬度线方向约二十公里至龙脖水库大坝，又东南沿永昌河至今宜阳县三乡入洛河。永昌河从柳树沟至龙脖水库间曲流发育，即弯道多。沿永昌河到洛河，大体上是西北向东南弯曲的“弓背形”。

莎栅道起自永宁县城西15公里莎栅城，即兰峰宫东3里，东南行经今池头、头峪后入洛宁县境到旧县村，相距是15公里，确为唐制15公里一驿。从旧县村东南经今照册村，沿杜阳河谷东经大宋（东宋）直抵三乡驿。旧县村与三乡驿之间也约为40里。据说“照册村”即为“莎栅”，^[5]今为一大村，应与莎栅道有关。新开莎栅道既东南斜行近乎直线走向为“弓弦”，自然道路便捷，减少路程，再加以避免曲流，又减少路程，再者莎栅道从起点到鹿桥驿，大体沿黄土丘陵原面或小分水岭，道路比较平直（高差不大）。这样莎栅道既便捷又较为平坦，量算莎栅道比古崤山南道（莎栅至三乡间）减少路程约20余里。所以自唐贞观十七年之后从陕州东南至洛阳的大道就改行莎栅道，并移永宁县城于鹿桥，这就是莎栅道。路线是莎栅城（驿）、永宁县城（鹿桥驿）、三乡驿。此后唐高宗显庆三年，又于莎栅城西3里置兰峰宫，鹿桥驿西，5里置崎岫宫。兰峰宫至崎岫宫也约为30里，即当时在山区行走的一日程。莎栅道揭开崤山南道交通史上的新篇章。

三、兰峰宫遗址的确认

陕县宫前乡宫前村北的武则天行宫遗址，当地群众有许多美丽的传说。《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6]标记“紫微宫”。《三门峡史迹》^[7]一书中也说明此地为武则天行宫。在2002年出版的《陕县宫前乡志》一书^[8]，在文物古迹一节中，亦记述为“武则天行宫”。“武则天行宫”不是该宫的专有名称，该宫到底是什么名字？宫前乡师振殿先生主编的《宫前神韵》^[9]一书中说，据“唐书地理志认为是兰昌宫，后称崎岫宫”。但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兰昌宫在福昌县，即今宜阳县境，崎岫宫在永宁县西5里，按史籍记载，从地理位置、地理环境与现场实地考察，陕县宫前乡宫前村北的“武则天行宫”就是唐代的兰峰宫。

据《新唐书·地理志》中载永宁县“西三十里有兰峰宫”。唐永宁县城即今洛宁县旧县村。旧县村西33里正是今宫前村所在地。从地理位置与地理环境观察，旧县村西或西北30余里为崤山山区，沟壑纵横，唯永昌河谷地形平坦、开阔，义系交通必经之孔道，

因此兰峰宫非此地莫属。从兰峰宫一名含义有高耸林木茂密的山峰为特征。今宫前村永昌河谷南有座南唐山，山上有座菩萨庙，山顶海拔高948.9米，宫前村海拔高约360米，高差500余米。从宫前村抬头南望山巅如锥，直插云端，加以植被茂密，青翠如黛绿复兰，这一枝独秀的特有景色是沿路的绣岭宫景观、崎岫宫景观所不具备的。

兰峰宫遗址在宫前村北高岗上，面积约百余亩，今为耕地。宫室座北面南，北依万岁山（人工堆砌高数米），南对南唐山，东西两侧各为一条南北沟所限，地面地下曾出土圆形、方形石柱础，铺地素面方砖（边长50厘米，厚2厘米）这些柱础石及方砖分散存放在宫前村群众家里，是他们在遗址上耕作时采集的。至今遗址地面上残留的唐代筒瓦残片、长砖等在田间地头俯拾皆是。据该村村农反映，每年初夏小麦将要成熟时，站在万寿山上，俯瞰宫坪小麦长势和颜色不一，宫殿室宇地基上生长的小麦因地下基础土质坚硬，水分少，小麦长势浅而瘦；宫殿屋宇之外的地方，土层深厚，含水量充足，小麦长势好，颜色浓绿。由此大体能辨识出当年的宫室的建筑轮廓，宛如一副城市平面图，规模宏大，结构复杂，错落有致，使人能够遐想到兰峰宫巍峨壮观的形势。

兰峰宫东去33里，是永宁县城鹿桥驿，永宁县城西5里有崎岫宫。2002年，严辉等曾在旧县村西约2公里处发现一处唐代板瓦、筒瓦、绳纹砖、石块等遗物，应为崎岫宫遗址^[10]。兰峰宫西北相间约30里是陕县的绣岭宫，这正符合《新唐书·地理志》所记载唐代崤山南道上的行宫的间距。

四、嘉祥驿地望的比定

唐代诗人吟咏之作于崤山南道上有嘉祥驿。嘉祥驿在哪里？无定论。《太平广记·卷一六八·郑还古》条记叙郑还古在东都，钟情于柳将军歌妓。及入京除国子博士，“柳见除目，乃津置入京。妓行及嘉祥驿，郑已亡歿，旅櫬寻到府界”。旅櫬寻到府界，其时只有洛阳称河南府，似应仍在河南府内之永宁县境。但《唐诗纪事·卷六七·王祝》（亦曰王祝）条：“会昌时有题三乡者曰：余本若耶溪东……从良人西入函谷，寓居晋里第（唐长安城慈恩寺所在的晋昌坊）……不意良人已矣，邈然无依……东迈，涉浚水，历渭川，背终南，陟太华，经虢略，抵陕郊。揖嘉祥之清流，面儿女之苍翠，凡经过之所，皆曩昔燕笑之地，遂命笔聊题。”据上述两条记载嘉祥驿应在陕州之东南，三乡驿之西北。然，三乡驿之西北30里鹿桥驿，鹿桥驿西北30里莎柵驿。莎柵驿西北30里为硤石驿（今陕县菜园乡石门，非今陕州东35公里硤石镇）硤石镇又西北50里达陕州。在崤山南道上无嘉祥驿插足之地。但耶溪女题三乡者，又是从长安去东都曾抵“陕郊”。再者从唐诗描写嘉祥驿风光有泉水木清。唐·薛能有《符亭》二首：“山如巫峡烟云好，路似嘉祥水木清。大抵游人总应爱，就中难说是诗情。”（《全唐诗》九函二册）似只有今陕县宫前乡东这一带地理环境相似。那么，嘉祥驿推测是否为莎柵驿之异名同地欤？待考。

注释

- [1]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长安洛阳驿道》，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
- [2] 严辉：《洛阳地区隋唐离宫遗址调查与考证》，《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2卷第4期 2004年12月。
- [3] 王文楚：《西安洛阳间陆路交通的历史发展》，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所，《历史地理研究》(1)，复旦大学出版社。
- [4] 辛德勇：《崤山道琐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4辑。
- [5] 胡德经：《两京古道考辨》，《史学月刊》，1986年第2期。
- [6]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 [7] 张怀银等编著《三门峡史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
- [8] 陕州宫前乡党委政府：《陕县宫前乡志》，2002年。
- [9] 师振殿主编《宫前神韵》，2006年，银河出版社。
- [10] 严辉：《洛阳地区隋唐离宫遗址调查与考证》《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2卷第4期 2004年12月。

长安溯渭水至陇山段
路线考察研究

今从长安溯渭水西行至陇山段曾是我国古代通往甘、青地区重要的通道。史前时期，与关中地区同脉的华夏文明曙光已经播映于陇东南的西汉水上游：商周的礼制继续推动了这一区域文明的历史进程；春秋时期，秦文公东猎汧渭之会，开辟了著名的陇关道，打通了秦人由西汉水流域逐步进入关中地区的通道；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修筑了从咸阳经雍城到陇西（今甘肃省临洮南）的国家大道——秦驰道，于是，自长安西行溯渭水至陇山段的道路成为全国驰道网络上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汉初期，皇帝多次出行直达陇南、陇西等地进行郊祀活动，以及东西贸易的繁荣，这条通道遂成为丝绸之路主干道之一，即所谓丝绸之路南线道路。当时在这条道路上常有外交使团、商旅过境往来长安和西域之间，因而得名；汉唐至宋元时期，此道仍是我国与中亚、欧洲交通道路上重要的组成部分，亦是驿邮通往西部各地的必由之路。

丝绸之路长安溯渭水至陇山段有两大天堑，一为汧（汧同千）河，二为陇山。由于这两大屏障的阻隔，也相应地制约与影响了两条主干道的走向，一条为汧渭谷道，即水上通道；另一条则为长安—雍城—陇州道，即陆上通道。

一、汧渭谷道

汧渭谷道（即水道）渭河段走向很清楚，即自长安西行至宝鸡之间。今宝鸡市以西进入山脉后，由于河面狭窄，河水湍急，缺乏水上通行的条件，所以不是主要的西行水上通道。自汧渭交汇处转道河水丰沛，河面平阔的汧河便成为主要的水上通道。本文作者曾重点对汧河谷道进行了考察研究。

汧河谷道又称汧水道，即利用水道与河谷并用的通道。从交通角度讲，以河谷作为交通要道是我们祖先的发明，因为沿河要比翻山容易得多，而且可随时取水捕鱼，补充给养。逐水而行，择水而栖，是人类活动的基本规律。

汧河谷道为水上与河岸并用通道，具体路线走向为从长安溯渭河西行至汧河口，沿汧河

河谷向西北行进，经今凤翔境内的长青镇孙家南头村一带至千阳境内，北行至陇县，再西行经陇关到今甘肃境内的清水、张家川一带（图1）。



图1 渭河谷道示意图

渭河谷道的开辟与秦人东迁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商周之际，秦人就在陇山以西先后为商周王朝“在西戎，保西垂”，西周孝王时，非子被封召于汧渭之间为周王室牧马，这是秦人第一次越过陇山东行的记载。虽然秦人为周人创建并管理畜牧业基地，但当时秦文化的重心仍在西垂旧地。周宣王时，“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文献的记载也印证了此时秦人活动的主要地区在渭河上游及其以西的戎人聚居区。^[1]年代当于公元前820年左右的不其簋就记载了西周末年，秦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同西戎作战的事实（图2）。不其簋盖铭文曰：“惟九月初吉戊申，伯氏曰：‘不其，馭（朔）方严允广伐西俞（隅），王命我羞追于西。……弗以我车函（陷）于艰，汝多擒，折首执讯……’”周王朝西部受到严允侵扰，周王命伯氏不其抗击，追至于西。西，当指“西垂”一带，秦汉时为陇西郡西县，地当今甘肃天水附近，礼县、西河等地。不其随伯氏对严允作战得胜，伯氏回朝献俘，命不其率兵车继续追击，搏战之中，多有斩获。李学勤先生认为，“不其簋所记是周宣王时秦庄公破西戎的战役”，“簋铭的不其很可能便是文献里的秦庄公”，“不其弟兄追戎于西，而《本纪》云秦庄公任西垂大夫，从地理上看也是符合的”。^[2]

秦庄公驾崩之后，子襄公代立。是时西戎、犬戎与申侯攻伐西周，杀周幽王于酈山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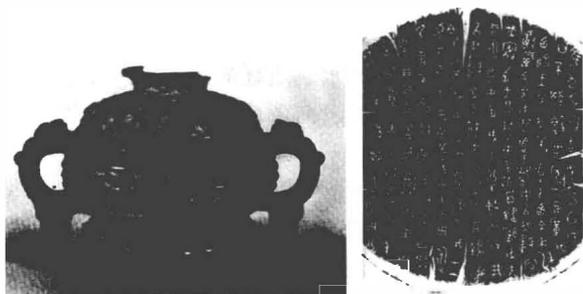


图2 不其簋和铭文

秦襄公将兵救周，护送平王东迁，周王朝赠其“岐以西之地”，秦襄公在今陇县东南建立“汧邑”，公元前770年受封享国后的秦襄公又“备其甲兵，以讨西戎，伐戎而至岐”。此后秦文公逾陇攘夷狄，“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建立了“汧渭之会”，“汧邑”和“汧渭之会”两处都邑均在汧河之畔。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陇山一带自然植被很好，到处是原始的大片森林，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开辟一条在原始森林中行进的山路是非常不容易的事，而利用天然的汧河河谷，不但平缓，而且沿途都是“周余民”和部分秦人先前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不但地形、地貌比较熟悉，军队在行进中不容易迷失方向，而且经长期经营，生活给养有保障。选择这条道路行进，应是最明智和最便捷的选择。秦人自非子为周王养马，秦仲为大夫到襄公始国，直至文公东猎，这个逐步壮大的部族往复活动于西垂与汧渭之间，正是经由汧河谷道完成了文明发展进程中的跃进。

著名的石鼓文——《汧絜》和《霁雨》就描述了秦君在汧河流域渔猎游乐之事（图3）。《汧絜》中写道：“汧絜（也）沔沔，絜皮（彼）淖渊。”《霁雨》则直接写道“舫舟自廓”“佳（唯）舟以行”，^[3]郭沫若认为上述诗所记就是“追叙（秦君）初由汧源出发攻救周之时事”。^[4]由此推测，此前文献中记载的周穆王西巡也可能就是沿此道西行。汧河西北岸有黄梅山，位于今凤翔与陈仓区交界处，俗称黄米山，又称马迹山、马脊山。山下有马迹泉，相传为周穆王西巡马死所葬之处^[5]。今陇县原子头、店子、千阳冉家沟等地的考古发掘也表明，自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老官台文化开始，经仰韶文化及周秦，汧河流域的与渭河流域的古文化面貌别无二致，表明陇山与关中一带的连通早已存在。^[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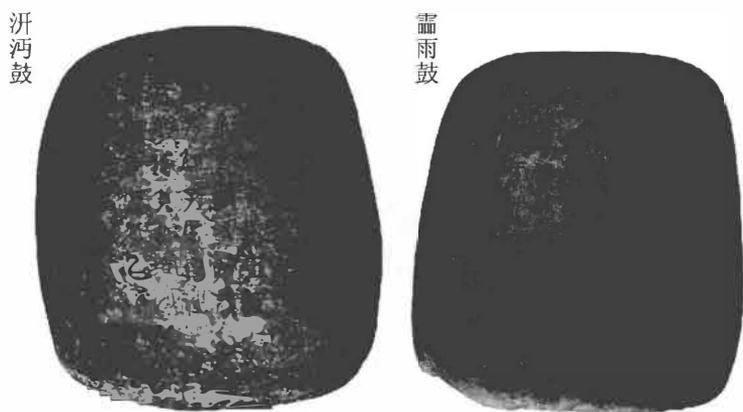


图3 汧渭之会一带出土的秦石鼓

汧河谷道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利用漕运作为辎重及后勤保障，秦文公初到“汧渭之会”时，其后勤的给养补充当有一部分就来自西垂，而通过汧河漕运则是最好的方式。古时汧河水量较大，大多季节可以行船，其上游今陇县境内蒲峪川古时称“弦蒲菽”，就是有名的大湖泊。《禹贡》中载：“天下九菽，此其一也。”据隋代《九域志》载，汧源县有弦蒲菽，经长期淤积，决口变湖为川。上游有大湖泊，可见当时汧河水量不小。另据《陇县志》载，唐武德八年（625）十二月十八日，水部郎中姜行本奏请于陇州汧源县修五节堰，许之。后遂引汧水通漕灌田，并始行水运。^[7]《新唐书·地理志》亦载：“汧源（今陇县）有五节堰，引陇川水通漕，武德八年，水部郎中姜行本开，后废。”唐代许棠《题千湖》诗云：“偶得湖中趣，都忘陇坻愁。边声风下雁，楚思浪舟移。静极亭连寺，凉多岛近楼。吟游终不厌，还似曲

江头。”可见，汧河在唐时水量较丰，可以形成湖泊，且已有行船历史。宋代仍以汧河筏运陇山木材。《陇县新志》载：“宋初，市木秦陇，以春秋二时联巨筏，自（汧）河达渭，历砥柱以集京，设官监市，其利甚溥。陇河渠在唐、宋固有益于国，非只利民田也。”今汧河河谷建有冯家山、王家崖和段家峡三座水库，其中，冯家山水库库容达3.89亿立方米，至今水量亦不小。^[8]

200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宝鸡市考古队联合组队，在凤翔县长青镇孙家南头村发现了一处距今2000多年的西汉时期大型漕运码头仓储建筑基址，为研究凤翔境内古丝绸之路和汉代漕运、仓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该仓储建筑基址建于汧河东岸300米处的台地上，由3组南北相连的仓储建筑组成，东西宽33米、南北长216米，建筑总面积7000多平方米。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了墙垣、柱础石、道路等遗迹。仓储建筑基址东约600米处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蕲年宫遗址，此宫是秦汉国君、天子祭祀五时或先王的斋宿之宫，秦始皇的加冕典礼就在蕲年宫举行，汉代也有多位帝王来蕲年宫举行过祭祀等活动。此大型仓储设施可能为蕲年宫举行盛大国事活动时的重要物资储备库，也是东西水上运输的中转站。从这一处大型遗址的发现证明了汧河当时水运能力很大，也证明孙家南头一带曾经是一处重要的交通要塞，这在当时尤其是夏秋两季，从西部东去长安时，此道当为首选之路。过去曾有人在此处发现过有“百万石仓”字样的文字瓦当，由此推断这处仓储设施极有可能就是该瓦当所指的“百万石仓”^[9]（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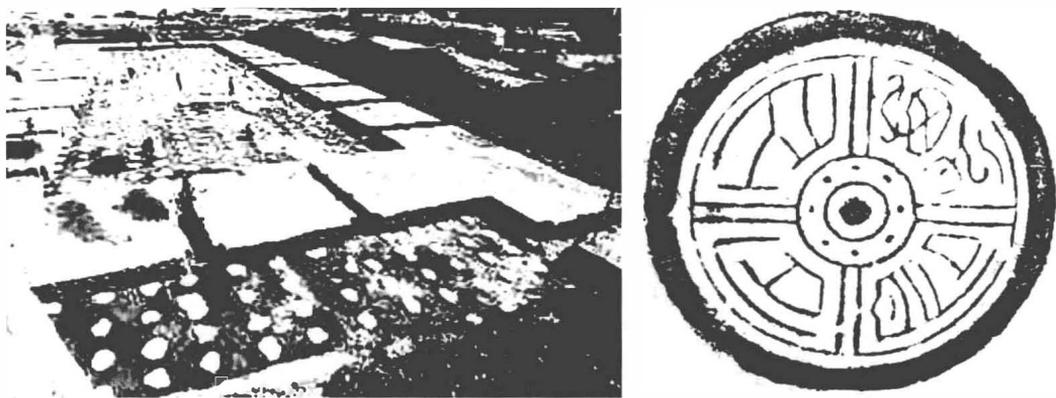


图4 孙家南头村发掘的仓储建筑基址和“百万石仓”瓦当

关于大型漕运最早的文献记载当属秦穆公时期的“泛舟之役”。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十二年，齐管仲、隰朋死。晋旱，来请粟。丕豹说缪公勿与，因其饥而伐之。缪公问公孙支，支曰：‘饥穰更事耳，不可不与。’问百里奚，奚曰：‘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于是用百里奚、公孙支言，卒与之粟。以船漕东转，自雍相望至绛。”这一历史事件史称“泛舟之役”。当晋遭到粮荒时，秦向晋两次输粟以解饥荒，雍城附近只有利用今凤翔孙家南头的汧河码头作为渡口，再进入渭河东去经黄河入汾河直达山西新绛，才能体现“船漕东转，自雍相望至绛”的景象。^[10]

北宋时，苏轼任凤翔府签书判官，负责“编木筏竹，东下河渭；飞刍挽粟，西赴边陲。”（苏轼《凤翔到任谢执政启》）。苏轼到凤翔后了解到，当地百姓最为沉重的差役之一是负责押运官物的衙前之役。他曾说，“轼官于凤翔，见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衙前之役是根据户等高下轮流当差，为了降低户等，逃避此役，许多地区的农民不敢多植一株桑，不敢多养一头牛，不敢多织一匹绢。服役的老百姓职责是替官府押送纲运、保管财物，如果被盗或者水毁是要赔偿损失的。凤翔一带百姓每年都要在西山砍伐上好竹木，然后编成竹筏、木筏，

从汧河、渭河入黄河，给京城开封送去。官府考虑借大水之力好放筏，所以规定每年衙前运竹木的时间，恰巧就在河水暴涨期间，谁如果不在规定时间运到就要受罚。但是，正因为河水暴涨，经常发生竹木筏颠覆事故，衙前水工被淹死无数，而且造成的损失还要由他们来赔偿。每年因此而致许多服役百姓家破人亡，倾家荡产。于是苏轼就主持重新修定了衙规，规定衙前之役可“自择水工，以时进止”。此项改革实施之后，取得了“衙前之害减半”的效果，受到凤翔官民称赞，他的改革也得到了朝廷的默许。^[1]苏轼改革衙前之役再次表明在凤翔境内有大型漕运码头，也印证了秦穆公“泛舟之役”事件的真实性，可见至少在宋代以前，汧河流域水流较大，漕运发达，汧河谷道也成为陇西至长安乃至东方货物运输的首选要道。

此外，孙家南头村南相邻的“马道口村”，村南亦有村名“官路沟”，也正好位于汧河谷道内，从村名来看，此道可能就是古时官道，孙家南头村和马道口村一带极有可能为古代一个重要的交通道口。与此道有关联的还有地处太昌村汧河西岸的通天河与晾经寺，晾经寺侧有一片空地，相传是唐代高僧玄奘取经回京时晾晒经书之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后传》就曾在此取景拍摄。千阳境内的汧河北岸也有一处晾经台，传说亦为唐僧晾晒经书处，南岸还有九妖十八洞，为传说中的妖精住处，与《西游记》中的故事接近。凤翔县田家庄镇寺头村境内也有一处晾经寺，《丝绸之路漫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300年前，唐玄奘西行取经，也真是在天水僧人孝达陪同下，离长安，翻陇山，抵达秦州的。”玄奘是不是真的从此经过，就无法考证了，但这些晾经寺的存在，与玄奘取经的路线必然有着某种的联系。

二、长安—雍城—陇州道

长安—雍城—陇州道（陆路）较汧河谷道开通稍后。西周时称西方干道、西方大道，西汉称长安高平道。具体走向为：由长安出发，经今咸阳、礼泉、乾县、扶风、岐山、今凤翔、千阳、陇县，之后入甘肃境（图5）。唐宋以后，长安—雍城—陇州道走向变更为：由长安出发，经今咸阳、兴平、武功、扶风、岐山、经凤翔、千阳、陇县入甘肃境内。从周秦至明清，长安—雍城—陇州道是历朝京都通往陇西、西域的主干道之一，在历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久负盛名的丝绸之路的溯渭道。秦穆公伐戎、秦始皇加冕和秦汉多位帝王至雍祭祀、唐代高僧玄奘西天取经和文成公主入藏联姻就行经此道。这条道路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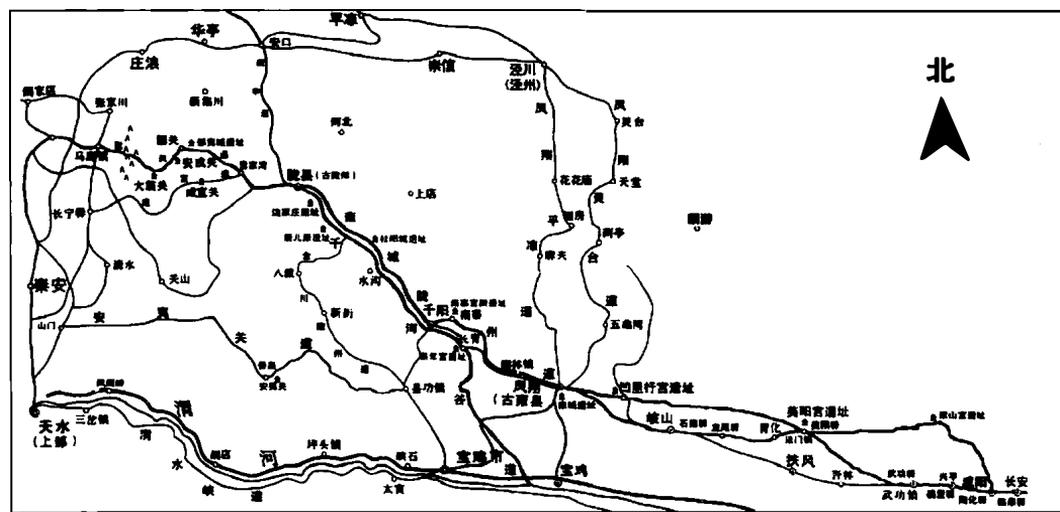


图5 长安雍城陇道示意图

沟通世界东西方两大文明的重要路段和加强西北边防的重要战略通道，对于社会的安定与历史的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具有深远的意义。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穆公三十七年，发动了一次较大规模西征，“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过贺穆公以金鼓。”秦在西方的霸权得到了周王室的承认。所谓“益国十二”，《史记·匈奴列传》中作“八国服秦”，《李斯列传》作“并国二十”，《文选·卷三九·李斯上秦始皇书》中作“并国三十”。总之，通过这场战争，秦人取得了西北地区的实际控制权。《汉书·韩安国传》说，“秦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时宜之变，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国十四，陇西、北地是也。”秦国这一战略胜利，使西北地区成为秦后来向东方作战的大后方，秦穆公的成功显然是以陇山通道的畅通为基础的。^[12]从此，关中至陇西的陆上通道得以打通畅行，为长安—雍城—陇州间的通行便利奠定了基础。也就是在此时，一部分戎人逃往西亚和欧洲，使“秦”这一称谓早在公元前四、五世纪就被西方国家所闻名。古代印度、罗马等帝国的人，均尊称中国为Cina、Thin、Sinae，译成中文即为支那、希尼、震旦、至那、脂那（后四种都是“支那”的异译）等，这些名称都是“秦”的外文对应发音。^[13]此外，在考古发现的公元前5世纪巴泽雷克（今俄罗斯乌拉干河畔）古墓群和公元前4世纪前后在中亚、印度等国的古墓中，都发现有精美的中国丝绸残片，甚至出土了绣着凤凰图案的中国丝绸。从现在所掌握的考古材料和文献资料来看，这些中西方文化间彼此的联系，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就已经产生，早在人类开始使用文字、出现国家、步入文明之前，它们之间的交往、联系已经不同程度的存在了。

长安—雍城—陇州道的开通与秦汉时代帝王西行效祀有关，所以，这条道路沿途建有多处的帝王行宫，如咸阳阿房宫和咸阳宫、兰池宫，乾县梁山宫，周至长杨宫和五柞宫，眉县成山宫，扶风高泉宫和美阳宫，岐山李家道行宫，凤翔四里行宫和蕲年宫、襄泉宫、来谷宫、竹泉宫，千阳走马楼行宫和尚家岭行宫，陇县汧邑行宫和回中宫等，均分布于此道沿途各地。此道开通后，长安、雍城与陇西一带的商贸往来也日渐频繁，《史记·货殖列传》载：“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

唐朝时期，国力逐渐强大，漠北的突厥被打败后，东西方的贸易往来比汉代更加频繁。一般所谓的“丝路黄金时代”，主要是指唐代前期的陆上丝路。时至“安史之乱”以前，陆上丝路发展到了高峰，形成了自汉以来东西陆路交通的极盛高潮，亦如《全唐文·卷六·讨高昌诏》所载：“伊吾之右，波斯以东，商旅相继，职责不绝。”而丝绸之路南线长安至陇山段一直是主干道路，为当时陆路交通最繁忙的交通要道之一。

唐宋时代长安—雍城—陇州道的兴盛与驿路有关，这条道沿途建有多处驿站，如长安临皋驿（今西安市莲湖区潘家村乡枣园村东南），咸阳陶化驿、兴平槐里驿、武功县驿、美阳驿（今扶风法门镇），岐山石猪驿、龙尾驿，凤翔岐阳驿、凤鸣驿，千阳驿，陇县在城驿。1986年出版的《公路交通编史研究》（第4期）对唐蕃古道的走向说，“其主干道大致是：从长安出发西行，越陇山经今天水、陇西、临夏，在炳灵寺附近渡黄河入青海”。金城公主入藏，唐中宗亲率大臣送到距长安百里的兴平，其行色必壮，所经道路进一步开拓无疑。唐两公主进藏，使“丝绸之路”的使吏往来更加频繁。唐代诗人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一诗中有“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的诗句，记叙了唐代长安—雍城—陇州道的繁忙与兴盛。

北宋以后，长安—雍城—陇州道逐渐衰落。明清时期，官驿改行长安—兰州—泾州—平凉—萧关线路。

（一）秦汉时代长安—雍城—陇州道沿途离宫别馆

1. 阿房宫

阿房宫位于今西安西郊15公里的阿房村一带，始建于公元前212年。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其规模之大，劳民伤财之巨，可以想见。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继续修建。唐代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写道：“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可见阿房宫确为当时非常宏大的建筑群。今阿房村南附近，有一座大土台基，周长约310米，高约20米，全用夯土筑起，当地人称为“始皇上天台”。阿房村西南附近，夯土迤邐不断，形成一长方形台地，面积约26万平方米，当地称为“郾坞岭”。这两处地方是阿房宫遗址内最显著的建筑遗迹。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地考察，确认秦阿房宫遗址建筑规模和保存完整程度在世界古建筑中名列第一，属世界奇迹和著名遗址之一，被誉为“天下第一宫”。

2. 乾县梁山宫

乾县梁山宫位于乾县县城以北9.5公里处的瓦子岗上，地处吴店乡与梁山乡交界处，为一和缓的龟背形台地。秦文化遗存。南北长1800米，东西宽1000米。遗址南部现存一高大的夯土台基，东西底边长37.5米，南北底边长25米，高5米，台下有大面积的夯土层。曾先后出土龙纹空心砖和龙凤纹空心砖4件，色彩绚丽的卵石数十立方米。现存遗址留有大量散水石、整修地面的专用砺石、秦筒瓦、板瓦块等。瓦外施有绳纹和抹光带，内施涡点纹。还发现有素面半瓦当、云纹瓦当和葵纹瓦当。梁山宫是秦的一座重要行宫，这里既是历史上有名的宫廷事件发生地，又是秦御匈奴的重要指挥部，也是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后的重要决策场所。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始皇帝幸梁山宫”，《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曰，梁山宫“俗名望山宫，在雍州好畤县西十二里，北去梁山九里”。所载地望与遗址完全吻合。又有《啸堂集古录》中载：“梁山宫，元康元年（前65）造”，说明此宫为汉代所沿用。

3. 周至长杨宫

周至长杨宫位于今周至县终南镇东竹园头村西50米，占地面积约2万平方米，遗存建筑台基高约3米，文化堆积层厚0.5~1.5米，遗址内曾发现“禁圃”“克乐未央”及“宫”字朱雀纹、朱雀纹、玄武纹、羊角形双云纹、花瓣形云纹等纹饰瓦当。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长杨宫遗址一直是竹园头村生产队取土的土场，遗址借被夷为平地。据《三辅黄图》记载：“长杨宫，在今周至县东三十里，本秦旧宫，至汉修饰之……备行幸。”《汉书·地理志》注：周至县“有长杨宫，有射熊馆，秦昭王起”。因宫中有垂杨数亩，故名。《小校经阁金文》记载有长杨宫鼎，应是长杨宫宫中之物。《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载：“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扬雄曾经写《长杨赋》讽谏汉成帝游猎于长杨宫。

4. 岐山李家道行宫

岐山李家道行宫位于岐山县凤鸣镇李家道村南，遗址面积约1万平方米，发现有夯土基址、陶下水管道，采集到战国秦“双獾”“单獾”、云纹等瓦当，为一处秦汉时期的宫殿遗址。

5. 凤翔凹里行宫

凤翔凹里行宫位于凤翔县横水镇九龙村凹里，为一处史书失载的宫殿区，1986年，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进行了钻探，发现一条南北长约200米的地下排水管。采集到的鱼鸟纹、双獾纹、云

纹等战国秦瓦当和“长生无极”“大宜子孙”等汉代瓦当，可能是秦汉帝王的行宫之一，属秦宫汉葺者。

6. 棫阳宫

棫阳宫位于凤翔县城南，棫阳宫曾为秦始皇软禁其母处，关于此宫的位置，史学界曾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棫阳宫在扶风县境内。1962年考古工作者在凤翔县南古城东北、马家庄西北与豆腐村之间发现“棫”字残瓦当一枚。1982年在雍水河南岸的东社村西和东北角，采集到“棫阳”一枚，并发现了成片的夯土和战国图案纹瓦当。《汉书·苏武传》载：“从至雍棫阳宫”，《小校经阁金文》中也有“雍棫阳宫共厨鼎”，大连市旅顺博物馆藏有一件铸有“棫阳宫铜鼎”铭文的铜鼎。可见，棫阳宫应在雍城境内。《汉书·文帝纪》载，文帝“二年夏，行幸雍棫阳宫”，说明此宫在汉时继续修葺沿用。关于“棫”字，许多专家有不同的解释，今凤翔县田家庄镇有西劝读村，西劝读村座落于北山（棫山）南麓的原地上，南临源于棫山的横水河北岸，曾发现众多鬲、罐等陶片和带有灼痕的卜骨，与西劝读村相邻的玉祥村和大塬村也曾发现许多历史遗迹。1973年，当地农民在遗址南平整土地时曾发现用多边形石块聚拢一起的遗址数处，上部铺置平整，下面夯筑密实，平面呈圆形，直径约1米，与扶风召陈村西周遗址发掘的柱础石相当。考古专家认为此处曾为一大型建筑物，属于宫室、庙寝一类的建筑。在该遗址西约1公里的河北村北部，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处西周墓地，曾出土了多件饗饗纹鼎、夔龙纹簋等铜器，著名的西周重器对盨就出土于此处。根据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推测此处遗址为莫（郑）国所在地，后为郑桓公始封的都邑之故地，也有人认为此地可能就是棫阳宫的建造地。

7. 年宫

年宫位于凤翔县城南，在典籍中没有任何记载，1962年曾在南古城东北、马家庄西北与豆腐村之间发现“年宫”瓦当一枚。1982年在雍水河南岸的东社村西和东北角，采集到“年宫”瓦当一枚，并发现了成片的夯土和战国图案纹瓦当。有学者认为年宫可能为蕝年宫的省略简写，但从年宫瓦当的出土地点来看，此地有战国到秦汉时期的建筑遗址，年宫应该与这一建筑遗迹有密切的联系。蕝年宫地点的确定更加有力地证明两者并非一处宫殿，年宫应为一个史籍失传的秦汉宫殿。

8. 蕝年宫

蕝年宫位于凤翔县长青镇，建造于战国中期的秦惠公时期（约公元前490年），是秦惠公为祭祀后稷、祈求丰年而修建的专用建筑。一直沿用到汉代，是秦汉时期天子祭祀五时和先王斋宿场所。蕝年宫遗址位于凤翔县长青镇孙家南头村，属于千河东岸的二层台塬。遗址保护范围约2万平方米，是一处极为典型、保护较完整的秦汉宫殿基址。蕝年宫是秦代有名的宫殿。关于它的地望史书记载说法不一。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孙家南头村堡子壕一处台地上采集到的“蕝年宫”“囊泉”“来谷宫当”“竹泉宫当”“长乐未央”“云纹”“太阳纹”等瓦当，还出土了陶制排水管、空心回纹砖等文化遗物，证实了蕝年宫遗址就在孙家南头村堡子壕的说法。

9. 囊泉宫

囊泉宫位于凤翔城西长青镇。泉宫与蕝年宫的关系、位置和建筑时间，史籍记载有许多分歧。《史记·秦本纪》载：“三十九年，缪公卒，葬雍”，《集解》引《皇览》曰：“秦缪公家在囊泉宫蕝年观下，”明确指出囊泉宫与蕝年观（宫）建在一起，而且蕝年观（宫）是囊泉宫的一个部分。《史记·秦本纪》同条记载下《正义》引《庙记》又云：“囊泉宫，秦孝公造。蕝年观，德公起。盖在雍州城内”，说明两宫是各自独立的建筑物，而且修建的时间也不相同。《史记·秦始皇本纪》亦载：“九年……将欲攻蕝年宫为乱。”《集解》云：“蕝年宫在雍。”并从《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雍县“囊泉宫，秦孝公造。蕝年观，德公起”的说法。《长安获古编·卷二》载囊泉铜鎛铭文云：“囊泉铜鎛一斗，重三斤，元康元年造。”又载囊泉宫铜鼎铭文：“雍囊泉宫鼎盖一，容二升，重一斤八两，名百二，杜阳五十四斤十四两。”《小校经阁金

文·卷八》载有囊泉宫灯铭文：“囊泉铜灯，重一斤十二两，元康二年考工孺监省。”元康为当宣帝年号，通过薪年宫的考古发掘和这些史料记载分析，现在一般认为，薪年宫起于秦孝公，新起的囊泉宫与薪年宫建在一起，并薪年宫成为它的一部分，而这两座宫殿的位置是在雍城西南的长青镇孙家南头村堡子壕的台地上，从战国中期一直延用到西汉后期。与此同时，考古工作者还在遗址附近发现了一口古泉，水质甘甜，四季常涌，可能为史书中记载的“囊泉”。

10. 千阳尚家岭行宫

千阳尚家岭行宫遗址位于千阳县南寨镇冯家堡村尚家岭南300米的坡边，地势北高南低，呈阶梯状。遗址东为涧口河，西、南临千河，北为尚家岭。遗址南北长约400米，东西长约300米，面积约120 000平方米。遗址北部断面上见有夯土，东西长约23米，高0.9~1.5米，夯层厚度5厘米，采用平夯，夯土坚硬。断层上暴露有厚约0.4米的文化层，内含较多的建筑材料残片。地表堆积有大量半圆形素面瓦当残片、云纹瓦当残片、残瓦片、残屋脊瓦等残片。尚家岭遗址规模大，内涵丰富，是千阳地区罕见的战国、汉代遗址，对于研究宝鸡地区战国和汉代建筑及发展有重要价值。

11. 汧邑行宫

汧邑行宫汧邑为春秋时期秦国的临时都城，为秦人东进关中时重要的军事据点，为陇关道的开通奠定了重要基础。关于汧邑的具体位置，《括地志》云：“故汧城在陇州汧源县（今陕西陇县）东南三里。《帝王世纪》云：“秦襄公二年徙都汧，即此城。”近几年，考古工作者在陇县东南乡边家庄发现了一处范围较大的春秋墓区，先后发掘墓葬33座。其中五鼎四簋等级的8座，三鼎二簋等级的3座，表明这是一处等级较高的秦贵族墓地。根据陵随都移的基本规律，考古工作者判定在其附近可能有与之相对应的城邑居址。后来又经考古工作者踏查，确在边家庄东南3里处的磨儿原发现一处时代与边家庄墓地相当的城址，认定这个城址当是文献中所记载的“襄公二年徙都汧，即此城”所指者。磨儿原遗址位于边家庄墓地东南5里，与后者处于汧河西岸同一片台地上。遗址东濒汧河，南临川口河。两河交汇的塬地当即汧邑城址，汧城原有大小，尚不清楚，在东南部的台地断崖上可以见到部分夯土城墙。其中东墙的南段保存约百米，南墙的东段保存约200米，东南角亦保存了部分残墙，残墙高1~2米不等。残墙上可以看到的夯层一般厚10厘米左右。采集到的器物除春秋早期的罐、鬲等残片外，还见有战国时期的陶盆残片、“千秋万岁”瓦当和素面半瓦当及内饰麻点外饰绳纹的板瓦、筒瓦、空心砖等建筑材料残片，说明这一城址曾有较长的使用时间。^[14]

（二）唐宋时代长安—雍城—陇州道沿途驿站关口

驿站是古代供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驿站分驿、站、铺三部分。驿站是官府接待宾客和安排官府物资的运输组织；站是传递重要文书和军事情报的组织，为军事系统所专用；铺由地方厅、州、县政府领导，负责公文、信函的传递。从长安、雍城到陇州沿线，驿、站、铺林立，至今西宝北线沿途乡村仍保留着十里铺和xx铺等名称，见证了当时驿路繁忙的景象。

1. 临皋驿

临皋驿唐长安西行第一驿站。西去河西、西北至朔方，西南往剑南道路均由此出。隋已置，位于长安城；西开远门外小严村附近（今陕西西安莲湖区潘家村乡枣园村东南），西有磁门驿、管城驿等。唐代公私宴饯多聚于此。《资治通鉴·卷二六二》载天复元年（901）条，李茂贞遣车驾至凤翔，朱全忠西讨，“至长安，宰相率百官迎于长乐驿。明日行，复班辞于临皋

驿。”《旧唐书·韩愈传》亦载：“（唐宪宗元和）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宫人三十人，持香花，赴临皋驿迎佛骨。”

2. 磁门驿

磁门驿是唐长安西去道上驿站。位于汨水之南，咸阳、长安间，东有临皋驿。《水经注》中载：“（镐）水北经汉灵台西，又经磁石门西。门在阿房前，悉以磁石为之，故专其目。”《旧唐书·回纥传》中记载了乾元元年（758），宁国公主远嫁回纥可汗，唐肃宗亲自送“至咸阳磁门驿”，宁国公主在和肃宗分手的悲壮情景。

3. 杜邮馆

杜邮馆是唐长安西行道上的驿站，在陕西咸阳县东（今渭城区渭阳乡任家嘴东），又名孝里亭，此地为白起自杀处，建有白起祠。郦道元《水经注》中载：“渭水北有杜邮亭，去咸阳十七里，今名孝里亭，中有白起祠。”《水经注》述“魏尚书左仆射王琰征蜀所开”之成国故渠时，又引《地理志》：“渠侧有杜邮亭”。诗人胡曾又诗《杜邮》感叹道：“自古功成祸亦侵，武安冤向杜邮深。五湖烟月无穷水，何事迁延到陆沉。”唐汪遵《杜邮馆》云：“杀尽降兵热血流，一心犹自逞戈矛。功成若解求身退，岂得将军死杜邮。”

4. 陶化驿

陶化驿是唐长安西去道上的驿站，在咸阳县（今陕西咸阳市东北）郭下，故又称咸阳驿、渭城驿。东去长安20公里，东南10公里至临皋驿。

5. 咸阳县驿

咸阳县驿唐长安西去道上的驿站，在咸阳县（今陕西咸阳市东北）治。

6. 望贤驿

望贤驿又称望贤宫，唐长安西行道上的驿站。《旧唐书》中述：天宝十五载（756）玄宗西幸，“至咸阳望贤驿置顿，官吏骇散，无复储供”至德二载（757）自蜀返，肃宗自望贤宫迎。上海博物馆所收藏的南宋名画《望贤迎驾图轴》，描绘的就是唐安史之乱后，唐肃宗在陕西咸阳望贤驿，迎接由蜀归来的太上皇李隆基的故事。

7. 温泉驿

温泉驿是唐长安西行道上的驿站，位于咸阳县（今陕西咸阳市东北）西。

8. 槐里驿

槐里驿是唐长安西行道上的驿站，位于兴平县（今名同）郭下。

9. 兴平县驿

兴平县驿是唐长安西行道上的驿站，位于兴平县（今名同）治，一说即槐里驿。

10. 马嵬驿

马嵬驿是唐长安西行道上的驿站，位于今陕西兴平市西马嵬镇，西为望苑驿。安史之乱中，玄宗幸蜀，至该驿赐杨贵妃自缢，故唐人多有题咏。

11. 望苑驿

望苑驿是唐长安西行道上的驿站，西为武功县驿。温庭筠《题望苑驿》原注：“东有马嵬驿，西有端正树。”

12. 武功驿

武功驿是长安西行道上的驿站，在武功县境（今陕西武功县武功镇）。

13. 龙尾驿

龙尾驿是唐长安西行道上的驿站，属岐州（治在今陕西凤翔），温庭筠有《龙尾驿妇人图》诗。

14. 石猪驿

石猪驿是唐长安西行道上的驿站，位于岐山县（今名同）治。《旧唐书·地理志》载，武德七年（624），岐山县“移治龙尾城，贞观八年（634）移治猪驿南，即今治所是”。

15. 凤鸣驿

凤鸣驿是宋代在凤翔设置的，清代称岐阳驿，在凤翔县城东大街现工业体制改革办公室址，后移到县城西大街县署西。北宋苏东坡任凤翔府签书判官时曾作《凤鸣驿记》^[15]。

16. 柳林铺

柳林铺是唐仪凤年间，吏部侍郎裴行俭，沿丝绸之路送波斯王子回国，行至雍县柳林铺（今凤翔境内柳林镇亭子头村附近）时，忽见路旁蜜蜂和蝴蝶纷纷坠地，遂命郡守查访缘由，方知为附近村落一坛新开启窖藏陈酒的香味所致，使十里之内的蜂蝶闻酒皆醉，卧地不起。凤翔郡守即将这坛美酒馈赠裴公，侍郎官饮后欣喜，即兴吟诗一首：

“送客亭子头，蜂醉蝶不

舞。三阳开国泰，美哉柳林酒。”《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八》亦有“仪凤三年，令吏部侍郎裴行俭将兵册送卑路斯为波斯王”的记载。亭子头村为古丝绸之路行经凤翔的实物例证（图6）。



图6 凤翔县柳林镇亭子头村

17. 分水驿

分水驿是唐长安西行道上的驿站，在大震关西50里小陇山分水岭。《元和郡县图志》：“小陇山，一名陇坻，又名分水岭。”

18. 陇关

长安—雍城—陇州道在今陇县境内因陇山天堑阻隔而称为陇阪道，又称为陇关道、陇道、逾陇道、陇山道、秦汧道。陇山又称陇坂、陇坻，南北走向，是关中平原与陇西高原的分界线，在古代也曾是中原地区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分界线。^[16]《通典·天水郡》载：“郡有大坂，名曰陇坂，亦曰陇山”，《读史方輿纪要·卷五十二》载，陇坂“山高而长，北连沙漠，南带千渭，关中四塞，此为西面之险。”陇山为六盘山南延之余脉，海拔高度在2000米左右，自宁夏南部向南延伸经甘肃平凉地区，直至陕西宝鸡以西的渭河北岸，与秦岭西段群峰夹渭对峙，闭合了八百里秦川的平原旷野，成为中原通向西域的第一道天然屏障。东汉初此段道路已明确称陇道，《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六年夏四月，“遣虎牙大将军盖延等七将军从陇道伐公孙述。”位于道中的固关镇，古名新关集，汉唐时置有关隘，驻兵把守，后在该镇置大寨巡检司、关山营，设游击都司，把总驻守。固关镇西南就是著名的大震关。

19. 大震关

大震关位于陇县西50公里的固关乡关山顶东坡洪家滩，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关隘，承担着丝绸之路畅通的重要职责。大震关前方有两道峡谷，一条通秦家源，一条通老爷岭。其中通往老爷岭这条峡谷段是民国时期在古道基础上改建的风陇公路，上山段为汉唐古道，当地人称

“马道”。从现在保留下来的路段来看，汉唐时期的关山古道，在峡谷内主要是沿河岸台地而行，然后在接近山脊时盘旋而上，巧妙地将一些小溪冲击平台连接起来，既形成了多处错车道，又可使路线在不断的缓冲中上行。这些道路多用巨石砌坡，条石铺筑路面，宽度一般在3~4米，弯道半径一般在5~13米，在一些巨石挡道的地方，当时还运用热胀冷缩的原理，先在巨石上堆柴烧火然后迅速浇水冷却，以此在巨石上炸出裂缝再凿出车道，从而使这条路成了西出的主要通道。汉初在此设关，因地处陇山，故名陇关。汉太始二年（前95），汉武帝刘彻巡行回中，经陇关（今陇县固关乡洪家滩），因遇雷震，故改陇关为大震关。北周天和元年（566），改名大宁关，隋代复名大震关。西汉末年，王莽置四关（东函谷关、西陇关、南武关、北萧关）将军，遣右关将王福守此关。东汉建武二年（26），大司徒邓禹战赤眉义军于陇山。唐武德五年（622），突厥入侵原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攻陷大震关。天宝十五年（756），大震关使郭英义在此斩安禄山使高嵩。广德元年（763），吐蕃入大震关，尽取河西、陇右之地。大历三年（768），凤翔节度使李茂真部将李晟率兵五千，出大震关，破吐蕃于临洮。

20. 安戎关

安戎关位于陇县西40公里的固关乡关山沟二桥，为丝绸之路支道上的一处重要关隘。唐大中六年（852），陇州防御使薛逵奏“……伏以汧源县西境切在故关，昔有堤防，殊无制置，僻在重岗之上，苟务高深。今移要会之中，实堪控扼。旧绝井泉，远汲河流；今则临水挟山，当川限谷，危墙深堑，克扬营垒之势，伏乞改为安戎关……”自薛逵徙筑安戎关于陇山下后，大震关称故关，安戎关称新关。安戎关与大震关相距10余公里，同为关防戎守处。因安戎关在陇关道上所起的作用与大震关相同，故新关的修筑从某种程度上代替了旧关，所以后人习惯上也称安戎关为大姐关。^[17]此地两山对峙，当川限谷，形势险要，为逾越陇山西行的要道。后唐高祖乾祐元年（948），王景崇叛乱，以凤翔附蜀。蜀将韩保贞赴援，出新关，屯军陇州。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金兵逾陇关，攻取秦、巩诸州。明初徐达克陇州逾陇关。

（三）长安—雍城—陇州道沿途的重要城邑

城邑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停留驿站和货物交易场所，是丝绸之路兴衰的重要标志之一。城邑的发展兴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丝绸之路兴盛与变迁。特别是雍城、汧渭之会、汧邑等秦人早期的都城，秦人在不断东进的过程中，开辟了关中与陇西和西域各地交流的通道，为丝绸之路的开通和畅行奠定了基础。

1. 咸阳

咸阳位于陕西省八百里秦川腹地，渭水穿南，宗山亘北，山水俱阳，故称咸阳。咸阳东邻省会西安，北与甘肃接壤，是我国中原地区通往大西北的要冲，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帝国秦王朝建都于此，号称“华夏第一都”，先后为周、汉、唐等13个朝代的京畿之地，是古丝绸之路的第一站。古时，咸阳北有关中通往河西走廊的泾河谷地，南扼渭水漕挽天下，西通陇西，东处泾渭交汇地带。左扶崤函，右控陇蜀，战时为兵家必争之地。渭水于此折向东北，构成关中西东大道的分界线，自古中原和长安来往于川、甘、青、宁、新各地者，均由此处渡渭，咸阳成为西出阳关，北上萧关，东至长安，直抵中原的交通枢纽。

2. 兴平

兴平北依莽山，南临渭水，与周至县隔渭河相望。封建王朝曾两次在兴平建都：一次是西周第七个皇帝周懿王二年（前908），把国都由镐京迁到犬丘（今兴平城南的南佐村）；一次是

楚汉相争时，项羽封章邯为雍王，王都设在废丘（今址同上）。汉高祖三年（前204）始置槐里县。唐中宗养女金城公主。神龙三年（707），吐蕃赞普遣使请婚，中宗许嫁给吐蕃赞普尺带珠丹。景龙四年（710）春，吐蕃遣使迎公主入藏，中宗亲送至始平（今陕西兴平），赠以锦缯、杂伎百工和龟兹乐，命左卫大将军杨矩持节护送至吐蕃，赞普为其另筑城居。唐“安史之乱”爆发后此地置“兴平军”，因该军平叛安史之乱有功，故于至德二年（757）以该军之名命名为兴平县，取“兴旺平安”之意，县名沿袭至今。

3. 武功

武功东迄兴平，西邻杨凌、扶风，北接乾县，南隔渭河与周至县相望，地势平坦开阔，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是关中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建县始于秦孝公十二年（前350）。王莽新朝天凤二年（15），改为新光县。东汉初，废入眉县。永平八年（65），复置武功县。北魏太和十一年（487）置武功郡。建德三年（574），废郡设县。五代后晋时，置武功郡，后周改郡为县。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改县名为武亭。元代复名武功县。

4. 眉县

眉县地处秦岭主峰太白山下，行政区域横跨渭河两岸。最早为西周部落发祥地之一，与邻县扶风共称“邠国”。公元794年，秦庄公在此筑邑，因地形似眉而取名“眉邑”。东汉末年权臣董卓在境内筑眉坞城堡，故又称眉坞。

5. 扶风

西汉时扶风此地为京官右扶风的封地，唐时借汉官名作县名沿用至今。位于扶风岐山交界处的周原遗址，是古周人早期都城岐邑所在地，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了2枚古代西亚人形象的蚌雕人头像，其中一件高2.9厘米，头戴尖状护耳翼帽，上刻等距离竖线条，帽顶平，面部颧骨隆起，额和颊巴窄小，长头形，高鼻深目，薄唇无须，鄂下锯平，中间有孔。^[16]它为古代中西文化的交流的实物例证。不管这种蚌雕头像是周人制作，还是中亚游牧部落献给周王朝的贡品，都说明早在张骞开通丝绸之路前，中西文化交往就已经开始。

6. 岐山

岐山因境内东北部的箭括岭双峰对峙，山有两歧而得名，始建于隋开皇十六年（596）。它是周王朝发祥之地，从周太王迁岐到周平王东迁，近400年间，岐山一直是西周的中心。岐山境内有周公庙、凤雏遗址，并出土大量周朝文物，以青铜器最为著名。

7. 陈仓

陈仓古称西虢，位于陕西关中西部，“关陇其西，盆门扼其南”，“跨枕陇蜀，扼塞西门”，自古就是秦地通陇通蜀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周文王母弟虢仲在此封地西虢；秦武公（前687）设虢县；秦孝公（前361）设陈仓县；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因闻陈仓山有“石鸡啼鸣”之祥瑞，改称宝鸡县。2003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陕西省宝鸡县，设立宝鸡市陈仓区。

8. 宝鸡

宝鸡古称陈仓，是华夏始祖炎帝的故乡，周秦王朝的发祥地，素有“炎帝故里、青铜器之乡、佛骨圣地、民间美术之乡”的美誉。唐至德二年（757），因市区东南鸡峰山有“石鸡啼鸣”之祥兆而改称宝鸡。地处陕、甘、宁、川四省（区）结合部，是连接中原与西北、西南的交通要塞。

9. 凤翔

凤翔古称雍，是成周兴王之地，嬴秦创霸之区，历代州、郡、府、路之治所，关中西部重镇。凤翔境内古道纵横交错，自古即是关中西部重要的交通枢纽。古人以“南控褒斜，西达伊凉；岐雍高峙，千渭争流”来形容凤翔当时交通的便捷以及地理位置的重要。特别是在我国以长安为国都的时期，凤翔一直是关中的西大门，是南通汉中、四川直至湖广的必经之路，西北

通甘肃宁夏的主要道口，古丝绸之路重要驿站。公元前9世纪，擅长畜牧、狩猎的秦人又开辟了雍城至千县（今陇县）的道路。秦穆公时伐西戎“益国十二，拓地千里”，开辟了雍城至狄道（今临洮）的道路。特别是作为秦国都城期间，雍城与周边各国交通道路日益通达。唐代时雍城虽已不再是国都，但由于战乱，作为都城的西大门，雍城又出现了往日的繁荣。此间，玄宗、肃宗、德宗、僖宗、昭宗等五位皇帝均西行幸驾凤翔，凤翔一度称“西京”“西都”。

10. 千阳

千阳因在汧山之阳而得名。汉高祖二年（前205）置县隃麋（今千阳县城东郊千川村），西晋撤隃麋并入千县，北周天和五年（570）复置千阳县。商周时期“安夷关道”，秦代“回中道”，汉代以后的“丝绸之路”均通过汧河谷地。汧河川道及沟谷为西出长安经雍城南达北往的重要通途。旧志曰：“南临汧水，北倚冯河。五里坡蜿蜒于左，月曲山盘踞于右。山岭重复，溪涧险阻。”

11. 陇县

陇县古称陇州，因地处陇山东坂而得名，为西疆军事重镇。因为陇山天堑的阻隔，便陇县地理交通位置显得非常重要，成为关中连接西北的重要通道和关隘。陇县帝辛三十四年（周武王四年、公元前1043年），西部羌人就经陇关道东下，参与周武王伐纣来商牧野之战。春秋时，秦文公东猎，开辟了陇西到关中的通道，秦襄公时秦人东进关中，在此建“汧邑”。秦穆公翻越陇山西征后，陇县与关中的交通联系更加频繁。秦朝回中道开通，与陇坂道相连，沟通了关中与西北直至中亚和欧洲的联系，陇县遂成为丝绸之路的要隘。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沿陇坂道西巡，至陇西郡（今甘肃临洮），经回中道返回咸阳。1981年，陇县城关公社祈家庄生产大队曾出土一件汉代铜钁，上面为盆形，下面有人形之足。这件铜钁通高13.5厘米，重1.85公斤，人为立状，圆脸，尖下鄂，宽眉深目，阔嘴高鼻，专家一致认为此为胡人形象，为研究汉王朝与西域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此外，在陇县的城关乡北坡村、县砖厂、东南乡党家庄、杜阳乡糜家河村、温水乡阎家湾村等地均还出土了唐代彩绘陶俑镇墓兽等文物，其中大多有胡俑，且多数有彩绘，造型精美，形态各异，为陇县一带唐代时与西方各民族文化贸易频繁交流的重要实物例证。

三、长安溯渭水至陇山段——古丝绸之路支线便道

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相互交流、联系的纽带和桥梁，它不单是一条单纯贸易运输的道路，而且也是一条东西政治、经济、文化互动的大动脉；它也不只是一条路线，而是由一个庞大的交通运输网构成。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走向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自然地理、人文环境的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丝绸之路的走向也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同时一些新的区段道路也会逐步形成。《后汉书·隗嚣传》记载了陇山防线的攻守：“（建武）八年春，来歙从山道袭得略阳城。（隗）嚣出不意，惧更有大兵，乃使王元拒陇坻，行巡守番须口，王孟塞鸡头道，牛邯军瓦亭，嚣自悉其大众转来歙。公孙述亦遣其将李育、田弇助嚣攻略阳，连月不下。帝乃率诸将西征之，数道上陇。”可见当时克服陇山天险确有“数道”相通。长安溯渭水至陇山段较常通行的丝绸之路支线便道有以下七条。

（一）陈仓狭道

又称渭水狭道，主要指宝鸡以西、天水以东渭河流域的狭长古道，即从今宝鸡市沿渭河南

岸西行，经峡石、六川河、车辙至城隍庙，或从今宝鸡市出发，经太寅、甘峪、晁峪、坪头或码头，到城隍庙，然后再经灵宝、香泉、赤沙、通河、拓石到三岔城（吴砦），渡东岔河直通上邽。此段道路为水陆并用，但由于水道数段狭窄，两岸山崖险峻，导致其通行能力效果不佳。渭河峡谷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8000年以前，古代先民就在陇山腹地的渭河两岸生活和居住，^[19]直至宋元明的各个历史时期，代表人类活动的文化遗存未曾间断过。既然有人类活动，就必然有交通。当然这条通道虽然险峻，但从军事上考虑，却较隐蔽，而且捷径。拓石村东西两端的古代栈道就是这种交通背景的证明。文献记载最早在东汉后期的建安十九年（214），当时占据北方的曹操曾派关中的夏侯渊讨伐马超，平复氐、羌、胡的反叛，其先锋张郃，就是从该道急入陇右的。《三国志·夏侯渊传》载：“十九年，赵衢、尹奉等谋讨（马）超，姜叙起兵卤城以应之。衢等谲说超，使出击叙，于后尽杀超妻子。超奔汉中，还围祁山。叙等急救，诸将议者欲须太祖节使。渊曰：‘公在邺，反复四千里，比报，叙等必败，非救急也。’遂行，使张郃督步骑五千在前，从陈仓狭道入，渊自督粮在后。郃至渭水上，超将氐、羌数千逆郃。未战，超走，郃进军收超军器械。渊到，诸县皆已降。”上述记载表明魏军的取胜就是利用了陈仓狭道的便捷，这一点与关陇干线“陇山道”颇有些不同，所以马超“未战”而走。所谓“狭道者”，是相对于“陇山道”而言。

位于陈仓狭道西端的吴砦，地势比较开阔，山势较缓，从这里南行可达麦积山，往西直至天水，因此河对岸的小镇又称三岔镇。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著名的松木板地图把这一带叫“燔史关”^[20]。此地分布着较为密集的石器时代、两周和汉代的文化遗存。1978年村民在火车站北的坡地上耕地时发现了青铜器，其中有蒜头壶、二十六年戈等。二十六年戈上有铭文“廿六年，□□守□造，西工室阝，工□。武库。”从此戈形制看，当作于秦昭王二十六年，“守”前二字当为“陇栖”，“西工室”当是秦都西犬丘的工官所造，隶属中央^[21]。此地附近还曾出土了一枚“魏归义氐侯”的金质魏印。这些出土实物证明，“陈仓渭水道”是一条往来于关陇之间的重要交通线，并且不断被后代加以利用。《宝鸡县志·卷二》载“西武当，北连吴山，洞开陡壁，飞阁悬楼，实为奇丽。”这处被称为“千佛山”的石窟遗迹，地处方唐铺附近，“铺”的地名往往与驿站有关，说明此处曾有道路相通。

宋代著名的抗金英雄吴玠也曾屯兵于此，以阻挡金人入陇进川，所以后人称之为“吴砦”。清初还曾在此设置“三岔厅”，驻以300军卒，备守要口。今拓石镇西侧的黄土台塬被称为官道塬，为古时官道从此经过而得名。此外，在这里发现的道路遗迹中，从密集的车辙痕迹判断出曾有古代车行道路的情景，与官道塬遗址中出土的大量文物相联系，则不难理解此道曾为历史上重要的官道。



图7 陈仓狭道示意图

（二）凤翔—平凉道

凤翔—平凉道即今凤翔县城西北方向经董家河乡张家店村，沿枣子河越老爷岭，入麟游县麻夫镇，北经酒房、中湖、花花庙入今甘肃灵台县境内百里镇，经盘口（今甘肃泾川县境内）到泾川，沿泾河至平凉。今麟游县酒房乡以北的山巅上仍有古代烽火台遗迹，麻夫镇唐时建有南北二寺，残留古钟一口毁于1958年“大跃进”中。^[22]或越老爷岭经千阳境内沈家十字、高涯、双庙、四十里铺达平凉，与丝绸之路北线相接。两线均长约160公里。凤翔—平凉道为凤翔通泾（今甘肃泾川）、原（今宁夏固原）的主要道路。北魏孝明帝武泰元年（528），关陇农民起义军首领万俟丑奴率军围岐州（今凤翔），左大都督贺拔岳率军迎击，万俟丑奴弃岐州，北走安定（今泾川）时行此道。唐末李茂贞在凤翔称岐王时，此道为通泾、原两地之主要道路。清代和民国时，商旅西来驮运皮毛、青盐、大麻、药材等在凤翔落庄，换驮京、津杂货和棉花、土布、白酒运至平凉，向陇东地区销售，就是行经此道。^[23]

（三）凤翔—灵台通道

凤翔—灵台通道即自今凤翔县城东北过狼沟桥，经萧史宫、竹园、上石佛寺顶，沿五曲湾到汤房庙，穿骆驼巷、大峡、越羊引关（古称羊峪关），经麟游县两亭、水磨沟过天堂到达甘肃灵台，皆沿河觅道，线型适顺。此道为古时甘肃陇东地区与凤翔相通的一条便道，与丝绸之路北线相接。麟游县天堂镇唐时建有规模宏大的佛殿，残留三尊金身佛像，现迁于河西“西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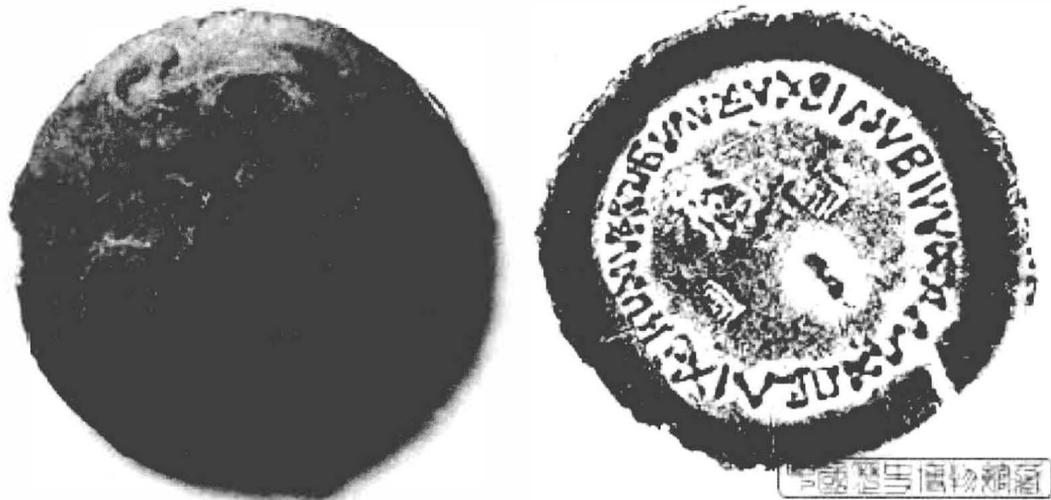


图8 灵台县出土的波斯铅饼

山”。羊引关曾建防卫设施，有楼名“望蜀”^[24]。道中凤翔境内北部山区有石佛寺和宝玉山庙，古时碑石颇多，今无存，为古时商旅停靠和求佛祈祷之处。凤翔北去灵台的古道上，1976年灵台县中台镇康家沟村枣树坪村民曾发现274枚波斯铅饼（货币），铅饼正面有似龙非龙、形状像蟠螭的浮雕，头有触角，背面阳铸外文一周，中有方形印记。^[25]这些外文铅饼为汉王朝时期中亚、西亚国家和中国的贸易货币，属古丝绸之路货币体系，可见汉代西域与西方联系频繁，商贸交流畅通，此物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佐证（图8）。

（四）回中道

回中道为逾陇通道中早期通道之一，为秦代修筑，因秦始皇曾行经此道而闻名，全线正式开通则在汉武帝时期。回中道南起汧水河谷，经汧县（今陇县），北出萧关（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东南），因道中有回中宫而得名，为关中平原与陇东高原间的交通要道。回中宫在萧关与雍县之间，其具体位置史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回中道沿途有多处烽火台遗址。^[26]公元前220年，秦始皇巡陇西（今甘肃省南部）、北地（今宁夏），出鸡头山（今甘肃省平凉崆峒山），过回中道，此路得到较好的修治。《史记·孝武本纪》载，汉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汉书·武帝纪》更具体地记载了“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此后，回中道全线畅通，并在道中设有亭障，派有专人修治，道名也随之昌扬于世。

回中道虽在西汉时贯通，但后来时有荒废。东汉建武六年（30），隗嚣起兵反汉，派大将王元占据陇坻，伐木阻塞回中道。建武八年（32），刘秀遣中郎将来歙领兵两千人，开山修路，从回中、番须口（陇县西）径袭略阳（今甘肃省秦安县东），击败隗嚣。《后汉书·来歙传》也记载了这段史实：“八年春，歙与征虏将军祭遵袭略阳，遵道还，分遣精兵随歙，合二千余人，伐山开道，从番须、回中径至略阳，斩嚣守将金梁。”建武九年（33），刘秀还亲率大军到汧县征剿隗嚣，隗嚣部将高峻投降。唐贞观四年（630）十一月十二日，太宗李世民西巡陇州，在鱼龙川（今火烧寨）狩猎，自射鹿，献于大安宫；^[27]二十年（646）八月，李世民再次越陇山，驻瓦亭（今秦安县东北），视察牧马，回中道得到进一步修治。

（五）金川陇州通道

为陇关道辅助路线，原为驮道，民国二年（1912），宝鸡县知事方大柱将此驮道创修为车路。具体路线为从今宝鸡市循金陵河北上，经陈仓区县功镇葫芦沟村经新街镇、车道、菜园进入陇县境内，越八渡梁、朝天岭至陇县县城。或由县功镇经箭舌关进入千阳境内，接陇坂道进入陇县。此道沿途山头至今仍有多座烽火台的残迹，烽火台的建造历史可追溯于西周时期^[28]。唐代时，杜甫就沿金川陇州道过陇州去秦州，并在《青阳峡》中写下了“昨忆逾陇坂，高秋视吴岳”的诗句^[29]。

金川陇州道上还有一处关隘名箭舌关，又名千阳岭、箭舌岭、大山梁，位于今陈仓区与千阳县交界处，一梁横呈，绵亘近百里，唯箭舌关处为一凹口，为古时交通要道，今宝平公路从此通过。历代此关多战争，后梁末帝贞明六年（920）十二月，蜀将陈彦威出兵散关，破岐王李茂贞15 000兵于此。宋绍兴元年（1131），金将没立方自凤翔攻宋兵于箭舌关，欲与别将乌鲁会合于和尚原（今宝鸡市西南），宋将吴玠遣杨政大破之。^[30]民国政府曾在此关傍山筑有碉堡，驻部队防守，以卫交通安全。

（六）咸宜道

咸宜道或称“长宁驿道”，是陇县境内通往西南方向的一条支道。开通时间较晚，为唐代以后的交通要道。道中有咸宜关，位于陇县西20多公里处，五代梁末帝贞明六年（公元920年），蜀使王宗俦将兵伐岐，出故关，壁于咸宜。绍兴四年（1134），宋金战争中，宋将吴玠、吴玠收复秦（今甘肃省天水市）、陇（今陇县）、凤（今凤县）三州时，以咸

宜关为屯兵之地。明代对此道进行改建，并在咸宜关设巡检司驻守，增置驿站，安戎关遂废为镇。据《陇县志》记载：“明正统时（1436—1449），因关山阻碍，改从咸宜凿山开道。”此道由今曹家湾沿咸宜河流经渠、三里营、咸宜关、长宁驿（今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到清水、天水。咸宜道开通后成为又一条径通秦（天水）、凤（凤翔）的通道，民国年间道衰人稀。

（七）安夷关道

南北朝时，宝鸡西部渭河北岸、陇山南麓有条东西通道称安夷关道。因北魏孝明帝于南由（峪）口（今陈仓区香泉街南）设南由县，又称南由路。《新唐书·地理志》载，陇州汧阳县郡吴山，“西有安夷关”，《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也说：“安夷关在（南由）县西一百四十六里。”据《虢县志》载，唐大中六年（852）三月，陇州防御夷薛逵奉诏旨，于州辖汧源县西筑“安夷关”，安夷关的设置是为了扼守南由路的畅通，故南由路又称“安夷关道”。薛逵奏文曰：“臣当界又有南由路，亦是要冲，旧有水关。亦请准前扼捉。”古南由当时为陇南重镇，安夷关亦为南由县重要关隘。今天陈仓区县石公路（县功—石家滩）县功至香泉段就在古安夷关道上修筑而成。前峪沟至大水川林区简易公路，再西行有山村小道直到山门镇（今甘肃省清水县），亦为安夷关道路基。安夷关道与放马滩地图第2块地图所标注的东北方向道路大致相近，^[31]这条路对于连结天水地区和宝鸡地区来说相当便捷，虽然无法通行车辆，但却避开了渭水峡谷和汧河峡谷。

四、古丝绸之路长安溯渭水至陇山段沿线重要历史遗迹

丝绸之路是历史上重要的经济大动脉，是古代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古丝绸之路沿线的众多历史遗迹和名胜古迹，为丝绸之路商贾云集之所和歇息之处，这些古迹大多因丝绸之路而兴，因丝绸商贾而名扬天下，与丝绸之路的兴衰与变迁有着重要的联系。

1. 郿城遗址

郿城遗址位于杨凌示范区揉谷乡法禧村，遗址区发现有灰坑，粗绳纹秦汉砖瓦、云纹瓦当、五角水管、刻有“郿”字铅记的秦代鼎和温壶等文物，并有铸铁作坊遗址、城墙遗址和秦汉时代的墓葬等。

2. 法门寺

法门寺位于扶风县城北10公里处的法门镇，东距西安市110公里，西距宝鸡市90公里。始建于东汉末年恒灵年间，距今约有1700年历史，有“关中塔庙始祖”之称。法门寺因佛祖舍利而置塔，因塔而建寺，原名阿育王寺。公元558年，北魏皇太后裔拓跋育曾扩建，并于元魏二年（494）首次开塔瞻礼舍利。隋文帝开皇三年（583）改称“成实道场”，仁寿二年（602）右内史李敏二次开塔瞻礼。唐高祖李渊武德七年（625）敕建并改名“法门寺”。唐代200多年间，先后有高宗、武后、中宗、肃宗、德宗、宪宗、懿宗和僖宗八位皇帝六迎二送供养佛指舍利。每次迎送均沿长安—雍城道，声势浩大，朝野轰动。

3. 雍城遗址

雍城遗址位于今凤翔县城南。雍城为春秋战国时秦都，此后一直延用至唐末，均为历代州、郡、府之治所，为关中西部重镇，丝绸之路重要驿站。雍城座北朝南，平面呈不规则的方形，城址东西长3480米，南北宽3130米，面积约10.89平方公里，超过了当时洛阳王城，相当于今西安市城内的总面积。史载戎族的使者由余面对秦都雍城建筑惊叹：“使鬼为之，则劳神

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秦雍城遗址的宏伟规模不仅反映了秦国早期国力的日渐强盛，而且也显示出它“包举宇内，囊括四海”的气魄。在雍城宗庙遗址内，考古工作者在出土的陶片中，发现了一些“H”、“X”等符号，专家推测，这些符号可能是古代欧洲流落到我国中原的一些人在陶器加工时所刻画的，这些都是古代中西方文明交流的一个见证（图9）。



图9 雍城宗庙遗址

值得一提的是，雍城城市总体布局与《周礼》记载的“前朝后市”完全吻合。八条街道平直宽阔，南北东西相交呈“井”字形分布。北城墙之南是市场遗址，西部位于今凤翔县棉织厂院内，东距高王寺村约百米，与秦国宗庙遗址南北对应，相距近1000米。市场为全封闭空间，平面呈长方形，南北宽160米，东西长180~230米不等，面积34 000平方米。周围是厚1.5~2米的夯土围墙基址，四面墙的中部各有一座“市”门。已发掘的西门南北长21米，东西宽14米，建筑平面呈“凹”字形，门入口处有大型空心砖踏步，门上有四坡式大屋顶建筑，为一座封闭式的露天市场。雍城市场遗址是我国考古发掘的第一座先秦集市遗址，也是我国古代实行“集中市制”的实物例证，^[32]对于研究雍城秦汉时期的商业贸易发展状况和“市”的整体结构、形制、规模等方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雍城市场遗址的发现，说明当时秦国在市场管理上已经实行了“集中市制”的一套管理制度，也说明秦市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此外，雍城遗址内和附近曾出土了大量的唐三彩等珍贵文物，为研究雍城与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文物。

4. 汧渭之会遗址

汧渭之会遗址位于凤翔县长青镇孙家南头村一带。汧渭之会是《史记》中记载的重要地理位置，秦人的先祖非子曾在此为周王室牧马而称秦，秦文公东猎至此曾建汧渭之会都邑，秦始皇曾在此举行加冕仪式。同时，此处还为历代漕运的重要仓储码头，为秦汉时期丝绸之路上漕运货物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为古时丝绸等货物运输发挥了重要作用。2003年底，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宝鸡市考古队联合组成考古队，先后在凤翔县长青镇孙家南头村共发掘出周、秦时期的墓葬137座，陪葬车马坑或马坑4座，发掘了约350平方米与墓地有关联的先周至西周时期的人类生活聚居遗址。这一墓葬群规模宏大，而且有几座高等级的贵族墓葬，考古研究人员结合

《史记》中秦文公所言“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等记载，认为此处为秦文公东猎所建“汧渭之会”都城遗址。^[33]另外，此遗址处还有蕝年宫、来谷宫、羽阳宫等秦汉行宫，是秦汉时代帝王祭祀郊雍的重要场所。秦始皇、汉武帝等秦汉时代的帝王多次在此举行国家祠典。

5. 杜阳县城遗址

杜阳县城遗址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北魏永熙元年（532）置汧阴县。《隋书·地理志》载，西魏废帝元钦二年（553）改汧阴县为杜阳县。今陇县杜阳乡堡子身村，有城郭遗址。其地西临大杜阳沟，北倚杜阳堡，东接小杜阳河。《陇州志》载，明嘉靖四十年（1564）更名沙河镇，并设有集市。又有小杜阳，无市，即今杜阳镇，与史料记载相符，说明堡子身就是杜阳县城故址。

6. 郁夷县城遗址

郁夷县城遗址据《水经注》载，郁夷县在陇州西五十里，《陕西通志》载，在州西五十里大宁关（大震关）侧，近汧水源。经文物工作者考证，郁夷县城故址在今陇县固关街东。东至穆家庄北河，西至李家沟河岸，南至固殿渠，北至陇固公路。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约150米。遗址中部断崖有灰土堆积层，厚约2米，东西长约160米。此城为西汉时设立，王莽地皇四年（23）改为郁平县，东汉时废。

注释

- [1] 王子今：《秦人经营的陇山通路》，《文博》，1990年第5期。
- [2] 李学勤：《秦国文物的新认识》，《文物》，1980年第9期。
- [3] 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
- [4] 郭沫若：《石鼓文研究》，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 [5] 佳雨、和风：《宝鸡旅游文化大观》，三秦出版社，2002年6月版。
- [6] 张天恩：《古代关陇通道与秦人东进关中线略》，《早期秦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8年8月版。
- [7] 《陇县志》大事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 [8] 林劲松：《冯家山水库排沙运用及水库淤积分析》，《西北水资源与水工程》，2002年第1期。
- [9] 杨曙明：《陕西凤翔发现西汉皇家水陆物资转运站》，《中国文物报》2004年8月27日第二版。
- [10] 刘明科、辛怡华：《渭河峡谷的秦文化遗存与秦文公东猎汧渭之会路线蠡测》，《秦文化论丛》，三秦出版社，2005年。
- [11] 田亚岐、杨曙明：《凤翔东湖》，作家出版社，2007年4月版。
- [12] 王子今：《秦人经营的陇山通路》，《文博》，1990年第5期。
- [13] 杨曙明：《秦文化解读》，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
- [14] 张天恩：《边家庄春秋墓地与汧邑地望》《文博》1990年第5期。
- [15] 田亚岐、杨曙明：《凤翔东湖》，作家出版社，2007年4月版。
- [16] 李健超：《丝绸之路沙漠路线中国境内的自然环境及变迁》，《汉唐两京及丝绸之路历史地理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7月版。
- [17] 杨军辉：《关于唐大震关的几个问题》，《甘肃农业》2006年第6期。
- [18] 《扶风县志》：第十三编文物，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 [19] 刘明科、辛怡华：《渭河峡谷的秦文化遗存与秦文公东猎汧渭之会路线蠡测》，《秦文化论丛》，三秦出版社，2005年；王红武、吴大炎：《陕西宝鸡凤阁岭公社出土一批秦代文物》，《文物》，1980年第9期。

- [20]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市北道区文化馆：《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的发掘》，《文物》1989年2期。
- [21] 王辉：《秦铜器编年集释》，三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 [22] 《麟游县志》第十二编城乡建设，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 [23] 《凤翔县志》第十一卷交通，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24] 光绪九年《麟游县志》，第162页。
- [25] 灵台县博物馆：《甘肃灵台发现外国铭文铅饼》，《考古》，1977年第6期。
- [26] 《宝鸡市志》第十三编交通邮电，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
- [27] 《陇县志》大事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 [28] 《宝鸡县志》第十九编军事，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 [29] 《重修凤翔府志》卷之十艺文，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 [30] 《千阳县志》大事记，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版。
- [31] 何双全：《天水放马滩出土地图初探》，《文物》1989年2期。
- [32] 《秦古雍城发现市场和街道遗址》，人民日报1986年5月21日第3版；《中国历史学年鉴（1987）》“凤翔发现秦都雍城市场和街道遗址”。
- [33] 焦南峰、田亚岐：《寻找“汧渭之会”的新线索》，《中国文物报》2004年3月5日第二版。

**甘肃东段
交通线的形成、
变迁与走向**

古代从关中通西域的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沿泾水西行，经平凉、固原、兰州、河西走廊抵达西域的陇右北道；另一条是沿泔水西行，逾陇山经甘肃东部、青海入西域的陇右南道。陇右南道分甘肃东段和青海段两段。本文考述的是陇右南道甘肃东段的形成、变迁及走向。

一、陇右南道甘肃段的形成与演变

甘肃东部地貌为陇西黄土高原和北秦岭山地，处于中原农业文化和西北牧业文化交汇的前沿地带，其“南通巴楚，北控朝那”“东走宝凤，西入甘凉”，自古为东西和南北交往的咽喉要径。因此，甘肃东部成为古代东方和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在“丝路”交往上起着枢纽作用。

考古发现，早在前仰韶文化时期，甘肃古文化与黄河中、下游的古文化在不断地交流着。距今7000—8000年的渭河上游大地湾一期文化的陶器中的三足钵、圈足碗和中原地区同时期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的同类器物的造型相同。至仰韶文化中期，以变体鱼纹、勾叶圆点纹和弧边三角纹的传播为标志，整个黄河流域部族之间的交往已经沟通，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部族之间的交往也已经开始。甘肃、青海一带距今5000—4000年的马家窑文化时期，自东向西延伸的海贝之路和自西向东延伸的玉石之路在甘肃汇合，孕育了丝绸之路的雏形。^[1]

距今3500—4500年，处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齐家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东南部、宁夏南部，是黄河农业文化与西北草原文化最早相交融的古文化，也是古代东方和西方文明最早发生接触的古文化。齐家文化中的铜器早于中原的四五百年，其中的铜耳环、斧、镞、镜与中亚、南西伯利亚同时并用时代的同类铜器的样式基本相同，这表明它与西北方的草原文化已有交流和联系。

青铜时代，兰州以东的甘肃中、东部出现寺洼文化（商代中期至春秋初期），研究发现寺洼文化对河西走廊的沙井文化（西周晚期至战国时期）、宁夏南部的杨郎文化（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和内蒙古地区的青铜文化都产生过影响。^[2]

春秋时期，一条横贯中亚、西域、河西走廊至甘肃东南部的国际通道已初步形成。甘肃是我国早期冶铁业的重要地区之一，早在距今3095±180—2630±135年（经树轮校正）的甘肃永昌县三角城沙井文化遗址中，就有铁钺、铁犁等农具的出土，与中亚早期铁器时代（距今3000年左右）开始的年代相当。^[3]在甘肃东部还陆续发现了一些春秋早期的铁兵器，如灵台县春秋早期墓铜柄铁剑^[4]、环县包金双兽首柄铁剑、礼县圆顶山先秦墓葬铜柄铁剑^[5]和甘谷毛家坪春秋早期秦墓铁镰^[6]等。甘肃铁器发现地点呈现出西早东晚的特点，证明可能存在一条起自中亚、经河西走廊至甘肃中、东部的冶铁技术的传播路线。通过这条路线，阿尔泰地区的黄金^[7]、中亚特有形制的青铜四轮车^[8]、玻璃技术^[9]传入甘肃东部，中原的丝绸也传入阿尔泰地区。

这时，甘肃东南部与河湟、关中地区的交通、经济联系加强，为丝绸之路陇右南道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禹贡》云：“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西倾山在今青海东南；鸟鼠山在今甘肃渭源，为渭河源头；朱圉山在今甘肃甘谷县渭河南岸；太华即今陕西华山，在渭河下游南岸。这些山处于由青海东部经甘肃东部的渭河上游进入关中地区的交通线上及其附近，所以更早地引起古人的关注并闻名于世。《尚书·禹贡》又云：“织皮昆仑、析支、搜渠，西戎即叙。”析支又叫赐支河，指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境内黄河由南折东流的一段；搜渠为山名，在今兰州以西。昆仑山、析支、搜渠地区的织皮，大约就是由青海东南部经甘肃东部到达关中、中原的。

战国至西汉初，丝绸之路陇右南道形成。秦惠公五年（公元前395年）征服绵诸戎。秦献公元年（公元前384年），秦国兵临渭首，灭狄、獯戎。绵诸戎在今天水市清水县境内，獯戎在今陇西县内，狄戎在今临洮县境内，它们分布于从张川、清水、甘谷、武山、陇西、渭源至临洮的陇右南道东段的道路沿线，秦先后对绵诸、獯戎和狄戎用兵，依次扫清了丝绸之路陇右南道东段南线上的障碍。

秦孝公七年（公元前355年），秦国推行郡县制至秦统一前后，秦在甘肃东部地区先后设立邽、冀、西、绵诸、狄道、獯道、枹罕、成纪等县。在设立郡县的同时，秦昭王在陇西、北地及上郡等地“筑长城以据胡”，秦战国长城西起今甘肃临洮县城北的三十里墩，沿古陇西郡北部边沿蜿蜒向东北延伸，经今甘肃境内渭源、陇西、通渭、静宁进入宁夏回族自治区，然后又经过甘肃境内镇原、环县、华池而进入陕西，^[10]犹如一条巨龙，成为陇西、北地等西北郡县的坚固屏障。郡县制的推行与长城的修建，为保障丝绸之路陇右南道的畅通、繁荣提供了重要条件。20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相继在甘肃临夏、灵台、礼县、西和、天水出土了一些希腊铭文铜、铅饼，铅饼共计282枚、铜饼1枚。此外，陕西西安、扶风，安徽，湖南等省有数枚铜饼出土。据考证，这些铜、铅饼是中亚希腊化国家巴克特利亚打造的。^[11]公元前3世纪中期，塞琉古王朝守将第奥德斯自立为王，占据阿姆河两岸一带，建立巴克特利亚国家，中国史籍上称为大夏。公元前1世纪初，大月氏人灭亡巴克特利亚，建立贵霜帝国。因此，这些希腊铭文铜、铅饼应该打造于公元前3世纪中期至公元前1世纪初，即相当于中国战国晚期和秦、西汉初期。临夏西与青海河湟地区毗邻，历史上一直为西出河湟的必经之地。临夏乃至甘肃东南部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的希腊铭文的铜、铅饼，可能是由北方草原之路经河湟地区流入的。

历史文献亦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西域经青海入甘肃东南部交通路线。《史记·货殖列传》云：“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12]羌中指秦最西疆界临洮以西羌人居地，汉代羌中包括祁连山以南、金城以西、湟羌以东的地区，^[13]天水、陇西包括今黄河以东、陇山以西、西汉水以北地区。从临夏、灵台、礼县、西和、天水、扶风、西安出土的相当于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的希腊铭文的铜、铅饼看，“羌中之利”绝非仅仅是我们一般理解的畜牧产品，还包括国际贸易，即陇东南经河湟地区与中亚等地的商贸往来。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人赶走大月氏人占据河西走廊，并控制长城以北

地区，中国内地和西域的联系主要通过甘肃东部和青海河湟地区进行，如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曾与堂邑父“俱出陇西郡，径匈奴”，被匈奴抓获，十一年后返回时，“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14] 秦、汉初相当于陇西郡相当包括今黄河以东、陇山以西甘肃东南绝大部分地方，治狄道（今临洮），南山一般指祁连山，郑炳林认为南山是一个大的地理概念，包括西域、河西走廊、陇右及长安之南的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和秦岭，狭义上指西域诸国以南的山脉。^[15] 这说明至迟在秦、西汉初年，由西域经青海、甘肃东南入关中的国际交通就已经存在。

西汉武帝时期，在开通沿泾水西行，经平凉、固原、兰州、河西走廊抵达西域的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同时，还开辟了一条经今张川、秦安、静宁、通渭、定西、榆中至兰州西固渡黄河，后经河西走廊通西域的便捷通道，因为该线在经今张川、清水、天水、甘谷、武山、陇西、渭源、临洮、临夏通青海的陇右南道东段主干线北部，因此，称为陇右南道东段北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曾与堂邑父“俱出陇西郡，径匈奴”时，被匈奴抓获。匈奴当时占领河西走廊，张骞从陇西进入匈奴统治的地方，说明张骞是由今甘肃东南进入河西走廊的。由今甘肃东南进入河西走廊最近的道路是走张川、秦安、静宁、通渭、定西、榆中至兰州一线。又据《汉书·霍去病传》记载，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有功……讨速濮……过焉支山千余里。”^[16] 秦及西汉初年陇西郡包括今六盘山以西，黄河以东的甘肃地区；速濮为匈奴人部落，活动于今永登北、宁夏黄河以西；^[17] 焉支山在河西走廊今山丹县境内。霍去病此次出兵，走的也应该是张川、秦安、静宁、通渭、定西、榆中、兰州渡黄河入河西走廊的路线。

对于陇右南道北支形成的时间、地位及走向学术界尚有不同的看法：20世纪80年代，鲜肖威认为东段南线沿千河至陇县，翻越陇山后，经秦安、通渭、陇西、渭源，越鸟鼠山至临洮；^[18] 20世纪90年代初，杨建新、卢苇先生将其称为丝绸之路东段陇右段第二条线，其走向是由陇关或大震关翻越陇山后，向西北经略阳（治今秦安东北）、平襄古城（治今通渭）至金城（治今兰州西固）；^[19] 至20世纪90年代末，陈守忠先生认为该道是一条于西汉元鼎三年（前114）开辟的丝绸之路的捷径，其向西至平襄古城（今通渭）后，分为两路即一路经襄武古城（今陇西）至狄道（今临洮），为主道，另一路由通渭经定西岷口、榆中至兰州，为支线。^[20]

从该道上的考古发现看，早在战国时期，该道与河西走廊已经有密切的交往，但作为官道，可能开辟于汉代。原因有两点：一是该道依次经过陇县古城（治今张川）、略阳道（治今秦安陇城）、成纪（治今静宁李店）、平襄（治今通渭）、骑都尉（治今定西岷口）、勇士（治今苑川河流域）、榆中（治今榆中县金崖乡）等，这些古县除成纪外，其余均为汉代所设立。二是该道东段和西段沿线都有汉代遗址及出土文物，但目前战国至秦代遗址、出土文物仅仅限于东段。该道上的古陇县东汉时曾一度为凉州刺史部治。平襄在西汉和东汉初年曾为天水郡郡治和汉阳郡治，这说明在西汉至东汉初年，该道为陇右通河西的一条干道，并非支道。它所经的陇县（今张川县）曾为非子养马有功而被周孝王封为附庸的地方，畜牧业发达。新发现的马家塬战国西戎墓出土的大量的车马器，亦说明战国时期今张川一带养马业的发达程度。成纪为以骑射闻名的飞将军李广的故里；平襄虽“山绝膏腴之壤，水乏灌溉之渠”，但“土多草堪牧”，秦汉时期西戎的一支襄戎就生活在这里；所经苑川河南岸诸山，如兴隆山、马衔山植被呈垂直分布，具备季节性放牧的条件。因此，由该道所经的自然条件、经济形态、民族分布和历史传统推断，该道是一条沿着历史上畜牧民族迁徙的方向开辟的骑路，也是一条由关陇通向河西的商旅之路。唐代该道仍然在使用。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长庆元年（821）刘元鼎出使吐蕃时，“逾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故时城郭未坠，兰州地皆秔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道观。至龙支城，耆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过石堡

城。”^[21]按成纪原在静宁县，开元二十二年迁至在今天水秦安县叶堡；武川即秦安郭嘉川；广武梁在今庄浪河入黄河处附近；龙支在民和隆治沟与湟水交汇处；石堡城即湟源县大、小方台城。由于成纪的南迁，该道秦安至通渭段由原陇城—李店—通渭改为陇城—叶堡—郭嘉川—通渭组成。

从东汉至西晋，随着陇右地区政治中心先后向冀（治今甘谷西）、上邽（治今天水市）南移，经清水、天水、甘谷、陇西、渭源、临洮、临夏入青海至西宁，再出扁都口至张掖的陇右南道南线地位上升，陇右南道北线的地位相对下降。

西晋至十六国后秦时期，陇县、成纪、平襄等县相继废止，这意味着十六国以后，陇右南道北线地位进一步下降。陇右南道北线地位的衰落，除政治中心的迁移、人口减少等因素外，与生态环境的劣化不无关系。如相传为教民结网渔猎的伏羲氏出生的成纪水（今治平河），北魏时东流出破石峡后逐渐断流，至成纪县故城以东时，已经完全断流了；流经曾为西汉天水郡、东汉初汉阳郡郡治的平襄县的温谷水（今散渡河）至北魏时期已经成为一条“冬则辍流，春夏水盛则通川注渭”的季节性河流。^[22]干旱缺水可能是导致这些古城废弃的根本原因，而古城的兴废必然会引起交通路线的变化。

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因河西道战乱不宁，丝绸之路陇右北道地位下降，而青海道所经地区相对稳定，所以，丝绸之路陇右南道又趋于繁荣。从东晋十六国至唐代贞观年间，在今青海的绝大部分、甘南、川西北和新疆的东南部，兴起了一个由鲜卑族建立的吐谷浑政权。吐谷浑政权鼓励商业贸易，不仅与其西邻高昌、于阗、龟兹等有密切往来，还与其东邻——十六国时期建立的前秦、西秦，南北朝时期的北魏、西魏、北周和南朝都有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经青海、甘肃东南的丝绸之路陇右南道成为西方与中原进行联系的要道。这时，东来西往者大多从此道经过。如公元399年，高僧法显与慧景、道整、慧应、慧鬼等人从后秦国都长安（今西安）出发，经乞伏乾归所据苑川郡西城（在今甘肃榆中一带），然后过南凉国都至张掖镇。^[23]南凉起初建都于西平（治今西宁），后迁于乐都。当时南凉范围相当于今武威地区和青海东南部。法显可能是沿陇右南道甘肃东段北线经兰州过黄河至西宁，然后西北行，由扁都口过祁连山进入河西走廊的张掖的。北魏洛阳崇立寺僧宋云曾于北魏孝明帝神龟元年（518）与惠生前往天竺取经，他们从洛阳出发，大致经陕西、陇东、河州、青海东南、柴达木盆地、昆仑山北、葱岭、阿富汗至巴基斯坦北。由西向东者，公元559年，乾陀罗僧闍那崛多，他先至于阗，然后经鄯善入青海，再经鄯州（治今乐都）东去长安。^[24]李并成先生认为，该发现表明途经青海东部，连接中原、西域、中亚、西亚的交通通道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25]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西宁、^[26]临夏、陇西、天水、清水等地先后出土的波斯萨珊卑路斯银币（457—483）、东罗马福卡斯金币（602—610）^[27]，表明公元5世纪至7世纪，由西域经青海和甘肃东部通西安、洛阳的丝绸之路曾繁荣一时。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陇右南道东段秦州路不仅是西入河西通西域、中亚的重要通道，亦为唐蕃古道所经，交通盛极一时。公元609年，隋炀帝西征，贞观元年（627）玄奘西行去天竺取经，贞观八年（634）唐朝征讨吐谷浑，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下嫁吐蕃，贞观十七年（643）、贞观二十一年（647）和显庆二年（657）王玄策经吐蕃出使天竺，僧侣玄太、玄照、道玄、道方、道生、道宣经吐蕃至天竺取经，长庆元年（821）刘元鼎出使吐蕃等等，他们都经过陇右南道东段。文人学士西出陇右者大多从此道经过，如岑参赴安西，王维赴张掖，高适赴武威，杜甫赴秦州，而走北道者仅颜真卿一人。岑参在《呈宇文判官》诗中有“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至陇山头”的诗句就描述了陇右南道的繁忙景象。处于该道上的秦州（治今天水市）西北通安西、北庭，西通河、鄯，西南通洮、岷、松州的交通枢纽上，使臣驿骑繁忙，驿馆规模宏大壮丽。杜甫《秦州杂诗之十》云：“今日明人眼，临池

好驿亭，从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稠叠多幽事，喧呼阅使星”，就是对当时秦州城交通盛况的形象描写。陇右北道从长安至凉州1800里，南道全长2000余里，较北道迂回，但陇右南道所经地区自然条件优越、人口稠密、经济富庶，所以，后勤补给便利；北道虽然便捷，但由于自然条件相对恶劣，且唐政府在南自秦州（治今天水市）、渭州（治今陇西），西至狄道（治今临洮），北至会州（治今靖远），东至原州（治今固原）幅员千里的地方建立养马基地，以致北道所经地区人口稀少，补给困难，所以行人稀少。唐代安史之乱后，陇右地区被吐蕃占领，丝绸之路陇右北道阻塞不通。唐末至五代宋初，西域、河西往长安或东京开封朝贡，往返均取灵州道，即由东京开封西行经洛阳至西京长安，由此北上至邠州（治今陕西彬县），循马岭河而上至庆州（治今甘肃庆阳）、环州（治今陕西环县）至朔方节度使治所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自灵州渡黄河，出贺兰山口西行，穿越瀚海（今腾格里沙漠），趋白亭海（今石羊河终端湖，已干涸）、白亭河至凉州（治今武威）。或穿越巴丹吉林沙漠，溯额济纳河（今黑河）南下至张掖绿洲，然后顺河西旧路经肃州（治见甘肃酒泉）、瓜洲（治今甘肃安西）、沙洲（治今甘肃敦煌）抵西域。^[29]不过，从刘元鼎长庆元年（821）经敬亲成纪（治今秦安叶堡）、武川（今秦安西北郭嘉川）出使吐蕃的历史记载看，吐蕃占领陇右期间，陇右南道东段在唐蕃交通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

西夏占领河西走廊后，丝绸之路陇右南道成为宋朝与西域沟通的最重要的通道。宋初，在河湟地区形成以唃廝囉为首的地方政权，宋人称为青唐羌，因此，又将经过甘肃东部及青海河湟地区的丝绸之路东段南道称为青唐道。陈守忠先生将其划分为三段，东段为传统的关陇道，中段为汉代的湟中道，青唐城（今西宁）以西为西海道。^[29]大中祥符八年（1015）唃廝囉遣使入贡后，此后双方信使往来不断，于阗、龟兹、高昌、回纥商人和东罗马帝国（拂菻）使臣多走青唐道。青唐道东段的秦州城路，为宋政府指定的唯一的朝贡路线，秦州城（天水）为唯一的检验关卡。庆历三年（1043），宋王朝诏令：“秦州至今嘉勒斯赉及外国进奉人约定人数令赴阙，其所带方物以本城传送之，勿令自雇庸人。”^[30]这道诏书明确指令河湟吐蕃和西域各国贡使团必须在秦州城接受检验，约定赴京人数，所带贡品由秦州城负责派差役转运，番使团不得擅自雇佣人手。西域各国及河西部落供奉使团往往由商团兼充，故而朝贡频繁，人数众多。如于阗自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以后，几乎每年三番五次地遣使入贡，每次使者多达七八十人，而朝廷则给与丰厚的回报。秦州城守臣奉命代表朝廷回赐，“引伴出番界”，以减轻朝廷压力。不仅西域商供取秦州路，河西商供亦取秦州路。据《宋会要·蕃夷四之八》记载：“天禧元年……四月，秦州曹玮请自今甘州进奉，止于秦州……不烦朝廷遣使伴送。从之……四年三月……二十一日，令甘州回纥进奉，自今并于秦州出入。”据统计，大中祥符三年（1010）以前50年内，甘州回纥入贡11次，平均每四年半一次；自大中祥符三年迄天圣六年（1028）的29年间，甘州回纥入贡次数达17次之多，平均每三年就有两次还多，甚至有一年之内入贡三次的。^[31]因此，秦州城一时成为商贾云集之地。

北宋时期，还在陇右南道东段北线的基础上，逐渐演变出经平凉翻越六盘山至隆德、静宁、会宁，再翻越华家岭，经定西至兰州的新线路，称为中线。至元朝初年，经会宁、定西至兰州的中线已经取代了南线秦州路，成为中原通往兰州的重要驿路。清代，中线更是经常使用。据统计，清代西行陇右的13篇游记中，有12篇走泾州—平凉—会宁—安定—金县至兰州这条路，走秦州路的只有一篇。^[32]清代，兰州至西安的道路上共设驿站13个，起点自兰州城内的兰泉驿，向东依次经过金县定远驿、清水驿至巩昌府所辖安定县秤钩驿、严守驿、西巩驿，会宁县保安驿、华亭县瓦亭驿、平凉县高平驿、镇远县白水驿，经泾州安定驿，最后在甘肃省向东入陕西。^[33]

二、陇右南道甘肃东段走向

（一）陇右南道陇山段交通线

陇山又称陇坂、陇坻、陇首、关山，是一座纵列于陕、甘、宁三省间的南北向山系。它既是一条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线，更是一条重要的人文地理分界线。历史上由中原、关中通往陇右、西域，或由西域进入中原，陇山为必经之区。而陇山之山大谷深，群山逶迤，历来被视为畏途。所谓“其坂九回，七日乃得越”“西上陇坂，羊肠九回”等，就是对陇山交通异常险阻的真实反映。千百年来，从关中溯千水西进，翻越陇山的道路逐步形成三条线路，由北向南分别为经华亭西南逾陇山的陇山北道、经大震关的陇关道和越陇山南段的咸宜关道。另外，还有沿滨渭而行的陈仓狭道。

1. 陇山北道

丝绸之路陇右南道东接陇关道和回中道。人们一般将丝绸之路西出长安到今凤翔，然后由凤翔至今陇县的这段道路的千水河谷段，即凤翔至陇县段习惯上称为陇关道，而将陇县连接萧关道的一段道路称为回中道。由陇县或回中道西越陇山的道路，大致由华亭西南翻越，这条古道有人称之为“回中道”，也有人称为“汉回中道”。由于回中道有所专指，故将位置最北的这条陇山古道称为回中道并不准确，为避免引起疑义，我们就称其为陇山北道。

陇山北道是由关中进入陇右最早开辟的通道。张天恩先生称呼此道为回中道，其走向是由陇县西北行，经火烧寨、新集川，在华亭县南翻越陇山至张川。该道早在西汉时已开通，后荒废，东汉初重新开通。^[34]王学礼又称此道为汉回中道，他通过实地考察，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走向，即沿千河西进，从今陇县至曹家湾、固关、唐河，进入甘肃华亭县的麻庵乡普陀（古遗址），再由普陀向南上陇山，沿梁脊西进（今尚有古道遗迹）至四岔河，由大屋脊下陇山至今张家川张棉驿。^[35]因王学礼先生的路线基于实地考察，本文认同之。

陇山北道在陇山诸道中位置偏北，虽然路途迂回漫长，但却相对平缓易行，故此道开通较早。但此道明确见于记载的是秦汉时期，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二十七年（前220），曾“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西汉武帝时，曾多次西巡，计十次“行幸雍，祠五畤”，五次行幸回中，五幸安定、北地，“逾陇”和“西登陇首”各一次。如此频繁地出巡西北，行幸陇山一带，足见其交通的重要。这其中，武帝于元封四年（前107）冬十月，“行幸雍（凤翔），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36]自秦始皇开始经营的回中道，这时已完全开通。于是，经凤翔（雍）沿千水北上，经陇县、华亭、回中宫北出萧关的道路就成为由千水逾陇的官方大道。而在此之前，在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就曾“出陇西，至皋兰，斩首八千级。”元鼎四年（前113）冬，汉武帝在雍祠五畤后，即“遂逾陇，登空同，西临祖厉河而还”。这次越陇山西行，走的就是陇山北道。可以说，回中道的开通和繁荣，直接促进了陇山北道的经营和畅通。东汉初年，光武帝平定隗嚣，部将来歙“伐山开道，从番须、回中径至略阳，斩嚣守将金梁”。^[37]番须、回中俱在今甘肃华亭县附近，则来歙所开道，仍然是陇山北道。秦汉以来，已先后在陇右设置陇西、天水、金城、安定诸郡，无论是经营边防，还是经济文化的联系与交流，关中与陇右之间的交通都是不可或缺的，这说明经华亭西南逾陇的陇山北道，从秦与两汉时期开始就已经十分繁荣。

2. 陇关道

陇关道又称陇坂道，它以经过陇山上最早的关隘陇关而得名。关中自雍（今凤翔）沿千水河谷至汧县（今陇县）的一段交通干道就以陇关道相称，可知这条道路曾一度是关陇交通的主要干道。陇关一名初见于《后汉书·西羌传》：“且冻分遣种人寇武都，烧陇关，掠苑马。”然

在两汉之际，就有置关的记载，《汉书·王莽传》说置四关将军，并命右关将军王福曰：“汧陇之阻，西当戎狄。”严耕望认为右关即为陇关。

陇关后称大震关，得名却与汉武帝有关，汉武帝于元狩元年（前122）曾在雍“祠五畤，获白麟”，并有《白麟之歌》记其事，并改元“元狩”。他自己就说：“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所谓“朝陇首，览西垠，雷电燎，获白麟”的记载，则表明正是在这次猎获白麟的巡狩活动中，汉武帝曾遭雷震，大震关一名盖源于此。可知陇关道在秦汉时是与陇山北道并列的一条逾陇干道。东汉顺帝时，为绝羌患，曾“令扶风、汉阳（今天水）筑陇道坞三百所，置屯兵。”这是对陇关道的一次大规模修缮。隋唐时期，陇关道被列为京城四面关中的六个“上关”之一，成为东西交通及唐与吐蕃交往攻防的要道，“凡戎使往来者，必出此。”^[38]无论吐蕃输款“请互市”，或东寇关中，还是商旅往来，唐王朝立驿设馆，置使命官，或塞道移关，其所经营与往来者，皆为此道。唐武德五年（622），突厥攻陷大震关；肃宗至德二年（757），安禄山遣其将高嵩诱降河陇将士，被大震关使郭若义擒斩；安史之乱后，吐蕃占据陇右，又常出大震关入侵，马遂“按行险易，立石植树以塞之，下置二门，设篱槽”拒之。代宗大历三年（768）凤翔节度使李抱玉派李晟率千人出大震关至临洮击吐蕃。大中三年（849），秦州收复，宣宗即命李珣等于“秦州至陇州以来道路，要置堡栅，与秦州应接……商旅往来，兴贩货物，任择利润，一切听从，关镇不得邀诘。”以岑参的《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王维的《陇头吟》等为代表的大量诗赋，都有对陇山及大震关的描述。以上诸例是陇关道在隋唐时期兴盛繁忙的最好写照。

关于大震关的位置学术界意见很不统一：有清水县东陇山东坡说^[39]，通关河西陇山西支脉东坡说^[40]，陕西陇县西北固关说^[41]，陕西陇县西境陇山主脉说^[42]等四种看法。《元和郡县图志·陇州汧源县》条记载，“陇山，在县西六十二里……大震关在州西六十一里，后周置，汉武帝至此遇雷震因名。”^[43]安史之乱后，秦陇地区沦陷于吐蕃，因吐蕃屡经大震关入侵关中，马燧立石植树塞关。秦州收复后，因为故关久废，大中六年（852）薛逢东移三十唐里筑安戎关，称为新关，以别大震故关。^[44]《元和郡县图志》成书于元和八年（813），即大中六年（852）薛逢筑安戎关之前38年，其所记载的大震关应该是大震关故关，不存在将安戎新关误记为旧关的错误。

由陇县西北行，30余公里至固关乡二桥一带。这里有一座古城遗迹，城墙残长约30米，残高4米多。20世纪60年代曾出土过城门石墩、瓦片，关南百米有一个旗台石，上有直径10厘米圆洞，是唐营插旗杆之用。该城前有两条峡谷，一峰突兀其间。这座山峰，大概就是《元和郡县图志》所说的在“县西六十二里”的陇山，这座古城应该就是在“（陇）州西六十一里”的大震关了。过千阳，事实上已经进入现代意义上的陇山山区。固关一带山势高峻，仅离陇山最高峰20余公里，形势与薛逢奏折“僻在重岗之上，苟务高深……旧绝泉水，远汲河流”^[45]的描述基本上是符合的，应该为大震旧关的遗迹。

陇关道分南北两线，北线即秦家塬道，亦称为陇关旧道；南线是马鹿道，亦称陇关新道。

陇关道北线即陇关旧道由陇县西北行，经固关、上官场、秦家塬、千河与樊河的分水岭，折西南沿峡谷下行，在河峪折西通陇城，折南经恭门、新城（或秦亭）至清水。

由大震关西行25余公里，就到了陇关旧道的另一处要隘分水岭。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小陇山一名陇坻，又名分水岭……陇上有水，东西分流，因号名为分水驿……东去大震关五十里”。^[46]关于《元和郡县图志》所说的“分水岭”的位置，严耕望先生认为在今天张川县马鹿一带，^[47]张国藩、赵建平认为是老爷岭。^[48]笔者认为应该是陇关旧道上的道堡石梁。道堡石梁海拔2628米，为小陇山最高峰，东南距离大震旧关约25余公里，与《元和郡县图志》中分水驿在大震关西25公里小陇山上的记载基本符合，分水驿应该在道堡石梁最高峰南侧不远处。

陇关道北线至今遗迹可循：上官厂有墩台遗迹，马店一段发现“汉摩崖碑”，上有“邽”“通”字样；恭门段古道痕迹依稀可辨，残宽3米，残砖断瓦俯拾皆是，有汉绳纹板瓦，^[49]从古道遗迹和“上官厂”这个地名看，汉代陇关^[50]就在“上官厂”附近。因该道经过汉代陇关或后周至唐大中六年（852）以前的大震关，因此叫陇关旧道。

陇关道南线是马鹿道，这条道路由安戎关（今固关东15公里）经大震关故关（今固关）后，从秦家塬道偏向西南分岔，经汗复坪、老爷岭至马鹿。由于其开通晚于旧道，故称陇关新道。这条道路至马鹿后，向西经恭门南白土梁至陇城，与陇关旧道相接；向南经长宁驿、百家、秦亭乡、白沙至清水。张国藩、赵建平在《丝绸之路陇坂古道考察散记》一文中记述了他们考察经历：“上山段为汉唐古道，当地人称‘马道’。峡谷流水潺潺，沿河而上，即为1号桥，桥址巨石上有人工凿迹五处……经3号桥，公路进入一条峡谷，两山险峻，谷口大石林立……前行900米，有一段较长的古道遗迹，路面为乱石所埋。过8号桥，便到陇关道上的重要控制点复汗坪。在11号桥处，公路沿峡谷通往白杨，古道盘山至老爷岭，要经过12条弯道，其中最大的弯道半径9米，最小的仅容一骑。老爷岭即唐代史籍中所说的‘分水岭’，盖因有水从这里东西分流，由此向西进入甘肃。约50米处有泉，水不多，是渭河支流的发源处。再行50米，有长500米的石块路，宽5~6米。下山后进入陈子沟（音）。沿林区公路下行5公里到陇坂重镇马鹿”。^[51]

3. 咸宜关道

由关中翻越陇山的第三条通道是开通较晚的咸宜关道，它位于陇关道以南，据《陇县志》记载：“明正统时，因关山阻碍，改从咸宜凿山开道。”^[52]该道从陇县西行至曹家湾、咸宜村、崖付沟口、马鞍子、骆驼巷、鬼门关、菜子河、南寨铺至长宁驿，北接陇关新道。或在崖付沟口继续前行，迂回30里经小老爷岭（碑志梁）至南寨铺接前线。该道上古道遗迹尚存，还有石屋遗址和石墙遗迹。另外，还发现岔道和山脊线：岔道在陇关道与咸宜关道之间，即由固关沿马陇公路前行，在40公里处分途通至鬼门关；山脊线以老爷岭为基点，向南循山脊经菜子河至小老爷岭，向北可通秦家塬。^[53]

4. 陈仓狭道

陈仓狭道之名最早见于《三国志·夏侯渊传》^[54]，唐代因其穿过陇州西南一百二十唐里的南由县，叫做“南由路”。该道上的“安夷关，在（南由）县西一百四十六里”^[55]，是关中过陇山入陇右的一个重要关口。张天恩在吸收徐日辉研究成果^[56]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地形地貌考察，推测认为该道起于陈仓（今宝鸡），在陈仓西离开渭河，然后溯渭河支流六川河而上，经过六川河、车辙，西南行至焦土沟城隍庙；或从陈仓（今宝鸡）出发，沿渭河南岸西进，在头坪或码头北渡渭河至焦土沟城隍庙，然后折西北溯小水河、落花沟而上，在赤沙渡过落花沟到达通洞，再渡通洞河至渭河北岸的拓石；或从拓石直接渡渭河至吴砦，或经凤阁岭至吴砦，由吴砦沿渭河西行至天水；或行经麦积山至天水。在这条道路上早至七、八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代就有人类活动，它在周代就已开通。^[57]

以上四条翻越陇山沟通关陇的交通线，以陇山北道和陇关道最为重要，应该是丝绸之路和关陇交通的主干道。咸宜关道开通较晚，又距陇关道较近，其功能实际类似陇关道的支线或补充，陈仓狭道已在陇山南段，且路线主要沿渭河峡谷穿行，多有险阻，时通时断，其功能及作用远不及陇山北道和陇关道。

（二）陇右南道北支交通线走向

翻越陇山以后至黄河以东，丝绸之路陇右南道的走向也并不是一条道路，而是分北南两条路线展开，且在一些区段还有支线或岔道。不过，由于地形山川的制约和人口与城镇分布的影

响，这些交通线路相对比较稳定，文献记载也比较清晰完备。因此，我们将主要通过挖掘交通沿线的考古遗址与文物资料信息，以揭示历史上本段交通线的盛衰变迁。

陇关道在恭门折西北经陇县古城（治今张家川县）至街亭（在今张家川县龙山镇）与陇山北道汇合。两道汇合后经略阳（治今秦安陇城）、成纪古城（静宁县治平乡刘河村东一里）、平襄古城（治今通渭）、骑马都尉治（治今定西巉口）、勇士古城（在今苑川河流域）至金城（治今兰州西固），形成丝绸之路陇右南道北线。这条路线上发现了许多古代遗迹，证明了这条古道的运营情况和具体走向。

1. 秦亭遗址和陇县古城

秦亭遗址位于今张家川县城南不远的上磨乡瓦泉村后川河两条支流交汇的台地上。由陇县向西经街泉、略阳、成纪、平襄、骑都尉、勇士至金城，南经清水、绵诸折西至上邽（治今天水市）。上磨乡瓦泉村曾发现了大量的秦墓和青铜器、半两钱、车马器等文物，尤其是这里还有一个面积37 500平方米（250米×150米）的古遗址。在夯土层下有砖瓦等建筑材料出土，这种情况与陕西秦公大墓的情况类似，^[58]应该是秦亭遗址所在，即秦人首领非子因养马有功，被周孝王封为附庸而赏赐修建的城邑——“秦”邑的所在地。^[59]西汉设陇县，因其当陇口之要，东汉时曾一度为凉州刺史部^[60]。建宁元年（168）凉州刺史部迁至冀县后，陇县政治地位日趋下降，西晋时废止。

2. 马家塬战国墓

由秦亭遗址向西北行大约7.5公里，就到了清水河上游的木乡店子村。店子村北约4.5公里是著名的桃园村马家塬遗址，面积约80万平方米。在2006年抢救发掘的3座墓葬中出土了金、银、铜、陶、骨、玛瑙、玻璃、锡质等文物2200余件，马器占绝大多数。随葬品中包含有北方草原文化、西方文化、秦文化、西戎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铜鼎、铜壶、铜茧形壶以及茧形壶底部的大篆铭文“鞅”应属于秦文化的因素。其中，2号墓中发现的子母口双耳罐、铲足鬲及单耳夹砂罐是西戎文化的因素；虎形和大角羊形的车饰件应属于北方草原文化的因素；玻璃杯和大量使用金银器的传统当是来自西方的文化因素。和后来两汉时期的月氏人、北朝和隋唐时期的粟特人一样，这一时期的戎人应当是西方文化的主要传播者和西方文化东传的主要媒介之一。^[61]这说明至迟在战国中后期，当地已与河西地区和北方草原地区有了广泛的文化、商贸交流。

3. 街亭遗址

从秦亭西行17.5公里（合秦汉里程约42里）便到了张川县龙山镇。在龙山镇南山村东北500米处的南山遗址，发现在仰韶文化之上叠压着汉代遗址，这里可能是西汉时期的街泉县和东汉、三国、西晋时期的街亭。街亭与秦亭一起，成为汉代丝绸之路陇右南道上重要的驿站。蜀汉建兴六年（228），诸葛亮首次北伐，三月，蜀军占领陇右的武都、祁山、西县、南安之后，派以马谡为主帅的万人大军渡过渭水，抢先控制街亭。^[62]由于街亭是地处陇山北道和陇关道的汇合点，又南下可接陈仓狭道，沿陈仓狭道可东出关中，西经上邽（治今天水市）至川蜀，因而成为陇蜀交通之要冲。当年，蜀军占领街亭，欲将魏兵阻止于街亭以东，同时南下攻占临渭（治今天水市麦积区社堂镇），阻断陈仓狭道，防止魏兵从南北两道增援上邽，从而实现对上邽的包围和占领，然后三道并出直捣关中。遗憾的是，街亭一役蜀军大败，诸葛亮统一中国的政治抱负化为泡影，留下千古遗恨。

4. 略阳道

由街亭遗址折西南顺清水河谷行10.5公里，便到了秦安县陇城镇，两汉、三国、西晋时期，这里曾设立略阳道，^[63]为丝绸之路陇右南道北线上的重要关津。早在西周末年，这里就有“略”的称谓，根据《不其簠铭文》记载，西周末年秦人伐豳的战斗就发生在这里。1986年发现的战国晚期的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上也有“略”这个地名。东汉初年，割据陇右的隗嚣与光武帝刘秀

相持陇上，来歙从番须、回中伐木开道，攻占略阳。^[64]永安三年（530），尔朱天光击败王庆云于此；永熙三年（534），宇文泰于此地击破侯莫陈悦。^[65]薛方显先生根据《水经注》关于泥渠水位置的记载，认为略阳道故城在今陇城镇西4.5公里的五营乡蔡河村，并以蔡河村南南山的大型汉墓群和出土的三国蜀制机弩作为旁证。^[66]在陇城镇南上袁村，还出土了秦始皇二十二年（前221）的一件极为珍贵的铜质“秦权”，证明陇城镇一带应该为清水河谷行政中心之一。

5. 大地湾遗址

由秦安县陇城镇西行大约七公里，便到了著名的大地湾遗址。大地湾遗址位于甘肃省秦安县五营乡邵店村东清水河和阎家沟两河交汇的级阶地上。考古发现大地湾一期文化与千水流域的前仰韶文化有很大的相似性，表明早在七八千年以前，陇山两侧的联系就已经开始，这种联系还远及黄河中下游地区。^[67]这条古道东段的秦安大地湾、王家阴洼、宝鸡北首岭出土的器物证明，进入仰韶文化时期，渭河上游与黄河中下游的交流更加频繁，甚至扩大至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和中亚、西伯利亚。如宝鸡北首岭下层遗址中出土的距今约7000年的榼螺，秦安县大地湾、王家阴洼和庄浪县徐家碾仰韶早期遗址中出土的距今6000年左右的短褶矛蚌，王家阴洼遗址出土的另一种壳厚而纹理粗疏的蚌壳（现今这种蚌只产于我国东部的江河下游地区和江河入海处）。此外，大地湾仰韶文化中期发现了中亚、西伯利亚镶石叶的骨柄刀、矛和匕首，这说明，这时渭河上游与西北草原地带的联系也加强了。^[68]

6. 成纪古城

由大地湾遗址沿清水河、葫芦河及其支流南河西北行32公里，就到了成纪古城。成纪古城位于静宁县治平乡刘家河东南约1里处，为正方形，边长约450米，厚12米，夯土0.14~0.18米，总面积20万平方米。西、南城垣被河水冲刷塌陷，唯东、北两边残存部分城垣。在城北、城南的断面上，发现三口枯井，井内有汉代陶片。城内有大量旧瓦砾碎片堆积层，并残存大量秦汉时期的板瓦、筒瓦片和各种粗细绳纹、篮纹陶片及各种纹饰的瓦当（包括“长乐无极”“长乐未央”“帛美禾大”等瓦当）、回纹铺地砖、鸱吻残件、唐彩俑、宋元瓷片。在城周围也多次发现战国和秦汉时期的墓葬，并从中出土了许多仰韶文化以来的各个时期的文物和少量的汉代漆器，还有远古祭天用的玉琮、玉璧、玉璜等，以及秦、汉半两钱。其中，玉琮为长江流域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它在成纪古城的出土，表明新石器时代，渭河上游地区与长江流域的古文化已有密切联系。结合考古和文献资料推断，这里应为汉代成纪城^[69]和北宋治平四年设立的治平寨^[70]。

7. 敬亲成纪

由大地湾遗址西行，还可以不去成纪古城，而是由西南经叶堡，再折西北去平襄古城（今通渭）。东汉建武初年，光武帝封窦融弟窦参在此建立显亲侯国，这后国除后建立显亲县。曹魏至北魏时称显新县，唐代称为成纪县，在秦州州治上邽（治今天水市）西北100唐里（合今54公里）的敬亲川，^[71]其具体位置大约在今秦安叶堡乡东南3公里处。唐开元二十二年（734）秦州大地震后和大中三年（849），秦州从吐蕃手中收复后，秦州州治上邽曾两度迁移于此。^[72]长庆元年（821）刘元鼎出使吐蕃时道经成纪，“元鼎逾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故时城郭未坠，兰州地皆秔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73]按武川即今葫芦河（渭河支流）支流郭嘉河谷，广武梁在今庄浪河入黄河处。1965年秦安县叶堡公社杨家沟出土180余件唐代三彩武士、文吏、牵驼、骑马、骆驼、马牛等俑，其中有许多头戴幞头或毡帽、足蹬长筒毡靴、高鼻深目而卷发、八字胡上翘的外国使者形象，^[74]这说明敬亲川成纪为丝绸之路陇右南道北线必经之地，曾在唐代丝绸之路交往中起过重要作用。

8. 温家坪遗址

由成纪古城溯南河西北行，经陇川、寺子川至通渭县境内的温家坪遗址。温家坪遗址位于

寺子川乡华亭阴村温家坪上，西南距成纪古城约38公里。遗址面积约20亩，地表为耕地。出土文物有彩陶、石器，并有烧陶窑址、储陶窑等的遗迹发现。它属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和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亦有齐家文化遗存。

9. 堡子坪遗址

由温家坪遗址西南过任家峡、新景至鸡川许家堡堡子坪遗址。堡子坪遗址位于许家堡北面第二台地上。地表为耕地，出土文物有彩陶、红陶、夹砂陶，器形有盆、罐、细颈瓶、尖底瓶等，并发现有白灰面居住层。它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和齐家文化遗存。堡子坪遗址的发现，证明早在仰韶文化中期，人类就已经由葫芦河流域进入散渡河上游地区。

10. 李家坪遗址

由堡子坪遗址西南行7.5公里至李家坪遗址。李家坪遗址位于碧玉乡下店子村李家坪上，东西长约600米，南北宽240米，文化层厚4.5~6米，内有烧窑址和白灰居住层。在遗址内发现有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和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的彩陶、尖底瓶、夹砂陶及石斧、石刀、尖状器等石器。

11. 平襄故城

由李家坪遗址溯散渡河而上，约10.5公里至平襄故城。平襄故城位于今通渭县城内。^[75]在城区及周围发现了战国、秦文物，以及大量的汉代建筑构件和窑址、残墙、墓葬、货币等文化遗存，特别是在县城东北不远处双华公路和通阳公路相交处大量的瓦砾堆积中，发现打有“平”字印戳瓦砾，系西汉平襄官营制陶（砖瓦）作坊之印记。^[76]古城东通成纪、略阳、街泉、陇县接陇坂道；北通祖厉与丝绸之路陇右北道相接；西北经勇士、榆中、金城与丝绸之路河西道相连；南下冀县、西县、武都可达川蜀，交通地位十分重要。从出土文物看，早在战国、秦代时期，这里人类活动就十分频繁。西汉和东汉初年，平襄曾为天水郡郡治和汉阳郡治，曾一度成为陇中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77]永平十七年（74），汉阳郡治南移至冀县（治今甘谷西）后，其政治与军事地位下降，但至西秦时平襄仍见于文献记载。^[78]

12. 平襄故城通往清水驿的古道

由平襄古城至今兰州市榆中县清水驿，还残存着一段古道遗迹。这条古道从平襄古城出发向西行，上史家山，越战国秦长城至坡儿川，从坡儿川上何家大山至马营下山，从马营镇驻地西1.5公里处上野狐山，沿山梁北行，至定西县红土窑下山，越关川河，再沿东北山梁到达定西县巉口，于巉口林场附近上车道岭向北延伸，经榆中县甘草店东面山梁，至榆中县清水驿东面山梁下山，古道遗迹不复见。古道沿途有宋代以后修筑的烽燧堡寨矗立山颠，其中在通往定西县红土窑至巉口间的下山平地里多有汉代墓葬分布。^[79]

13. 巉口汉代遗址和汉墓群

在平襄故城通往清水驿的古道上，最重要的古代遗迹是巉口汉代遗址和墓群。巉口汉代遗址位于关川河和称钩河交汇的第一台地上，东南距定西县城20公里，312国道、陇海铁路和兰天高速公路从其南部通过。遗址面积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2~3米。出土物有绳纹灰陶残片、板瓦、筒瓦残片、新莽权衡和货币及“颍阴承印”封泥。遗址附近还分布着大量的汉墓群。1995—2000年夏，抢救清理的6座汉代墓葬中出土了铜机弩、铜带钩、铜车马器、铜镜、漆器残片、五铢钱、绿釉陶器等。从车马器和彩绘漆器制作精工考究和漆器上装饰有金片看，墓主人有较高的权位和级别。何钰先生认为是汉天水郡属国都尉治所勇士县满福所在地；^[80]鲜明认为是汉勇士县治所所在地；^[81]笔者认为可能是汉天水郡骑都尉治所密艾亭。“颍阴承印”封泥的出土，表明汉颍川郡（今河南境内）颍阴县（治今河南许昌）文书曾递送到此，这恰好说明巉口正处于汉代官方驿道上。

14. 子城遗址

在平襄故城通往清水驿的古道上，还有另外一处比较重要的遗址，即子城遗址。遗

址位于今榆中县苑川河上游的甘草店，东南距岷口汉代遗址约23公里。甘草店旧城今已拆除，原来相当大，有内外两重。1949年前群众把内城叫子城。北魏称乞伏国仁第一次所都之勇士城为子城，因此，陈守忠先生考证这里为乞伏国仁第一次所都之勇士城。^[82]

15. 清水驿堡

在平襄故城通往清水驿的古道上还有清水驿堡和东古城。由甘草店子城西北行11公里，就到了清水驿堡。清水驿堡为明、清代两代西安通兰州大道上的重要驿站，^[83]位于榆中县清水驿乡孙家庄南侧。北临西兰公路，陇海铁路从堡中横穿而过，城墙只剩下南墙一段，残长27米，高5米，夯层0.15米。城堡东南50米有一道山梁，山梁中有小堡寨一座，南北长17米，东西宽21米，残高4米，夯层0.05米，可能为山下清水驿堡的附属设施。

16. 东古城

东古城位于清水驿北6公里东古城村西部。南距陇海铁路1公里，苑川河自东南折而向北，将城西南角冲去。城堡为正方形，南北长75米，东西宽50米，高8米。东城门墙有三次修补的痕迹。城内有古井一眼，附近采到宋至元明时期的砖瓦及圈足碗残片等。^[84]陈守忠先生从开挖的断面判断，此城有过三次加筑。他结合城东北约4公里的“太子营”、西南2公里的“接驾岭”等地名和历史记载，断定东古城为乞伏乾归徙都的苑川城。^[85]

17. 三角城

三角城位于榆中县三角城乡三角城村，西距清水驿接驾咀约6.5公里，原城为正方形，现存西北一角，北墙残长20米，西墙残长10米，墙高6~8米，基厚2~3米，顶厚0.8米。此城可能为唐城。^[86]

18. 红柳沟古城

由东古城溯苑川河继续西北行，约24公里至榆中县夏官营镇。红柳沟古城在夏官营镇红柳沟村东300米，南距苑川河800米，北距北山500米。城址已遭破坏，遗址东部有一条南北向的土埂，高4米，长200米，基宽3米，顶宽1米，在土埂上下发现大量板瓦、筒瓦、瓦当等文物，可能为西秦时所筑。

19. 夏官营堡和上堡子城

夏官营堡位于夏官营镇东，为清代西安通兰州大道上的另一处重要驿站。夏官营堡北距苑川河1公里，陇海铁路经城堡北墙外，西北为夏官营火车站。城堡为正方形，长330米，墙垣残高6~15米，基厚6米，顶厚2米，夯层厚0.2~0.3米。为清代建筑。

上堡子城位于夏官营镇上堡子村西100米。北临苑川河，陇海铁路从北部穿过，城址呈正方形，边长300米，四面城墙保存完好，城垣高4~8米，顶厚2~4米，夯层0.08~0.16米。西、南两侧正中各有马面一座。城址北面临河，其余三面有壕沟，宽10米，深6~10米。在城墙及附近曾采集到大量宋代瓷片。^[87]从出土文物看，上堡子城为宋城。

20. 上古城

由夏官营镇沿苑川河继续西北行11公里至金崖乡。金崖乡内原有上古城，上古城原名尚古城，位于苑川河下游西岸的台地上，距黄河不远。从残存的少许城墙和板筑看，为宋和宋以后及明清建筑，未发现汉代遗物。武沐先生认为上古城是汉勇士县故城；陈守忠先生认为，上古城是秦榆中故城，汉勇士县在今榆中县西北黄河岸边的青川镇境内。^[88]勇士为西汉政府安置一支归附游牧的匈奴所设的天水郡属国。苑川河南岸为兴隆山、马衔山，兴隆山、马衔山海拔1500米以下为典型草原，1500~2050米为含落叶的灌丛草原，2050~2200米为低山灌丛，2200~2750米为山地落叶阔叶林和针叶林，2750~3450米为亚高山灌丛，3450以上为高山草甸。植被的垂直分布，为季节性游牧创造了条件。因此，汉勇士县故城应该在苑川河流域，但上古城是否为秦汉城址，待考。

21. 苑川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和汉墓群

苑川河沿岸发现的汉代遗址很少，但在其南岸支流上分布有新石器时代马家窑和齐家文化遗址，如马家洼马家窑和马厂类型遗址、分豁岔马家窑类型和齐家文化遗址、祁家崖马家窑半山类型遗址、湖滩马家窑半山类型遗址、白虎山齐家文化遗存等。南岸支流上还分布有大量汉墓群，如敬家坪汉墓群、马莲山汉墓群、大池泉汉墓群、靳家庄汉墓群、施家庄汉墓群等，出土有汉砖、汉瓦、灰陶罐、细颈加盖熏炉、硕腹长颈瓶、犁铧等。这些说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在苑川河流域活动十分频繁，汉代又进行大规模的开发，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22. 金城河渡口

由上古城出发经来紫堡、大水洞，沿黄河南岸西行，经兰州市城关区、七里河区至西固区。始元六年（前81），设立金城郡，领11个县，^[89]其中金城县治就设在今天兰州市西固区，其辖区应包括今天兰州市区。历史上，从金城河（今天兰州市的这一段黄河）渡河的例子屡见不鲜。如甘露四年（前50）左右，赵充国就曾领1万多骑兵从这里渡黄河。^[90]东汉后期，武威卢水胡反，张既带领数千人从这里渡黄河，增援武威。^[91]《周书·文帝纪》记载，废帝二年（553），太祖“领数万骑西逾陇，渡金城河至姑臧”。^[92]能够渡数万人，说明这里早有渡口。目前，今兰州市西固区一带可考的重要渡口有西固区河口渡、西固区钟家河渡、七里河浮桥渡和城关区金城关渡。^[93]

（三）陇右南道南支走向

丝绸之路陇右南道翻越陇山后，一路通北线，另一路经清水、天水、甘谷、陇西、渭源至临洮，或西至临夏渡黄河去青海，或北上兰州通河西走廊，形成丝绸之路陇右南道东段南线。陇右南道东段南线走向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三国志》，魏正元元年（254），姜维从枹罕（治今临夏县韩集镇双城村）进攻狄道，陈泰由上邽（治今天水市）至陇西郡（治襄武，在今陇西县城内），西越高城岭（洮河支流上峪河与渭河支流后河的分水岭）来救，会“凉州军从金城至沃干阪。姜维闻之解围而遁”。^[94]《武经总要前集·一八上·边防篇》更明确记载了其走向及里程“自（秦州）西北三百一十里至故渭州（治今陇西），又百八十里至临洮（今临洮），又东北二百里至兰州（今兰州），北渡河出金城关二百六十里至凉州昌松县，又二百里至凉州”。

下面，通过交通沿线的考古遗址与文物资料信息，以揭示其丝绸之路交通线的盛衰变迁。

1. 南下清水的古道路及遗迹、遗物

丝绸之路翻越陇山后南下今清水的道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走向：唐大中六年（851）以前，循陇关旧道顺樊河而下，经恭门、新城至清水；唐大中六年以后至明代正统年间（1436—1449年），循陇关新道经马鹿、盘龙铺、百家、秦亭、白沙至清水；明代正统年间以后走咸宜关道，经长宁驿、马鹿、盘龙铺、百家、秦亭、白沙至清水。陇关旧道上重要遗址有下城子遗址；陇关新道上有长宁驿、盘龙铺关山驿路碑、秦子铺遗址和程沟遗址，其中最重要的是关山驿路碑。路碑发现于清水县盘龙村东50米处，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立，内容记述了陕西凤翔知府、陇州首领、知名人士及参与修路的有功人士的姓名。长宁驿凤翔府太守功德碑和盘龙村关山驿路碑是考察丝绸之路咸宜关道走向及运营情况的重要实物资料。

2. 白土崖古城

南下清水三道均经过白土崖古城。白土崖古城位于牛头河北岸的邽山之阳，即今清水县城北1.5公里的白土崖，处于牛头河与樊河交汇的三角台地上。经考察，现残存夯土版筑北垣36米，残高1~3米，夯土层厚0.13~0.15米，另有断续残垣数处。城内满布汉代残砖断瓦及柱础等建筑材料。农民犁地时常有汉代灰陶器皿和布纹陶片露出。白土崖古城为南下诸支道的汇合点。秦

家塬道至马店一段发现汉摩崖碑，上有“邽”“通”字样。白土崖古城是否就是邽县古城呢？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探讨的问题。从距离看，白土崖古城可能是唐代清水县。^[95]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秦州经略使曹瑋于小陇山（今盘龙山）笔架峰之阴，西江（牛头河）南岸，即现城处筑新城至今。

3. 西城村古城

由白土崖古城向西行7.5公里，就到了牛头山下红堡乡西城村古城。从遗迹看，古城为不完整的四边形，五花土版筑夯成，其西垣残长50米、南垣残长560米、北垣残长700米，东垣被白驼河冲毁，夯层厚0.13~0.15米。城内满布汉代残砖断瓦及碎石等建材。曾出土双翼铜镞、绳纹灰陶片等汉代文化遗物，西边梁顶筑有二坞。武帝元鼎三年（前114），从陇西郡析置天水郡，清水为天水郡下辖16县之一。^[96]顾祖禹认为西城村古城即汉清水故城；^[97]严耕望认为西城村古城为唐清水城和清水驿所在地。^[98]

4. 灵芝城

由西城村古城出发，顺牛头河西岸山梁南行，至贾川乡林家河村，1987年文物普查时，在贾川乡政府所在地林家河村林家河南岸的堡子山上，发现一座古城遗址，当地人称为灵芝城。据勘察，该城北据川，南连山，城垣从山脚伸向山腰，形状呈长方形。城垣南北长350米，东西宽250米，占地约87 333.33平方米。古城北垣已湮没在牛头河支流林家河之中，东、南、西三面城垣仍清晰可辨，城垣夯筑而成，残高2余米，厚1.5~2米，城内曾发现多处建筑基址和墓葬，其中两处汉墓出土了铜壶、铜鼎、铜花瓶、铜香炉和剑、箭镞等文物；城内断崖处有灰坑和大量秦汉砖瓦。雍际春先生考证为西汉绵诸道故城。^[99]

5. 绵诸县古城

据《直隶秦州新志》记载，在牛头河与渭河交汇处曾有一古城，秦州（治今天水市）东40里有上邽故城，“其上邽山，其外犹有敌台，若峭壁然，有子城，城内外多瓦砾，时或掘得金银器。绵诸，东四十五里，山下有古城遗址，汉置绵诸道，魏置绵诸县，西魏省”。^[100]依道里，两古城在今天水市麦积区社棠镇一带。子城和罗城最早起源于北朝时期，据《直隶秦州新志》记载的“上邽故城”有子城和罗城，结合出土器物特征，可能为北魏绵诸县；东45里的所谓“绵诸”古城，可能为临渭故城。^[101]绵诸县古城处于丝绸之路陇右南道南线与陈仓狭道的交汇处，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6. 以麦积山石窟为代表的渭河上游石窟群与丝绸之路

麦积山石窟寺北距绵诸县古城直线距离约20公里，开窟造像应始于公元402年，现保存自后秦，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元、明、清十多个朝代开凿的石窟194个，塑像7800余尊，壁画1000多平方米，北朝崖阁八座，有“东方雕塑馆”的美誉，是研究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走向与佛教传播的宝贵资料。

古代丝绸之路陇右南道与陇蜀大道交汇于天水，因此，麦积山石窟是外来佛教艺术中国化及中国佛教艺术在境内石窟寺中交叉弘传的中心轴。麦积山石窟开凿受到北朝和南朝中心文化的影响，云冈、龙门石窟中的三佛题材，凉州石窟中的影塑千佛，响堂山以及栖霞山石窟中的佛装式样等均在麦积山石窟中有所反映。此外，西魏北周皇室也与麦积山关系密切。^[102]同时，麦积山对周围地区佛教艺术产生了影响：麦积山石窟佛教造像艺术向西滋润至敦煌，直接影响到敦煌莫高窟的佛教造像艺术，乃至西域，^[103]向南影响到四川，^[104]向北影响到庄浪。^[105]

除麦积山石窟外，渭河上游还有仙人崖石窟（麦积区麦积乡后川村）、千佛洞石窟（麦积区街子乡滩子村西2公里）、罗汉崖摩崖造像（麦积区街子乡草滩村东1公里）、碧莲洞石窟（麦积区五龙乡石洞村西6公里）、大像山石窟（甘谷）、华盖寺石窟（甘谷）、水帘洞石窟群（武山）、木梯寺石窟（武山）、禅殿寺石窟（漳县）和铁笼山石窟（漳县），这些石窟仿佛一座长

廊，见证了佛教沿丝绸之路陇右南道东渐路线和历程。

7. 天水古城与丝路文物

丝绸之路由清水顺牛头河南下至绵诸县古城（在今社棠镇），或经西城村古城、灵芝城至天水市麦积区城区与陈仓狭道汇合，南渡渭河西行约20公里至天水古城。天水古城是丝绸之路上的大重镇，其建城历史可以追溯至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建立的邽县，^[106]天水古城自西晋开始为州、郡治所，遂逐步成为陇右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天水“南通巴樊，北控朝那”“东走宝凤，西入甘凉”，为陇右地区的交通枢纽，留下了许多关于丝路交往的文物，如天水市博物馆藏有一件出土于秦州区的绿松石镶嵌的兽面铜牌饰，与河南偃师二里头和三星堆铜牌饰极为相似，说明天水早在3000多年前，就已成为连接中原和四川地区的纽带。^[107]西晋末年，北方战乱，丝绸之路陇右道起点曾一度移至故臧（今武威）。北魏平陇右、河西后，特别是吐谷浑控制丝绸之路西域南道后，由西亚、中亚经塔里木盆地南缘、青海入甘肃临夏、陇西、天水、清水，至西安、洛阳的丝绸之路曾一度繁荣。天水境内留下这一时期的丝绸之路文物，如公元5世纪至公元7世纪的波斯萨珊王朝金币、^[108]贴金彩绘屏风石棺床等^[109]。唐代西行者大多从陇右南道南线经过，秦州为丝绸之路南道上的重要都会，唐代丝路文物有乘马馭驼的西亚商贾和使者造型的三彩俑、负重荷载的陶骆驼、石雕佛坐像、鎏金十一面观音立像、彩陶天王俑等，成为这一时期天水古城丝绸之路繁荣景象的生动写照。

8. 冀县故城和丝路文物

丝绸之路出天水古城后，并非严耕望先生所考述的那样，沿渭河西行，而是继续沿渭河的支流藉河西行，在今秦州区关子镇向北翻越中梁山至渭河边上的冀县故城。冀县故城位于今甘谷县城西五里铺的杨赵村，^[110]东距大像山西1里，^[111]其建城史可以追溯到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从公元74年至公元286年200余年中，冀县曾一度成为区域政治、经济、军事和交通中心。^[112]公元620年改伏羌县，^[113]1929年改甘谷至今。这里留下许多丝绸之路文物，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三彩凤首壶，1972年1月发现于甘谷县渭阳乡杨家庄鸭儿沟，凤首壶是中亚波斯萨珊王朝器形特征与中国三彩工艺凤鸟形象结合的产物。凤鸟的头形和嘴融合了中国的凤鸟和西亚金翅鸟的特点。^[114]三彩凤首壶以它精致的造型、鲜艳的色彩、诱人的魅力，见证了冀县故城在丝绸之路历史上辉煌的一页。除三彩凤首壶外，甘谷县内还有大象山石窟（甘谷县城东一里文旗山的悬崖上）、华盖寺石窟（甘谷县城西10公里的二十铺村）、朱围山栈道（甘谷县西三十里铺东）、毛家坪遗址（甘谷磐安镇毛家坪村）、春秋铁镰等与丝绸之路有关的遗迹、遗物。

9. 洛门古镇

由甘谷西行20公里至洛门古镇。洛门古镇因汉代洛门聚而得名。^[115]建武十年（34）来歙攻洛门、平陇右的战争就发生在这里。^[116]延熙十六年（253）夏，姜维率数万人，从石营出发，经董亭围南安时，曾经过洛门。^[117]据《资治通鉴·卷二四六》记载，会昌二年（842），吐蕃洛门使论恐热举兵反，欲回吐蕃，清君侧，至渭州，遇其国相尚思罗，败之于薄寒山，思罗退屯松州。可见，洛门川地当东西往来的大道。在洛门镇所在的武山县境内，还有水帘洞石窟群等丝路遗迹。

10. 襄武故城

由鸳鸯镇西北行25余公里至襄武故城。^[118]严耕望考证襄武故城在今陇西东南2.5公里。襄武故城位于荆头川水（今陇西县城西南四河^[119]）与渭河交汇处以南，即今陇西县城内，为唐渭州治所。严耕望先生考证，唐代渭州向西有西南、西北两条驿道，“西南行三百里至岷州，开元中置八驿。又西转南行经洮、叠至松州，有三交驿者（今三岔镇），在鞬县西七十里，盖即岷渭间一驿也……其行程则由州西行微北九十里至渭源县（治今县东北），置渭源镇”。^[120]在汉代，由襄武故城向北还可以经天水郡骑都尉治所密艾亭（在今定西岷口）至勇士县，再由勇士县

渡黄河至河西。因此，襄武故城在丝绸之路交通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康熙年间的《巩昌府志》说“江分蕃境，阶文洮固（涸）为之藩，河限边防，安会兰靖张其掖；云栈扼三巴之咽喉，金城拊五凉之背”，十分精辟地评价了其形胜。陇西重要的丝绸之路文物中有东罗马拜占廷帝国狄奥多西斯二世（408~450）王朝的金币。^[121]

11. 渭源堡故址与通往临洮的道路

由襄武故城西行偏北九十里至渭源堡遗址。渭源堡又叫王韶堡，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王韶曾驻兵渭源堡。《宋史·卷三二八·王韶传》记载，王韶于“（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七月，引兵陈渭源堡及乞神平，破门罗角、抹耳水巴等族。”^[122]渭源堡位于渭源县城北辽洼上，今天仅存东、西、南三面墙，残长100米，残宽50米，残高8米。两汉、三国、西晋在渭源附近置首阳县，西魏设郡，隋罢郡，将渭源县并入渭州，^[123]唐置镇，^[124]宋置渭源堡。^[125]渭源是渭河流域通向洮水流域的咽喉。由渭源通往临洮的古道有两条：一条是经渭源堡故址逾高城岭至上峪河流域，经武街故城至临洮，为主干道；另一条是经竹牛岭（在今渭源五竹乡）循抹邦山，过会川古城至临洮，为军道。熙宁五年王韶开拓熙河，就是沿着这两条路线进入熙州的。^[126]

12. 高城岭

由今渭源县向西行约7.5公里，就到了呈南北走向的渭河支流后河与洮河支流上峪河的分水岭，即历史文献中多次提到的高城岭，^[127]岭上置关，^[128]为由巩昌府（治今陇西）通狄道（今临洮）的重要关津。古道由渭源堡故址西行，在上关坪附近上山，西北行经王家店至柳树坪，^[129]再由柳树坪下山进入洮河支流上峪河流域。《水经注·卷二·河水注》云：“洮水又北迳狄道县故城西……又北，陇水注之，即《山海经》所谓滥水也。水出鸟鼠山西北高城岭，滥水又西北经武街城南，又西北迳狄道故城东……又西北流，注于洮水。”注文中所说的陇水即洮河支流上峪河。1947年，裴文中先生至临洮考古调查时，对洮河支流上峪河及其与渭河之间的分水岭作了如下描述：“临洮城北洮河有一条支流，自东而西，与渭河上游仅有一平宽之分水岭之隔。史前人类之交通，即以此支流之河谷连接渭河上游及洮河流域。”^[130]可见，高城岭，即洮河支流上峪河与渭河的分水岭，早在史前时期就是人类交往的天然通道。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由渭河流域进入洮河流域必须翻越鸟鼠山的观点是错误的。

13. 狄道古城

翻越高城岭后，经武街故城（约今庆平一带）继续沿洮河支流上峪河西行至临洮。临洮古称狄道，建城历史可以追溯至秦献公二年（前383）。^[131]当地文物工作者根据考古发掘认为：秦、汉狄道在今临洮城北上川一带；西晋、十六国狄道在今城东北校场附近；唐狄道在今城南烧瓦窑附近；金、元、明、清狄道在今城内。^[132]由临洮向西在临夏附近渡黄河可至河湟地区，向东南经殪虎桥（唐三交驿），再转西南至岷县与丝绸之路河南道洮河支道相接，向北经兰州通河西。顾祖禹在《读史方輿纪要》中用“襟带河湟，控御边裔，为西垂之襟要”来概括临洮古城的战略位置。^[133]

14. 河关故城

由临洮西行至临夏，西渡黄河通河湟地区的渡口主要有四个，即河关、凤林关、安乡关和临津关。

由临夏西北行，经踏白古城（在今东乡乱藏旧城村）、磨沟古城（在今东乡县寨子沟乡磨沟村董家社西南）、吹麻古城（在今东乡县吹麻滩镇）、冶城故址（在今东乡县刘家集乡刘家集村）至大河家镇西南康吊村康吊古城。王宗元先生以为康吊古城就是河关故城。^[134]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曾置河关县，大概其地早有西行的关卡，所以置县时以河关命名。东汉永元元年（89）曾在这段河上“作大船于河峡，作渡桥兵”。^[135]三国时期，夏侯渊派张郃等“平河关，渡河入小湟中”。^[136]十六国至隋，由于这里为吐谷浑与北方各政权反复争夺的军事要地，

渡口趋于衰落。至迟至西秦时期，河关渡口东部逐渐兴起了一个新的渡口，即凤林关渡口。

15. 凤林关

由临洮西渡洮河西行的另一条道路是经汉大夏县故城、大夏河支流牛津河上游峡谷、河州（治今临夏）至凤林关渡黄河。凤林关关址在炳灵寺黄河南岸的阎王砭一带，崖壁上刻有“凤林关”三个大字，旁有当年修关时凿的椿眼和石块磊砌的墙垣，今已淹没在刘家峡库区。凤林关渡至迟在西秦时已开通，唐初设立关隘，与吐蕃交界，为唐开元七下关之一。

16. 安乡关

元符二年（1099），西夏焚毁炳灵寺桥，凤林关从此销声匿迹。当年可能又筑了一座新关，元符三年（1100）赐名为安乡关。^[137]金曰安乡关城，^[138]元升为县。^[139]冯国瑞先生认为位于炳灵寺黄河以东银川河与黄河交汇的三角台地上的奄哥城即安乡关。^[140]安乡关筑成后，丝绸之路便经银川河的西番庄古城至奄哥古城之间渡黄河。安乡关东30里还有一个渡口叫京玉关^[141]，位于盐锅峡小寺沟附近。^[142]

17. 临津关

由临洮西渡洮河西行至枹罕古城（在今临夏县韩集镇双城村），后折西北经张尕古城（在今循化县白庄乡张尕村）、文都古城（在今循化县白庄乡北500米）至古什群古城（在今循化县查汗都斯乡古什群峡黄河南）亦可渡黄河。古什群古城南古城即临津城。^[143]古什群古城南古城东边的清水川（今清水河流域），为吐谷浑四大镇戍之一。大业五年（609），隋炀帝大军进攻盘踞在清水川的吐谷浑，于清水川西边的临津城渡河至青海北，经浩门河、大斗拔谷道至河西走廊，谋求打通由吐谷浑控制的青海道。

在循化县查汗都斯乡和化隆县甘都镇境内，有南北相向而立的两座古城。北城位于化隆县甘都镇境内，南城位于循化县查汗都斯乡。南城为两重城，外城平面呈梯形，东、西、南三面城垣共长400米，无北垣，东西各开一门。内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80米，南北宽58米，东向开门，内城北侧有河桥桥墩残址。《新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记载：“（开元二十六年）七月，（杜）希望又从鄯州发兵夺吐蕃河桥，于河左筑盐泉城……因于盐泉城置镇西军。”^[144]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河州）西百八十里有镇西军，开元二十六年置。”^[145]古什群古城东南至河州约118公里（合200余唐里），可能为镇西军、盐泉城。《水经注·卷2·河水注》云：“河水又东，临津水注之，水自南山北经临津城西，而北流注于河，河水又东经临津城北，白土城南。”古什群古城北城可能就是白土城，南城可能为临津城，镇西军、盐泉城可能就是在临津城的基础上建立的。^[146]

18. 临洮古城通往兰州地区的古道

由临洮至兰州的道路至迟在三国时期已形成。^[147]唐代开辟了由狄道（今临洮）通兰州至凉州的官方大道，其走向为：由狄道（临洮）向北经长城堡、沃干岭，折入阿干河谷北至兰州治所五泉县，置金城镇、临河驿，又北渡河出金城关，正北循逆水（今庄浪河）而上，行二百二十里至广武县（今永登南），又约二百里至昌松（今古浪西），又西北越洪池岭（今乌稍岭），一百二十里至凉州治所姑藏县（武威）。临洮至兰州段具体走向为：从临洮沿洮河东岸北上，在巴下寺折而西北上沃干岭（今马啣山支脉），经关沟门、摩云关、阿干镇西沟进入阿干河谷，顺阿干河谷而下，途经岷口子、二十里铺、八里窑、洪门子至兰州城袖川门（在解放门东南临夏路口）。此段沿途经过的重要遗址或关津有长城堡、沙楞古城、沃干岭、摩云关等。另外有两条支道：一是临洮北至巴下寺继续前行，在红旗乡折而西北行至何家山，翻山进入兰州市七里河；^[148]一是从临洮古城北行约20公里至新添铺，再北行经榆中县至兰州市东岗镇。^[149]

注释

- [1] 张朋川：《从甘肃一带出土的文物看丝绸之路形成过程》，《丝绸之路》1999年第S1期，第5~9页。
- [2] 吕春华：《试论宁夏青铜文化与周邻地区文化的关系》，《西北史地》1999年第4期，第25~31页。
- [3] 张朋川：《从甘肃一带出土的文物看丝绸之路形成过程》，《丝绸之路》1999年第S1期，第5~9页。
- [4] 刘得祯、朱建唐：《甘肃灵台县家庄春秋墓》，《考古》1981年第4期，第298~301页。
- [5] 甘肃省文物考古所：《礼县圆顶山春秋墓》，《文物》2002年第2期，第4~30页。
- [6]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系：《甘肃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第3期，第359~395页。
- [7] 韩伟：《论礼县出土的秦金箔饰片》，《文物》1995年第6期，第4~11页。
- [8]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礼县博物馆：《礼县圆顶山春秋秦墓》，《文物》2002年第2期。
- [9] 干福熹：《古丝绸之路与中国古代玻璃》，《自然杂志》28卷5期，第253~260页。
- [10] 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1页。
- [11] 康柳硕：《甘肃出土的丝路外国钱币述略》，《陇右文博》1996年第1期，第145~149页。
- [12]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2页。
- [13] 郑炳林：《汉塔羌管辖范围与南山羌中道》，《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北民族大学，2010年7月。
- [14] 班固：《汉书·卷六十一·张骞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687~2698页。
- [15] 郑炳林：《汉塔羌管辖范围与南山羌中道》，《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北民族大学，2010年7月。
- [16] 班固：《汉书·卷五十五·霍去病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479页。
- [17] 王宗维：《秦汉之际河西走廊地区的民族及其分布》，《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 [18] 鲜肖威：《甘肃境内的丝绸之路》，《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第14~21页。
- [19] 杨建新、卢苇：《历史上的欧亚大陆桥—丝绸之路》，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1页。
- [20] 陈守忠：《从丝路遗存的货币看古代东西方商业交往及对我国西北地区经济政治的影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西北史研究》（第一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8~74页。
- [21]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02页。
- [22] 酈道元著、杨守敬疏：《水经注·卷十七·渭水注》，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1483、1493页。
- [23] 章巽：《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24] 道宣：《续高僧传·卷二·闍那崛多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 [25] 李并成：《盛唐时期河西走廊的区位特点与开发》，《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60~69页。
- [26] 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
- [27] 康柳硕：《甘肃出土的丝路外国钱币》，《陇右文博》1996年第1期，第145~149页。
- [28] 严耕望：《长安西北通灵州驿道及灵州四达交通线》，《唐代交通图考》卷一《京都关内区》，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85年；[日]长泽和俊著、钟美珠译：《唐末五代宋初之灵州》，《丝绸之路研究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80年；[日]前田正明著、陈俊谋译：《河西历史地理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陈守忠：《北宋通西域的四条道路的探索》，《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孙修身：《五代时期甘州回鹘和中原王朝的交通》，《敦煌研究》1989年第4期；周伟洲：《五代时期的丝绸之路》，《文博》1991年第1期；罗丰：《五代、宋初灵州与丝绸之路》，《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赵祯：《敦煌文书中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灵州道》，《中国历史地理理论丛》2001年12月第16卷第4辑。
- [29] 陈守忠：《河陇史地考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36~239页。
- [3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5庆历二年二月庚辰。
- [31] 朱悦梅：《甘州回鹘与周边政权的关系及特点》，《敦煌研究》2007年第1期，第79~86页。

- [32] 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5~46页。
- [33] 升允、长庚(修),安维峻(纂):《甘肃新通志》,《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二十四卷,1990年,兰州古籍书店影印本,第30、33~37页。
- [34] 张天恩:《古代关陇道与秦人东进关中路线考略》,徐卫民、雍际春主编:《早期秦文化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47~60页。
- [35] 王学礼:《陇山秦汉寻踪(二)》,《社科纵横》1996年第3期,第28~31、16页。
- [36] 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95页。
- [37] 范晔:《后汉书·卷十五·来歙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87页。
- [38] 沈亚之:《陇州刺史厅记》,《全唐文》卷736。
- [39] 见新编《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
- [40]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理地图集》将大震关标在清水县东的盘龙铺一带。
- [41] 见刘满:《大震关考辨》,《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
- [42]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85年,第361~364页。
- [43] 吴永江:《陇山古道考》,《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
- [44] 吴洁生:《唐大震关考》,《历史地理》第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4~138页。
- [45]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关内道二·陇州》,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5页。
- [46]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85年,第361页。
- [47] 《唐会要·卷八十六·关市》。
- [48]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九·陇右道上·秦州》,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82页。
- [49]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85年,第364页。
- [50] 张国藩、赵建平:《丝绸之路陇坂古道考察散记》,《丝绸之路》2001年第1期,第107~111页。
- [51] 张国藩、赵建平:《丝绸之路陇坂古道考察散记》,《丝绸之路》2001年第1期,第107~111页。
- [52] 范晔:《后汉书·卷六·顺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70页。
- [53] 张国藩、赵建平:《丝绸之路陇坂古道考察散记》,《丝绸之路》2001年第1期,第107~111页。
- [54] 陇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陇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 [55] 张国藩、赵建平:《丝绸之路陇坂古道考察散记》,《丝绸之路》2001年第1期,第107~111页。
- [56] 陈寿:《三国志·卷九·夏侯渊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270~273页。
- [57]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关内道二·陇州》,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6页。
- [58] 徐日辉:《“陈仓渭水道”与街亭战役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16卷第2辑,第90~125页。
- [59] 张天恩:《古代关陇道与秦人东进关中路线考略》,徐卫民、雍际春主编:《早期秦文化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47~60页。
- [60] 徐卫民:《天水附近秦都城考论》,《天水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第19~26页。
- [61] 雍际春:《嬴秦故园》,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1~76页。
- [62] 范晔:《后汉书·志二十三·郡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517页。
- [63] 王辉:《发现西戎—甘肃张家川战国墓地》,《中国文化遗产》2007年第6期,第66~78页。
- [64] 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911~930页。
- [65] 雍际春:《天水放马滩木版地图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6~129页。
- [66] 范晔:《后汉书·卷十五·来歙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87页。
- [67]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九·陕西八》,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416页。
- [68] 薛方登:《(水经注·渭水注)葫芦河段笺证》,雍际春主编:《陇右文化论丛》(第二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2页。
- [69] 宝鸡市文物考古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陇县原子头》,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
- [70] 张朋川:《从甘肃一带出土的文物看丝绸之路形成过程》,《丝绸之路》1999年第S1期,第5~9页。
- [71] 酈道元、杨守敬疏:《水经注·卷十七·渭水注》,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842~1843页。
- [72] 王存等:《元丰九域志·卷三·秦凤路》,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8页。

- [73]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九·陇右道上·秦州》,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82页。
- [74]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40页。
- [75]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02页。
- [76] 汪保全、李虎生著:《瑰宝遗珍—天水馆藏文物精粹》,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2~105页。
- [77] 苏海洋:《汉平襄县位置考》,《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125~128页。
- [78] 何钰:《西汉天水郡治平襄县城故址考》,《敦煌学研究》1984年第10期,第77~81页。
- [79] 班固:《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10页。
- [80] 陈守忠:《河陇史地考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46~248页。
- [81] 何钰:《汉代天水郡属国都尉治所地望的探讨》,《陇右文博》2001年第1期,第21~25页。
- [82] 何钰:《汉代天水郡属国都尉治所地望的探讨》,《陇右文博》2001年第1期,第21~25页。
- [83] 鲜明:《水经注苑川考》,《西北史地》1990年第4期。
- [84] 陈守忠:《河陇史地考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77~278页。
- [85] 穆彰阿主修:《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256《兰州府·古迹》记载:“清水驿,在金县东三十里清水镇,其地有城堡,明置驿于此。有驿丞,今裁。”
- [86] 《榆中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榆中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43页。
- [87] 陈守忠:《河陇史地考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78页。
- [88] 《金县志》记载为“唐戍兵所筑”。
- [89] 《榆中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榆中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45页。
- [90] 陈守忠:《河陇史地考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71~272页。
- [91] 班固:《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10~1611页。
- [92] 班固:《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75页。
- [93] 陈寿:《三国志·魏书·卷十五·张既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471~477页。
- [94] 令狐德棻:《周书》卷2《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34页。
- [95] 冯绳武:《论甘肃古代交通》,《兰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第78~86页。
- [96] 陈寿:《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二·陈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638~641页。
- [97] 考证见《唐蕃古道走向的在考察》一文。
- [98] 班固:《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12页。
- [99]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九·陕西八》,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416页。
- [100]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卷二·河陇西区》,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第364页。
- [101] 雍际春:《嬴秦故园》,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0页。
- [102] 费廷珍:《直隶秦州新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
- [103] 房玄龄:《晋书·卷四十·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35页。
- [104] 陈悦新:《中心文化对北朝麦积山石窟的影响》,《敦煌研究》2006年第4期,第15~18页。
- [105] 项一峰:《丝绸之路与麦积山石窟》,《丝绸之路》2000年第1期,第21~24页。
- [106] 项一峰:《试论天水与四川佛教石窟之间的关系》,《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第104~108页。
- [107] 庄浪朱林寺的3号、4号窟,佛沟寺的2号洞窟,其窟外形制和麦积山部分北周石窟一致。
- [108] 《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
- [109] 张天恩:《天水出土的兽面铜牌饰及相关问题》,《中原文物》2002年第2期,第43~46页。
- [110] 康柳硕:《甘肃出土的丝路外国钱币》,《陇右文博》1996年第1期,第145~149页。
- [111] 李永平:《天水出土的围屏石榻及相关问题研究》,《陇右文博》2001年第2期。
- [112] 范三畏:《“甘谷”县名的深层文化意蕴—兼考旧县址之位置》,《西北史地》1995年第1期,第13~17页。
- [113] 《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九·陇右道上》伏羌条云:“伏羌县,中。东北(应为东南)至州一百二十里。……”又据《太平寰宇记·卷一五〇载》,宋大潭县北一百三十里有古城:“平襄城(冀县),汉县也……大像在县东一里,石崖上有大像一躯,长八尺(丈),自山顶自山下,二千三百三十丈,有阁道可登。”
- [114] 东汉永元十七年(公元74年)汉阳郡治由平襄(治今甘肃通渭)移治于冀县(治今甘谷西)。灵帝永宁元年(公元

- 168年),凉州刺史治所亦由陇县(治今张川)移治于冀县城。西晋泰始五年(公元265年)至太康七年(公元286年)为秦州治,太康七年后移治上邽(治今天水市)。
- [115]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九·陇右道上·秦州》,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81页。
- [116] 汪保全、李虎生著:《瑰宝遗珍—天水馆藏文物精粹》,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7-98页。
- [117] 范晔:《后汉书·志二十七·郡国五》,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517页。
- [118] 范晔:《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13-532页。
- [119] 陈寿:《三国志·卷四十四·姜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1062-1070页。
- [120] 《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九·陇右道上·秦州》记载:“襄武县,本汉县也,属陇西郡。隋开皇三年罢郡,县属渭州,大业三年复属陇西郡。武德元年改属渭州。”
- [121] 四河发源于陇西县西偏南之颛头山,与荆头川音相似;穆彰阿主修《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记载:“荆头川水在陇西县南”;《巩昌府志》记载:“有南河,源出府南三十里荆谷。东北流经府南锁谷山之烽火台下,北入渭”,《巩昌府志》“南河”实际为四河之支流。
- [122]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85年,第374-375页。
- [123] 牟世雄:《陇西发现东罗马拜占廷金币》,《甘肃金融》1999年第9期,第52页。
- [124] 脱脱等:《宋史·卷三二八·王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580页。
- [125]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九·陇右道上·渭州》,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83-984页。
- [126] 胜州都督王先墓志铭云:“如意元年改渭州渭源镇副”,可知渭源县置镇。
- [127] 脱脱等:《宋史·卷八十七·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162页。
- [128] 脱脱等:《宋史·卷三二八·王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580页。
- [129] 陈寿:《三国志·卷二十二·陈泰传》;《水经注·卷二·河水注》;《水经注》卷17《渭水注》。
- [130]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巩昌府》,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419页。
- [131] 柳树坪一带可能就是《水经注》所说的高城岭,高城岭上的重要关津渭源城就在这里。
- [132] 裴文中:《甘肃史前考古报告》,《裴文中史前考古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08-255页。
- [133] 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69-2908页。
- [134] 临洮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临洮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76-678页。
- [135]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临洮府》,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419页。
- [136] 王宗元:《河关故城考》,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540-541页。
- [137] 酈道元:《水经注·卷二·河水注》,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
- [138] 陈寿:《三国志·卷九·夏侯渊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271页。
- [139] 脱脱:《宋史·卷八十七·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164页。
- [140] 脱脱:《金史》卷二十六·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55页。
- [141] 宋濂等:《元史·卷六十·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432页。
- [142] 冯国瑞:《炳灵寺石窟勘察记》,《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本。
- [143] 脱脱:《宋史·卷八十七·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164页。
- [144] 石磊:《炳灵寺附近关城考》,《西北史地》1996年第4期,第39-46页。
- [145] 魏征等:《隋书·卷三·炀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3页。
- [146] 刘昫:《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34页。
- [147]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地理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40-1041页。
- [148] 魏征等:《隋书·卷三·炀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3页。
- [149] 陈寿:《三国志·卷二十二·陈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638-641页。
- [150] 兰州市七里河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兰州市七里河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8页。
- [151] 陶保廉著、刘满点校:《辛卯侍行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3-214页。

丝绸之路与汉唐驿道
——以甘肃、宁夏为中心

一、引言

秦王朝建立以后，一扫春秋战国诸雄割据的局面，在帝国的框架下，畅通无阻成了重要而迫切的需要，“车同轨”是帝国政令畅通的基础之一。秦朝对今甘肃、宁夏地区的控制伴随着秦朝郡县制的确立而实施，这个界线已经超过了战国时期秦国修筑的长城范围，根据《史记》的记载，这条长城是秦昭襄王为拒胡而筑造的，陇西、北地、上郡也在这时归于秦国版图。^[1]秦始皇在王朝安定之后，开始巡视各地，他的巡视包括了陇西（今甘肃省临洮南）、北地郡（今甘肃省宁县西北）等地区。鸡头山（今宁夏六盘山）是秦始皇的目的地，他经过回中后返回咸阳。^[2]虽然，秦始皇的这次巡视并没有走得很远，但却奠定了官方道路的基础。秦将蒙恬将兵三十万，北逐匈奴，取河南地，并筑城四十四临河。广大的河套平原被称之为“新秦中”，此地空旷少民，徙民实之。^[3]开通道路、设置郡县、移民实边，经过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帝国的西北边疆获得了巩固，尤其是秦人开辟的道路，成为了后来汉唐官方驿道的基础，当然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虽然无意全面检验甘肃、宁夏段“丝绸之路”的全部成果，但根据文献、考古实物及调查所得，简单地勾勒出本区域的“丝绸之路”的一般路线，却是目标之一。

二、汉代驿道的开通与丝绸之路

西汉初年，西北边疆并不稳固，不断受到来自匈奴的入侵。官方驿道的确立，与几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有关联，并促使了交通要道驿、传建制的完善。

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十四万大军南侵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绕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汉文帝遂发车骑前往击胡迎敌，然而匈奴人并

不愿意正面作战，史载“单于留塞内月余乃去，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4]实际上正是由于匈奴人主动撤退，汉军才得以防守长城。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孝文本纪》在记录同一场事件时称：“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杀北地都尉印。”^[5]朝那塞就是萧关，后者是前者的别称，此后以萧关著名。关中者，四关之中，即：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是汉都长安通往塞北的重要关隘，在汉与匈奴的分界线上。

匈奴强大以后成为汉帝国的心腹大患，从高祖刘邦开始就与匈奴和亲，但随着匈奴本身生存压力的加大，和亲政策并不能解决汉匈根本问题。汉武帝时，雄心勃勃的刘彻决心要打通西域通道，联合西域诸国，以断匈奴右臂。派遣大将霍去病率大军西进，打败匈奴在河西走廊上的浑邪王与休屠王。为巩固汉王朝在河西地区的直接统治，设置了所谓的河西四郡：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关于河西四郡设置的年代，长期以来悬而未解，主要原因是史料记载上的相互矛盾。^[6]但无论如何应在武帝元狩至元鼎年间设立。与此同时，汉武帝又将原北地郡南部析出设安定郡，将陇西郡之东北部析置天水郡。至此，整个通往河西走廊至关内的全部道路被全线贯通，并且在重要地区设置郡县控扼要津，保证道路畅通无阻。

汉武帝在河西四郡设立之前就已开始尝试通西域，建元三年（前138）张骞率团第一次出使西域。可是一入河西走廊就被匈奴人俘获，数十年后才逃脱，并继续西行直至大夏。张骞返回长安后，西北局势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广大的河南地及河西走廊已完全在汉王朝的管控之下。张骞的二次出使西域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他的副使分别到达大宛、康居、月氏、大夏、中亚诸国，并沿着丝绸之路顺利返回长安。

汉武帝本人也数次西巡西北，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所谓的“通回中道”，也提到了萧关。据《汉书·武帝纪》载：元封四年（前107）冬十月，武帝“行幸雍，祠五寺。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自代而还。”^[7]应劭注：“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险阻，萧关在其北，通治至长安也。”孟康注：“回中在北地，有山险，萧关在其北。”如淳曰：“《三辅黄图》云回中宫在汧也。”颜师古注：“回中宫在安定，北通萧关，应说是也。而说治道至长安，非也。盖自回中通道以出萧关，孟、如二家皆失之矣。回中在汧者，或取安定回中为名耳，非今所通道。”^[8]以上注家的理解注释虽不尽相同，但无疑是我们现在研究回中道的基础。总结起来，汉武帝所通的回中道是西汉长安通往高平郡治高平的重要通道，回中道的北端就是著名的萧关。萧关是依托长城而修筑的关隘，其遗址或在今宁夏固原北十里许的秦、汉长城附近。^[9]

近年间考古工作者在调查回中宫、萧关遗址时均有所得，果家山遗址位于宁夏泾源县东北的瓦窑山山前坡地，坡地自北山而南倾斜，现呈阶梯形耕地，原地貌亦可能是多层台地。其前是一条河流，当地人称香水河。遗址东西约800米，南北宽约300米以上。遗址地面遗物有大量建筑材料，有板瓦、筒瓦、砖等，其中筒瓦有的长达50厘米。瓦当有圆形和半圆形，其中一件夔纹瓦当，直径47厘米，这与秦始皇陵出土瓦当形制规格、纹样等完全相类似。考古工作者曾对该遗址进行过调查、试掘，在距现地表深2米处发现铺地砖、排水套管。综合调查结论是，这是一处秦朝始建，汉代沿用的大型建筑遗址，规模宏大，建筑材料的规制、等级都很高，有可能与文献记载中的秦汉回中宫遗址有密切关联。

清水河流过固原城后，形成一河谷地区，西面较高，东面是山，长城逾清水河时形成拱卫环抱之势，内侧则有一古城。古城北距长城约六七百米，整个城面积约为420 000平方米（700米×600米），只是全部城垣情况无从了解，仅存北墙约150米，高约2~3米不等。

整个城址的文化层堆积十分丰富，也十分单一，有1米左右。地面和断面采集的遗物有绳纹筒瓦、板瓦、云纹瓦当、菱形、方格纹壁砖等。文化面貌较为单一，基本上都在西汉中期以前，在一些断面的房址上有火烧的痕迹。可以看出城址并未经过多代连续使用，使用不久即废弃，无疑与不远处的长城属于同时代，并且有密切的关联。我们在分析若干与汉代萧关有关的

史料后，有理由认为可能是汉代萧关遗址（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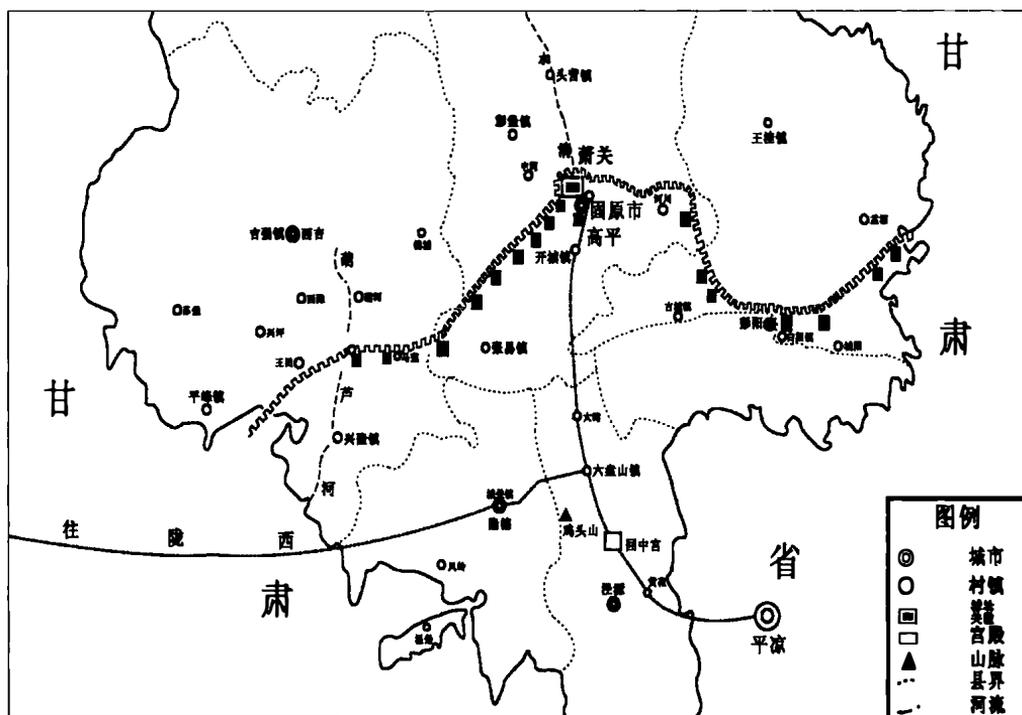


图1 战国秦长城及萧关可能位置示意图

张骞开通西域后，汉王朝得到了许多有关西域的信息，陆续前往的使者竞相奔走西域，也促使朝廷努力维护相关设施。西域诸国使节也“随汉使献见天子，天子大悦”。^[10] 在长安通往西域道路上，透过兵威使诸国臣服，又用财赂利诱，并设官吏，分任其事，经过这样仔细的经营，正如《后汉书·西域传》所描述的局面：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11] 官方邮驿传置的设立，是保持道路畅达的重要手段。

非常幸运的是，考古发掘的汉代遗址出土了较为完整的木牍材料，使汉代起始长安终于敦煌，长达数千里的国家道路得以重现。20世纪70年代初，考古学家在汉代居延甲渠候官遗址中获得简牍，编号74EPT59: 582的木牍用隶书书写了道路名称，共计十六行：

长安至茂林七十里，
 茂林至置州五里，
 置至好止七十里，
 好止至义置七十五里，
 月氏至乌氏五十里，
 乌氏至泾阳五十里，
 泾阳至平林置六十里，
 平林置高平八十里，
 媪围至居延置九十里，
 居延置至鱗里九十里，
 鱗里至次九十里，
 次至小张掖六十里，

删丹至日勒八十七里，
日勒至钩著置五十里，
钩著置至屋兰五十里，
屋兰至池五十里。^[12]

木简用松木制作，全部的文书从上至下当分为四栏，现存三栏，每栏从右至左分四行书写，现存12行，^[13]每行8~9字不等。木简出土于破城子A8探方T59第二层，从堆积上看属西汉成、哀帝时，简牍文字没有王莽改制的痕迹，当属其前。^[14]具体的年代为元鼎时期或稍后一些。简牍残阙原无标题，何双全定名为《传置道里簿》，^[15]今从此名。

《传置道里簿》第一、二栏记录从长安至安定郡治高平全线传置的名称和道里，即长安—茂陵—获置—好畴—义置—月氏—乌氏—泾阳—平林置—高平，共十程，全程合计495里。《史记案隐》中引《广雅》云：“置，驿也。”《续汉书》中又云：“驿马三十里一置。”如淳云：“律，四马高足为传置，四马中足为驰置，下足为乘置。”^[16]汉时在国家主要道路上都设置传置，所谓“列亭传，置邮驿”^[17]，以确保政令畅达。《传置道里簿》中的置大多沿郡、县配置，里程稍多，不过平均起来基本上相当于现西安（长安）至固原（高平）的距离。简文中置的名称虽有一些能与记载中县名相对应，如泾阳、乌氏之类，但高平之类^[18]，仍然不便确指今之城址对应地名。

高平以西的简文阙佚，高平至武威郡姑臧的大部分郡县传置名称、道里已不可知晓。值得庆幸的是1990年考古工作者又在敦煌悬泉遗址中发现另一枚简牍。它所记载的内容恰好和《传置道里簿》内容可以衔接。《悬泉簿》内容如下：

仓松去鸾鸟六十里，
鸾鸟去小张掖六十里，
小张掖去姑臧六十七里，
姑臧去显美七十五里，
池去鱧得五十四里，
鱧得去昭武六十二里府下，
昭武去祁连置六十一里，
祁连置去表是七十里，
玉门去沙头九十九里，
沙头去乾齐八十五里，
乾齐去渊泉五十八里，
右酒泉郡县置十一，
六百九十四里。^[19]

何双全对于此简版与《传置道里簿》进行了直接勾连，以为这是可以直接后者传置名称^[20]，实际两者间尚有缺环。实际上，这两枚简牍记述两条通往武威郡张掖的道路，在《传置道里簿》记：媪围至居延置—鱧里—一次—一小张掖，这条道路是从今天甘肃靖远进入景泰，绕经寿鹿山东麓，过土门入武威境。而在《悬泉簿》则是仓松—鸟—一小张掖—姑臧—显美，此条路是经由乌鞘岭，经天祝，过古浪至武威境内^[21]（图2）。

两条简牍记载的内容大体上可以勾勒出从长安至敦煌的驿道基本走向，共经过八个郡，涉及二十七个县的一个置，当然这尚不是全部，全部应在四十个以上，多数以县为置名，也有一些小的地名如获置、平林等充作传置名称。简牍中有详尽的里程统计，悬泉置编号92OXT1611③：39A、39B的简记：

张掖千二百七十五一，

冥安二百一七，
武都千七百二，
安定高平三千一百五十一里三，
天水平襄二千八百州东南，
长安四千八十。[22]

这些由悬泉置向东到张掖、武都、安定、天水、长安的里程计算，包涵着传置有可靠的信息来源。

悬泉置简牍中有许多是与西域诸国使交往的记载，有大月氏、康居、罽宾、乌弋山离等国。主要是传置供食使者记载，也有康居使诉讼的文书，还有一条是“以食钩盾使者迎师子。”师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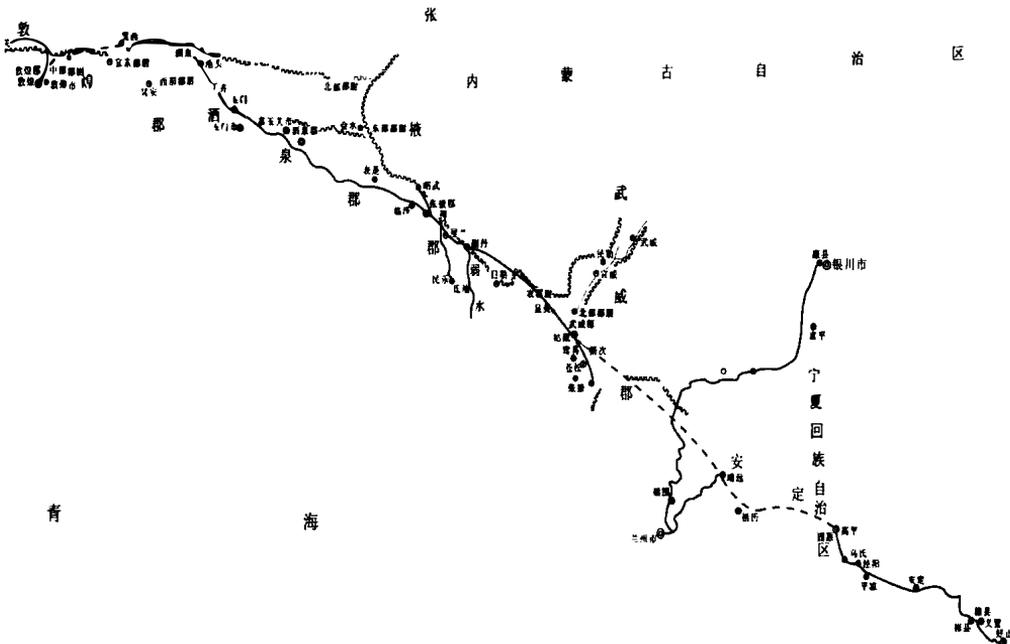


图2 汉代长安—安定—凉州—敦煌驿道

即狮子，西汉时西域国家就有狮子进贡。[23] 传置制度中关于国外使者，有一套较完善的接待制度，官吏则按规定办事，一旦在某些环节出现问题，还可照章诉讼。简牍中就有康居国使者与酒泉太守在评估骆驼毛色、肥瘦方面产生分歧的申诉文件。[24] 越来越多的丝绸被通过驿道运往西方国家，西方的奢侈品也源源不断地开始输送到汉朝，丝绸之路就这样担负起了它的使命。

丝绸在运往西域时常常被储存在驿置所在的重要据点。[25] 居延汉简中就记录了这方面的内容，有些数量还不小，布帛的产地在任城、河内及广汉等地。[26] 这些丝绸有时被作为货币使用，用来支付士兵或商人的资费，大批量的则作为商品输出西域。

有西方风格的金银器通过驿道来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讨论的道路沿线，出土一种有变形的西方文字的铅饼，虽然铅饼上文字的辨识并未获得共识，[27] 动辄上百枚的出土品，无疑代表了那个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水平。

三、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丝绸之路

永嘉之乱以后，中国内地深处极度的混乱之中，河西诸国偏安一隅则没有受到动乱的冲

击，与西域联络畅通，沿着丝绸之路的东西文化交流仍无阻碍。西晋末年，河西走廊在凉州刺史治理下安定繁荣，给前凉政权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从此之后的五凉政权都重视向西域的发展，利用地利之便谋求与西域交往，东晋南朝的使团也纷纷通过他们假道出使西域诸国。拓跋鲜卑强盛以后，以平城（今山西大同）为政治中心，缓慢地向西推进。

登国六年（391）魏太祖率军西进，围剿匈奴刘卫辰部，在五原（内蒙古五原）的金津渡黄河，直取刘卫辰盘踞的悦跋城（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境）。刘卫辰被部属所杀后，其子赫连勃勃，率残部投奔高平川（今宁夏清水河）一带活动的岳父没奕于，两股势力合二为一。北魏的五万大军在常山王元遵的指挥下进攻鲜卑，破多兰部没奕于。^[28] 没奕于、赫连勃勃败走天水。这样，我们可以从文献中整理出一条从平城到高平的行动路线，赫连勃勃沿此路南下至高平，北魏大军也尾随而至，前田正名称之为“鄂尔多斯南缘路”。^[29] 赫连勃勃袭杀没奕于，并其部众，于天赐四年（407）自称大夏国，定都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县北）。赫连勃勃死后其子赫连昌继位，太武帝拓跋焘率军攻占统万城，获府库珍宝、器物不可数计，马、牛、羊百万头。^[30] 赫连昌只得退回陇山一线，在高平附近。魏大军围安定城（今甘肃泾川县境），军民举城而降，赫连昌被擒。众又推赫连定退守平凉，平凉（今宁夏彭阳县红河乡）为魏军攻破后，至此，丝绸之路重要通道安定，高平一线全线贯通，魏军控制了今山西大同到今宁夏的全部地区。

北魏的下一目标便是河西走廊，为交好北凉政权，多次派使者前往姑臧（今甘肃武威）。李顺曾经十二次出使凉州，^[31] 通好北凉。此外北魏多次派使者出使西域，董琬、高明等六批魏使出使西域，大获成功，他们返回后，西域遣使来贡献者有十六国。^[32] 虽然魏使在出使西域时获得北凉政权的保护，牧犍也派人引导走过沙漠道，但北魏仍然不希望通往西域的大道上盘亘着北凉这一障碍。太延五年（439），太武帝亲率大军讨平北凉，罗织的十二条征讨理由，其中向胡商课税，以断行旅是重要的一条。姑臧攻破后，魏军获取了大量的西域奇珍异宝。波斯的毛制品、金银器，西亚中亚的玻璃器及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等大量流入中国，在现代的考古发现中，这些奢侈品实物也不断出土在丝绸之路沿线的遗址和墓葬之中。^[33]

在敦煌，发现一件北魏刺绣，上面的图案、人物装束，与宁夏固原的北魏漆棺画上的龟背联珠纹图案、鲜卑人装束非常相似。北魏刺绣上有太和十一年（487）纪年，据研究刺绣是由平城带到敦煌。^[34] 这类风格的相互传播，暗示着平城、高平和敦煌之间，不但有实物的流传，在艺术风格上也有沿丝绸之路流行的倾向。

中亚粟特人从公元4世纪开始就是丝绸之路贸易的操纵者，他们不远万里，长途跋涉，将中亚的奢侈品运往中国，为保持贸易活动的可靠稳定，在道路的途中建立聚集点。较为密集的移民聚落有敦煌、张掖、武威、原州和天水等地。^[35] 中亚康、安、史等姓人大量移居这些丝绸之路重镇，有的不但建立商团，还建立保护商团和聚落安全的武装军团，成为当地一支重要的地方势力。^[36]

北魏太延二年（436）与高平镇同时设置的还有薄骨律镇。《水经注》中记载：薄骨律镇城在河渚上。赫连果城也。桑果余林，仍列洲上。但语出戎方，不究城名。访诸耆旧，咸言故老宿彦云：赫连之世有骏马死此，取马色以为邑号，故曰“城为白口骝韵之谬，遂仍今称所未详也。”^[37]

北魏破赫连昌后在薄骨律镇北收胡户徙之，因号故地城。“此处胡户何指，史书固然没有明文，但是，他们必定不是当地习见的屠各、步落稽等部落则无疑义。”^[38] 这暗示可能与西域胡人有关联。北魏时的薄骨律镇（后来的灵州今宁夏吴忠市），已经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重镇（图3）。

北魏太和后迁都洛阳，西域商团、使者仍沿着河西走廊、武威、高平通往长安、洛阳。史载嚧哒国向北魏贡献一头狮子，途经高平时，正巧关陇发生镇民暴动，狮子为首领万俟丑奴扣押，并改元“神兽”，^[39] 以纪念狮子的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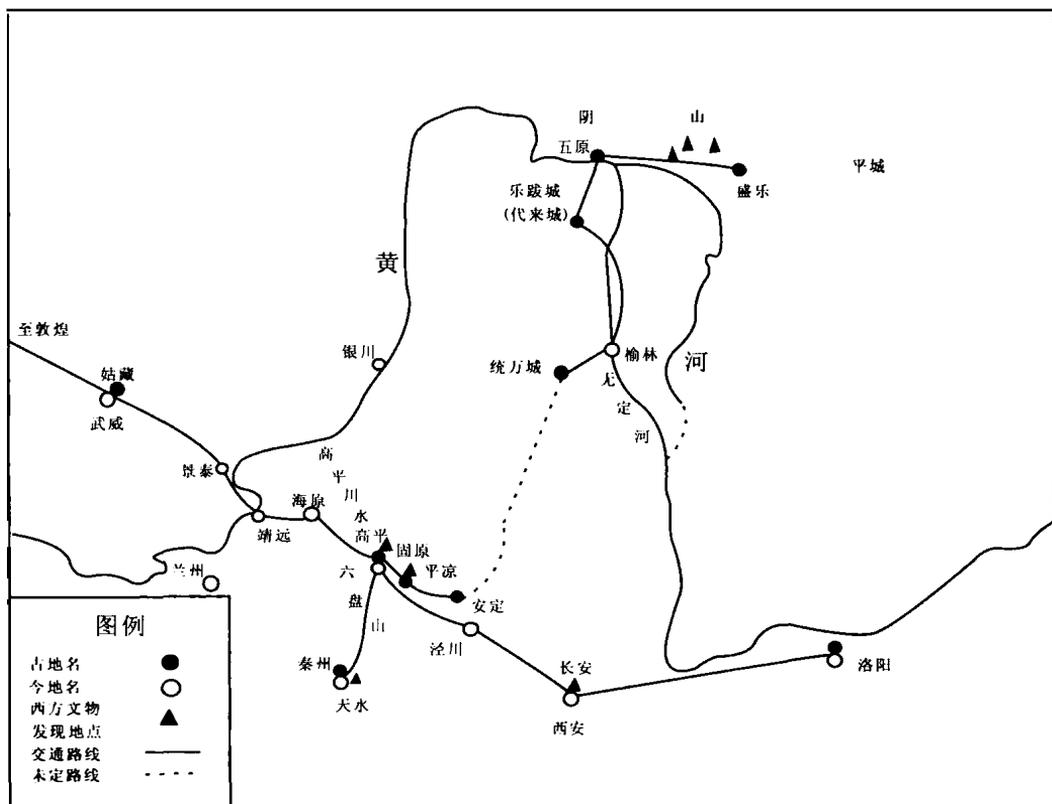


图3 北朝时期平城、高平、姑臧一线交通图

四、唐驿道与丝绸之路

隋唐时期，帝国疆域空前扩大，行政运作模式促使其围绕政令畅通，建立规模空前的驿传网络。朝廷的命令如果需要，很快会沿着驿传到达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即使在帝国衰落时期的晚唐，其效率仍然使人吃惊，以致于有时基于某种特殊考虑，要特别放慢速度。曾官至泾原节度使的少数民族将领，灵州人史宪忠受命于危际，“会党项羌内寇，又徙朔方，有诏驰驿赴屯。”史宪忠觉得驰驿抵达灵州（今宁夏吴忠），速度太快，容易引起党项羌人误会，应缓行，以消弥他们的疑虑。果然“羌人乃皆喜，奉酒湏而迎道。”^[40]那么史宪忠依据的是什么关于驰驿的律条呢？据《唐律疏议》载：“依公式令，在京诸司，有事须乘驿，及诸州有急速大事，皆合遣驿。”^[41]

早年间官员的乘驿条件严格，后来可以利用乘驿的范围变得很广，这是纪纲紊乱的结果。

按照规定：“诸道须置驿者，每卅里置一驿，若地势险阻，及无水草处，随缘置之。”^[42]道路的重要之处设置关隘，以限中外，隔华事，设险作固，闲邪正暴。^[43]根据距离驿道的远近及重要与否，关分三等，上、中、下，用于控管全国道路，全国共有二十六关。

京城四面关有驿道者为上关，余关有驿道及四面关无驿道者为中关，他皆为下关焉。^[44]其中位于甘宁两省的关有：上关原州陇山关，中关会宁关、原州木峡关等，这些关隘都控扼驿道。

驿道是唐人主要的交通道路，及全国各地“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长安城西北来第一门曰安远门，本谓之开远门也），阊阖相望，桑麻翳野”。^[45]“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46]繁荣盛况空前。长安通往河西道路，据《元和郡县图

志》载，凉州（今甘肃武威）东北至上都，取秦州路二千里，取皋兰路一千六十里。^[47]长安通往凉州，有两条，其一是经由秦州（今甘肃天水），其二是经由乌兰路，取道后者的距离，一千六十里实际经推算是一千六百里之误。^[48]

长安至凉州所谓的乌兰路，是我们讨论的重点。这条驿道出长安开远门，西北行，在咸阳渡渭水，过礼泉驿（今礼泉县），经过奉天驿（今乾县），北上永寿（今永寿县）、邠州（今彬县）至泾州（今甘肃泾川县），进入今日甘肃省境内。泾州位于泾水河谷的南岸，南北均是高原山地，史称：

“泾渭之间，地形平敞，正当西塞之口。至德以后，河湟尽陷，西鄙之地极于潘原，遂屯重兵，外州为方镇。又谓散地不足守御，乃建平凉为渭州，临泾县为行原州，外张蕃翼之卫。本朝（指宋）建镇戎军（今宁夏固原）以通陇右，置德顺军（今宁夏隆德县）以制山外，渐复襟带之固。”^[49]

泾川之地虽无险据守，但中唐以后吐蕃乘机南侵，广德元年（763）入大震关（今陕西陇县）“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略）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50]泾州就成了唐人西北边境，地位日益凸显，遂有重兵屯守，升格为方镇。泾州的治所在安定县，后更名保定。整个唐代长达近300年之久，每一时期的重要城、堡并不完全一致，中唐以后的连云堡成为泾州扼守的要塞。“堡之三面颇峭峻，唯北面连原，以濠为固（略）。泾州之西唯有连云堡，每侦察贼之进退。乃是堡陷，泾州不敢启西门，西门之外皆为贼境。”^[51]

泾州向东是潘原县，《元和郡县图志》云，本汉阴盘县，属安定郡。地有阴槃驿。^[52]唐蕃贞元会盟平凉，骆元光与浑瑊将发泾州，称：“本奉诏令营于潘原堡以应援侍中。窃以潘原去盟所六七十里，蕃情多诈”。^[53]此后潘原堡亦是唐人防御吐蕃之重要据地，过去的阴槃驿则在驿道上。

寻泾水西上就是平凉县，北朝、唐初的平凉并不在此，而是在治阳晋川，在今宁夏彭阳县红河乡境。^[54]开元五年（717）移治古塞城，贞元中又移旧县南坂，基本上就在今甘肃平凉地境。唐元和四年（809）以渭州陷蕃，权行渭州于此。唐蕃会盟坛在平凉县西北2.5公里处。^[55]

再往西就是弹箏峡，弹箏峡是吐蕃人南下的重要通道，也是唐驿道北上的必经之地。建中四年（783）唐蕃会盟词中，历数唐蕃各自的领土，称唐“今国家所守界，泾州西至弹箏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56]云云。贞元年间诏泾原节度使刘昌筑平凉城，“以扼弹箏峡口”。^[57]修筑平凉城的目的就是为了扼守弹箏峡口，以备吐蕃南侵。又在平凉西别筑胡谷堡，名曰彰信。胡谷堡向西入弹箏峡，“故泾水亦曰薄落水。又南流经都卢山，山路之中，常如弹箏之声，故行旅因谓之弹箏峡”，^[58]水声如弹箏之说由来已久，《太平寰宇记》中引《水经》云：“泾水经都卢山，山路之内，常有如弹箏之声，行者闻之歌舞而去。又云：弦歌之山，峡口水流，风吹滴崖，响如弹箏之韵，因名之。”^[59]

西出弹箏峡后，驿道分为两道路，一逾六盘山，经今天宁夏隆德、静宁等地，往兰州方向，亦在隆德向南至天水方面；另一路则沿瓦亭、开城到达原州。

陇山关是六个上关之一，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庚辰，至泾州。丙戌，逾陇山关，次西瓦亭”，“观牧马”，^[60]在今天的六盘山上。虽然陇山关是这条驿道上最重要的关隘，但文献记载甚少。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原州有石门、驿藏、制胜、石峡、木靖、六盘等六关。其中并无陇山关，不过又说平凉县“西南陇山上有六盘关”^[61]。这样，很可能陇山关后来改称六盘关。

从六盘山折北上经过的是瓦亭，瓦亭是东汉牛邯屯军处，唐李贤注：“安定乌支县有瓦亭故关，有瓦亭川水，在今原州南”。^[62]胡三省也说：“原州平高县南有瓦亭故关。瓦亭水出陇山，

东北斜趣，西南流，经成纪、略阳、观亲界，又东南出新阳峡入于渭。故有东西瓦亭之别”。^[63]瓦亭关在此时可能已废弃。

从瓦亭北上约八十里是原州，也就是汉安定郡治高平、北朝之原州、隋唐之平凉郡。元载曾为西州刺史，他认为知河为西陇右之要害，并指画于上前曰：“今国家西极于潘原，吐蕃防戍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间。原州当西塞之口，接陇山之固，草肥水甘，旧垒存焉。吐蕃比毁其垣墉，弃之不居。其西则监牧故地，皆有长濠巨堑，重复深固。”

元载请修筑原州城，未几，元载获罪，此议耽置未果。^[64]后吐蕃曾两次修原州并居之。原州唐中期以前位置非常重要，亦是陇右监牧的所在地，是全国军马的供给、指挥中心。安史之乱后，吐蕃借机侵入秦陇之地，原州亦在其中。大中三年（849）节度使康季荣收复关陇三州、七关，原州复归大唐。^[65]

出原州，沿清水河北上所经一个重要的关隘即石门关。石门关原州七关之一，元载的建议中曾云：“移（郭）子仪大军居泾以为根本，分兵守石门、木峡、陇山之关，北抵于河，皆连山峻岭、寇不可越。”^[66]吐蕃结赞劫平凉之盟后，将唐臣在石门关遣返。^[67]石门关的具体位置在今固原西北的黄铎堡，宋代在此置平夏城、怀德军。

过石门关至今固原黑城，折转西上沿苜蓿河谷至海原县贾端乡，再经海原县城，西行至西安州，过干盐池。唐人称干盐池为“河池”，《元和郡县图志》载：“河池，西去州（会州）一百二十里。其地春夏因雨水生盐，雨多盐少，雨少盐多，远望似河，故名河池。”^[68]

过干盐池之后就按甘肃靖远的打拉池，干盐池与打拉池都是过去产盐的地方。再向西公里到黄河岸边，唐代于此设置会宁关，是十三个中关之一。敦煌文书P.2507号《水式部》载：“会宁关有船伍拾只，宣令所管差强了官检校蕃兵防守，勿令北岸停泊。自余缘河堪渡处，亦委所在州军严加提搦。”^[69]

会宁关要渡黄河，每船船夫即所谓“渡子”五个，那么五十只船就需250人左右，研究者推算，每天可渡千人以上。^[70]是否摆渡千人，当然可以讨论，不过会宁关的繁忙是可以肯定的。这时与吐蕃关系已经日趋紧张，朝廷才会饬令船勿北岸停泊，在沿河可渡处加强防守。会宁关同样是在开元年间《唐六典》的记载中，日常并没有这样船多人广，按照规定“大津无梁皆给船人，量其大小难易以定其差等”，会宁关虽然已非常重要，但关船仅为三艘，每船渡子，仅有五人。^[71]敦煌《水式部》记载的数量无论是水手还是服役者数量都很大，这种大约同时代相同内容文献载录的差异，是值得进一步关注的。

渡过黄河对岸就是乌兰关，据《元和郡县图志》载，会宁关与乌兰关东南相距四里。因“旧城内沙石不堪久居，天授二年，移于东北七里平川置”。^[72]乌兰关和乌兰县同在一地。黄河这条天然屏障，横阻会宁、乌兰两关之间，尤其是对河北的吐蕃人来说，南下进程遭受阻拦。所以吐蕃人便想在黄河上架起桥梁。《旧唐书·王佖传》载：元和中“先是吐蕃欲成乌兰桥于河壖，先贮林木，朔方节度使每遣人潜载之，委于河流，终莫能成。至是，蕃人知（王）佖贪而无谋，先厚遣之，然后并役成桥，仍筑月城围守之。自是朔方御寇不暇，边上至今为恨”。^[73]吐蕃人终于在黄河上架起桥梁。再向西进，经现在的甘肃景泰，可抵河西重镇武威。这大约400公里的行程基本上与长城的内侧并行。

唐时驿道从原州北向，除一道通向会宁关、乌兰关至凉州外，另一路则通往灵州。灵州，是唐朝西北最重要的都会之一，唐朝初年，太宗曾亲赴灵州会见突厥、铁勒等北方部族首领，促成与北方部族的和解，太宗也被诸部推举为天可汗。安史之乱以后，唐肃宗北上灵州即位，更是大大地提高了灵州的国内、国际地位。

肃宗就是依照驿道北上的，肃宗先到渭北，便桥已断，收残军两千余人，从奉天向永寿进发。到达新平郡时，已昼夜兼程奔驰三百余。到达乌氏驿时，彭原太守来谒见，并募得甲

士四百余名，获得补充。继续北上抵达平凉郡（今宁夏固原），获得陇右监牧的公私良马万余匹，军心大振。肃宗在平凉虽然获得很大补充，但由于没有获得灵州军方的正式表态，史载“数日之间未知所适”。^[74]灵州的朔方军派遣杜鸿渐一行前来迎接，并陈述招兵买马，粮草兵甲之数，肃宗这才恢复信心。朔方军又派数千步骑在白草军奉迎。

白草军，《云和郡县图志》载，萧关县，南至州（原州）一百八十里。“本隋他楼县，大业元年置，神龙三年废，别立萧关县，以去州阔远，御史中丞侯全德奏于故白草军城置，因取萧关为名”。^[75]萧关县在蔚茹水的西岸，蔚茹水即今之清水河。

肃宗过白草军，“行至丰宁南，见黄河天堑之固，欲整军北渡，以保丰宁，忽大风飞沙，跬步之间，不辨人物，乃回军趋灵武，风沙顿止，天地廓清”。^[76]丰宁城属灵州灵武郡辖，大约在今宁夏中宁黄河北岸。

宋代初年，这条路仍然是北向通往灵州大道，据《武经总要》记载：“缘胡卢河川路，北控贼界，从苇子湾至故萧关。萧关路，自军（镇戎军）北刘璠堡，缘胡卢河川，过古城，入苇子湾，出萧关，至鸣沙县界，入灵武约五百余里。地形平敞，至道中李继隆护送贼粮入灵武由此路。”^[77]

总体上来说，我们讨论的这些道路关津在唐人的眼中亦为要津，吐番人也多次由此侵入内地，宰相李德裕曾经说“自陇山天宁关，北至萧关、原州、安乐州、乌兰桥等，皆是贼之险路，入寇要津。”^[78]

唐代的灵州原址是与北朝的薄骨律镇相同，它的具体位置长期以来人们并不清楚。最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吴忠西北的墓地中发现一块墓志。墓志的主人是一位吕姓夫人，志中明确记载，墓主于“太和四年七月六日终于灵州私第”，并于同年十月四日殡于迴乐县东原。^[79]迴乐县是灵州治所（图4）。

唐肃宗灵武继位后，所有军事、政治力量云集灵州，灵州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成为唐人的中兴之地。塞北民族也会聚朔方，以迴纥为首的诸多民族，借机与唐王朝建立密切的联系，即进行著名的“绢马贸易”。回纥使者也将灵州视为必经之途，大历十三年（778）“三月，甲戌，回纥使还，过河中，朔方军士掠其辎重，因大掠坊市。”^[80]大中十年（856）“上遣使诣安西镇抚回鹘，使者至灵武，会回鹘可汗遣使入贡。”^[81]两国使者相聚灵州，灵州在国防、外交上的地位得以凸显。

以灵州为中心的丝绸之路贸易活动一直持续到五代、宋初，随着西夏的崛起，灵州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才日渐式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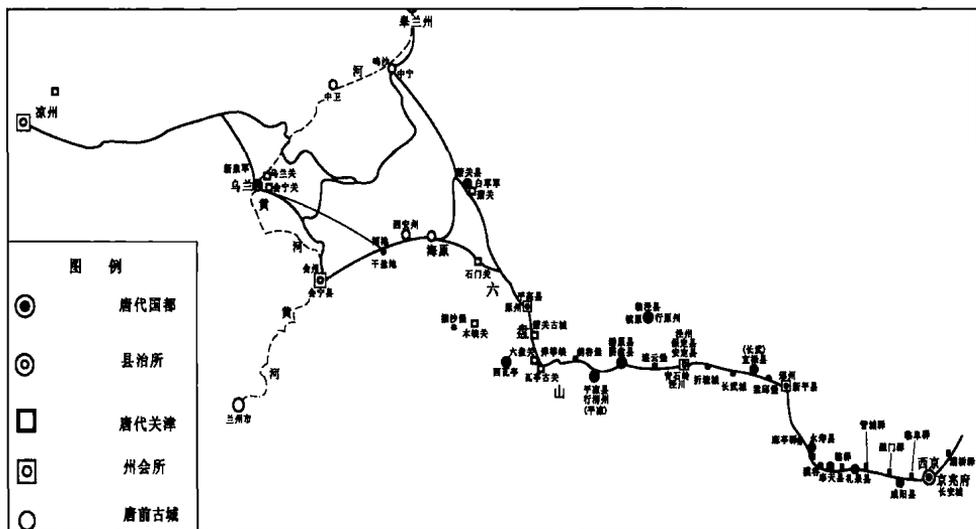


图4 唐长安通往原州、凉州、灵州驿道

五、结语

以上我们讨论了汉—唐时期的国家驿道走向和所承担的功能，秦汉时的设置驿馆，从制度上保持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使远政不废，迅驰抵达。沿驿道而行的官方人士能感觉到官方抚慰，抚慰征者。远国来使入国门即受到应有的礼遇，食、宿费用依标准而行。隋唐时期有关驿道及其相关制度，日臻完善，具体而详尽地规定了有关驿传的各种细节。唐朝的驿馆也成为历代建设最好的官方驿舍，顾炎武曾经说：

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82]

馆舍内规模宏大，杜甫的笔下有池、有林，^[83]元稹在说到褒城驿时也称“已种千杆竹，又栽千树梨。”^[84]官僚、文人在途经驿馆时都有题诗留念。“邮亭壁上数行字，崔李题名王白诗”^[85]，白居易“每到驿亭先下马，巡墙绕柱觅君诗”，^[86]每到驿亭都要寻找元稹的留诗，驿舍留诗成为一种旅行文化。

驿舍的功用虽然是用于官方人士的接待工作，但驿道所经的重要地区，则必定是迅捷便利之路，安全也有保障。丝绸之路上往来人员，除官员、使者外，大量的的是求法、传法的僧侣，逐利前往的商人和普通民众。这些人虽不一定利用驿舍，但驿道则是他们前行中主要行进道路，丝绸之路在某种意义上是与汉唐驿道重合的。

注释

- [1] 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卷一百一十》载：“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中华书局标点本，下同，2885页。关于这段长城实际调查情况，参见宁夏博物馆等《宁夏境内战国秦长城遗迹》，《中国长城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45-51页。
- [2]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载：“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史记集解》应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241页。
- [3]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载：“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秦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胡，略取河南地。”252页。《史记·平准书·卷三十》：“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1425页。有关新秦中位置所在的辨析亦参见鲁人勇《新秦中地望考》，《西北史地》1984年第4期，82-84、72页。
- [4] 《史记·匈奴列传·卷一百一十》，2901页。
- [5] 《史记·孝文本纪·卷十》，298页。
- [6] 关于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参见张维华《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二卷，1942年后收入氏著《汉史论集》，齐鲁书社，1980年；陈梦家《河西四郡的建置年代》，《汉简缀述》收录，中华书局，1980年；劳榘《居延汉简考释·居延汉简考证·有关四郡问题》，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十四，1986年，24-29页；黄文弼《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氏著《西北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 [7] 班固《汉书·武帝纪·卷六》，中华书局标点本，下同，195页。
- [8] 《汉书·武帝纪·卷六》，195页。
- [9] 有关萧关具体位置的说法很多，称其是长城关隘，位于安定高平之北说者，参见罗丰《汉代萧关地理位置的初步研究》，《西北史地》，1987年第1期，86-94页。
- [10] 《史记·大宛列传·卷一百二十三》。另《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卷六十一》亦云：“大宛诸国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犂轩眩人献于汉，天子大说。”2696页。
- [11] 《后汉书·西域传·卷八十八》，2931页。

- [12]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汉简·甲渠侯官》，中华书局，1994年，上册，174页上栏，下册图版，389页。
- [13] 参见何双全《汉代西北驿道与传置——甲渠侯官、悬泉汉简〈传置道里簿〉考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8年第1期，2页。
- [14] 参见何双全《汉代西北驿道与传置》，65页。
- [15] 参见何双全《汉代西北驿道与传置》，62页。
- [16] 《史记·孝文本纪·卷十》，423页。
- [17] 《后汉书·循吏列传·卫飒传·卷七十六》，2459。
- [18] 高平，安定郡治，酈道元《水经注·卷二》河水注云：高平川（今清水河）“东北流，迆高平县故城东，汉武帝元鼎三年，安定郡治也。”“川水又东北流出秦长城，城在县北一十五里。”（陈桥驿《水经注校释·卷二》，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33页）。
- [19]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文物》，2000年5期，33页。
- [20] 何双泉《汉代西北驿道与传置》，64页。
- [21] 参见赫树声《敦煌悬泉里程简地理考述》，《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104-105页。
- [22] 参见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33页。
- [23] 参见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西域资料考证》，荣新江等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129-130页。
- [24] 参见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西域资料考证》，142-144页；王素《悬泉汉简所见康居史料考释》，荣新江等主编《中外关系史》，155-158页。
- [25] 参见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郭文玲等中译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36-137页。
- [26] 参见劳干《居延汉简·居延汉简考释》，64-65页。
- [27] 所谓希腊铭文铅饼在西安、扶风、灵台礼县等地均有出土，时间大约在西汉时期，最晚不过东汉。铅饼上的文字有人以为是变形的希腊文，但并未获得学术界的共识（参见夏鼐《外国字铭文的汉代（？）铜饼》，《考古》，1961年第5期，后收入《夏鼐文集》，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3-9页；《西汉汉城故址出土一批带铭文的铅饼》，同上书，10-11页。
- [28] 《魏书·高车传·卷一百零三》附《薛干传》记载：“牵屯山鲜卑别种破多兰都世传部落。至木易干。有武力壮勇，劫掠左右，西及金城，东侵安定。数年间诸种患之。天兴四年，遣常山王遵讨之于高平。”2313页。
- [29] 参见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李凭等中译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135-157页。
- [30] 《魏书·世祖纪·卷四》，72-73页。
- [31] 《魏书·李顺传·卷三十六》，832页。
- [32] 《魏书·西域传·卷一零二》，2259-2260页。
- [33] 关于这条道路沿线出土的中亚西亚遗物参见罗丰《北魏漆棺画中的波斯风格》，《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73-76页。
- [34] 参见宿白《〈大金西京武州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收入氏著《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102-104页。
- [35] 参见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国学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7-85页，后收入氏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 [36] 参见陈国灿《魏晋至隋唐的河西人的聚落与火祆教》，《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198-209页。
- [37] 陈桥驿《水经注校释·卷三》，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39页。
- [38] 参见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氏著《西域史地丛稿初编》，1995年，263-264页。
- [39] 参见《魏书·西域传·卷一百零二》，2279页。
- [40] 参见《新唐书·史宪忠传·卷一百四十八》，4791页。
- [41] 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十》，刘俊文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209页。
- [42] 狩谷掖斋《笺注倭名类聚抄·卷三·居处部道路具驿条》，全国书房，昭和十八年，158页。
- [43] 李林甫《唐六典·卷六·尚书刑部司门郎中条》，陈仲夫点校本，中华书局，1992年，196页。
- [44] 李林甫《唐六典·卷六·尚书刑部司门郎中条》，195页。
- [45] 《资治通鉴·唐纪·卷二百一十六·天宝二载（753）条》，中华书局标点本，6919页。
- [46] 社佑《通典·食货典·卷七》，王文锦等标点本，中华书局，1988年，152页。

- [47]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卷四十》，中华书局，1983年，1019页。
- [48] 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西碛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八十三，1985年，342-354页。
- [49] 《武经总要·前集·卷十八上》“边防”，“泾原渭化路”条。
- [50] 《资治通鉴·唐纪·卷二百二十三》，代宗广德元年条，7146-7147页。
- [51] 《旧唐书·吐蕃传下·卷一百九十六下》，5255页。
- [52]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卷三》，57页。
- [53] 《旧唐书·吐蕃传下·卷一百九十六下》，5253页。
- [54] 参见罗丰《北魏漆棺中的波斯风格》，《胡汉之间》，76-77页。
- [55] 《太平寰宇记·陇右道二·卷一百五十一》，3页。
- [56] 《旧唐书·吐蕃传下·卷一百九十六下》，5247页。
- [57] 《旧唐书·刘昌传·卷一百五十二》，4071页。
- [58] 《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卷三》，60页。
- [59] 《太平寰宇记·关西道九·卷三十三》，百泉县条。6页。
- [60] 《册府元龟·帝王部·卷一百一十三》，中华书局影印本，1348-1349页；《资治通鉴·唐纪·卷一百九十八》贞观二十年条，6239页。
- [61] 《新唐书·地理志·卷三十七·原州平凉郡条》，968页。
- [62] 《后汉书·隗嚣传·卷十三》引李贤注，528页。
- [63] 《资治通鉴·唐纪·卷一百九十八》贞观二十年条，6239页。
- [64] 《旧唐书·元载传·卷一百一十八》，3411-3412页。
- [65] 《旧唐书·宣宗本纪·卷十八下》，621-622页。
- [66] 《旧唐书·元载传·卷一百一十八》，3412页。
- [67] 《旧唐书·吐蕃传·卷一百九十六下》，5253页。
- [68]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卷四》，98页。
- [69] 王永兴《敦煌写本唐开元水部式校释》，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敦煌吐鲁番研究论文集》，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44页。
- [70]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河陇西碛区》，413页。
- [71] 李林甫《唐六典·卷七I部》“水部郎中”条，226-227页。
- [72]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卷四》，98页。
- [73] 《旧唐书·李晟传附王佖传·卷一百三十三》，3686页。《资治通鉴·唐纪·卷二百三十九》将此事记在宪宗元和八年秋七月条，7701页。
- [74] 《旧唐书·肃宗本纪·卷十》，241页。
- [75]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卷三·原州条》，60页。
- [76] 《旧唐书·肃宗本纪·卷十》，241页。
- [77] 《武经总要·前集·卷十八》，中华书局影印本，1959年，20页。
- [78] 参见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吴忠唐墓》文物出版社，2008年，324-325页。
- [79] 《资治通鉴·唐纪·卷二百二十五》大历三年条，7251页。“朔方军士的这种掠夺实际上是由于绢马贸易中的不平等贸易引发的。例如在“大历八年七一月，回纥一百四十人还蕃，以信物一千余乘。回纥特功，自乾元之后，屢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匹。”（《旧唐书·回纥传·卷一百九十五》，5207页）“在灵州担任节度使的中兴名将郭子仪曾经拿出一年的俸禄，来促成与回纥的绢马贸易”（参见《旧唐书·郭子仪传·卷一百二十》，3464页）。
- [80] 《资治通鉴·唐纪·卷二百四十九》大中十年条，8061页。
- [81] 傅璇琮等《李德裕文集校笺·卷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5页。
- [82] 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十二》，岳麓书社，1994年，443页。
- [83] 杜甫《秦州杂诗》、《全唐诗·卷二百二十五》，中华书局标点本，199年，2418页。
- [84] 元稹《褒城驿》《全唐诗·卷四百零九》，4546页。
- [85] 元稹《骆口驿》《全唐诗·卷四百一十二》，4567页。
- [86] 白居易《蓝桥驿见元九诗》、《白居易集·卷十五》顾学颉点校本，中华书局，1979年，312页。

**从西安经固原至武威
丝绸之路北线考察记**

2008年，笔者有幸参加丝绸之路中国境内交通线路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从2008年4月29日至10月13日，先后五次出野外：从澠池、宜阳、洛宁到三门峡市；从三门峡市到潼关；从潼关到西安；从西安、固原到武威；从西安、凤翔、陇县、天水到临洮，以填补往年在丝绸之路考察中未曾踏察的路段的空白。^[1]

对于汉唐长安沿泾水至安定（原州、固原）穿六盘山、渡黄河至凉州的丝绸之路北线的考察，笔者曾几度往返于西安、固原间。此次拟从固原经石门，过黄河至武威段进行线路实地考察。其中尤以从今靖远县北城滩到武威200余公里，历来研究丝绸之路者，除陈良的《丝路史话》^[2]有记述外，其他如严耕望先生的《唐代交通图考》^[3]一书中的《长安西通凉州两驿道》及孟凡人先生的《丝绸之路史话》^[4]均为空白。因此这次长安、凉州北道的历史地理考察重点即针对这200余公里线路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线路选择。

一、行程与路线

2008年8月15日傍晚与肖爱玲博士后乘西安至银川的火车，于16日午抵银川市，受到宁夏回族自治区考古研究所罗丰所长盛情款待。当时下午即驱车至银川市郊贺兰山东麓参观西夏王陵——三号陵，尔后又沿贺兰山东麓北行约50公里的贺兰山口，参观贺兰山岩画。17日上午由宁夏考古所所长助理陈伟陪同，与肖爱玲乘考古所专车沿贺兰山东麓、黄河西岸南行，经宁夏吴忠市，又西南经中卫市进入甘肃省景泰县。于景泰县五佛寺轮渡黄河到右岸靖远县境内北城滩，实地考察唐乌兰关遗址。又轮渡返五佛寺，于五佛寺西9公里处考察应为唐新泉军所在地。由此再西北傍明长城、经景泰县城（一条山镇）东北，又西北时而穿越长城，时而在长城南北，身临这云气苍茫的大地、蜿蜒延伸的长城，连绵的烽燧墩台，依稀能领略这古代建筑的轮廓。沿途虽然自然环境荒凉，但仍有稀疏的村落、块块的农田和广阔的河谷。又经景泰县的下、上沙窝到古浪县的大岭（河流之分水岭）、裴家营、大靖镇、双塔，到武威市。原拟考察沿途汉代城址，但几经寻觅而无结果。从五佛寺到武威，这200多公里行程中，身临其境，深深感受到在这失而复得

的文明进程中，沿这条道路行走的古人的顽强和坚忍。18日晨起从武威到古浪县城是高速公路，然后又折返双塔收费站，沿古浪至景泰的新建公路返回大靖镇。由大靖镇向南行约10公里，于民权乡大景河东岸考察汉朴县城址。又至景泰县芦阳镇东吊沟村北岗上，考察汉媪围县城遗址。尔后经白银市区，又东过黄河到靖远县城。于靖远县文化局博物馆参观出土文物后，从靖远县城出发，东北经白银市平川区、红会、打拉池（有明代堡寨尚完好）、干盐池（有古城遗址）。由靖远至干盐池，均行进在东西走向的大川道之中。干盐池以东为破碎高原残岭甚高，东盘桓下坡即为西安州，今为一镇。西安州东行15公里至海原县城，于暮色苍茫中经黑城、三营晚宿于固原市。19日上午从固原市出发，沿北去银川的公路经三营又西南经黄铎堡，即宋代的平夏城，也即怀德军的驻地、唐石门关。又西至六盘山峡口，溯寺口子水库北岸公路到海原县境，主要探察从固原穿越贺兰山的古道走向。当日返回固原市。20日与肖爱玲博士后乘固原至西安的公共汽车，经平凉、泾川、长武、彬县、永寿、乾县、咸阳至西安，结束四天长安至凉州的北道考察。

二、靖远县唐乌兰关至武威间的丝绸古道

从靖远县境的古城滩到武威约200余公里，是长安西北通往河西走廊的一条地理里程最近、东南西北走向的通道，是腾格里大沙漠与陇西黄土高原的边缘接合地带。古道的形成与发展，既与这一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关，同时也由于汉代抗击匈奴的军事形势，所以在这条古道上留下汉唐、明、清时代的遗址和遗迹。他们和这里的自然环境为研究丝绸之路长安凉州道提供了实物证据。

（一）自然地理环境

这里是陇西黄土高原与腾格里沙漠的边缘地带，气候干燥，雨量稀少，至今虽然生态环境较差，但地势相对较为平坦，大体上沿着东南西北向的河谷行进，沿途有稀疏的村落，南北两侧丘陵地上草场不良。但在汉唐时期这里的生态环境还是适于人居的。汉代在今古浪县与景泰县境有四个县，比今多一倍。在古浪与景泰县境有广袤的森林，如古浪县汉代称苍松，唐代称昌松，至今古浪县南还有个镇名叫黑松驿。无论是苍松、昌松，或黑松大约指的都是针叶林，但至今这一带除新栽培的树木和草地外，连灌木都很稀少。由古浪县在向东到景泰县的寿鹿山（主峰称老虎山），民国时修纂的《重修皋兰县志·卷十》“山川”记载，“寿鹿山，即大松山东坡，崇岗隐天，森林蔽日。故老相传本人迹不到之地，樵人以斧斤入，始见庙宇，不知何代所建，有老僧与白鹿在庙中，岁一出游。康熙五十年后，踪迹绝矣！上人画僧鹿于庙壁。因以名山。”

至今虽然寿鹿山为一自然保护区，但残存的云杉、松柏已远非昔比。然寿鹿山之名在《甘肃通志》中无记载，而载有的是“米哈山”。“松山亦名‘米哈山’。番人谓肉为米哈，言此山多禽兽，可资肉食也，在县北（皋兰）二百余里。”

皋兰县北100余公里就在今景泰县境。今景泰县红水镇，在皋兰县北165公里，明代称永泰堡。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兵部副使邢云路撰《永泰城铭》称这一带“广袤八百里，东轶芦靖，西跨庄凉，北界沙漠，前滨临巩。其间崇岗隐天，森林蔽日，华实之毛，衣食自出，甲兵云布。林麓之饶，何物不有。夷言‘米哈’，田猎飞走，千军肉食，武夫赳赳。”（《重修皋兰县志》）于此可知500年前，西起武威、古浪，东到景泰，靖远，北界沙漠，南至临洮，这广袤千里之地，崇山峻岭，林木遮天蔽日。由于在明清两代森林遭受严重破坏，遂使河流断流，或流量大为减少。大沙河在永泰堡，源出老虎沟，东北流与洪沙河会，东流50里至羊皮草窝入靖远县境（今景泰县的大小芦塘、五佛寺、老虎湾等处，1933年甘肃省决定由靖远县划归景泰县），又东至索桥入河……大沙河下游可通索桥，然涸时常多，此外别无入黄河之水，岂古今

水道有不同欸！（《重修皋兰县志》）大沙河发源于老虎山北麓寺儿滩，东北流经景泰县西羊皮草滩，又经景泰川，在靖远县哈思吉西黄河索桥处入黄河。这条河道在羊皮草滩以北尚有巨大干河床，从卫星照片上更清晰可见。^[5]

（二）汉代、明代长城的布局与遗址

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由于长安至河西的北道已经开辟，姑臧、次等县正处孔道，并于道上新置、媯围、朴等县，于是从张掖郡东段分置武威郡。在此同时于两县之北境，又新筑一道塞防，以维护此驿道的安全。^[6] 这道汉塞有无遗址、遗迹？遗迹在哪里？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兵部尚书、三边总督李汶在《计处松山善后事宜疏》中记载，“查得历凉（武威）之泗水，以至靖（靖远）之索桥（景泰东南，靖远西北黄河上）横亘不过四百余里许。……勤得自镇番（民勤）以至中卫，烽堠相望，迄今旧址犹存……乃旧自永安（即永安索桥），历皋兰，渡河逾庄浪（永登）以至于凉，则一千五百里。舍此四百里不守，而欲守一千五百里之边，果熟难而熟易？”（《甘肃新通志·卷八六·艺文志》）于是，万历二十七年开始，沿烽燧相望的旧址，筑从索桥至古浪土门子长共四百之边墙，并筑墩台烽燧一百二十座，筑永泰等几座大城堡。今从景泰的黄河边起西北至古浪土门的长城就是李汶率部于万历二十七年重修的明长城。李汶重修的长城是按民勤至中卫的“旧址犹存”的遗址来修建。那么“旧址犹存”的遗址是汉长城？还是明初修建的长城，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李并成教授认为，在近年文物普查中，汉次县至媯围县故城址一线以北找到了汉塞遗迹，位于明长城以北3~12公里，大体与明长城平行延伸，多数墙段穿行于沙漠之中，整段整段被沙漠壅塞，已不连贯，^[7] 这条“汉塞遗迹多呈残高0.5~1米的土梁状，当地群众形象地俗称‘鱼脊椎’，残宽约2~3米，夯筑，夯层厚10~12厘米……汉塞沿线散落较多的灰陶片、汉砖块；五铢钱、残铁片等物，在许多地段都可以找到，由此证明此遗迹确系汉长城残址。”^[8] 吴初骧先生则认为“古浪县大景乡明边墙以北3~12公里发现的边墙遗迹，非常重要，然是否为汉塞遗迹，尚属可疑。……‘旧址’当即明代初年所筑之边防。……明初在今景泰县境修筑的‘旧边’，在今古浪县境修筑的‘新边’，均非新建，而是利用了汉代的塞防遗迹，进行改造，重建而成。”^[9] 吴初骧先生并举出汉代原有的塞防在景泰与古浪县境的走向和地方名称。

（三）古浪县和景泰县境的汉代朴县城址和媯围县城址

汉朴县城址，位于古浪县民权乡大景河东岸马家楼村南，当地人称“三角城”。此城略呈四边形，南、北为冲沟，西对大景河，高出河谷约30米，东与高台丘陵相连。城内已为农民铺成“石头地”，遍布一层厚约20厘米的卵石。东北墙与南墙残高约2米，西墙与北墙已无踪迹。在城墙外沟坡上捡到一块汉代绳纹残砖，这块残砖上还能触摸到历史的信息。从城址座落在具有防御功能的近乎孤岛的台地上，周围的地理环境是在大景河较为宽广的河湾平原上，有农田数万亩。溯大景河而上，南与西南还有富庶的农业区。向北沿大景河下游的大靖镇，亦是一片农耕区，明代称大靖为“大靖营，亦名扒沙营，昔之屯田处也。（清·梁份《秦边纪略》）在古代朴城是这一农业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

汉媯围城遗址在景泰县城东南芦阳镇东吊沟村北的台地上，高出吊沟村约40米，南对大沙河。除城址西部与该地区破碎高原相连外，亦系一孤岛。东沟不深，北与西北为200~300米之深切沟道，沟道外为面积不大的小块绿洲。城址面积东西约500米，南北约350米。地面之上遍布灰色夹砂陶片（炊具残片），城有外围墙，筑于高台边缘。西部最为名显，长约100

余米，残高约2~3米，底宽2~3米。北墙稍低，但有明显的隆起，东垣不明。城内地形北高南低，呈倾斜面。西墙今有三个缺口，拟为原门阙遗址。墙西有一条南北沟道，北部深切，向南缓坡直下吊沟村。媼围城所处控制交通孔道地理区位，大沙河流域又是一处宽广的农业区，城区又据险构筑，也应是汉代这一地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中心。

（四）沿线早期人类居址和活动的遗址、遗迹

在汉明长城沿线，曾出土灰陶片汉砖块、五铢钱、残铁块等物，还有不少古代房舍和阡陌的废墟和遗址，^[10] 这些说明自汉以来，移民屯田戍边。残砖的存在，应为墓葬之物。据《秦边纪略》称“扒里扒沙，即大山子山（昌林山），其山在凉、庄、靖、宁之间。明制，凉州（武威）各堡抽调千人，更番按伏于扒里扒沙也”，“大靖营，亦名扒沙营、昔之屯田处也”，这说明至明代这一带仍为一屯田的营地。

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西汉中叶为了抗御匈奴残存势力的南下，保护打通自长安向凉州的通道，就构建了军事上的防御工程——长城，为固守长城，就要人马戍守；为避免供应戍守人马的粮草长途运送，就须就地屯田。关于此，早在汉文帝时，晁错就分析得非常精辟（《汉书·卷四九·晁错传》），戍守和屯田也须解决交通，设置驿站。因此，戍边、屯田和驿站的设置，为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这些历史遗址和遗迹，既属于历史，又属于现在，人们看到它们就会确定历史曾经存在，只要看到这些遗迹，人们就会坠入欲知往事的追索之中。因此可以断定，从今天靖远县西北黄河西岸至凉州（武威）这200多公里的路线是：靖远县石门、索桥或北城滩渡黄河，向西经媼围城，西北越今昌林山，经朴县境到凉州（武威）。史越2000年，虽然至今这条线路已较汉唐时代沉寂，但它也不是默默无语的老人，且不论沿边有长城、屯田遗迹、房舍阡陌作证，更确切的证据是出土文物中的文字记载。半个世纪以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73—1974年在居延获汉简21 000枚，1990—1992年又于敦煌悬泉置获汉简22 000余枚。其中有记载汉代从长安到居延，或从长安到敦煌的驿站名称和有关驿站之间的距离。尽管这些汉简残缺不全，但从中还能反映出从汉代媼围至凉州这200多公里的线路概况。

居延汉简74EPT59: 582, 姑臧67, 小张掖60, 次90, 罽里90, 居延置90, 媼围。悬泉置汉简90DXT0214^[11]: 130, 姑臧67, 小张掖60, 鸟65, 仓松（今古浪县）。由于这两批汉简时代不同，所以记载的驿站名称也不同，因此所经线路也有移动。但大体上还能确定有关驿站间距，如从罽里或鸟至小张掖，小张掖至姑臧的距离相等，说明这一段，路线和距离在汉代都没有变动。而从小张掖以东走鸟、仓松与今古浪至景泰的大道相符，次、罽里可能偏北。至于汉简记载的有关驿站在今天什么地点，学者间有不同的意见，^[12] 尚待进一步研究。

三、从固原到靖远县

固原地处宁（夏）南黄土高原丘陵中部和六盘山山地东北部，海拔高度1500~2933米，是渭河、泾河和黄河河曲间之最高处，也是清水河、葫芦河、泾河的发源地，为四方之交通枢纽、军事要区。战国时秦于此置乌氏县，并于今固原城北构筑长城以防匈奴南下。秦始皇二十七年曾“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泾水发源地），过回中。”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在固原置安定郡，史籍记载汉武帝从元鼎五年（前112）至后元元年（前88）曾六次逾陇山，北出萧关到安定，并沿祖厉河而下。他第一次巡游时“北出萧关，从数万骑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史记·平准书》）由此可见安定的军事地位。

唐置原州，为平高县，并于险阻之地置石门、木峡等七关，外控河陇内拱长安。古道自长安

至固原，沿清水河北下，经今头营、二营、老三营，西北行约15公里到黄铎堡古城，即唐之石门关，宋平夏城，为怀德军治所。今外城、内城、城墙宛在，当地称古城西北角之内城为“紫禁城”。又西至清水河出六盘山之峡口，峡口北为始建于北魏的佛教著名胜地须弥山石窟（东南距固原市55公里）。古道穿行于六盘山之中约10余公里到海原县境，亦是黄土高原，梁、塬、峁地形复杂，沟壑纵横植被稀疏，是我国西北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明初曾赐楚王为牧地，又西北至海原县城。海原县西约20公里，至西安州。据《宋史·卷八七·地理志》怀远军条记载：“本平夏城……大观二年（108）展城作军，名曰怀远……增置将兵，与西安、镇戎互为声援接应。”镇戎军即唐原州平高县（固原）；平夏城即唐之石门关，西安州为宋元符二年（1099）置，此三州互为声援。西安州在一平原中，又西北经天都山北，越梁峁北上约15公里到干盐池，唐称“河池”。《元和郡县图志·会州下》记载“河池，西去州（会州）一百二十里，其地春夏因雨水生盐，雨多盐少，雨少盐多。远望似河，故名河池。”干盐池今已无盐，但古城在一条东西向的河谷之中，城墙较完好，唐宋至明清，均有人居止。城墙东西长450米，南北宽350米，至今城内居民约10余户，城内北部有大规模的养羊圈。又西北至甘肃省靖远县之打拉池（有明代堡寨，今尚完好）、红会、白银市的平川（旱川）区，又西北经水泉、石门，小口子渡黄河（索桥）至景泰县境之芦阳。或经石门又北至北城滩渡黄河经五佛寺向西北经唐新泉军，又西北沿明长城一线到武威。北城滩在靖远县北偏西约180公里黄河东岸的石崖上，扼险据要，东西山上有烽燧，隔河与景泰县五佛寺相对。古城城墙夯土层明显，尤其在一家农民院墙外于城墙中挖窑洞更加清晰。该地为红色砂岩孤立小山崖，这里曾出土各种陶器、瓦当碎片及古钱币等唐代遗物，据该地附近唐墓出土的三通唐代墓志中记载及一块隋代砖质墨书墓志称：“大业三年……会宁郡、乌兰城”等字样，确认今北城滩即唐代的乌兰关（唐墓志今存靖远县博物馆）。1988年在靖远县北滩乡的东街庄一农民家出土一件东罗马鎏金浮雕银盘，直径31厘米，重3181克，现存甘肃省博物馆，是长安凉州北道上出土的一件极为珍贵的国外文物。^[13]

注释

- [1] 笔者对中国境内丝绸之路线路的历史地理考察，从1955年到2006年先后有五次。第一次1955年从西安经兰州、乌鞘岭、武威、张掖。第二次，1980年对新疆吐鲁番、天山南北二道上乌鲁木齐至伊宁、霍尔果斯；乌鲁木齐、库尔勒、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进行实地考察。第三次，1985年对青海省青海湖、柴达木盆地唐蕃古道、青海道以及敦煌、古居延海（今额济纳旗）居延海道，呼和浩特、大同、太原的考察。第四次，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参加对中国境内从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的丝路考察。第五次，2006年，对兰州、临洮、临夏丝绸之路甘肃境内南道与中道接合部位的实地考察。以上考察除1955年第一次考察外，散见拙著《汉唐两京及丝绸之路历史地理理论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
- [2] 陈良《丝路史话》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3]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二卷341—420页《长安西通凉州两驿道》。
- [4] 孟凡人《丝绸之路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八五”重点研究课题。
- [5] 鲜肖威《历史时期甘肃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1982年油印稿。
- [6] 吴初骧《河西汉代长城》《文博》1991年第1期。《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
- [7] 李并成《河西走廊东部新发现的一条汉长城》《敦煌研究》1996年第4期。
- [8] 吴初骧《河西汉代长城》《文博》1991年第1期。《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
- [9] 《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初骧文物出版社2005年。
- [10] 鲜肖威《甘肃境内丝绸之路》《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 [11] 李并成《河西走廊东部新发现的一条汉长城》《敦煌研究》1996年第4期。
- [12]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初骧《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
- [13] 初师宾《甘肃靖远新出土东罗马鎏金银盘略考》《文物》1990年第5期。

丝绸之路青海道 形成、变迁及发展

日前，学术界将中国古代陆上对外交通分为西南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和沙漠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主要指由中原、关中经甘肃河西走廊进入新疆，沿塔里木盆地南北穿越葱岭，通往中亚、印度和欧洲的主干线。除此之外，还有一条不经河西走廊，而是走青海古羌人居住区而通今新疆至域外的路线，学术界称之为羌中道或青海道；公元4世纪至6世纪，吐谷浑占据青海、甘南及四川西北，被南朝宋封为河南王，因此，丝绸之路青海道又称为河南道。西夏占领河西走廊后，青海道成为宋朝与西域沟通的最重要的通道。宋初，在河湟地区形成以唃廝囉为首的地方政权，宋人称为青唐羌，因此，又将经过青海河湟地区的丝绸之路称为青唐道。为了统一，本文称之为丝绸之路青海道。丝绸之路青海道分为东、南、西、北四段：东段由西宁向东经民和至临夏或兰州，与丝绸之路甘肃东段衔接通关中；南段由茶卡向东南，在青海共和、兴海渡黄河，经库泽、河南蒙古、迭部、岷江流域至成都；西段由西宁西经青海湖两岸、柴达木盆地南北分别抵达若羌和敦煌；北段穿越祁连山隘口，经河西走廊通蒙古高原或西域。

一、丝绸之路青海道研究的回顾

丝绸之路青海道的研究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1932年任乃强首先注意到四川与青海间存在着某种较为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1] 1935年沙畹撰写的《宋云行纪笺注》对宋云一行路线做了详细考订；^[2] 1936年岚瑞徵以诸本高僧传所载中西僧侣经行资料为线索，提出六朝时期的西域僧侣曾经取道西域前往成都和江南；^[3] 1937年清水泰次以四川与西域之间存在粮饷供应关系为题，提出明代与西域之间原有相当成熟的交通；^[4] 同年，日本学者松田寿男以吐谷浑往南朝遣使为题，揭示了南朝与吐谷浑、南朝与西域、南朝与柔然间密切的政治和经济联系；^[5] 同年，黄文弼对丝绸之路青海道进行了系统、翔实的考订。^[6]

20世纪40年代，学界继续关注青海道。在研究方法上除进一步挖掘文献资料外，还将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相结合，同时试图利用地理调查资料解决中西交通问题。靳玄生、黄文弼、岑

仲勉、吴景敖和倪锴等学者先后撰文论及青海道，其中以吴景敖在1948年出版的《西陲史地研究》影响最大。吴景敖在西北、西南数年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在南北朝及其前后一段时间里，西域和江南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通道。该道由汉中出发西南至昭化，后沿白龙江西北行，经叠州、洮州至务隆河流域，西向经三道抵达青海西部，后经柴达木盆地南北及当金山口至西域。^[7] 吴景敖的研究奠定了青海道南段和北段沿线所经的基本框架。1948年，裴文中根据甘肃及青海湟水流域考古发掘所得，认为由祁连山南麓，沿湟水而西至青海湖，再经柴达木盆地而至南疆的通道，是史前时期中西交通的一条重要通道。

20世纪50至20世纪70年代，对青海道的研究走向深入，这一阶段共发表近30篇相关论文，其中以夏鼐、唐长孺、严耕望的研究较为重要。1958年，夏鼐以赵生琛报道青海西宁发现波斯银币为题，撰文认为，在河西走廊“丝道”之南，原有一条丝绸之路，它东起西宁，西抵新疆，主要兴盛于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初，其地位并不逊色于河西走廊丝道。^[8] 同年，冯汉鏞对夏鼐论断做了补充研究。^[9] 这时，学界还未注意到青海道东段走向。受吴景敖影响，严耕望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研究川甘青间区域交通线、沿途所经和启用时间，重要成果汇集于1979年出版的《唐代交通图考》中。值得一提的是唐代青海道东段走向问题在《唐代交通图考》中有详细考述。以新疆都善土峪沟相继发现的两件佛经残页，以及德国新近发现的两件关于中西交通的文书卷子为基本资料，唐长孺相继发表了数篇有关系西域与南朝交往的文章，认为四川成都与西域间原有一条与吐谷浑关系密切的交通孔道，该道主要经行的是佛教僧侣，其次为西域各国前往南朝的使团。^[10]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逐步揭开了青海道的神秘面纱。20世纪80年代，吴初曩^[11]、张德祖^[12]、初师宾^[13]、周伟洲^[14]、前田正明^[15]、王叔凯^[16]、王宗维^[17]、赵荣^[18]、王育民^[19]等对青海境内通向青海境外的交通道路的走向进行了讨论。周伟洲认为，青海道柴达木分道大约形成于秦汉以前，南北朝时期进入鼎盛，唐代开始衰落，北宋一度复苏；该道起点是凉州，中途经青海，西端终于西域，因其主要在青海省内展开，因此称为青海道。王育民认为，东晋、南北朝时期，丝路往来或由青海北出祁连山隘口至张掖，与河西干道连接；或西出柴达木至鄯善，与西域南道接通，青海道基本上取代了河西干道成为丝路的主道。

20世纪90年代，李之勤^[20]、吴焯^[21]等继续探讨青海道。吴焯在《青海道述考》一文中认为，原始时期，甘肃农业文化自东向西进入湟水流域，大致构成了后来青海道东段的走向；先秦时期，羌人由河湟西迁，穿越柴达木盆地，越阿尔金山，抵昆仑山麓，再向西越过葱岭，在逐水草而迁徙的过程中踏出青海道的西段，同时，羌人南下至蜀，踏出青海道的南段。吴焯接着从历史文献记载的角度，依次考述了两汉、蜀汉、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至宋时期青海道各段的演变和发展状况。纵观以上研究，绝大部分研究忽视了沿线所经研究和实地考古调查，因此，青海道的具体走向一直如雾中之花，没有露出真实面目。1994年5月，陈良伟撰写了题为《丝绸之路河南道考古调查与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22] 论文将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学科资料相贯通，重视沿线所经研究和实地考古调查，对丝绸之路河南道的开辟、走向、运营和衰落进行了全面、具体和系统的论述，揭开了青海道神秘的面纱。该项研究代表了当时丝绸之路青海道研究的最高成就。但陈良伟先生主要从东晋、南北朝时期河南道在沟通西域与南朝的角度出发，着力论述青海道南段、北段和西段的相关问题，而对东段、西南段走向以及青海道在沟通西域与北朝、西域与北宋交通等问题上没有涉及或涉及不多。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界对青海道的研究不多。与传统认为的隋唐时期青海道已走向衰落的观点不同，2005年，魏霍在《粟特人与青海道》一文中认为隋唐时期青海道依然繁荣。^[23] 2007年，李宗俊以《唐代河西走廊南通吐蕃道考》为题，考述了唐代河西走廊向南穿越祁连山

通吐蕃的道路，包括玉门军道、三水镇道、张掖守捉道、洪源谷道和白山戍道。^[24] 2008年，张德祖在《古玉石之路与丝绸之路青海道》一文中，将以湟水流域的西宁为中心，东通关陇、北越祁连、南入河南蒙古自治州、西抵青海湖的道路称为湟中道；将沿青海湖南北西行、横贯柴达木盆地进入南疆的道路称为羌中道；将沟通雍梁二州，即甘青与汉中、四川等地的道路称为河南道或氐羌道。^[25]

本文拟在总结、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地理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相关资料，对青海道的形成、发展与走向问题发表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大家。

二、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形成与发展

早在距今6000—6500年期间，来自中原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就已经到达青海黄河九曲^[26]和湟水流域的民和一带。^[27] 距今5000—4000年的马家窑文化“虽然受中原仰韶文化的影响，但究其根源在甘肃境内，并且最大可能是源于渭河上游及其支流葫芦河等流域，”^[28]说明青海东南部史前文化是甘肃史前文化向西发展的结果。据此，可以清晰地勾画出一条由渭河上游经洮河流域至湟水流域的自东向西的人类迁徙路线。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岷江上游今四川汶川、理县、茂县等地发现了一百余处新石器遗址，在这些遗址上出土的石器、陶器与甘青马家窑文化相近，石兴邦认为它们是甘青马家窑文化南下的一支。^[29]可见，早在距今4000—5000年期间，由湟水经洮河、白龙江上游至岷江上游的区域通道已打通。

齐家文化时期（距今3800—4200年），中国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西方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在甘肃、青海东南部、宁夏南部交汇。青海齐家文化时期的墓葬中普遍出土数量巨大的产自我国南海或台湾海峡的海贝^[30]以及大量玉器（包括斧、镑、铲、琮、璧、璜、镯、凿、刀、纺轮、佩饰等）。杨伯达认为，齐家文化玉器的“玉料来源于甘肃临洮与榆中交界处的玉石山、青海祁连及格尔木，也不排除来自和田、且末、若羌等阿尔金山之玉。我所目睹过的齐家玉器确有和田玉和甘肃玉石山玉，近年又看到青海喇家遗址出土的玉器却与甘肃齐家文化玉器的玉质有所不同，疑其为取自本地的玉矿或从甘肃兰州经青海，从芒崖经（阿尔金）山口到达若羌，再往且末、和田，其直线距离也不足3000公里，也算得上远距离运输，很可能是昆山玉路的最早的也是最西端的一段。”^[31]可见，齐家文化时期，已经存在着一条起自南疆和田，沿塔里木盆地南缘东进，再东南穿越阿尔金山口，经柴达木盆地、湟水流域逾黄河至甘肃东南的“昆山玉路”。青海贵南杂马台齐家文化遗址曾出土过一面七星纹青铜镜，其形制、纹饰和河南安阳妇好墓发现的晚商青铜镜相近似，安志敏认为可能是齐家文化下延至商代，与商文化交流的结果。^[32]

距今4000年前后，出现了一次影响全球数百年的气候干冷现象。受此影响，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的这段时间内，生活于中亚北部草原的雅利安人在干旱的逼迫下不断向外迁徙，踏出了一条横贯亚欧的草原之路。草原之路形成南北两道，北道从伊朗或南俄草原向东至西伯利亚、外贝加尔湖至蒙古草原；南道从中亚的巴尔喀什湖地区，经额尔齐斯河流域沿阿尔泰山南麓、河西走廊到内蒙古西北草原，然后进入河套地区。受气候变化影响，四坝文化（前1950—前1550）率先由原始农业经济向畜牧经济过渡，河西走廊中、西部成为草原之路南道的一部分。^[33]

稍晚，大约在夏代晚期至西周晚期，青海黄河上游和黄河支流湟水流域、甘肃洮河和大夏河流域出现半农半牧的辛店文化。大约在商代早期至西周晚期，以青海东部的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流域为中心，在东至甘青交界处，西到青海湖沿岸，南达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的黄河沿岸，北抵祁连山南麓大通河流域的范围内兴起了以畜牧经济为主的卡约文化。研究认为，辛店文化和卡

约文化皆为古羌人遗存。^[34]卡约文化时期，青海与北方草原、西域、中原都有文化交流：

卡约文化中有从欧亚北部传播来的因素。如1992年在西宁市马坊乡小桥村沈那遗址出土的铜矛，矛长达61.5厘米，刃部下部宽，向尖端直线收敛，柄部为釜，刃部下有钩，梁下部有三条突带，钩的对面有钮。据高滨先生研究，这种铜矛是从蒙古高原到芬兰、摩尔多瓦的广大范围内分布的塞麻—特尔比诺文化传入的；又如在黄家寨卡约文化M16的骨管上发现了鹿纹图案，鹿纹表现鹿角为连接向侧C字形，背面突出三角形的肩胛骨，这种鹿纹，与以蒙古高原为中心分布于欧亚北部一带的鹿石的鹿纹图案类似，年代为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35]另外，卡约文化的多孔铜钺等亦具有典型北方青铜文化特点。以上例子说明，卡约文化时期，北方草原之路以四坝文化为中介，跨越祁连山隘口，向南延伸至青海境内。

卡约文化时期，青海与黄河流经的甘肃、宁夏、陕西、内蒙、陕西和河南也发生了文化交流。如西宁鲍家庄卡约文化遗址出土了具有典型二里岗时期商文化风格的铜鬲；^[36]宁夏杨郎文化流行洞室墓，盛行殉马、牛、羊、犬肢体习俗，墓内的管釜斧、矛、刀、铃形饰、泡饰及圆雕鸟、犬狼相斗形象杆头饰，与湟水流域的卡约文化存在着某种联系；^[37]内蒙古出土过1件管釜斧，^[38]上面同时出现在青海地区铜器上常见的“丁”字形饰和孔周起缘饰；陕北延川棣道河发现的长管釜斧，其装饰风格与青海上孙家寨卡约文化遗址出土的铜斧上的装饰风格颇为相近；^[39]山西灵石县旌介商墓出土的有孔含铁铜钺上，^[40]也可看到在青海地区铜器上常见的那种孔周起缘饰。

哈密地区的焉不拉克文化（前1048—前500）“主要典型陶器腹耳壶和单耳豆在辛店文化和四坝文化中也同样是主要代表器形，其中腹耳壶形制完全一样，均多绘彩。其次，焉不拉克文化与辛店文化、四坝文化的彩陶基本上都是在红色或黄白色陶衣上绘黑色花纹，主要花纹母题如S形纹、双钩纹、横竖线纹、曲线纹、动物纹以及器耳上的花纹等完全相同或相似。”^[41]由此我们推测，距今2500—3000年期间，青海湟水流域的以辛店文化为代表的古羌人可能曾由青海湖向西，经柴达木盆地北缘出当金山口，经敦煌至哈密盆地，与来自河西走廊西段的以四坝文化为代表的羌人汇合，创造了焉不拉克文化，这是目前在新疆地区发现的最早的羌人文化。

不过，据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青海羌人沿柴达木盆地南缘进入新疆的时间可能要比由柴达木盆地北缘进入新疆的时间晚一些。相当于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左右（中原地区战国时期）的塔什库尔干香堡墓地，经发掘的40多座墓中，火葬墓有19座，几乎占总数的一半。葬式有屈肢葬、二次葬、无腿葬等。与寺洼文化中的土、火并行、一次葬、二次葬共存的现象颇为相似。其族属与古代羌族或塞种有关。^[42]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秦献公元年（前384），秦人用兵渭河上游和洮河流域，灭狄、獯戎，羌人“畏秦之威……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隔绝，不复交通”。^[43]吴焯先生根据《汉书·西域传》、《汉书·赵充国传》、南疆沙雅县什格提遗址“汉归义羌长”铜印以及罗布泊古城遗址羌女纸质书信推测，羌人“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的路线是由河湟西行，穿柴达木盆地，越阿尔金山，抵昆仑山麓，向西越过葱岭，或至昆仑山后不再西行，而不是向北经罗布泊地区至西域北道诸国。^[44]除西迁塔里木盆地南缘的羌人之外，韩康信先生运用体质人类学资料曾推测：“早在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甚至更早，地中海支系的一支居民越过帕米尔高原，沿塔里木盆地的南缘，不断移居到新疆境内，直至罗布泊地区”。^[45]由此看来，青海道西段与西域南道的形成与接通，要归功于印欧人种的东进与羌人的西进。

以上材料与《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张骞传》记载，还有甘肃临夏、灵台、礼县、西和、天水 and 陕西扶风、西安等地出土的希腊铭文的铜、铅饼相映证，勾画出了由西域经青海至陇东南乃至关中的丝绸之路陇右南道的走向。

汉初，占据罗布泊以东至嘉峪关长城之间的大片地区的匈奴，与占据今甘肃西部和青海全境的西羌两相连接，给汉朝造成极大的威胁。元鼎六年（前111），汉军第一次深入羌地；神爵元年（前61），赵充国兵进先零羌，屯田湟水两岸，“治湟陜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46]从战略上控制了从青海湖向西经柴达木盆地至西域的道路。东汉建立不久，继续在狄道（今临洮）设立护羌校尉，以管理洮河流域和湟水流域的羌人；为了分散羌族力量，加强对羌族的统治，东汉政府还利用各种机会对青海湖周围的羌族进行强制迁徙，如建武十一年（35），将游牧于大小榆谷（今青海贵德东南黄河南岸）的先零羌迁至天水、陇西和扶风三郡。明帝永平元年（58），强迁游牧于大小榆谷的烧当羌“七千口置三辅”。永元十三年（101），护羌校尉周鲂又将塞外降羌六千余口强行迁至汉阳、安定、陇西诸郡。除迁徙政策外，还在大小榆谷、湟中“广设屯田，阻塞羌、胡交关之路”。^[47]两汉政府隔绝羌胡的策略，实际上截断了青海与草原丝绸之路的联系，使青海道失去了国际通道的作用。

东晋至唐宋，青海道重新成为一条沟通中西的国际交通线。西晋灭亡后，关中和陇右地区的天水、陇南被前赵占领，使传统的陇右道、祁山道、褒斜道和故道阻塞不通。前凉为了与东晋取得联系，经过近四十年努力，初步开通了一条从凉州横穿祁连山隘口，经青海、甘南、松潘草地、岷江上游、成都抵东晋建康（今南京）的道路，但这条道路仅仅是南北政权之间交往的区域性通道，不能算作国际通道。继前凉之后开发青海道的是吐谷浑。从东晋十六国至唐代贞观年间，在今青海的绝大部分、甘南、川西北和新疆的东南部，兴起了一个由鲜卑族建立的吐谷浑政权。政治上，吐谷浑与南朝结盟共同对抗北朝诸政权；经济上吐谷浑鼓励以蜀锦为主的“丝路”贸易以补国用；宗教上吐谷浑笃信佛教，保护和鼓励本国佛教僧侣外出学习。所以，吐谷浑积极参与了青海道的开发与维护，使其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国际交通线。前凉、西凉、北凉、南凉、河南国、高昌、龟兹、于阗、粟特、波斯、天竺和白题末国曾沿青海道出使南朝，南朝亦循此线遣使北凉、河南国、柔然和丁零；往来僧人，如释发献、昙摩密多、缙良耶舍、僧伽跋摩、释慧览、沮渠安阳、释僧隐、释法献、释玄畅、释明达等亦经行此道；柔然、北凉、吐谷浑以及西域或西方商人也经此道与南朝进行商贸往来。

吐谷浑不仅与南朝有密切往来，而且与十六国时期建立的前秦、西秦，北朝时期的北魏、西魏、北周都有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所以，青海道不仅是中国南方与域外联系的国际通道的一部分，而且也是中国北方与西方联系的国际通道的重要一段。这时，东来西往者亦大多从青海道经过，如后秦姚兴弘始元年（399），高僧法显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人从后秦国都城长安（治今西安西北）出发，经乞伏乾归所据苑川郡西城（在今甘肃榆中一带），然后过南凉国都至张掖镇。^[48]当时南凉范围相当于今武威地区和青海东南部，起初建都于西平（治今西宁），后迁于乐都。法显可能是沿陇右南道东段至今兰州，然后渡黄河沿湟水至今西宁，又西北行经今扁都口过祁连山进入张掖。刘宋永初元年（420），黄龙（今辽宁朝阳）人释县无竭十分羡慕法显西行，于是召集同志25人，由黄龙出发，经吐谷浑、西海郡、流沙，最后抵达高昌。稍后又由高昌出发，经龟兹、沙勒、疏勒等国，翻越葱岭至中亚两河流域。^[49]北魏洛阳崇立寺僧宋云曾于北魏孝明帝神龟元年（518）与惠生前往天竺取经，他们从洛阳出发，大致经陕西、陇东、河州、青海东南、柴达木盆地、昆仑山北、葱岭、阿富汗至巴基斯坦北。^[50]由西向东者，如敦煌人单道开，他曾由敦煌移居西平，“石季龙时，从西平来，一日行七百里，其一沙弥年十四，行亦及之。至秦州，表送到邺，季龙令佛图澄与语，不能屈也”。^[51]敦煌人单道开由敦煌至西平的路线大约是由敦煌经今当金山口，穿越柴达木盆地北缘至西平，然后沿青海道东段经关中、中原抵达邺城。又如北周明帝武成元年（559），乾陀罗僧闍那崛多，他先至于阗（今和田南），然后经鄯善（治今若羌）入青海，再由鄯州（治今乐都）东去长安。^[52]青海曾出土这一时期的“丝路”文物，如湟中出土的胡僧骑马铁俑，胡僧深目、高鼻、大眼，身披袈裟、颈戴佛珠、双手合

十端坐马上，有浓郁的键陀罗风格，这件稀世珍品，是乾陀罗僧闍那崛多及其他名不见经传的西域僧人东来弘法的形象写照。^[53]联系今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俾路斯银币（457—483）、^[54]今甘肃临夏、陇西、天水、清水等地出土的波斯萨珊卑路斯银币（457—483）和东罗马福卡斯金币（602—610），^[55]我们认为，公元5—公元7世纪由西域经青海和甘肃东部通西安、洛阳的丝绸之路曾代替了陇右北道，成为中国北方与西域、中亚、西亚交往的最重要的国际通道。大业五年（609），隋炀帝率大军自陇西狄道（治今临洮），出临津关（在今青海循化县查汗都斯乡），渡黄河至西平（治今西宁），复沿湟水至西平以北的长宁谷，渡大通河，经大斗拔谷（今扁都口）至张掖，^[56]仍谋求开通吐谷浑通西域的商道。

唐代，经青海沟通中国南北与西域的丝绸之路继续畅通。如1985—1988年青海省考古工作者在都兰县发现唐代初年吐谷浑贵族墓葬，出土众多的丝织品，其中112种为中原织造，18种为中亚、西亚织造。西方织锦中粟特锦最引人注目，一件织有钵罗斯文的文字锦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仅有的一件公元8世纪波斯文字锦。此外还有波斯金银器、玛瑙珠、玻璃珠、铜香水瓶等出土。^[57]2002年8月，考古工作者对德令哈郭里木乡的两座古墓进行挖掘，从中发现三具唐代中期彩绘木棺，与新疆和田发现的晚唐五代时期的彩绘木棺如出一辙。^[58]唐代中期丝路文物在青海省兴海、乌兰和四川都江堰等地亦有发现。这些表明唐代今青海地区在连接中国南北与西域、中亚乃至西亚的交通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青海道的东段走向

青海道东段由西宁向东经民和至临夏或兰州，与丝绸之路陇右南道甘肃东段衔接通关中。具体走向在《唐蕃古道走向的再考察》一文中已论述，本文不再赘述。

四、丝绸之路青海道南段走向及兴衰

据《南齐书》记载，益州“西通苻苻河南，亦如汉武威张掖，为西域之道也。”^[59]这条由益州（治今成都）出发经吐谷浑建立的河南国通苻苻、西域的道路被命名为“丝绸之路河南道”。由于河南道主要在今青海省境内展开，因此，本文认为它是青海道南段的组成部分。尽管学术界对青海道南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由于历史文献记载的简略，这条道路的具体走向并不十分清楚。

由成都沿岷江北行经松潘草原至若尔盖丘状高原后，地势逐渐由东南向西北倾斜，西倾山、阿尼马卿山、鄂拉山、青海南山、布尔汗布达山东南—西北向排列，在这些山脉之间穿行的河流如黑河、沙沟、芒拉沟、恰卜恰河、沙珠玉河、察汗乌苏河、香德日河亦呈东南—西北走向。这些东南—西北走向的河谷地势平坦、水草丰富，为人类东西、南北往来的天然通道。据考古调查，青海道南段主干道由成都向北经岷江上游至甘南迭部卡坝古城（在今迭部东25公里），再折西北经迭部、河南蒙古自治县、库泽、同德县、兴海县、共和抵茶卡。这条古道沿西倾山东麓的丘状高原、山地及鄂拉山和青海南山之间的河谷盆地而行，自南向北依次经过松潘草地、若尔盖高寒草甸草原、黄南山地草原和青海湖盆地草原，沿途所经道路平坦、水草丰美，为游牧民族迁徙的理想通道。清代四川松潘至茶卡间有一条盐茶商道，藏语称为“夏尔兰木”（夏尔即“夏尔哇”，意思为松潘商人，兰木为直通道路的意思），就是沿着这条游牧民族迁徙的道路行进的。清代后期至民国初年，松潘商人每年两次取道“夏尔兰木”，沿途售茶，交换牧区土特产，后至茶卡购食盐返回松潘。这条商道的大体路线是松潘—黄胜关—若尔盖—黑河—玛曲—河南—库泽—同德（渡河）—兴海—共和—茶卡（乌兰）。^[60]松潘至茶卡间

盐茶商道走向与丝路河南道南段主干道走向十分相似，所以，“夏尔兰木”应该是沿着历史上早就存在的丝路河南道行进的；“夏尔兰木”也印证了用考古文物与遗迹勾画出的青海道南段走向的合理性。

（一）由成都至卡坝古城的道路

由成都至卡坝古城（在今迭部东25公里）的道路有两条：一条由成都溯岷江北上至卡坝；另一条由昭化西北溯白龙江经武都、舟曲至卡坝古城。有人认为这两条道路均为丝绸之路河南道所经。^[62]笔者认为前一条道路为丝路河南道所必经，原因有二：第一，在阿才在位期间（417—424），吐谷浑就已经向南拓境至岷江上游的龙洞（松潘南）一带，与南朝接壤；第二是沿线发现大量的南北朝至隋唐的遗址及丝路文物（见表1）。

表1 青海道南段岷江沿线古遗址一览表（据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2002）

编号	遗址、遗物	地址	时代
1	万佛寺	成都	南北隋唐
2	鲤鱼沱城	都江堰	南北朝
3	楠木堰	灌县	
4	桃关故址	汶川南20公里	南北朝、明
5	汶川古城	汶川县	南朝
6	龙洞故城	松潘南	南北朝
7	川主寺	松潘县	南北朝、隋唐
8	黄胜关	松潘北	南北朝、明清
9	加阿卡古城	甘南	南北朝、唐宋
10	卡坝古城	迭部西25公里	南北朝、唐宋

在众多“丝路”文物中，四川都江堰灵岩寺石千佛塔最具有代表性。据其铭文，该塔镌刻于开元四年（716），石千佛塔呈圆锥状，高3米余，底边长约7.5米，顶径约2米。共分13层，底部两层为台座，上浮雕蔓草花纹；中层为千佛，约800多个；塔顶有莲台与莲座，上铸铁释迦摩尼入定趺坐宝像一尊。此塔与中原唐代塔造型迥异，而与印度和中亚公元4世纪至公元6世纪前后塔的样式十分接近，也与新疆库车县克孜尔千佛洞早期壁画中的样式颇为相似。石千佛塔发现的意义有两个：一是证明岷江流域为益州西通吐谷浑乃至西域的必经之地；二是证明青海道南段至迟至公元8世纪初期还在运行。陈良伟在松潘县川主寺附近调查时，曾见到两件半月形石刀，石刀长约20厘米、宽5~7厘米，玄背直刃，刀面钻有两孔。该刀的形状与云南和新疆阿克塔拉遗址所出者十分相似。这证明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岷江沿线就与云南省、新疆有联系。^[62]

后一条道路可能与丝绸之路交通无关，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沿线遗迹较少、保存状况差，南北朝至隋唐遗址更少（见表2）。二是沿线没有发现丝路文物。一般认为，有石窟的地方为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但事实上，后一条道路沿线附近广元境内的千佛崖、皇泽寺和观音崖等石窟，与北方麦积山、巩县等石窟中的魏形佛、菩萨的形象及雕刻手法颇相似，^[63]就其艺术风

格来说仅仅是麦积山石窟艺术的一个支派，与中西交通无关；三是白龙江流域曾被仇池国与宕昌羌控制，因此，由益州借道仇池国与宕昌羌进入河南国的可能性不大。

表2 白龙江沿线古遗址一览表（据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2002）

编号	遗址	地址	时代
1	广元石窟寺	四川广元	北朝晚期朝至唐宋元
2	白水故城	四川白河镇（遗迹无存）	
3	阴平故城	甘肃文县西5公里（遗迹无存）	
4	葭芦古城	文县临江寨（遗迹无存）	蜀汉至南北朝
5	覆津故城	武都透防（遗迹无存）	南北朝
6	武都故城	甘肃武都（遗迹无存）	西魏、北周、隋
7	舟曲故城	甘南舟曲县	明清
8	峰迭古城	甘南舟曲县西15公里	年代不详
9	华严古城	舟曲县立节乡东南2公里	南北朝
10	卡坝古城	迭部西25公里	南北朝、唐宋

（二）卡坝古城西北通茶卡道路

陈良伟认为由白龙江流域西北行通青海有三条道：一条由迭部卡坝古城西北经迭部、郎木寺、尕海、河南蒙古自治县、库泽、同德县、兴海、共和抵茶卡（沿途所经考古遗迹见表3）；另一条由卡坝古城北经卓尼、临潭、合作、贵德、共和县至伏俟城，或者偏东经贵德、尖扎北渡黄河至西宁，再折西经湟源、刚察至伏俟城（沿途所经考古遗迹见表4）；第三条由昭化镇溯白龙江至两河口后，北经宕昌、岷县、卓尼、临潭、循化县、化隆县、平安、西宁、湟中至湟源县，再由湟源县沿青海湖北岸至吐谷浑故都伏俟城（沿途所经考古遗迹见表5）。

笔者认为陈良伟提出的后两条道路为区域性通道，不是国际通道，理由有两点：第一，这两条道路都经过洮河和大夏河上游，由白龙江上游的马牧城（今迭部益哇乡卜岗村卜岗古城）北经洮河上游的洮阳戍（今临潭县西约5公里牛头城）、大夏河上游的列浑城（今夏河县桑科乡桑科古城）至清水川（今循化县东清水河谷，为吐谷浑根据地之一）一线是吐谷浑防御河南地的重要防线，吐谷浑曾与前赵、前凉、前秦、西秦、后秦、北魏、西魏、北周等政权在这里进行过反复争夺，除个别时段（432—441）外，吐谷浑从来没有稳定地控制过这些地方。因此，青海道南段经过洮河流域和大夏河上游的可能性不大。尽管前凉遣使东晋时曾可能经过洮河流域，但由湟水流域经大夏河流域、洮河流域通四川的道路仅仅是南北政权之间往来的区域性通道，与国际交通无关；第二，这两条道路都经过西宁，青海湖东南的河湟地区一直是北方各政权争夺的战略重点，尽管吐谷浑王慕利延时曾短时间内占有过西平（今西宁），但西平及其以东的湟水流域绝大部分时间曾被前凉、前秦、后凉、南凉、西秦、北魏、西魏、北周等占领，因此，青海道南段经西宁、青海湖北岸抵伏俟城通西域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相反第一条道路所经绝大部分时间控制在吐谷浑手里，应该为丝绸之路青海道南段的主干道。

表3 青海道迭部至茶卡沿线古遗址一览表 (据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 2002)

编号	遗址	地址	时代
1	卡坝古城	迭部东25公里	南北朝、唐宋
2	然闹古城	迭部西1.5公里	南北朝至北宋
3	阿木乎古城	青海河南蒙古自治县智后茂乡阿木乎村	南北朝时期
4	夏德日古城	库泽县夏德日乡内	吐谷浑时期
5	夸日龙古城	库泽县东北35公里夸日牧场内	年代不详
6	和日古城	库泽县西北50公里和日乡境内	年代不详
7	青禾羊古城	贵南县东南25公里	南北朝、明
8	塔瓦古城	贵南县北芒拉乡瓦塔村东南0.2公里	南北朝至盛唐
9	冬次多古城	贵南县塔秀乡子哈村	南北朝时期
10	斗后宗古城	同德县东南巴水乡斗后宗村	吐谷浑时期
11	斗后宗古城	同德县巴水乡斗后宗村	吐谷浑时期
12	上尕毛其古城	同德县巴沟乡上尕毛其村	南北朝
13	才乃亥古城	同德县巴沟乡才乃亥村	始筑于吐谷浑时期
14	羊曲桥头古城	兴海县河卡乡羊曲村东	年代不详
15	夏塘古城	兴海县桑当乡夏塘村	南北朝至唐代
16	上台破城	兴海县大河坝乡泉曲村西3公里	南北朝至唐代
17	支冬加拉古城	兴海县河卡乡宁曲村	南北朝
18	切吉古城	兴海县河卡乡原塘格木农场三大队	年代不详
19	卡日切亥古城	共和县切吉乡乔夫旦村	年代不详

表4 青海道卡坝古城至伏俟城沿线古遗址一览表 (据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 2002)

编号	遗址	地址	时代
1	卡坝古城	迭部西25公里	吐谷浑时期
2	然闹古城	迭部西1.5公里	南北至北宋
3	卜岗古城	迭部县益哇乡卜岗村	吐谷浑时期
4	羊巴古城	卓尼县卡车乡洮河南岸的羊巴村	蜀汉至盛唐
5	牛头城	临潭县城西5公里	东汉至隋唐
6	麻当古城	夏河县麻当乡玛利巴村	早期南北朝、晚期明
7	桑科古城	夏河县桑科乡	南北朝、明
8	八角城	夏河县甘加乡政府东	隋唐宋
9	桑科古城	夏河县桑科乡	南北朝、明
10	铁城山古城	同仁县保安乡保安村	南北朝至宋
11	藏盖古城	贵德县新街乡藏盖村	南北朝
12	瓦家古城	贵德县河西乡瓦家村	南北朝
13	黑古城	贵德县河西乡光锋村	明

表4 青海道卡坝古城至伏俟城沿线古遗址一览表 (据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 2002)

14	贵德古城		元明
15	尕次古城	贵德县尕让乡查曲昂村	东汉至隋唐
16	查角亥古城	贵德县过马营乡查角亥村	年代不详
17	东让遗址	贵德县沙沟乡东让村	南北朝至隋唐
18	曲沟古城	共和县曲沟乡克才村	
19	上塔买古城	共和县恰卜东南5公里	南北朝至隋唐
20	东巴古城	共和县东巴乡	南北朝
21	黑古城	共和县倒淌河乡蒙古村东南0.1公里	明
22	大仓古城	共和县江西沟乡大仓村东200米	南北朝至唐初期
23	尕日拉城	共和县石乃亥乡尕日拉村	吐谷浑时期
24	伏俟城	共和县石乃亥乡铁卜加村东南100米	吐谷浑时期

表5 青海道南段东线岷县至伏俟城一线古遗址一览表 (据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 2002)

编号	遗址	地址	时代
1	羊巴古城	卓尼县卡车乡洮河南岸羊巴村	蜀汉至盛唐
2	牛头城	临潭县城西5公里	东汉至隋唐
3	麻当古城	夏河县麻当乡玛利巴村	早期南北朝、晚期明
4	土门关故城	夏河县与临夏县交界处的土门关	年代不详
5	双城村古城	土门关北25公里	
6	起台堡	青海循化县道韩乡起台堡	吐谷浑时期
7	张杂古城	循化县白庄乡张杂村	唐宋仍在使用
8	文都古城	循化县白庄乡北0.5公里	南北朝至隋唐
9	古什群古城	循化县查都汗乡古什群峡黄河南	
10	雅毛古城	尖扎县马克塘镇雅毛村	
11	群科古城	化隆县群科乡	
12	昂斯多古城	化隆县昂斯多镇	
13	平安古城	平安县城西北	内涵不详
14	西宁波斯银币	西宁解放路	波斯萨珊俾斯 (457年—483年)
15	多巴南北古城	湟中县多巴镇	汉、南北朝至隋唐
16	山城子古城	湟中县上五庄乡东山上	
17	东峡古城	湟源县东峡乡石板沟村东	
18	光华古城	湟源县城关镇光华村村东	南北朝至隋唐
19	营盘台古城	湟源县申中乡申中村	
20	石门儿古城	湟源县佛海乡石门儿村	建城年代不详, 唐代仍 在使用
21	仓开古城	海宴县金银乡仓开村	可能始筑于南北朝
22	三角古城	海晏县城内	汉、南北朝

表5 青海道南段东线岷县至伏俟城一线古遗址一览表 (据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 2002)

23	尕海古城	海晏县尕海村北	汉
24	立新城	刚察县泉吉乡立新村	始筑年代不详
25	向阳古城	刚察县吉尔孟乡向阳村	
26	伏俟城	共和县石乃亥乡铁卜加村东南0.1公里	吐谷浑时期

1. 卡坝古城至夏德日古城的道路

古道由卡坝古城出发偏西北经迭部、郎木寺、尕海、河南蒙古至库泽北部的夏德日古城。夏德日境内有三座古城,分别为羊马日古城、智和罗合东古城和智和罗合西古城,城内出土物不多,主要是素面布纹瓦片,城垣用杂土判碎石夯筑而成,符合吐谷浑筑城的特征。^[64]

2. 夏德日古城至茶卡的道路

夏德日古城为丝绸之路河南道的枢纽,由此向北顺莫曲沟北上至吐谷浑的首都之一浇河城(今贵德),渡黄河翻越承风岭(今拉脊山西脉,隋代为重要互市地)至西平(今西宁),再向北穿越大斗拔谷(今扁都口)通张掖;向西北经共和或兴海至茶卡。

(1) 夏德日经共和至茶卡的道路。由夏德日至莫曲沟上游新街附近,偏西北顺沙沟至龙羊峡北出口渡黄河,经共和、沙珠玉河至茶卡。沙沟即吐谷浑的四大戍之一莫贺川,吐谷浑第六代国王视黑时曾将都城迁于莫河川。直至今日,今沙沟下游仍有个叫莫合的地名,应该为莫贺川地名的孑遗;茶卡西边的“莫河”,应该为吐谷浑沿着沙沟、恰卜恰河、沙珠玉河迁徙至茶卡盐湖西边的屈真川留下的地名。在龙羊峡北出口附近的黄河南岸有姊妹古城,北岸峡口至恰卜恰河之间,由东北向西南依次排列着峡口古城、姊妹古城、曲沟古城(已经淹没在龙羊峡水库中)、曹多隆古城。曲沟古城即文献中多次提到的吐谷浑故都树墩城。唐代中叶吐蕃占领这里后曾设树墩城、大莫门城和洪济城。洪济城南有桥通黄河南岸,名洪济桥,唐败吐蕃后,在洪济桥侧的黄河南岸置金天军。长庆元年(821)刘元鼎出使吐蕃,返回时曾经洪济桥至河州(治今临夏)。由龙羊峡北出口渡黄河,溯恰卜恰河西北行至曲沟乡,境内有托勒台东坎沿(卡约文化)、托勒台南坎沿(卡约文化)、苏乎拉吾堡台(齐家文化)遗址。继续西北行至恰卜恰乡,境内有恰藏拿乐山等10处卡约文化遗址和上塔买古城、下塔买古城、上塔买扎滩古城、尕寺台古城堡、加拉上古城、加拉下古城、门古骆驼古城等7座古城。^[65]可见,古代由龙羊峡北出口渡河,再经恰卜恰河、沙珠玉河抵茶卡的道路是一条十分重要通道。

(2) 夏德日经共和至茶卡的道路由夏德日向西有偏北与偏南两种走法,其中偏北经塔措其卡、其哈托洛、森多、贵南、芒拉、塔秀、曲布藏卡至杂毛羊曲渡黄河,后经河卡、满帐岗山(海拔4079米)东侧隘口、支冬加拉古城(兴海县河卡乡宁曲村)、沙珠玉河抵茶卡。在贵南县城东南25公里的青禾羊木一带,发现10座古城,其中有5座筑于河南王国时期,这证明了这条道路在河南道上具有重要位置。

偏南沿巴曲至才乃亥古城(在今同德县巴沟乡才乃亥村北)渡黄河,西北经夏塘古城(在今兴海县桑当乡夏塘村东3公里)、上破台古城(在今兴海县大河坝乡泉曲西3公里)、大河坝及其支流黄清河、满帐岗山(海拔4079米)东侧隘口、支冬加拉古城(在今兴海县河卡乡宁曲村)、沙珠玉河抵茶卡。该道由巴曲至才乃亥古城一段共发现16座古城,其中有6座古城筑于吐谷浑时期,这说明该道在河南道交通上也具有重要地位。该道上的夏塘古城可能就是吐谷浑第一代至第五代国王定都的赤水城,隋在此置河源郡。^[66]在河卡乡确什旦古代建筑遗址上,发

现一块长约33厘米、宽32厘米、高5厘米的雕砖，上部为蹲踞的露齿、扬尾的雄狮，下为一装饰有莲花瓣纹和忍冬藤纹的圆毡。专家认为这块雕砖确切年代在唐武则天（684—704）至唐玄宗（712—756）之间，为中亚粟特人的艺术品。^[67]在塔里木盆地南缘东段都兰吐谷浑贵族墓葬亦发现粟特锦。魏霍研究认为，粟特人早在三国至两晋时期就进入四川西北及盆地。^[68]河卡乡确什旦粟特风格雕砖的发现，为兴海处于沟通四川和西域、西亚的丝绸之路沿线提供了重要证据。

偏北与偏南两路同在支冬加拉古城（在今兴海县河卡乡宁曲村）汇合。支冬加拉古城被认为是历史上吐蕃所筑的有名的曼头城和唐代的那禄驿，处于唐蕃古道与“丝路”河南道的汇合处。^[69]由支冬加拉古城折西北至沙珠玉河，与由夏德日偏西北经龙羊峡北出口渡河，溯恰卜恰河谷至沙珠玉河的道路汇合，再西北溯沙珠玉河至茶卡。沙珠玉河流域人类活动遗迹较多，如沙珠玉乡尕巴赛、朱乃亥台、上卡力岗沙丘等卡约文化遗址，^[70]切吉乡表现羌、吐谷浑、吐蕃等游牧和狩猎生活的卡木屯岩画和切吉岩画，^[71]兴海县河卡乡切吉古城、共和县切吉乡乔夫旦村卡日切亥古城等。

左藤长认为茶卡或其西莫河一带，为吐谷浑根据地之一屈真川。^[72]2009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茶卡考古队在茶卡巴音乡乌兰哈达村发现一座建造规模巨大的陵墓。墓葬北依大山，面向茶卡盐湖，坐北朝南，南面宽约140米，南北长约240米，高30米左右，墓葬位于西、北、东三面环山的中部，其东、西两面的山势，犹如两头巨象，伏卧于陵墓的两侧，象鼻前侧面对茶卡盐湖。据考证，茶卡巴音乡陵墓可能是吐谷浑灭国前十几代君王的陵墓。^[73]茶卡吐谷浑王陵证明茶卡一带就是吐谷浑根据地之一屈真川。由茶卡向西北经乌兰、德令哈、大柴旦、鱼卡、花海子，逾当金山口至敦煌，向西南经都兰、格尔木，逾阿尔金山口至新疆，所以，茶卡为丝路河南道与青海道的交汇点。

综上所述，青海道南段走向是由成都向北经岷江流域，至白龙江上游的卡坝古城，西北经迭部、郎木寺、尕海、河南蒙古自治县至库泽，西北渡黄河（自东向西有龙羊峡北出口、尕毛羊曲和才乃亥三个渡口）经沙珠玉河流域抵茶卡。

（三）青海道南段兴衰落时间的再探讨

一般认为，吐谷浑称河南王时期（426—635）是丝绸之路河南道正式形成和正常运营的时期。经隋唐王朝的两次致命打击，河南王国崩溃瓦解，作为一条中西间通道，“丝路”河南道已经不复存在。但从岷江流域和兴海县境内发现的唐代丝路文物（如四川都江堰灵岩寺石千佛塔、兴海河卡粟特风格雕砖）看，8世纪中期，青海道南段仍然发挥着国际交通的作用。公元670年，吐蕃灭吐谷浑后，吐蕃与唐陇右诸州接境。公元755年—公元763年，吐蕃趁安史之乱占领河陇地区，建立了西至新疆塔里木盆地，东至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的庞大帝国，为经青海道沟通四川与西域、中亚乃至西亚的“丝路”大道的继续畅通创造了条件。因此，青海境内的都兰、兴海、四川岷江流域的都江堰发现的公元8世纪的“丝路”文物可能与吐蕃对青海道的经营有很大关系。换句话说，至唐代，丝绸之路青海道南段仍然是畅通的。就是到了南宋时期，青海南段仍然发挥着国际交通的作用。如前所述，1980—1981年，考古工作者在清理新疆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时，发现一件南宋时期临安（今杭州）泰和楼大街某行铺招帖。吴焯先生推断，在河西走廊与关陇驿道全部隔绝的情况下，由南宋都城临安抵西域的道路应该是沿南朝与西域的老路，即先由临安至成都，复由成都西北经松潘草地，取道柴达木盆地，越阿尔金山口进入塔里木盆地。

五、丝绸之路青海道西段走向

青海道西段由南北两支组成，北支由西宁西行经青海湖南北、柴达木盆地北缘，出当金山口抵敦煌入西域；南支由西宁西行经青海湖南北抵茶卡，然后由茶卡经柴达木盆地南缘，逾阿尔金山口抵若羌。

（一）西宁至铁卜加古城、茶卡的道路

西宁处于青海道东、西和北段的交汇处，由西宁向北经大通、门源、祁连逾扁都口至河西走廊的张掖，再北居延道出蒙古高原；由西宁向东沿湟水经乐都、平安至民和，分两路东渡黄河通陇右及关中；由西宁向南在贵德附近南渡黄河经库泽、河南蒙古、迭部、岷江上游通成都；由西宁向西经柴达木盆地南北分别抵达若羌与敦煌。1956年，西宁内隍庙街粮食厅工地出土76枚波斯萨珊俾路斯银币（457—483），^[74]表明公元5世纪下半叶途经青海的丝绸之路为十分繁荣的国际商道。

由西宁西行至湟源县，道路分为南北，北路经青海湖北岸的海宴、刚察抵达铁卜加古城；南路由湟源东南翻越日月山，溯倒淌河西北行，经青海湖南岸的江西沟至黑马河，再折西南经大水桥至茶卡，或由西宁向南溯南川河南行，后向西翻越拉脊山，经倒淌河、江西沟、黑马河、大水桥抵茶卡。^[75]青海湖区周围处于东部湟水、黄河流域温性森林草原带与西部柴达木盆地荒漠区的过渡带，植被为高寒草甸草原。由于本区海拔在3300~3800米，气候相对温和潮湿，牧草生长期长（107天左右），草场为由禾本科和莎草科等为主的优良牧场，^[76]所以自古以来为游牧民族东西迁徙的重要通道。在青海湖南岸共和县黑马河乡^[77]、北岸刚察县吉尔孟乡、青海湖西岸布哈河流域的卢森山和鲁芒沟^[78]发现了反映游牧与狩猎生活的岩画。青海湖南北两岸亦为农耕民族争夺的战略要地，留下了众多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古城遗址（见表4、表5）。

铁卜加古城位于共和县石乃亥乡铁卜加村东南，城东西长220米、南北宽200米，开东门一处，残墙高5米、宽6米，城内西侧有房基一座。^[79]城内出土大量素面布纹板瓦与筒瓦残件、夹砂灰陶器。研究认为铁卜加古城即吐谷浑国都伏俟城，^[80]是在王莽西海郡两县之一的基础上建立的^[81]据《魏书》记载，“伏连筹死，子吕夸立……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虽有城郭而不居，恒处穹庐，随水草畜牧。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千余里……尝得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驄驹，能日行千里，世传青海驄者是也。”^[82]由此看来，游牧民族国都与农耕民族国都有所不同，所以伏俟城虽为国都，不一定要将其作为丝绸之路河南道与青海道的汇合点，但伏俟城是西北经柴达木盆地北缘通敦煌的必经之地。

（二）铁卜加古城经柴达木盆地北缘至敦煌的道路

柴达木盆地是青藏高原北部边缘一个巨大的近似三角形的山间盆地，位于阿尔金山、祁连山南麓、昆仑山北麓，面积约14.93万平方千米。有些文献记载柴达木盆地面积为22万或25.5万平方千米，系指柴达木内陆流域，尚包括茶卡盆地，哈拉湖内陆流域的部分山区。盆地地表结构大致呈环状结构，祁连山、阿尔金山南麓，昆仑山北麓为洪积扇，扇缘泉水出露地带为绿洲。由洪积扇扇缘向内依次为倾斜平原和中部湖积平原，平原盐碱化与风沙侵蚀严重。^[83]因此，盆地南北缘绿洲成为人类东西往来的天然通道，尤其淡水资源最为丰富的南缘，为历史时期柴达木盆地入西域的主干道；而盐碱化与风沙侵蚀严重、植被覆盖度严重不和淡水缺乏的盆地内部，历史时期南北纵向交通不发达。

吴景敖^[84]、周伟洲^[85]考述了由柴达木盆地入西域的三条道路：一条是由伏俟城至白兰（今青海都兰、巴隆一带），再西北经今小柴旦、大柴旦至今甘肃敦煌，由敦煌西出阳关至西域鄯善（今若羌）。^[86]慕瓚之子被囊为躲避魏军追击，曾沿此路逃走。二是由伏俟城经白兰，西至今格尔木，再西北经尕斯库勒湖，越阿尔金山至西域鄯善，与前一条路汇合，为古青海路主线。北魏时慕利延西通于阗及唐大将李大亮追击吐谷浑伏允可能取此道。三是由伏俟城经白兰，西至今格尔木，再往西南之布伦台，溯楚拉克阿干河谷入新疆，西越阿尔金山，顺阿牙克库木湖至且末，再与上述一、二条路线汇合。此道为通往新疆较捷之路，解放前仍为西宁、和阗之间的商队行道。但此道入新疆多经山岭，旅途不便，只能视为古青海道的一条支线。

柴达木盆地北缘断续分布着赛什腾山、绿梁山、锡铁山和沙利克山等，海拔在3500~4000米之间，自东南向西北，将盆地分割成茶卡、希里沟、德令哈、小柴旦、马海及花海子等一连串的闭流小型山间盆地与谷地。^[87]由于受祁连山冰雪融水的滋养，在这些山间盆地与谷地形成一连串绿洲，绿洲上水源丰富，宜农宜牧，为河西走廊西端与青海沟通的天然通道。

由伏俟城出发沿现代铁路西行经天峻、都兰寺至乌兰县重镇希里沟。希里沟境内发现各种文化遗址7处，其中最能说明乌兰在中西交通中地位的是乌兰县城内的佛塔塔基。塔基是夯筑而成，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2.5米、南北宽约10米。塔基东南凿有佛龛，内有彩绘与泥塑雕像。塔基上有塔体，底部由素土夯筑，上部由长条形土块垒砌。研究认为希里沟佛塔塔基与南北朝隋唐时期西域所见风格十分相似。^[88]

由乌兰县偏西北行经赛克什、厚日、客城、尕海至德令哈。2002年8月，青海文物考古队与海西州民族学博物馆联合考古队对德令哈郭里木乡的两座古墓进行挖掘，从中发现三具唐代彩绘木棺，上有四神图案和莺歌燕舞图等。^[89]林梅村认为，在棺木外绘制彩色图案，是东汉以来在河西走廊和罗布泊一带兴起的葬俗。在新疆和田发现的晚唐五代时期的彩绘木棺，上绘有四神兽图案，与郭里木彩绘木棺如出一辙。^[90]唐代，由塔里木盆地北缘顺奔疾道西北逾当金山口可至阳关（今敦煌西南古董滩一带），由阳关折西经于阗道，即经库姆塔格沙漠北缘、罗布泊南岸、若羌、且末可抵达于阗（今新疆和田）及葱岭以西；逾当金山口后亦可至沙州（治今敦煌），再西北经稍干道抵伊州（治今新疆哈密）。^[91]希里沟佛塔塔基和郭里木彩绘木棺说明，晚唐五代由柴达木盆地北缘经当金山口至南疆的国际交通线繁荣一时。公元前1048年—公元前500年哈密地区的焉不拉克文化当中的代表青海古羌人的辛店文化因素，也可能就是沿着柴达木盆地北缘出当金山口，再经敦煌北至哈密盆地这条路线传播的。以上路线也应该是吐谷浑遣使柔然和东魏、柔然经吐谷浑遣使南朝的最主要的路线的一段。

由德令哈西行约55公里至怀头塔拉。在怀头塔拉西约40公里的宗务隆山南麓发现一处岩画。岩画内容有牛、羊、骆驼、马、鹿、蛇、鹰、狼和狩猎场面，还有古藏文文字。这些表明塔里木盆地北缘为包括吐蕃在内的游牧民族栖息往来的必经之地。

由怀头塔拉西北行便是大柴旦。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了100余件打制石器，有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这些石器制作精良、器形规整，应该属于旧石器晚期器形。另外在当金山口以北与敦煌相邻的肃北县霍勒扎德盖亦有旧石器晚期地点的发现。^[92]两旧石器地点虽不能为丝路交通提供直接证据，但它们的发现表明，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当金山口以北的河西走廊西端与柴达木盆地北缘已经有人类活动。以后的人类南北往来的活动，是踏着这些远古人类的足迹而行的。

由大柴旦偏西北行38公里至鱼卡。鱼卡以北和以西大山环绕，西北有山口通向苏西克。在鱼卡境内有一处烽燧遗址，烽燧呈正方形，夯筑而成，基座边长各5米，残高约5米，推断为明代遗迹。^[93]

由鱼卡西北行经苏西克约100公里至花海子，花海子位于苏干湖盆地。晚唐时期（约

9世纪)变文(P.2692)中的《张仪潮变文》载“诸川吐蕃兵马还来劫掠沙州……仆射(张仪潮)闻吐浑王反叛,即点兵……取西南上把疾路进军。才经信宿,即至西同近侧,即交锋……决战一阵,蕃军大败。”同卷唱文云:“忽闻犬戎起狼心,叛逆西同把险林。星夜排兵奔疾道,此时用兵总须禽。”按把疾即奔疾道,又称南山道。该道出敦煌沿党河(唐甘泉水)河谷西南行,经黑山咀(唐马圈口)、西千佛洞、党河大拐弯处,折而南行,经沙枣园、沙山子、沙山沟、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长草沟,逾当金山口(有唐南口峰),复经苏干湖盆地(唐五代名西同),直抵柴达木盆地(唐五代名墨离川)及其以远;西同又称西桐(唐五代名)即今苏干湖盆地,^[94]明代在此置安定卫。《明史·卷三三零·西域传(二)》记载:“安定卫距甘州西南一千五百里,汉为若羌,唐为吐蕃地,元封宗室卜帖木儿为宁王镇之。其地本名撒里畏兀儿,广袤千里,东近罕东,北迤沙州,南按西番。”^[95]今苏干湖盆地团结乡西北,残存明代故堡一座,其平面呈矩形,东西长约1000米,南北宽近500米,残高2米许,以就地水渍碱土夯筑,墙体呈白色,当地哈族群众称其为“阿合塔木”,意即“白城”。该城应为安定卫的卫城。另在该城东南19公里许,发现明代小城堡一座,面积约为白城的一半。苏干湖南十几公里的一小山丘上,还残存若干石块垒砌的古烽燧。^[96]

由花海子西北逾当金山口经党城遗址(党城遗址为文献记载的东晋的子亭城、唐代的子亭镇和五代的子亭故址)至马圈口(今黑山咀)。P.2555《佚名氏诗五十九首》(作于安史之乱后)吟诵了敦煌陷落于吐蕃后,诗作者被押送往临蕃城一路所见所闻及感受。诗作有《冬出敦煌郡入退浑国,朝发马圈作》《至墨离海奉怀敦煌知己》《青海卧疾之作》《夜度赤岭怀诸知己》《晚宿白水古戍见白骨之作》和《晚秋至临蕃城被禁之作》等。“马圈”即今马圈口;墨离海一般认为即柴达木盆地北缘苏干诺尔;“青海”即青海湖;“赤岭”即今日月山;“白水古戍”即今湟源县城关镇光华村东2公里的光华古城;“临蕃城”即今湟源县多巴北古城。诗人所走路线由敦煌出发东南经今当金山口、柴达木盆地北缘、青海湖南岸至倒淌河,再折东北翻越日月山至湟源,后折西南至湟源多巴镇。

由马圈口遗址向北至党河大拐弯处的南口烽遗址。《通典·卷一四七》记述敦煌四至,“南至南口峰二百五十里,烽以南吐谷浑界”。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述甘泉水(今党河)出子亭镇(今肃北自治县党城遗址)“又西北流六十里至山阙烽,水东即是鸣沙山”。李并成先生认为山阙烽即今残存在党河大拐弯处西侧山头、鸣沙山西侧的唐代烽燧,残高2.7米。

由南口烽向北至沙州(治今敦煌),再经稍干道通伊州(治今哈密),向西至阳关(在今敦煌西南古董滩)经于阕道通塔里木盆地南缘的鄯善(今若羌)与青海道西段柴达木盆地南缘通新疆的道路汇合,通于阕(今和田)及葱岭以西。该道早在西汉已开辟,为当时通往西域的南道,唐代仍在沿用。其具体走向是由沙州(治今敦煌)西行出阳关,一路顺阿尔金山山前洪积冲积扇戈壁、沙丘地带前行,经菖蒲海(今罗布泊)南岸、七屯城(汉伊循城)至石头城(汉楼兰国,亦名鄯善),沿途几无水草,但路况平坦易走,且能全天候通行;一路沿阿尔金山北麓行进至石头城,靠近山根,水草条件好,且较为平直,距离较短,但路况较为险峻,不能夜行或全天候通行。由石头城(今若羌)继续向西沿今车尔臣河至今且末,通于阕(今和田)及其以远。^[97]

(三) 茶卡经柴达木盆地南缘至若羌或且末的道路

柴达木盆地东南部是一片广阔的平原,河流众多,湖泊面积广大。察汗乌苏、香日德一带黄土覆盖较厚,给水条件良好,便于发展农业生产。南缘地势开阔平坦,由巴隆至乌图美仁

间，在昆仑山北麓距山脚约10~15公里的戈壁前缘，有一条东西呈带状分布，绵延500公里，宽1~5公里的地势平坦的山前冲积平原，冲积扇缘泉水出露地带水源丰富，其中香日德、格尔木、乌图美仁地区水量最为丰富，占盆地总水量的55.5%；东部的察汗乌苏、茶卡、希里沟次之，占总水量的22.4%；西部的阿拉尔地区占总量的8%，以潜水补给为主，水源丰富稳定；而北部的德令哈、花海子、鱼卡、马海、大小柴旦占仅仅总量的14.3%。^[98]因此，与柴达木盆地北缘相比，柴达木盆地南缘自然条件最为优越，该道上的遗址特别是“丝路”遗迹、文物也最为丰富，应为青海道西段主干道。

古道由茶卡出发西南经尔秀沟至都兰县夏日哈乡。夏日哈一带为柴达木盆地南缘第一个绿洲，境内有7个青铜时期的遗址，其文化面貌与香日德、诺木洪的文化相同。这表明公元前1000年前后，从盆地东南的夏日哈经香日德至西部的诺木洪之间已经形成了一条固定的通道。

1985—1988年，青海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都兰东南10公里的热水乡发现了一座属于唐代早期的吐蕃大墓，从中发现了大量的波斯织锦、粟特系统金银器、波斯、拜占庭织锦以及阿拉伯世界出产的大食锦等珍贵文物，^[99]他们生动反映了青海道西段国际贸易的盛况。研究认为，公元7世纪伊斯兰文明迅速取代拜占庭、波斯与粟特文明，但伊斯兰兴起之初不得不依赖于各地被统治民族的艺术。公元7世纪随着萨珊波斯覆亡，许多波斯王室成员流亡唐朝，都兰血渭一号大墓出土的波斯织锦写有波斯王的名字，就与波斯王室有关。波斯织锦显然是由波斯难民带入中国的。^[100]因此，都兰波斯织锦、粟特系统金银器、波斯和拜占庭织锦以及阿拉伯大食锦的发现，可能是吐蕃与阿拉伯帝国交往的结果。另外，在都兰热水乡卢丝沟还发现了以佛教题材为主的岩画。这些岩画将马匹与佛陀组织在一起，可能与信奉佛教并从事游牧生活的吐谷浑有关。^[101]周伟洲和谭其骧根据《宋云纪行》中的相关信息推断，文献记载的吐谷浑城就在都兰一带。^[102]都兰血渭一号大墓被认为是莫贺吐谷浑可汗的陵墓。^[103]所以吐谷浑城在都兰一带的判断是有道理的。都兰一带，应该就是公元452年拾寅开始营建城邑的伏罗川。

在都兰西南的香日德镇境内，考古工作者相继发现了9处诺木洪文化遗址和一座古城。古城平面呈方形，边长300米，城基宽2米，夯层厚0.12米，城内出土物不多。陈良伟认为香日德与都兰都在柴达木盆地南缘，自然条件相似，但香日德境内发现古城遗迹，且明显暖于其它地方，可能是就是文献记载的吐谷浑城。^[104]2002年5月底，香日德镇东3公里沟里乡牧草村北朝吐谷浑墓葬出土一枚拜占庭金币。金币为狄奥多西二世（408—450）时铸造。这枚金币为历史上经西宁、柴达木盆地赴新疆的偏南青海丝绸之路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105]由香日德向西，经诺木洪、格尔木、乌图美仁逾阿尔金山口西去西域；向北顺柴达木河通盆地北缘，经当金山口抵敦煌、西域；向南溯香日德河（柴达木河上游）、冬给措纳湖横穿大山至花石峡、玛多。道宣《释迦方志》记述的唐初通印度东道由青海湖南岸、柴达木盆地南缘至香日德后，就是经香日德河、冬给措纳湖南下的。

在柴达木盆地附近共发现诺木洪文化遗址40余处，以诺木洪搭里他里哈遗址最具有代表性。诺木洪搭里他里哈遗址发现于1957年，1959年被命名为诺木洪文化。遗址内发现土围墙9座、房屋遗迹11座、土坯坑9个、圈栏1个、瓮棺葬墓3座以及大量的铜器、石器、骨角器、陶质工具等。诺木洪文化居民以畜牧业为主要生活来源，兼有农业。文化早期与卡约文化联系紧密，上限相当于西周时期，下限至汉代。^[106]诺木洪搭里他里哈遗址表明，距今3000年左右，青海东南部卡约文化的先民已经进入柴达木盆地南缘。

格尔木是柴达木盆地南缘重要的交通枢纽。由格尔木向东经都兰、青海湖南岸通西宁；向西经阿尔金山口通若羌；向北经柴达木盆地北缘的大小柴旦、当金山口通敦煌；向南逾昆仑山口，经楚玛尔河、沱沱河逾当拉山，经藏北草原黑河抵逻些（今拉萨）；向南一路在纳赤台继续向西溯奈齐郭勒河而上，经布伦台、楚拉克阿干河、阿牙克库木湖至且末。考古工作者在奈

齐郭勒河流域发现一处岩画，命名为野牛沟岩画。野牛沟岩画位于格尔木西南约100公里的郭勒木德乡野牛沟四道梁东南山坡上。岩画共分为五区，主题为马匹、牦牛、奔狼、秃鹰和狩猎，共46幅，约250个个体形象。野牛沟岩画表明昆仑山中的奈齐郭勒河流域为游牧民族东西往来的通道。2008年8月笔者至奈齐郭勒河考察时，还发现采玉矿点多处和西王母庙。奈齐郭勒河以西的乌图美仁河上游就是著名的传说中的西王母瑶池所在地。奈齐郭勒河流域不仅是游牧民族的迁徙通道，可能还是昆山之玉向东传播的通道。

古道由格尔木向西至乌图美仁后道路分为两支：一支南湖那仁郭勒河至布伦台，与溯奈齐郭勒河的西向通道汇合，经楚拉克阿干河、阿牙克库木湖至且末，该道在河谷与山谷中穿行，虽较为崎岖难走，但沿途水草丰美，并且绕开了乌图美仁以西的沙碛，为通新疆的较为便捷的通道；一支在乌图美仁继续向西，经尕斯库勒湖，越阿尔金山至若羌，该道须穿越一段沙碛之地，但路途平坦易走，能全天候通行，为青海道西段主干道的最西的一段。乌图美仁在元代前后为蒙古王封地，在此地发现许多元墓，元明时仍当中西交通孔道。^[107]

乌图美仁至尕斯库勒湖之间，道路在沙碛与盐碱沼泽地之间的地带穿行，虽然路途平坦，但缺乏水草，比较难行。不过在沙碛包围的芒崖镇西19公里处发现一古城遗址，命名为那仁沙拉古城。由于强烈风蚀作用，古城保存极差，目前仅存北垣。北垣为夯筑而成，东西残长18米，残高1.5米，夯层厚0.05~0.1米。城内没有发现遗物，所以筑城年代不详，至迟在明代还在使用。唐代中后期至元代以前黄头回纥居住于此。元代，黄头回纥改为撒里维吾尔。^[108]那仁沙拉古城的发现说明，乌图美仁经芒崖通尕斯库勒湖的古代道路是存在的。由尕斯库勒湖西北行逾阿尔金山口走一段山路，即可到达若羌，亦可由尕斯库勒湖向西经铁木里克河、车尔臣河至且末。

（四）柴达木盆地南北缘纵向交通

陈良伟认为由柴达木分道沿线南北对接的站点有9个：伏俟城经黑马河可与茶卡互通；茶卡经察汉诺、乌兰可与德令哈互通；香日德经铁卜圭可与怀头他拉互通；格尔木经察尔汗、小柴旦可与大柴旦互通；乌图美仁沿河而下可与沙梁子互通；鱼卡经茶冷口可与芒崖互通；当金口经冷胡、俄博梁可与芒崖互通；大草滩经库什哈、拉配泉可与索尔库里互通。^[110]此外，周伟洲认为由柴达木盆地北缘的德令哈南经察尔汗至格尔木，再由格尔木向西经芒崖直达都善的道路，是经柴达木盆地入新疆的一条最近的路线。以德令哈至格尔木一线为界，柴达木盆地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面积约4.02万平方千米，年均气温2~4℃，年均水量100~180毫米，河流较多，植被为荒漠草原，盆地南北缘之间沟通的自然条件较好。西部面积约10.91平方千米，年降水量在20毫米以下，地表干旱，风蚀、风积作用十分明显，除沿河、湖岸发育盐生草甸外，大部分为戈壁、风蚀残丘及流沙所占据。北部为干燥剥蚀及若干荒漠性山间盆地，河网稀疏。盆地西南部水资源较为丰富，那仁果郭勒河、格尔木河、乌图美仁河都有较多的水资源，但河流下游平原盐积过重。因此，盆地西部南北纵向交通联系的自然条件不如东部，或者说，所谓南北交通，特别是盆地西部南北互通的对接线，大多只有在现代机动条件下才能实现，在古代车马交通或步行为主的时代，徒步穿越戈壁、盐泽、流沙而没有淡水的保障，是难以想象的。

六、青海道北段走向

青海道北段指穿越祁连山隘口通河西走廊至西域或蒙古高原的通道，最主要的是大斗拔谷

道，另外还有扁都口以西、当金山口以东的走廊南山道、扁都口以东至河口间的张掖守捉道、洪源谷道、白山戍道等。

（一）大斗拔谷道

大斗拔谷道指从湟水流域出发，经祁连山隘口扁都口向北通河西走廊的道路，因扁都口古代称为大斗拔谷，故名大斗拔谷道。大斗拔谷道为汉唐时期青海道进入河西走廊的最重要的干线，走向与今国道227线（西宁至张掖）略同。

据考古推断，早在卡约文化时期（商代早期至西周晚期），青海古文化已经跨越祁连山隘口进入河西走廊，与北方草原文化接触。汉魏时期，大斗拔谷道为青海与北方草原和西域沟通的重要通道。如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东汉晚期墓葬中出土过一块匈奴等胡人特有的具有强烈的斯基泰风格的网状铜牌饰、一件锤有忍冬藤和葡萄形图案的安息（波斯）风格的单耳鎏金银壶。^[110]东晋南北朝时期大斗拔谷道更为繁荣。如后秦姚兴弘始二年（400）高僧法显、慧慧西行求法，曾穿越大斗拔谷入河西西去。^[111]又如元嘉元年（424），北印度人昙摩密多曾经此道至建康。据《大藏经·二〇五九·高僧传·卷三》记载，昙摩密多“周游诸国。遂适龟兹……顷之适凉州……常以江左王畿志欲传法，以宋元嘉元年辗转至蜀。俄而出峡止荆州……顷刻沿江东下至于京师。”昙摩密多由凉州至蜀，必经过口扁都支道，不仅东西往来求法、弘法者经过，它还是吐谷浑与南朝、柔然、突厥和北齐沟通的交通要道。

北魏占领河西走廊以后，江南与西域和塞北的联系主要经柴达木南道，大斗拔谷道作为国际通道已衰落。但隋唐时期，大斗拔谷道仍是区域交通干道。如大业五年（609）隋炀帝西巡曾经大斗拔谷道至张掖。^[112]《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开元十五年（727）载：“去冬，吐蕃大将悉诺逻寇大斗谷，进攻甘州，焚略而去”，走的也是这条道路。唐末吐蕃内乱，其洛门川镇将论恐热西攻鄯州节度使尚婢婢，又西北掳掠甘、肃、瓜等州，亦是经由此道。

陈良伟认为，该道由西宁向北，经山城村古城（今大通县景阳乡山城村北）、下庙古城（在今大通县新城乡下庙村，下限至晚唐北宋间，隃斯罗牦牛城、宋宣威城）、杨家城古城（在今大通县城关镇李家磨村，筑于河南国时期），渡北川河沿东岸行至达坂山口，再北偏东行经金巴台古城（在今门源县北山乡金巴台村，唐威戎城、隃斯罗曙令城、宋德通城）、老虎沟古城（在今门源县北山乡老虎沟）、克图古城（在今门源县北山乡东南75公里，宋城，疑为宋震武军、隃斯罗古骨龙城）渡大通河，经门源古城（在今门源县浩门镇东约1公里，宋元城，疑为宋善治堡、隃斯罗通济堡）、青石咀镇、金沙古城（在今门源县皇城乡马营村，筑于吐谷浑时期，宋以后称石门堡）、峨堡故城（在今祁连县峨堡乡峨堡村，汉至元代）、扁都口（唐置大斗拔军）、永固古城（在今甘肃民乐县东南约25公里，筑于西汉前后）至山丹。^[113]另外，在扁都口稍东，今山丹县冶南微东有白崖口，山口北有山丹河东源流经，近代有人马往来的记载，可能为唐代三水镇道。^[115]大斗拔谷道北接居延道，由张掖北出，沿黑河北行，经古居延绿洲，可深入蒙古高原腹地，亦可由此东接阴山河套，西连天山南北。^[115]

由于该道沿线相继发现汉、东晋、南北朝、隋唐宋及至元明清时期的城址、墓葬和要塞，所以，事实上自汉代以来，该道一直没有停止过运行，为沟通湟水流域和河西走廊的最重要的通道。

（二）走廊南山道

走廊南山道指位于扁都口以西、当金山口以东，南起青海湖北岸，向北横穿祁连山抵河西走

廊，更北抵达漠北的道路。因为主要路线经过走廊南山，即日月山、大通山、托来山、俄博南山等故名。最早注意到该道的是严耕望先生，后来陆庆夫和陈良伟亦注意到此道。陈良伟认为该道“至少起用于西汉中期，东晋南北朝时期相当繁荣，而唐初仍在继续使用”，其具体路线是：起于三角城（在今海晏），溯甘子河而上，经过大通山、大通河至祁连，然后溯黑河而上经油葫芦塘至野牛沟，由野牛沟正北行，经过白泉门、肃南至大河；偏北行经元仙子至高台或经红崖子、马营、清水堡、总寨至酒泉；西偏北经托来河、托勒、祁青、夹皮沟、铁镜山、石泉、嘉峪关至酒泉。^[116]李宗俊博士结合敦煌文书，发现一条未被陈良伟注意到的道路，该道大致从青海境内的疏勒河上游，过达坂隘口进入肃北蒙古自治县境至荒田地（这一段因沟壑纵横，一路翻山越岭，仅为小路，但至今人马可行），再从荒田地经肃北蒙古自治县旧场部、鱼儿红乡、玉门市早峡山区的红沟（人马行走亦可经早峡口）进入河西走廊地区（今为大车路）。唐代在其北出口即今玉门市的早峡山区置玉门军，因此，李博士称之为玉门军道。由玉门军道向西北经红柳峡还可通今瓜州县。唐代由青海湖北岸吐蕃鱼海军（治今青海海晏境内）经祁连成直通河西走廊建康军（治今高台骆驼城）的道路称为建康军道或鱼海军道。该道由鱼海军北经大通山、大通河、祁连，后溯黑河而上，经油葫芦塘、野牛沟、白泉门、肃南、大河、元仙子至高台，继续向北还可经花海、金塔、居延道通蒙古高原或河套、宁夏平原，相当于陈良伟先生所说的走廊南山支道偏北的一条道路；由走廊南山道至青海祁连县边麻河后，再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梨园河谷通张掖的道路（今有肃南通张掖的公路），李博士认为也可能为唐代三水镇道。

（三）张掖守捉道

开元二十五年（737）因孙海、赵惠琮矫诏令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击吐蕃，“希逸不得已，发兵自凉州南入吐蕃境两千余里，至青海西，与吐蕃战，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乞力徐脱身走。”^[117]崔希逸行军的路线大约是在今武威南山麓张义堡一带向南翻越冷龙岭、达坂山，经青海互助县至西宁，又由西宁向西至青海湖西岸。李宗俊博士认为，唐代有两个张掖守捉，其位置大约在今武威市南境祁连山麓张义堡一带，崔希逸此次行军的路线必经过武威市南境祁连山麓张义堡，因此将此道称为张掖守捉道。

（四）洪源谷道

关于洪源谷的记载最早见《资治通鉴》，武周圣历二年（699），吐蕃内乱，论赞婆降唐，武后“以为右卫大将军，使将其众守洪源谷。”^[118]久视元年（700），吐蕃攻凉州，“大将趣莽布支率骑数万人寇凉州，入自洪源谷，将围昌松。”^[119]李并成先生认为洪池岭即乌鞘岭，^[120]李宗俊认为洪池岭与洪源谷应该为同一词源，为今乌鞘岭北的古浪峡，峡谷地形狭长、地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吐蕃经洪源谷进攻凉州的路线大致是：过大通河，经今天祝县藏族自治县入河西走廊洪源谷，再经昌松县而至凉州，路线与今天从西宁经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至天祝藏族自治县华藏寺的公路所经的路线相似。严耕望先生早在《唐代交通图考》中就注意到从今乐都（鄯州）出发，渡大通河，经过今古浪西（昌松县）至武威（凉州治所姑臧）的道路，^[121]该道就是本文所说的洪源谷道。由洪源谷道至凉州（武威）后，可继续向北沿白亭河（今石羊河下游）北行，经白亭海（今石羊河终端湖白碱湖一带），向东穿越今腾格里沙漠北部直抵黄河岸边。该道为河西走廊通往河套、北京及至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的一条捷径，唐五代以后依然兴盛，当地称之为绥远道，又称为白亭河道。^[122]

（五）白山戍道

白山成为唐代在河西走廊设立的戍守之一，其位置大约在大靖河出山口处的大靖镇北1公里处。“大靖河源于祁连山东端的毛毛山北麓，由古城头向南穿越大靖峡谷可直抵松山牧场，并进而联通庄浪河谷地，历史上该道屡屡成为羌、蕃北来的孔道”；庄浪河谷南段入黄河河口一带古称为令居，为中原通往河西走廊、河湟水流域的咽喉要径，又是地当河湟北出蒙古高原的交通要道。^[123]白山戍道所经位置路线大致为由白山戍向南溯大靖河至松山牧场，再东南沿庄浪河谷至河口，再由河口沿湟水西进至青海。

注释

- [1] 任乃强：《川康交通考》，《新亚细亚》1932年第3卷第4期。
- [2] 沙畹：《宋云行纪笺注》，《禹贡》1935年第4卷第1、2期。
- [3] 岚瑞徵：《六朝时佛僧往来的西域交通路及记录》，《佛教学论》1936年第1辑。
- [4] 清水泰次：《明代四川省与西域的交通》，《史潮》1937年第7卷第1期。
- [5] 松田寿男：《吐谷浑遣使考》，《史学杂志》1937年第11~12期。
- [6] 黄文弼：《古楼兰国历史地位及其在中西交通上之地位》，《史学集刊》1937年第5期。
- [7] 吴景敖：《西陲史研究》，中华书局，民国三十七年版。
- [8] 夏鼐：《青海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
- [9] 冯汉镛：《关于“西宁通西域路线”的一些补充》，《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
- [10] 唐长孺：《南北朝间西域与南朝的陆路交通》，《魏晋南北朝史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北凉承平七年写经题记与西域通往江南的道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979年；又载于《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1986年2月。
- [11] 吴仍骥：《两关以东的“丝绸之路”一兼与鲜肖威同志商榷》，《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80年4期。
- [12] 张德祖：《丝绸之路在青海》，《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 [13] 初师宾：《丝路“羌中道”开辟小议》，《西北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
- [14] 周伟洲：《古青海路考》，《西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丝绸之路东段的又一条支线——青海路》，《西北历史资料》1985年第1期。
- [15] （日）前田正明著，张金衡、陈宗祥译：《西夏时期河西走廊南北的交通线》，《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
- [16] 王叔凯：《古代青海中西交通路考》，《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 [17] 王宗维：《汉代祁连山道考述》，《西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
- [18] 赵荣：《青海古道探微》，《西北史地》1985年第4期。
- [19] 王育民：《丝路“青海道”考》，《历史地理》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 [20] 李之勤：《唐代的汶川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1期。
- [21] 吴焯：《青海道述考》，《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第123~140页、第86页。
- [22] 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 [23] 魏 霍：《粟特人与青海道》，《四川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第94~98页。
- [24] 李宗俊：《唐代河西走廊南通吐蕃道考》，《敦煌研究》2007年第3期，第44~49页。
- [25] 张德祖：《古玉石之路与丝绸之路青海道》，《青海师大学报》2008年第5期，第56~59页。

- [26] 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7页。
- [27] 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民和阳洼坡遗址试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1期，第40-58页。
- [28] 谢端据：《马家窑文化溯源试探》，《中国考古学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9-32页。
- [29] 石兴邦：《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考古》1962年第2期。
- [30] 董志强：《青海出土的外国文物考释》，《青海民族研究》（社科版）2001年第1期，第46-50页。
- [31] 杨伯达：《“玉石之路”的布局及其网络》，《南都学坛》2004年第3期，第113-117页。
- [32] 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 [33] 苏海洋：《两汉以前河西走廊人地关系转型与交通格局的演变》，陕西师大环发中心“河西走廊人地关系研讨会”武威会议论文，2009年5月。
- [34] 俞伟超：《古代“西戎”和“羌”“胡”考古学文化归属的探讨》，《先秦两汉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80-192页。
- [35] 三宅俊彦：《卡约文化青铜器初步研究》，《考古》2005年第5期，第73-88页。
- [36] 赵生琛：《青海西宁发现卡约文化铜鬲》，《考古》1985年第7期。
- [37] 李怀顺、黄兆宏：《甘青宁考古十八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7页。
- [38] （俄）B.B伏尔可夫：《北蒙古的青铜时代与早期铁器时代》，乌兰巴托，1967年，第118页。
- [39] 张文立、林云：《黑豆嘴类型青铜器中的西来因素》，《考古》2004年第5期，第65-73页。
- [40] 戴尊德：《山西灵石县旌介村商代墓和青铜器》，《文物资料从刊》第3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 [41] 陈戈：《略论焉不拉克文化》，《西域研究》1991年第1期。
- [42]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帕米尔高原古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
- [43] 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68-2908页。
- [44] 吴焯：《青海道述考》，《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第123-140页、第86页。
- [45] 韩康信：《新疆洛普山普拉古墓人骨的种系问题》，《人类学学报》1988年第3期。
- [46] 班固：《汉书·六十九卷·赵充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71-2995页。
- [47] 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75-2876页。
- [48] 章巽：《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49] 释慧皎：《高僧传·卷三·释县无竭传》。
- [50] 杨衔之：《洛阳伽蓝记·卷五·宋云记行》。
- [51] 房玄龄等：《晋书·卷九十五·艺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492页。
- [52] 道宣：《续高僧传·卷二·闍那崛多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 [53] 裴之…主编：《黄河上游地区历史与文物》，重庆出版社，1995年，第234-239页。
- [54] 夏鼎：《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
- [55] 康柳硕：《甘肃出土的丝路外国钱币》，《陇右文博》1996年第1期，第145-149页。
- [56] 魏征等：《隋书·卷三·炀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3页。
- [57] 李永平：《西北地区重大考古发现与丝绸之路研究》，《丝绸之路》1999年学术专辑，第18页。
- [58] 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8-277页。
- [59] 萧子显：《南齐书·卷十五·州郡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298页。
- [60] 《黄南藏族自治州州志》编撰委员会：《黄南州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59-461页。
- [61] 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93-110页。
- [62] 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86页。
- [63] 胡文和：《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图版二、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 [64] 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18-119页。
- [65] 《共和县志》编纂委员会：《共和县志》，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45-450页。

- [66] 魏征等撰：《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16页。
- [67] 《龙羊峡志》编纂委员会：《龙羊峡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222页。
- [68] 魏霍：《粟特人与青海道》，《四川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第94-98页。
- [69] 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27-128页。
- [70] 《共和县志》编纂委员会：《共和县志》，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46-447页。
- [71] 周庆措：《对青海省海南地区岩画的时代、族属及相关问题的思考》，《文博》2009年第4期，第17-20页。
- [72] 佐藤长著、王丰才编译：《吐谷浑的根据地》，《西北史地》1982年第2期。
- [73] 许新国：《茶卡吐谷浑国王陵浅谈》，《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4期，第132-135页。
- [74] 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
- [75] 道宣：《释迦方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4页。
- [76] 《共和县志》编纂委员会：《共和县志》，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0页。
- [77] 周庆措：《对青海省海南地区岩画的时代、族属及相关问题的思考》，《文博》2009年第4期，第17-20页。
- [78] 曹清景：《布哈河流域岩画考察》，《柴达木开发研究》2002年第2期，第70-71页。
- [79] 《共和县志》编纂委员会：《共和县志》，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50页。
- [80] 黄盛璋：《吐谷浑故都一伏俟城发现记》，《考古》1962年第8期。
- [81] 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19页。
- [82] 魏收：《魏书·卷一〇一·吐谷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40-2241页。
- [83] 任美镛、包浩生主编：《中国自然区域及开发整治》，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24-426页。
- [84] 吴景敖：《西陲史研究》，中华书局，民国三十七年，第6-7页。
- [85] 周伟洲：《吐谷浑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8-139页。
- [86] 其实，由伏俟城向西，经今乌兰、德令哈、小柴旦、大柴旦即可抵达敦煌抵达西域，不需要绕道都兰、巴隆。
- [87] 青海农业地理编写办公室：《青海农业地理》，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8页。
- [88] 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95-196页。
- [89] 许国兴：《郭里木吐蕃墓葬板画研究》，《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第56-64页。
- [90] 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8-277页。
- [91] 李并成：《盛唐时期河西走廊的区位特点与开发》，《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60-69页。
- [92] 谢骏义：《甘肃西部与中部旧石器考古的新发现与展望》，《人类学报》1991年第1期。
- [93] 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22页。
- [94] 李并成：《盛唐时期河西走廊的区位特点与开发》，《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60-69页。
- [95] 张玉廷等：《明史·卷三三〇·西域传（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550页。
- [96] 李并成：《“西桐”地望考—附论明安定卫城》，《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第45-50页。
- [97] 李并成：《盛唐时期河西走廊的区位特点与开发》，《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60-69页。
- [98] 青海农业地理编写办公室：《青海农业地理》，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3、78-79页。
- [99] 许国兴：《都兰吐蕃墓中镀金银器属粟特系统的推定》，《中国藏学》1994年第4期；《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
- [100] 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6页。
- [101] 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99-200页。
- [102] 周伟洲：《古青海道考》，《西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第66页；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4册第50-51幅。
- [103] 许新国：《茶卡吐谷浑国王陵浅谈》，《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第132-135页。

- [104] 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00~201页。
- [105] 刘宝山：《青海都兰县出土拜占庭金币》，《中国文物报》2002年7月24日版。
- [106] 青海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队：《青海都兰诺木洪塔里他哈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第17~43页。
- [107] 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06页。
- [108] 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90页。
- [109] 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07~208页。
- [110] 俞伟超：《古代“西戎”和“羌”、“胡”考古文化归属的探讨》，《先秦两汉考古学文化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80~192页。
- [111] 章巽：《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页。
- [112] 魏征等：《隋书·卷三·炀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3页。
- [113] 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26~237页。
- [114] 李宗俊：《唐代河西走廊南通吐蕃道考》，《敦煌研究》2007年第3期，第44~49页。
- [115] 王北辰：《古代居延道路》，《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编辑组编：《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57~80页。
- [116] 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37~244页。
- [117]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五载，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827页。
- [118]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六》圣历二载，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542页。
- [119] 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四二八·将率部料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 [120] 李并成：《晋国会城、缠缩城、清塞城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期，第173页、168页。
- [121]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85年，第515页。
- [122] 李并成：《盛唐时期河西走廊的区位特点与开发》，《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60~69页。
- [123] 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页。

康壽古道
血雨腥風

由渭河向西逾洮河、黄河，再沿湟水西行，绝大部分为海拔小于1700米的河谷地带，因气候温暖、土地肥沃、水源丰富，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是发达的农业区和人类东西往来的重要通道。考古与文献证明，至迟在战国至西汉初，由今甘肃东南部经青海连接西域的交通道路就已经存在。

由湟水上游向西南行，经今海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唐古拉山口至拉萨一段，自东北向西南依次为青东草原带（高原温带）、果洛那曲高寒灌丛草原带（高原亚寒带）和藏南山地灌丛草原带（高原温带）。^[1]至迟在先秦时期，生活在这里的游牧人在高原亚寒带的夏季牧场和高原温带的冬春季牧场之间季节性迁徙的过程中，就踏出了一条由河湟谷地西南经果洛、玉树、那曲至藏南的道路。

唐代，在唐蕃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将上述两条道路连接起来，开辟了一条从长安经今甘肃东南、青海至吐蕃首都逻些（今拉萨）的国际通道——唐蕃古道。唐蕃古道开通后，成为内地沟通青藏高原和我国汉藏兄弟民族友好往来，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的纽带。从公元634年松赞干布首次派遣使者入唐至公元864年吐蕃王朝崩溃的213年间，双方使者往来共191次，其中唐入蕃共66次，蕃入唐125次，形成“金玉锦绣，问遣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絶”的亲密关系。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下嫁吐蕃，贞观十七年（643）、贞观二十一年（647）、显庆二年（657）王玄策经吐蕃出使印度，僧侣玄太、玄照、道玄、道方、道生、道宣经吐蕃至印度取经，长庆元年（821）刘元鼎出使吐蕃都走此道。

关于唐蕃古道的走向，《释迦方志》《旧唐书·吐蕃传》《新唐书·地理志》《唐会要》《通典》和《太平寰宇记》等对其均有记载。早在1883年，布舍尔就开始对《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的唐蕃古道西段走向进行研究，以后的伯希和、足立喜六、松田寿男、吴景敖^[2]、王中、佐藤长、包寿南、范祥雍^[3]等都对其进行过探索。严耕望在《唐代交通图考·卷二·河陇碛西区》中对唐蕃古道东段和西段走向均做了翔实的文献考订。^[4]1984—1985年间，青海省文化厅唐蕃古道考古队历时6个月，行程20 000余公里，分别对唐蕃古道西段（西宁至拉萨）和东段（西安至西宁）路线与走向进行全面考察，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得出了较为中肯的

结论。^[6] 1986—1987年，吴均先生针对佐藤长《西藏历史地理研究·唐代青海至拉萨间驿道》一文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先后撰文就截支川至悉诺逻驿、西月河至食堂之间的驿路走向发表不同看法。^[6] 1994年，秦裕江和张海生对海南州境内唐蕃古道几个驿站和大非川地望再次进行辨析，提出很有价值的见解。^[7] 尽管学界对唐蕃古道路线和走向已经有大量的研究，但仍然有些问题尚待继续研究。

一、唐蕃古道东段走向的再考察

唐蕃古道划分为东西两段，东段由长安至鄯城（今西宁），西段从鄯城至逻些（今拉萨）。台湾学者严耕望在《唐代交通图考》中认为，古道从长安都亭驿出发出开远门，于中渭桥渡渭水（置临臯驿），西行经望贤宫、咸阳县（置陶化驿）、温泉驿、始平县（郭下置槐里驿）、马嵬驿、武功县、扶风县、龙尾驿、望苑驿、岐山县（至石猪驿）、横水（驿？）至岐州、凤翔府治所雍县。又西北循汧水河谷而上至陇州治所汧源县（治今千阳）。又西经安戎关、大震关（后称故关），又西50里至小陇山分水岭，至分水驿。下面，笔者在参考严耕望及唐蕃古道考古队成果的基础上，就大震关以西的唐蕃古道东段走向问题发表个人见解。

1. 大震关

大震关原称陇关，陇关之名最早见于《后汉书·西羌传》，后称大震关，隋唐时期被列为京城四面关中的六“上关”之一，成为东西交通及唐与吐蕃交往攻防的要隘。关于大震关的位置，学术界有清水县东陇山东坡说、通关河西陇山西支脉东坡说、陕西陇县西北固关说、陕西陇县西境陇山主脉说四种看法。唐蕃古道考古队调查认为大震关与陇县、张川交界处的鬼门关、熊家寺、老爷岭，特别是老爷岭有关系。笔者主张故关说，详见《丝绸之路甘肃东段交通线的形成、变迁与走向》一文。

2. 分水驿

关于分水岭的位置，有张川县马鹿说^[8]和老爷岭说两种看法^[9]。笔者认为分水岭即今小陇山道堡石梁。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小陇山一名陇坻，又名分水岭……陇上有水，东西分流，因号名为分水驿……东去大震关五十里”。^[10] 道堡石梁海拔2628米，为小陇山最高峰，梁上水东西分流于千河和牛头河，其南侧东南距离大震旧关约六十里，与《元和郡县图志》中分水驿在大震关西五十里小陇山上的记载基本符合，所以分水驿应该在道堡石梁南侧不远处。

3. 清水县

严耕望认为，唐清水县在今清水县西7.5公里，即今牛头山下红堡乡西城村古城。唐蕃古道考古队认为清水故城在今清水西北三里，但没有做实际调查。考古队所说“西北三里”可能指今清水西北三里的白土崖古城。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唐代清水县“西南至（秦）州一百二十五里”^[11]，与今清水县城至天水市的距离接近。仅就距离看，唐代清水县在今清水县城西北三里的说法是可信的，但是城内没有出土唐代文物。

4. 赤亭驿

由清水县顺牛头河西南行至社堂镇南渡渭河，折西沿渭河、藉河（渭河支流）南岸至秦州（治今天水市）。秦州为“南通巴樊，北控朝那”“东走宝凤，西入甘凉”的重要都会。盛唐时出陇右者大多取秦州道西行，如岑参赴安西、王维赴张掖、高适赴武威、杜甫至秦州。杜甫的《陇蜀纪行诗·秦州杂诗之九》就描写了秦州城驿馆的宏大壮丽：“今日明人眼，临池好亭驿。丛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稠叠多幽事，喧乎阅使星。”杜甫的《陇蜀纪行诗·赴同谷纪行之二》一诗中有“晨发赤谷亭，险艰方自兹”句。赤谷即藉河支流南河沟，因两岸山色发红得名，为南下川蜀的要道。赤谷亭因赤谷得名，在今天水城西南南河沟与藉河交汇处的天水郡

一带，为唐代由秦州西出河陇、南下巴蜀的重要关口。

5. 当亭县故城

严耕望又考证由秦州向西略循渭水而上，经伏羌（治今甘谷）、洛门川、陇西县（今陇西、武山两县间）、渭州治所襄武县（县在治今陇西东五里）、渭源县（置渭源镇）、高城岭、武阶驿、大来谷至临州、临洮军治所狄道（治今临洮）。

由秦州通往伏羌的路线到底如何走，严耕望先生并没有做实地调查，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向西略循渭水而上”；唐蕃古道考古队因循严先生的观点，也说“由秦州向西略循渭水而上，行约一百二十里至伏羌县城，在渭水南一里”。这里需要纠正的是，由秦州向西所循的并不是渭水，而是渭水的一条支流藉河。古道从赤亭驿站出发，溯藉河西行经四十里铺、藉口，后折西北继续溯行藉河行至关子镇。关子镇盆地就是《水经注》所说的当亭川，^[12]北魏太平真君八年（447）曾于此置当亭县。^[13]由当亭县向北翻越中梁山，沿沙石坡沟（当里溪水）^[14]南下至渭河南岸折西行，即可抵达伏羌故城。由天水市直接向北翻越中梁山至渭河南岸再折西行，亦可抵达伏羌故城，但必须穿越两道渭河峡谷，路途十分艰险；由秦州溯藉河河谷西行至当亭故城（在今关子镇）的道路平坦开阔，不需要穿越峡谷，只在当亭故城向北翻越起伏平缓的中梁山，即可抵达渭河南岸的伏羌故城，因此，由秦州西至伏羌，当亭县故城为必经之地。

6. 伏羌故城

伏羌原为冀县，唐武德三年（620）改伏羌县，^[15]其位置大约在今甘谷县城西五里铺乡杨赵村。^[16]融合了中国凤鸟和西亚金翅鸟特点的三彩凤首壶为其当丝绸之路大道的物证。除三彩凤首壶外，甘谷县内还有大象山石窟（甘谷县城东500米文旗山的悬崖上）、华盖寺石窟（甘谷县城西10公里的二十铺村）、朱围山栈道（甘谷县西15公里铺东）等与丝绸交通有关的遗迹、遗物。

7. 陇西县

古道离开甘谷西行经磐安、洛门至武山县城。唐蕃古道考察队认为今武山县城就是唐代陇西县所在地。据《元和郡县志》记载：“陇西县，上，西距（渭）州五十里，本汉豨道县也。”^[17]渭州治所襄武县在今陇西县城；一唐里约今540米，五十里唐里合今27公里。依里距，唐陇西县应该在今武山鸳鸯镇一带，《中国历史地图集》也将陇西县标在这里。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唐陇西县在伏羌西一百三十唐里。唐蕃古道调查队认为今武山县城在甘谷西一百三十里，因此，将唐陇西县确定在今武山县城内。调查队混淆了今里与唐里的差别，显误。

唐蕃古道考察队调查了由洛门西行至今陇西的两条路：一条是由洛门西行45公里至武山县城，然后在城西渡过渭河，溯马河北行，经何家沟、马家沟、草滩至何家门，随后沿永吉沟西下，经赵家门、乔家门、贾家门至三台，在三台附近渡过渭河至文峰镇，由文峰镇至渭州（治今陇西县城）；一条是出洛门沿渭河西行，经山丹至鸳鸯镇，又经桦林，再穿过牙儿峡经四十里铺、三十里铺到达文峰，与第一种走法路线汇合。考察队认为，以上两种走法都得翻山越岭，第二种走法更是山高峡深、道路崎岖，且水涨路阻，不能通车，只能走单骑，但里程稍短。考察队比较了两种走法，认为第一种走法应该为主要的、经常的通道。据《元和郡县志》记载，秦（治今天水市）渭（治今陇西）间距离为三百唐里，合今162公里。如按第二种走法，刚刚合适，而按第一种走法则要超过三百唐里，因此，与考察队的观点相反，笔者认为今鸳鸯镇（唐陇西县）应该为唐蕃大道必经之地，即第二种走法应该是常态。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由陇西县（治今鸳鸯镇）溯渭河支流漳河西行经三交驿（今三岔镇西南瘴虎桥一带）亦西北通临洮军。漳河流域木梯寺石窟、禅殿寺石窟、铁笼山石窟和佛字崖等遗迹证明，由陇西经漳县（治今漳县）、三交驿至临洮军（治今临洮）的道路，亦为重要的西行通道。

8. 襄武故城

由鸳鸯镇西北行五十余里至襄武故城。^[18]严耕望考证襄武故城在今陇西东南2.5公里。笔者考证在今陇西县城内，陇西重要的丝路文物有东罗马拜占廷帝国狄奥多西斯二世(408—450)王朝金币^[19]，证明在公元5世纪，今陇西为中西交通的必经之地。

9. 武街驿

由襄武故城西行偏北45公里至渭源，由渭源逾高城岭（渭河支流后河与洮河支流上峪河的分水岭）至上峪河流域，经武街故城至狄道（今临洮）。宣统时期的《续狄道州志》将武街故城的位置确定在临洮东四十里铺东峪沟北岸的田家坪和大坪之间。田家坪和大坪之间的古城未经过详细调查，情况不明，待考。或有人以为武街故城在临洮县窑店乡东十里黄家川，聊备一说。据史载，唐代设置的武街驿在武街谷中，武街谷在大来谷东二十里。^[20]严耕望先生亦认为武街驿在大来谷东二十里。庆平东南1.5公里有一古城遗址，可能为宋庆平堡。^[21]^[22]庆平堡西北离南峪沟（窑店西）12公里，刚好合二十唐里，所以，东峪沟支流南峪沟可能为大来谷，庆平以东的东峪沟可能为武街谷，庆平堡一带可能就是武街驿所在地。唐蕃古道考察队得出了与笔者相反的结论，认为庆平堡一带东峪河谷为大来谷，窑店之“武家”与“武街”发音接近，应为武街驿所在地。

10. 由狄道古城北出与西出的古道

由武街故城继续沿洮河支流上峪河西行至临洮。临洮古称狄道，建城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83年，^[23]为陇右地区交通枢纽之一。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用“襟带河湟，控御边裔，为西垂之襟要”来概括临洮古城的战略位置。^[24]严耕望继续考证，古道在狄道（治今临洮）分为南北两路：北路由临洮略循洮水河谷北下，经长城堡、沃干岭，折入阿干河谷至兰州治所五泉县（置金城镇、临河驿），北渡黄河出金城关至姑臧（治今武威）通西域，或渡河循湟水北岸行，经四望峡至鄯州（治今乐都）；南路由临洮军西渡洮水，经大夏县（约今宁定，在大夏川即今大夏河北岸）、东谷（大夏县西北五十五里）至河州治所枹罕县（治今临夏），再由河州北行经凤林县（约河州北三十五里的凤林山北）北渡黄河至鄯州。又由河州向西盐泉城（治今循化，在黄河左岸）北渡黄河鄯州（今乐都）、鄯城镇（今西宁）。

由临洮西出入青海的道路走向得到语言学研究成果的支持。研究表明，甘肃方言河州片包括甘肃的临夏县、临夏市、和政县、广河县、永靖县5个县，另外青海的同仁、循化、民和、乐都也属于本片区。^[25]河州片与由临洮西出渡黄河至青海的道路十分符合：由临洮西渡洮河后经广河、和政、临夏至永靖，渡黄河经青海民和至乐都，或至临夏后西北经临夏县、循化县渡黄河至乐都，或至临夏西经临夏县、双城、麻当、夏河县甘加、同仁县至共和渡黄河与唐蕃古道主干道汇合。河州片包括的各县都位于临洮西出渡黄河至青海的道路沿线。

11. 大夏县故城

唐蕃古道考察队考察认为，由临洮军西渡洮水有两条路可走：一路西北渡洮河沿广通河西行，经汉大夏县故城，越洮河、大夏河分水岭经东谷（大夏河支流牛津河）至河州；一路西渡洮水经虎关至广河与前道汇合。广通河即《水经注》所说的大夏川，据《新唐书·吐蕃传》《资治通鉴》和《全唐文》记载，大夏川为东西往来必经之地，并设有驿馆。长庆元年（821）刘元鼎出使吐蕃返回时，吐蕃元帅尚塔藏曾在在大夏川驿馆会见刘元鼎。1987年7月，陈守忠先生曾调查了广河县城西十里阿力麻土乡刘家庄古城。城址东西南北各500米，为一大方城，城东有寺沟河，顺着一米高的河岸踏勘，数百米间均有大量汉瓦遗存发现。刘家庄古城的距离与《元和郡县志》汉大夏县西北去河州七十里的记载符合。^[26]

12. 凤林关与炳灵寺

由大夏县故城西行经东谷（大夏河支流牛津河谷），约70唐里（约今73里）里至河州故城。严耕望又考证，由河州故城北行凤林县（河州北35里凤林山北麓），约百里至凤林关。

凤林关关址在炳灵寺黄河南岸的阎王砭一带，崖壁上刻有“凤林关”三个大字，旁有当年修关时凿的椿眼和石块垒砌的墙垣，今已淹没在刘家峡库区。至迟在西秦时，凤林关渡已开通。唐初设立关隘，与吐蕃交界，为唐开元七下关之一。凤林关曾有“金玉绮绣，问道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絶”的繁荣景象。从唐太宗贞观八年（634）至唐武宗会昌六年（846）100余年间，唐蕃通使达190余次，几乎每年都有使节往来。^[27]

炳灵寺石窟，亦名冰凌寺、龙兴寺、灵岩寺，位于永靖县西南35公里黄河北岸的小积石山中，毗邻刘家峡水库。石窟最早开凿于晋代或西秦，^[28]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元、明、清等朝代。今尚有183窟，大小石造像694躯，泥塑82身，壁画900余平方米。炳灵寺石窟以造像见长，石雕造像最高达28米，最小25厘米。西秦造像高鼻深目，颇具西域民族特色。唐代作品占三分之二，造型丰满潇洒，艺术造诣精湛。以藏传佛教密宗为内容的壁画随处可见，直到今天，炳灵寺仍然有信奉黄教的喇嘛主持。炳灵寺石窟处于古丝绸之路重要关道上和唐蕃古道的咽喉要冲，是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交汇融合点，对研究古丝绸之路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有着重要的价值。

13. 凤林关至龙支城的道路

由炳灵寺渡河后，西北去鄯州的最理想的路线是经永靖五台、川城进入青海，过马营、古鄯镇、民和至乐都（鄯州），这段路大部分沿山脊曲折前进。从今永靖县的杨塔（有古城名宋家城）北经川城、民和的古鄯至乐都有一条烽燧线，每隔5公里1烽墩，为汉代军事设施。唐蕃古道、宋代青唐道应该就是沿此道而行的。

14. 龙支城

《武经总要·前集一八下》云：“自（河）州北百里过凤（林）关，渡黄河百四十里至鄯州龙支县”。可见，龙支县地当河州经凤林关渡黄河去鄯州的大道上。又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刘元鼎出使吐蕃时曾“逾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至龙支城……过石堡城”。^[29]成纪在今甘肃秦安叶堡；武川即叶堡西北的郭嘉河；广武梁即今庄浪河入黄河处一带山岭，因广武县得名；石堡城即湟源县日月乡小茶什浪村的大、小方台城。由此看来，龙支城又当由兰州经湟水西行的大道上。今青海民和县有一条叫隆治沟的小河，隆治沟发源于拉脊山，东北汇入湟水。据《元和郡县志》记载，龙支“县北至鄯州一百三十五里……西南有龙支谷，因以名焉”。^[30]“龙支”与“隆治”音近，《元和郡县志》记载的龙支谷可能就是今隆治沟；又一百三十五唐里合今73公里，而隆治沟入湟水处西北据乐都（鄯州）75公里左右，两者里距接近，因此，龙支县可能在隆治沟入湟水处附近。

然吴景敖、严耕望皆论定龙支城在隆治沟上游古鄯镇；唐蕃古道考察队将历史文献与实地考察结合，认为龙支县故址应该在古鄯镇古城以北2公里柴沟（隆治沟支流）与隆治沟交汇处的条形岗地上。古城呈长方形，东西长约700米，南北宽120~150米，基宽10米以上，残高5米左右。一条东西大道笔直穿过古城中心。东西城门城墙内侧堆积大量卵石、石块，为礮石。在古城内外，除齐家文化、汉魏陶片外，隋唐陶片、残砖断瓦随处可见，还有磨盘与柱杵。1985年还出土了开元通宝30多公斤，内杂有少量西汉半两、五铢和莽钱。古鄯镇北古城无疑为唐代古城，但其距乐都（鄯州）85公里，与历史文献记载的距离（一百三十五唐里，合今73公里）有差距。唐蕃古道考察队为调和这一矛盾，认为唐代官道主干线并没有经过老鸦峡，而是走了沿山麓行进、需要多次越沟涉岭的较近的路，即由古鄯（北古城）经柴沟、东沟、西沟、塘尔垣、峡门至乐都。但据张维《陇右金石录》记载，老鸦峡石刻“在乐都县东，仅存。按此刻在道侧石壁，存字甚多，有‘从郭子仪者九人’七字明晰可辨。”又宣统《甘肃通志》亦记载：“老鸦峡古石刻在碾伯县东六十里峡内，有大石平面，下临湟水，上倚官道。石刻字甚多，为开元所镌，但细小模糊多不能辨。”可见，老鸦峡就在龙支县与鄯

州之间的大道上。《武经总要》记载河州至龙支县距离为二百四十里，而《通典》记载“河州西北至西平郡（即鄯州）临（龙）支县一百八十六里”，两者相差五十四唐里，合今29公里。今古鄯镇至隆治沟与湟水交汇处的距离约30公里。可见《通典》所记的龙支城应该为今古鄯镇北古城，而《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和《武经总要》所记的龙支城应该在隆治沟与湟水交汇处。

要之，由炳灵寺渡河后，西北去鄯城的路线是由五台经川城、马营、古鄯镇、隆治沟、民和、老鸦峡、乐都至西宁。

除上述主干道外，还有两条支线：一条经大震关（陕西固关）、成纪（甘肃叶堡）、武川（叶堡西北的郭嘉河谷）、兰州、广武梁、龙支城（在今民和隆治沟与湟水的汇合处）抵鄯州（治今乐都）的道路；^[31]另一条支线是至河州后，向西经海南藏族自治州，在共和县曲沟附近渡黄河至恰卜恰，与西段主干道汇合入藏。

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长庆元年（821）刘元鼎出使吐蕃时，“逾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故时城郭未坠，兰州地皆秔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道观。至龙支城，耆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过石堡城。”^[32]成纪在今天水秦安县叶堡镇。《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成纪，汉县，属天水郡。旧治小坑川。开元二十二年徙治敬亲川，成纪亦徙新城。”^[33]《新唐书·地理志》载，大中三年（849）从吐蕃手中收复秦州后，秦州州治上邽曾再度迁移于此。^[34]《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九·陇右上》秦州条云：“成纪县，中，东南至州一百里。”^[35]1986年，秦安叶堡乡杨家沟唐墓出土一块字砖，上有“口（秦）州成纪县安乐乡安乐里”字样。据史籍记载之道里和出土文物，开元二十二年（734）至大中三年（849）成纪在今秦安叶堡乡境内。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7—984），成纪仍在秦安叶堡。《太平寰宇记》云：“成纪县……瓦亭水（今葫芦河），源出县东南瓦亭山……显亲故城，汉为县，废城在东南。”^[36]因此，天宝之后吐蕃统治陇右期间某年成纪南迁至今天水城区的观点^[37]是不成立的。

关于武川在何处，有两种说法：鲜肖威认为武川在今通渭县城东、秦安县城西，武川为长川之误；^[38]刘雁翔认为武川为《水经注》中所说的“武城川”（今山丹川）或“武阳川”（今武山洛门镇至武山县城之间的川道）。^[39]鲜肖威所谓长川县，即开皇十八年（598）由安阳县所改之长川县，“后魏置安阳郡，领安阳、乌水二县。西魏改曰北秦州，后又改为交州，开皇三年废郡，十八年改州曰纪州，安阳曰长川。”^[40]据今人王仲箎的《北周地理志》考证，安阳在今秦安北，乌水在今秦安西北。^[41]开皇十八年由安阳所改的长川县之长川，即《水经注》所言之长离川，为葫芦河流经庄浪县阳川乡一段的河谷冲积平原，因东汉三国时期长离羌居住于此故名，其位置正好在秦安北。乌水为《水经注》所言之虾蟆溪水，即今郭嘉河（葫芦河的一条支流），其下游是一个南北长18公里、东西宽0.3~1公里的河谷盆地，盆地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为今秦安著名的瓜果产地。郭嘉河下游明清称为“阳兀川”，隋代乌水县应该设在这里。所谓武川即乌川之讹，非长川之讹。明清之阳兀川即唐代的“乌川”，“乌”与“兀”同音。1965年秦安县叶堡公社杨家沟（郭嘉河下游）出土180余件唐代三彩武士、文吏、牵驼、骑马、骆驼、马牛等俑，其中有许多头戴幞头或毡帽，足蹬长筒毡靴，高鼻深目而卷发，八字胡上翘的外国使者形象。^[42]这一发现有力地证明了郭嘉川在丝路交通上的重要位置。

广武梁在今庄浪河入黄河处（河口）附近。刘元鼎至广武梁后，是如何到达龙支县的呢？目前有两种不同看法。严耕望认为，刘元鼎逾广武梁后，必经赤岸桥（今大夏河至洮水口之间的黄河南岸）、出凤林关至龙支县。唐蕃古道考察队则认为由兰州西行取道黑嘴、红古、海石湾、接路口、窑街、冰沟、老鸦堡去乐都的道路全程三百九十七里，与《元和郡县志》记载的兰鄯之间四百里里程的记载极为相近，当为兰鄯之间常道，并认为刘元鼎渡过黄河以后，可能走下面两条路：一是由兰州至红古城，南渡湟水，由隆治沟西南行到达龙支城；一是由兰州至河咀一带渡湟

水，由南路到达龙支城。相比较之下，唐蕃古道考察队判断较为合理，但个别结论需要修正。如前所论，《元和郡县志》记载的龙支县并不在古鄯镇，老鸦峡亦为唐代官道必经之地，所以，刘元鼎没有必要从湟水沿岸枉道古鄯镇所在的旧龙支城，也并不需要绕道老鸦堡。

综上所述，唐蕃古道东段南线主干道以北，有一条逾大震关后，西经张川—陇城—叶堡—郭嘉—通渭—岷口—苑川河—西固—河口（广武梁）—隆治沟与湟水交汇处（即龙支新城所在地）—老鸦峡—乐都—西宁的支道。

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长庆元年（821）刘元鼎出使吐蕃返回，“虜元帅尚塔藏客馆大夏川……元鼎逾湟水，至龙泉谷，西北望杀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出蒙谷，至龙泉与河合。河之上流，繇洪济梁西南行两千里……河源东北直莫贺延碛尾殆五百里，碛广五十里，北至沙州，西南入吐谷浑寢狭，故号碛尾。隐侧其地，盖剑南之西，元鼎所经见，大略如此。”^[43]这里的莫贺延碛即海南藏族自治州境内黄河以南、茫拉沟以东、沙沟以西三角地带之间的沙丘与戈壁，而不是玉门关至伊州之间的莫贺延碛；沙沟即吐谷浑四大镇戍之一莫贺川，亦为吐谷浑沙州所在地。唐代中叶吐蕃占领此地后相继建立树墩城、大莫门城和洪济城，可能是青海共和县沙沟入黄河处对面即龙羊峡北出口黄河北岸的曲沟古城。洪济城因洪济梁得名。洪济城南有桥通黄河南岸，名洪济桥，唐败吐蕃后，在洪济桥侧的黄河南岸置金天军。刘元鼎返回时必然要过洪济桥至黄河南岸，才可能见到莫贺延碛。《旧唐书·吐蕃传》亦记载“是时元鼎往来，渡黄河上游，在洪济桥西南两千余里，其水极为浅狭。”^[44]刘元鼎返回时要到达洪济桥，必然至恰卜恰，后顺恰卜恰河谷南下至洪济城（今共和县曲沟古城）。渡河后要到达河州（今临夏），最可能的路线是经金天军（沙沟下游）、武宁军（约治今共和县沙沟乡东让村）、曜武军（约治今同仁县保安乡保安村）、振武军（约治今夏河县甘加乡政府东八角城）、麻当、双城至河州（治今临夏）。刘元鼎至河州后，又逾湟水至龙泉谷。从“湟水出蒙谷，至龙泉与河合”的记载看，龙泉谷指湟水与黄河交汇处附近的湟水河谷。唐蕃古道考察队认为龙泉谷在今兰州市张家寺以东的大沙沟一带。刘元鼎到底是如何由河州到达湟水南岸，又是在什么地方渡湟水至龙泉谷的呢？唐蕃古道考察队据《甘肃省新通志·舆地图》考证了一条由河州北出凤林关，经塔杨、小岭、康家沟、白家川渡湟水至龙泉谷的路线。刘元鼎在龙泉谷渡河后，必然经金城、武川、成纪、大震关原路返回，其返回的路线刚好给我们勾勒了另一条支道的走向：

即逾大震关后，西经今张川—陇城—叶堡—郭嘉—通渭—岷口—苑川河—西固（渡河）—河口（广武梁）—龙支新城（隆治沟与湟水交汇处）—龙支旧城（古鄯邑北二里）—凤林关（炳灵寺黄河南岸）—河州（治今临夏）—双城—麻当—振武军（约治今夏河县甘加乡政府东八角城）—曜武军（约治今同仁县保安乡保安村）—武宁军（约治今共和县沙沟乡东让村）—恰卜恰，与唐蕃古道西段主干道汇合。

二、唐蕃古道西段变迁及走向

从鄯城通吐蕃的“丝道”有两条：一条是道宣的《释迦方志》里记载的唐代初年经吐谷浑衙帐至吐蕃的道路；另一条是《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唐灭吐谷浑后经唐蕃分界岭赤岭（日月山）入吐蕃的道路。

道宣的《释迦方志》中记述了唐朝初年往印度有三道，“其东道者，从河州西北渡大河，上漫天岭，减四百里至鄯州。又减百里至鄯城镇，古州地也。至故承风戍，是隋互市地也……又西减二百里至青海……海西南至吐谷浑衙帐。又西南（东南）至国界名曰白兰羌，北界至积

鱼城，西北至多弥国。又西南至苏毗国，又西南至敢国，又西南至小羊同国。又西南至咀仓法关，吐蕃南界也。又东稍南度末上加三鼻关，东南入谷，经十三飞梯、十九栈道。又东南或西南，缘葛攀藤，野行四十余日，至北印度尼波罗国。”^[45]道宣为唐代僧人，《释迦方志》成书于公元650年，因此，《释迦方志》反映了唐代初年唐蕃古道走向。

严耕望认为漫天岭即小积石山余脉。笔者认为漫天岭不是小积石山，而是拉脊山。根据有两条：一是《释迦方志》记载河州至鄯州四百里，而《元和郡县志》记载河州“西北至鄯州三百里”^[46]，两者相差一百唐里；二是，凤林关在河州东北，不在西北。所以，漫天岭并不是凤林关至民和之间的小积石山余脉，当另有所指。由河州西北渡黄河有两个渡口，一个在今甘肃大河家镇，一个在青海循化县查汗都斯乡古什群峡黄河南。由大河家镇渡河至乐都的距离不足四百里，而由查汗都斯乡古什群峡黄河南渡河至鄯州（治今乐都）的里程为四百余里，与《释迦方志》中的记载符合。因此，唐代初年由河州（治今临夏）西北渡黄河至鄯州的具体路线是：由河州（今临夏）西南行，于今临夏县尹集乡折向西北，经枹罕古城（在今临夏县韩集镇双城村）、张尕古城（在今循化县白庄乡张尕村）、文都古城（在今循化县白庄乡北0.5公里）至古什群古城（在今循化县查都斯汗乡古什群峡黄河南）。古什群南古城即公元609年隋炀帝所经的临津关，唐代的镇西军和盐泉城。渡河后，再经雅毛古城（在今尖扎县马克塘镇雅毛村）、群科古城（在今化隆县群科乡，南距离黄河0.5公里）、拉脊山、乐都至西宁。所以，《释迦方志》所谓的漫天岭，应该是拉脊山，而非小积石山余脉。

承风戍在何处呢？严耕望认为，《释迦方志》所述由鄯城至承风岭的方向与牛心水（西西南之南川水）的方向一致，承风戍应该在黄河贵德峡南或湟中县西南的千户庄。如果承风戍在黄河贵德峡南，古道得两次渡河至黄河北岸，逻辑上是讲不通的；承风戍在今湟中县西南的千户庄倒具有合理性。千户庄位于拉脊山北麓，要抵达青海湖西岸，须向西翻越拉脊山西脉至日月山南侧，经倒淌河、青海湖南岸的黑马河，再折西南经茶卡至都兰，都兰即吐谷浑衙帐所在地（详后论述）。

接下来的道路如何走？多弥、苏毗、白兰到底在何处？据《唐会要·卷九十七》吐蕃条记载：“自中国出鄯城五百里至乌海（今冬给错纳湖），入吐蕃部落多弥、苏毗、白兰等国，至吐蕃界。”可见《唐会要》中所指的多弥、苏毗、白兰不在传统所认为的柴达木盆地，而在冬给错湖以南地区。又据《新唐书·苏毗传》记载，“苏毗本西羌族，为吐蕃所并，号孙波，在诸部最大。东与多弥接，西距鹈莽峡……多弥亦西羌族，属吐蕃，号难磨。频犁牛河，土多黄金。”^[47]其中，犁牛河即通天河，鹈莽峡在唐古拉山南索曲上游高山峡谷。综合《唐会要》与《新唐书·苏毗传》记载，可知多弥在今冬给错纳湖至通天河之间的地区；苏毗应该在通天河以南至唐古拉山南侧索曲上游一带。林梅村认为，苏毗原居住在今西藏昌都一带，为吐蕃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后随着吐蕃帝国的扩张不断东迁，一部分苏毗人迁入四川西北，建立“东女国”；另一部分苏毗人则在青海东部定居，与吐谷浑为邻，^[48]因此，唐朝节度使哥舒翰在天宝十四年（755）写给唐玄宗的信件中说：“苏毗一蕃，最近河（黄河上游），北吐泽（浑）部落，数倍居人。盖吐蕃举国强援，军粮马匹，半出其中。”^[49]传统认为白兰在今柴达木盆地布尔汗布达山一带，^[50]而胡小鹏先生认为在多弥、苏毗东南的四川阿坝草原一带，不当唐蕃古道大道。^[51]由冬给错纳湖以南的花石峡向西南经多弥、苏毗可至吐蕃；向东南沿阿尼玛卿山与喀拉山之间的高寒草甸草原可至白河、黑河和黄河环绕的白兰羌牧地—阿坝草原。可见，离开吐谷浑衙帐（治今都兰）后，古道走向应该继续向西南至香日德，后沿香日德河、冬给错纳湖南下至花石峡，由花石峡西南渡黄河、通天河逾唐古拉山至吐蕃。

公元670年吐蕃灭吐谷浑后，柴达木盆地东南的都兰失去了政治中心的作用，因此，经吐蕃入印度的通道不再绕道吐谷浑根据地清水川（青海循化东清水河流域）和柴达木盆地的伏罗

川至花石峡，而是经赤岭（今日月山）、大非川（今沙珠玉河）至花石峡，然后渡黄河、通天河，逾唐古拉山至逻些（治今拉萨），再由逻些西南至天竺（印度）。

《新唐书·地理志》以鄯城（今西宁）为中心，记载了唐代初期以后唐蕃古道的走向：“鄯城。中。仪凤三年置。有土楼山，有河源军，西六十里有临蕃城，又西六十里有白水军、绥戎城，又折西南六十里有定戎城。又南隔涧七里有天威军，军故石堡城，开元十七年置，初曰振武军，二十九年没吐蕃，天宝八年克之，更名。又西二十里至赤岭，其西吐蕃，有开元中分界碑。自振武经尉迟川、苦拔海、王孝杰米栅，九十里至莫离驿。又经公主佛堂、大非川二百八十里至那录驿，土浑界也。又经暖泉、烈谟海，四百四十里渡黄河，又四百七十里至众龙驿。又渡西月河，二百一十里至多弥国西界。又经牦牛河渡滕桥，百里至列驿。又经食堂、吐蕃村、截支桥，两石南北相当，又经截支川，四百四十里至婆驿。乃渡大月河罗桥，经滩池、鱼池，五百三十里至西诺罗驿……”^[52]

与《释迦方志》一样，《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述亦失于简略，且夹杂了许多陌生的汉藏地名，所以，仅仅凭借文字无法知道这条道路的具体走向。布舍尔、伯希和、足立喜六、松田寿男、吴景敖^[53]、佐藤长^[54]、王忠、包寿南、严耕望^[55]等对其走向都进行过有益探索，但因考古资料限制和未做实地考察，收效都不显著。1984年6月30日至11月2日，青海省文化厅唐蕃古道考察队从青海西宁出发，经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抵达果洛藏族自治州的杂多县，然后分两队，一队骑马西南翻越唐古拉山进入藏北；一队乘车入四川，经昌都至藏北那曲的聂荣县与马队汇合。继续南行至拉萨，经日喀则、聂拉木到达中尼边境的樟木口岸。最后，经青藏公路返回西宁。调查队行程15 000公里，历时126天，取得了丰硕成果。^[56]此后，吴均^[57]、秦裕江等^[58]针对古道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发表过不同见解。尽管唐蕃古道西段走向研究成果颇丰，但有争议的地方仍然不少，远远没有达到盖棺定论的程度。2008年，我们曾深入青海省考察了青海道的个别路段。笔者不揣浅陋，在近当代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主要运用考古资料，同时结合调查心得，对唐蕃古道西段走向问题发表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大方。

1. 临蕃城

关于临蕃城位置问题，史学界有很大争议，有湟源县东南药水与湟水汇合处东岸数公里处说、湟源附近说、镇海堡说、湟源西数十公里说和多巴镇说等观点。唐蕃古道考察队认为，西晋时期，临羌城迁至多巴镇，临蕃城由临蕃新城改名而成。在湟中县多巴镇原来有南、北两座古城，北城叫踏破城，出土了大量板瓦、筒瓦残件和绳纹条砖、铜灯和隋代五铢钱等，附近还有汉代墓葬群；南城出土的遗物不多。根据里程及出土文物，北城当为唐中叶临蕃城。

2. 白水军、绥戎城

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白水军，在（鄯）州西北二百三十里，开元五年郭知运置。管兵四千人，马五百匹。”^[59]按出土文物与里程，湟源县城关镇光华村东2公里的光华古城应当为白水军所在地。古城略呈梯形，北垣长150米、东垣长412米、南垣长413米、西垣长478米。城内出土了石磨盘、石础、砖块、陶片、开元钱币等。陶片中除卡约文化遗物外，其余皆为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遗物。^[60]

3. 定戎城

依里程与出土文物，定戎城可能为湟源县日月乡克素儿村北克素儿古城。古城呈梯形，南城墙长147.5米、北城墙长137米、东城墙长110米、西城墙长203米。城内地面散布大量唐代陶器残片和瓦片；城外采集到开元通宝一枚。陈小平亦持此观点。^[61]贾鸿键以为克素儿古城是历史上闻名的石堡城。^[62]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定戎城南七里即天威军、故石堡城。石堡城即湟源县日月乡小茶什浪村的大、小方台城的观点已被学术界公认。克素儿古城南距大、小方台城7里余，与《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定戎城与石堡城的距离和方位皆符合，所以，克素

儿古城应该是定戎城。

4. 石堡城和纥壁驿

关于石堡城位置，有恰卜恰说、哈拉库图城附近石堡山说、哈拉库图城东南古营盘说、哈拉库图城说、甘肃卓尼羊坝城说和大小方台城说等多种观点。依据里程与考古文物推断，石堡城应该为湟源县日月乡小茶什浪村的大、小方台城。^[63]考古工作者在大小方台发现唐代房址、铜钱、陶片和砖等遗物。另外，在大小方台城西发现北京台石城，可能为吐蕃所置的纥壁驿。严耕望认为哈拉库图城（湟源县日月乡莫多吉古城）为石堡城。哈拉库图城南距大小方台城、北京台石城约11公里，这与《新唐书·地理志》中“又南隔涧七里有天威军，军故石堡城”的记载不符合。

5. 赤岭

赤岭即今日月山，海拔3800多米，为黄土带与青藏高原的分界岭，一般认为因山色发红而得名。但2008年8月笔者至日月山考察时，发现日月山上水草丰美，牛羊遍野，山体外表并不泛红。从路边的剖面看，山体上层被一层厚30余厘米的黄土覆盖，黄土之下才是红土。1983年，青海文物普查队在日月山大牙豁的草丛中发现一唐碑，碑文因风雨经久侵蚀和破坏而剥落无存，但碑额、碑座为唐代形制，可能就是开元中唐蕃分界碑。

6. 尉迟川

吴景敖、周希武、佐藤长皆以为尉迟川即今倒淌河。唐蕃古道考察队认为尉迟川既是一条河的名字，又是一个地域的概念，是对日月山西南、青海湖南山东北、青海湖东南之倒淌河地区的统称。笔者认为尉迟川即今倒淌河流经河谷平原。倒淌河乡境内有9座古城，分别是黑城子、白城子（察汗城）、白城城堡、将军城、湖东种养殖场古城、破城子（那亥烈古城）、哈拉八仙古堡、群科加拉古城堡、群科加拉城。察汗城位于倒淌河乡黄科村，又叫白城子，城东西420米，南北385米，城西北角100米处有建于1832年的海神庙一座，内有雍正九年立残碑一块，其他建筑物荡然无存。^[64]严耕望先生以为察汗城即吐谷浑故都之一树墩城。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廓州（治所在化隆群科古城）“西至吐蕃树墩城三百二十里。”^[65]树墩城应该在化隆西三百二十里唐里的黄河岸边，可能为今共和县曲沟古城，现在已经淹没在龙羊峡水库中。察汗城为树墩城的说法值得商榷。

7. 苦拔海

关于苦拔海的位置，严耕望认为即今巴彥淖尔。笔者认为苦拔海即尕海，尕，“苦拔”与“尕”音相近。巴彥淖尔蒙古语为哺育的湖，位于共和县东巴镇尕海滩中心。周希武在《宁海纪行》中描述其“东西长约六里，南北阔二里余”，今天已经萎缩至1.35平方千米。尕海海拔3177米，水源由大气降水和沼泽补给，今为季节性湖泊。唐蕃古道考察队亦认为苦拔海即今尕海。

8. 王孝杰米栅

王孝杰米栅在何处？严耕望先生没有考证其准确位置；唐蕃古道考察队认为“在东巴村或东巴村东北的台地上，因为以这样的地方作为后勤辎重营地，既便于居高瞭望，又能守备防卫”；^[66]陈良伟认为今天东巴乡境内有六座古城，即东巴古城、兰卡索古城、索尔加古城、加拉古城、加拉村北古城、下梅古城，其中一座与王孝杰米栅有关。^[67]

9. 莫离驿

关于莫离驿的位置，谭其骧、严耕望都认为在恰卜恰乡镇；陈良伟以为恰卜恰乡上塔买村两古城之一为莫离驿；唐蕃古道考察队根据《新唐书·地理志》“自振武经尉迟川、苦拔海、王孝杰米栅，九十里至莫离驿”的记载，认为莫离驿在尕海以西共和县东巴乡乙浪堂。在乙浪堂一个岗形台地上，曾发现一古城，出土过宋代及宋代以前的钱币和陶片，可能为莫离驿所在地。2008年8月6日，笔者至东巴镇考察。东巴镇位于一片开阔肥美的草原上，草原被土墙或低

矮的土埂分割为一块块牧场，见不到农田的任何踪迹。秦裕江和张海生等认为，从振武至黄河沿现代里距为420公里，合唐里九百里，而《新唐书·地理志》所记载的此段里程为八百一十唐里，加上一百里，才与现代实际里程基本符合，所以，《新唐书·地理志》振武军至莫离驿“九十里”可能为“百九十里”之误记。据此，将莫离驿确定在今达连海附近；那禄驿确定在大河坝以西40公里水塔拉河西侧；将大非川确定在大河坝西南约40公里的鄂拉山口水塔拉河至根清河流域一带。一唐里约等于今540米，八百一十唐里合今421.2公里，与现代振武至黄河沿420公里（840里）非常接近。“九十里”可能为“百九十里”的误记是不存在的。秦裕江和张海生两位先生认识到今里与唐里的差别是对的，但认为今里大于唐里是一个错误。因此，仅仅从里距考虑，唐蕃古道考察队的观点是值得肯定的。

10. 公主佛堂

关于公主佛堂的位置，松田寿男及我国的一些学者认为在青海湖西北布哈河流域；吴景敖认为在沙珠玉；佐藤长认为在恰卜恰；唐蕃古道考察队进一步考证认为在恰卜恰加拉古城一带；秦裕江和张海生认为在大河坝。2008年8月6日我们乘车离开东巴镇，又走了一段山路后进入恰卜恰河谷。汽车下山时，路边零星出现一些农田，田中油菜花开得正旺，小麦还泛着青绿。进入共和盆地恰卜恰河谷，油菜花已落，麦田泛着金黄，完全是一片农业景象。恰卜恰河谷呈西北—东南走向，长约44公里，宽1~6公里，海拔2500~2870米，河谷两岸有宽阔的二级阶地和三级阶地。恰卜恰年均温3.4℃，平均最高温11.6℃，平均最低温-3.3℃，全年日照时数2944小时。气候和地貌都适宜于农业生产。公主佛堂位于莫离驿和大非川之间，而恰卜恰是今东巴镇（莫离驿）至沙珠玉河（大非川）之间自然条件最为优越的地方，公主佛堂设在这里应该是在情理之中的。

11. 大非川

关于大非川的位置，有青海湖西说和青海湖南说两类。青海湖以西说以民国时期的张穆为代表，他在《梦游录》中认为大非川在青海湖西布哈河流域。唐蕃古道考察队从位置与里距角度令人信服地否定了青海湖以西说，肯定了湖南说。青海湖以南说有以下几种观点：吴景敖、范文澜、陈小平认为大非川指切吉草原；佐藤长和严耕望先生认为大非川即今沙珠玉河；秦裕江和张海生认为大非川在大河坝西南约40公里的鄂拉山口水塔拉河至根清河流域一带。如前所论，秦裕江和张海生是在颠倒了今里与唐里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推定莫离驿、公主佛堂和大非川位置的，因此，大非川在水塔拉河至根清河流域一带的观点是不可信的。据《西宁府志·卷二十一》记载“自哈什哈水（倒淌河）起五十里至白彦脑儿（今尕海或尕海滩），又五十里至恰卜恰（今恰卜恰附近），又四十里至西泥脑尔（今达连海），又六十里至公脑儿（今更朵海），又六十里至牛哥兔。”由恰卜恰向西经达连海、沙珠河西行的道路虽然迂回，但有湖泊与河流提供水源，沿途水草丰美，应该与唐蕃古道的走法一致。而由恰卜恰向西南经河卡至大河坝的道路虽然比较近，但沿途要经过自然条件恶劣的沙丘草地（直到解放后才凿开河卡山口通车），唐蕃古道通过这里的可能性不大。历史文献中的“川”一般指河或河谷平原，因此，大非川指沙珠玉河或沙珠玉河流经的河谷平原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12. 那录驿

关于那录驿的位置，严耕望、陈小平等认为在兴海县大河坝附近；陈良伟认为那录驿即冬支加拉古城（在今兴海县河卡乡宁曲村）；秦裕江和张海生认为，“那录”系藏语为“沼泽沟”之意，那录驿即沼泽沟驿站，今水塔拉河中上游地区至今尚有七八片大小不一的沼泽，近年考古界在水塔拉河西侧，青康公路以东发现一座古城堡，城垣残长115米，宽77米，可能为那录驿遗址。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从那录驿至黄河沿四百四十唐里，合今237.6公里；从今大河坝至黄河沿约240公里，与237.6公里极其接近，所以那录驿在兴海县大河坝附近的观点

不会离实际太远。冬支加拉古城位于兴海县河卡乡宁曲村原塘格木农场三大队九中队，城址呈长方形，东西长510米、南北宽250米。城垣用素土夯筑，基础宽5米、残高0.8米，城址四面各有一门。城内出土泥质灰陶器残件、素面布纹板瓦和筒瓦残件。城内没有发现大型建筑。陈良伟认为冬支加拉古城东南通贵德、西北通茶卡、东北至西宁、西南往花石峡，位于丝绸之路河南道河源支道与唐蕃古道的交汇处，为文献中提到的曼头城与那录驿。^[68]由沙珠玉河流域南入宁曲沟，经冬支加拉古城至大河坝的路程要比由切吉沟至大河坝的路程为短。虽不能肯定冬支加拉古城为那录驿，但可以肯定其必当唐蕃古道大道，它的发现对确定唐蕃古道的走向具有重大意义。

13. 暖泉

即今温泉，已被学术界公认。

14. 烈谟海

左藤长认为“烈谟”即草药。《西宁府志》记载清代入藏官道所经的苦海有“草药”。唐蕃古道考察队认为苦海西南5公里有醉马滩，滩生醉马草，马行皆醉，因此，烈谟海即苦海。民国二十六年，马鹤天护送班禅由西宁赴玉树，在其游记中记述由大河坝南行入山谷，过永隆滩，逾扎索拉山至醉马滩，行五十里至绵羊湾，又行五十里至海耳朵，入山峡，出山口至黄河沿玛多。^[69]可见，《西宁府志》所说的苦海即绵羊湾东北五十里的豆错，也即《新唐书·地理志》所记载的烈谟海。

15. 众龙驿

唐蕃古道经那录驿（今大河坝附近）、暖泉（今温泉）、烈谟海（豆错）至玛多渡黄河后至众龙驿。关于众龙驿的位置，学术界亦有不同的看法：吴景敖先生认为众龙驿在今巴颜喀拉山札木隆山口；日本学者佐藤长根据众龙驿与崇龙峒发音上的相似性，认为称多县清水河乡崇龙峒就是众龙驿所在地，国内学者陈小平也认同佐藤长的观点；吴均认为，“众龙驿为藏语Hbron lung的音译，意为野牛沟，今天仍然叫野牛沟；它是一条长沟，今宁玉公路在此有站，以其位于巴颜喀拉山之北麓，扼交通要冲，水草皆方便。吐蕃于此设驿，颇合地方形势。崇龙藏语语意为湖谷滩（mtsho lung thang），它确是一个大滩，而不是一条沟”^[70]。从黄河沿玛多至众龙驿相距四百七十唐里，合今约236公里。而野牛沟至黄河沿玛多的路程只有60余公里，从语言学角度看，吴均先生观点似乎有道理，但与史书记载的里程相差甚远。清水河乡崇龙峒的里数与记载的里程相近，因此，众龙驿在今称多县清水河乡崇龙峒的观点应该是正确的。

16. 西月河

日本学者佐藤长认为西月河是藏语sa dkar的音译，即色航曲；吴均先生认为西月河为意译，月河即藏语rdza chu，音译作杂曲，为了有别于大月河之杂曲，也翻译为“扎曲”或者“咱曲”。rdza chu也写作Zla chu，Zla是藏语方言，为月的意思。因其源头的水泉形如圆月又澄清如镜，故称月河；又因雅砻江上源扎曲在众龙驿之西，故称西月河。唐人为了与流量较大的杂曲相区别，故将澜沧江上源杂曲称为大月河。吴先生所言甚是。

17. 牦牛河滕桥

牦牛河即通天河。通天河上的渡口主要有六处：曲麻莱县的七渡口，刚察渡口（由曲麻莱县巴干乡的岗当渡至治多县立新乡的刚察），尕朵渡口（由称多县尕朵乡的着木其或吾云达渡至玉树县安冲乡的叶吉），赛河渡口（由称多县赛河乡的芒查渡至玉树县的安冲乡），仲达渡口（由称多县拉布乡渡至玉树县仲达乡）和直门达渡口（今通天河大桥一带）。佐藤长认为唐蕃古道在今刚察渡口渡通天河；陈小平认为，以上六个渡口只有尕朵渡口符合条件，理由有二：一是由清水河至尕朵渡口，再由尕朵渡口经安冲、哈秀、结隆至子

曲的给沙扁地是一条宽畅、平缓、条件适宜、海拔均在3500米左右的大道，长期以来为内地与西藏来往的人们所行走，被誉为“入藏大道”的一部分；二是由清水河至通天河尔多渡口的里数与古道记载中众龙驿至牦牛河间的里数一致。笔者认同陈小平先生的观点。

18. 列驿

日本学者佐藤长认为，治多县立新乡代乃曲河口附近由南向北注入木努乌苏的小河，其上游有滕桥，在滕桥过木努乌苏河，小河上游的根据地Nomd camp可视为列驿；吴均提出三条否定佐藤长观点的理由：第一，代乃曲河位于截支桥之西，要想连接，必须转过头来向东行走，势必要走弯路；第二，代乃曲河口与佐藤长称为列驿的若里果拉距离相距甚远，不是一个地方，而且若里果拉藏语写作Hlad Yu，列驿之利藏语写作Klad Yu，两个地方的读音不一，字母拼写不同，不是同一个地名；第三，沿色行寺西北绕葛觉阿雪山系，进入代乃曲，再由代乃曲河口渡木鲁乌苏虽是一条道路，但不是主要通道。吴均先生还认为，从色行寺起，唐蕃古道应该沿协曲南下渡通天河至今玉树县安冲地区。安冲地区今天仍叫列玉，即《新唐书·地理志》所记“又经牦牛河渡滕桥，百里至列驿”之列驿；陈小平观点与吴均基本相似，认为列驿在玉树县结隆乡。但相比之下，吴均先生的观点似乎更合理些。

19. 食堂和吐蕃村

日本学者佐藤长认为食堂在治多县；吴均先生认为哈秀、结综至拉秀的达云滩一带水草条件良好，帐落众多，从《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吐蕃村”看，是一处民户集中，具有设立驿传条件的地方，据此推测食堂在达木云年吉措北日塘（ri fnang）一带；陈小平认为食堂和吐蕃村在年吉措。

20. 截支桥和截支川

日本学者佐藤长认为截支桥在截支川上，即今子曲子野云松多一带。陈小平认为在子曲河中上游的子曲桥东约10公里的枪查弄（弄即曲）入子曲处的给沙扁地，发现了古道记载中所说的“两石南北相当”的两石。“此地水缓，河床较狭，子曲呈由西向东走向，子曲南北两岸皆为约1公里之草滩地。两石分立于子曲的南北两岸，间约1公里。石约长20米，高15米，宽8~10米，皆在滩中。奇异的是，在整个子曲南北两岸的草滩上惟两大石独立，距山较远。凡经此者都能就此二石留下深刻印象”，因此，认定唐代的截支川即今子曲，“截支桥”即唐代架在今子曲给沙扁地的桥。吴均认为，截支桥和截支川是两个地名，截支桥在今杂多县子曲河食宿站；截支川在截支桥以西，与自南向北流入杂曲河的塞青水、赛穹水、结鲁水、沙尔水流域有关，与子曲河流域无关。从《新唐书·地理志》“又经食堂、吐蕃村、截支桥，两石南北相当，又经截支川”的记载看，截支桥与截支川的确有先后关系，将截支桥确定在截支川上确有值得商榷之处，但笔者认为唐蕃古道首先在截支桥（给沙扁地）渡过弄即曲后，沿子曲河北岸西行10公里，再渡子曲，经今一道班、二道班至结杂。第一次过截支桥时所渡的水指给沙扁地子曲支流，第二次所经截支川指子曲干流。所以截支桥和截支川是有联系的，截支川即子曲的观点是成立的。

21. 婆驿

佐藤长认为，婆驿出自罗桥，即藤桥（sba zam）之sba，这正是《达斯》《霍尔德奇》上的Da si gom pa，即扎西寺；唐蕃古道考察队认为，婆驿在杂多县子曲河子野云松多一带，大月河与扎曲无关，大月河即扎阿曲；吴均认为大月河即扎曲，婆驿在今杂多县泗欠惹瓜一带。从子曲河食宿站至查午拉山口有两条路可走：北路是沿子曲河西北行，在子野云松多渡过子曲西行至然达，沿扎曲、扎那曲（扎曲上游）、加力曲（当曲支流）至当曲，后转西南沿查午曲（当曲支流）至查午拉山口；南路由子曲河食宿站西行至杂多渡扎曲河，经杂热坎多至查午曲与当曲汇合处，再折西南顺查午曲至查午拉山口。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从列驿经

截支桥、截支川至婆驿的路程是四百四十里唐里，至婆驿后“渡大月河罗桥，经滩池、鱼池，五百三十里至西诺罗驿”。四百四十里唐里合今237公里，与从玉树着木其（列驿）渡通天河至杂多县城附近渡扎曲的距离相近，而子曲河上游子野云松多一带渡河的距离不足237公里，在扎阿曲渡河的距离却远远超过了237公里。因此吴均先生关于大月河即杂曲，婆驿在泗欠惹瓜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

22. 滩池和鱼池

唐蕃古道在婆驿（泗欠惹瓜）附近渡大月河（澜沧江上游扎曲）后至西诺罗驿之前，经过滩池和鱼池两个地方。佐藤长将《新輿图》上的冬卜勒以南的扎生吉尔湖定为滩池和鱼池；吴均认为佐藤长的结论是不顾事实和难以想象的，“自婆驿渡大月河后，沿大月河南岸经结乃通滩，南入瓦里昂谷，逾瓦里昂山口至今格那寺地，然后由此西经郭仁达、可袞云、阿那且马、热马龙秋、阿苟么茂日山麓至沙当松多（若去沙买拉山，由此南行），这条驿道的这一段路程中湖泊星罗棋布，如在阿苟么茂日山及沙东水一带都有一些直径四五十米的湖泊，为措云玛、车东措等，唐时所称之潭池、鱼池当属于这一带之某两个湖泊，而完全可以肯定不是那遥远的西北。”^[71]吴先生所言极是。

23. 西诺罗驿

佐藤长认为西诺罗驿是过则噶尔山山岭名；陈小平认为西诺罗驿在当曲以北加力曲一带；吴均认为悉诺罗系苏毗王子，西诺罗驿属于用人名命名的地名，其位置在查吾拉山口以东唐古拉山北侧的卧曲流域；藏史记载苏毗如之地在藏北与青海毗连之处，以嘉·雪巴达策为中心，北至纳肖。纳肖位于唐古拉山北麓卧曲流域，纳肖为苏毗如小千户所之名，其牧地地跨唐古拉山南北两侧，王室夏季牧场就在卧曲流域。^[72]笔者认为，嘉·雪巴达策与今查午拉区和白雄区之间的阿西巴日策音相近，阿西巴日策可能就是苏毗如的活动中心嘉·雪巴达策。《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从婆驿（杂多县泗欠惹瓜）至西诺罗驿之间的距离为五百三十唐里，合今286.2公里。从杂多县泗欠惹瓜渡扎曲河，经杂热坎多至查午曲与当曲汇合处，折西南顺查午曲逾查午拉山口至阿西巴日策，其间的距离为285公里，与婆驿至西诺罗驿的距离接近。综合历史文献、地名和里距，笔者认为西诺罗驿位于西藏查午拉区至白雄区之间的阿西巴日策附近。

综上所述，唐蕃古道西段走向和路线为：鄯城（西宁）—临蕃城（多巴镇北古城）—白水军城（湟源县光华古城）—定戎城（湟源县日月乡克素儿古城）—石堡城（湟源县日月乡小茶什浪村大、小方台城）—赤岭（日月山）—尉迟川（倒淌河）—苦拔海（尕海滩）—王孝杰米栅（东巴村）—莫离驿（东巴镇西）—公主佛堂（恰卜恰）—大非川（沙珠玉河流域）—那禄驿（大河坝附近）—暖泉（温泉）—烈漠海（豆错）—黄河沿（玛多）—众龙驿（称多县清水河乡崇龙峒）—西月河（雅鲁藏布江上游扎曲）—牦牛河藤桥（通天河杂多渡口）—列驿（玉树安冲乡）—食堂和吐蕃（达云滩）—截支桥（子曲给沙扁地）—截支川（子曲）—婆驿（杂多县泗欠惹瓜）—滩池和鱼池（阿苟么茂日山至沙东水一带）—西诺罗驿（西藏查午拉区至白雄区之间的阿西巴日策）。后经鹤莽驿、野马驿、閤川驿、蛤不烂驿、突录济驿、农歌驿至逻些（拉萨）。^[73]由拉萨西南行经日喀则、江孜至吉隆入尼泊尔、印度。1990年，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在靠近尼泊尔边境的一个山口发现摩崖碑刻《大唐天竺使出铭》。此碑系显庆三年（658）所刻，碑文记载了使节王玄策率领随从刘嘉宾、贺守一等人历经艰难险阻，出使天竺，经小羊童（同）等，路过吉隆，于此勒石记功的情形，为补正吐蕃—尼婆罗道南段走向、出山口位置、王玄策使团的组成提供了重要材料。^[74]

另外，吐蕃时期还设沙洲驿道，直接控制瓜、沙及其他河西地区。该道起自逻些，经过藏北草原黑河逾当拉山，渡沱沱河、楚玛尔河，逾昆仑山口而抵达柴达木盆地的格尔木地区，越柴达木盆地西部的盐泽和戈壁，逾当金山口到达敦煌。^[75]

注释

- [1] 黄秉维、郑度、赵名茶等：《现代自然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55~256页。
- [2] 吴景放：《西陲史研究》，中华书局，民国三十七年版。
- [3] 范祥雍：《唐代中印交通吐蕃驿道考》，《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4辑。
- [4]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85年。
- [5] 卢耀光主编：《唐蕃古道考察记》，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89年；陈小平：《唐蕃古道》，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年。
- [6] 吴均：《论西月河、列驿与食堂之驿路——对日本佐腾长所著〈西藏历史地理研究〉一书中几个问题的商榷之三》，《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第124~129页；《自截支桥以南至西诺罗驿唐蕃古道的走向——对佐腾长〈西藏历史地理研究〉中一些问题的商榷之五》，《中国藏学》1988年第2期，第116~122页。
- [7] 秦裕江、张海生：《海南州境内唐蕃古道几个驿站和大非川在何地辨析》，《青海民族研究》1994年第4期，第57~63页。
- [8]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85年，第364页。
- [9] 张国藩、赵建平：《丝绸之路陇坂古道考察散记》，《丝绸之路》2001年第1期，第107~111页。
- [10]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九《陇右道上·秦州》，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82页。
- [11]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九·陇右道上·秦州》，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82页。
- [12] 酈道元著，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卷十七·渭水注》，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490页。
- [13] 魏收：《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610页。
- [14] 酈道元著，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卷十七·渭水注》，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480页。
- [15]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九·陇右道上·秦州》，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81页。
- [16] 范三畏：《“甘谷”县名的深层文化意蕴——兼考旧县址之位置》，《西北史地》1995年第1期，第13~17页。
- [17]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九·陇右道上·秦州》，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84页。
- [18]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九·陇右道上·秦州》记载：“襄武县，本汉县也，属陇西部。隋开皇三年罢郡，县属渭州，大业三年复属陇西部。武德元年改属渭州。”
- [19] 牟世雄：《陇西发现东罗马拜占廷金币》，《甘肃金融》1999年第9期，第52页。
- [20] 刘昫：《旧唐书·卷九十三·薛讷传》和《王峻传》、卷196《吐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 [21] 脱脱：《宋史·卷八十七·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162页。
- [22]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六十·巩昌府》，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419页。
- [23] 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69~2908页。
- [24]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六十·临洮府》，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419页。
- [25] 雒鹏：《甘肃汉语方言现状与分区》，《甘肃高师学报》2007年第4期，第1~4页。
- [26] 陈守忠：《河陇史地考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3页。
- [27] (唐)魏季随撰：《灵岩寺记》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
- [28] 《法苑珠林》云：“有石门滨于河上，镌文曰：晋泰始年之所立也。”晋泰始年是公元165年。如果按这一说法，炳灵寺石窟在晋代时就已开凿。又根据第169窟“西秦建弘元年”(公元402年)的造像题铭，炳灵寺最迟开凿于西秦。
- [29]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02页。
- [30]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九·陇右道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93页。
- [31]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85年。
- [32]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02页。
- [33]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631页。

- [34]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40页。
- [35] 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九·陇右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31页。
- [36]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五〇·陇右道一》，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900页。
- [37] 刘雁翔：《成纪县治迁移讨论》，《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3期，第129至144页。
- [38] 鲜肖威：《甘肃境内的丝绸之路》，《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第14~21页。
- [39] 刘雁翔：《成纪县治迁移讨论》，《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3期，第129至144页。
- [40] 魏征等撰：《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14页。
- [41] 王仲桢：《北周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48页。
- [42] 汪保全、李虎生著：《瑰宝遗珍——天水馆藏文物精粹》，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2~105页。
- [43]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03~6104页。
- [44]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65页。
- [45] 道宣：《释迦方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4~15页。
- [46] 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九·陇右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89页。
- [47]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苏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57页。
- [48] 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1页。
- [49] 《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
- [50] 松田寿男著、周伟洲译：《吐谷浑遣使考》，《西北史地》1981年第1~2期。
- [51] 胡小鹏：《白兰考辨》，胡小鹏著：《西北民族文献与历史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1~78页。
- [52]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41~1042页。
- [53] 吴景敖：《西陲史研究》，中华书局，民国三十七年版。
- [54] 佐藤长著、梁今知译：《唐代青海拉萨间的道路》，《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
- [55]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85年。
- [56] 唐蕃古道考察队：《唐蕃古道考察记》，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89年；陈小平：《唐蕃古道》，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年。
- [57] 吴均：《论西月河、列驿与食堂之驿路——对日本佐腾长所著〈西藏历史地理研究〉一书中几个问题的商榷之三》，《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第124~129页；吴均：《自截支桥以南至西诺罗驿唐蕃古道的走向——对佐腾长〈西藏历史地理研究〉中一些问题的商榷之五》，《中国藏学》1988年第2期，第116~122页。
- [58] 秦裕江、张海生：《海南州境内唐蕃古道几个驿站和大非川在何地辨析》，《青海民族研究》1994年第4期，第57~63页。
- [59]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九·陇右道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91页。
- [60] 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79~183页。
- [61] 陈小平：《“唐蕃古道”的走向与路线》，《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第70至76页。
- [62] 唐蕃古道考察队：《唐蕃古道考察记》，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89年，第104~107页。
- [63] 唐蕃古道考察队：《唐蕃古道考察记》，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89年，第108~117页。
- [64] 共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共和县志》，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48页。
- [65]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九·陇右道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93页。
- [66] 唐蕃古道考察队：《唐蕃古道考察记》，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89年，第125页。
- [67] 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57页。
- [68] 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27~128页。
- [69] 马鹤天：《甘青藏考察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6~254页。
- [70] 吴均：《论西月河、列驿与食堂之驿路——对日本佐腾长所著〈西藏历史地理研究〉一书中几个问题的商榷之三》，《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第124~129页。

- [71] 吴均：《自截支桥以南至西诺罗驿唐蕃古道的走向——对佐腾长〈西藏历史地理研究〉中一些问题的商榷之五》，《中国藏学》1988年第2期，第116~122页。
- [72] 吴均：《自截支桥以南至西诺罗驿唐蕃古道的走向——对佐腾长〈西藏历史地理研究〉中一些问题的商榷之五》，《中国藏学》1988年第2期，第116~122页。
- [73] 西藏境内唐蕃古道争议仍很大，且不属于本文研究范围，故从略。
- [74]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吉隆发现显庆三年大唐天竺使出铭》，《考古》1994年第3期。
- [75] 崔永红、张德祖、社常顺主编：《青海通史》，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0页。

汉代河西走廊
交通道路考察

河西走廊，位居东亚与中亚的结合部，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东中部腹地通往西北边地乃至西方各国的天然走廊和必经孔道。从世界历史上来看，河西为古老的华夏文明与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地中海文明等的汇流之区；从中国历史上看，河西走廊又是我国率先对外开放的地区，堪称为我国走向世界的第一条通道。

河西走廊依赖其南部祁连山脉发源的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河流水系的滋润，哺育了连绵的片片绿洲，其自然和通行条件较之其北部的荒漠、南部的青藏高原无疑优越得多。河西北部伸入沙漠中的石羊河、黑河下游绿洲，自古又是通往宁夏、河套以至蒙古高原腹地的天然要径，南部穿越祁连山脉诸山口又可通往青藏高原腹地。因此河西自古以来就成为丝绸之路国际交通大动脉上最重要的路段之一。

考古发掘证明，早在距今约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仰韶文化时期，河西走廊就已经发挥着东西方通道的重要作用。众所周知，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是中国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中原文化在它诞生以后呈现出向四周扩展的趋势，在我国西部地区则表现为由东向西的传播方向。例如发现于甘肃东部、青海东部、河西等地的马家窑文化，即是仰韶文化向西传播的遗存，其陶器群与中原仰韶晚期的陶器组合基本相同，又可称之为甘肃仰韶文化。彩陶文化又由河西西传新疆及其以远、和田、皮山、库车、新和、拜城、且末、哈密、吐鲁番、伊犁河流域等地，均出土彩陶器以及多量的泥质夹砂红陶器，其形制特征、制作方法、图案风格等方面都很明显地受到甘肃东部沙井文化的影响。^[1]与之同时，新疆和田一带的玉石也通过河西走廊而大量输往中原，如197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756件随葬玉器，其玉料大部分就是和田玉。^[2]河西走廊西端的玉门关即因其地为西域美玉输入内地的门户而得名。可见东西文明的交流早已选择河西走廊作为重要通道。

将河西走廊作为通往西方国家交通干道的正式开辟及其沿线邮驿系统的设立，始于汉武帝时张骞“凿空”、河西归汉之后。公元前138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征讨匈奴，河西走廊正式归属中原王朝版图。河西归汉后，为了对其实施有效的统治，并从根本上切断匈奴右臂，确保边境安全，进而加强对天山南北地区的控制，发展东西方

经济文化交流，汉王朝遂在河西地区推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经济措施，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及其属县的设立以及交通道路的开辟即为其重要举措之一。

1972年，汉代居延甲渠候官遗址（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破城子）出土了一枚珍贵的记载汉代交通道路、驿置间里程的简，即EPT59：582简。无独有偶，1990—1992年于敦煌市甜水井东南3公里的汉代悬泉置遗址，又出土了一枚珍贵的里程简，即II 0214①：130简，该简恰可与破城子里程简相互印证和补充，令人欣喜。EPT59：582简分作两栏，计4组16行，其中第一栏记从长安，经由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东北）、好止、义置、月氏道（约在今宁夏隆德县境）、乌氏县（今宁夏彭阳县东南）、泾阳县（今甘肃平凉市西北）、平林置等地至高平县（今宁夏固原市）的沿线里程，不在河西域内。该简第二栏所记为进入河西沿线各地里程：^[3]

媪围至居延置九十里 删丹至日勒八十七里

居延置至鱓里九十里 日勒至钩著置五十里

鱓里至次九十里 钩著置至屋兰五十里

次至小张掖六十里 屋兰至池五十里

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II 0214①：130简，所记皆为河西沿线里程：^[4]

……仓松去鸟六十五里，鸟去小张掖六十里，小张掖去姑臧六十七里，姑臧去显美七十五里。……（A 第一栏）

……池去鱓里五十四里，鱓得去昭武六十二里府下，昭武去祁连置六十一里，祁连置去表是七十里。……（A 第二栏）

……玉门去沙头九十九里，沙头去乾齐八十五里，乾齐去渊泉五十八里。右酒泉郡县置十一·六百九十四里。（A 第二栏）……

以上两枚里程简为我们研究汉代河西丝绸之路交通提供了绝好的第一手史料。

笔者自1980年起，年年赴河西实地考察，对于汉代河西丝绸之路沿途所经四郡及其属县的位址，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摸清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5]笔者考得，河西四郡及其属县依其空间布局大体可分为三组：一组位于走廊平原中部，并多沿祁连山北麓山前洪积冲积扇前缘泉水出露带排布；另两组则分别沿石羊河和黑河河岸南北方向列置，东西、南北两组城市分别以武威郡治姑臧和张掖郡治麟得为交点展布。这种格局不单反映了自然条件对于置郡设县和绿洲开发的制约作用，为汉代河西绿洲土地开发范围的重要标识，而且是汉室将河西作为“以通西域，隔绝南羌、匈奴”之基地来从事经营的政治战略在地理布局上的体现。其中沿走廊平原东西向分布的一组县城正当丝绸之路主道，而沿石羊河、黑河干流南北延伸的两组县城又是走廊平原沟通河套和蒙古高原的天然孔径。汉室开拓河西之主旨即在于切断匈奴右臂，打通东西交通，屏卫边境安全。在丝绸之路沿线设县，且县城之间一般相距30~60公里，使其作为丝绸之路大动脉的中继站和补给地在所必然。这些城市的盛衰与丝绸之路的兴颓有着密切的关系，绿洲地区的开发史与丝绸之路的发展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考定这些城址的位置又为我们研究丝绸之路的走向提供了依据，如山前洪积冲积扇前缘泉水出露带一线即为丝绸之路的主干道所经。

考定的汉代河西交通道路，主要有长安至武威（姑臧）北道、长安至武威（姑臧）南道、武威至敦煌段、敦煌往西域南北二道、谷水（今石羊河干流）河谷段、弱水（黑河）河谷段。

一、长安至武威（姑臧）北道

汉代由长安通往河西走廊东部重镇武威有南北两条道路。敦煌悬泉V 1611③：39简A、B两面就分别记载了由悬泉前往北道和南道一些地点的里程，其中A面记东去“安定高平

三千一百五十一里”，即取北道而往。北道亦即居延EPT59：582简所记路线。此条道路开辟较早，自河西郡、县设立伊始即当开通；且线路较为顺直，由长安径取西北方向，大体溯泾河谷而上，经高平、媯围等地，直抵武威（姑臧），全程长约720公里，约合汉里1730里，较南道近约160公里，合汉里385里（详后）。但该道沿程自然条件较差，地理景观较荒凉，人烟较稀少，且位置偏北，靠近蒙古高原，距匈奴原游牧地较近，道路安全状况恐难尽如人意。该道于今索桥渡口渡过黄河，经媯围县、居延置、鱓里、次县、小张掖等地抵达汉武威郡治姑臧。

1. 索桥黄河渡口

上引EPT59：582简中，由长安出发到达高平（固原）后简文断缺，再向西的首站记为媯围，媯围为汉武威郡属县，其位置笔者考得即今甘肃省景泰县吊沟古城，^[6]该城东距黄河索桥渡口仅约14公里，则丝路进入河西必在这里渡河。从固原至索桥这段路线虽简文缺漏，但依其地形走势可以复原：应由今固原继续取向西北，越过较为低缓的六盘山北端和屈武山，进入祖厉河谷地，西汉元鼎五年（前112）汉武帝曾亲至这里巡幸。《汉书·武帝纪》记载：是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遂逾陇，登空同，西临祖厉河而还”，其中，“雍”即今陕西凤翔县一带，“陇”指陇山，“空同”即今甘肃平凉市西边的崆峒山，“祖厉”即今祖厉河，两汉时曾于这一带置祖厉县。武帝于此行幸，说明其沿途所经必为交通大道。祖厉河系黄河支流，沿其河谷继续西北行，至其河口入黄河处为今靖远县城，这里西魏时置会州，隋改名会宁镇，唐宋时亦置会州。靖远一带黄河切穿长达近百公里的红山峡，两岸群峰陡立，除峡谷出口五佛寺可以摆渡外，只有索桥对岸的石门乡小口子一段可渡。其地河床宽约百米许，水流较平稳，两岸虽很陡峭，但有沟壑可作通道，东岸穿过小口子可通哈思堡、石门乡以至靖远县城，接通祖厉河大道；西岸即索桥渡口所在的大沙沟口，该沟源于景泰县西部昌林山与寿麓山间的洼地，其上游寺滩一带干涸无水，仅存河道，至芦阳镇（景泰县老县城）以西则多有泉水涌入，水势渐大，形成了一条肥沃的带状河谷绿洲，宽约2公里，这是黄河以西这一带方圆数百里内唯一的一处绿洲，从而也自然成为丝绸之路过河后必经的通道。

索桥渡口位于大沙沟北侧，正是这处唯一的渡口控制了该段丝路大道的走向。索桥的得名源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于此设置的索桥（绳索系船以成浮桥），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又于此处建索桥堡。其实这里早自汉武帝开拓河西道路时即为要渡大津。史载，西晋泰始六年（270）秦州刺史胡烈讨河西鲜卑树机能，东晋义熙三年（407）南凉拒赫连夏，北魏太延五年（439）拓跋焘伐北凉均在此处渡河。唐时又于这里设会宁关，每日渡行旅可达千人以上，仍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渡口，迨至明代仍为要津。

笔者曾几次到索桥渡口实地考察，所见遗址犹存，皆为就地取材用当地山体（红山峡）风化的紫红色板岩砌筑而成，多已倾圮。河东岸渡口地形较为蹙狭，遗址规模不大，仅残留一处伸向河岸的院落基址，长、宽各约50米，内有房址数间。河西岸由于地势稍平缓，遗址沿山坡、台地分布，范围可达2平方千米许。其中最大的一处聚落遗址长约200米，宽100米许，位于河岸三级台地上，建筑密集，院落、街道、门户轮廓历历在目，地表散落许多青瓷片、瓦片、砖块、建筑残件等，多为明代遗物。该聚落北侧一座孤立的小山包上残存烽燧一座，残高2.4米，底部每边宽约8米，夯筑，夯层厚11厘米，烽周散落砖、瓦残片较多，并见铁灰色的汉砖残块，该烽当为汉代烽燧，烽周围以紫红色石板砌筑围墙。四级台地上残留一组明代烽燧，其中大墩一座，其西半边坍塌，底部长、宽各4.6米，残高5米许；大墩北侧依次排列5座较小的旗墩，每座旗墩间隔2米许，旗墩底部皆方形，每边长1.8米，残高亦1.8米许。大小墩外侧亦用当地紫红色石板垒砌，中间填以夯土。索桥遗址北侧约1公里，见汉、明长城遗址，其坍塌约10米，内侧（南侧）残高一般2米许，外侧临沟，残高可达7~8米，墙体一直伸至黄河岸边。

2. 媪围县城

由索桥遗址沿大沙河河谷西行约14公里，即抵达吊沟古城，该城即汉武威郡媪围县城、唐新泉军城。城址位于芦阳镇吊沟村大树梁大沙沟北岸，北依丘陵山梁而筑，南迤河滩（二级阶地），分山城、川城两部分，呈不规则形。山城高出河床80米许，墙垣断续残存，基宽5~7米，残高1.5~2米；西垣较完整，沿山势延伸，长225米；北垣、东垣破坏严重，多不连贯，仅见石砌墙基，分别长138米、95米。山城中间存土筑隔墙一道，残高1~2.5米，将山城分为南北两半。城南临大沙沟，东西两侧亦有沟壑，形势险要。川城已荡然无存，墙垣被夷为农田，笔者步测其南北宽约200米。整个山、川城周长约2400米。

3. 居延置

依上引EPT59：582简，媪围西九十里为居延置。汉九十里合今约38公里。由吊沟古城向西，溯大沙沟及其上游常年干涸的横沙河谷而行，约38公里处即今景泰县寺滩乡白茨水村。这里有一处泉水露头，水量虽不大，但为居住在该村数十户人家的唯一水源，也是这一段丝路沿途必经的水源补充地，汉居延置设于此无疑。近年文物普查中即在该村发现古代聚落遗址，存石砌房屋残迹，其范围约百米见方。

4. 鱓里

依EPT59：582简，居延置以西九十里为鱓里。由白茨水沿昌林山与寿麓山之间的洼地继续西北行约38公里（九十汉里），经曹家窑、蒿沟岷、白家洼、裴家营等地可抵古浪县大靖镇。其地为河西走廊东部一块肥沃的绿洲，发源于祁连山东端毛山北麓的大靖河（年出山径流量0.16亿立方米）流灌这里，沃野膏壤，人烟稠密。该镇北1公里许原有一座汉唐时期的古城址，今名古城头，仅北垣、东垣因分别用作地埂而保存了部分墙体。北垣残长330米，基宽6.5米，残高1.5米许；东垣残长300米，墙基正中开挖农渠一道，墙外城壕隐约可见。城内城周尚可拣到汉唐时期的灰陶片、黑陶片、碎砖块等物。笔者考得该城为汉武威郡扑县、北魏魏安郡、北周白山县、唐白山戍城，⁷¹鱓里当为该县城附近的一个里，位于今古城头近侧。

5. 次县

依EPT59：582简，鱓里西九十里为次，次为汉武威郡属县。由古城头往西38公里（汉九十里）许正是今古浪县土门镇偏西一带。该镇原为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筑的土门堡，地处古浪河下游平原，土地平广，田连阡陌，农产丰饶。《古浪县志》记载：土门“土沃民富，商务盛于县城”。因其地处绿洲繁华之域，人为破坏严重，汉代城址早已无存。笔者实地访知，镇西3公里的王家小庄一地今仍有“老城墙”的称谓，土门镇则被称作“新城墙”，新、老之别甚为分明。老城墙系南北较长、东西稍短的一座古城，20世纪50年代其城垣尚有1米多高，周长约有二三里，以后逐渐毁坏，当地年长者皆对此记忆犹新。城中还曾出土许多汉代陶罐等物，附近散落一些灰陶片、红陶片等。笔者考得此城即汉次县城。

6. 小张掖（汉张掖县）

依EPT59：582简，次西六十里为小张掖，即汉武威郡张掖县，为别于汉张掖郡，故以“小”称之。《居延汉简释文合校》119·67简：“葆，小张掖有义里”。小张掖既然辖有“里”，则肯定是指汉张掖县。西汉六十里，约合今25公里，由次县（土门镇王家小庄）往西北通往汉武威郡的大道行约25公里，正是今武威市东河乡王景寨村，该村存留一座长宽各约300米的古城遗址，此即汉武威郡张掖县城。1986年夏，笔者来这里考察时，所见城垣已荡然无存，访之当地群众，言“文革”中城墙被挖去做了垫圈土，前几年还残存西、南城垣各一段。在原基址的地方，田边地头到处散落着绳纹或素面灰陶片、残瓦片、碎砖块等物，并见汉代卷云纹残瓦当。该城地处古浪河与黄羊河洪积冲积扇前缘泉水出露带南侧，清水长流，绿洲肥沃。其地又东连汉媪围黄河渡口，西北通姑臧，南可接苍松（今黑松驿，后考），并可由此向

南湖古浪河谷而上越乌鞘岭直抵金城（兰州）黄河渡口，实处于由媪围而来和由金城而来的两条丝绸之路大道的交汇之地，位置十分重要。

7. 姑臧

汉武威郡郡治，笔者考得西汉姑臧县城即今武威市城西北约2公里处的三掾城，约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迁至今武威市城。汉张掖县（王景寨古城）位于三掾城东南27公里，恰与悬泉II 0214①：130简“小张掖去姑臧六十七里”的记载相合。姑臧地处石羊河绿洲腹地，系长安连通河西南北两条丝绸之路的交汇点，物产丰饶，人烟稠密，为汉唐时期我国西北除首都长安之外最大的城市。早在东汉前期就已成为“通货羌胡，市日四合”的富邑，降至唐代更是发展成了一座国际性都市，且有诗为证：“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

二、长安至武威（姑臧）南道

从长安到武威（姑臧）的南道，由长安沿渭河西行，在宝鸡（虢县）附近溯千水（古称汧水）西北行，越过陇关（又名故关、大震关，今陕西陇县西北），复沿渭河西行，经天水（上邽）、陇西（襄武）、临洮（狄道，汉陇西郡治），折而向北，翻过七道梁至兰州（金城），再由兰州渡过黄河北行，越乌鞘岭至武威。该道因翻越陇关可称之为陇关道，又因位于北道之南，故可称为南道。敦煌悬泉V 1611③：39B简载，悬泉至“金城允吾二千八百八十里，东南。天水平襄二千八百卅，东南。东南去刺史口三口……一八十里……长安四千八十……”。取向东南，经由金城、天水等地而至长安，所行线路即是南道。南道大多路段沿渭河谷地行进，沿途人烟较稠密，所经城镇较多较繁华，且安全性比北道更好；但其路途较远，取南道由长安至武威长达880公里，合汉2116里，较北道远出160公里，合汉里385里，至少要多出4天的路程，且需翻越陇关和乌鞘岭，也比较艰辛。又由上引汉简知长安至悬泉4080里许，则武威至悬泉约1964汉里，合今817公里，这与今日道里大体吻合。

南道的开辟应较北道稍晚。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该道所经的金城郡迟至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设置，较武帝设置的河西四郡晚了几十年，亦较北道所经武帝元鼎三年（前114）设置的安定郡（郡治高平，今固原）晚了30余年。

1. 万城津渡口

长安至金城（兰州）段因不在河西域内，从略。由金城至武威，首先须渡过黄河。据有关文献记载、前人所做工作和作者的实地调查，兰州市区一带的黄河渡口主要有金城关渡和石城津渡。金城关渡口，学界公认在今兰州市中山黄河铁桥北岸西侧1公里许，今已辟为金城关文化园区。《隋书·地理志》记，金城郡“有关官”。《新唐书·地理志》云，金城郡治五泉县（今兰州市城关区）“北有金城关”。《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九》“兰州”条：“金城关在州城西，周武帝置金城津，隋开皇十八年改津为关。”《宋史·地理志》“兰州”条记载：“金城关，绍圣四年进筑，南距兰州约二里。”该关其实早自汉代即已设置，宋绍圣四年复以修筑。《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兰州”条记载：“金城关，州北二里，当黄河西北山要隘处，本汉置。阌颿《十三州记》金城郡有金城关是也，后废。宋绍圣四年，复置关于此，据河山间筑城以为固。崇宁三年，王厚请移关于北境斫龙谷，不果。今设巡司于河南。”据乾隆《皋兰县志》，明洪武十八年（1385）于这里建成镇远浮桥，用大船25艘，横排河面，每船相距1.5丈，以长木连接，两侧围以栏杆。浮桥随波升降，平如坦途，号称“天下第一桥”。1909年耗银30余万两于此建成黄河铁桥，为黄河上最早、最重要的铁桥之一，从而大大便利了祖国内地与新、青、藏边疆地区的联系。

石城津渡口又称为金城渡口，位于汉金城县北，今兰州市西固区河口镇，地处庄浪河注入黄河处，为丝绸路上必渡之口。《水经注·河水》记载：“湟水又东流，注于金城河，即积石之黄河也。阚骠曰：河至金城县，谓之金城河，随地为名也……河水又东径石城南，谓之石城津。阚骠曰：在金城西北矣。河水又东南径金城县故城北。”《读史方輿纪要·卷六十》载：“石城津，（兰）州西境。阚骠曰石城津在金城西北。”今石城废址仍存，位于河口镇北黄河北岸1公里许，东临庄浪河，兰新铁路从城西穿过。城址大体方形，每边残长约100米，残高1米许。《资治通鉴·卷一〇四》记，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八月，前秦苟苩率军从石城津渡过黄河，会同梁熙攻克前凉缠缩城，进而军抵姑臧（武威）灭前凉。可见石城津渡口在军事上、交通上的重要性。所云缠缩城，笔者考得即从石城津渡河后不远处位于庄浪河谷的今永登县城北8公里的罗城滩古城。^[9]

由金城关渡口或石城津渡口渡河后，溯庄浪河谷（汉称乌亭逆水）北上，经令居县，越洪池岭（今乌鞘岭），西北行，复经苍松、鸟至小张掖，与前考北道接，而抵武威。

2. 令居县

汉金城郡属县，笔者考得今兰州市永登县红城镇玉山村西500米许的玉山古城即为该县故址。其城垣已很残破，仅存西北角和东垣中部各一段，墙基宽7米，上宽4米，残高6米许，唯西北角墩高达9米许。城内外散落灰陶片、碎瓦块等物，城垣外侧见城壕遗迹，残深0.8~1.5米，宽30米许。访之当地，知该城毁于“文革”中，原东西长约400米，南北宽300米许，墙垣未筑马面。^[10]令居县城位于庄浪河谷，北距永登县城约35公里；南距庄浪河入黄河口30公里许，合汉72里，恰为一天行程。

3. 苍松县

汉武威郡属县。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苍松，南山，松陕水所出，北至次入海。”笔者考得松陕水即今古浪河，北至次所入的海即今邓马营湖—汤家海。可见苍松县位于次县（今土门镇西王家小庄）南，县境内有古浪河源头的南山（今祁连山）。悬泉II 0214①：130简载：“仓（苍）松去鸟六十五里，鸟去小张掖六十里”，依此由苍松至小张掖计125汉里。由于悬泉此枚汉简记有“沙头”一名，沙头原名池头，东汉时才改称沙头，为酒泉郡属县，因而该简应为东汉时简，所记里程亦应为东汉里程。东汉里较西汉里稍大，约合今430米许。东汉125里合今约54公里。小张掖即前考今武威市王景寨古城。由该城向南38公里许即抵达古浪河出口，该口呈“V”字型向北敞开，向南则进入古浪河峡谷，该峡谷既是沟通兰州黄河盆地与河西走廊的必经咽喉，又是走廊平原通往南羌的要径，交通和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历来被称为中国西部的“金关铁锁”。《古浪县志》称其“足资弹压，诚万世不可废也”。汉、明长城以及今兰新铁路、连霍高速公路、国道312线皆从此峡通过。由古浪峡口再向南16公里（王景寨古城至此恰为54公里）处，为今古浪县龙沟乡政府驻地，这里为古浪峡谷中一处较宽展的地方，东西宽达1.5公里许。即在河谷西侧的台地上存留一座古城址，名黑松驿城，因明清时曾在这里设过黑松驿故名。1991年7月25日笔者来此考察时，所见该城已被拆得很不完整，仅存西垣，基宽5米许，顶宽2米，残高约1.5米。据地表显示的遗迹，其南垣抵达龙沟乡中学，北端伸至铁路附近，全城南北长约500米，东西宽350余米，今龙沟乡政府即位于城内。访之当地，云当年修建兰新铁路时曾从城中挖出许多陶罐、砖瓦块、铜箭头、铁箭头等。近年有人在城内建房时还掘出过小铜镜、铜簪子等物。笔者即在城中一户家中看到其收藏的黑灰色陶罐，应为汉代物品。该城正门上曾镶嵌一石匾，楷书“凉庄保障”四字，当为清代驿站之物，后被县文物部门拆下。该城西面的山坡上有大片的汉墓群。据当地老人们说，原来这一带山上长满了松树，密密实实，后因山坡地开为梯田，现只能在深山中看到树木；今全乡计有19 000余人，耕地46 000亩，而河谷川地仅500亩。由上考可见，汉苍松县城即是今黑松驿古城。苍松县、松陕水，以至明清时黑松驿的得

名，皆由于这一带松林茂密之故。事实上直到清代这里仍留下了“云海苍茫迷路客”的诗句。

4. 鸟县

依II 0214①：130简，鸟县位于仓（苍）松县北六十五里，合今约28公里；鸟又北去小张掖六十里，合今约26公里。由苍松县故址今黑松驿城沿古浪河谷北出，约16公里即达古浪河出山口（县城所在），进入绿洲平原；由该口再向北约12公里的小桥村东南，即古浪河“V”字型冲积平原中部，今有一处名一堵城的地方，当地群众告知这里原有一堵残墙，原为一座古城的西墙，因正好作为两个村的界限而被长期保存了下来。1983年残墙被毁，今仅存墙基。夯筑，残长约200米，残宽4米许，残高不足半米，今仍作为地埂。墙基西侧存深约1米、宽50米的槽沟一道，俗称城槽子，应为护城壕残迹。至于南北东三面墙垣，据云百余年前就被毁了。城内城周今已无遗物可寻，但村民们言，残墙中曾挖出过五铢钱。1991年春，该墙东约半里的胡庄子还出土汉简数枚，但因当时群众挖掘不善，字迹已无法辨认。城西约2公里的平顶山山前缓坡上向南直到县城一中一带，分布着大量汉代小型砖室墓，出土汉灰陶罐、砖块等物。据《后汉书·段熲传》唐章怀太子李贤注：鸟故城在凉州昌松县北。唐凉州昌松县正是今古浪县城，一堵城正位于该县城以北。一堵城南去苍松县故址黑松驿古城28公里，北去小张掖故址王景寨古城恰好约26公里（汉60里），可见一堵城为汉鸟县城无疑。

5. 武威

由鸟县北去抵达汉武威郡张掖县，与从长安经高平（固原）而至武威的北道汇合。

三、武威至敦煌段

从汉武威郡治姑臧往西，沿河西走廊大道依次经汉张掖郡显美县、番和县、删丹县、日勒县、钩著置、屋兰县、池县、麟得县、昭武县、祁连置、酒泉郡表是县、乐涪县、绥弥县、禄福县、玉石障、玉门县、沙头县、乾齐县、敦煌郡渊泉县、冥安县、广至县、鱼离置、万年骑置、遮要置等地，而至敦煌郡治敦煌县，全程约875公里，合汉里2104里。其沿途除其西部少数地段戈壁、沙地面积较广、跋涉较艰辛外，总的来看一路上绿洲连片，地势平坦，农产丰富，城镇棋布，为沿途行旅提供了较为方便、优越的通行条件。因而河西大道也就自然成为丝绸之路前往西域的首选路段。

1. 显美县

西汉时显美为张掖郡属县，因其靠近武威，东汉时又改属武威郡管辖。依悬泉II 0214①：130简记载，姑臧去显美75汉里，合今32公里多。由姑臧县故址（前考今武威市西三棵城）西去32公里处，正是今武威市丰乐乡之地。该乡地处西营河（石羊河支流）下游平原，水源充沛，土地肥沃，自古就为武威绿洲西部的精华之域。今天这里虽早已无汉代城址留存，但在乡政府一带仍可找到些许断续的墙基和遗物。

2. 番和县

显美县西去里程，简文缺失。显美西侧应为汉张掖郡番和县，该县唐时更名天宝县，《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二》等史书均记该县位于凉州（武威）西180里。笔者据之考得，番和县故城即今永昌县西12公里许的焦家庄乡西寨古城，该城东距丰乐乡（汉显美县）52公里，合汉121里。城垣破损严重，南北240米，东西300米许，残高不足1米，散落少许灰陶片、破砖块等物。^[10]该城位处石羊河支流东大河冲积洪积扇前缘泉水出露带北侧，自古发展农业的条件优越，西汉时在番和专设农都尉，可见其田功之盛。且地当交通大道，今国道312线、连霍高速公路等均从其地通过。

3. 删丹县

番和县西去为删丹县。由西寨古城向西约45公里（合汉105里）许，即今山丹县古城窠，

其地又名峡口或十五里口，地处石羊河流域与黑河流域的分水岭低缓山岗的西侧，源于大黄山（古焉脂山）的沟水可流至该城附近。城址北依十五里口达坂，南靠大黄山东段之白露掌，峡口长约22公里，自古就为重要的交通孔道和战略重地，汉、明长城和今国道312线、连霍高速公路亦由此处穿过。古城窟中古城犹存，平面呈方形，每边约250米，东开一门，城内散见灰陶片、红陶片、粗瓷片等物。该城即汉删丹县城。

4. 日勒县

EPT559: 582简记，删丹至日勒八十七里。《汉书·赵充国传》记载：“武威郡、张掖日勒，皆当北塞，有通谷水草。”可见日勒县位处河西走廊北部，临长城（北塞），且有水草谷地可供通行。东汉末于张掖郡西分设西郡，日勒遂立为郡治，表明其地位的重要。《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二》：“后汉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分置西郡，以删丹县属焉。”《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三》有云：“西郡治日勒县”“日勒城，在（山丹）卫东南”。明代山丹卫即今山丹县城。西汉87里约合今34公里，由古城窟向西偏北34公里许，即今山丹县城东南约2.5公里处，恰可找到一座古城址——五里墩古城。该城位于位奇乡十里堡村二社居民区，城址几被夷平，仅存三段残垣：两段位于南部，应为南墙，一段长5米许，残高2.5米，残宽5米；另一段长16米，残高4.5米，基宽8.5米；二墙均作东西向延伸，相隔约70米；其北180米处又有残垣一段，残长12米，残高4米，残宽6米。据此该城南北至少应长180米以上，其东西长度可辨认的墙基至少在200米以上，规模较大。城中东南部存枯井一眼，井口直径10米许，深20米以上。城内外散落铁青色碎砖块（俗称“汉铁砖”）、碎陶片等物。城北1公里许，汉、明两代长城通过。该城即应为汉日勒县城。

5. 钩著置

依EPT 59: 582简记载，日勒至钩著置五十里，钩著置至屋兰又五十里，则钩著置恰处于日勒、屋兰二县之间，为连接二县及丝绸之路河西干道上的重要置所。屋兰县故城即今张掖市碱滩乡古城村东古城（详后），位于前考日勒故城东42公里许，今42公里恰合西汉100里，与上述汉简记载完全吻合。位于二县中间的钩著置地当今山丹县东乐乡十里堡村一带。该村地处山丹河南岸，东距今山丹县城18.5公里。惜汉置故址今已无存。

6. 屋兰县

依EPT 59: 582简记载，屋兰县位于钩著置西五十汉里（合今约21公里），其位置正是今张掖市碱滩乡古城村所在。这里原有俗称东古城的古城址一座，清代城中曾设仁寿驿，今为村委会驻地。《甘州府志》载：“屋兰古城，城东五十里，今仁寿驿，俗称古城是也。”东古城正位于张掖市城东50里，其汉代城垣早已毁弃无存，今仅存明代所建西门楼一座。访之当地，知该城原周长三里，基本方形，开东、西二门，规模较大。当地文物部门同志介绍，1958年拆除明清所筑城墙的一些墙段中发现裹有旧的墙基，应为汉代始筑的墙基。东古城坐落在山丹河南岸，其地自古以来就是从事农耕的理想之域，且交通、战略地位重要。该城即汉屋兰县城。

7. 池县

居延EPT59: 582简作“池”，记其位于屋兰东五十里；悬泉II 0214①：130简又记：池去罽得五十四里。由碱滩乡东古城西去略偏南21公里（50汉里）许，即今张掖市城南长安乡一带。地湾出土汉简：“肩水候官执胡燧长……，池宜药里，家去官六百五十里”（甲编1014）。同地所出另一简：“肩水候官并山燧长……，罽得成汉里，家去官六百里”（甲编114）。同地又一简：“肩水候官始安燧长……，罽得千秋里，家去官六百里”（乙编32）。地湾城址位于今金塔县鼎新镇北50公里许（详后），即今张掖城北250公里许，为汉肩水候官驻地。由以上简可算得，池县宜禾里与罽得县成汉里、千秋里相距约50汉里，且应位于其偏南

部，而这一方位里距正与上引悬泉简所记“池去鱣得五十四里”近之，不同地点所出简上的记载可相互印证。长安乡因地处黑河中游绿洲腹地，人类活动频繁，今天已无汉代遗迹留存。

8. 鱣得县

鱣得县为汉张掖郡郡治，由池县所在的今长安乡往北偏西23公里（54汉里）处，恰为今张掖市西北约17公里的“黑水国”一带。“黑水国”系当地俗称，笔者经实地调查考证，发现这里为一片已沙漠化了的古绿洲，面积约40平方千米，其地遗存北古城、南古城及其周围的7座小城堡，汉鱣得县城即为北古城址。^[11]该城南北长254米，东西宽228米，墙垣损毁较严重，残高1.4~2.3米，西南隅城垣完全被流沙埋没。城中到处散落汉代砖块、灰陶片等物。约隋代初年张掖郡治迁至今张掖市城之地，北古城遂废。悬泉V1611③：39A简云，悬泉去“张掖千二百七十五”里，合今约530公里，与今之里程近之。

9. 昭武县

依悬泉II0214①：130简，昭武去鱣得六十二汉里，合今约27公里。由“黑水国”北古城沿黑河流向西北行约27公里处，即今临泽县鸭暖乡昭武村一带。《后汉书·梁懂传》载：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懂率军击羌，“大破之，乘胜追至昭武”。唐人李贤注：昭武，“县名，属张掖郡，故城在今甘州张掖县西北也”，唐甘州张掖县城即今张掖市城，则汉昭武县应位于今张掖市城西北，这正与昭武村的位置相合。《晋书·地理志》记载：张掖郡领临泽县，即“汉昭武县，避文帝讳改也”。改称临泽表明其地临近湖泽。今昭武村地处黑河南岸，平畴沃野，一望无际，地势低平，黑河萦绕其间，河汉众多，蛇曲、牛轭湖发育，富有水乡景色。昭武村西约4公里处，黑河主要支流之一的大沙河（上游名梨园河）自南而北注入黑河干流，河口处更趋低平，常聚水成泊，当年“临泽”所临之泽即应在这一带。就在今昭武村村部东北1公里许的黑河岸边，原有古城遗址一座，即名昭武古城。笔者访问得知，20世纪50年代建村小学时该城被部分挖毁，“学大寨”运动中遭到进一步破坏，今已荡然无存。笔者于原址步测，该城长宽各约280米许，符合汉代县城的一般规模，^[12]城址内外今仍可找到少许汉至北朝时期的碎砖块、灰陶片等物。1941年考古学家卫聚贤和甘肃著名学者冯国瑞一同在昭武村废墟考古，发现过14种类似汉代的砖块。由上可见昭武村古城确系汉昭武县遗址。II0214①：130简又记昭武为“府下”，表明该县曾一度为张掖郡太守府，做过郡治，大概不多久郡治就迁往鱣得了。

10. 祁连置

依悬泉II0214①：130简，昭武西去祁连置六十一汉里，合今约26公里。由昭武古城西去26公里许，为今高台县渠口堡一带。其地位处黑河南岸、今芦湾墩水库西测，南望祁连山脉。渠口堡系清代所筑屯堡，今天这里亦无汉代遗址可见。

11. 表是县

依悬泉II0214①：130简，祁连置西去表是县七十汉里，约合今30公里。由渠口堡西去30公里之地正是今骆驼城遗址。骆驼城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我国现存规模较大、颇有影响的一座古城址。该城位于高台县城西略偏南21公里处的骆驼城乡，城垣犹存，分作南北两半城。南城较大，南北长494米，东西宽425米。北城较小，南北长210米，东西亦宽425米。全城南北通长704米，总面积299200平方米。夯筑，夯层厚10~15厘米。墙基残宽6米许，顶宽1.8米，残高5~8米。四角筑角墩，南北二城隔墙两端亦筑墩台，东南角墩顶部存敌楼残迹。东西二垣又各筑马面3座。南城开东、西、南三门，皆筑护门瓮城。北城仅开南门，以与南城相通，亦筑瓮城。骆驼城东南1公里许发现前凉墓葬，出土木板纪年墓志一通，记曰：“建兴二十四年三月癸亥，朔，二十三日人酉，直执凉州建康表是县显平亭部前任闰领拔周振，妻、孙阿惠得用。今岁曰道通，葬埋太父母以后入蒿里，……”。建兴二十四年即公元336年，

亦即前凉张骏太元十三年；墓主人周振为凉州建康郡表是县显平亭闰领拔（即副领把）。由此墓志可以证明，前凉建康郡表是县城正是今骆驼城遗址。《后汉书·五行志》亦记，光和三年（180），“自秋至明年春，酒泉表氏（表是）地八十余动，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顿，县易处，更筑城郭。”西汉始筑的表是县城因东汉光和三年的地震毁弃，只好易地重建城郭，这一重筑的表氏（表是）县城即应为前凉建康郡表是县所沿袭的城郭，即今骆驼城。笔者还考得骆驼城在唐代为建康军城。^[13]

12. 乐涇县及其以东的置（屯升）

由表是县再往西，为汉酒泉郡乐涇县。笔者曾考得，汉乐涇县城为今酒泉市下河清乡的皇城遗址。^[14]《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载：“福禄县，中下。西至（肃）州一百里。本汉乐涇县，属酒泉郡。”《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二》亦云：“福禄县，肃州东一百里。……唐武德二年于乐涇古城置福禄县。”唐肃州（酒泉郡）城即今甘肃省酒泉市城，其东100里处正是今皇城遗址，汉代于此设乐涇县，唐代改称福禄县。今城垣尚存，南北长298米，东西宽351米，残高3~7米。该城地处丰乐河下游，东与骆驼城的直线距离为59公里（约合汉137里），相距较远，其间肯定还有置的设立，惜汉简缺载。考之其所经地点，骆驼城往西约33公里许（约合汉77里）为今酒泉市屯升乡，这里地处马营河下游，为祁连山北麓的又一处绿洲原野，其地应有汉置之设。由此再往西北约30公里（约合汉70里）即为下河清皇城遗址。这样由骆驼城途经屯升乡再往皇城，总距离约63公里，虽较骆驼城至皇城的直线距离多了约4公里，但中途可得到屯升绿洲的补给。屯升应为该段丝路上的必经之地，今312国道亦从这里通过。

13. 绥弥县

后汉改曰安弥，魏晋因之。据《资治通鉴·卷一一四》记载义熙二年（406）条：“沮渠蒙逊袭酒泉，至安珍。（李）暠战败，城守，蒙逊引还。”胡注：安珍即汉酒泉郡安弥县也，后人从省书之，以“彌”为“弥”，传写之讹又以“弥”为“珍”。时酒泉为西凉李暠的都城，北凉沮渠蒙逊袭酒泉自然是东向西进军，先至安弥，可见安弥位于酒泉之东。《宋书·氐胡传》亦载，义熙“二年（406）九月，蒙逊袭李暠，至安弥，去城六十里，暠乃觉，引军出战，大败退还，闭城自守，蒙逊亦归”。去城60里指距西凉都城酒泉60里。笔者曾考得酒泉城东60里的汉绥弥县城，正是今酒泉市临水乡古城村残存的古城废墟。^[15]该城西距酒泉26公里，恰合汉里60里；东距皇城遗址（汉乐涇县）31公里，合汉里约72里。城址略呈方形，长宽各200米许，残高1~2.5米，开东、西二门，地面散落灰陶片、黑陶片、碎砖块等物。

14. 禄福县

禄福县为汉酒泉郡治，今酒泉市城。该城始建于武帝太初元年（前104），为河西设立最早的郡、县城，迄今2000多年来其城址一直未有迁改。清《肃州志》《重修肃州新志》记，明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于旧城东城外展筑新城，“今之鼓楼，即昔日之东门也”。鼓楼今仍存，屹立在酒泉市城中心。由此看来汉酒泉郡治禄福城当为今酒泉城的西半部，东半部则为明代新辟。1954年拆除酒泉南城城墙时还发现墙中旧南门遗址（今军分区院内），为汉晋时的禄福县之南门。酒泉位处北大河、洪水坝河洪积冲积扇泉水出露带西南侧，地势平衍，地表地下径流都很充盈，具有发展农垦、置郡设县的优越条件。该城不仅地当贯通走廊平原的丝绸之路东西向主干道，而且沿北大河、黑河河谷北上又可直趋蒙古高原腹地，这条河谷水草地带每每成为匈奴南下的天然孔径。酒泉正位居这东西、南北两条交通要道的交汇点上，具有交通、军事等方面极为重要的意义。

15. 玉石障

由酒泉往西，穿过数十公里的北大河洪积戈壁滩，则进入一片绵延的剥蚀残山地带，今称之为黑山，为黑河流域与疏勒河流域的分水界山。山体相对高度约200~500米，山体南部发育一

条东西向延伸的天然峡谷，长约10公里，宽100米许，今名石关峡或黑山峡。峡内有大道，可通车马，成为古代由酒泉西出之要口。峡中还有一股泉流由西向东流出，今名红柳沟，这股泉水遂为穿越石关峡的沿途行旅提供了良好的补给水源。因为古代在干旱戈壁地区行进，沿途人畜水源补给为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该峡东口距酒泉城32公里，合汉75里许，恰为一天的行程。由酒泉西行一日恰可得到红柳沟泉水的补给，因而石关峡也就成为十分理想的必经通道。笔者考得，石关峡东口为最早所设的玉门关，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酒泉列亭障至玉门”时，就在这里设玉门关。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李广利伐大宛获胜后玉门关随之西迁敦煌西北，石关峡遂改置为玉石障，五代宋初又于这里复置玉门关。^[16]据《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二·肃州条》载：“玉石障，按《十三州志》云，延寿县在（酒泉）郡西，金山在其东，至玉石障，亦是汉遮虏障也。”《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肃州玉门县条载：“金山，在县东六十里。出金。”汉唐玉门县城即今玉门市赤金镇古城（详后），由该城向东60里，正是黑山余脉之所在。延寿县，东汉置，故址为今玉门市清泉乡驢马城（详后）。《十三州志》所云金山之东的玉石障恰恰正是今石关峡。关即是障，名称不同，所指属一。石关峡之所以曾有玉门关、玉石障之称，想来一是由于西域向中原贡玉的孔道经由此峡，二是当地自古产玉早有玉石山之名。今天遐迩闻名的酒泉夜光杯所用部分玉石亦采自是山。

16. 延寿县

由玉石障再往西即为东汉所置的延寿县。据《后汉书·郡国志》延寿县条刘昭注引《博物记》载：“县南有山，石出泉水，大如笕簾，注地为沟。其水有肥，如煮肉泊，羹羹永永，如不凝膏，然之极明，不可食，县人谓之石漆。”石漆即石油，指明延寿县位于山之北麓、天然石油流出的沟谷近旁。《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二》玉门县条引阚骃《十三州志》云：“延寿县，在（酒泉）郡西，金山在其东，至玉石障。”可见延寿县在玉石障之西。今玉门一带有两条天然原油溢出的沟道，一条今名石油河，一条今名白杨河，二河均源出祁连山西段北麓。石油河即《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玉门县条所记的“石脂水”，出山后流经老君庙（原玉门市城），折而西北，经赤金镇（汉唐玉门县），又东北流注入花海（延兴海）。白杨河则位于石油河以东15~30公里处，出山后流经玉门市清泉乡、驢马村等地，没入戈壁，该河即应为《博物记》所记流经延寿县的“石漆”水，延寿县即位于该河近侧。即在今白杨河西岸的清泉乡驢马村东头恰有一座古城遗址，俗称驢马城，其南距国道312线仅800米。城址分为内外二城。内城位于外城东北隅，存北西南三面墙体，东垣坍入驢马河（白杨河下游支流）中；南北长63米，东西宽58米；外城墙垣多毁，南北长230米，东西宽280米，城内大部地面被辟为农田，田间地头散落灰陶片、红陶片、碎砖块、石磨残块等汉唐时遗物，亦见明代的青瓷片。笔者考得该城即东汉延寿县城，其东北隅的内城为明代重修，作为当时茶马互市的“驢马”之所。^[17]驢马城位处石关峡东口以西约36公里，合汉84里，恰为一天的行程。

17. 玉门县

由延寿县再往西即为玉门县，笔者考得其故址即今玉门市赤金古城。^[18]该城位处驢马城以西约31公里，合汉72里。《旧唐书·地理志》载：“玉门军，在肃州西二百里。”唐之玉门军即汉以来的玉门县，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又改军置县。《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二》亦云玉门县位于肃州西二百里。由酒泉向西200里正是今玉门市赤金绿洲之地，石油河流贯其间，地土沃饶，自古就为交通要道和重要的农垦屯田之处。这里遗留东西相连的新旧两座古城址，东为旧城，略呈方形，仅余部分墙段，残高0.5~3米，为汉唐时的玉门县、唐玉门军废址。西为新城，为清康熙年间所筑的赤金卫城。

18. 沙头县

依悬泉II 0214①：130简，玉门去沙头九十九里，合今约43公里。从赤金绿洲沿石油河北

去，穿过赤金峡即进入该河下游的花海绿洲。笔者发现在今花海绿洲的西部还有一片废弃的古绿洲，其面积约310平方千米。古绿洲上残存多座古城遗址，其中最大的比家滩古城为西汉池头县、东汉沙头县城。^[19]该城位于玉门市花海乡政府西略偏北13.5公里、恰在赤金古城北43公里处，与汉简记载合。城垣因20世纪70年代“学大寨”运动而几被夷平，实地所见城址仅余两座残土墩和长约30余米的一段土垣，系东垣颓基，残高1.5米许。访之当地，知此城原来甚高大，每边长约300米。城址内外到处可见各种陶片，亦有残铁片、石磨残块等物。当地群众说，当年推土平地时城中推出了不少陶罐、陶碗一类的东西。

19. 乾齐县

依悬泉II 0214①：130简中载，沙头西去乾齐八十五里，约合今37公里。由比家滩古城沿南石河（疏勒河中游东向支流）南岸西行37公里许，为玉门市黄闸湾乡东部一带，地处今玉门镇绿洲腹地。由于人类活动的频繁，今天这里已无古城址可觅，但乾齐县位于这一绿洲腹地应无疑义。其地附近的北沙梁至今还存留古墓群三处，地表散落不少灰陶片等物。

II 0214①：130简：“酒泉郡县、置十一，六百九十四里。”酒泉郡境内的这11个县、置由东向西，即依此为上考祁连置、表是县、失名置（今屯升）、乐涇县、绥弥县、郡治禄福县、玉石障（置）、延寿县（东汉新设）、玉门县、沙头县（西汉名池头县）、乾齐县，恰为数11；东汉694里合今约298公里，这一里数应指从表是县至乾齐县的距离，恰为694汉里。

20. 渊泉县

依II 0214①：130简，乾齐西去渊泉县五十八里，合今约25公里。由黄闸湾乡沿疏勒河干流西北行25公里，为今瓜州县河东乡四道沟村一带。该村残存古城址一座，南北长约350米，东西宽240米许，残高1.5~2米，城内曾发现汉五铢钱币等物。笔者考得该城即汉渊泉县城。^[20]渊泉为敦煌郡最东部的一县，地处疏勒河干流大拐弯的内侧，地势较低，泉源旺盛，为疏勒河中游绿洲的精华地段。

21. 失名置（草城遗址）

渊泉县往西为汉敦煌郡冥安县之地，笔者考得汉冥安县故址即今瓜州县锁阳城镇南岔大坑古城，^[21]该城东距渊泉县所在的四道沟古城约60公里，合汉140里，里距较远，其间肯定还应设有置，惜今已不知其名。笔者注意到即在四道沟古城西偏南约30公里（合汉70里）的锁阳城镇桥子村长沙岭，存留一座汉代小城堡，今名草城，又叫半个城。基本方形，东西长26.4米，南北宽24米，东西北三面存断续墙垣，夯筑，残高最高5.5米；南垣倒塌后用土坯修补。夯层、土坯层间均有红柳夹层，系典型的汉代建筑风格。南开一门。城中仍堆放着当年燃放烽火的积薪，由红柳、芦苇、胡杨树枝堆积而成，呈斜坡状堆放，长约18米，宽4.5米，最高处4米。因堆放大堆柴草，故该城称作草城。城内外随处散落陶片等物，城南不远发现许多墓葬，并见大量陶片分布区。由其位置、规模、遗物等可以认定该城应为汉代连接渊泉县与冥安县间的一所置。

22. 冥安县

由草城遗址西去又30公里（合汉70里）即为汉冥安县所在的南岔大坑古城，该城西距锁阳城镇约23公里，西南距著名的锁阳城遗址4.5公里。城垣已十分残破，实测东垣560米、北垣550米、西垣535米、南垣525米，墙基坍宽7~8米，多数墙段残高不足1.5米，保存最好的一段残高4.5米。城内暴露许多汉代灰、红陶片等物。笔者发现今南岔大坑古城、锁阳城、草城等所在的疏勒河洪积冲积扇西缘，有一大片古绿洲沙漠化地带，其地貌景观以成片分布的风蚀古耕地为主，总面积约500平方千米；今天虽满目龙荒，但昔日渠网密布，田连阡陌。^[22]悬泉V 1611③：39B简载：悬泉去“冥安二百一十七”里，合今约91公里，这恰与冥安县（南岔大坑古城）经广至县（踏实破城子，后考）、鱼离置（老师兔城，后考）而至悬泉置（吊吊水）的距离相合，可见南岔大坑古城确为汉冥安县城，所考沿途广至县、鱼离置的位置（详后）

亦无误。

23. 广至县

冥安县往西即广至县，笔者考得该县故址为今瓜州县踏实破城子。^[23]其东距汉冥安县所在的南岔大坑古城约32公里，约合汉76里，东南距锁阳城镇8公里。城垣见在，损毁较轻，南北长约280米，东西宽150米许；墙基宽约5米，顶宽1.5米，残高6.5米。城内遗落灰陶片、红陶片、碎砖块等物。该县位处榆林河下游绿洲，径流充沛，土地肥沃，农产丰饶，为此段丝绸路上的必经之地。

一般认为，汉代邮驿系统内部机构设置有“置”、“驿”、“邮”、“亭”等。《后汉书·卷一一八·西域传》：汉代“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日；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邮置系统为汉王朝的兴盛和丝绸之路的繁荣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除前述里程简外，悬泉置还出土了一批简涉及广至、效谷二县的驿置。II 0214③：154简载：“口效谷、遮要、县泉、鱼离、广至、冥安、渊泉写移书到……。”县泉即悬泉。简文中提到的7处地名，皆当为汉敦煌郡辖境内的置名，其顺序依次从西向东排列，从而为我们研究丝绸路上这些置的序次及其相互间的位置提供了第一手珍贵史料。其中效谷、广至、冥安、渊泉又为敦煌郡属县名，这4个置与县同名，表明上述县中亦设置。此外还有龙勒置和玉门置（详后），敦煌郡境内有置9所。

于居延、悬泉汉简见，“置”为最高级别的邮驿机构，其人员最多，吏员有丞，丞下有置、廐、榭和仓啬夫（佐），还有负责养马、驾车、传递文书与提供饮食的各种日常人员，或徒或一般平民。悬泉置即有官卒徒御共37人（甘露二年，另一简记载为47人）、传马40匹、传车6乘（阳朔二年），多时可达15乘。“驿”和“置”则有所不同，功能有别。有学者认为，驿以驿马传递为主，置以传车接送为主并兼递部分邮件，有些置、驿又合而为一。由悬泉简知，汉敦煌郡境内除9置外，还设11个驿：万年驿、悬泉驿（一度改名临泉驿）、平望驿、龙勒驿、甘井驿、田圣驿、遮要驿、效谷驿、鱼离驿、常和驿、毋穷驿。置、驿以下最基层单位为亭，敦煌郡邮路所设的亭，简文中可查知其名者近60个。另有学者认为汉代邮驿系统中还有以传递重要和紧急文书为主的“骑置”，此为速度最快的一种传递方式，其地位介于置以下，一般设在两个置之间，骑置与骑置之间有亭。^[24]在全部的17914枚悬泉汉简释文中有13枚简提到“骑置”，其中效谷县有甘井骑置、遮要骑置、平望骑置、悬泉骑置共四个骑置，广至县有万年骑置等。骑置通常有吏1人、马3匹、驿骑3人。

24. 鱼离置

由上引II 0214③：154简知，鱼离置为邻近广至西边的一个置，该置亦应兼设骑置。由广至县城（踏实破城子）西去穿过榆林河洪积戈壁滩，约28公里（合汉67里）有一个泉水出露的小村子——老师兔，村西花岗岩剥蚀残丘上残存一座古城址，南北长33米，东西宽40米许，西、南二垣较完整，残高4~6米，残宽3.5米，东垣全部倾圮，北垣东段坍塌。东北角筑烽燧一座，残高10米许。城内散落碎陶片、砖块、铁片等汉唐时遗物。笔者考得该城在唐代为瓜沙二州间驿路上的黄谷驿，系当时一处十分重要的军防警讯之地，附近还有官马群的放牧。^[25]该城亦发现汉代遗物，无疑当为汉代始筑，汉鱼离置即应置于该城。老师兔村位处榆林河洪积冲积扇西缘泉水出露带上，其地泉流众多，水草丰茂，今有三个泉、五个泉、木头泉、直路泉等泉源，为行旅补给的理想之地，且众泉中皆有游鱼，这可能也是其得名的缘故。

25. 万年骑置

鱼离置西北行穿过芦草沟口，再沿截山子西去即为著名的悬泉置遗址。悬泉置东距鱼离置约31公里，合汉74里许，万年骑置即设于鱼离、悬泉二置之间。悬泉V1411②：55简载：“县泉置骑置，西到平望骑置五十里，东出广至万年骑置卅”。悬泉东去40汉里（合今约17公里）的万年

骑置，其位置正在今火焰山芦草沟出山口东侧，其地今存汉代城址一座，今名芦草沟古城。城垣已不完整，南北长约30米，东西宽近20米，夯筑，夯层厚8~12厘米，底部残宽2米许，顶宽1.2米。东开一门。城内偶见陶片碎块，瓜州县博物馆认定该城为汉代城址。城北里存古道遗迹，残宽3~4米，低于现代地面约0.8米。城南约120米的山坡台地上保存汉代烽燧一座，平面正方形，底部每边长约10米，残高近7米；夯土夹压红柳、芨芨筑成，每层厚8~12厘米，系典型的汉烽构筑形制。烽周散见绳纹、素面陶片。万年骑置故址当即该城。该骑置为广至县辖领，再往西即进入效谷县领地。该城向南穿过芦草沟口至鱼离置所在的老师兔城约14.5公里，合汉34里。I 0111②：24简载：“万年驿骑喜付县泉驿骑”。“驿骑”或作“译骑”，指传递文件人员的身份。此份文书由万年译骑传给县泉驿骑，传递方向是由东向西。II 0313②：52简载：“年七月癸巳日下铺县泉译骑充国受万年译骑傅”。悬泉译骑接受万年译骑的文书，其传递方向亦是由东向西。II 0114③：199简载：“敦煌太守上书一封，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七月丙辰……付广至万年译骑。”敦煌太守上书经由万年骑置传递，其方向自然是自西向东。

26. 悬泉置

悬泉置遗址西去今敦煌市城64公里，东去今瓜州县城60公里。遗址南依火焰山（该山东延即三危山），北邻北沙窝盐碱滩，座落在源于火焰山北麓的吊吊水沟口。1990年10月至1992年底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连续三年对其发掘，收获颇丰。该遗址包括坞院、灰区、马厩及附属建筑等，占地总面积22 500平方米。遗址西北角叠压魏晋时烽燧残迹，其下层为汉代建筑。坞院长宽各约50米，墙基宽1.5~2米，残高0.8米，土坯砌成，其东北和西南转角处筑角楼，院内共有房屋27间。出土物以大量简牍、陶片、麻纸、皮革、丝织品和马、牛、鸡等骨骼为主，最引人注目的是发现简牍35 000余枚，其中有字者23 000多枚、帛书10份、纸文书10张和泥墙题记1幅。简牍纪年最早为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最晚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8）。^[26]该遗址的发掘被评为1991年度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悬泉置其名得自悬泉水，该水又名贰师泉，《十三州志》《凉州异物志》《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以及敦煌文书P.3929《敦煌廿咏》、P.4792《两面杂书》、P.0788《沙州地志》、P.2691《沙州城土镜》、S.0367《沙州伊州地志》、S.5448《敦煌录》、P.2488《贰师泉赋》、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等都对其有载。如P.2005载：“悬泉水，右在州东一百卅里，出于石崖腹中，其泉傍出细流，一里许即绝。……侧出悬崖，故曰悬泉。”该水即今吊吊水，又名掉掉水，沟水自火焰山山崖间渗出，径流细弱，出山数百米后即全部渗入砾石戈壁中，“悬泉”“吊吊”之称可谓名副其实。别看该水细小，但对于行进在“路指三危迥，山连万里枯”“涸因胡商，枯山赤坂”之地，周围数十公里范围内别无水草补给的行旅来说，这股细小的泉流就成了“能令士马苏”的救命之水，悬泉置设于这里正当其地。

27. 平望骑置

上引V1411②：55简云，悬泉至平望骑置50里，合今约21公里。由吊吊水沟口沿火焰山北麓西行21公里处恰是今东水沟口。东水沟亦是从火焰山中流出的一股泉流，平均流量0.48立方米/秒，年出山径流量150万立方米，较吊吊沟水量大很多。该河出山后顺自然坡面流经11公里许至疙瘩井，其下游干河床可一直通往党河尾闾天然洼地——伊塘湖盐池。东水沟口亦是一处较重要的军事、交通要口，溯水沟南上，可穿越火焰山通往山南的东巴兔、浪柴沟等地。汉平望骑置设于该口不仅可得到水源补给保障，亦有军事方面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初，敦煌五墩乡农民在沟口建小水库一座，拦蓄沟水，开种土地上千亩。由于水流冲刷、自然风蚀和人为破坏，今天这里亦无遗迹可觅。II 0216②：341简载：“效谷平望骑置一所第四，马三匹，吏一人，小未傅三人。”知平望骑置为效谷县境内所置的第四所骑置，有吏1人和小未傅3人、马3匹。所谓“小未傅”即不够傅籍年龄者（依汉代傅籍制度，一般男子年龄在23~56岁间服兵

役)。V1612④：11AB载：“皇帝玺书一封赐敦煌大守，元平元年（前74）十一月癸丑夜几少时，县（悬）泉译骑得受万年译骑广宗到夜少半付平望译骑。”简中“大守”即“太守”。由于是皇帝赐给敦煌太守的玺书，其传递方向自然是由东向西，即万年骑置递给悬泉骑置，悬泉骑置再递给平望骑置。简中还明确规定了“得受”和“付”的时间，传递中不得违误。似此类文书传递的记录在悬泉简中还有不少，不再赘述。

28. 遮要置

遮要置同时并置骑置。V1812②：103简载：“效谷遮要骑置一所第三，马三匹，吏一人。”该骑置在效谷县境内排列第三。由上引悬泉简知，遮要置位于悬泉置和平望骑置以西。V1310③：135A简亦云：“遮要以东写传至临泉。”临泉即悬泉。但遮要与悬泉、平望间的距离简文缺载。考虑到这一带置、骑置间多相距40~50汉里，如悬泉置东到万年骑置40汉里，西到平望骑置50汉里，那么平望骑置到遮要置的距离大概亦可取此数。由平望骑置所在的东水沟口西行50汉里（合今约21公里），即今敦煌市莫高镇新店台村北1.5公里处，恰可找到一座汉唐时期的古城址，今名大疙瘩梁古城。残垣犹存，南北长65米，东西宽56米，墙基宽6米，残高2~3米，唯东北角最高，可达4米，似原筑有烽燧。西垣中段断缺，似为城门，宽7米。城址大小与汉唐时期置、驿的规模类似。城内发现灰陶片、碎砖块、瓦片等，多为唐代物品，亦可找到少许汉代的粗绳纹陶片等，该城应始建于汉，延续至唐。依其位置、规模、遗物等判断，该城即汉遮要置遗址。笔者还考得该城亦为唐代的东泉驿^[27]。大疙瘩梁古城位处敦煌绿洲东部边缘，位置重要。城址以东3公里许为伊塘湖、新店子湖一带，这里系党河、东水沟、西水沟（流经莫高窟前的宕泉河）三条河流洪积冲积扇交汇之处，地势低洼，又处扇缘泉线分布带，潜流每每出露，积水成泊。唐代称其为东泉泽。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载：东泉泽“在州东卅七里，泽内有泉，因以为号”。沙州故城东47唐里（约合今25公里）正是这一带。同时，唐代这里还有东盐池。P2005又载：“东盐池水，右在州东五十里，东西二百步，南北三里。其盐在水中自为块片，人就水里漉出爆干，并是颗盐，其味淡于河东盐，东印形相似。”今天这里仍为湖沼区域，面积达10平方千米许，湖沼中仍有泉和盐池，因其盐体结晶完整（“并是颗盐”），质量好，不仅仍为远近乡亲们食用，而且还开发成工业用盐。该古城因傍近湖沼，地下水位较高，各种杂草生长良好，水源取用方便，城址则筑于一高起的台地（即大疙瘩梁）上。

29. 甘井骑置

II 0115③：32载：“效谷甘井骑置一所第二，马三匹，吏一人，小未傅三人。”甘井骑置在效谷县境内排列第二，其人员、马匹配置亦与其它骑置同。汉敦煌郡效谷县城笔者考得即今敦煌市郭家堡乡墩湾村北的墩墩湾古城，^[28]其西南距敦煌市城17公里，该县管辖敦煌党河下游绿洲东部、东北部一带，甘井骑置当在其辖境内。由简文可见，甘井骑置与遮要置、玉门都尉等联系频繁。II 0214②：239A载：“入东军书一封，玉门都尉上，建平三年（前4）四月己未夜食时，遮要厩吏并受甘井驿苏利。”II 0214②：266A又云：“入东军书一封，玉门都尉上，建平三年四月癸卯定昏时，遮要驿吏并受甘井驿音。”II 0214②：267A也有云：“入东军一封，使者解君上，建平三年闰月己癸鸡中鸣时，遮要驿吏并受甘井驿吏音。”以上三简标明为“入东军书”，即向东递送的军情文书，其中两封为来自玉门都尉的“上书”。一般认为玉门都尉府治即今敦煌市城西北约90公里的小方盘城。这些文书均为遮要驿吏或厩吏“受”甘井驿吏之递，即经由甘井传至遮要，表明甘井位于遮要之西；同时甘井骑置又要接收来自玉门都尉的军书，说明该骑置又位于玉门都尉之南或东南。II 0214②：268记载：“平三年四月癸未桑树时，遮要驿吏并受甘井驿吏音”。亦表明甘井在遮要之西。甘井骑置还充当敦煌太守府与玉门都尉、中部都尉间的重要联系站点。V1210③：9A云：“出北书一封，大守章诣都尉府，七月壬申夜食时，甘井卒充付都尉卒安。”V1210③：10A云：“出北檄一，

大守章诣都尉府，七月己巳平旦时，甘井卒充受鄯门卒忠。”V 1210③：95云：“亥时下舖时，甘井卒充受鄯门卒安。”太守无疑指敦煌郡太守，都尉府则可能指玉门都尉府，抑或中部都尉府。笔者考得中部都尉府即今西碱墩（T24），为一座周长约130米的郭城，位处敦煌国营农场场部东北6公里、党河汇入疏勒河河口东南13公里处。从敦煌郡发往北部军防一线的“北书”“北檄”亦须经由甘井骑置传递。可见这条以东西方向为主的驿道中，又分出一条敦煌北通北部军防一线的路线。至于“鄯门”所指，上引9A简记为“付鄯门卒”，应指玉门都尉府或中部都尉府的鄯门；而10A、95两简皆云“受鄯门卒”，则该鄯门当指敦煌太守府的鄯门。那么位于遮要置之西、玉门都尉以南或东南、敦煌城以北的效谷县甘井骑置，究竟位于何处？笔者注意到，在今转渠口镇戴家墩村六队残存一座汉唐时的古城址，名戴家墩古城。其墙垣破损严重，仅余颓基，夯筑，南北长114米，东西宽93米，墙基坍塌约10米，残高0.6~1.1米。四角向外突出，应为角墩残迹，唯西北角墩稍完整。南垣中部缺失，似为城门所在。城中偶见灰色绳纹、素面陶片及红色细绳纹薄胎陶片等物。因其地处党河尾闾，地下水水位较高，城周一带多有草甸、盐碱滩分布。曾有学者认为该城为汉效谷县城，其实该城的规模远较汉代县城为小，其位置又与史料所记汉效谷县的方位、距离不符，不可能为汉效谷县城。戴家墩古城位于大疙瘩梁古城（遮要置）东北18公里（合汉42里）处，恰与这一带置、骑置间通常的距离吻合；南（略偏西）距汉敦煌郡城（沙州故城）亦约18公里，北距西碱墩（中部都尉府）14公里（合汉33里），西（略偏北）距小方盘城（玉门都尉府）约70公里，这一位置正符合甘井骑置的位置，因而戴家墩古城应为汉甘井骑置。

30. 敦煌郡城

学界公认汉敦煌郡城即今敦煌市城西、党河西岸的古城址，名敦煌故城或沙州故城。今存南、北、西三面断续残垣，南北长1132米，东西宽718米，墙基宽6~8米，残高4米许。四角筑角墩，唯西北角墩特别高大，今仍高16米。由敦煌郡城东去遮要置（大疙瘩梁古城）21公里（合汉49里），北去甘井骑置（戴家墩古城）18公里（合汉42里），西去汉龙勒县城（亦设龙勒置，今南湖破城）约70公里，经由甘井骑置西北去玉门都尉府约90公里。

四、敦煌往西域南北二道

敦煌，位居河西走廊西端，地当西域门户，为西出西域古道上无可替代的咽喉枢纽。东汉应劭解释“敦煌”二字：“敦，大也；煌，盛也。”唐人李吉甫又云：“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敦煌得名的本身，即寓有开辟西域交通之意。南朝刘昭注《后汉书》中引《耆旧志》云：敦煌“国当乾位，地列艮虚，水有县泉之神，山有鸣沙之异，川无蛇虺，泽无兕虎，华戎所交，一都会也。”汉唐丝绸之路的兴盛，使敦煌成为中国历史上率先向西方开放的地区，成为中原与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吐纳口。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融汇聚，西传东渐，使其可以长时期地吸收、汲取这条道路上荟萃的各种文明成果来滋养自己，促进自身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闻名于世的敦煌莫高窟就是丝绸路上的一处光辉的历史足迹。著名学者季羨林教授曾论道：“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诚如其言，敦煌堪称具有国际意义的文化汇流之地。

《汉书·西域传》记，西域“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当时中原出西域的南北两道，分别经由敦煌的阳关、玉门关前往，是故两关在中西交通

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依《汉书·地理志》载，阳关、玉门关均位于敦煌郡龙勒县境，“皆都尉治”，它们雄踞丝绸之路大道，一南一北，控扼西域门户。

1. 玉门关

玉门关，约设于武帝元封四年（前107）“酒泉列亭障至玉门”之际。已如前述，笔者考得汉代最早的玉门关在今嘉峪关市石关峡，约太初年间李广利伐大宛后移至敦煌西北。至于敦煌西北汉玉门关的位置历来看法不尽一致，或指认今小方盘城，或认为应在小方盘城以西约11公里的马圈湾西，或认为应在小方盘城西侧150米处的南北长城线上。近年敦煌市博物馆又在小方盘城外西侧、南侧的灰堆中发现300多枚汉简，简文中记有“玉门置”“玉置”，表明小方盘城亦为玉门置，则敦煌郡境内应设9个置，与悬泉简中“九置”记载合。同时在小方盘城正东115米处发现残存的南北走向坞墙，长75米，宽2~3米，残高30~50厘米；坞墙北端向西北延伸18米，南端亦向西延伸；城北50米处又有东西走向的坞墙，长40米；可见小方盘城周围尚有一个外城，^[29]外城大体方形，每边长约80米。笔者认为小方盘城为玉门都尉府所在，玉门关应位于其西侧，或在其西150米处长城线上。从敦煌故城北出，沿党河干流西岸而行，至戴家墩古城（甘井骑置）18公里（合汉42里），再北行14公里（合汉33里）可抵西碱墩（中部都尉府），折为向西沿疏勒河南岸行进，经大月牙湖、东园湖、酥油兔、波罗湖、条湖、大方盘城（汉代粮仓）抵达小方盘城；亦可不经过中部都尉府，从戴家墩古城径取西北，经盐池、平湖、麻黄滩、七流水而至大月牙湖，与前道合。由此继续西行出玉门关，踏上前往西域的北路。

2. 阳关

阳关，约与玉门关同期而设，亦置于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左右。饱经历史的风风雨雨，阳关故址早已损毁无存。古阳关究竟在哪里？多年来不断有人对其调查探讨。《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旧唐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和《舆地广记》均谓，阳关在唐沙州寿昌县（汉龙勒县）西6里。其废址犹存，即今敦煌市城西南62公里的南湖乡南湖破城。南湖是河西走廊最西的一块绿洲，面积仅约100平方千米许。P.5034《唐沙州图经·卷五》《新唐书·卷四三》引贾耽《四夷道里记》则记，阳关在寿昌县西10里，较前云6里稍远，当取其约数而言。

敦煌南湖乡寿昌故城西6里、以至10里的地方，正是今古董滩。学者们曾于此多次查找，始终未能找到至今仍墙垣耸立的城址，但也并非一无所获。早在1972年酒泉地区文物普查队于古董滩第14道沙梁（新月形沙丘链，由东往西数）后发现成片夯筑墙基遗址，附近还有断续宽厚的垣基，面积约上万平方米。笔者于2000年8月19日，在距今绿洲西缘（南工村四组西）约1公里许，亦找到了一处墙垣遗迹分布较集中的地方。其地位于两道新月形沙丘链间，丘间地宽50米许，共残留大致呈东西方向的夯土垣基10条。其中6条垣基较完整，贯通于两侧沙丘间，4条垣基西端残断，长不足20米。垣基高出风蚀地面仅20~30厘米，残宽30~45厘米，每条垣基之间宽2.2~3米。其地南北向墙基不明显，当因其冲着主风向而被风蚀殆尽。这里应是一处大型的院落遗址。可见古董滩上墙垣遗迹集中分布的区域并不止一处，阳关古址即应位于其中一处。

由敦煌市城西出，沿党河（汉氏置水）北岸西南行，经党河总分水闸、南湖店至党河大拐弯处，继续西南行即可达南湖破城。该城与敦煌故城相距60公里（鸟道），合汉里约140里，距离较远，其间肯定还应有邮驿机构（驿、骑置或亭）之设，只是因史料缺失，详情不明。估计今党河总分水闸口应设有相应站点，这里位处敦煌绿洲最西端，与绿洲最东端的遮要置遥相对应，位置亦很重要；其东距敦煌故城15公里，合汉35里；据P.2005等敦煌遗书记载，唐代此处称作马圈口，为当时敦煌迎送贵宾、举行赛神等活动的重要场所，汉代这里亦应为重要站点。

由党河总分水闸口向西又15公里为南湖店，该店始设于清代，直到20世纪60年代，一直为前往南湖及其以远的行旅提供吃住之所，想必汉代这里亦为重要站点。南湖店东距敦煌故城30公里，合汉70里，恰位于敦煌故城与南湖破城的中间，70里也正好是一般行旅一天的行

程，恰可在这里得到休整补充。由敦煌文书知，唐五代时这里设有破羌亭，传说该亭即为汉代辛武贤所筑。P.0788《沙州地志》载：“破羌亭，（寿昌）县东六十五里。云汉破羌将军辛武贤破羌戎，于此筑亭，故曰破羌亭。”P.2691《沙州城土镜》《寿昌县地境》等亦有相似记载。寿昌县城东65里处正是今南湖店。同时这里还有一处重要的石窟群——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千佛洞，洞窟开凿在党河北岸崖岸上，始建年代不详，今存北魏至元代洞窟19窟。该石窟群的建造无疑亦与这里重要的交通位置有关。由南湖店再向西南约30公里即可到达汉龙勒县城。

汉龙勒县，唐代改称寿昌县，今南湖破城，位于南湖乡北工村一队，已十分残破，多被流动沙丘埋压。东西北三面仅存断续墙垣，南垣仅见墙基，南北长270米，东西宽300米许，总面积83 500平方米。城内城周散落大量陶片、砖块、箭镞、石磨残块、断珠、黑白棋子、铜饰残件等汉唐遗物。由该城向西约5公里即为阳关遗址所在。由此西出，即踏上前往西域的大道，是为西域南道。P.5034《沙州地志》记石城镇（今新疆若羌县）通往各地的六条道路，其中“一道南路，从镇东去沙州一千五里，其路由古阳关向沙州，多缘险隘，泉有八所，皆有草。道险不得夜行，春秋二时雪潦，道闭不通。”

五、谷水（石羊河干流）段

汉代河西交通，除东西走向的主方向外，还有两条重要的南北向通道，即谷水段和弱水段。河西北邻匈奴，南毗诸羌，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绿洲河流沿岸水草地带和山区大河谷地往往成为民族往来、交易的主要通道，也是游牧民族前来骚扰的孔道。因而这些通道的交通、军事意义确很重要。早在太初元年（前104）汉军伐大宛时，为防备匈奴乘隙而入，确保后方安全，即分别在弱水下游和谷水中游以北置居延、休屠以为屏卫。^[30]太初四年（前101）又在谷水下游置武威县，“武威县、张掖日勒皆当北塞，有通谷水草”，^[31]其军事、交通地位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谷水段南起汉武威郡治姑臧，沿谷水北行，经休屠、宣威、武威三县，通往漠南、漠北。姑臧一地，不仅有南北二道通往长安，而且还可沿谷水北去，诚为汉代河西东部的丝路枢纽重镇。

1. 休屠县

据《水经注·卷四十》载：流经姑臧武始泽的泽水（即谷水），又“东北流，径马城东，城即休屠县之故城也”，表明休屠县故城位于姑臧城东北、谷水西岸。《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载：“休屠城在（姑臧）县北六十里，汉休屠县也。”1唐里约为今540米，60里合今32公里有奇。今武威市城北（稍偏东）32公里处的四坝乡三岔村恰有一座古城遗址，名三岔古城。其墙垣多已倾圮，墙基仅存三段，残高2米许；城址范围南北长400米，东西宽200米许（步测）。城中曾掘出陶器、铜器、汉代钱币等物。笔者考得该城即汉休屠县城。^[32]休屠位处石羊河中游平原北部，径流丰盈，田土肥沃，自有立县建城的良好条件，且又控扼河谷通道，正由于其交通、军事地位的重要，汉代于此城设北部都尉，管辖这一带的塞防、军务。《汉书·地理志》云：“北部都尉治休屠城。”居延破城子出土42.6A简留有武威北部都尉“行塞”的记录。笔者曾在这一带发现汉长城遗迹。

2. 宣威县

由休屠县故址循石羊河干流北去，洪水河从东岸注入，接着穿过红崖山口，即进入其下游平原。汉代在下游平原沿河南北依次设有宣威、武威二县。据《水经注·卷四十》载，长泉水（今洪水河）东北注入马城河（石羊河）后，马城河“又东北径宣威县故城南……又东北径武威县故城东。”这座位于马城河岸边的宣威县故城，乾隆《甘肃通志·卷二十三》、

道光《镇番县志》等皆认为即是唐代的明威戍。《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与《新唐书·地理志》皆曰，明威戍在姑臧北180里。依此方位里距寻之，今武威城北180里许，即民勤县大坝乡文一农科队北部灌丛沙堆中恰可找到一座汉唐古城址，笔者将其命名为文一古城。古城甚为残破，墙垣大段坍塌成垄状，唯北墙被修筑明长城时所利用，保存较好。南北长250米，东西宽280米，基宽约6米。城内城周大量散落灰陶片、红陶片、碎砖块、残铁片等汉唐时遗物，亦见明代的青瓷片等。该城即汉宣威县城。

3. 武威县

《汉书·地理志》中曰：“武威，休屠泽在东北，古文以为猪野泽”；又曰，“谷水北至武威入海，行七百九十里”。谷水所入的海即其终闾湖—休屠泽（猪野泽）。可见汉武威县位于谷水终闾湖西南。《水经注·卷四十》：“都（猪）野泽在武威县东北，县在姑臧城北三百里，东北即休屠泽也。”汉魏时的300里约合今125~130公里。即在今石羊河下游绿洲民勤县泉山镇西北约10公里的沙漠中可找到一座被称为连城的古城址，其大部墙段被沙丘埋压，但轮廓仍十分清晰，南北约长420米，东西宽370米，夯土版筑，残高一般2~3米，最高6米。四壁各筑马面2座，西、南二垣各开1门，门阔10米许，均设瓮城。城址及周围地面暴露大量灰陶片、红陶片、蓝釉硬陶片、碎砖块、石磨残块等物。城内西门南侧铜甲、铁甲残片、铁箭头等物甚多，似为兵器库。城内东部铜质残渣集中，似铜器作坊。西南隅玛瑙碎片较多，似玛瑙作坊。城中还出土五铢、开元通宝币等。连城遗址位于今武威城北（略偏东）127公里许，恰与《水经注》所记300里吻合，且正处于古休屠泽西南，城址大小又符合汉唐县城的一般规模，并保留有汉唐遗物，因而连城当为汉武威县城。

4. 三角城

由连城遗址继续沿石羊河北去，约9公里处又有一座汉代的城障遗址，名三角城，其南（略偏西）距民勤县城50公里许。整座城址筑于一座高8.5米的夯土台基上，台之东北部倾塌，使城垣看上去略呈三角形，该城因名之三角城。城垣东西长约180米，南北宽近100米，已大段倒塌，存者不足三分之一，残墙高出台面2~4米。城内及周围散落大量灰陶片（绳纹的居多）、红陶片、碎砖瓦等，多系汉代遗物，城中还曾发现汉五铢钱、漆木片、铜镞等物。三角城为谷水绿洲最北部的城垣遗址，正当防范匈奴之前哨，其地位的重要不言而喻。

三角城再往北数公里，即进入石羊河终闾湖区，由此再向北穿过茫茫沙区可与蒙古高原腹地连通；或由石羊河终闾湖区趋向东北，到达宁夏平原、河套平原等地。

六、弱水（黑河）段

弱水河谷，又为河西走廊通往蒙古高原腹地的一条要径。如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夏霍去病率军再征匈奴，出北地，“涉钩翥，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麟得”^[33]。其进军路线即由今庆阳西北一带出发，绕行至黑河下游居延地区，再沿河挥师南下，直捣祁连山下匈奴腹地，出奇制胜。又如昭帝元凤三年（前78）春正月，匈奴右贤王、犁汗王四千骑循黑河河谷南来，分三队入日勒、屋兰、番和三县，汉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大破之。^[34]汉代沿黑河河岸由南而北设有会水县、肩水都尉府、金关、悬索关、居延县城及居延都尉府，并在一些重要地段筑有长城护卫。

1. 会水县

由前考汉张掖郡昭武县（一度做过郡治）沿黑河北去，穿过今正义峡可进入黑河下游。然而此峡曲折陡峭，很不便行走。故而前去黑河下游多由酒泉而往。从酒泉出发，沿北大河（汉呼蚕水，黑河支流）东去，经汉绥弥县城（前考临水古城）折而东北行，穿过夹山子即进入该

河下游，汉会水县即位于这里。据《汉书·地理志》酒泉郡会水县条记载：“呼蚕水出南羌中，东北至会水入羌谷”，说明北大河（呼蚕水）汇入黑河（羌谷水）一带为汉代会水县之地。笔者考得汉会水县城即今金塔县东沙窝中的西古城。^[35]该城位于金塔乡五星二社西部，西南距金塔县城11公里。全城分作东西二城，西城南北80长米，东西宽90米；东城南北长80米，东西宽110米；全城总面积16 000（80米×200米）平方米。墙垣多已倾圮，残高1.5~3米许，许多地段仅见残基。北垣部分墙体被红柳沙堆壅压，城西、城北亦有沙堆侵入。城内及城周仍可找到汉代灰陶片、红陶片、碎砖块等物，亦见后代的陶片、瓷片等。

2. 肩水都尉府

由汉会水县城继续沿北大河东北行约65公里，即今金塔县鼎新镇营盘村附近，北大河注入黑河干流。复沿黑河河岸继续东北行约28公里，有一座今名大湾的古城遗址，此即肩水都尉府城。大湾城位处黑河东岸，南北长350米，东西宽250米，由外城、内城和障三部分组成。外城西垣已塌，北、南二垣仅见部分墙段，唯东垣较完整，残高2~3米。东南隅存烽台一座，残高10米。内城位处外城东北部，残高1.5~2米。障位于内城西北部，南北长90米，东西宽70米，高8.5米。全城出土汉简1500余枚。

3. 金关

由肩水都尉府城继续沿黑河东北行约15公里（合汉35里），有一座今名地湾城的古城址。其平面为正方形，每边约100米，曾出土汉简2000余枚，由简文知该城为肩水都尉府所辖的肩水候官城。该城以北600米许即为金关遗址。金关由关门、坞和烽燧几部分组成，坞在关门内西南侧，坞墙北长36.5米，南长35.5米，东残长24米，残高0.7米，坞内有房宅、马厩残址。坞西南角残存烽燧和方堡，堡内有居室、灶房、仓房和院落。金关先后共出土汉简12 000多枚、实物1300多件。据其所出简文确知此处即金关，又名通道厩。诚如其名，金关正位处在黑河东岸交通大道上，并仍存厩圈遗迹。金关以南还筑有两道汉长城夹黑河东西两岸延伸，两道长城分别自张掖郡北部和酒泉郡北部延伸而来，交汇于金关，金关再向北沿黑河至布肯托尼（汉悬索关）长约130公里内无塞墙遗迹，仅有烽燧罗置。因而金关地当张掖、酒泉北通居延以至漠南、漠北的咽喉门户，取名金关，当含有“固若金汤”之意。

4. 悬索关

悬索关位于金关以北约130公里的黑河东岸今额济纳旗布肯托尼，地当拱卫黑河下游居延绿洲东、北、西三面塞垣的南端点，诚为居延绿洲的南部门户。金关、悬索关遥遥相望，二关之间一河孤悬，烽燧连绵，形势险峻，为兵家必争要地，又是古居延绿洲的命脉所系。关名取为悬索，可谓名副其实。关城遗址今已无存，极有可能被沙丘埋压。

5. 居延县

《汉书·地理志》载：“居延，居延泽在东北，古文以为流沙。”所谓“古文”，指《尚书·禹贡》“道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与流沙”的记载。合黎即今河西北部的合黎山，流沙即指黑河尾间今巴丹吉林沙漠一带。笔者考得古居延泽即今已干涸的黑河终间湖泊京斯图诺尔和天鹅湖等处遗迹，面积约800平方千米；古居延泽西南的居延县城即今位于额济纳旗城东南34公里、黑城遗址东略偏南14公里处的绿城遗址。该城多半坍塌损毁，平面略呈椭圆形，周长1205米，墙基残宽3.5米，残高最高2米。北垣东部开门，有瓮城。城内遗存丰富，多为汉晋时遗物。绿城地处居延古绿洲腹地，其周围垦区范围广大，渠道遗迹密集，房宅、寺庙、佛塔、烽燧、墓葬、砖窑等连片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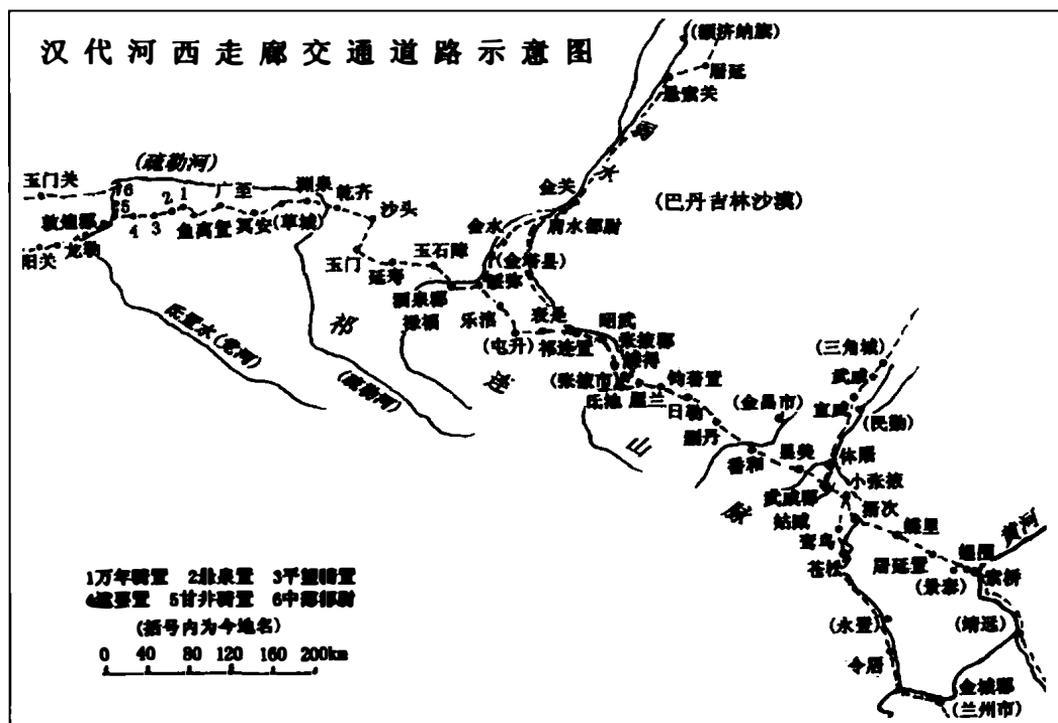
6. 居延都尉府

笔者实地查得，居延古绿洲范围约1200平方千米，古绿洲内古城址、遗址众多，位于绿城以北略偏东17.5公里处的K710城应为居延都尉府城。^[36]城略呈方形，南北二垣均长110米，东

垣长131米，西垣长133米，墙体遭受严重风蚀和自然风化，残高0.5~1.2米，城内散落大量汉代砖块、陶片、石磨残块等物。

由K710城北去约45公里，经黑河下游西侧支流终闾湖索果诺尔，再往北即可通向蒙古高原腹地。

汉代河西交通道路，为汉王室经营西域的极为重要的大通道，也是发展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大动脉。这条道路自汉代形成后，基本上为后代所沿袭，变化不大。只是西出敦煌玉门关、阳关前往西域的道路各代不尽相同，如汉代敦煌往西域的南北二道曹魏时增为三道，以后各代亦多取三道。《三国志·魏书》中引《魏略·西戎传》：“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即新增敦煌径通高昌（今吐鲁番）、以至龟兹（今库车）以远的新北道。隋代裴矩的《西域图记》中记赴西域有北、中、南三道，但无论哪一道都“发自敦煌”“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于敦煌遗文及有关史料见，唐代以敦煌为中心即辟有7条道路（详见拙作《唐代河西走廊交通道路考》）。由于出玉门关、阳关已进入西域，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从略。



汉代河西走廊交通道路示意图

注释

- [1]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简史》（第一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8~10页。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11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324~326页。
- [3]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396页。
- [4]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文物》2000年5期，33页；又见于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56页。本文引用悬泉简文皆见于以上二著，以下不再一一出注。
- [5] 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
- [6] 李并成：《西汉武威郡诸县城址的调查与考证》，《历史地理》第1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308页。
- [7] 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46~48页。
- [8] 李并成：《晋河会城、缠缩城、清塞城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2期，176~177页。
- [9] 李并成：《汉令居城及其附近汉长城遗迹的调查与考证》，《长城学刊》1991年1期，23~30页。
- [10] 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75~76页。
- [11] 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年，47~54页。
- [12] 笔者曾据多年来田野考察总结出，汉代河西县城一般周长在1000~1500米；城址规模是确定城市等级、判断城址性质的重要依据。参见拙著《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150~151页。
- [13] 李并成：《甘肃省高台县骆驼城遗址新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1期，108~112页。
- [14] 李并成：《西汉酒泉郡若干县城的调查与考证》，《西北史地》1991年3期，71~76页。
- [15] 李并成：《西汉酒泉郡池头、绥弥、乾齐三县城址考》，《西北史地》1995年3期，7~11页。
- [16] 李并成：《石峡关：最早的玉门关与最晚的玉门关》，《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2期，120~125页。
- [17] 李并成：《东汉酒泉郡延寿县城考》，《西北史地》1996年4期，30~32页。
- [18] 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94~96页。
- [19] 李并成：《西汉酒泉郡池头、绥弥、乾齐三县城址考》，《西北史地》1995年3期，7~11页。
- [20] 李并成：《汉敦煌郡冥安、渊泉二县城址考》，《社科纵横》1991年2期，50~53页。
- [21] 李并成：《汉敦煌郡冥安县城再考》，《敦煌研究》1997年2期，41~44页。
- [22] 李并成：《锁阳城遗址及其古垦区沙漠化过程考证》，《中国沙漠》1991年2期，20~26页。
- [23] 李并成：《汉敦煌郡广至县城及其有关问题考》，《敦煌研究》1991年4期，81~88页。
- [24] 张经久、张俊民：《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骑置”简》，《敦煌学辑刊》2008年2期，59~73页。
- [25] 李并成：《唐代瓜沙二州间驿站考》，《历史地理》第1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93~101页。
- [26]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5期，4~20页。
- [27] 李并成：《唐代瓜沙二州间驿站考》，《历史地理》第1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93~101页。
- [28] 李并成：《汉敦煌郡效谷县城考》，《敦煌学辑刊》1991年1期，57~62页。
- [29] 李岩云、傅立诚：《汉代玉门关址考》，《敦煌研究》2006年4期，67~71页。
- [30] 《史记·大宛列传》。
- [31] 《汉书·赵充国传》。
- [32] 李并成：《西汉武威郡诸县城址的调查与考证》，《历史地理》第1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304页。
- [33] 《汉书·霍去病传》。
- [34] 《汉书·匈奴传》。
- [35] 李并成：《西汉酒泉郡若干县城的调查与考证》，《西北史地》1991年3期，71~76页。

- [36] 李并成：《汉悬索关考》，《敦煌研究》2004年4期，85-87页。
- [37] 李并成：《汉居延县城新考》，《考古》1998年5期，82-85页。
- [38] 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年，32-47页。

唐代河西走廊
交通道路考察

河西走廊，因位于黄河之西，且又夹处在青藏高原北缘的祁连山脉与蒙古高原南缘隆起的走廊北山之间，形成了一条长1000余公里、宽达数十至百余公里的狭长地带，形似走廊而得名。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与周围地理环境的特定关系，这条走廊历史上曾是中原通往西域、中亚、西亚以至非、欧的必经孔道，是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干线路段之一。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流荟萃，民族交往十分频繁，同时又是屏蔽关陇的门户和中原王朝势力强盛之时所锐意经营的西进道路上的重要中继站，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均开创了前所未有的盛大局面。为了维系大一统国家的正常运转，保证中央王朝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有效的统治，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庞大的交通通讯路网，构建了高速高效的馆驿系统。而对于位处丝绸之路干线和战略要地的河西走廊，其交通道路的辟建更是规模空前，令人称道。

一、横贯走廊的东西交通大道

横贯河西走廊的东西大道，为唐代通往西域、中亚的主干线，其关乎唐代政治、外交、军事进退，以及国际贸易、文化交流诸方面。有关该道的走向、馆驿设置等问题，不少学者曾有论及。尤应提到是我国台湾学者严耕望先生所撰的《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1]，对其作了颇为系统翔实的考证，实足称道。但美中不足的是，严先生未经实地踏查，所用地形图又系民国时的旧本，因而难免有所疏误。笔者参照严先生所考路线，并结合自己多年来在河西实地考察、史地考证等方面工作，对这条道路考论如下。

严先生首先考察了凉州以东的交通路线。《通典·卷七》述开元时国内交通状况：“东至宋（今河南商丘）、汴（今开封），西至岐州（今陕西凤翔），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饌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今湖北江陵）、襄（今湖北襄阳），北至太原、范阳（今北京），西至蜀川、凉府（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

寸刃。”足见其时交通之盛。河西节度治所凉州，为自陇以西最重要之政治军事商业交通中心。凉州东南至长安，或取兰州，或取会州（今靖远黄河东岸）而往，有南北两道。《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凉州条记载：“东北至上都，取秦州路二千里，取皋兰路一千六十里。”“北”为“南”之讹。取秦州路者，经兰、临（今临洮）、渭（今陇西）、秦（今天水）、陇（今陕西陇县）五州及凤翔府（今凤翔），而至长安，计程2000里。“皋”为“乌”之讹，里数亦夺误。乌兰路者，乌兰县置乌兰关，与会宁关西东对夹黄河，具舟50艘待行旅，为西北极大津渡处，故应名乌兰路。路经乌兰关及会（今靖远北陡城堡地区）、原（今固原）、泾（今泾川）、邠（今彬县）四州至长安，行程约1800里，非1060里。两道皆置驿。

严先生考证南道驿程：发长安都亭驿西出开远门，经临皋驿、望贤宫、咸阳县、温泉驿、始平县、马巍驿、望苑驿、武功县、扶风县、龙尾驿、岐山县、横水驿、岐州至凤翔府治所雍县。凤翔府为京西重镇，府南有驿道通汉中与剑南，府西有驿道通秦州、凉州至安西。凤翔又西经汧阳县（今千阳县），西循汧水河谷而上至陇州治所汧源县（今陇县）；又西经安戎关、大震关，越小陇山分水岭，西经弓川寨、清水县，至秦州治所上邽县（今天水），馆驿甚宏壮。自陇州以西过大震关越分水岭道，古称陇坻大坂道，盛唐时西出陇右者取此道为多。秦州向西略循渭水而上，经伏羌县（今甘谷）、洛门川、陇西县、渭州治所襄武县、渭源县，西北至临州、临洮军治所狄道县（今临洮）。由此北行，略沿洮水河谷而下，经长城堡，越沃干岭，折入阿干河谷，而北至兰州治所五泉县。又北渡河出金城关，正北微西略循逆水河谷（今庄浪河）而上，行220里至广武县（今永登南），又约200里至昌松县（今古浪西），又西北越洪池岭，凡120里至凉州治所姑臧县（今武威）。兰、凉间凡置20驿，皆无考，而沿途汉晋以来故城堡则颇多可指。

严先生这里有一处疏误。先生据《通鉴》胡注、《读史方輿纪要》《大清一统志》等所记“姑臧东南有洪池岭”，认为该岭在武威东南、古浪县以北。事实上古浪县以北即进入走廊平原地带，古浪与武威之间平原坦荡，并无山岭。笔者考得，洪池岭即今乌鞘岭^[2]。该岭位于今武威市东南约85公里、古浪县南30公里；西接祁连山，余脉向东延至景泰县境；东西横亘，屏蔽天成，为黄河流域与内陆河流域的分水岭；雄据河西走廊东端，控扼我国东南半壁通往西北半壁的襟喉之地，历来被称作古丝路大通道上的“金关铁锁”，军事、交通地位十分重要。

严先生接着考证了北道（乌兰道）驿程：由长安西北行亦经临皋驿、咸阳县驿，又经醴泉县，至奉天县（今乾县东）。奉天当西北通道之要，唐代中叶西北有事常置重兵于此。由奉天北出，经永寿县、麻亭驿、新平县，又西北循泾水河谷上行，经薰邱堡、宜禄县（今长武），折而西行经长武城、泾州治所安定县、连云堡、阴盘县，至平凉县旧治阳音川。又西北行经胡谷堡，入弹箜峡，经瓦亭故关，向西南逾陇山关即六盘关，西北行经汉萧关故地，至原州治所平高县（今固原）。由原州西北行经石门关、河池，至黄河东岸的会州治所会宁县（今陡城堡），再略沿黄河东岸西北行180里至会宁关，此关为开元13中关之一。渡河而西至乌兰关，为乌兰县治，此为西域大道之重要关津。元和中吐蕃建乌兰桥于河上，李益诗有乌兰戍，均疑此处。

严先生所考会宁关、乌兰关之位置，正是今夹峙黄河东西岸的靖远县哈思堡、景泰县索桥堡一带地方。笔者由居延新简EPT59:582等史料所记有关里程考出，早在西汉时期长安通往河西、西域交通大道的北线就于此处渡河。^[3]这里河床不宽，水流较平稳，两岸虽群峰陡立，但均有沟谷可做通道。东岸通道为小口子，西岸通道为大沙沟。延及唐代亦为重要津渡。敦煌文书开元《水部式》（P.2507）记载：“会宁关有船五十只，宜令所官差强了官检校，著兵防守，勿令北岸停泊。自余缘河堪渡处，亦委所在州军严加捉搦。”《唐六典·卷七》“水部郎中”条记载：“其大津无梁，皆给船人，量其大小难易，以定其差等。”其中会宁、龙门、合河三关各置船3艘，船数仅次于白马津和渭水冯馮渡各4艘，而其余各津船均只一二艘。渡子之数，“会宁船别五人”，仅次于蕲州江津等3渡口船别6人，其余津渡则船别三四人。《唐

六典》所载会宁关船数与《水部式》大异，恐因二书反映的时期不同所致。即依《唐六典》所记已可知会宁关天津在诸天津中之地位。若依每舟渡子3~5人计，则《水部式》代表之时期该天津渡子可达250人之多，每日所渡行旅起码在千人以上，盛况的确非同一般。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此河段上又置设索桥（草绳系船成桥），四十二年（1614）在河西大沙沟口建索桥堡。今成废墟，地基、断墙皆石板垒砌，街道、院落门户轮廓依稀可辨。

渡河后由乌兰又西20里至新泉军，统兵7000人，为边防大军之一，盖为镇护天津而设。新泉又西北400里亦至凉州治所姑臧县（今武威）。北道较之南道路途缩短200里，但平凉以西段较险峻。南道虽迂，但较平坦，且沿途较富庶。故唐人行旅似取南道者为多。凉州为唐代西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极为繁荣。由此西行5000里即达唐安西都护府（今库车），为当时中央政府控制西域之总部。其间通道为当时国际交通之第一重要路线，全程皆置驿。

严先生又考得，由凉州西北行180里至天宝县（今永昌西），又西北越删丹岭，西经汉日勒故城，凡200里至删丹县（今山丹）。又西120里至甘州治所张掖县。甘州南经大斗拔谷通鄯州，可至吐蕃，北达居延至回鹘衙帐，为河西重镇之一，刺史兼充河西节度副使，且置张掖守捉，管兵6500人。又西行190里至建康军，管兵5200人，或以甘州刺史兼充使职。又西道出崆峒山北，盐池（今明海湖）之南，110里至福祿县（盖今新桥堡、龙兴关地区），又西北100里至肃州治所酒泉县。又由甘州略循弱水即张掖河西行300余里至福祿县界之盐池烽，盖在盐池之东，又西230余里亦至肃州。《释迦方志》云，肃州西少北75里至故玉门关，关在南北山间，约在今嘉峪关西至黑山下。又西约120里至玉门县（今县东颇远，盖赤金峡、赤金堡地区），唐代前期设玉门军，以肃州刺使兼领，管兵5200人。五代时置玉门关。又西经沙头故城（今玉门县西），约300里至瓜州，盖今苦峪城，俗名锁阳城，亦可能在布隆吉城。唐初玉门关在州西北50里之瓠河（今疏勒河或窟窿河）上，后迁至瓜州城近处。瓜州置墨离军，统兵5000人，称为四镇之东门，例以刺史充使，盖在瓜州城或西北不远处。又西300里至沙州（今敦煌）。

严先生所论上述途经地点，笔者曾反复实地踏勘，对其均有考证。考得唐天宝县即位于今永昌县西12公里的焦家庄乡水磨关西塞古城，^[4]汉日勒故城（日勒都尉府城）即今山丹县峡口古城洼古城，唐建康军城即今高台县西略偏南21公里处的骆驼城；^[5]盐池并非严先生所指明海湖（该湖非咸水湖），而应是高台县城西北约60公里的盐池乡北之盐池。自汉迄清，张掖西出傍黑河行至高台县罗城乡附近折而向西，经盐池、双井子、临水而至酒泉，始终为一条交通大道。^[6]唐福祿县（应为禄福县）本汉乐涪县，即今酒泉市东南50公里下河清乡皇城古城。^[7]《释迦方志》所记酒泉西少北75里的故玉门关，即位于今嘉峪关市西北约10公里许的石关峡。^[8]唐玉门军确在今玉门市赤金一带地方，为赤金堡古城，^[9]但这里并非五代的玉门关，五代玉门关亦在石关峡。^[10]沙头故城即今玉门市花海乡比家滩古城，^[11]唐瓜州确为今锁阳城，^[12]非布隆吉城（该城为清代安西厅城）。唐代的玉门关确在瓠河（今疏勒河，非窟窿河）岸，为今安西县双塔堡一带地方。

另，盛唐时张掖附近还置有鞏笔驿，严先生漏。《旧唐书·王君冕传》：开元十五年（727），“会吐番使间道往突厥，君冕率精骑往肃州掩之，还至甘州南鞏笔驿，护输伏兵突起……，遂杀君冕。”《资治通鉴·卷二一三》亦载其事，胡注：“甘州张掖县西南有鞏笔驿。”《新唐书·地理志》则云，张掖县“西有鞏笔驿”。王北辰先生考得，驿名应为鞏笔驿，“笔”即粮囤之意，“鞏笔”即粮囤巩固，或固若粮囤的意思，“笔”、“笔”均为传刻之讹，是不可信的。该驿方位《旧唐书》记在张掖南，《新唐书》记在张掖西，《通鉴》亦记在南，胡三省则折中二说记在张掖西南。依王君冕进军方向，此驿应在甘州通往肃州的路上，即应在唐张掖城（今张掖市城）的西偏北。乾隆十四年（1749）修《甘州府志》：“今黑水西岸有古驿址，俗曰西城驿

者，或云即鞏皂驿，或云元西城驿，或云明小沙河驿。”王北辰认为唐鞏皂驿、元西城驿、明小沙河驿即在今张掖市黑水国南古城，南古城内的坊巷遗迹乃是元、明时期的建筑遗迹。笔者赞同其说。该古城位于张掖市城西偏北约17公里处的西城驿沙窝中，即国道312线2744公里南1.5公里处，城址已残破，残垣周围多被沙淤，南北222米，东西248米，墙基坍宽8米，顶宽2.5米，残高3~6米。夯土版筑，夯层厚15~20厘米。门一，东开，有瓮城。城内建筑无存，地表遍布碎砖块、石磨残片、瓷片、粗缸瓷片等物。城址中部有一条东西向街道遗迹，城内北部、西垣正中还残留建筑台基。

经由河西走廊连接唐都长安与安西都护府的这条道路，不但为唐室控制西域、中亚之大通道，亦为国际贸易、文化交流之大动脉，其交通价值之高，对于唐与西域、中亚、西亚之政治外交关系、经济供求、文化交流作用之大，诚如严先生所言，无愧为当时中国第一重要之国际交通路线。

二、大斗拔谷道、白亭河道、居延道

与上述这条横贯东西的交通大道相交汇的，唐代还有若干条略呈南北向的大道，将河西走廊与周边一些地区连接起来（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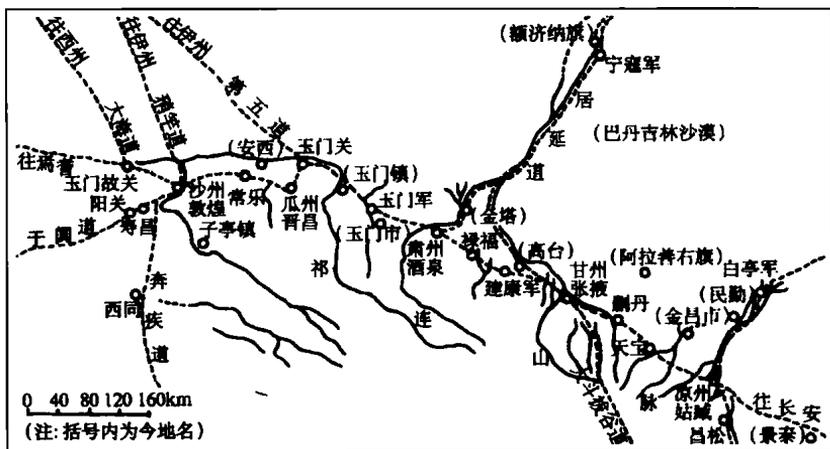


图1 盛唐时期河西走廊交通道路示意图

（一）大斗拔谷道

由张掖斜向东南，沿洪水河、童子坝河河谷穿越祁连山脉垭口扁都口（大斗拔谷），可直抵湟水谷地，将河西走廊与青海高原直接连接起来，其走向与今国道227线（西宁至张掖）略当。

后秦姚兴弘始二年（400）高僧法显、慧景等西行求法，即是翻越大斗拔谷，由该道进入河西而西去的。^[15]隋大业五年（609）炀帝西巡，亦是穿过大斗拔谷到达张掖的。《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开元十五年（727）：“去冬，吐蕃大将悉诺逻寇大斗谷，进攻甘州，焚掠而去。”走的亦是这条道。近年青海省东部都兰县发现吐谷浑贵族墓葬，出土了数量众多的丝织品，其中112种为中原织造，18种为中亚、西亚织造。西方织锦中独具浓郁风格的粟特锦最引人注目，一件织有钵罗波斯文字锦，是目前世界上所发现的仅有的一件公元8世纪波斯文字锦。此外还有波斯金銀器、玛瑙珠、玻璃珠、铜香水瓶等出土。^[16]由此表明途径青海东部，连接中原与河西、西域、中亚、西亚的交通道路曾在历史上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从北朝晚期至中唐时期，

此条路段成为丝绸之路的重要干线和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

严耕望先生认为，唐末吐蕃内乱，其洛门川镇将论恐热西攻鄯州节度使尚婢婢，又西北掳掠甘、肃、瓜等州，亦是经由此道，与炀帝西巡之路线略当。

除大斗拔谷道外，沟通祁连山脉南北还有一些通道，但均较次要。如唐代前期由山南的吐谷浑地北出肃、瓜、沙、玉门即有道路，高宗龙朔三年（663），吐谷浑国被吐蕃所灭，余众诣凉甘肃瓜沙等州降，即是从这些通道进入河西的，不再赘述。

（二）白亭河道

由武威向北，沿石羊河（其下游唐五代名白亭河）北行，经唐白亭海（今石羊河终端湖白碱湖一带），穿越腾格里沙漠北部可直抵黄河岸边。后晋天福三年（938）张匡邺、高居海一行即是由此道前往于阕的。他们自灵州（今宁夏灵武市）渡过黄河西行，经细腰沙、神点沙、三公沙、黑堡沙、沙岭等地（均为腾格里沙漠之地），“渡白亭河至凉州”^[17]。该道为河西走廊通往河套、北京乃至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的一条捷径。唐五代以后依然兴盛，当地称之为包（头）绥（远）道。

（三）居延道

由张掖北出，沿黑河北行，经古居延绿洲（唐于此设宁寇军），可深入蒙古高原腹地，亦可由此东接阴山、河套，西连天山南北。《新唐书·地理志》甘州张掖郡条记载：“北渡张掖河（黑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峡口，傍河东 屈曲东北行千里，有宁寇军，故同城守捉也，天宝二载为军。军东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门山堡，又东北千里至回鹘衙帐。”所记即此道路。同书瓜州晋昌郡条记载：瓜州“东北有合河镇，又百二十里有百帐守捉，又东百五十里有豹文山守捉，又七里至宁寇军，与甘州路合。”甘州路亦即此道。对于居延古道，王北辰先生曾有细致的考论，^[18]于此不赘述。

三、以敦煌为中心的交通道路

位处西域门户、丝绸之路咽喉的敦煌，盛唐时仍是政治上军事上联结中原与西域的枢纽和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荟萃之地，并且随着国力的空前强盛和丝绸之路交通的繁荣，其地位更形重要。与敦煌遗书及有关史料见，盛唐时敦煌可东通中原，北通伊吾（稍竿道），西北通高昌（大海道），西通焉耆、龟兹（沿罗布泊北岸行，大碛道），西通鄯善、于阕（沿阿尔金山北麓行，于阕道）；又由敦煌西南行，过马圈，越今当金山口，经西柯（今苏干湖）可通吐谷浑和吐蕃地（奔疾道，又名把疾道）；又由敦煌东面的瓜州城出玉门关，西北可通往伊州（莫贺延碛道，又名第五道）。可见敦煌一带实处于东西、南北交通的十字路口，成为当时交通馆驿网络颇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很值得深入研究。

（一）瓜沙道

唐代瓜、沙二州间的交通道路、驿站及其变迁，敦煌遗书《沙州都督府图经》（P.2005）所记最为详确。该卷专列“十九所驿、并废”一节，记载了瓜沙二州间的14所驿站和第五道的几所驿站，至为珍贵。前揭严耕望先生大作利用该史料，勾勒了二州间的基本路线走向和驿

次。但严氏未来过这一带，未能将文献记载与实地地理状况及所存路、驿遗址对照起来，因而不免粗疏。笔者经实地反复踏勘，对于瓜沙二州间诸驿的位置及其驿路变迁状况做过系统考察，撰成《唐代瓜沙二州间驿站考》^[19]一文。

笔者考得，唐代连接瓜、沙二州间的驿路曾使用过新、旧两道，其中旧道又先后有过山（常乐南山，今截山子）南、山北两条路线。高宗永淳二年（683）前，道由沙州东行，经州城、东泉、其头、无穷、空谷、黄谷、鱼泉7驿（截山子南麓），至瓜州常乐驿，再东抵瓜州；是年奉敕废无穷、空谷、黄谷3驿，而于山北置悬泉驿，由其头驿东经悬泉驿、鱼泉驿至常乐驿，或由悬泉驿直取常乐驿，再到瓜州。上面走法是为旧道山南、山北两种走法。至武后天授二年（691），“以旧道石碛山险，迂曲近贼，奏请近北安置”，于是于旧道之北改置新道：由沙州东北行，经州城、清泉、横涧3驿，又北行至白亭驿，东北行至长亭驿，东行至甘草驿，东南行至阶亭驿，再东行达常乐驿、瓜州。新道多因烽戍置驿，旧道诸驿遂废（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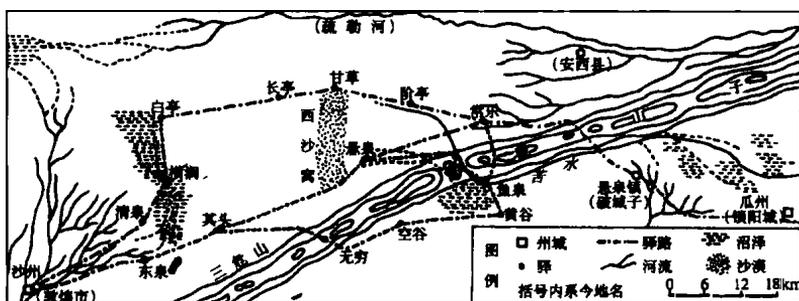


图2 唐代瓜、沙二州驿站示意图

新道诸驿中，州城驿位于唐沙州城，即今敦煌市城西党河西岸的沙州故城址；清泉驿位于今敦煌城湾农场二站古城，该城亦是唐清泉戍；横涧驿位于今咸水沟旁（地理坐标X: 16663.9, Y4466.4），驿侧有烽；白亭驿位于东碱墩烽正南1.5公里处（X16663, Y4477），驿侧有烽；长亭驿位于白亭驿东北21.5公里处（X16683, Y4481.3），今遗存两座残墩；甘草驿位于西沙窝北端的北路井；阶亭驿位于北路井东南13公里（X16706.3, Y4480.3），驿侧存残高9米的烽燧一座，即唐阶亭烽，其地还建有阶亭坊，为唐时一大型车坊；常乐驿设于唐常乐县城内，即今安西县南岔乡六工破城。

旧道之常乐南山北麓诸驿：东泉驿位于今敦煌市五墩乡新店台村北的大疙瘩梁古城；其头驿位于今二道井附近；悬泉驿位于今吊吊沟口北9公里的甜涝坝古城；由此可向东南越常乐南山达鱼泉驿，或径向东直抵常乐驿。常乐南山南麓诸驿：鱼泉驿位于今谢家圈滩北部土墩子一带（X16718, Y4467.5）；无穷驿位于常乐南山中的早峡（X16690.1, Y4453.3），空谷驿位于无穷驿东15公里处（X16703.4, Y4457.1）；黄谷驿位于今安西县老师兔古城，由此向东北约12公里可到鱼泉驿，与前道接。

于敦煌文书见，唐代对于丝绸之路交通大动脉瓜沙地区的驿馆建设极为重视，每条驿道乃至每所驿站的开置废弃，均须经由州刺史奏请皇廷，然后奉敕施行，驿路的选线、开辟、变迁既受地理条件（主要是水资源）的制约，又受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影响。今天不少驿址仍有残垣断墙、驿侧烽燧或军戍遗址。驿址多呈方形，每边长约30~70米不等，面积约100~500平方米。有的驿址周围还发现古渠道、古耕区遗迹，反映了古今地理环境的变迁。今天全国保存的

唐代驿址已很罕见，因而瓜沙地区的这些古驿址在我国考古学以及古代交通通讯史的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

（二）稍竿道

稍竿道为沙州向北直达伊州（今新疆哈密）的道路，又名伊吾路。《沙州都督府图经》（P.2005）在新井等驿条下记：“奉如意元年四月三日敕，移就稍竿道行。至证圣元年正月十四日敕，为沙州遭贼少草，运转极难，稍竿道停，改于第五道来往。”随着路况安全等方面的变故，有唐一代稍竿道与第五道（后考）往往交替通行（图1）。

稍竿道的得名因伊州南有稍竿馆而来。《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三》伊州条：“正北微东取稍竿馆路至沙州七百里。”所记正北应为正南之误。敦煌遗书S.0383《西天路竟》载，出沙州“又西行三十里入鬼魅碛，行八日出碛至伊州。”所记正是稍竿道。该路段上可考之地点还有碱泉戍。《通典·卷一七四》敦煌郡条：“北至故碱泉戍三百三十六里，与伊吾郡分界。”敦煌研究院藏《唐敦煌县给碱泉戍粟牒》记载由县司食用给碱泉戍粟102石。

陈国灿先生曾撰《唐五代敦煌四出道路考》，对于稍竿道走向论之：“以今航测图观之，敦煌北去土窑墩80余里，再北约90里至青墩，再北至明水井约70余里，再北抵水沟子井约90里。水沟子井今又名甜水井，其地南距敦煌330里，当是唐碱泉戍所在地。……碱泉戍至伊州城尚有300余里，稍竿馆在碱泉戍以北，相距或为一二日程。再西北，很可能与第五道之赤崖驿合，再西北经塹亭等驿而达伊州”^[20]。严耕望先生前揭文认为：“稍竿道者，由沙州州城驿西北行，一百一十里至兴胡泊，又一百三十二里至河仓城（今大方盘城），又折北行盖六十六里至碱泉戍”，所考路线似乎向西绕行太多，事实上敦煌直北略偏西可径达伊州。

（三）第五道（莫贺延碛道）

由唐瓜州向北50余唐里，出玉门关，折向西北经约800里的莫贺延碛至伊州（今哈密），又称莫贺延碛道。《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伊州条：记载“东南取莫贺碛路至瓜州九百里。”唐瓜州、玉门关，即前考分别在今安西县锁阳城、双塔堡之地。该道将瓜、伊二州直接连接起来，较之绕行沙州（瓜、沙相距300里许），再取稍竿道至伊州（700里）的道路缩短驿程近百里。然而第五道要穿越数百里的莫贺延碛，极乏水草，路况险恶，行走十分艰辛。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记，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高僧玄奘西行求法，即取莫贺延碛道而往。该路在瓜州以北50余里的瓠河（今疏勒河）上置有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关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沙河阻远，鬼魅热风，遇无免者。徒侣众多，犹数迷失”；玄奘孤游沙漠，“惟望骨聚马粪等渐进。……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是时顾影唯一，心但念观音菩萨及《般若心经》……”。足见其行程艰危之况。

《沙州都督府图经》（P.2005）：“唐仪凤三年（678）闰十月，奉敕移稍竿道，就第五道莫贺延碛置，沙州百姓越界捉。奉如意元年（692）四月三日敕，移就稍竿道行，至证圣元年（695）正月十四日敕，为沙州遭贼，改第五道来往。”第五道与稍竿道相替使用。同卷又载：“又奉今年二月廿七日敕，第五道中总置十驿，拟供客使等食，付王孝杰并瓜州、沙州审更检问。令瓜州捉三驿，沙州捉四驿。”所云“今年”，严耕望考为万岁通天元年（696）。瓜州负责经管供应（“捉”）的3所驿为新井、广显、乌山；沙州越界经管供应的4所驿为双泉、第五、冷泉、胡桐。10驿中另有3驿（赤崖等驿）当由伊州“捉”。诸驿大抵皆置戍，以护卫交通

大道的畅通。于《唐天宝年代敦煌郡会计牒》(P.2862背)等可考知所置的戍有:广明戍(原名广显戍,避中宗李显讳改)、乌山戍、双泉戍、第五戍、冷泉戍、赤崖戍等,戍名与驿名同。

笔者考察中见,该道唐瓜州城至玉门关的一段至今仍有古道留存。自锁阳城向北略偏东沿疏勒河洪积冲积扇扇缘,经兔葫芦村直达双塔堡(唐玉门关)有一条宽约3~6米,较今地面低1~1.4米许的古道,今仍断续相连,尤以兔葫芦遗址沙丘北部草滩、青山子胡杨林至吴家沙窝(长约14公里)等路段保存较好,部分路段今仍作为乡间道路使用。该道穿越扇缘泉水出露带的地段为防止湿陷翻浆,路基用芦苇、怪柳等物夹砂土垫压。当地乡亲们管该路叫作唐道,说“这是唐家里老先人走过的路”。据该道陷入现代地面以下的深度知其年代已颇久远。

严耕望认为,明清大道及今日汽车、火车道大抵即循莫贺延古道而行。陈国灿亦认为,由于受沿途泉水的制约,第五道大体与今安西县至哈密의公路线相近。笔者曾于1992年2月、1999年5月、2000年8月几次循此古路实地考察,但由于受路况条件、交通工具等方面的限制,仅获得一些初步收获。笔者大致同意严、陈二先生的看法,初步考为唐第五道约与今国道312线安西至哈密段走向近之,唐广显驿、广明戍即今安西县城西北约50公里处的白墩子城,乌山驿(戍)即今安西县柳园镇西南约7公里的红柳园古城,双泉驿(戍)即今柳园镇西北约35公里的大泉遗址,第五驿(戍)约在今大泉北30余公里处的马莲井一带,冷泉驿(戍)约在马莲井西北30余公里的星星峡一带,胡桐驿约为今哈密市沙泉子遗址,赤崖驿约在今哈密苦水之地。进一步的细致考察有俟来日。

(四) 大海道

为唐代沙州径通西州(今吐鲁番)的交通大道。敦煌遗书P.2009《唐西州图经》记,西州通往各地有11条道路,其中大海道为东通中原必经的要途之一。“大海道,右道出柳中县界,东南向沙州一千三百六十里,常流沙,人行迷误,有泉井咸苦,无草,行旅负水担粮,履践沙石,往来困弊。”西州柳中县,“西至州三十里,贞观十四年(640)置,当驿路,城极险固”^[21]。笔者曾实查,该县城位于今吐鲁番市东约20公里的鄯善县鲁可沁、火焰山南麓,城址犹存,东西长近1000米,南北宽约400米,基宽5米许,顶宽3米,残高最高12米,城内残留部分建筑台基。^[22]所谓“大海”意指大沙海,瀚海戈壁。《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西州柳中县条记载:“大沙海,在县东南九十里。”以其位置即指今噶顺戈壁。这是一片方圆约500公里的残积—洪积戈壁滩,并多有流动沙丘,石碛渺渺,沙浪滚滚,除少数几处苦涩的露头泉水外,地表几无径流,且人易迷向,又不便车马,路途亦很困苦艰险。然而该道较为顺直,行程较短,可由沙州径向西北,经兴胡泊(沙州西北110里,今哈拉卓尔^[23]、玉门故关(沙州西北160里)、白龙堆、大沙海、柳中县而达西州,无须绕经伊州(今哈密)而往。

笔者考得,大海道的开辟可上溯至曹魏时期,北朝、隋代相沿未辍,唐代成为通往西域的主道之一,北宋以后废弃。^[24]撰成于开元廿四年(736)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引裴矩《西域记》曰,西州高昌东南去敦煌1300里,“并沙碛之地,四面危,道路不可准记,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驼马粪为标验。”《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西州条载:“东南至金沙州一千四百里。”“金”系衍字。所云西、沙州间距离较《西域记》所记略远,与《西州图经》的记载则完全吻合(柳中县东南至沙州1360里,该县西至西州又约40里)。敦煌遗书P.2691《沙州城土镜》载:“西北至西州一千三百八十里。”《太平寰宇记·卷一五六》西州柳中县条亦记该道,但将其称作“柳中道”,当为大海道的另一称谓。

见于史载,北朝隋唐时大海道除平时使用外,若逢伊吾路(即第五道)上“遭贼动乱”或出现紧急军情时,还每每作为通达西域的一条捷径而发挥其特殊作用。如北魏时柔然曾几次逼

近，占据伊吾，隋时突厥兴兵伊吾，均迫使伊吾路断，大海道则取而代之，担负起更为重要的交通职责。吐鲁番阿斯塔那188号墓所出西州都督府牒文述：“北庭大贼下，逐大海道”，此事约发生在开元二年（714）前后，北庭大贼当指西突厥。《西州图经》新开道（西州通伊州的南道）条记：“今见阻贼不通”，此事约发生在乾元（758—760）之后，“贼”当指吐蕃。伊吾路阻，大海道就成了中原通向西州的唯一道路。

（五）于阗道

出敦煌阳关，沿阿尔金山北麓西南行，经若羌、且末等地，再沿塔里木盆地南缘西达于阗（今新疆和田市）及葱岭以西。该道早自西汉即已开辟，为当时通往西域的南道（《汉书·西域传》），唐代仍在沿用，严耕望漏考。《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四道记》曰：“又一路自沙州寿昌县西十里至阳关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汉伊修（循）城也。又西[一百]八十里至石城镇，汉楼兰国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艳典为镇使以通西域者。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谓之弩支城，艳典所筑。又西经特勒井，渡且末河，五百里至播仙镇，故且末城也……五百里至于阗东兰城守捉，又西经移杜堡、彭怀堡、坎城守捉，三百里至于阗。”

敦煌唐代文书对该道多有记载。约作于盛唐时的《沙州地志》（P.5034），记石城镇通达周边的6条道路，其中东去沙州的就有北南2路，可见其间交通的重要。“一道北路，其路口口口（东去屯）城一百八十里，从屯城取磧路，由西关向沙州一千四百里，总有泉七所，更无水草。其镇去沙州一千五百八十里”“一道南路，从镇东去沙州一千五百里。其路由古阳关向沙州，多缘险隘，泉有八所，皆有草，道险不得夜行，春秋二时雪涂，道闭不通”。“西关”之名，于S.0788《唐沙州图经》和《寿昌县地境》亦见，属沙州寿昌县辖，依其位置应在石城镇之东的屯城（汉伊循城）左近。北路需向北绕道，行经阿尔金山山前洪积冲积扇戈壁、沙丘地带，途中几无水草，但路况较平坦易走，且能全天候通行。南路则沿阿尔金山北麓行进，靠近山根，水草条件较好，且较为顺直，距离较短，但路况较为险峻，不能夜行和全天候通行。行旅可依据具体情况选择路线而往。

P.5034又记，由石城镇继续向西，“从镇西去新城二百四十里，从新城西出取傍河路向播仙镇六百一十里。从石城至播仙八百五十里，有水草。”S.0367与《寿昌县地境》均载，播仙镇，古且末国，隋置且末郡，上元三年（676）改名播仙镇，即今新疆且末县。石城西去播仙所傍的河应即且末河，今车尔臣河。由且末继续西行，可达于阗及其以远。

（六）大磧道

唐代由敦煌西北行，穿过白龙堆（今库姆塔格沙漠）北部，经罗布泊北岸，再沿孔雀河而上，西抵焉耆及其以远，名大磧道。《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焉耆》载：“其王姓龙氏，名突骑支……贞观六年（632），突骑支遣使贡方物，复请开大磧路，以便行李。太宗许之。自隋末罹乱，磧路遂闭，西域朝贡者皆由高昌。及是高昌大怒，遂与焉耆结怨，遣兵袭焉耆，大掠而去。”《新唐书·西域传》与《资治通鉴》亦有相似记载。大磧路不经由高昌，它的开辟直接影响到高昌在丝路交通上的地位和利益，高昌因之出兵攻掠焉耆，以致这后来成了唐室讨伐高昌的原因之一。郑炳林先生对该道的开辟及通行状况有详细论述，^[25]不再赘述。

根据这一带沿途地形状况，该路的具体走向当由敦煌径向西北，经兴胡泊、玉门关，然后傍疏勒河下游古河道而行，西抵罗布泊北岸；再溯孔雀河谷西北行，直抵焉耆。该道将敦煌和焉

耆直接连接起来，途中无须向北绕行，并可由焉耆直接西达龟兹（唐安西都护府驻地，今新疆库车）及其以远，虽然路况艰辛，须穿越大片的戈壁以及疏勒河下游和罗布泊北部的风蚀雅丹地貌区，但沿程多傍河谷，水草条件较好，因而早在隋代以前就被人们利用，唐代更趋兴盛。

另据前引《沙州地志》（P.5034）所记石城镇6条道路中，其中“一道北去焉耆一千六百里，有水草，路当蒲昌海西，度计戍河。”“计戍河”应即孔雀河。该路为敦煌前往焉耆的又一条通道，但须绕经石城镇（今若羌），虽路途更远，但中途有石城镇绿洲粮草、水源的补给，故亦有取此道而往者。如前引《法显传》记，法显西出敦煌“行十七日，计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国……复西北十五日到焉耆国”。“鄯善国”即唐石城镇，当年法显所走即此道路。

（七）奔疾道

出敦煌沿党河（唐甘泉水）河谷西南行，经黑山咀（唐马圈口）、西千佛洞、党河大拐弯处（存唐山阙烽残址），折而南行，经沙枣园、沙山子、沙山沟、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城、长草沟，逾当金山口（祁连山脉与阿尔金山山脉分界隘口，有唐南口烽），复经苏干湖盆地（唐五代名西同），直抵柴达木盆地（唐五代名墨离川）及其以远。其路径与今国道215线大体吻合。该道将敦煌与青藏高原直接连接起来，亦是沟通蒙新与青藏的大通道之一，亦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严耕望先生前揭大作漏考。

该道又名把疾道，或可称其为南山道。《通典·卷一七四》述敦煌郡四至：“南至故南口烽二百五十里，烽以南吐谷浑界。”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曰，甘泉水（党河）出子亭镇（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党城遗址）“又西北流六十里至山阙烽，水东即是鸣沙流山”。依其位置山阙烽即今仍残存在党河大转弯处（今建为党河水库）西侧山头、鸣沙山西端的唐代烽燧，残高2.7米。同卷又记：“马圈口堰，右在州西南廿五里，汉元鼎六年造，依马圈山造，因山名焉。”其地正是今黑山咀，唐代为甘泉水诸引水干渠的总分水口，今天党河的总分水闸亦在此附近。山阙烽和马圈口，均为奔疾道上所经的重要地点。P.2555《佚名氏诗五十九首》（作于安史之乱后），吟诵了敦煌陷落吐蕃后诗作者被押往青海临蕃城（今湟源县）一路上的见闻和感受。诗作有《冬出敦煌郡入退浑国，朝发马圈之作》、《至墨离海奉怀敦煌知己》、《青海卧疾之作》、《夜度赤岭怀诸知己》、《晚次白水古戍见枯骨之作》及《晚秋至临蕃被禁之作》等。“赤岭”今日月山，唐白水军戍在今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西北，诗人所走路线即奔疾道。

作于晚唐时期（约公元9世纪后期）的P.2692《张议潮变文》：“诸川吐蕃兵马还来劫掠沙州，奸人探得事宜，星夜来报仆射：‘吐浑王集诸川蕃贼欲来侵袭抄掠，其吐蕃至今尚未齐集。’仆射闻吐浑王反乱，即乃点兵，鏖凶门而出，取西南上把疾路进军。才经信宿，即至西同近侧，便拟交锋。其贼不敢拒敌，即乃奔走。仆射遂号令三军便须追逐。行经一千里已来，直到退浑国内，方始趁蹙。仆射即令整顿队伍，排比兵戈……决战一阵，蕃军大败……生口细小等活捉三百余人，收夺得驼马牛羊二千头匹，然后唱《大阵乐》而归军幕。”同卷唱文中又云：“忽闻戎戎起狼心，叛逆西同把险林。星夜排兵奔疾道，此时用命总须擒。”“仆射”即指张议潮，其出敦煌向西南过西桐的进军路线正是奔疾道。“西同”又名“西桐”，笔者考得为今苏干湖盆地。^[26]“信宿”即连宿两夜。《诗·豳风·九罭》曰：“公归不复，于女信宿。”毛传：“再宿曰信；宿，犹处也。”由敦煌取道西南再向南至西桐（今苏干湖盆地），约150余公里，恰需要两夜三天可以抵达，可证所走确为奔疾道。由此亦可得悉，奔疾道是可以通到青海纵深地区的。

注释

- [1]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河陇碛西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83，1985。
- [2] 李并成：《晋河会城、缠缩城、清塞城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2，173页。
- [3] 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48-49页。
- [4] 李并成：《唐代凉州（武威郡）诸县城址的调查与考证》，《敦煌研究》1990.1，63页。
- [5] 李并成：《河西走廊马营河、摆浪河下游的古城遗址及沙漠化过程初探》，《北京大学学报》“历史地理专刊”，1992，95-97页。
- [6] 李并成：《敦煌悬泉汉简里程简考》（待刊）。
- [7] 李并成：《西汉酒泉郡若干县城的调查与考证》，《西北史地》1991.3，70-75页。
- [8] 李并成：《五代宋初的玉门关及其相关问题考》，《敦煌研究》1992.2，89-93页。
- [9] 李并成：《西汉酒泉郡若干县城的调查与考证》，《西北史地》1991.3，70-75页。
- [10] 李并成：《五代宋初的玉门关及其相关问题考》，《敦煌研究》1992.2，89-93页。
- [11] 李并成：《西汉酒泉郡池头、绥弥、乾齐三县城址考》，《西北史地》1995.3，7-8页。
- [12] 李并成：《唐代瓜州（晋昌郡）治所及其有关城址的调查与考证》，《敦煌研究》1990.3，24-31页。
- [13] 李并成：《唐玉门关究竟在哪里》，《西北师大学报》（社）2001.4，20-25页。
- [14] 王北辰：《甘肃黑水国古城考》，《西北史地》1990.2，45-50页。
- [15] 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3页。
- [16] 李永平：《西北地区重大考古发现与丝绸之路研究》，《丝绸之路》1999学术专辑，18页。
- [17] 《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录三》。
- [18] 王北辰：《古代居延道路》，《历史研究》1980.3，107-122页。
- [19] 李并成：《唐代瓜沙二州间驿站考》，《历史地理》第13辑，1996，93-101页。
- [20] 陈国灿：《唐五代敦煌四出道路考》，《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216-236页。
- [21]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陇右道》下。
- [22] 季成家，王尚寿，胡小鹏，李并成等：《丝绸之路文化大辞典》，红旗出版社，1995，855页。
- [23] 《沙州都督府图经》（P.2005）：“一所兴胡泊，东西十九里，南北九里，深五尺。右在州西北一百一十里。其水咸苦，唯泉堪食，商胡从玉门关道往还居止，因以为号。”。
- [24] 李并成：《古丝绸路上的大海道》，《光明日报》2000.2.C4版“历史周刊”。
- [25] 郑炳林：《试论唐贞观年间所开的大碛路》，《兰州大学丝绸之路研究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44-52页。
- [26] 李并成：《“西桐”地望考》，《西北民族研究》1998.1，45-50页。

丝绸之路
新疆段研究

“丝绸之路”是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研究课题，当之无愧的关联着全人类共同的精神文化遗产。深入剖析“丝绸之路”的历史，感受不同种族、民族、国家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故实，无疑会助益于建设一个健康的、和谐的、文明的人类新世界。

俯视欧亚大陆，地中海周围（包括北非之古埃及文明）、印度、中国，是人类文明发育最早、曾取得最辉煌成果的几个地区。而受所在地区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社会条件的影响，它们的经济、文化，古老文明的方方面面，各具特色，并不相同。这种经济、文化的差异，文明色彩的不同，使得这些异质文明间的交流成为了一种需要。而地域毗连，又使得它们间的交流成为可能。既有需要，又有可能，这些异质文化间彼此的联系，是发生得很早的。在人类开始使用文字、出现国家、步入文明之前，它们之间的交往、联系已经存在。从这一角度观察，在欧亚大陆上古代几个重要文明中心间的交通联系，其时代、路线是远早于（德）李希霍芬在其《中国亲程旅行记》^[1]、（德）艾伯特·赫尔曼在其《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丝绸之路古道》^[2]这些著述中提出的“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而其实质，与现在大家习称的“丝绸之路”，自然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异。

在欧亚大陆古代文明中心彼此交通的过程中，新疆大地居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

位居帕米尔东麓的新疆，四周高山环绕，境内戈壁、沙漠纵横，所在多是难以逾越的交通障碍。但它既处欧亚大陆人们交往联系的中心，自然也就成了无法替代的古代印度、伊朗、希腊罗马文明与黄河流域华夏文明之间交往联系的枢纽，成为了“丝绸之路”沙漠道、草原道上的关键地段。

又因为新疆大地气候特别干燥，地上地下的遗址遗物保存特别完好，林林总总的文化遗迹，无数说不清的各类出土文物，结合历史文献，分析“丝绸之路”新疆段的开拓、路线变迁、在这条欧亚交通大动脉上曾经展开过的经济文化交流，无不可以得到远较文献记录丰富的历史结论。因此，丝绸之路新疆段，在丝绸之路研究中，具有不同一般的地位。

一、汉代以前的欧亚内陆交通

根据文献，人们往往将公元前2世纪汉王朝使者张骞通西域，作为“丝路”开拓的标志。但是从考古资料看，欧亚大陆上东西方的交通，实际要远比公元前2世纪早。

从目前已掌握的资料，可以肯定，当时新疆大地在沟通地中海周围与亚洲东部地区的联系中，居于重要的、中心的地位。

申述这一概念，我们首先以已经有过比较深入研究、时代比较明确的罗布淖尔地区孔雀河流域的青铜时代考古遗存为例。孔雀河流域青铜时代考古文化遗存，目前主要见于古墓沟、小河这两区墓地，在墓地每个死者随身的草篓中，都见到小麦籽粒。这说明这时在罗布淖尔荒原上，小麦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食品或食品之一，同时也表明小麦栽培已非最初阶段，小麦种植在这里已经经历一个过程。而小麦，普遍认同的一个学术结论是：它的原产地是在西亚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早到去今10 000年前，已经培育出了人工栽植小麦，以后慢慢扩散到欧亚广大地区。^[3]而孔雀河流域的青铜时代遗存，大量¹⁴C测定数据表明，其绝对年代可早到去今4000年前后。^[4]

同样还是以孔雀河流域小河墓地为例，1930年瑞典考古学者F·贝格曼在调查、发掘小河五号墓地时，在沙丘地表，曾采集到贝珠500多颗，标本携归斯德哥尔摩后，曾请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无脊椎部的R·伯根海恩博士分析、鉴定，结论是：这类贝珠，使用材料是取自海菊蛤属的海生动物，可能是面蛤（Sowerby）。而这种面蛤，其产地仅见于东亚海岸。根据这一资料及分析，可以引伸的逻辑结论只能是：在距今近4000年前，产自我国东部沿海、直线距离在3000公里以外的面蛤，已经辗转到了新疆东部的罗布淖尔地区。^[5]

在东部天山北麓巴里坤发掘的兰州湾子大型石构房址，建筑面积达200平方米。四周石墙，墙厚达3米。底部见柱洞，曾先后两次废毁、三次住人。最底层、也是最早有人居住的地面，存烧灰、大型圈足铜鍪、环首小铜刀、彩陶罐、双耳鼓腹红陶罐、碳化小麦粒，马、羊、鹿骨，及大型马鞍形磨石等。其中，陶器手制，鍪通高54厘米。从取遗址底层木炭进行年代测定，结论为距今3285年±75年，这表明了该遗址最早居住活动的时间。^[6]这里也有小麦粒。而那件经发掘出土的双耳圈足铜鍪，同类器形的炊具在东到蒙古高原，西至欧洲东部广大草原地带，是多有所见的典型文物。^[7]这其中透示的交通文化联系自不待言。

新疆哈密五堡发现过一处青铜时代土著居民墓地。出土文物主要为彩陶、木器、石杵、毛织物及皮革制品、小件铜器等。取墓室盖木进行¹⁴C测年，结论均在距今3200年前后，^[8]与出土文物显示的时代风格一致。五堡墓地中，出土了相当数量的海贝，包括货贝，它们只能来自周邻的海洋，显示了当年新疆与周围地区实际联系的存在。

197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地区殷墟发掘的妇好墓，出土玉器756件（少量残片未计），曾取其中约300件标本进行材质分析，结论“大部分均系软玉，其中大部分属青玉，白玉较少……这几种玉料大体上都是新疆玉”，特别是其中三件小型玉雕，尤其是其中两件白玉羊、鸟，肯定是和阗特产脂玉。^[9]它们有力地显示了新疆，尤其是新疆和阗地区玉石，在公元前13世纪晚期至公元前12世纪时，已经远销黄河流域下游、河南安阳殷商王国的史实。

同一时段，在哈密地区哈密县花园乡茶迄巴勒，农民挖土，在深4米的地下，发现多件青铜器，其中一件鹿首铜刀，柄端鹿首：头长，眼鼓突，耳直立，角后曲成环。柄与刀背弧曲成一线，通长达36厘米，柄长13.5厘米。与这件鹿首铜刀一道，还有环首小铜刀、釜形铜鏃、砺石等，同出的陶器被挖土者毁弃。这是一组很重要的、具有鄂尔多斯风格的青铜器。形制相同的鹿首铜刀，在内蒙、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河北青龙县抄道沟及陕西绥德塬头村商代遗址内都曾经发现过，在俄罗斯境内的卡拉索克文化中也有同类型兵器，其流行时代可以早到商代

晚期。^[10]

时代相当、值得引起人们关注的还有一种文物，这就是最迟在春秋晚期已经进入中国，战国、秦汉时期多有所见的蜻蜓眼玻璃珠。据不完全统计，在华北大地、长江流域多有所见，总数在400颗以上。这些文物，大都作为奇珍出土于贵族王侯墓葬中。它们在新疆和闽山普拉、尼雅，且末扎洪鲁克，沙雅、轮台穷巴克等地，也都有出土，时代最早到公元前1000年前期或更早。而从更广阔的范围观察，这类蜻蜓眼玻璃珠，最初出现在尼罗河畔的古代埃及，被视为一种具有神奇力量的魔珠，可以避邪，给死者带来安宁、幸福，因而作为殉物入葬，时代可以早到去今3400年前（亦说最早可到公元前2500年）。稍后，传布到了伊朗高原，在伊朗基兰，出土过类同的蜻蜓眼玻璃珠实物。在伊朗基兰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与山西出土的实物，造型图案惊人相似。这给我们以有力启示：这类蜻蜓眼玻璃珠，最早发明在古埃及，以后进入伊朗高原，进入新疆，进一步东达华北、长江流域。^[11]实际上，这类蜻蜓眼玻璃珠，也就是我国古代《尚书》《管子》《说文》中所称的“琅玕”，^[12]《魏略》曾揭明，它们来自“大秦”。^[13]实际已经准确说明，它们的原产地是在地中海边。

不论是作为琅玕的蜻蜓眼玻璃珠、哈密五堡出土的海贝、哈密花园乡出土鄂尔多斯式青铜刀，还是殷墟所见和阗玉石，自然都不足以显示当年社会生活的全貌，也不足以显示彼此实际交往的规模。它们的意义，在于以无可置疑的事实揭明了一种历史的存在。表明在距今3200—3300年前，新疆与其四周地区，尤其是与西亚及黄河流域的联系，已经是一种不容置疑的事实。这种联系及与这种联系互为表里的交通路线，与后人定名为“丝绸之路”的商道，是没有本质差别的。

这一联系进入西周、春秋战国时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论及春秋、战国期间（前7世纪至前3世纪）的亚欧地区间的交通，前苏联学者在俄罗斯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卡童河、伯莱利河、乌尔苏河、乌拉干河发掘的一批大型石冢，是很值得关注的考古资料。这是公元前1000年中期或更早一点阿尔泰山地古代居民首领的墓冢，发掘时封冻严实，文物保存完好。位于乌拉干河畔的巴泽雷克墓地，出土了春秋—战国之际具有楚文化特点的凤鸟纹刺绣，山字纹铜镜，表明了它与中国存在的联系。而在同一批墓地中，还有显示着黑海北岸希腊化殖民地艺术风格的皮革、毛毡、木雕制品；具有古代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艺术特色的野兽纹、格里芬、有翼狮图像的文物。^[14]于细微处见精神，阿尔泰古代游牧部落东南与中国大地、西与黑海、西南与伊朗的这种交往，由此可以清楚捕捉。而古代中国与亚洲西部、欧洲地区交往联系的路线之一，也可由此透显在今人的面前。

与巴泽雷克古墓出土文物相通，时代略晚的是20世纪70年代发掘的中部天山阿拉沟墓地。在这里发掘的100多座堆石墓，其中有一部分巨型石冢、竖穴木椁墓。墓内出土的凤鸟纹刺绣、链式绞纹罗、漆器等，明显来自中原，刺绣显示的凤鸟纹，还颇具楚文化特征。而同出的大量金器，如有翼狮形金箔、对虎纹金箔带、虎纹圆形金牌，具有塞人艺术特点。方座承兽铜盘，盘中伫立带翼狮形异兽，盘内见燃炭，是祆教祭器，这与古代伊朗是存在关联的。阿拉沟墓地，呈现着中国内地，甚至长江流域楚文化与塞人文化汇融于一炉的情景。^[15]还应强调一点：通过阿拉沟，中天山这一普通沟谷，传统习惯所谓的“丝绸之路”沙漠道上的重要站点吐鲁番、焉耆与“草原道”上的准噶尔盆地、伊犁河谷、哈萨克丘陵，实际上已联通在了一体。1976—1978年间，笔者配合南疆铁路在阿拉沟谷地进行调查、发掘，初始，曾为阿拉沟似不当交通径道，却出土如此丰富的丝织物、漆器，而稍感不解；在多次穿行其间后，认识到它在贯连吐鲁番与伊犁地区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这才豁然开朗，原来这条普通山沟，曾是沟通“草原道”与“沙漠道”上的关节点。进而认识：古代曾经存在、展开过的欧亚大陆间的交通，实际是远较历史文献中有限的记录更为丰富的。邻近的绿洲、偏僻的山谷，只要是古代居民生存、活动之处，无不与欧亚

大陆上交通往来的干线勾连在一起，形如网络。任何一个点，都可从中吸收到经济、文化营养，也可籍此而奉献自身有特色的创造与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认识丝绸之路，它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发挥的作用与做出过的贡献，真是怎样估计也不为过的。

吐鲁番地区鄯善县洋海古墓区，规模大、时代延续长，早到春秋，晚到汉。墓地内与彩陶器共存，发现过两件釜形戈。^[16]这种釜形戈，是苏联米努辛斯克盆地塔加尔文化中的典型文物。在洋海墓地第90号、第263号墓葬中，出土了两件五弦箜篌；在第2069号墓葬中发现长115厘米、直径2.3厘米的扁形葡萄藤，为圆果紫葡萄植株，时代均早到公元前1000年前期。箜篌、葡萄，它们明显来自西、南亚地区，与埃及、伊朗存在关联。^[17]

在新疆北部如阿勒泰等地，普遍见到鹿石，时代早到公元前6世纪或更早。类同岩刻也见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南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18]

阿拉沟墓地出土过的祆教铜质祭祀台，在伊犁河流域青铜时代遗址、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周围中也多有所见。而后者，还往往共出对兽铜环。这种对兽铜环，在古代伊朗是不止一见的。它们与祆教祭祀密切关联。祆教的祖源地就在伊朗。^[19]

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岩画，是公元前1000年前期的作品，其上清楚显示了马祖崇拜，通过“马祀”求育的信仰。同样岩刻主题也见于阴山岩刻。在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见到这类有关“马祀”活动的记录，伊朗卢里斯坦出土的青铜器，也有同类风格的双马造型。^[20]

这些考古资料有力表明：通过塔里木盆地西去南亚、西亚的“丝绸之路”沙漠道，是一个早已存在的事实；新疆地区，在公元前1000年前，东向蒙古高原、西伯利亚，西向哈萨克斯坦以至欧洲东部，南向印度、伊朗，无不存在明显的文化联系。横亘于新疆中部的天山，曾是沟通其间联系的桥梁。

应该说，公元前2世纪西汉王朝使者张骞“通西域”，正是奠基在这一历史基础上，顺应时代的要求而做出的伟大历史贡献。它使过去很可能是自发的、民间的、无组织的、接力棒似的交通联系转化成了在西汉王朝自觉努力之下，运用政府的力量，进行强有力组织、建设、保护、管理的交通干线。它发自长安，经过河西走廊穿越塔里木盆地的南北缘，跨越帕米尔西去西亚、南亚、中亚西部广大地区，成为沿线国家、民族进行政治、经济、技术、思想、文化交流的更为便捷的桥梁，也进一步沟通了亚、欧、非洲各国及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往来。从这时起，“丝绸之路”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获得了空前的繁荣。

二、“丝路”新疆段路线变迁

一条交通路线的产生、发展，都有其内在的根据。既受自然地理因素的制约，也受到社会政治形势的影响，如沟通亚欧、影响及于沿线许多国家、民族的“丝绸之路”，在汉王朝时期，步入全新的历史阶段，社会因素的影响明显十分巨大。大量历史事实表明，通西域、断匈奴右臂的社会要求，引发出十分强大的组织力量，恶劣的地理环境受到改造，以保障通路的运行；同样，在另一不同的社会形势前，社会的力量也能使自然条件远为优越的交通线路被阻断、被封闭，形成人为的却也是难以逾越的障碍。

新疆南部地区，南有阿尔金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耸峙。地势高达5000米以上，只有高山雪水下洩的几条内陆河道形成的绿洲，人类才能生存、活动。与昆仑山相对，天山绵延起伏，除山前断续分布的绿洲外，还有一条横贯东西、流程全长达2437公里的塔里木河。这为“丝路”北道交通增加了便利。天山、昆仑山之西，是世界屋脊帕米尔，在这形成了相当封闭的塔里木盆地。只是在东部天山与阿尔金山之间，留有一道宽数十公里的天然豁口，东接河西走廊。这一自然地理形势，在人类历史时期内，并没有大的变化，受这一自然地理形势的制约、影响，顺理成

章，汉王朝时期要开拓“丝绸之路”沙漠道，比较便捷的路线只能是出河西走廊，寻路抵达阿尔金山、昆仑山北麓或天山南麓的沙漠绿洲，选择可以取得给养的路线前进。其间，可清楚观察到强大的社会需求，是不可阻抑的力量，不论条件如何艰难，交通总可以维持。而在社会条件稍显变化时，路线随即变化。因此，两汉、魏晋、隋唐，各具特色。最后，翻越帕米尔高原中的大坂、沟谷，抵达西亚、南亚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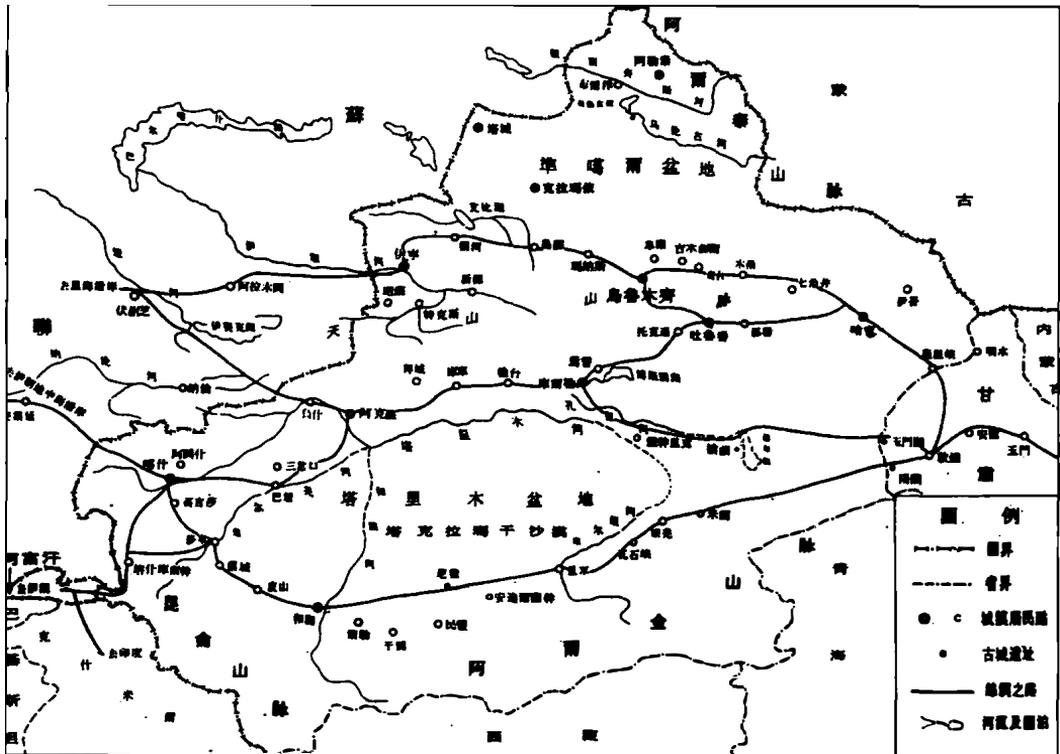


图1 丝绸之路新疆段主要路线示意图

论及公元10世纪前“丝路”新疆地段沙漠道的具体路线，如果说，塔里木盆地南北缘的“南”“北”道线路，即使有变化，还不是太大时，那么，在出河西走廊，进入孔雀河流域前，还有一段500公里左右途程，其间盐漠、雅丹、戈壁相继，水草补给困难。这段路线，在不同历史时段，变化可谓相当的激烈。粗略分析这些变化，可以很清楚看到社会因素在其中的重大影响。具体分析其变化发展，可以大概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 汉王朝以前

汉王朝以前，中原地区通过新疆与西方交通及经济、文化联系的具体情况，史无明文。由前面介绍的考古资料，可以肯定，在公元前1000年的周秦时期或其以前，自黄河流域通向西方的交通路线，实际已经存在，只不过是处于一种自发的、民间的、无组织的状态，因此在官府文档中少见反映。地理位置最近河西走廊的罗布淖尔荒原，从很早的历史时期起，已是人们使用的捷径，孔雀河水系内青铜时代墓地中所见海菊蛤、玉石，就是证明。而在开拓这条路线时，处于西北地区的秦国、秦王朝，在西向交往、联系中，自然居于关键的地位，发挥过不可低估的作用，且规模会日有进展。因此，“秦人”随这种联系的存在、发展而广泛影响南亚、中亚、新疆地区。印度、伊朗至今仍称中国为“秦”，《史记·大宛列传》记录，当年的大宛称中国人为“秦

人”；新疆拜城县保存至今的东汉时期摩崖刻石和刘平国治关亭诵，距秦王朝虽已有400年，却还是按当地传统，称凿石建关的工人为“秦人孟伯山”等。“秦人”的概念，没有疑问，和后来的“汉人”“唐人”一样，是周秦时期秦王国到后来的秦王朝，曾经有相当数量中原地区人民在新疆及中、南亚地区进行广泛地活动，并留下受其深刻影响的产物。其实际交通路线，在没有敌对政治势力阻抑的情况下，不论是昆仑山北麓、天山南麓，还是天山北麓的通道，大概也都是随处可行，即使偏僻如阿拉沟这样的天山峡谷，前引考古资料表明，也都网织在这一交通线上。

（二）两汉王朝时期

出于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需要，两汉王朝对开拓丝绸之路十分重视。张骞、班超通西域，李广利征大宛，在敦煌至罗布淖尔一线建烽燧、设邮置，在楼兰、轮台、扞泥等地开屯田，设“西域都护府”，设官置守，使汉朝政令“颁行”于西域。这样使得丝路交通得到正常运行。经过两汉时期坚持不懈的努力，从长安通向西方世界的“丝绸之路”，成为得到政府经营、沿途给养、通信联络可以保证的国际交通命脉。自此，“丝绸之路”正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亚欧交通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汉王朝开拓、建设通向中亚的“丝绸之路”，始终与匈奴王国的矛盾、冲突密切相关。

西汉王朝通西域的路线，最初由于匈奴王国控制着新疆北部草原、哈密绿洲及吐鲁番盆地，在焉耆地区设置着统领西域最高机构的“僮仆都尉”府。这一形势下，西汉王朝通向西部世界的道路，主要就只能出敦煌，斜向阿尔金山，自阿尔金山北麓、昆仑山北麓匈奴控制相对较弱的地区西行。西汉时称此为“南道”。与“南道”并存，出敦煌后，沿疏勒河谷，经过白龙堆、盐泽、楼兰到焉耆盆地，沿天山南麓而西出大宛的路线，也是一条可以伺机而走的道路，西汉时称此为“北道”，但沿途匈奴的干扰不小，为了使这条道路可以顺利行走，西汉王朝在军事上做过相当艰苦的努力。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21]，把握这一形势，汉王朝遂自敦煌而西，筑长城、亭燧，稍后并在渠犂、轮台置屯田，核心就是把握对匈奴取得的军事胜利，加强建设通向中亚大地的“北道”路线。目前仍然屹立于地面的玉门关以西、沿疏勒河谷铺展的汉代长城遗迹，黄文弼先生在罗布淖尔湖北岸发现的汉居卢訾仓故址——土垠，自土垠而西，现在仍可以见到的沿孔雀河谷、库鲁克塔格山南麓铺展的汉代烽燧，都是西汉王朝努力开拓、东汉王朝进一步建设“北道”干线保留至今的历史纪念碑。

通过伊吾、车师进入焉耆，沿天山南麓西行中亚的路线，汉王朝得以比较稳固的控制，实际上只是在东汉取得对匈奴王国的决定性胜利，匈奴基本丧失对新疆的影响以后，才得以实现的。东汉时期，窦固征匈奴，组织伊吾屯田；班勇在公元123年以“西域长史”身份屯驻柳中，都表明，东汉王朝仍进行着艰苦努力，力图加强对伊吾、车师的控制，求丝路便捷与交通安全。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

与两汉时期比较，魏晋南北朝阶段，“丝路”沙漠道的最大变化，是避开异常艰难的白龙堆，另觅新途的努力得到成功。这新的通途：一是经伊吾绿洲到吐鲁番的路线更为顺畅；再是经“五船北”的新道已成为现实。古代文献、出土古文书资料都说明了这个结论。

《魏略·西戎传》称：“道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

经若羌，转西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龙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并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戍已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22]这里所说的“新道”，要“出五船北”，毫无疑问，就是两汉时期曾经力图开拓的“五船北新道”。

关于这条“新道”的具体路线，历来是历史地理学界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根据有关古籍记录，参证近年出土的古文书资料，结合自然地理形势可以得出结论：这一新道，实际就是从高昌古城东出柳中，沿库木塔格沙漠西、南缘，翻库鲁克塔格山，进抵疏勒河流域，而抵达古玉门关。这样的行程，避开了令人谈之色变的白龙堆沙漠，而且路程大大缩短，故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古代丝路上一条重要的支线。

为探寻这条径道的具体路线，笔者在吐鲁番考古中，曾向鄯善县敢于出没沙海中的猎手调查，并在《吐鲁番古代文明》一书中说明过有关结论。其路线是：“从鄯善县鲁克沁绿洲斜向东南行，经底坎尔、土古满它、比尔阿塔尔布拉克、肖尔布拉克、玉尔袞布拉克、央布拉克、乌宗布拉克、巴勒袞布拉克、红柳泉、抵库木塔格沙漠南缘；也可以从底坎尔向南，经和加玉尔袞，穿库鲁克塔格山道、阿里提未布拉克，经七个泉、布尔袞布拉克到红柳泉，与前路合。复经库鲁克塔格山脉南麓，顺山势东行，经库木库都克、羊塔格库都克、科什库都克、臭水泉、具什托克布拉克等，抵达疏勒河流域，与出玉门关后通楼兰的大道结合在一起，把白龙堆沙漠，无法通行的盐碱滩抛在了身后”^[23]。简单地说，这条通道，是从鲁克沁斜向东南，经底坎尔，逐渐进入库木塔格沙漠，遵循着一些泉水溢出地点，过库鲁克塔格山，到红柳泉，顺山东行，即可抵达敦煌。据说，这条道路1949年前还有人通行。这条道路的最大特点是要穿越渺无人烟的库木塔格沙漠，即“沙海”，因而唐代也曾被称为“大海道”。

在吐鲁番出土十六国时期文书中，有北凉建平时期“守海”文书两件。文书均出土于高昌城北郊喀拉和卓第91号墓，内容为北凉王国兵曹下文，命令高昌、横截、田地三县发人发骑服役守海，役期十日，^[24]这里的“海”，只能是高昌东部的库姆塔格“沙海”。文书表现了北凉王朝对戍守大海道十分认真，证明当年高昌通过大海道往来敦煌，仍是一条相当重要的交通路线。

与大海道至少处于同等地位或较“大海道”更为重要的是由伊吾经白力来去高昌的通道。这是一条传统古道，汉代即受重视，但受政治形势影响，时通时阻，并不顺畅。在出土的北凉文书中，有6件文书与发人戍守白力有关。^[25]

白力，是高昌东部重镇，控扼伊吾与高昌之间的交通。北凉“兵曹”，不断向各县下文，催遣部伍守“白力”，这说明位于今鄯善县境的“白力”，是由伊吾进入高昌的一处重要关隘。

北凉王朝对“大海道”与伊吾道的建设和经营的重视，既表明从高昌通过大沙海前往敦煌，或经过伊吾到敦煌，是当年吐鲁番盆地通达敦煌的重要交通线，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出敦煌后过白龙堆、楼兰交通路线地位的降低，正逐渐被取代。楼兰出土的古文书表明，楼兰古城在魏晋、前凉时期还是一处屯田基地，西域长史驻节之所。但遗址内绝不见公元330年以后的纪年文字资料。人们一般都同意，此后楼兰即逐步趋于衰落，沦入荒漠。这当然意味经过楼兰城的交通路线已失掉既往的重要地位。与这一重大历史现象密切相关，根据吐鲁番出土的北凉时期古文书，可以想见与此同时或较此稍后，与楼兰径道具有同等地位、但条件稍好、路线大大缩短的“大海道”已是一条受到官方经营、管理的交通路线。这不应是巧合，而应有着内在的联系。因为大量的历史文献反复表明，开拓“五船北新道”亦即“大海道”，一直是改进“丝路”沙漠道这一路段交通情况的希望。开通这一路线，可以回避白龙堆之险，大大缩短运输日程。北凉时期这一路线的畅通（其时间当然会比文书中所显示的时间更早），并为人们所接受，意味着楼兰的交通枢纽地位的丧失与历史地位的没落。

(四) 隋唐时期

进入隋唐，国家统一，经济文化发展，“丝路”交通，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空前繁荣的阶段。

根据出土文物及各地城镇遗迹，结合历史文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历史时期的“丝路”交通路线，可以说是全面畅达。不论是缘昆仑山北麓、天山南麓、天山北麓来去，都无阻碍。如果更全面地分析有关资料，可以得出更进一步的具体结论：由河西走廊进入哈密绿洲，复由哈密绿洲经吐鲁番沿天山南麓西行的路线；由伊吾（哈密绿洲）翻天山松树塘大坂进入蒲类海（巴里坤盆地），沿天山北麓西行，过北庭、轮台（这里的轮台，是唐王朝新设的轮台），尤其是由伊吾入西州，由白水涧道入轮台、西向弓月（在今伊犁河流域）的路线，已明显居于一种主体的地位，成为唐代西向中亚的最主要的交通路线。

唐朝政府深切关心丝路路政建设。近年来，吐鲁番出土的文书，对唐代路政建设多有揭示，颇可与古籍记录相呼应，有助于我们对“丝路”认识的深化。

为保证丝路交通的便捷，唐朝政府在丝路沿线设置驿馆、配置驿马、驿丁，以保证往来官员交通、食宿之需。吐鲁番阿斯塔那曾出土一件纸棺，糊制纸棺的材料是唐天宝十三至十四载（753—755）轮台、柳中两县下属郡坊、驿馆的马料账。在账册上可以看到来往官员住宿、用马耗料均逐日登记与结算。因为是官方账册，其上钤有唐轮台、柳中两县的官印。账册上涉及的驿馆有交河、天山、酸枣、碛石、神泉、达匪、草堆、银山、柳谷、吕光、东碛石、柳中、罗护、赤亭等。当年唐代封疆大吏北庭付都护封常青及其幕下的边塞诗人岑参来去住宿、用马、消耗马料的细账，也都历历在目。^[26]

为维护社会安定，保证交通安全，在丝路沿线，唐朝政府设军置守，从戍、烽、铺到守捉、军、镇，组织严密。据吐鲁番出土的文书记载，自甘州至西州途中有悬泉、苦水、常乐、盐池守捉；自西州至庭州，有赤亭烽、酸枣戍、岸头府游奕所；自西州至安西都护府途中有铁门关镇戍守捉。在出土文书中所见的烽，在伊州境内有阿查勒烽、泥熟烽、故亭烽、青山烽、桎槌烽、高颈烽、速度烽、花泉烽、伊地烽、柳望烽、明大烽、波色多烽、工耳烽、乌谷铺、乌骨裸铺；西州境内有赤亭烽、小岑烽、维摩烽、神山烽、柳中上烽、武城上烽、交河上烽；在庭州境内有耶勒烽、干坑烽、桎林烽等。这当然不是完整的统计，而是仅见于新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中的部分烽铺。在吐鲁番盆地西缘，进入天山的阿拉沟口，笔者曾清理一处唐代戍堡，为天山县属的鸛鹑游奕所故址。据戍堡出土的文书记载，镇下有白水、黑鼻、碛石、阿施、鸛鹑、赤山、小白水等烽，临蕃、摠见、断贼等捉铺，总有镇兵约百人，镇将名孙玖仙，几乎都是来自中原大地的长住健儿^[27]。他们戍守在阿拉沟东口，实际上控制了吐鲁番与焉耆、伊犁河流域交通往来的隘口，维护交通安全，颇见组织的严密。

为纠察奸宄、保证交通安全，唐朝政府对“丝路”上来去行人颁给“过所”。行人通过关戍、守捉，必须勘验过所。这是汉代以来就实行并取得效果的一项制度。在罗布淖尔、尼雅的汉、晋遗址中，发现过这类木简。而到唐代，制度就更进一步完备了。吐鲁番出土的石染典过所、唐益谦过所、蒋化明过所等，对了解唐代过所制度及有关交通路线，都是难得的资料。^[28]石染典是安西商人，到瓜州市易。返程，由瓜州据原安西过所改给过所，途中经过的悬泉、常乐、苦水、盐池守捉，守捉官或守捉押官都要勘验，签名，放行。石染典最后止于西州，随身过所存留伊州刺史的签押。唐益谦是安西官吏，要前往福州都督府长史唐循忠的任所，随同有唐循忠妾薛氏及奴婢、马、驴等，申请文书说明了每人身份、年龄，奴婢、马匹的来路及有关证件，并说明准备通过的路线是“路由玉门、金城、大震、乌兰、僮（潼）、蒲津等关”。由于里程远，涉及问题的较多，请过所者身份也不是平常百姓，所以最后要经过当年西州都督王斛斯亲自批准签发。蒋化明过所丢失，在由西州返回北庭的途中，即被酸枣戍检查拘留。保留

至今的这些过所文书，既表现了唐朝政府对人民的严密控制，也表现了在丝绸之路上只要有过所在身，即使迢迢千万里，也可以通行无阻。

据出土文书载，为便于交通运输，唐代在西州设置有“长行坊”，这是一种专司运输的官办运输机构。运输工具有牛车、长运马、长运驴等。管理这类运输事务的机构称“长行转运史”。后人不仅在出土文书中见到“转运史”“车坊”“北馆坊”“赤亭坊”，采办“车材”“具”，存储备用，也见到有关“长行驴”死后处理肉、皮的文书。此外，木制、陶制牛车，马、驴、驼俑等更是屡见的文物。

为保证丝路交通所需给养，自汉代以来，一项成功的政策就是实行屯田。唐代屯田同样取得巨大成功。伊州、高昌、安西等处，都是当年重要的屯田基地。反映屯田状况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数量颇多，有关论述不少。很明显，没有屯田作为后盾，要维持丝路行政管理机构，沿线驻军、驿馆开支、使节商旅沿途供应等，都是很困难的。

应该说，正是得力于唐代这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才保证了唐代丝路交通的顺畅，丝路贸易的繁荣。

论及陆上“丝路”交通，一般均止于唐代。实际唐代以后的陆上交通线，虽然因海上交通的发展而相对降低了它在沟通亚、欧交通方面的地位，但实际上它在唐代以后仍然是继续存在并发挥着作用的。即使如五代时的分裂割据，宋王朝也不能号令西北，丝路交通不能如唐朝一样畅达，但宋王朝与于阗回鹘政权，关系就相当密切；高昌回鹘与辽也有相当频繁的往来。元朝，通过陆路与欧洲的交通，又形成过一次高潮。明代，中国的大黄、茶叶，在欧洲、西亚仍具有十分重要地位。而运输大黄、茶叶的路线，就是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这些例子，说明唐代以后，陆上“丝绸之路”并没有完全退出亚欧交通的舞台，只是它们随着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

三、南、中、北道史迹扫描

（一）南道

这是西汉以前即存在，宋、元时期仍可通行的一条古道。

关于这一路线，《汉书》上说是“从鄯善旁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魏略·西戎传》记录是“从玉门关西出，经若羌，转西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为南道”。至于鄯善（今若羌县境）以东怎么走，到鄯善后如何“波河”西行到莎车，则史无明文。

“丝绸之路”南道，据上引文献记载，汉、魏时期，最东段的具体路线，是由玉门关（或阳关）西行，进入鄯善。至于出敦煌至古鄯善之间的路段，究竟如何走？学术界实际是相当模糊的。近年新疆沙漠地理学者曾在罗布泊地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综合考察。根据实际地理形势并参证沿线文化遗物，判断其主要路线是：自敦煌沿疏勒河谷西进，经过羊塔克库都克、库木库都克、土牙、阿其布拉克、敦力克进入米兰。

理由是，出疏勒河谷向西，南为库姆塔格沙山，北为坚硬似铁、锐利若刀的龟裂盐漠，人、畜都难以行走。而在它们之间是一条狭长的山麓沟谷地带。一些地段有泉水溢出。历史时期内，环境变化不大。因此，自敦煌入米兰，这是唯一最为近便可以通行的径道。其次，沿途也见到不少历史文物，如在库木库都克东部沙西井，曾采集到古代饰珠，唐代、清代钱币，马掌，附近山梁上见长期使用、踩踏平实的驼道，路畔有标示行进方向的人工堆石，沿线偶有泉水出露，可补给旅人；在库木库都克，采集到铁马掌、小件铜器，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件

已残的动物透雕铜饰牌，明显具有鄂尔多斯青铜器风格，^[30]晚到匈奴文化中也不乏这样的饰件；在土牙，见到古墓遗迹；敦力克有古烽一区，方形，残高5米，夯土构筑，夯土层中夹含芦苇，与汉代长城、烽燧建筑方法相同，烽台下，残存半地穴式房舍四间；在敦力克古烽南约2公里，可以清楚地见到一条古道。这里，距伊循故地——米兰绿洲仅35公里，由伊循抵鄯善扞泥城，已属坦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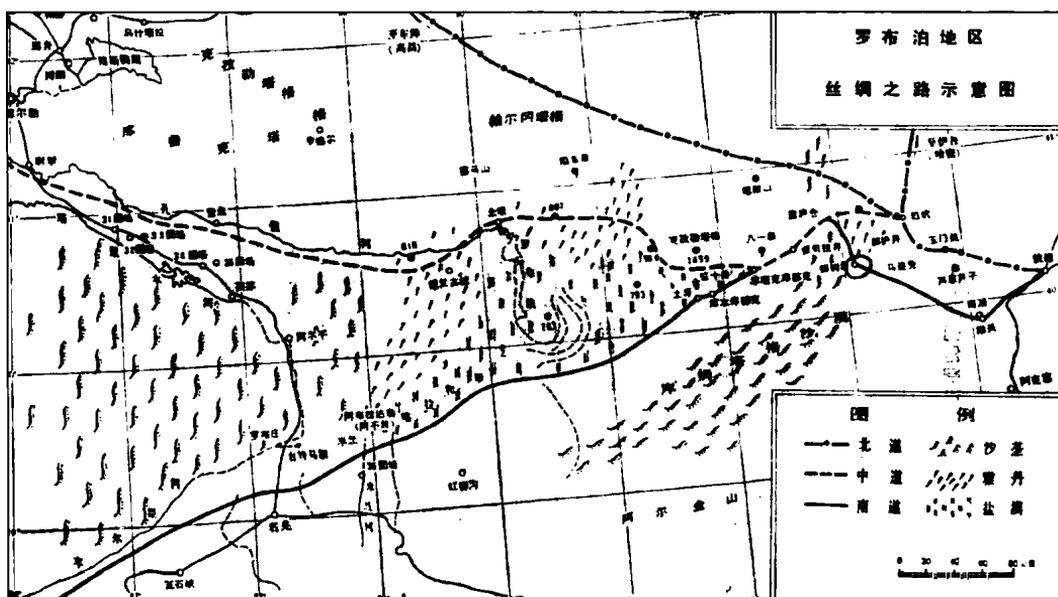


图2 阳关至鄯善交通路线示意图（引自《罗布泊科学考察与研究》）

虽然，在汉王朝控制楼兰古城后，经过楼兰古城，也可以通达米兰绿洲。公元前77年，迁楼兰王国至扞泥，自楼兰故城至伊循、鄯善之间自然会有路可通。但在此前，自敦煌至鄯善之间，前述的径道当是主要交通路线，且它与《汉书·西域传》的记录，是彼此切合的。

米兰，是鄯善王国境内最肥沃的绿洲，处于鄯善王国东境，近敦煌。这片绿洲，凭籍源自阿尔金山的独立水系——米兰河灌溉。米兰遗址所在地区，黄土层厚达5~15米，土壤以轻壤、沙壤为主，含盐少，是罗布淖尔和塔里木河流域少见的优质土壤，而且地下水埋藏深，矿化度弱，加上冬日少风，气候较温和，是一处十分理想的、可资农垦的地带。确实可算是《汉书·西域传》中所称的古鄯善国中最“肥美”、近敦煌的土地。

20世纪后期，水利史、考古学者，在米兰地区调查，发现了一处古代灌溉渠系遗迹，并对之进行了较深入的测量。灌溉区内，大型干渠、支渠，斗、农、毛渠的布局仍依稀可见。水利工程师对此进行了分析，得到了“水头控制良好，干渠线路平直整齐，渠系分布均匀，渠道引水势顺，全灌区均可得水”的结论，并推断它是汉至唐代的一区屯田水利工程。^[31]1989年秋，笔者偕刘文锁、肖小勇到米兰地区，除踏查过上述已见报导的遗迹外，又在傍近灌溉渠系处发现一区汉代遗址，采集到汉代文物，可以为米兰遗址曾是汉伊循屯地提供新的证明。

遗址位于米兰古城堡东南约2公里，米兰河西北岸第二台地上。占地约100 000平方米（200×500米）。在遗址范围内，陶片遍地，多夹砂灰、褐陶，火候较高。器型多罐、盆，均尖唇、折沿，相当数量灰陶上饰细绳纹。这是中原地区汉代盛行的一种纹饰。新疆地区，除奇台县石城子中曾见这类绳纹灰陶外，它处未见。此外还采集到西汉五铢、三棱形铁镞、铁质鱼鳞甲片，大量铁器残片及断残铁刀；多块玉料，大、小不等，以青、白玉居多。西汉五铢、绳纹灰

陶、三棱形铁镞，都给人以遗址活动在汉代的有力说明。^[32]

遗址区西北，灌区范围内，曾采集到一件镏金铜卧鹿，在内蒙古曾发现过与此可以类比，型式相近的铜鹿，是战国至西汉时期的作品；米兰卧鹿，与文形式相同，但制作更为精致。这透露了汉代匈奴在这片地区也有过活动的消息。^[33]

吐蕃戍堡西南一区废弃佛寺的内护壁，发现两躯有翼天使像。这是A.斯坦因当年的劫余。斯坦因在掘取米兰壁画时，注意到画作者署名“Tita”，这是希腊罗马人常用名（“Ti Tus”）的佐卢文拼法。透露了画作者可能是中亚移民后裔。^[34]与这一犍陀罗式壁画遗存可以呼应，在这区出土了有翼天使的佛寺之东北，还有一区时代晚到南北朝至隋代的大型土建佛寺，存巨型佛像。寺院外墙壁龕内，塑像多已不存，但龕柱显然具有罗马式风格，^[35]这些遗存，结合在尼雅遗址所见多件表明月氏胡来去的过所^[36]，A.斯坦因在第四次中亚之行中，在尼雅所获的精绝王接待“大宛王使”“左大月氏”安排座次的汉文木简^[37]，可以揭明一个历史事实：在汉代丝路南道上，贵霜、月氏、大宛等中亚古国居民、使者，是不绝于途的。深受希腊文化浸染的贵霜王朝，与精绝、鄯善王国关系颇密，米兰佛寺建筑细节、壁画遗存，就保留着这方面的消息。

在米兰遗址区内，至今保存最为完好的遗迹，是一区吐蕃入据塔里木盆地时的戍堡。戍堡土墙，植基在早期墙基之上。A.斯坦因曾在古堡内晚期房址中，掘获大量吐蕃文木简。20世纪70年代，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古堡发掘，又获吐蕃木简200多件，文字记述了吐蕃驻军屯种生产的情形。^[38]汉代居址、灌溉渠系、佛教寺院、吐蕃戍堡，这些都说明自汉迄唐，这里一直是“丝绸之路”南道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站点。

自米兰而西，约80公里，为若羌绿洲。上文中引《汉书》《魏略》中述及的丝路“南道”首站“鄯善”，其王国都城扞泥，故址就在今天的若羌绿洲内。它东向伊循通敦煌，西去“且末”，南入阿尔金山，抵羌中，入青海，在丝路“南道”上，是一处具有重要地位的站点。

古鄯善王国扞泥城所在的若羌绿洲，有源自阿尔金山的若羌河滋养，使阿尔金山北麓若羌河谷成为一片可耕可牧的乐土。扞泥城故址从遗迹判断，当在今天若羌县城东南，距离约6~7公里处，名“且尔乞都克”，城周约720米，城墙宽1.5米，残高1米，用卵石垒砌。东距若羌河约300米，古城内建筑多已湮灭无存。仅见的一处遗存，土坯筑，周约220米。西北角有土台，似为佛塔基址。清理中，见过贝叶经及纸质梵文书，泥塑佛像及壁画残片。^[39]在古城遗址之西南，尚存一处佛教寺院遗址，名“孔路克阿旦”，遗址周长亦近200多米，存佛殿、佛塔，可见壁画残迹，建筑用土坯，规模同于且尔乞都克，¹⁴C测定遗址年代在去今1915年±75年，约当西汉末至东汉时期。^[40]此外，可以与古代扞泥联系的遗存，是今天县城西郊的一处大型土墩，直径达30米，残高仍达10米，地表见夹砂红陶片。土台四周有较大卵石，以及红烧土、灰土。比较平坦的地面，高高耸立的土台，或与守望戍守的功能相关。^[41]这些零星的遗存，已难以显示当年扞泥城的具体面目，聊可供着历史的联想而已。^[42]

自扞泥故址向南，在若羌河出阿尔金山口一处峭壁断岩上，仍可见到一区古代戍堡遗迹。断岩三面环水，一边与台地相连，山势陡峻，相对高度约100米。城堡依断岩顶部形势而铺展。东侧临水之峭壁曾用块石垒砌取平。部分堡墙仍存，残高2.5米上下。堡墙内可见石垒房址数区，10间左右。观察剖面，文化层堆积颇厚，内含大量木炭、炭屑、灰烬，并见青灰色条砖（40厘米×25厘米×6厘米）、石质甲片、铁炼碴、残铁器。古堡所在，是若羌绿洲进出阿尔金山的重要隘道，而且控制着若羌绿洲的生命之源——若羌河。^[43]从这些遗迹分析可知，自古代若羌绿洲进入阿尔金山，沿河谷曾有军事性质的守御系统。从“丝路”角度说，揭示了自昆仑山北麓西行的“南道”与交通阿尔金山的“羌中道”，若羌河谷曾是其间联系的重要孔道之一。吐蕃进入塔里木盆地，这里是一处主要隘口。可透见当年古鄯善在丝路“南道”上连通东西、交通阿尔金山内外的地位。

自若羌城西行90公里，为瓦石峡绿洲，引瓦石峡河而灌溉。古代瓦石峡城，已淹没在今瓦石峡绿洲西南6公里处的一片红柳丛中。在约2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发现30多处居址、3处窑址、1处冶铁遗址。发掘中获得土制玻璃器皿，唐、宋钱币，元代文书。它们说明了直至宋、元，这区遗址还在“丝路”南道上发挥着作用。^[44]

《汉书》说，南道出鄯善后“波河西行”，应自车尔臣河谷西走。这片地区，目前为胡杨、红柳、芦苇丛生的灌木林，沿途水草不断。车尔臣河宽处，可达百米。在以畜力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古代，沿河谷西走，是相当理想的交通路线。笔者曾沿车尔臣河谷进行认真调查，确也发现了一些古代废址，如阿孜勒克遗址，它失落在去河道不远处的一片枯死的胡杨林中。胡杨直径粗大，或双人才能合抱。遗址区内，部分建筑废墟仍然暴露于地面，以木为梁，土坯为墙，但不见文化遗物。附近发现的墓地是以掏空的胡杨木为葬具，具有早期土著文化的特征，而非伊斯兰文化特点。故可判定遗址废弃时间当在伊斯兰文化进入这片地区以前。在塔地让乡克干墩，尚存两处古烽，烽燧已大多为沙掩覆，但仍可观察其构筑办法是芦苇、红柳夹土坯，层层相叠，如汉代风格。在烽台附近，采集到的夹砂红陶片，同样具有早期特征。这些与河谷平行的古烽，揭示了古代丝路沿车尔臣河西行的路线。

且末县城稍偏西南，与车尔臣河故道相去不远，近年，发掘过扎洪鲁克墓地。墓地附近，为占地面积相当广大的纳勒克遗址。

扎洪鲁克墓地，是且末王国的墓葬遗存。在先后发现的四区墓地中，已发掘墓葬176座。根据墓葬形制、出土文物及¹⁴C测年推断，墓葬时代早到公元前8世纪，晚可到公元3世纪。早期墓葬主要为竖穴棚架，丛葬。一墓多者可达20人，仰身、下肢上屈。尸体保存比较完好。不少死者以彩绘面，手臂刺青，长辫戴帽，毛布包脚，身穿毛布袍、裙或皮裤，束腰，带项链。随葬木器、陶器，木器器表雕刻动物图像。其中出土的木质篋篋，显示了他们与亚洲西部（如伊朗高原）存在着文化交流。晚期墓葬，同样见竖穴棚架。出土文物中除传统陶、木器外，还见到漆器、玻璃器、珊瑚珠饰、丝绢织锦及棉、毛织物，还出土了魏晋时期纸质汉文书及各式点心。由此可见，作为当年“丝路”上的重要交通站点，东来的丝、漆，西来的玻璃，均已成为且末王国居民物质生活中的重要元素。^[45]

那勒克遗址，是散布在古且末河谷一区范围相当大的早期遗存。在这一遗址上见居住遗迹与三棱式铁镞，大量褐陶片、残铁器、几何形花押、玻璃器等，自河谷左右向展开，有相当规整平直的渠道。量度其中一条，宽达6米、深达0.5米、长达50米左右。它与陶器，都显示着定居农业生产的性格。从陶器特征，与前述米兰遗址上的相近，据此推论，遗址活动，应在汉晋时期。当年的“丝路”交通，与此是存在关联的。

玄奘东归，自吐火罗故国东行，提到“析摩塔那故国，即且末地也。城廓巍然，人烟断绝。”对玄奘提到的这区且末废墟，读者往往都与此处规模相当大的遗存相联系。这不无可能，但却难以定论。我们在且末调查中，曾经了解到在县北大沙漠中，还保存着一座形制相当完整的古城，坐落在阿牙克河古道旁。北距县城约80公里，与尼雅、安迪尔正处于纬度相当的地理位置。20世纪50年代，测绘工作者在沙漠中还清楚看到过城垣遗址。兰州沙漠所的沙漠科学工作者曾在城内采集到佉卢文简牍。近年曾有学者多次深入沙漠中，希望一探其究竟，但均无所获。通过航片分析，古城已经淹没在沙尘之下。

自且末西走，有安迪尔古城，这是又一处已淹没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古城废墟。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提到的“吐火罗故国”，“国久空旷，城皆荒芜”，就是指此。1989年深秋，笔者在这片废墟中踏查，对遗址范围广大、延续时间长久，而且经历过多次居住活动有十分深刻的印象。斯坦因当年发掘过的城堡，今天又大部分掩埋在了沙尘之中，只是建筑木架的顶端及围墙，在沙尘中仍清楚可辨。我们在这里，采集到旋制得十分精美的建筑部件，陶片、

钱币、碎铁片，一枚汉佉二体钱，一躯干裂发白的木质菩萨像，具有鲜明的犍陀罗艺术风格。还见到一件完好的手制带流罐，陶质夹砂，手制，直口大流单耳大平底，通高11厘米，器壁见烟炱痕。在楼兰城东一座可能早到西汉的墓葬中，近年曾发掘出土一件与此形制相类的单耳带流罐。它们表明，这是可能早到西汉时期的陶器。从楼兰到安德悦城中均见此文物，这揭示了一条文化交流亦即交通联系的路线，在这条路线上，A.斯坦因在此曾采集到西亚风格的玻璃珠，这是一种公元1世纪至公元4世纪罗马产的带花玻璃片；^[46]同时也揭示安德悦遗址人类活动的时间，可以早到西汉或西汉以前，而在玄奘东归时，这里却已是一片久已废弃的空城。但是，在20世纪初叶斯坦因发掘中，却不但见到了唐开元时的汉文题铭，而且获得不少吐蕃文书。它们生动地说明在玄奘东归以后，这一废址又恢复生机，^[47]重新成为丝绸之路南道上的重要站点。

两汉时期的精绝王国，是“丝路”南道上的重要站点，故址在民丰县北部沙漠中的尼雅废墟之中。北距民丰县城直线距离约120公里，遗址南北长约25公里，东西宽约5公里。在废墟中共见古城、房址、畜厩、佛寺、制陶及冶铸作坊、古桥、果园、行道树、涝坝、灌溉渠、农田等各类遗存约200处。遗址呈南北方向，散布在尼雅河故道左右台地上。自20世纪初开始，迄止1997年，考古工作获得了大量汉、晋汉文、佉卢文简牍，陶、木制器，大量丝、绢、锦、绣、印花棉布以及毛罽、毛毯、五铢钱、汉佉二体钱、铜镞、汉镜、漆器、玻璃、珊瑚、蜻蜓眼料珠等，却不见公元5世纪以后的物品。出土的“汉精绝王承书……”简，肯定了出土地为精绝王国故址所在；佉卢文函牍上的维纳斯、宙斯图像封泥，棉布上丰收女神图像，玻璃器、蜻蜓眼料珠等，清楚地显示是来自帕米尔以西的文化印痕；“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龙纹铜镜、漆器、藤奩盒等，则是来自两汉王朝。佉卢文中有当年以驼、马在沙漠中运输货物，沿途供应苜蓿、草料的记录。这些清楚地表明，在公元5世纪以前，当年丝绸之路南道的具体路线，还深处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距离今天昆仑山下的主要绿洲居民点，达100公里以上。^[48]

应该强调，在尼雅遗址出土的佉卢文文书，对我们了解“丝路”南道相关交通细节，具有无可代替的价值。下面稍举数例，以见一斑。文后的简号、页码，均为林梅村的《沙海古卷》（文物出版社，1988年）中的编码。

南道，由且末至于阆的沙漠交通路线，多件简牍揭明，具体路线是由“且末”，至“莎阁”，至“尼壤精绝”，再由精绝至“扞弥”“于阆”（简14，40页；简214，70页；简367，103页），这里的“莎阁”，从地理位置分析，似与安迪尔遗址相当。交通往来工具主要是骆驼，也有马。骆驼，有官驼、私驼之分。在沙漠中来去，向导十分重要，但在沙漠中，向导商旅、使者，是一件苦差（简10，37页），不能硬派“骑都”作向导。一人名“布军”上诉家里“世代非向导”却“被派当向导”（简438，115页）。遇有重要客使，鄯善国王会直接指定提供“专用骆驼”，并派有经验向导亲自带路（简22，44页；简135，65页）。饲料也有特别规定，比较珍贵的牲畜，要供“面粉”“谷物饲料”“三叶苜蓿”“紫苜蓿”（简214，71页）。这些记录，清楚地揭示了古道在沙漠中运行的细节。在南道上进行丝绸经营，“汉地”“商贾”是关系人，在“汉地来的商贾抵达时，务必清查”（简35，50页）。看来，中原汉地商人，售卖丝绸物品时，有赊销、定期再回来收取货款的情况。但在丝路沿线，也有汉人常住，相关地点见诸残简的有“乌宾特”“且末”“尼壤”等（简686，251页）。这些细节，可深化我们对丝路南道沙漠运行情况及丝绸贸易形式的认识。

全面分析精绝遗址，可以清楚得出结论，它的废弃不会晚于公元5世纪。在遗址区内，没有发现过较公元5世纪更晚的文物。因此，南北朝以后至唐代，南道的路线已不再经过尼雅。具体地点，目前还不清楚，但总在今尼雅故址之南，是不会有问题的。

丝路南道，自精绝西行，主要站点是“扞弥”。这同样是南道上不可逾越的一站。近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克里雅河下游沙漠深处，发现的圆沙城，可能是汉代扞弥国的都城。它东距尼雅100多公里，南与于阗县城距离达230公里。古城傍克里雅河故道，城址为不规则四边形，周长近1000米。城内尚存六处建筑遗迹，散见残破陶器、石器、铜、铁器及玻璃珠，多量骆驼、牛、马、羊及猪、禽类骨骼。城郊见灌溉渠。农牧结合的经济生活可以触摸。在这一古城址以南约50公里，同处克里雅河畔，为喀拉墩古城，城址为正方形。城郊有佛寺、住宅、灌溉渠等遗存60多处，出土过汉五铢钱、玻璃串珠等，佛寺内壁画残存。遗址活动在公元3世纪至公元4世纪。丝绸之路南道进入克里雅河流域后，圆沙古城、喀拉墩古城，是不同时间段的站点但都支撑过丝路南道的运行。^[49]

地处克里雅河与和阗河之间的丹丹乌列克文是唐代例谢镇故址，也是南北朝至唐代“丝路”南道上的一处要站，废毁在唐代晚期。目前已经淹没在沙漠中的例谢镇，面积约4.5平方千米，尚可见建筑遗存16处。出土的唐代汉文、古文和阗文文书，表明了当年唐王朝在这里驻军，戍边健儿生活艰难。此处有一处佛寺名称“护国寺”。斯坦因在这里发现过一件用草体希伯来文写成的波斯文书信，是一位定居在伊朗的犹太商人的商业信函，还有一幅东国公主将蚕种藏在头发里的版画，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着丝路南道的历史细节。^[50]

近年发掘的和阗山普拉古墓，对认识汉晋时期古于阗王国的经济、文化状况是一批重要资料。墓地位于昆仑山北麓、玉龙喀什河东岸，今洛浦县西南14公里处，共发掘墓葬68座，殉马坑两处。它们的时代早到西汉，晚至于晋。主要文物为具有特点的双系陶罐、木质用器、弓箭、大量缂毛织物、棉布、蜻蜓眼，各式玻璃珠、丝绸、织锦、汉镜、桃、杏核。丝绸织物及铜镜来自中原，毛织物大部是本地所产，但也有些可能来自西邻。其中毛织人首马身像旗帜，就明显是西来的织品。人首马身图像主题源自希腊神话，挺直的高鼻明显具有希腊、罗马风格。十分精美的毛织人物像，被剪裁成小块用于靴腿之上，对这类织物的使用显示着一种内在的不协调，也表明织物不是本地的制品。^[51]

古代于阗王国的都城至今未能确认。位于玉龙喀什河东岸的阿克苏比尔古城，城址四周河道纵横，遗迹集中，“宽广儿及百里”，黄文弼推定它是于阗国都。^[52]20世纪60年代后，又在遗址地区采集到西汉、新莽、唐、黑汗王朝钱币，契丹文铜币，公元4世纪上下具有犍陀罗风格的陶塑马、象、猴，绿釉莲座陶盖（化生佛像），还有一件陶蚕。陶蚕长5.2厘米，身有轮脊，作平卧状，^[53]可与斯坦因在丹丹乌列克所见公主藏蚕种于发髻的板画相呼应，表现了古代于阗对蚕桑事业十分重视。

今和阗市西郊约特干古遗址，位于喀拉喀什河畔，总面积达10平方千米，A.斯坦因认为这里可能是古于阗国都。^[54]遗址掩复在厚达3~6米的洪积层下。村民、考古工作者不时可在断崖、泉水溢出处采集到各种小型动物的红陶塑，如猴、马、骆驼、伎乐、佛像等，工艺精细。也曾采获一件小金鸭。鸭，唐代敦煌壁画多见，也见于榆林窟中的弥勒变壁画中，表现了西方净土世界的美好。金鸭十分可能与古于阗王国崇信佛教存在关联。^[55]

自和阗西北向莎车，为南道在塔里木盆地内之终点。莎车县境，考古调查不少，但早期遗存大多厚压于沙积、洪积土中。莎车王国的都城——当年的政治、经济中心，至今仍未得明确。

“南道”自和阗经莎车入帕米尔，山间有径道可以通行。只是山险路陡，履步困难。进入帕米尔，重要中继站是塔什库尔干古城。古城位于今县城的北部，依山势而走，用块石、土坯砌筑补缺。城内，高低不平，相当地段仍残留房垣残迹。清蒲犁厅城，坐落于古城东部。笔者20世纪70年代在这里工作，曾选叠压于蒲犁城下的早期文化层，进行试掘，出土了唐代钱币及文物标本，取其中出土树枝进行¹⁴C测年，结论为距今1325年±75年，当于唐代。结合有关文献记录，可以肯定，这里曾经是渴盘陀王国首都，也是唐代葱岭守捉故址所在，^[56]是塔里木盆地

西向阿富汗必经的一处要隘。

出塔什库尔干县城沿塔什库尔干河谷南行，可以直入印度河上游；西南行，可以进入阿富汗瓦罕走廊。由阿富汗进一步西去伊朗、伊拉克、地中海周围地区，坦然而阻。

（二）中道

“中道”是指出敦煌后沿天山南麓过帕米尔抵大宛、碎叶的交通线，即《汉书·西域传》中的“北道”。这一路线，自焉耆傍天山南麓西行，自汉迄唐，以至宋元，变化不大。但是敦煌至焉耆间的路线变化不小：或经罗布荒漠到楼兰，或经伊吾过高昌，甚至经过库姆塔格沙漠入高昌，颇为复杂。

西出敦煌，沿疏勒河谷入白龙堆，过楼兰，沿孔雀河谷西走，这是西汉时期进入西域的一条主要路线。

从自然地理条件分析，这是一条十分艰难的通路。自疏勒河谷进入白龙堆，沿途戈壁、风蚀土丘林、盐渍荒漠，缺水少草，通行十分艰难，所以选择、开拓这条道路，完全是因为存在匈奴对伊吾、车师的控制。因为这一政治形势，西汉王朝开拓了这一路线，从而也把楼兰推上了中西交通枢纽的宝座。

前引《魏略·西戎传》（《三国志·魏志·乌丸传》注引）中，记述三国时这条路线的具体走向是，“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迥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楼兰”。从玉门关过三陇沙、沙西井、白龙堆，到楼兰的途中，要经过“居卢仓”。居卢仓故址，是在罗布淖尔湖北岸一处三面濒湖、一面接陆的半岛上。黄文弼先生发现它时，据地貌特征，称其为“土垠”，^[57]这是一个重要的考古发现。遗址中出土的72枚西汉时期的木简，表明这里曾是开拓丝路、维护汉代丝路交通十分关键的站点。它不仅是仓储，而且是邮置、驻军屯田，涉及面相当广。据简文，来自中原大地的汉族吏民，应征西行，曾经在这片地区屯田。作为丝路“北”道上重要站点，它南与伊循，西与西域都护府、龟兹，北与交河等地联系密切。驻守在居卢仓的吏士，送往迎来，生活忙迫而紧张，在西汉王朝开拓西域、统治楼兰的事业中，它肩承、发挥的作用，无法轻估。尤其值得强调一笔的是土垠遗址不仅通过陆路与西、南、北各处军政中心交通联系，在其西侧濒湖边，还有一区小码头，遗迹尚存，可以通过水路与楼兰、LE古城来往。在新疆丝路上，曾经也存在过水运，这一事实，可大大开阔我们的视野。^[58]

楼兰故城依傍罗布淖尔湖，位于罗布泊西北，东径89°55'22"、北纬40°29'55"处。古城城墙大都已不存。城垣原为不规则的方形，周长1316.5米，总面积108 000千多平方米。从残存土墙看，城垣系堆土垒筑。孔雀河一条支流，自西北斜向东南贯穿全城。城内遗迹尚可见出官署、寺院、居民住宅区。曾出土大量汉晋简、纸文书、佉卢文木简，近年也采集到晋时残木简60多支，这些表明了魏晋时期，这里是西域长史府的驻节地，屯田、戍守，任务繁重。还采集到罗马风格玻璃器、贵霜钱、犍陀风格木雕、五铢钱、丝织物。在楼兰城郊，发掘的汉代墓葬，出土最多是汉代锦绢、漆器、铜镜，也有不少精致毛毯、斜纹毛织物、平纹毛布、木器、陶器等。作为丝路北道枢纽，东西文化特征的文物毕集于一处显示了汉晋时期楼兰古城最本质的风貌。^[59]

从楼兰古城斜向西南行，经过斯坦因编号的LK古城，可以进入米兰，即汉代伊循屯地，与“丝路”南道连接。

从楼兰进入天山南麓，则是斜向西北行。走库鲁克山南麓，孔雀河谷水草丰沛地带进入焉耆。从这一角度讲，楼兰，堪谓“丝路”南北道东段的枢纽。

自楼兰古城西北行，仍可见几座烽燧耸立在荒漠之中。

距楼兰古城约80公里，孔雀河北岸一道低矮山脊上，俗称老开屏。1979年，笔者曾主持发掘过

一座孤立的汉代墓葬，出土过汉锦、汉镜及多量木器。^[60]约略表现着汉代“丝路”北道的走向。

在库鲁克山南麓，营盘古城旁，近年发现一区相当规模的汉、晋墓群，其中见到汉、晋时期织锦、漆器，也有罗马风格图案的毛织物，波斯风格的玻璃器，伊朗产镏石。^[61]

自营盘，更西至轮台、渠犁，汉王朝曾因地制宜，设置亭障烽燧。《史记》说，在“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罗布泊），往往有亭，而仑头（轮台）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我们今天在楼兰古城西北、库鲁克塔格山南沿孔雀河谷一线，已找到汉代烽燧多处，较显目的遗址如：孙基、亚克伦、卡勒泰、西尼尔、脱西克吐尔、脱西克吐尔西、沙鲁瓦克、萨其垓；兴地山南口还见南北方向古峰一列，尚存三座，是与吐鲁番盆地交通有关的遗存。更西进入轮台县境，有喀拉亚、拉依苏等，彼此相连相续。这些烽燧均坐落在地势高敞之处，残高十数米上下，建筑工艺为砂土夹芦苇、红柳枝，或土坯夹红柳枝。据地理形势差异，彼此间距，稍远者距10公里左右。近两千年的风雨，它们虽多已颓败，四周荒烟白草，但当年丝路“北道”的具体走向，却可以由此而清楚地触摸。^[62]

至此，即可抵达汉王朝在西域的政治中心，西域都护府所在地乌垒城。乌垒故址，历史地理学界均同意当在今轮台县境，考古工作者近数十年曾努力调查，因盐碱化严重，仍未获确切结果。

与通过楼兰的路线并存，由敦煌入伊吾，自伊吾西向入吐鲁番盆地，进入天山南麓，是一条更重要、自然地理条件也稍好的路线。

汉代伊吾城址，至今未得确定，故址当在今哈密市附近。这里泉水丰沛，地理条件优良。在哈密市内，近年发现不少古代遗址，哈密火车站附近就是一片相当密集的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古代墓地，墓中出土相当丰富的彩陶，图案风格颇受甘肃四坝文化影响。

东汉以后，自敦煌经莫贺延碛至伊州（哈密），复自伊州西行，逐渐成为“丝路”北道东段重要路线。

自伊州西行至高昌、西州，据《新唐书·地理志》记录，有“伊西路”及又一条经罗护守捉与天山北麓联通的路线。结合地理形势及已获考古资料，大概线路就是由伊州西北行，约60公里，抵白杨沟畔的拉甫乔克古城。白杨沟，是哈密境内一条比较重要的河道。河谷不宽，但源自天山冰川的河水，几乎长年不断。哈密县境几处重要的青铜时代遗存，如五堡、焉不拉克墓地，都在这一河谷左右。拉甫乔克古城，目前遗迹虽主要属唐代，但其开拓、建设过程，实际是相当长久的。在拉甫乔克古城边，笔者就曾清理过一座青铜时代墓地，出土过彩陶。冯承钧先生论定拉甫乔克之名，实际源自公元四五世纪鄯善王国灭亡、人民溃散之际，部分居民进入哈密绿洲，入居白杨沟河谷的结果。^[63]唐代在拉甫乔克置纳职县。自伊州西向西州，具体路线，自然会首先抵达白杨沟水系内的拉甫乔克。

在白杨沟畔，地近天山南麓，目前仍可见一区大型寺院，遗址地跨河水东西岸。在西岸的主寺，坐西面东，前庭后殿。后殿巨型塑像，肌体残迹仍可捉摸。在这一唐代寺院稍北，在黄土崖下有开凿更早的中心柱式佛窟，千佛壁画依稀可见，时代早于唐。由古城至这区佛寺，其间还有三区小型寺院。这一系列佛教遗迹，自然也旁证着这一绿洲开发的历史，昭示着交通路线的走向。

过纳职后，具体路线歧分为二。

其一，据《新唐书·地理志》载，是由纳职县向西，“经独泉、东华、西华驼泉，渡茨箕水，过神泉，三百九十里罗护守捉，又西南经达匪、草堆，百九十里至赤亭守捉，与伊西路合。”

这是在贞观十六年新开的道路，它充分利用天山山前明水、潜水溢出地带的泉流，逶迤西行，具体线路约略与1933年始修的哈密汽车运输路线相当。1933年哈密始修的简易公路，多是利用当年民间交通往来的自然土路或戈壁便道，很大程度上表现着没有近代汽车交通时的古道情况。途中经过的鸭子泉、瞭墩、一碗泉、车轱辘泉等一线布列的泉水地点，与《新唐书·地理志》中提到的“独泉”“东华”“西华驼泉”“茨箕水”“神泉”^[64]可以彼此呼应。虽途程稍

长，但地理条件稍佳。遗憾的是相关地点考古工作做得太少。虽在“瞭墩”仍可见古代烽燧，傍依泉水。“一碗泉”，只一眼小泉汨汨流淌，泉边也有时代比较晚的军事戍堡。这都与《新唐书》记录气息相通，只是不能直接证明它们就是唐代的遗址，只能是在逻辑上推定，唐代古道会与这条传统土路概一致。作这样的推定，还有一条理由。前引《新唐书·地理志》在列述多处泉水后，清楚说到罗护守捉。这“罗护守捉”，在伊西路上，是一处十分重要的站点，它“西北上乏驴岭”“至赤谷”可进入天山北麓；“西南经达匪草堆”，可至“赤亭”。“罗护守捉”今址，历史地理学界，一般均同意在今七角井附近的西盐池。^[65]笔者1987年曾自西盐池穿七角井至木垒的山道进行过踏查。由七角井斜向西北，可进入天山中一条峡谷，线路七弯八拐。谷内岩壁峭立，道路崎岖，当地俗称“羊肠子沟”。相当路段，山石赭红。据这一地势、景色，《新唐书·地理志》称此为“乏驴岭”“赤谷”，可以说是相当贴切。出峡谷后，即抵天山北麓木垒县境的独山守捉城，“经蒲类县”（今奇台县）抵北庭都护府，形势与唐书记录完全切合。^[66]而从罗护守捉斜向西南，可以抵达火焰山东端的七克台，即唐代赤亭守捉所在。

“赤亭守捉”故址，在今天七克台镇。绵延吐鲁番盆地北境的火焰山，东端止于七克台。“赤亭镇”故址，就在火焰山丘陵上，遗址尚存。范围在5000平方米（100米×50米）左右。地势陟险，难以攀援。但站在故址上，东、北面形势却可一揽无余。^[67]由此可推断，唐代交通路线就在火焰山南行进。鄯善县新近出土的唐代文书，表明蒲昌府（鄯善县）、柳中县（鲁克沁）、临川城（连木沁）、酒泉城（今吐峪沟乡洋海下村）、高宁城（吐峪沟西南）一线铺展，^[68]由此可以十分方便地进入高昌城中。

其二，是自纳职县沿白杨沟水向南折西行，经老瞭墩、三间房、十三间房，进入吐鲁番盆地七克台镇，与前路合。这条路线，因路程稍短，清代仍为驿道。（清）陶葆廉旅新，曾走过这条路，他在《辛卯侍行记》中记述过这一路线。文中称此为“旧驿路”。途经多为受严重剥蚀的丘陵，少水草，途程短，但风季狂风，交通不便。这类路，在没有现代工具前，改变不多，清代称为“旧驿路”，大概表明了隋唐时期老路路线。^[69]

高昌、交河古城，是丝路中道的枢纽性中心城镇，遗迹保存尚好。

高昌故城城垣保存基本完好，现存遗迹可见出外、内、宫城三重。这是长时期发展的结果，并不是一次规划完成的城市布局。

外城略呈方形，周长5000多米，城垣基址厚达12米，城墙残高至今仍有11.5米，夯筑而成，部分地段用土坯修补，城墙外有马面。它是唐西州到回鹘高昌时期的遗迹。

内城居外城正中。西、南两面城墙大部完好，北面部分残存，东墙全毁。复原周长3000多米，《隋书》中记高昌王国“都城周一千八百四十步”。隋唐时期，每步6尺4寸。据吐鲁番出土唐尺，一尺实际长度为29厘米。换算结果，1840步当为3415米，与高昌中城周长约略相当。故可肯定，它是高昌王国都城所在。^[70]

高昌王国的宫城，位于内城北部，俗称“可汗堡”。堡内塔柱至今仍高10多米。其旁，是一组面积达100多平方米且包含地下庭院、暗燧的大型建筑。其中暗燧道宽3米多。宫城墙还基本完好，高达6米，南向开门。门阙地基清晰，其间有宽达3米的门道。宫墙东侧，曾出土“沮渠安周造寺功德碑”，为高昌王室寺院的所在。

至于公元9世纪以后高昌回鹘王国的宫城，从现存遗迹看，范围已不很明确。南北朝时期，高昌王国宫城在高昌回鹘王国时期是否被继续使用，目前还无充分资料可供明确结论。有的学者提出高昌回鹘王国的宫城，是在现存外城的北部，处内、外城北墙之间，外城北墙即宫城之北墙，而内城北墙即宫城南墙。^[71]这一观点主要根据是这一范围内目前保留着不少高出地面三四米的高土台，建筑规模宏伟，推测可能是回鹘王族的宫廷遗址。

高昌城外北、西北郊是晋、唐时期的墓葬区。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这里发掘古墓葬400多

座，出土物既有大量汉民族居民志石、汉文书资料，也有许多粟特胡姓如康、安、史、曹姓居民墓葬，大量深目、高鼻、多髯的胡人俑，甚至保留了唐王朝护送波斯王子泥涅师返国途中的僬人姓名的文书。此外还出土许多来自中原的汉式丝绢锦绣，其中不少适应中亚地区喜好、装饰带波斯风格图案，也见到波斯银币、仿制拜占庭金币、与佛寺并存的摩尼寺等，生动而具体地表现了唐代前后丝绸之路上，东来西走的人流，繁荣的贸易，多种不同的宗教信仰，是一个多彩、丰富、适应多种社会需求的现实世界。〔72〕

高昌城西北，距约50公里，是交河古城。自高昌北向吉木萨尔、乌鲁木齐或西向焉耆，交河均是交通要隘，历史上一直也是吐鲁番地区的重要军事中心。

古城所在土岛南北长1650米，最宽处约300米，建筑遗迹多位于土岛南半部，长达1000米，宽与岛同。

城内建筑遗址总面积，初步测量约22万平方米。可见出衙署、寺院、民居、道路和水井、窖藏、窑址、地下寺院等性质不同的遗存。

纵贯全城南北方向有一条长约350米、宽约10米的大道。大道直通城北一区大型寺院，寺院建筑面积达5100平方米。

自这一主干道中部向东为另一干道，通向东门。主干道以东，东西干道以南，为全城内最大一区建筑遗址，系衙署所在。东西干道以北，建筑相当密集，门庭较小，为一般居民住宅。

交河古城是新疆保存最好的古城遗址，建筑富有特色。其一，街道两旁是高厚土墙，临街不见门窗。纵横交错的巷道通过土墙将庭院分隔为坊曲。穿过街巷，进入坊墙，才能到达民户大门。其二，土崖土质致密，所有建筑均挖地为院，隔梁为墙，掏洞成室。街巷也是挖地而成的路沟。高度不足，则以挖地掏出的土夹板夯筑。屋顶主要由土墙承重，所用木料不多，这是适应新疆地区干燥少雨的特点而形成的生土建筑风格，极大地减省了木材及能源的消耗，富有特色。〔73〕

近年在交河沟西、沟北发掘的车师王陵、竖穴土坑墓中，游牧民族的野兽纹金器、骨雕，土著文化风格的陶器，与汉式铜镜、五铢钱、丝织物，共存在一室。生动而形象地显示了：在汉代交河大地，可以见到各方面物资与文化艺术的交流，展现着丝绸之路的精神。〔74〕

不仅可说明丝路走向，更足以展示“丝路”文化特色的佛教遗迹，除交河城外石窟外，还有桃儿沟、吐峪沟、胜金口、伯孜克里克等多处。

“丝路”自吐鲁番西去，下一站为焉耆。自吐鲁番盆地进入焉耆盆地，其间为天山支脉喀拉克孜尔山、喀拉塔格山和克孜尔塔格山隔阻。《新唐书·地理志》记录其间的交通路线是“至天山（唐西州天山县——引者）西南入谷，经碯石碛，二百二十里银山碛，又四十里至焉耆界吕光馆”。敦煌所出唐《西州图经》残卷，记其路线为“银山道，西出天山县，西南向焉耆国七百里”。唐西州天山县，地在今托克逊境。由此向“西南”，山谷有多条，如阿拉沟、乌斯套沟、干沟、苏巴什沟等，究竟哪条沟谷为银山道所经，是一个需要辨明的问题。玄奘西行的记录，为我们提供了比较清晰的线索。惠立、彦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述，从“笃进城西行至阿焉尼国阿父师泉。泉在道南沙崖，岩高数丈，水自半而出……法师与众宿于泉侧，明发，又经银山”，则进入唐之“银山”前，必先经“阿父师泉”。1991年，为改善乌鲁木齐至库尔勒间交通路况，新修314国道，路线变穿干沟为经苏巴什沟。为配合修路进行考古调查，笔者曾数次入苏巴什沟中。多处遗存标示，唐代银山道路线，走的就是苏巴什沟。〔75〕此沟为山水长期冲刷而成的天然沟谷，宽10~100米不等，“苏巴什”在突厥语中意为“水之源头”。沟内泉水丰沛，在阿哈布拉克附近道南岩壁上、距地面3米左右，有泉水穿透岩壁汨汨流淌，与《三藏法师传》中所记“阿父师泉”特征一致，而自此前行四十里，即“库米什山”，汉语意为“银山”（山有银矿）。沟谷内，在考古调查中，确也发现过唐代遗存。因交通条件

较好，清代驿道也选此途。^[76]

进入焉耆盆地，与丝路交通关系最为密切的站点，当首推汉至晋时期的焉耆王国都城。由现有考古资料推断，目前坐落在焉耆县城西南的博格达沁古城，当为汉唐时期都城故址。它在焉耆盆地内，规模最大（周长3000多米），且四面环水、地势险要；古城四周，有多处防卫设施。城内，采集到自汉迄唐的各式文物。傍近墓地中有汉镜、五铢钱、包金铁剑及金带扣等物。城郊墓葬出土的金质龙纹带钩，具典型汉代风格文物，是汉王朝赐赏羁属小国统治者的珍品，一定程度上透示城址为焉耆王都的消息。唐焉耆都督府和焉耆镇城，根据地势、规模，应该也在这片地区。^[77]

与博格达沁古城相去不远的为锡克沁佛寺遗址，曾经出土过多量佛像。这些佛像犍陀罗风格十分明显。古焉耆文《弥勒会见记》也出土在这一佛寺之中。具有波斯风格的银盘、粟特风格的银盘均见于此。^[78]当年丝绸之路上曾经展开过的文化艺术交流，在此留下了斑斑遗珍。

焉耆西去，最重要的城镇是轮台。这里是汉轮台国所在，也是汉王朝政府为经营、开拓“丝路”进行屯田的主要基地。

屯田遗迹主要散布在克孜尔河畔，距现代居民点多已在30公里以外。目前均已沦为盐渍荒漠。梯木沁、柯尤克沁、着果特沁、黑太沁等古代遗址，周围渠道、田埂遗迹仍清楚可辨。粮食、陶器、汉代钱币等物屡见。^[79]

自轮台西行，越过一片戈壁，即进入库车绿洲。在今天公路的南侧，彼此距离不远，如二八台等处，还可以见到一些唐代烽墩、戍堡，显示了丝路中道的走向。

库车绿洲居新疆之中，古称龟兹。古代龟兹王国统治地域主要在库车、新和、沙雅绿洲及拜城盆地，地理位置冲要，自然条件优越，长时间中一直是西域大地的最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交通中心。东汉西域都护府、唐安西都护府均曾置于此。

汉、唐龟兹国都称“延城”（唐代又名伊罗卢城），遗址即今库车县城郊之皮朗古城。古城西傍库车河，从残迹追寻，周长约7公里。考古工作者曾在城内喀拉墩进行发掘，文化遗物可分早晚两期。早期可到青铜文化时代至汉，出土了石器、骨器、彩陶片、部分铜器及一枚汉代五铢；其上叠压成组大陶瓮，以及莲纹铺地砖、蓝纹砖、筒瓦等。砖的纹饰、形制与唐长安大明宫麟德殿出土铺地砖近同。共出唐代钱币，如建中钱、中字钱、大历元宝、开元通宝等，明显为唐王朝时期遗存。^[80]

龟兹王国，自汉迄唐，向为丝绸之路“中道”上的最大国，是十分重要的交通枢纽。皮朗城东郊的苏巴什，是唐安西都护下属雀离关所在，雄据铜厂河口，控制了自库车绿洲进入天山玉尔都斯草原的径道，而玉尔都斯草原曾是汉代匈奴、乌孙、隋唐突厥的主要牧业基地；自都城北向，过盐水沟，是龟兹王国的盐水关所在，关址有二三个至今仍耸立于盐水沟西岸峭岩之上。伯希和曾在此掘获用龟兹文书写的龟兹王苏伐叠签发的过所文书。^[81]过盐水关，进入拜城后，在天山博者克拉格沟口，有东汉时期的刘平国治乌垒关摩岩刻石，^[82]它是两汉王朝时期经丝路中道由龟兹进入伊犁河流域乌孙王廷的径道，西汉细君、解忧公主嫁乌孙，往来都曾由此隘口通过。在龟兹都城西约24公里的渭干河口，河东岸目前仍有古城堡屹立，河西岸遗址大都已遭破坏。

（法）伯希和曾在这片地区发掘，名其为“都勒杜尔·阿胡尔”。发现过佛寺、佛像壁画及200多件汉文文书。笔者1985年在巴黎图书馆检视这批汉文书，粗略浏览，文书涉及“河西寺”、“行客营”，坊、里组织及屯田事务等多方面内容。在其中编号为D.A27的残纸上，可见“……大至柘橛关……”的文字，联系《唐书·地理志》^[83]，笔者推论，这里是唐柘橛关故址之所在。^[84]

作为汉唐西域的政治中心，龟兹境内不仅古代城镇遗址众多，作为佛教文化的主要中心，也留下了十分丰富的佛教寺院遗存。举其大者，如拜城县境克孜尔、台台尔、温巴什，库车县库木吐拉、克孜尔杂哈、玛扎巴赫、森木塞姆及苏巴什佛寺，新和县境内的托克拉克埃肯等，

粗略统计，全部石窟保留至今仍存500多孔。尚存壁画，可达2万平方米以上。这不仅是研究古代西域佛教思想史、佛教艺术史的瑰宝，从中也可透见佛教自印度、阿富汗进入西域后的状况，它在文化艺术各方面产生的影响。

自库车而西，进入中亚之“丝路”干线，主要有两条。自库车西偏南行，过柘橛关，沿塔里木河、克孜尔河方向过巴楚，入喀什，翻天山谷道进入苏联费尔干纳盆地，这是《汉书》中强调指出的“北道”；而从库车过温宿，沿托什干河谷到乌什，斜向西北，翻天山险隘别迭里山口，是汉唐时期由新疆进入伊塞克湖、碎叶、坦罗斯的一条重要路线。这条线路是沿托什干河西走。在柯坪县见托木里克古城、沙牙提古城、县城西北苏巴什河口有克斯勒塔格佛寺。乌什县旁托什干河谷有古力瓦克古城、沙依拉石窟。进入别迭里山口，沿途还保存着古代烽燧。这些遗迹，可以说都显示着“丝路”中道通过别迭里山口以出中亚的具体路线，^[85]有学者称此为“热海道”^[86]。

自库车西偏南行，至巴楚，沿途见到不少唐代烽燧、驿馆遗址。如柯坪亚依德梯木、阿克沁、都埃梯木、巴楚县的穷梯木、玉木拉克梯木、柯西梯木、泽梯木等，绵延连续至托库孜萨来古城。根据出土的唐代文物并结合《唐书·地理志》可以判定为唐代“和平铺”（都埃梯木）“济浊馆”（亚依德梯木）和“译者馆”（穷梯木）等馆驿的故址。^[87]

巴楚县托库孜萨来古城，位于巴楚县东北柯坪山派生的一座孤立的石岭上，为唐代据史德城故址，喀什噶尔河流贯其南。喀什噶尔河上游主支称克孜尔河（汉意红河）。这一地理位置与《唐书·地理志》所记“据史德城，龟兹境也，一曰郁头洲，在赤河北岸孤石山”的地理特征可以完全统一。

古城遗存仍可见内外两重，依山势而铺展。伯希和曾经在这里发掘，得到了十分丰富的唐代佛教文物。新疆考古工作者20世纪50年代也曾在这里进行发掘，发现了自南北朝到唐宋时期的大量文物，如佛教塑像，唐代汉文文书，古龟兹文书，丝、毛、棉织物，以及南北朝时期五珠钱铸范。关于托库孜萨来古城的上限，最近有学者提出应早到汉，是疏勒王国的盘陀城，一度作为疏勒王国的都城。^[88]但从出土文物分析，相关文物似乎均较汉代为晚。

在古城南郊、东郊2公里左右，发现过大型佛教寺院，俗称“图木休克”。佛教塑像具有浓烈的犍陀罗艺术风格。

自据史德城向西进入疏勒故城，丝路中道基本依傍喀什噶尔河西行，与今天的公路线比较，已偏南40公里左右。这段路途中，迄今只进行过一般的调查。据已刊资料，在据史德故城以西，乌库麻扎塔格以东一处遗址上，发现过南北朝以后的玻璃器碎片，在伽师县英阿瓦提、喀拉墩，发现过唐代前后的佛像。在谢尔托胡拉遗址，发现过不少玻璃器残件。在喀勒呼其农场，发现过佛塔，傍近数公里，有烽燧遗址。在英吾斯坦，笔者1978年进行调查，见过多处聚落、烽燧。从这些遗存，可以大略把握，唐代由据史德城向疏勒行进的路线，主要是在喀什噶尔河左右。^[89]

疏勒王国，居帕米尔高原东麓，在丝绸之路中道上地位冲要。至此，不论西行、南走，均可穿越葱岭而进入中亚西部、南亚大地，迈向广阔的西部世界。只是考古工作较为滞后，已获考古成果，远不足以展示它在“丝路”上曾经踞有的重要地位。

汉唐时期疏勒王国的都城位置大概就在今天的喀什市。它背依大山，周围环克孜尔河，与唐代史籍记述的地理形势相当切合。

自疏勒北走12公里，为卡克玛克河。在卡克玛克河南岸峭壁，有东西一列佛窟三座，俗称“三仙洞”。塑像与壁画残迹显示着魏晋时期的特征。

佛窟之南、东为一大区古代遗址。遗址区内，出土过具有早期特征的梵文贝叶经，惜残碎过甚，无法通读。其他如佛像之手、眼、衣纹，表明曾有被毁的佛寺。一件具有贴塑人面像的三耳红陶瓮，显示了公元三四世纪犍陀罗艺术风格，表明了此外和贵霜等地曾有的联

系。而顺卡克玛克河谷西走，过托云，可以比较方便地到达安集延。自古迄今，这都是疏勒西去中亚西部的一条捷径。

自喀什斜向西南，可抵乌帕尔绿洲。这是古代疏勒王国境内一处名胜，水足林密，位置冲要。在绿洲西缘，乌布拉特村西一处河谷台地上，笔者曾发现过一处淹没在洪积土下的方形城堡，边长约近80米。城毁于火，据出土文物风格及¹⁴C测定，古城活动在公元3世纪前后。^[90]自古城西走，可抵乌恰，进入安集延。

乌帕尔绿洲，背依艾斯热提毛拉山。笔者在这里调查，发现过多处佛教遗迹。塑像多已毁碎，往往只见衣褶、手指、眼睛等碎残部分。山下为穆罕默德·喀什噶里陵墓。陵墓重修，地下发现过不少的梵文贝叶经。它们与山上佛像残件，可以互相补充，说明这里也曾是重要的佛寺遗址。^[91]

自乌帕尔斜向西南，可渐入帕米尔山地。

自喀什西北走，经乌恰，也有径路入安集延。1959年，在今乌恰县西北一处荒山石缝中，曾发现波斯银币947枚、金条13根，共重1330克。^[92]出土地点属天山南支，地接帕米尔。山谷幽深，傍依溪谷。而自此西行，经斯木哈那，即可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入奥什、安集延。

在喀什市南郊，有艾斯克沙尔古城，虽大部已遭破坏，但残存土垣仍高及3米。一般均认为这当是汉代疏勒王国之乌即城。^[93]

喀什东郊，伯什克然木乡东北有罕诺依古城。比较一致的结论是为黑汗王朝的东都。城内曾出土过大量黑汗王朝钱币、波斯银币。公元10世纪，黑汗王朝萨图克博格拉汗，首先皈依伊斯兰教，对新疆地区的伊斯兰化，发挥过不可估量的影响。^[94]

与罕诺依古城邻近，是以摩尔佛塔为标志的一区宏大佛教寺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古代疏勒王国曾经有过的佛教文明。^[95]

（三）北道

这里的“北道”，系指自敦煌过伊吾，入天山北麓西走，最后进入碎叶的干线。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古道。西汉以前，匈奴右部控制新疆地区，主要基地就在水草丰美、宜牧宜农的巴里坤草原。自巴里坤到伊犁河谷、碎叶城，这一交通干线的开辟，不仅与汉唐王朝的努力密切相关，而且与匈奴及其他一些古代游牧民族的努力，也存在密切关联。

为顺利使用这条自然地理条件比较理想的交通线，汉王朝政府曾进行过持续的努力。但它成为沟通黄河流域与中亚广大地区联系的干线，则是在隋唐时期。隋在哈密设伊吾郡，唐在哈密置伊州，并在此驻军屯田，以保证“丝路”交通安全。

自河西走廊出星星峡，在苦水、烟墩、长流水、大泉湾、黄芦岗、一棵树、墩墩湾等处，仍可见到可能是明清时期的戍堡。这些遗址，时代稍晚，但驼、马交通对自然地理条件的依赖，基本一样，由此可以大概看到古代自河西走廊到哈密驿道的走向。

笔者曾于1983年4至5月间，自乌鲁木齐出发，沿天山北麓东行，至巴里坤后穿天山松树塘大坂至哈密，复自哈密沿天山南麓西走，探寻古伊州至西州间的历史遗存。行至七角井后，西北走入羊肠子沟，入色必口，至木垒。驱车3000多公里，对丝绸之路在天山南北存留的史迹进行了比较认真的踏查。^[96]

自哈密进入天山北的巴里坤草原，古代主要是翻越天山松树塘大坂。这是纵穿天山的一条谷道。自哈密南山口至巴里坤口门子，谷道长达24公里。山道曲折回环，泉流奔涌，左右松林密布。进南山口不远，一块巨型漂砾，汉、唐、清三朝刻字集于其上。清刻“焕彩沟”三个大字，远远可见。其南，认真辨读，可见“唯汉永和五年六月……”等汉刻隶字，在“焕彩沟”三字下，依稀又可见有“唐贞观十四年六月……”刻字残迹。山北，也出土不少汉代碑石，目

前分别收存在巴里坤文管所、乌鲁木齐新疆博物馆中，十分清楚地提示了汉代以来，至唐及清，这条古道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它在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这条穿越天山的谷道是哈密地区交通天山南北的要隘。^[97]

巴里坤草原，古属蒲类。这里水足草茂，夏天不热而冬天不冷，是十分理想的牧业基地，也是蒙古高原交通西域大地的重要前哨站。汉与匈奴争西域，巴里坤曾是一个焦点。除上述永和五年汉碑外，巴里坤发现过汉永和二年（137），敦煌太守裴岑大败匈奴呼衍王的记功碑。^[98]近年，又发现过永元五年（94）任尚记功碑，都透露着这段历史的印迹。^[99]唐代统一西域后，同样把在军事上控制巴里坤草原作为一个重要环节。唐设伊吾军，其重要任务是防突厥，卫北道，同时也进行屯田生产。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多件涉及伊吾军屯田的资料。屯田收获，除保证自身需要外，还要上交伊州、北庭都护府，满足军政之需。伊吾军的驻地，就在巴里坤县大河乡的大河古城。^[100]古城周长1140米，高10米左右，曾出土过大量唐代文物。古城附近地区积温高，地势平，水利好，宜于农业生产。直到今天，这里仍然是哈密地区主要的农业生产基地。

自巴里坤草原，缘天山北麓西行，沿途古烽相望。更西行，过色必口、大石头、沙河子、三十里大墩、三个泉，入木垒河谷，抵木垒城。沿途同样可以见到主要是清代的烽墩、清代以前戍堡。

木垒县，值得注意的古城遗址有新户、英格堡、木垒古城。新户古城居天山北麓木垒河畔，古城呈长方形（280米×200米），出土过不少西辽时代陶器。英格堡居木垒西去奇台的大道上，古城略近方形（300米×280米），出土的文物除辽元时期的陶器外，多见察合台汗国银币。古城地控水草湾子入天山隘道，更前可至吐鲁番盆地。木垒古城傍木垒河谷，城墙依地势变化展开，略近方形，地理位置冲要。从地理形势分析，或与唐独山守捉城有关。距木垒县城不远的东城乡，曾出土过大量动物饰牌，图像有野猪与马互斗、野猪纹、虎形纹等青铜牌，具有游牧民族文化特色。^[101]

奇台县境，与“丝路”关系密切的遗迹颇多。傍奇台县城而在的奇台古城，依水磨河，东西宽235米、南北长400米，周长约1300米。从出土文物分析，主要是唐代遗存。有学者认为它是唐蒲类县故址所在。“奇台”是“契丹”之音转。宋代，当为“西辽”之重镇。临准噶尔沙漠边缘，另有古城一座，俗称“北道桥古城”。城垣呈方形，周约600米，控扼自蒙古高原、北塔山入天山北道的咽喉。自阿勒泰入天山北麓一线，这里也是一处隘道，^[102]应是唐代“回鹘路”上的重镇——郝遮镇故址。

奇台县半截沟乡麻沟梁“石城子”古城，依山傍涧，控扼进入天山的隘口。古城东、南为峭壁深涧，西、北面筑土垣，北墙长280米、西墙长155米。在城址范围内出土了大量汉式灰砖、云纹瓦当、绳纹板瓦、筒瓦及汉式绳纹盆、罐之类，文化内容单纯。古城之兴废，只能在汉代。结合地望、形势，当为东汉疏勒城故址，它是柳中过天山入金满途中的要站。^[103]

自奇台缘天山山前地带，过营盘滩、碧流河、吉布库、东湾、中渠，途程75公里，抵吉木萨尔县，沿途存在不少时代相当于唐代或更早的石堆墓。^[104]它们标示了古代居民聚落、交通路线的实际情形。

吉木萨尔县，是天山北道一线中文物荟萃之处。北庭大都护府所在的北庭故城，就在县北10公里。故城西郊近年发掘出土高昌回鹘佛寺，还有北庭故城周围的戍堡烽驿，都显示着丝道的迹痕。

北庭故城略呈长方形，夯筑，内外两重。外城周长4596米，见角楼、马面、护濠，现存遗迹是唐、回鹘高昌至元代的遗存。内城周长3000米。城区内陆续出土过大量唐印、唐代钱币、陶质下水管道、铜器、瓷器及多量陶器、砖瓦等。其中瓦当形制与唐代长安所出文物近似。^[105]

位于古城西郊的“西大寺”，是高昌回鹘王室寺院。遗址面积约3000平方米，北为正殿，南为庭院、配殿。配殿中残存塑像壁画，贴金妆彩，富丽堂皇。绘画回鹘王族供养人并见回鹘文题记，是研究当年回鹘佛教信仰、绘画艺术、世俗生活的珍贵资料。^[106]

北庭故城与吐鲁番盆地的高昌、交河城，隔天山相望，联系密切。汉代车师前后部，唐代西州、庭州，回鹘高昌王国夏都、冬都，分置在吐鲁番、吉木萨尔，都必须穿越天山峡谷来往。人们称这条“丝路”支线为“它地道”“金岭道”。自北庭故城南行，沿着现代翻越天山的线路踏查（翻越天山大坂，受自然条件局限很大，古今道路，往往不变），沿线可见古城遗址三处：“贼疙瘩梁”古城、卡子湾古城、水西沟古城。进入天山石窑子大坂，还可见古代石冢。这些遗迹显示了北庭、高昌之间交通往来的事实。^[107]

自北庭古城西走，距离约20公里，见双河古城。城傍双河水，呈长方形，南北长125米，东西宽85米，残高约3米。夯筑，夯层厚7厘米上下。城址内陶片显示为唐代风格，一件枣形蚀花玻璃器，亦为唐代物。

自双河古城堡更西行，距约22公里，为“八家地古城”，左右傍河道。城堡呈长方形，南北长280米，东西宽135米，墙宽10米，残高达3米，外附马面。夯筑，夯层厚10厘米上下。其南，相去约2公里，为又一70米×80米的遗存，遗存中部为一相当高大的圆形建筑遗迹，直径约15米，残高达3米。遗址内外，随手即采集得唐开元钱5枚、玻璃器片、铜带饰及铁炼碴、窑流等，当为与古城相关的一处冶炼遗存。^[108]自“八家地古城”西行，北庄子、阜康县六运、米泉县下沙河，都还可以见到古代城堡、大型遗址，这清楚地表明了古道行进的方向。《新唐书·地理志》载“北庭大都护府”条下，称“自庭州西延城西六十里有沙钵城守捉，又有冯洛守捉，又八十里有耶勒城守捉，又八十里有俱乐城守捉，又百里至轮台县，又百五十里有张堡城守捉……”。这些相关记录与双河、八家地、北庄子、六运、下沙河以至昌吉古城堡联系分析，颇相切合。遗憾的只是相关小型城堡，至今未进行考古发掘，无法将它们与文献记录中的古址作进一步具体联系。

上引《新唐书·地理志》中的“轮台县”，在丝路北道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所在。《新唐书·西域传·焉耆》条，文称“……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征西域贾，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轮台征之。”轮台在丝绸之路北道上，居于十分冲要的地位，这由唐玄宗在公元8世纪初下达的这一诏文就表现得十分清楚。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唐代轮台，与汉、清均异，^[109]它究竟坐落在什么地方，是一个需要究明的结论。近年，新疆历史地理学界，对此曾多次讨论。目前，比较倾向一致的结论是在乌鲁木齐南郊。依傍乌鲁木齐河谷东岸的乌拉泊古城，当为唐轮台故址所在。^[110]它正当吐鲁番盆地与乌鲁木齐交通联络的大道，是唐代丝绸之路中道与北道交通联络的要隘。古城废址仍存，略近方形，南北约550米，东西约450米，夯筑。城四角见角楼遗迹，四墙外见马面。城内北部见子城。地理位置、城墙构筑工艺、子城设置等与唐轮台作为军城^[111]及在丝路交通线上的地位，相当切合。如是，公元8世纪，丝路中道、北道有一个重要的变化。这就是“中道”上的西州，穿过白水涧道，进入轮台，沿天山北麓入伊犁河谷弓月城，成为了一条重要干线。

自米泉下沙河古城向西，或自乌鲁木齐乌拉泊古城向北，均可抵昌吉。昌吉市区见古城一座，城内曾出土大量察合台汗国时期银币。学界一般都认可，这区城址应为唐代张堡城守捉故址，入元，名“昌八刺城”，^[112]在丝路北道上，自然也是一处腰站。

自昌吉西北行，有两条路线可入伊犁地区。其一，自精河斜向南行，入天山，进入巩乃斯河谷，继续西走，入伊犁河谷地；其二，自精河过赛里木湖，入天山果子沟，进入伊犁河谷地。成吉思汗西征时，这是一条主要通道。

丝绸之路北道，进入伊犁后，其经济中心是在“弓月”。弓月城，曾是西突厥汗国的一处

重要政治中心。唐代统一西域大地后，这里成了丝路北道上一处十分重要的交通和贸易中心。对弓月在丝路北道上这一经济贸易地位，过去并未为人们关注。自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了一批有关弓月城胡商曹禄山状告汉商李绍谨的文书后，弓月城在丝路交通、贸易中不一般的地位，引发了人们广泛的关注。相关文书共见八残件，经过整理，可大概把握这一事件的原委：唐乾封二年（667），粟特商人曹禄山之兄曹延炎与汉商结伴，自长安至安西（今库车地区），穿越天山到了伊犁地区之弓月城，同行者还有胡商曹果毅、曹毕娑。唐总章三年（670），李绍谨因商业经营，在弓月城向曹延炎借“二百七十五匹绢”。其后李绍谨又与曹延炎结伴“从弓月城向龟兹”，途中曾遇安西使者四人。但曹延炎后来未出现在龟兹，而曹果毅及曹毕娑这两个关系人又自弓月“向己西去”。这过程中，李绍谨又与曹禄山一道从龟兹到了高昌。曹禄山因一直不见其兄曹延炎下落，内心不安，有十分强烈的疑虑，所以在高昌状告了李绍谨。^[113]从这些保留至今的唐代司法案卷中，可以清楚看到：伊犁地区的弓月城，当年确是丝路贸易活动中一处重要中心，汉商李绍谨一次就可以从粟特商人曹延炎处举借绢275匹，在此集中的丝绸商品，看来数量是相当巨大的；从长安经过安西到弓月，汉商、胡商相继于途；粟特胡商，在丝路贸易中是主要角色，他们的重要中心地之一就在弓月。自此东去长安，南向龟兹，西往中亚两河流域，都相当便利。^[114]

关于弓月城之故址，相关论述不少，如阿力麻里、吐鲁番圩子古城、巩乃斯古城等，均在人们的视野之中，^[115]在没有考古资料提供直接证明前，关于弓月城故址的今地，看来一时还难以解决。但它在伊犁地区当是可以肯定的。通过上引弓月城相关丝绸贸易的唐代文书，唐代伊犁地区，在丝绸之路北道上曾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是可以充分肯定的。

北道到弓月，自弓月抵达碎叶，西去亚洲西部、欧洲，是一条坦途。

这几条据历史文献及考古遗迹联缀起来的交通路线，只是几条主干道，在这几条运输动脉之间，诚如《隋书·裴矩传》所述，“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当年的丝路交通线，可以说是如同纵横交错网络。大大小小的绿洲聚落基本都可与“丝绸之路”程度不等地联系在一起。这里我们拿唐代设置在吐鲁番绿洲的西州作例。西州，除作为中道上的枢纽而交通东西外，以其为中心，还有翻越天山抵达北庭等广大地区的“他地道”“乌骨道”“花谷道”“移摩道”“萨捍道”和“突波道”，有斜向西北，进抵乌鲁木齐地区的“白水涧道”，入苏巴什沟进入焉耆盆地的银山道，穿行天山乌拉斯台，进入巩乃斯河谷的山道等，可以说每条能够穿越的山谷均得到开发利用，四通八达。

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四向辐射的古代交通路线，表现了唐代“丝路”的实际情况，与之相类的情况，在其他较大的西域文明中心当是同样存在的。

四、三道之间

既见于历代文献，也可以与相关古代城镇遗址相呼应的“丝绸之路”新疆段，不论是沿昆仑山北麓，还是沿天山南、北麓西走的南、中、北三道路线，以及它们在历史长河中的变化、沉浮，已略如上述。

认真思考上述三条交通干线，可以清楚得出以下结论：在其开拓、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深受自然地理因素的制约，更受到不同时段内政治、军事形势的影响。而且后者，在特定情况下，对路线的变化发挥着更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只是这一概括，实际是站在中原王朝的角度，对奠基在黄河流域的政治中心与南亚、西亚古代政治经济中心之间的交往路线的总结，对西域大地三条干线之间（也就是众多经济实体之间）如何交通，却未予关注。这对剖析“丝绸之路”新疆段在历史上的运行实际，不能不是一大缺憾。

这一遗憾，至（隋）裴矩时受到关注。隋“炀帝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杨广任命了一名知道自己“勤运略”方针，而且善于管理的裴矩（547—627），至张掖主持其事。裴矩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与抵达张掖的“诸商胡”倾心交接、联络，“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最后撰成《西域图记》三卷，详述了“自敦煌至于西海”一带的三条交通干线及其相关“襟带”，并得到了“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的结论。^[116]

但《西域图记》早已失佚。在近年国际关注的“丝路”研究热潮中，三道之间的交通往来，除殷晴先生有过一次探讨外，^[117]确还是学界涉猎不多的一个领域。

互阻南、北道之间的是东西长约1070公里、南北宽约410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约33万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几乎全为沙丘覆盖，不仅极端干旱，而且风沙活动频繁，要穿越这样的沙海极为不易。但是，源自昆仑山、喀喇昆仑山下洩的和闐河、克里雅河，夏日水势盛大时，是可以纵贯沙漠南北与塔里木河连通的。今天流程稍短、水量稍小的策勒河、尼雅河，古代流程也远较今日为长，可以深入塔干沙漠腹地。沿河谷行进，虽不足以直接交通南北，但也可为此提供一点方便。汉、晋时期（公元五世纪以前），在今尼雅河水系内的精绝王国，活动中心在距今昆仑山下民丰绿洲以北约120公里的沙漠中，北面，是浩瀚无际的沙漠。但精绝居民，在十分迫切的需要面前，还真可以排难涉险，穿过沙漠，走到天山南麓的龟兹。尼雅遗址中出土的佉卢文，曾记录了一件事：叶吹地方的陶工詹左的儿子沙迦牟韦，有妻室儿女，却与黎帕那的妻子善爱，有了婚外恋情。两人抛弃家庭，从塔克拉玛干南缘的尼雅私奔到了天山脚下的龟兹绿洲。^[118]这自然是冒着生命危险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也表明了沙漠南北实际上是可以交通往来的。与此可以呼应的是公元四世纪末至五世纪初，法显去印度，离开天山南麓的焉耆后，也是纵穿塔克拉玛干沙漠，到了昆仑山北麓之和闐的。^[119]从沙迦牟韦到法显，实际上都是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这两个例子，虽属个案，但清楚表明了实际生活中确有需要时，穿越沙漠、交通南北的可能。

纵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古道，主要是依凭和闐河谷，自和闐通达今阿克苏地区。这条道路，自汉至今，历代均见文献记录。《汉书·西域传·姑墨国》称“姑墨，南至于闐，马行十五日。”^[120]北魏酈道元的《水经注·河水篇》，有相类文字记录：“姑墨川，东南流经姑墨国西，治南城，南至于闐，马行十五日……”^[121]《新唐书·地理志》称：“自拨换南而东，经昆冈，渡赤河，又西南经神山、睢阳、咸泊；又南经疏树，九百三十里至于闐镇城。”^[122]《新唐书》里的记录引自贾耽的《使四夷道理记》，是当时的实际调查资料，应表现着唐代自拨换（今阿克苏）沿和闐河南行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情况，其间的“神山”，故址在今和闐河下游玛扎塔格山，古代城堡仍存。“赤河”“咸泊”和“疏树”遗址所在，目前无法确指，但途中有这么一些具体指称的站点，可以表明，当年这条路，是路线大概明确，也可能存在路政管理的。唐里“九百三十”，约合450公里左右。驿程马行十五天，一天三十公里，是比较正常的速度。

这条道路，宋代仍然通行。北宋乐史编撰的《太平寰宇记》中的相关记录是：“又从拨换正南渡思浑河，又东南经昆冈，三义等守戍，一十四日程至于闐大城。”

与此同时，保留至今的敦煌写本《西天路竟》，也说“割鹿国（姑墨）又西南行十日，至于闐国”。这说明至宋代，这条道路还是可以穿越，也有人穿越的一条路线。

这条南北向通路，直至近代仍是民间使用的一条路线。1929年黄文弼由沙雅至和闐，走的就是这条路。^[123]在杨增新主新时期，还曾派人实际勘察，并计划沿河设驴站、马站，在塔里木河设渡船，认为开通这条路线，实际上缩短了和闐至阿克苏、龟兹间交通路线之半，“于军务商务均有裨益”。^[124]

与上引文献可以呼应的是在遗迹犹存的和闐河下游玛扎塔格山上的一座古代城堡及相去约

50米的古烽燧。剖析相关烽、戍，构筑工艺不一，可以肯定不是一个时代的遗存。其主体用材为土坯，但也见具有早期特征的胶泥土堆砌，这种胶泥土堆砌工艺可以早到汉，或较汉代更早，足见汉代在此，已筑亭、鄣。遗存最晚可能到伊斯兰教进入西域，与和阗李氏王朝展开的宗教战争阶段，绝对年代已至公元11世纪前期。^[125]

遗址中曾出土过汉文、吐蕃文、古和阗文、阿拉伯文文书，箭镞，陶，木器，唐代钱币，龟兹小铜钱等，据以分析，唐代及唐中期以后吐蕃占领西域时段，曾是戍堡使用的高峰期。出土之吐蕃文书，有军事活动报告、要求补给武器等内容，说明了作为军事戍堡，在吐蕃占领西域时期，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

这里，需要说明两点：一是缘和阗河穿行南北的路线，实际在无人沙漠中行进的路程，是没有400~500公里的。于阗古国，汉唐时期绿洲，要北入沙漠中100~200公里。塔里木河古道，也较今天的河床偏南。因此，远离人烟的沙漠行程，也就200公里左右。虽然，这也是十分艰难的行程，但较之想象中的四五百公里，终是短得多了。

其次，这里提到的真正没有人烟的沙漠行程，可能只在200公里左右，也有一个可以参照的事实。与和阗河并列、居于和阗河之东的克里雅河，同样源自昆仑山冰川，在7~9月的丰水期内，河水或可流贯塔克拉玛干沙漠。克里雅河绿洲，汉代是与于阗并列、有力量互争雄长的扞弥国。近年的考古调查、发掘，在古克里雅河下游，发现了不晚于西汉时期的圆沙古城（经纬位置为东经81° 34'90.5"，北纬38° 52'23.6"），^[126]城址已南距今天于阗县绿洲近300公里，已越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再一百多公里，就可抵达塔里木河了。较圆沙古城更早，在圆沙古城北约40公里、同处克里雅河尾间，最近发现了一处青铜时代的墓地，地表特征与罗布淖尔地区小河墓地相同，此处墓地，距塔里木河已经不足100公里了（此据新疆考古所伊第利斯在2008年8月于《新疆通史·史前卷》讨论会上刊布的资料）。较圆沙古城稍晚，在公元四五世纪，克里雅河谷中心绿洲在喀拉墩，^[127]向南退行达40多公里。在和阗河东、克里雅河以西，更南约60公里，目前已沦入沙漠中，有唐代代谢镇故址丹丹乌列克。^[128]在更东的尼雅河尾间，较精绝国故址更北约40多公里，还新发现一处青铜时代遗址。^[129]这些今天已经发现的古代聚落：丹丹乌列克、尼雅北青铜时代遗址、喀拉墩、圆沙城，与玛扎塔格戍堡一样，给我们十分强烈的历史信息是：自汉迄唐，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与和阗河、克里雅河、策勒河、尼雅河有关，曾经存在过多处绿洲城镇，有城堡、佛寺，自然，它们也曾经有力支撑、沟通过交通沙漠南北的路线。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是一种不可阻抑的力量。纵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古道，很生动地展示了这一真理。

天山南麓的“中道”，与天山北麓的“北道”，彼此交通往来需要翻越天山大坂，或穿越天山峡谷。

天山，在新疆境内，东西延展达1760多公里，南北宽250~300公里，面积达46.4万平方千米。山地平均海拔达4000米左右，最高峰高达7435米，天山东段，山体逐步降低，至喀尔里克山以东，渐隐没于戈壁之中。整个山系，为数列东西向断块山地组成，地理学界分别称之为“北天山”“中天山”和“南天山”，山区冰川近7000条，总储水量达3600亿立方米。因此，虽是峰峦叠嶂的高山，却包容着众多盆地，且水流丰富，草被如茵，自然成了古代游牧民族理想的活动天地，也为交通南北提供了最好的支持。

由于天山互阻在准噶尔盆地与塔里木盆地之间，形成了南北两大盆地不同的气候、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物产，这又导致两大盆地间产生强大的互补要求。因此，穿越峡谷，翻越大坂冰川以沟通南北来往，几乎可以说是与人类生活共始终，出现得是很早的，只是在进入文明社会后，在政治、经济利益驱动下，这些早已自发存在的古代交通隘道，受到了更好的开发、建设，交通更为便捷了。

在上文说及北道路线时，曾多少涉及到一点穿越天山的南北交通。如果进行一个总结性的概括，可以说：在天山南北任何一处稍有实力的政治实体，无不努力利用天山中的断裂带与河谷形势，进行开拓、建设，逐渐完成了穿过天山、联络丝绸之路山南沙漠道与山北草原道间的交通支线，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这里，稍列比较重要、路线比较清晰的几条径道，作为实例，予以说明。

自哈密绿洲，翻越天山松树塘大坂，自汉迄唐，晚到清朝直至今天，一直是伊州与巴里坤盆地之间的重要交通路线。伊州，是中原王朝由敦煌入西域后，首先接触的最重要的一处绿洲。巴里坤盆地，东连蒙古草原，北接阿尔泰山地，西为准噶尔草原，是古代游牧民族活动的重要舞台。因此，自哈密至巴里坤的古道，经济、军事价值绝不同于一般。古道路线是从天山南麓“南山”口，到北麓“口门子”，循自然山谷而行进。沿途溪谷迴环，泉水淙淙，松林、草场绵延不绝。

自伊州西行至西州（今吐鲁番盆地）。在伊、西路上，自天山南麓的罗护守捉西北行，入天山，可至天山北麓木垒县境独山守捉城。

进入吐鲁番盆地，南北向交通，据《西州图经》载在唐代曾有六条山道，沟通着“西州”与“庭州”间的往来。庭州是“北道”上的中心；西州，在长时期中，是丝路中道上的经济枢纽。这一形势，早到汉代，晚到回鹘高昌时期，实际都是一样的：汉代，山南吐鲁番是车师前部王国，山北吉木萨尔为车师后部王国，原本就是一家。吐鲁番出土唐代文书中，不少是来去庭州、西州间进行市易的过所。北庭地区的面粉也在西州市易。唐代以后，高昌回鹘王国都城在高昌，而山北吉木萨尔地区则为其夏都所在。两地气候迥异，物产不同，经济上的互补性是很强的。

这六条记录在案的山道，目前并没有完全考察清楚。只有其中的“他地道”，已经进行过多次踏查，比较清晰了。《西州图经》中记录“他地道”的路线是“出交河县界，至西北，自柳谷，通庭州。四百五十里，逐水草，唯通人马。”前面，从北庭入山，沿途情况，前文略有所及，而自吐鲁番交河古城西北行，入大河，沿河谷，经红柳河（柳谷）、桃树园子。途中，发现过突厥石人。至石窑子大坂，大坂上岭秃山荒，少见树木，一座石砌古堡，断垣壁立，周围木栅。过大坂后，有一条长约40米、宽1米多的石“巷”，左右峭壁直插云天，现在人们称之为“石门”，是一处天然关隘。过石门后，有“六道桥”。高出山涧20多米的木桥，桥下水势急湍。大龙口河谷，有一土城，人称“贼坑瘡梁”，更北行，可直下北庭都护府所在的护堡子古城。^[130]

宋太平兴国六年（981），王延德奉使回鹘高昌。到吐鲁番后，国王在山北避暑，不得不骑马自交河入天山，至金岭口、汉冢寨，过金岭。“度岭一日至北廷”。他留下的《西州使程记》（亦称《王延德使高昌记》），记述沿途形势，与今日所见地势基本一致。^[131]

除“他地道”外，由高昌城向北，入木头沟，经七泉湖、黑沟，翻萨尔勒克大坂，可入山北奇台；从鲁克沁北行，入二塘沟，经碱泉子，翻沟川大坂，可抵木垒。这些沟谷，当是可以与《西州图经》记录在案的其他通道如“花谷”“移摩”“萨捍”“突波”和“乌骨”等相联系的，但究竟那一条山道可与唐代古道相契合，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西州，与天山北部除有上述六条山道可以连通外，还有一条“白水涧道”，可以抵达北道上的轮台。“白水涧道”，《西州图经》保留至今的文字是“出交河县界，西北出处月以西诸蕃，足水草，通车马”。这条路沿白水涧西走，途中，还保留着唐代白水镇城、烽燧，^[132]更前，可以通达唐轮台县，将中道、北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于沿途所经峡谷比较开阔，海拔低，出白水镇后，沿途草场连片，走马行车，均称便利，在穿过天山的十多条路线中，这条白水涧道，可以说是最近捷、路况最好、最重要的一条路线。

行文至此，有一个问题。这就是在《西州图经》中，只说从西州出发后，可通“处月以西诸蕃”，根本没有提到“轮台”。判其原因，因为置轮台县，系在《西州图经》完成以后。所

以《西州图经》只说出白水涧道后，通“处月以西诸蕃”，不提轮台。而轮台县所以设置在目前这一位置，确实与白水涧道在沟通中与丝路北道上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唐中期以前，中原王朝并没有能力完全或直接控制自西州至乌鲁木齐间的白水涧峡谷，因而路线不畅通。唐开元中，西州、庭州均在唐王朝政府直接统辖之下，在白水涧道出天山北口，地近北道处设置轮台县，已不存在任何阻碍。置轮台，既有军事上的需要，也有沟通丝路中、北道联系这一运输需要。正因为这一点，今天观察丝路北道行进路线，在过阜康后，路线并不直接西向昌吉（昌八刺），而是折向西南，抵达轮台（今乌鲁木齐南），才又转进昌吉，形成了一个并不便捷、令人费解的拐角，^[133]留下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图3）。

由吐鲁番盆地西部托克逊（唐西州天山县）西入天山，过阿拉沟，入于尔都斯草原，沿巩乃斯河谷走，可以抵达伊犁谷地。这条山道，唐代文献虽未见记录，但近年在阿拉沟口发现的唐鸛鸽镇城故址^[134]，据城内出土的唐代文书，沟谷内有一系列烽台、游弈，警卫安全，“给使首领康口口”的供给文书，说明它是唐代西州通达伊犁河流域的小道，在军事、交通上具有重要地位。

自西州西行，为焉耆。古焉耆王国活动的舞台——焉耆绿洲，本来就是南天山与中天山间的一个山间盆地。自焉耆北入于尔都斯草原，至伊犁河谷，可以说没有任何阻隔。清朝文献关于自焉耆盆地西北进入伊犁的路程记录，^[135]实际也同样表现着汉唐时期的情况。

龟兹，是天山南麓最大的绿洲，汉、唐时期的龟兹王国，经济、政治实力举足轻重，与天山北部交通联系紧密。西汉王朝和亲乌孙，往来取道龟兹，路线主要是由前述汉刘平国刻石所在的天山博者克拉格沟，北入于尔都斯草原，即可抵达伊犁河流域昭苏、特克斯盆地。自西突厥重镇弓月城，进入龟兹道路略同。

由龟兹地区北入伊犁，还有一条比较有名的山道：木素尔冰川道。这条古道，南起阿克苏温宿县境克孜布拉克，北入昭苏县的夏台山口。这条山道，南北两端均平坦易行，只是中间有冰川三十华里。过冰川时，由其东侧小路行进。历代文人描写途中冰峰雪岭，令人胆战心寒。由于这条路在清王朝统一战争中，转饷运粮，关系重大，留下的文字记录比较多。乾隆时期还曾御旨“应多派回人专责修治道涂冰雪”。^[136]《新疆图志》对沿途情况也有比较朴素的记述：“温宿至扎木台一百里，均系大路。扎木台至盐山口，八十里，均平路行车。盐山口至可力峡一百里，中隔石山一座，不甚高峻，余均平路通车，中有大河一道。可力峡至图巴拉特六十里，中隔横流水沟三道，半山斜险石路二十里，余均平路。图巴拉特至瑚斯图托海四十里，均乱石险途。瑚斯图托海至塔木塔什八十里，途中乱石大河，石沟甚多，无好路。塔木塔什至黄草湖驿一百八十里。冰路一百里。中有冰梯雪路三十里，上山脊三十里，平路二十里，此站长且险。”^[137]过此冰雪山路后，由黄草湖驿至阿仁墩，由阿仁墩至勺梯，勺梯至特克斯河，至和乐火依，至布噶乐，至坎尔，至宁远城，途中多树林、平路，再无险途。“由温宿起至宁远止，共计一十四站，一千三百二十里”。^[138]这虽只是清朝记录，但由汉至清，在基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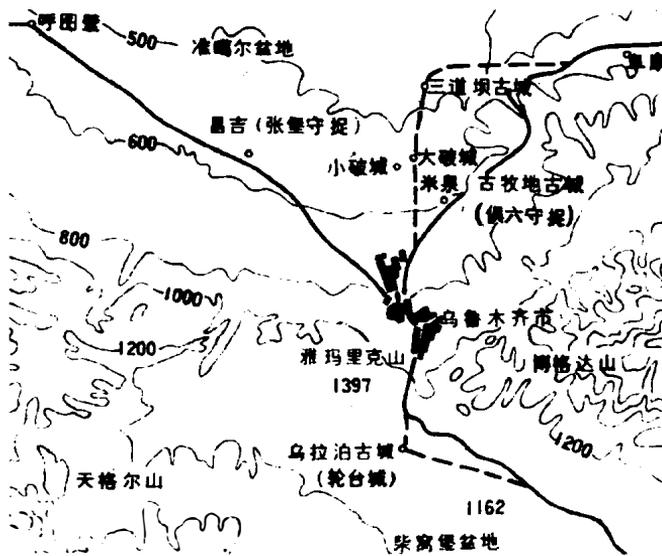


图3 唐轮台县与丝路中、北道（引自《轮台丝路今觅处》）

运输工具（马、骡、大车）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利用天然山峡，穿越溪流，形势不变，路线也当大概相同。中间，令人谈虎色变的冰川、凌山，实际就只塔木塔什至黄草湖驿一程，全路约90公里，其中真正险恶的“冰梯雪路三十里”，据左宗棠在《勘定新疆记·归地篇》中介绍，实际是由“阿克苏冰岭之东，沿特克斯河”行进的，椿园的《西域闻见录》，对此有文学的描述，说是：“……在在皆冰……层峦叠嶂，千仞攒空……裂隙处下视，不见其底……陡绝处，凿梯冰蹬，陡峰攀援，滑津万状。跬步不谨，辄落冰涧……”放开想象，令人不寒而栗。其实，他在这段描写前还有一句话是：“人畜皆于山坡侧岭，羊肠曲径而过”，正常情况下，是并无虑碍的。否则，怎么会成为清代的驿路呢？

沟通天山南北的山路，比较重要的还有一条，这就是翻别迭里大坂，抵达伊塞克湖的古道。《新唐书·地理志》中叙述，从安西都护府西北行，“……又六十里至大石城，一曰于祝，曰温肃州。又西北三十里至栗楼烽。又四十里度拔达岭，又五十里至顿多城，乌孙所治赤山城也。”继续前行，至热海、碎叶城，抵达坦罗斯。从《新唐书·地理志》，可以肯定，这是安西都护府通达中亚名城碎叶、坦罗斯的干线。唐代“温肃州”，历史地理学界均认同的结论，就在今天的乌什县。“勃达岭”，就是今天习称的“别迭里山口”。李健超教授，为一探唐“凌山道”究竟，曾于1980年夏，骑行至别迭里山口，直接观察山口交通形势，认为玄奘行行的“凌山”与木素岭冰川形势迥异，而与别迭里山口形势多暗合处，因此，唐代“凌山道”实即拔达岭山道。^[139]这是一个学界多所关注的问题。笔者也曾对这一路线进行过踏勘。我们从乌什县城出发，沿托什干河谷西偏南行，至牙满苏，折向西北，进入天山山前冲积带，地势渐高，砾石纵横。30公里后，至别迭里河口，发现一座古烽。沿河谷上行约50公里，为又一古烽（经纬度为东经78°44'22.2"，北纬41°07'4"），残高仍达7米，底周略近方形，10米×13米，顶部8米×4米，保存尚好。从暴露之遗迹可清楚见出，主体为一层夯土（夯层厚12厘米），一层砾石，其间夹木骨红柳（厚10厘米左右）。后期，在夯土台基四周又砌以卵石，形成石质防护层。烽台顶部尚存木炭、碳灰。

自这一古烽上行，5公里后为又一古烽。烽顶尚存木杆数根。更上行，10多公里，可以翻越大坂。这一形势与先至“栗楼烽”，又20公里后“渡拔达岭”的记录，完全切合。

为判定古烽的绝对年代，曾取第二座古烽内层之夹木，进行¹⁴C测年，结论为去今1645年±90年。建筑年代大概在公元三四世纪。^[140]拔达岭古道，汉代以来一直是塔里木盆地西北向碎叶的隘道，与古道相关的保卫设施，会早有建树。古烽建于三四世纪，或在这一时段增修、加固，并不令人费解。通过这条古道，交通来去，虽也有地势高寒之难，但较之木素尔岭冰川，便捷多多。

东西绵延达1700多公里的东天山，横空出世，将新疆大地分隔成自然地理有别、经济生产不同的两盆地，山南山北，形势迥异。但是，社会需要的力量，经济生活互补的要求，是强大的。人类在这一需要的驱动下，又硬是踏破铁鞋觅得各处地势稍低、方便跨越的大坂，自然断裂的峡谷，将山南、山北，所谓的丝绸之路“中道”“北道”深深地联系在一起。裴矩深谙这一形势，说“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总结得贴切而准确，使我们可以体会到，丝绸之路作为亚欧内陆经济、文化交流的路线，切合时代、沿线国家、人民的要求，凡有居民集群活动处，就会有不同的交通线路，将之联系在一起。丝绸之路，在实实在在的历史生活中，它绝不只是几条干线，而是一个有主干、有支线的网络，将沿线大大小小的不同民族的政治、经济实体，或紧或疏地联系在一起，这才是丝绸之路交通往来的真实面目。

五、“丝路”考古的几点新收获

新疆，作为“丝绸之路”沙漠道上不可逾越的重要路段，地上地下，保留了许多足以展现

当年“丝路”历史面目的珍贵遗物。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的新疆考古工作中，不少新的收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丝绸之路”在沟通亚欧经济、技术、文化思想交流中，曾经有过的巨大贡献，它为人类文明进步、发展做出的奉献，是怎么估价也不会过分的。虽然，这些有幸出土并已被认可的“丝路”遗珍，与当年实际存在的、十分丰富的社会生活比，只能算是片鳞只爪，肯定不足以表现全局。但一斑窥豹，总还是可以通过这些细节，使我们的认识得到深化。凝集其上的文化精神，自然应该充分阐发、继承。现择其主要者，略予以介绍。

（一）丝绸织物、丝织工艺西传

在出土的足以表现“丝路”内容的珍贵文物中，首推丝绸。它以出土数量大、品种多、地域广、时代延续长的特点十分有力地表明：在“丝绸之路”上，轻薄美观的各种丝绸织物，深受西亚、南亚、欧洲人民的欢迎，是通过“丝路”西去的主要商品。

近40年来，新疆考古工作中见到丝绸织物的遗址点相当丰富。举其大者，南道：如若羌东部的阿拉尔、且木县扎洪鲁克、民丰县尼雅、策勒县喀拉墩、于阗县屋于来客、洛甫县山普拉、阿克苏比尔。中道：土垠、楼兰城东北郊的孤台、平台墓地，孔雀河谷老开屏墓地，库鲁克山南麓的营盘古墓，吐鲁番盆地中鄯善县鲁克沁、洋海，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喀拉和卓、库车苏巴什、巴楚县托库孜萨来古城等。北道：天山中阿拉沟、鱼儿沟古墓地，乌鲁木齐南郊盐湖，木垒四道沟古墓葬，伊犁昭苏盆地波马古墓等处，均有所见。尤其是吐鲁番高昌故城北郊的阿斯塔那晋唐墓地，可以说无墓不见丝绸文物，这些有力说明当年丝绸织物在高昌地区相当普及的情况。只是这些地点，大部都在天山以南，天山以北发现较少。之所以如此，应与天山以北地区降水较多，湿度较大，织物不易保存有关。

有关织物的时代，早可以到战国，盛于两汉，大盛于隋唐，宋元数量渐少。

织物品种主要为素绢及染色绢，以及各种花纹图案的织锦、暗花绮、绫、缣、纱、罗、轻容、刺绣及染缣等。这些文物，出土时多零散、破损，绝对数量不算多，但实际却代表着巨大的数字。A.斯坦因在楼兰故城遗址点发掘到过一枚佉卢文筒牍，筒文称“入三百一十九匹。今为住人买彩四千三百廿六匹”。前文提到的唐代长安汉商在弓月城胡商处，一次就调集到绢275匹。弓月城，是西突厥政治中心，也是丝路贸易中心。将上列出土物品种与这些出土文字资料结合分析，可以说，通过“丝路”进行的丝绸织物贸易，数量是相当巨大的。

分析“丝绸”织物图案，可以得到的强烈印象是汉代或汉代稍前织锦，花纹布局均成行排列，循环往复。花纹图案多是变幻的云纹中游动着象征吉祥的瑞兽，并穿插种种吉祥用语如“延年益寿长葆子孙”“富贵且昌”“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世无极锦宜二亲传子孙”“广山”等，形成显目的时代特点。而南北朝以后，尤其隋唐时期，既有传统的中原图案纹饰，也出现了流行于中亚、西亚的狮、象、鹿、野猪、马及佛教艺术的化生、莲花图案。其中一些标本，如联珠对雀“贵”字纹锦、联珠猪头纹锦、鸾鸟衔绶带纹、联珠鹿纹等，更是明显具有波斯风格的纹样。唐代，吐鲁番地区出土的联珠禽兽纹锦，数量巨大，其中一些兽纹锦，且织有“胡王”字样，更具特色。

在丝织物图案上的这种变化、发展，可以说明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表明通过“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传统的中国丝织物装饰图案，吸收了西亚的营养，显得更为丰富而光彩夺目。

第二、可以肯定，丝织物方面的这一发展，与中原王朝推进丝路贸易密切相关。适合波斯等西亚地区人们喜好的联珠禽兽、鸾鸟衔绶带纹织锦，会更加受到他们的欢迎。在织锦图像中，织上“胡王锦”字样，十分明显，当是为外销目的而组织的生产。

值得强调一点，在论及“丝路”上的“丝绸”贸易时，一般的概念，都是从丝绸的祖国——中国西去，这当然是正确的结论。但在新疆出土文书及丝织实物中，可以得到另一历史信息，这就是在隋唐以前，在新疆大地上还有来自波斯的织锦。在吐鲁番哈刺和卓第90号墓出土文书中，见到“钵斯锦”（此墓同出有永康十七年（482）文书），在阿斯塔那第170号墓葬中，出土高昌章和十三年（543）孝姿随葬衣物疏，其中见到“故波斯锦十张”。对这些文字记录，有学者认为，此“‘钵斯锦’……颇似当地所产”，并不一定就是来自波斯的实物。^[141]这自可备一说。只是应该考虑，作为死者衣物疏中出现了“波斯锦”，应可以肯定，当年高昌社会中，存在波斯锦，且波斯锦相当珍贵。否则，不会在死者随行的“衣物疏”中，表现出这一美好的愿望。它存在的数量多少，流入的途径如何，是可以研究的问题。夏鼐先生曾经考证，吐鲁番出土的鸾鸟衔绶带纹锦，织造工艺为纬线显花，图案具有波斯特点，可以作为波斯锦的标本。

通过“丝路”，不仅大量中国丝绸织物西传，美化了人们的生活；意义更为重大、影响更为深远的是育蚕缫丝及丝绸织造工艺的西传，这在新疆出土文物中也有表现。

丝路南道，在育蚕、缫丝、丝织工艺交流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民丰尼雅遗址中，曾发现过蚕茧，表明至迟在两晋时期，和阗已有了养蚕业。^[142]策勒县唐杰谢镇故址丹丹乌列克中曾见过表达蚕种西传的版画。在洛浦县北阿克苏皮尔古城，发现过陶蚕。^[143]这几组极具说服力的文物，深刻地表现了：在育蚕、缫丝、丝织工艺西传过程中，“南道”具有重要地位，是相关技术、知识西走的主要路线。

中道，车师、高昌所在的吐鲁番，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丝织物生产、贸易中心。

在吐鲁番出土的高昌文书中，有西凉建初十四年（418）的“赁薄蚕桑”文书，表明5世纪初，在吐鲁番地区“蚕桑业已有相当规模”“并导致缫丝制锦业的发展”，另几件西凉文书表现了为官茧缫丝，领取官粮以为工价的史实。在麹氏高昌时期的出土文书中，有在茧丝交易中收取“秤钱”的记录。而在高昌地区购买茧丝者又颇多胡人，故可推论“当时销往中、西亚的中国茧丝，其中相当部分产自高昌”。^[144]

在育蚕缫丝业发展基础上，根据麹氏高昌时期征收寺院官绢的文书，初唐时期记录绵练价格的文书，反映官属纺织工匠报告因火灾受损的文书，则可肯定麹氏高昌吐鲁番地区已有相当规模的丝织业。文书中还留下了它们织造“黄地丘慈锦”的文字记录。出土实物中也确实发现了丝、棉混织几何纹锦。

这里，作为典型，着重说明了吐鲁番地区的情况。而从文书中记录的“疏勒锦”“丘慈锦”，则可以推论，与吐鲁番绿洲相类，在南北朝晚期，库车和喀什绿洲，丝织业也都达到了相当水平。这类技术自新疆进一步远及中亚、西亚，实际已不存在困难。

（二）漆器及制漆工艺

漆器，也是古代中国一大发明，曾光显于世界。色漆，初见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商代安阳发现过红色雕花木器印痕，是漆器之滥觞。周秦两汉，漆器兴盛，《史记》称西域“无丝漆”，文字背后，透显着的是华夏大地富有丝漆而不同于一般的自豪。也因此，各种漆器作为赐赠的礼品，很早就到了日本、朝鲜、蒙古及南亚、西域各处。2005年夏，笔者得机会参加“美国、蒙古联合考古队”在塔米尔河流域考古发掘，汉墓中几乎都有漆器出土，一件口缘包金、器底有汉隶“宜子孙”三字的黑地红彩漆盆，出土时仍光鲜耀眼。在新疆，近几十年的考古调查、发掘中，战国以来的遗址、墓地，几乎是处处见漆器。中天山腹地阿拉沟，战国时期竖穴木椁墓中，漆器多见，有漆盘、耳杯等物。^[145]罗布淖尔湖北岸土垠是西汉时期的重要遗址，出土过西汉木简，遗址中也有多件漆器，^[146]昭苏夏台乌孙墓，湿度大，漆器保存不好，但

漆皮仍存；^[147]和静县拜勒其尔墓葬，时在汉代前后，见到保存完好，相当精美的夹纆漆盘；^[148]楼兰城郊，两座保存较好的汉墓，仅漆器即见七件，当年楼兰王国上层占有漆器之多，可见一斑。^[149]在民丰尼雅遗址东汉时期贵族墓葬中，也出土过漆奁，用为贵族夫人的梳妆盒，内置铜镜、粉袋、胭脂袋。^[150]汉晋（最晚至南北朝初年）的墨山国墓地，也出土漆耳杯、漆奁盒等，其中一件圆形带盖的漆粉盒、一件外壁见弦纹的筒形杯，不仅器形别致，制作工艺也别具特色。^[151]后者与昆仑山北麓古且末王国扎洪鲁克墓地（时代最晚到西汉，早可到东周）出土过的一件筒形杯形制相近。这件筒形漆杯，表面髹黑漆，器表雕刻鹿、羊。发掘者根据木桶材质及雕刻纹样判定，毫无疑问是本地制作的一件漆器。^[152]其它还有髹漆食案等物，同样具有地区特点。^[153]其他，如古于阗王国内汉晋时期的山普拉墓地，出土过单耳漆罐及漆碗，^[154]漆碗纹饰鲜亮如新，黑地红彩（少量黄、绿彩点），正面作云纹，背面以四圆点为一组，密布于几何形方格中，极具特色，有人认为图案表现了鲜明楚文化特征。^[155]两晋以后，在吐鲁番阿斯塔那高昌王国时期墓地出土过漆盘等物，天山南麓巴楚县托库孜萨来唐据史德故城遗址，在南北朝阶段文化层内，出土过一件鼓形漆盒，木胎，用红、黑色漆，髹出彼此相间的条纹，^[156]也很具特色。

这里罗列的漆器资料，肯定并不是完整的。但总体上还可以表现古代中原漆器西，及新疆漆技的情况。战国时期，中原漆器已经到了西域，两汉至晋，尤其是两汉时期，是漆器多量进入西域的时期，这与两汉王朝对西域各地王国实施安辑政策，对王国上层集团赂遗不绝，存在密切关联。南北朝以后，漆器在日常器皿中的地位，要逊于两汉，在新疆发现的漆器标本也相对减少了许多。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髹漆技术何时进入西域？只要能获得漆液，获得稀释剂桐油，进行髹漆工艺是并不复杂的。只要注意漆液的密封运输即可。从对扎洪鲁克出土的、工艺比较简单的黑色漆筒的观察，可以得到的结论是：最晚到汉，这种漆髹工艺，新疆已经大概了解。在尼雅遗址东汉末期的王族墓地，男主人随身的剑鞘，皮套外表也曾经涂过红色漆^[157]，而鞘剑图案却具有贵霜风格，这一现象也表明，东汉后期的精绝王国，大概也已经掌握了髹漆工艺，并在少数贵重物品上进行漆髹了。

更晚，这一工艺传到了波斯、阿拉伯。而欧洲最后掌握这一源自华夏大地的漆髹工艺，并从东方进口桐油，已在16世纪前后了。

（三）棉花东传

中国，是棉花种植大国。今日中国棉纺织业居世界前列，全球受其惠泽。只是棉花原产地却并不在中国。棉花植根中国，同样源自“丝绸之路”。只是这一过程，颇多曲折。贯穿其中的，是“丝路”沟通欧亚非文明的精神，是人民始终不变的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属于锦葵科植物的棉花，适宜于在亚热带生长，根据对纤维长度、外观进行分类，有非洲棉、亚洲棉、陆地棉、海岛棉之别。从已获考古资料分析，最早进入中国西部地区的，是原产非洲、纤维比较短粗的非洲棉，又名草棉，时代约在公元2世纪的东汉时期。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和阆地区多处绿洲王国遗址，罗布淖尔地区楼兰、鄯善王国境内多处遗址，曾多批、多量发现过棉布、棉织衣物。1959年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在和阆民丰县北沙漠中尼雅遗址区发掘的一座东汉时期精绝贵族墓中，出土了多件保存完好的棉织物：男主人穿著在身的棉布面细绢衬里长裤、缀附于女尸上衣的方形棉布手帕、男主人棉布覆面，都保存完好。另外，还有两块分别长77厘米、88厘米的长方形蓝色印花棉布，出土时覆盖于随殉的盛储食品的木盘上。印花图案有三角形、狮、龙、鸟以及希腊风格的裸上体、项光、手持角状杯、纓络缠身女像。除这些棉布衣物外，在女主人盛化妆品的藤奁中，还有一件棉花团，用为涂擦胭脂的工具。^[158]这批棉

织物，透露的历史信息是：在精绝，棉布还是不平常的珍稀品，所以男主人长裤以棉布做面，丝绢做里，并用之为覆面；除棉布外，出土了棉花团，似乎本地已有棉花；用为食布的印花布，尤其是其上的裸体女像，不是新疆本土图案，学者研究，相关棉布织物来自印度；^[159]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一裸体女像，与贵霜王朝胡毗色伽王（Huvishka）时金币背面的丰收女神阿尔多克洒（Ardochsho）的形象几乎完全一致，表明了贵霜文化的痕迹。^[160]可见这件印花棉布更有可能来自贵霜。而贵霜王朝在东汉时期，与新疆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1959年尼雅发现的棉织物，学界印象比较深。但尼雅发现棉织物，其实是远远早于1959年的。20世纪初，A.斯坦因在尼雅、楼兰等多处遗址中，就发现过棉织物。他为判明所获那些织物碎片的材质，曾经委托汉诺塞克博士进行过分析，确认为是棉织物，而且结论为是当地的“手工产品”。^[161]

在尼雅遗址中，进一步多量、多次地发现棉织物，是在20世纪90年代。其中，尤以1995年发掘的一号墓地出土为集中，如其中三号墓，男主人着裤为锦面棉里；四号墓，男主人头戴白棉布帽，女主人头部包裹棉布方巾；八号墓，男女主人盖身之布单、男主人长袍，女主人内衣均用棉布。^[162]这一墓地，经过全面分析，定为东汉末年精绝王国时期的王陵，^[163]由此表明东汉末年，在尼雅河绿洲，棉布已比较常见。

同处和阗地区，与民丰尼雅遗址邻近的洛浦县山普拉墓地，曾被多次发掘。在墓地出土的大量织物中，主要为毛织物，棉织物占5%的比例。经过分析，棉织物不少为汉代遗存。^[164]

且末县扎洪鲁克墓地，规模大、沿用时间长，在这区墓地汉代墓葬中，也发现过平纹本色棉布。

罗布淖尔地区不少遗址，同样出土过棉织物。这些遗址，早到东汉，晚到晋。例如，A.斯坦因在楼兰城LAI遗址采得的棉织物，为棉麻混织，据汉诺塞克和温顿分析，“棉类似曾予丝光处理，可能在碱溶液中浸过”。^[165]其他如LAIV号遗址也见到本色平纹粗棉布碎片。在楼兰城郊LB遗址也见到3件本色平纹粗棉布片。1980年，在楼兰城东郊一座墓葬中（编号为MB2），新疆文物考古所曾发掘到棉织物5件，这座墓葬的时代，约当在东汉。^[166]1998年，在楼兰城郊LE曾截获盗墓者掘取的棉布袍，保存十分完好，^[167]时代最晚到晋。

从山普拉、尼雅，缘昆仑山北麓东行，经且末至罗布淖尔地区，自汉及晋，几乎所有曾经发掘的遗址中，都见到了棉织物碎片，完整的衣、裤、袍、被等，据此做出东汉时期塔里木盆地南缘，古代绿洲居民已普遍穿用棉布，可能也已知种植棉花、纺织棉布的结论，是不无道理的。棉织物生产成本低，坚实耐磨，保暖，透气性能好，这对改善人们的生活，作用是难以轻估的。

晋代以后，吐鲁番地区高昌王国成为显目的植棉、棉纺织业中心。高昌王国植棉，棉布既自用，又投入市场。这不仅见于历代史籍记录，也有大量出土棉织物、出土古代文书提供直接证明：棉织物，已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物资。^[168]此外，这一时段，在昆仑山下于阗县乌于勒克、^[169]克孜尔石窟窟前积土清理，也发现了南北朝时期棉布。^[170]克孜尔石窟处塔里木盆地北缘，说明这时期棉花种植、棉布服用，已遍及塔里木盆地周缘古代绿洲。

入唐，新疆植棉业得到更进一步发展，棉花种植地域扩大，棉布产量增加，棉织业在人民生活中的地位进一步增强。考古工作中发现的棉籽、棉絮、棉布，不仅见于吐鲁番，还见于巴楚托库孜萨来、库车通古斯巴什、和阗地区的喀达列克、昆仑山脚下安迪尔、阿尔金山脚下米兰古堡……凡气候干燥、多少有过一些考古工作的地点，几乎都发现过棉织物。新疆考古学者在托库孜萨来发现的棉籽，曾经鉴定，根据其籽粒小、纤维短等特点，可以肯定为草棉，^[171]这为了解古代新疆唐代以前的棉花品种及通过“丝路”沙漠道进入新疆的途径提供了直接证明。

新疆考古中发现的高昌回鹘、元朝时期的棉织物标本，也同样丰富。^[172]

草棉，由于纤维短、粗，产量不高，虽然进入中国很早，在北方中国尤其在新疆、甘肃西部地区，曾经为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做出过无可估量的贡献。但最后还是在实际生活中，遭遇

淘汰的命运，经过海上丝路进入中国的亚洲棉逐渐成为了民间种植品种。19世纪，又为从美国引入的陆地棉所取代。通过棉花，见证了人类物质文明发展进步的过程，也浸透和显示着“丝绸之路”文化的精髓。

（四）造纸

纸及造纸技术，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造纸技术传入新疆，并通过新疆进一步西去，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1933年在罗布淖尔地区，发现过西汉麻纸。在尼雅东汉墓中，发现过纸片一小块“绉成一团，大部分涂成黑色，长仅4.3厘米、宽2.9厘米”。^[173]但当时的书写材料，还是以木简为主，也有少量书写在羊皮上，纸质材料是十分少而珍贵的。在吐鲁番地区，汉代以后，晋唐时期，近30多年来，出土文书约3000多件。目前所见文书最早在公元4世纪前期的十六国时期。自此以后，纸质文书渐成吐鲁番古墓中最常见的出土物：官方文档、私人契约、书信，抄写经典、蒙童习字，无不用纸。纸，在当年吐鲁番地区的社会中，已经是一项须臾不可离开的物品。

据此，可以推论：在十六国时期，尤其是东晋咸和二年（327），前凉张骏在这里置高昌郡以后，吐鲁番可能已逐渐掌握制纸工艺。理由是：社会对纸有重大需求，其制作工艺并不复杂。自西汉开始造纸，至此已有400年历史。在河西地区进入吐鲁番的大量移民中，会有了解制纸工艺的匠师。其技术知识，当有可能已稍普及。本地造纸的主客观条件，至这一历史时期，已经具备。

这一推论，有一定的事实根据。

对吐鲁番出土古纸，潘吉星教授曾进行分析。^[174]取北凉到唐代古纸标本26件（其中4件为库车出土），对纸的物理、化学结构进行观察分析。纸质标本，包括官府文档、私人文书、古籍抄本、佛经等。观察表明，晋、南北朝时期，重要典籍抄本、官府文档用纸，纤维分散均匀，纤维束少，打浆较细，纸质较好；而一般民间用纸，如民间私契、丸药包装纸，纤维交织不均，打浆不匀，纤维破碎程度较差，杂质或未除尽，纸质明显较次。分析抄纸工艺，主要为布纹纸，也有帘纹纸。吐鲁番出土建兴三十六年（348）、建初十四年（418）的用纸，都是用织纹模抄造的布纹纸。其中建初十四年古纸，可以观察到纸模网目约为110孔/平方厘米，是我国目前有准确纪年的早期布纹纸标本。

布纹纸是比较古老的产品，表现着传统的工艺。汉、晋、南北朝时期，多为这种技法。值得强调说明的，是新疆土法造纸，至今仍保持这一传统。笔者于20世纪80年代曾在和阗县调查过一处桑皮纸作坊。取当地桑树皮，在碱水中浸泡，击打，取得纸浆后，复以木框布廉抄出，阴干成一张张桑皮纸，色泽不白，但纸质韧，民间仍然使用这一造纸工艺。^[175]它接受的是中原地区比较古老的一种工艺。由此可以推论，其接受的时代也当是这一工艺在中原、河西地区盛行的时代。

帘纹纸，是晋以后始见的抄纸工艺产品。在潘氏测定的18件隋唐时期古纸中，除少量帘纹不显外，几乎都是帘纹纸。细致分析吐鲁番出土唐“白怀洛借钱契”“卜老师借钱契”及“卜天寿《论语》郑注”“宁和才授田户籍”，可以见出纸质有粗帘纹及制作稍精的细帘纹之别。蒙童习字等平常普通用纸，明显为粗帘纹；官府文档如户籍等，纸质即较精良。帘纹纸工艺与敦煌石室中所见粗横帘纹纸一样，工艺一致。^[176]

唐代吐鲁番地区已有了官办的造纸作坊，这得到阿斯塔那第167号墓中出土的唐代文书的证明。文书存字“当上典狱配纸坊驱使”，^[177]可作为唐代吐鲁番已存在“纸坊”的确证。唐代西州既有纸坊，纸质标本显示的工艺与敦煌地区用纸又一样，说明当年吐鲁番地区纸张生产工艺得之于河西地区的影响，甚至生产者就直接来之于河西地区。汉晋时期，吐鲁番居民多“汉魏遗黎”，大量河西地区移民进入了吐鲁番，纸作工艺随之进入这片地区，自是情理中事。

在分析吐鲁番古纸标本时，还应注意一个工艺现象：在纸浆中加入淀粉糊，以使纸质平滑、增光、受墨，而这一传统，也显示着中原地区造纸历史的印痕。

坦罗斯之战后，造纸工艺传入阿拉伯，并进一步及于非洲、欧洲广大地区，大大推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这一工艺西传的中继站，就在新疆。

（五）毛纺织工艺

近40年的新疆考古工作，最大的收获之一，是对新疆地区毛纺织生产有了比较具体的认识，对毛纺织生产工艺的发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这些年的考古工作，在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哈密五堡、且末扎洪鲁克、阿拉沟、鱼儿沟、和静察吾呼沟、巴里坤南湾、哈密焉布拉克、哈密火车站附近，洛浦山普拉、鄯善洋海、楼兰城郊、尼雅、于阗屋于勒克、巴楚托库孜萨来、吐鲁番阿斯塔那、米兰吐蕃戍堡等处，都有相当数量而且保存情况很好的古代毛纺织物出土。从公元前2000年，直到唐宋时期，前后历时差不多于3000年。这为我们总结、认识古代新疆毛纺织发展历史提供了充分的基础。

粗略统计一下现有毛织物种类，如提花毛毯、平纹毛织毯、平纹毛布、毛罽、缂毛织物、各种编织毛带等，其中，不能排除少量缂织物（如山普拉出土的人首马身毛织物）是来自境外，但绝大多数当均为本地自产。

现在，可以肯定提出一点：中国中原地区在唐宋时期运用得十分成熟，有过许多惊人产品的缂丝工艺，其通经断纬的织造技术，应该是籍“丝路”联系，吸收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在毛纺织生产中早就运用了的一种生产工艺。在新疆出土的毛纺织物中，早在公元前1000年（如哈密五堡青铜时代墓地），已见到这类通经断纬的生产工艺。在出土的公元前后的毛织物中，通经断纬技术运用得十分成熟。毛织物染色，也很值得注意。3000年前的毛织物，其色彩至今仍然新鲜而光泽，是了不起的成就。

（六）玻璃

玻璃制作工艺，初见于埃及、米索不达米亚。最早在公元前2500年，蜻蜓眼玻璃珠已见于上述地区。当年，这是被认为具有神奇力量且可以辟邪得福的神物，因而受到社会上层统治人物的青睐。于是，这种具眼睛外形的料珠及它背后的文化思想，很快北传到欧洲，东传到伊朗高原，并进一步向东亚地区扩展其影响。前面曾经简述过蜻蜓眼玻璃珠进入中国的史实，中国古代最早接触玻璃制造工艺，应该是与蜻蜓眼的东传密切相关的。

汉代以后，在新疆古代遗址中，见到了各种造型的玻璃器皿，如杯、罐、盆、盘之属。这一进程同时，其制作工艺也渐为人们所了解并适应环境，很快有了中国特色的制造品。

在新疆不少早期考古遗址中，出土过蜻蜓眼料珠。最早的出土地点，是在天山南麓轮台县境的穷巴克墓地中，发现一枚。时代最早可能到公元前7世纪或更早。^[178]时代较此稍晚，则出现在昆仑山脚下且末县境扎洪鲁克墓地，共见6枚。^[179]入汉，蜻蜓眼料珠发现更多。在尼雅精绝遗址，仅1995年一号墓地，即出土6枚。出土时，或置于贴身内衣下，说明其确实被视为辟邪神物，而非一般装饰品。^[180]与尼雅相邻近的洛浦县山普拉墓地，时代也在两汉，发现蜻蜓眼料珠21枚，^[181]由此可见，这类料珠受到人们重视的程度。

主要根据在尼雅精绝遗址出土的精绝王室贵胄们互相礼赠“琅玕”的汉简文字，结合王室墓葬中对蜻蜓眼料珠的处置情形以及参证以历代文献中对“琅玕”的记录，笔者曾分析：古代文献中所述“琅玕”，实即指西来的蜻蜓眼料珠。^[182]如此论不谬，则这类玻璃珠，进入我国，时代是相当早

的。东周时期在山西、河南、山东等贵族大墓中所见蜻蜓眼料珠不少，就是生动的证明。^[163]

就笔者实际工作中的体验，且末县那勒克、安迪尔、墨玉县扎瓦、疏附县英吾斯坦等处，都曾见过细碎的玻璃片，这本是测定其成份、判明产地的好标本，遗憾的是这一工作始终未进行。只是器形稍大，特征比较显明的器物，大家关注较多，也就其形制进行过分析。如在楼兰古城发现的、具有西亚风格的玻璃杯残片，在扎洪鲁克、营盘古墓地、巴楚托库孜萨来等处，见过的具有波斯风格的玻璃器。时代都在公元4世纪以前。自然，这些只是历史长河中挂一漏万的一点实证，但确清楚表示了一种存在。对西亚、伊朗玻璃进入中国的过程，也因此引起人们关注，不少学者进行过专门研究，^[164]此处不再赘述。

玻璃器的主要原料是二氧化硅，取得不难，工艺也并不复杂。随玻璃珠、玻璃器皿进入，中国似很快就有了仿制、自行生产的情形。如被视为神物而售价奇昂的蜻蜓眼，在战国时期的隋县曾侯乙墓中，就已有了自己生产的同类珠子，只是其成份，不是西亚的钠钙，而是以钾钙为主。^[165]在新疆也有一个相似的实例，在拜城县克孜尔墓地，曾在多座墓葬中发现过蜻蜓眼玻璃珠，一般均置于死者颈、胸部。发掘者曾取18个样品进行了分析，成份颇不一致：既有钠钙玻璃，也有铅系玻璃，一些标本中钾、镁含量还很高，为其他钠钙系统玻璃少见。发掘者认为这是在吸收西方技术的基础上，利用本地资源生产的具有自身特点的制品。^[166]而其绝对年代也在公元前400年以前，是比较早的。在新疆若羌瓦石峡元代遗址中，也发现过自行制造玻璃器的作坊，并采获6件小口细颈凹底瓶，4件玻璃罐（残），分析其成份，为钠钙玻璃，制造工艺似存在西部影响，但助熔剂用的是新疆土硝，是本地特点。器壁中虽气泡较多，工艺不是很进步，但也不是原始的生产形态，说明在新疆地区因地制宜地自行生产玻璃，也已走过一段岁月了。^[167]

中国传统文化中用陶、瓷，与玻璃相比较，后者自有其优点。玻璃器及其工艺东传，对丰富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其贡献，也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除了这几个方面的资料外，其他如小麦东来、水稻西去、古代采矿及金属冶铸工艺、犁耕技术、水利灌溉技术（如凿井、坎儿井）、音乐舞蹈、绘画技艺的彼此吸收以及多种宗教信仰（如祆教、佛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的东传等，也都有新的发现，它们从不同角度表现着古代“丝路”上思想文化技术知识的交流。相关论著颇多，此处不再赘述。

丝绸之路，是古代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产物，推动过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丝路”的历史，表现了全人类在自身发展、进步的崇高事业中，交流是客观的需要。一个互相联系、积极交流、共同发展与进步的世界，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这一积极的文化精神，应该成为人类的共识，并随人类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注释

- [1] 1877年，李希霍芬在其名著《中国亲程旅行记》（1877—1912年陆续出版）中，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概念，意指汉代黄河流域与中亚两河流域、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交通路线，丝绸贸易为其重要内容。
- [2] 1910年，艾伯特·赫尔曼在其《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丝绸之路古道》中强调：“丝绸之路”的概念，应该延伸为中国与西亚、叙利亚之间交通路线。
- [3] 小麦源自西亚，这是国际普遍认同的一个结论。1979年，古墓沟墓地发掘后，出土麦粒曾经当时四川农学院颜济教授鉴定：古墓沟出土小麦，既有普通小麦，也有圆锥小麦。而新疆还存在不少天然的野生节节麦。野生节节麦与圆锥小麦自然杂交，即可形成普通小麦。因此，颜济教授提出：圆颖多花类型、具有中国特色的普通小麦，可能就是这样产生的。参见王炳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189页。

- [4] 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院首届学术报告会论文集》1982年，327-350页；新疆考古所小河队《罗布泊小河墓地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吐鲁番研究》2005年第1期。
- [5] F.贝格曼著、王安洪译《新疆考古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77年，91页。
- [6] 王炳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152-153页；王炳华等：《巴里坤兰州湾子三千年前石构建筑遗址》，《中国考古年鉴》，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255-256页。
- [7] 郭物：《铜镜在欧亚草原的初传》，《欧亚学刊》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镜中乾坤》，上海：上海科学出版社，2003年。
- [8] 哈密五堡出土文物，现藏新疆文物考古所。《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3页；王炳华：《哈密古墓地发掘简报》，《考察与研究》第四辑，1984年12月。测年结论，见《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152页。
-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11页。
- [10] 王炳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154页。相关文物，收存于哈密博物馆。
- [11] 杨伯达主编：《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玻璃器》卷，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4年；关善明：《中国古代玻璃》，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干福熹编：《中国南方古玻璃研究》，上海：上海科学出版社，2003年；高至喜：《论我国春秋战国的玻璃器及有关问题》，《文物》1985年第12期；后德俊：《谈我国古代玻璃的几个问题》，《江汉考古》1985年第1期。
- [12] 王炳华：《也释琅玕》，《新疆考古历史论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 [13] 《太平御览》，卷809，第3594页。
- [14] C.N.鲁金科著、潘孟陶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 [15] 王炳华：《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3-5页、212-214页；新疆社会科学院编《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4-5页；其测年结论见《文物》1978年第5期；周利群：《凤西飞——由西域出土的镜、漆、绣看楚文化西渐》，（待刊）。
- [16] 吐鲁番研究院：《吐鲁番学新论》图版一，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
- [17] 新疆考古所、吐鲁番文物局：《鄯善洋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4年第1期，21、27、30、45页。
- [18] 王炳华：《丝绸之路草原道》，《丝路游》1988年第6期；王博等《新疆石人研究》，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
- [19] 《波斯艺术大观·卷七》，纽约，1981年，57页；王炳华：《古代新疆塞人历史钩沉》，《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
- [20] 王炳华：《新疆天山生殖崇拜岩雕刻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
- [21] 《史记·大宛列传》。
- [22] 《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
- [23] 王炳华：《吐鲁番古代文明》，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129-132页。
- [24]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第131、142-144、146、151页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版；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434-435页。
- [25]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第131、142-144、146、151页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版；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434-435页。
- [26]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十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54-240页。
- [27] 王炳华：《阿拉沟古堡及其出土唐文书残纸》，《唐研究·第八卷》。
- [28]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北京：文物出版社，31-72页；王仲华：《试释吐鲁番出土的几件有关过所的唐代文书》，《文物》1975年第7期。
- [29] 黄文房：《罗布泊地区古代丝绸之路的研究》，《罗布泊科学考察与研究》，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987年，306-315页。
- [30]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罗布泊综合科学考察队：《神秘的罗布泊》图版222，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
- [31] 饶瑞符：《汉唐时代米兰屯田水利初探》，《水利史研究会成立大会论文集》。
- [32] 中国科学院塔克拉玛干沙漠综合队考古组：《若羌县古代文化遗存考察》，《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续）1990-1996》，新疆：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年，549-552页。
- [33] 文物图片见王炳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彩图13，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
- [34] 林梅村：《西域文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52-54页。
- [35] 1999年调查，遗迹仍然显明，近年再看相关遗迹，已破坏殆尽。相关图片，见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五十一

- 图,北京:中华书局,1943年。
- [36] 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 [37] 王冀青:《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三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264~265页。
- [38] 彭念聪:《若羌米兰新发现的文物》,《文物》1960年第8~9期;中科院塔克拉玛干综合考察队《若羌县古代文化遗存考察》,《新疆文物》1990年第4期。
- [39] 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48~49页。
- [40] 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49~50页;测年结论见孟凡人《楼兰新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211页。
- [41] 中国科学院塔克拉玛干沙漠综合队考古组:《若羌县古代文化遗存考察》,《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续)1990—1996》,新疆: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年,546页。
- [42] 据《沙州图经》记载,“鄯善城周迴一千六百四十步,西去石城镇二十步,汉鄯善城见今摧坏”。则鄯善王城夯泥,早已毁圮。其规模1640步,换成今天的概念,周围应达3000米上下。上列这些遗址,最多只能是当年夯泥城内的一点建筑遗存而已。
- [43] 张平:《若羌县石头城勘查记》,《新疆文物》1990年第1期。
- [44] 黄小江:《若羌县文物调查简况》,《新疆文物》1985年第1期。
- [45] 王博:《扎滚鲁克一号墓地与古且末国文化》(公元前8世纪至3世纪),《吐鲁番学新论》,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300~313页。
- [46] A.斯坦因:《Serindia》,第一卷,第七章,第3节,牛津版,1921年,382~383页。
- [47] 塔克拉玛干综合队考古组:《安迪尔遗址考察》,《新疆文物》1990年第4期。
- [48] 中日尼雅学术考察队:《尼雅遗迹学术报告书》第一、二、三卷,(日)京都,法藏馆。
- [49] 中法联合克里雅河考古队:《新疆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考察概述》,《考古》1999年第7期。
- [50] A.Stien Ancient Khotan, PL LXIII, P259~260, 1907.
- [51] 新疆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所编著《中国新疆山普拉——古代于阗文明的揭示与研究》,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
- [52]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五章,第三节,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52~53页。
- [53] 史树青:《新疆文物调查随笔》,《文物》1960年第6期。
- [54]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四章,中华书局,1943年。
- [55] 史树青:《新疆文物调查随笔》,《文物》1960年第6期。
- [56] 王炳华:《丝绸之路南道我国境内帕米尔路段调查》,《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58~81页。
- [57]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之一,第105~112、179~220页,北京:国立北京大学出版,1948年。
- [58] 王炳华:《沧桑楼兰》,第31~36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
- [59] A.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疆楼兰考古队《楼兰城郊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
- [60] 新疆文物考古所:《罗布淖尔地区东汉墓发掘及其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 [61] 新疆文物考古所:《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5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1期。
- [62] 巴州文物普查队:《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93年第1期。
- [63] 冯承钧:《高车之西徙与车师鄯善国人之分散》,《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彙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45~47页。
- [64] 陈国灿:《唐西州蒲昌府防区内的镇戍与馆驿》,《吐鲁番研究》,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489~509页。
- [65] 陈国灿:《唐西州蒲昌府防区内的镇戍与馆驿》,《吐鲁番研究》,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495页。
- [66] 王炳华:《天山东段考察记》,《新疆文物》1988年第1期。
- [67] 新疆文物普查办公室等:《吐鲁番地区文物普查资料彙编》,《新疆文物》1983年第3期。
- [68] 陈国灿:《鄯善县新发现的一批文书》,《吐鲁番学研究》,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36~52页。
- [69] (清)陶葆廉:《辛卯侍行记》。
- [70] 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4页。
- [71] 阎文儒:《吐鲁番的高昌故城》,《文物》1962年第7~8期。

- [72]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70~123页。
- [73] 李肖：《交河故城的形制布局》，北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 [74] 新疆考古所：《交河沟西》[1994—1996年度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4~41页；新疆文物局等《交河故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15~72页。
- [75] 王炳华：《近年新疆考古中所见唐代重要史迹》，《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431~447页。
- [76] 清：《新疆图志》，七卷，八十，道路二。
- [77] 新疆博物馆：《博格达沁古城调查》，《文物》1982年第4期。
- [78] 新疆文物局等：《新疆文物大观》锡克沁佛教遗址，新疆：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180~187页。
- [79]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10~12页。
- [80] 黄文弼：《新疆考古的发现》，《考古》1959年第2期。
- [81] 伯希和：《吐火罗语考》，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64~136页。
- [82]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33~35页。
- [83] 《新唐书·地理志·卷四十三》载：“安西西出柘橛关、渡白马河，百八十里入俱毗罗碛……”。
- [84] 王炳华：《新疆/库车玉其土尔遗址与唐安西柘橛关》，《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2期。
- [85] 阿克苏地区文管所：《阿克苏地区柯坪乌什两县文物调查》，《新疆文物》1986年第1期。
- [86] 向达：《西域见闻琐记》，《文物》1962年第7~8期。
- [87] 柳晋文：《柯坪—巴楚古丝路调查》，《新疆文物》1985年第1期。
- [88] 林梅村：《疏勒考古90年》，《文物天地》1990年第5~6期。
- [89] 喀什地区文物普查队：《喀什地区文物普查资料汇编》，《新疆文物》1993年第3期。
- [90] 《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40页。
- [91] 所见贝叶经，后收存于喀什文物保管所。
- [92] 李遇春：《乌恰县发现金条和大批波斯银币》，《考古》1959年第9期。
- [93] 武伯伦：《新疆天山南路的文物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0期。
- [94] 喀什地区文物普查队：《喀什地区文物普查资料汇编》，《新疆文物》1993年第3期。
- [95] 喀什地区文物普查队：《喀什地区文物普查资料汇编》，《新疆文物》1993年第3期。
- [96] 王炳华：《天山东段考古调查纪行》（一）、（二）、（三），《新疆文物》1987年第3期、1988年第1期、1988年第4期。《中国考古集成》西北卷，综述二，767~791页。
- [97] 马雍：《新疆巴里坤、哈密汉唐石刻丛考》，《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16~23页；王炳华：《新疆访古散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105~109页。
- [98] 王树楠：《新疆访古录》；王炳华主编《新疆历史文物》，新疆：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46页。
- [99] 马雍：《新疆巴里坤、哈密汉唐石刻丛考》，《出土文献研究》，1985年；《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16~19页。
- [100] 王炳华：《近年新疆考古所见唐代重要史迹》，《唐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431~434页。
- [101] 王炳华：《天山东段考古调查纪行》（三），《新疆文物》1988年第4期。
- [102] 王炳华：《天山东段考古调查纪行》（二），《新疆文物》1988年第1期。
- [103] 王炳华：《天山东段考古调查纪行》（二），《新疆文物》1988年第1期。
- [104] 王炳华：《天山东段考古调查纪行》（二），《新疆文物》1988年第1期。
- [10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队《新疆吉木萨尔北庭古城调查》，《考古》1982年第2期。
- [10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1年。
- [107] 王炳华：《天山东段考古调查纪行》（一）《新疆文物》1987年第3期。
- [108] 王炳华：《天山东段考古调查纪行》（一）《新疆文物》1987年第3期。
- [109] 汉代、清代轮台，可以肯定，在今天山南麓轮台县境。唐代轮台，与汉代轮台，不居于一处。文史学界，过去多有混淆。
- [110] 徐百成编著《轮台丝路今觅处》，新疆：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年。
- [111] 孟凡人：《北庭史地研究》，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96~112页；陈戈：《唐轮台在哪里》，《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
- [112]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昌吉古城调查记》，《文物资料丛刊》第四辑。
- [113]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242~247页。荣新江：《西

- 域粟特移民聚落补考》，《吐鲁番学新论》，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459~468页。
- [114] 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补考》，《吐鲁番学新论》，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459~468页。
- [115] 王国维：《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卷上；岑仲勉：《弓月之今地及其语缘》；王明哲：《吐鲁番出土有关弓月城文书初析》，《西域史论丛》第一辑。
- [116] 《隋书·西域传》、《隋书·裴矩传》。
- [117] 殷晴：《古代新疆的南北交通及经济文化交流》，《新疆文物》1990年第4期。
- [118] 林梅村：《沙海古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141~143页。
- [119] 贺昌群：《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38~39页。
- [120] 《汉书·西域传》下。
- [121] 酈道元：《水经注·河水》。
- [122] 《新唐书·地理志》。
- [123]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42~45页。
- [124]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甲集下。
- [125] 侯灿：《麻扎塔格古城堡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文物》1987年第3期。
- [126] 中法联合克里雅河考古队《新疆克里雅河流域考古概述》，《新疆文物》1997年第4期。
- [127] 中法联合克里雅河考古队：《新疆克里雅河流域考古概述》，《新疆文物》1997年第4期。
- [128] 肖小勇：《探索沙漠遗址丹丹乌列克》，《新疆文物》1997年第4期。
- [129] 张铁男、于志勇：《新疆民丰尼雅遗址以北地区考古调查》，《新疆文物》1996年第1期。
- [130] 王炳华：《访古吐鲁番》，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141~143页。
- [131] 王延德：《西州使程记》，《古西行记》，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160页。
- [132] 王炳华：《唐西州白水镇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 [133] 徐百成、程鸿远：《浅论唐代丝绸之路过天山路径》，载《轮台丝路今觅处》，新疆：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年，119~148页。
- [134] 王炳华：《阿拉沟古堡及其出土唐文书残纸》，《唐研究》第八卷。
- [135] 《新疆图志·道路三》载，焉耆“城西北十五里太平渠，五里北大渠，七十里喀喇木墩，四十里埃布齐山口，六十里巴仑台，百四十里小裕勒都斯，三百里大裕勒都斯，二百里巩古斯达坂出境接伊犁东南支路。”
- [136] 《清高宗实录·卷六一三》，第21页。
- [137] 《新疆图志·道路三》。
- [138] 《新疆图志·道路三》。
- [139] 李健超：《唐代凌山地理位置考》，《西北史地资料》，1982年第1期；《汉唐两京及丝绸之路历史地理论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417~425页。
- [140] 王炳华：《唐勃达岭—乌什县别迭里大坂》，《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438~440页。
- [141] 武敏：《从出土文书看古代高昌地区的蚕丝与纺织》，《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5期，92~100页。
- [142] 李吟屏：《和田考古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2页。
- [143] 新疆文物局《新疆文物古迹大观》图版第0164，新疆：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78页。
- [144] 李吟屏：《和田考古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2页。
- [145] 王炳华：《新疆阿拉沟竖穴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
- [146]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北京：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
- [147] 新疆考古所《昭苏县古代墓葬试掘简报》，《文物》1962年第7~8期合刊。简报文字，对漆器未作具体介绍，笔者参与过这一发掘。
- [148] 周金玲：《和静县拜勒其尔墓地的发掘研究》，《新疆文物》2004年第1~2期。
- [149] 新疆考古所楼兰考古队：《楼兰城郊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
- [150] 新疆文物考古所：《尼雅95一号墓地3号墓发掘报告》，《新疆文物》1999年第2期；图版见新疆文物局等《新疆文物古迹大观》图版0113，新疆：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60页。
- [151] 李文瑛：《新疆尉犁营盘墓地考古新发现及初步研究》，《吐鲁番学新论》，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393~408页。
- [152] 《新疆且末扎洪鲁克一号墓地》，《新疆文物》1998年第4期，图版见《新疆文物古迹大观》图0075，46页。

- [153] 新疆文物局等:《新疆文物古迹大观》图版0084,新疆: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49页。
- [154] 新疆博物馆、新疆考古所:《中国新疆山普拉》图版第190、191,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29页。
- [155] 新疆文物局等:《新疆文物古迹大观》图版0084,新疆: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49页,图版0199文字说明,90页。
- [156] 新疆文物局等:《新疆文物古迹大观》图版0084,新疆: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49页,图版0726,266页。
- [157] 新疆文物考古所:《尼雅95一号墓地3号墓发掘报告》,《新疆文物》1999年第2期,图版见《新疆文物古迹大观》图版0113,60页。
- [158] 新疆博物馆:《新疆民丰县北沙漠中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
- [159]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67页;武敏:《从出土文物看唐代以前新疆纺织业的发展》,《西域研究》1996年第2期,6~9页。
- [160] 孙机:《建国以来西方古器物在我国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99年第10期。
- [161] A.Stien The Ancient khotan , ChaptetXI VIII, New Delhi—India 1981, P410; A.Stien Serindia , Chapter XI, VII, P393-399; XII, P442-448.
- [162] 《中日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二卷,88~114页;于志勇:《新疆尼雅遗址95NM1、M8概况及初步研究》,《西域研究》1997年第1期。
- [163] 王炳华:《精绝王陵考古二三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一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103~122页。
- [164] 新疆博物馆:《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发掘报告》,《新疆文物》1989年第2期。
- [165] Hanausek Winton Microscopg of technicae phaducts, 纽约,1907年,66页,引自serindia.
- [166] 新疆文物考古所楼兰考古队:《楼兰城郊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
- [167] 作者作为鉴定组成员曾目验原衣物。图版刊于《新疆文物古迹大观》图版0027,新疆: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33页。
- [168] 王炳华:《从考古资料看古代新疆植棉及棉纺织业发展》,《新疆考古历史论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 [169] 新疆博物馆:《丝绸之路—汉唐织物》图版21,北京:文物出版社,1972年。
- [170] 新疆文物维修办公室:《1989克孜尔千佛洞窟前清理简报》,《新疆文物》1991年第3期。
- [171] 沙比提:《从考古资料看新疆古代棉花种植和纺织》,《文物》1973年第10期。
- [172] 吐鲁番文管所:《吐鲁番喀拉和卓乡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86年第2期;王炳华《盐湖元墓》,《文物》1973年第10期。
- [173] 新疆博物馆:《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
- [174] 潘吉星:《新疆出土古纸研究》,《文物》1973年第10期。
- [175] 笔者调查手记,未刊。
- [176] 笔者调查手记,未刊。
- [177]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231页。
- [178]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新疆队:《新疆轮台县穷巴克第二、三次发掘》,《考古》1991年第8期。
- [179] 新疆博物馆:《新疆且末县扎洪鲁克一号墓地》,《考古学报》2003年第1期。
- [180] 新疆考古所:《尼雅95一号墓地三号墓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99年第1期。
- [181] 新疆博物馆、新疆考古所:《中国新疆山普拉——古代于阗文明的揭示与研究》,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34~35页。
- [182] 王炳华:《也释琅玕》,《新疆考古历史论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 [183] 王炳华:《也释琅玕》,《新疆考古历史论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 [184] 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器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86年第2期。
- [185] 后德俊:《谈我国古代玻璃的几个问题》,《中国古玻璃研究——1984年北京国际玻璃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60页。
- [186] 张平、潜伟、李青会:《新疆拜城县克孜尔墓地出土的玻璃珠及其相关问题》,《吐鲁番学研究》,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368~374页。
- [187] 张平:《若羌县巴什夏尔遗址出土的古代玻璃器皿》,《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

《前汉书·西域传》上称“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1] 汉代史家十分明确：当年，自塔里木盆地西行的南北道，都必须“西踰葱岭”，才能进抵今阿富汗、伊朗，或乌孜别克斯坦及西亚地区，进而步入欧洲。

“葱岭”是古代中国学者基于在地理调查基础上，赋予“帕米尔”的称谓。^[2] 号称“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多高山，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主要山峰海拔都在6000米以上。它位居我国新疆与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乌孜别克斯坦之间，自新疆西去阿富汗、伊朗及中亚各国，进一步抵西亚、欧洲，穿越葱岭是首要一环。要在如此高峻的崇山峻岭中来去，会遭遇的艰难险阻，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

但是，这并没有能阻抑古代中国西向欧亚大陆的努力，丝路“葱岭道”开拓得很早的。《前汉书》中称帕米尔为“葱岭”，就是汉代或更前已存在过穿行帕米尔高原的最好证明。张骞西使大月氏，“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史记·大宛列传》），走的就是葱岭。关于这一通道，在根据班勇提供的资料而作了具体补充的《后汉书·西域传·莎车国》条中记录得较前清楚了一步：“莎车国，西经蒲犁、无雷至大月氏”，文字记载非常明确。自两汉迄唐、元，历史不断发展，但南道的走向并无大的变化。尤其穿越帕米尔高原时，路线须受山口、谷道、可以翻越的大坂（分水岭）等各种自然地理条件的局限。几千年的历史风雨，这方面的变化可以说是相当微弱的。因此，调查自莎车、疏勒绿洲通达帕米尔的山谷径路及我国境内帕米尔通达阿富汗的山口、大坂路线，不仅涉及目前交通地理，对于了解古代“丝绸之路”南、北道自塔里木盆地西缘穿越葱岭，通达大月氏的路线及古代蒲犁、无雷的今地、境域等，也都有直接的意义。然而目前国内史学界，关于汉代莎车、蒲犁、无雷的今地所在，看法并不是完全统一的。^[3] 此外，这种调查，对准确了解古代丝路南、北道穿行葱岭的具体线路，了解中外古代旅行家、我国西去求法高僧们穿行葱岭的径路、山谷，从而更加准确地掌握他们留下来的珍贵行记，也都有重要价值。

笔者曾先后于1972年、1982年两次到塔什库尔干地区，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境内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考古调查，足迹涉及于县内大部分地区并登达了自塔什库尔干县去到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亚地区的一些主要山口如红其拉甫、明铁盖、瓦赫基里大坂等要隘，在一些遗址进行了试掘。工作期间登越崇山峻岭，穿行急流险滩。炎炎夏日身著皮裘活动于冰峰雪岭之间，目睹葱岭的泥石流怒涛直下，须臾之间平路成谷、陆桥化烟。对这片地区的地理形势、高原生活的特色、各山谷通道及沿线历史遗迹遗物，有了初步了解。当回首再读有关穿越帕米尔的各种行记文字时，感受大不同于以前。认识大有深入，但初步考察以后，存留问题仍多。本来还有带着问题进一步深入葱岭的计划，只是因缘难再，自20世纪80年代后，竟再未得涉足其地。这里不揣粗陋，把30多年前进出塔什库尔干的几条路线及沿线古迹情况稍作整理，公之于同行，供治中西交通史者之参考；分析中不当之处，也热望得到指正，以利进一步地深入研究。



笔者两次去我国境内帕米尔塔什库尔干地区调查、考察时，都利用了现代交通工具——汽车，首先自喀什至塔什库尔干地区（西方称此为塔格敦巴什帕米尔）。

自喀什出发，斜向西行，42公里后，抵疏附县乌帕尔。途中，为一不大的戈壁。地势随路程而逐渐增高，至乌帕尔，已近葱岭东麓。这里是一处水源充足的小绿洲，是喀什地区的名胜所在。水流不大，村内绿树成荫、果园成片，农业、园艺均盛。文化亦素称发达。逢集日，附近县内亦有人来此。据说这是历史的传统：因为乌帕尔向为巴基斯坦、印度商货较为集中的站点。供销社内一维吾尔老人，聊起四五十年前，他们经塔什库尔干所进巴基斯坦商品及其在四乡农民中的地位，仍颇怀感情。

在乌帕尔公社内，我们先后发现过细石器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4]和毁于公元三四世纪，目前已沉没在沙砾下的古城废墟^[5]。在乌帕尔村西约3公里，有一座相对高度100多米的艾斯热提毛拉山。山前泉水淙淙，山脚绿树成林，山上曾有一处规模宏大、气宇非凡的古代佛教寺院遗址。从遗迹看，显明的较大建筑基址有5处。一区建筑底面积达400平方米（20米×20米），较小者100平方米（10米×10米）。底部有厚1厘米的白灰面。遗址范围内见埋置大陶瓮的灰坑、大陶瓮碎片，陶片上有莲瓣纹装饰、婆罗门像，也见石膏质佛塑像残部，如手指、眼睛、衣纹等。建筑依地势高下铺展。就在这区佛教寺院遗址下，见到过梵文贝叶经。据说，还曾发现过高1.67米的铜佛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化成了铜料。这是一区十分值得注意的、规模宏大的佛教遗址，被毁时间与伊斯兰教进入疏勒王国地区有关。

自乌帕尔西北走，有驿道，马程约10天可达乌孜别克斯坦共和国，抵安集延。阿古柏入侵南疆，这条路就曾为主要通道之一。至今，当地还保留着一些古堡就与阿古柏入侵事件有关。自乌帕尔南下，可至塔什库尔干。这一交通枢纽地位，使乌帕尔历史曾经相当繁荣。

我们自乌帕尔南行，30公里至塔什米力克。这是一个不大的小村落。自塔什米力克南入峡谷，有羊肠小道蜿蜒曲折依公格尔山东麓行，可以通达塔什库尔干。疏附县文化馆曾在塔什米力克南库尔曼阿塔格山一处不为人注意的峭壁上，发现过一件铁质锁子甲。铁甲悬挂在楔入峭壁缝隙中的木桩上，完全不为人注目。这当是一次战争中败军之将丢盔卸甲、只身逃跑时留下的遗物，很好地指示了古代隘道之所在。这条小道，通行艰难。我们闻之于老乡，并未身历。我们所走的是大路，亦即目前公路之所在。自塔什米力克村斜向西南，12公里后，入盖孜峡谷。自此，公路穿行于公格尔、慕士塔格山与萨雷阔勒岭之间的峡谷中。峡谷宽数百米至一公里，最宽处也不过两三公里。公路依山傍水，是利用河谷的天然形势开拓

的。路线基本都在盖孜河西岸行，一路爬坡。两岸峭壁悬崖陡立，盖孜河水势急湍，形势峻险。由于地势、水势至猛，而且峡谷不宽，一些路段没有草场。因此，在喀什至塔什库尔干未通现代公路的自然形势下，这一谷道虽也称得上天然孔道，实际上人、畜是很难通行的。勉强行走，局限颇多。水势大时通行会更加艰难。所以，公路开凿前，喀什至塔什库尔干之间的通路联系，主要还是取自喀什到英吉莎而后至塔什库尔干一途。

车行70公里，至布伦口。目前为阿克陶县的一个公社。附近为一高山湖泊，面积约10平方千米。四周高山环列，湖水清澈如镜，景色似画。我们说水面约10平方千米，只不过表明这一具体时刻的情况，实际水势大小完全依雪水消融量而转移，随季节、气候冷热而不断变化。在布伦口稍作停留，闻之于老乡：自布伦口西稍偏南行，经阿克拜尔迪山口、郎库里、萨雷阔勒岭上之库日班卡西大坂、乌孜别里山口，可通达塔吉克斯坦、乌孜别克斯坦。这条隘道，全程不过150公里，马、骡均可通行。

由布伦口循公路方向、顺峡谷南行，30公里后至喀拉塔什。这里地势比较开阔。一区湖水，倒映冰峰雪岭，谷地内绿草如茵，是十分好的夏牧场。十多座毡帐散列在草场上，牛、马、羊漫处其间。时在七月，草高不过数寸。自盖孜峡谷南来，一路景观大都是荒山秃岭、峭壁陡岩，植被极少。有这么一片青葱，使人精神为之一振。葱岭山区自然环境之艰苦，于此可见一斑。

喀拉塔什南行10公里，过苏巴什大坂。这里海拔高程达4000米。慕士塔格冰峰耸立身旁，虽说是7500米的高峻冰岭，此时此地，却不见怎样的雄伟，似乎随便可以登攀至顶。实际上稍稍动步、工作，便觉气短腿重，方知“更上一层楼”决非易事。

苏巴什大坂，其北，水皆北流，入盖孜河；其南，水均南向，入塔什库尔干河。阿克陶县与塔什库尔干县，就以这一大坂为界。车过大坂后，山势一路直下。约50公里至克尔沁，更5公里后至塔合曼，草场辽阔，有数万亩之多，地势坦平，水源亦丰，此地人口，在塔什库尔干县也是较多的一个所在。在塔合曼乡四大队托尔布隆姆的巨石缝中我们见到了一具古代女尸，随身的木盆残片、毛毯、毛布、丝绸都还清楚可见，没有十分典型的、时代特征鲜明的文物，能直接说明她逝去的年代。但离我们已相当久远，而且死亡得很不正常，却是可以清楚地做出结论的。这可能也是曾经发生在“丝路”上的一件算不得什么的小悲剧的遗迹。这种情况，我们在调查过程中不只一见。后文还要谈到的排衣克山口，一处僻静的高山深洞中，边防战士们也发现过一具古代女尸，又一山洞还有成捆的布、绢在厚厚的尘土之中……它们都可能是昔日“丝路”上平凡但却足以说明其艰难不易的一些历史镜头。

塔合曼西南不远的一条山沟中，有高山温泉一处。自塔合曼至县城约30公里。一路草场成片，居民点毗连：布古尔乌勒、且尔拜森、曲什曼、提孜那普直至县城。这片地区是全县范围内自然条件比较好、草场比较辽阔、沟谷比较平展的所在，一路也见到古墓、古堡遗址。如提孜那普至县城间的香巴拜战国时期墓地，戈壁上各种类型的石堆、石棺墓，丛集成片。1976年、1977年新疆考古所曾先后两次在这里发掘了古代墓葬40座，据分析，是距今二千四百年前的考古文化遗存，其民族属性可能与羌、塞种有关。^[6]颇可见出这片地区内历史文化的悠久。

塔什库尔干县城不大，背依高山，东濒塔什库尔干河。县城所在才只两千多人。虽属县城，牧区景观仍盛，河滩草场上毡幕朵朵，马、牛、羊成群。城镇塔吉克族职工、居民，夏天仍然愿意住到毡房中去。马行代步，白天到县城上班，入夜在草地上息宿，可以更方便地享受到牧业的美好处。

自喀什到塔什库尔干，公路全程290公里多，汽车一天可达。虽地势高、山路险，但较之古代僧人、旅行家笔下描绘的葱岭行程，已不可作同日语了。天堑已经变通途，“帕米尔”的严峻世界，已不是那么森严可怖，距离也确近得多了。

探讨“丝绸之路”南道进入帕米尔及去中亚的通道，却这么详细地叙述了自喀什（古疏勒）至塔什库尔干的路线情况，目的不只在说明工作的具体过程，也意在藉此讨论《新唐书·西域传》中的“渴盘陀……由疏勒西南入剑末谷、不忍岭六百里，其国也”这条记录。从地理方位、道路远近及走向、峡谷与大坂形势等方面分析，有认为今天的喀什、塔什库尔干公路路线大概正是唐代“剑末谷”“不忍岭”路线。从形式上看，颇为有理。但是，如果没有公路、汽车这个条件，从山势陡峭、河谷狭窄、水流急湍、难以渡越，相当地段河谷内没有草场，在人、马驮行的古代，走这条路线是十分困难的。从各种因素考虑，唐代“剑末谷”路线更大的可能是取道英吉莎，翻奇奇力克大坂到塔什库尔干地区。因为这也是一条十分重要的天然谷道，与本文希望讨论的问题关系密切，所以在这里提出来，并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沿途情况，为进一步地研究提供方便。

二

汉代丝绸之路“南道”，在塔里木盆地内止于莎车。关于汉代莎车的今地，必须首先大略明确，才能进一步讨论自莎车进入葱岭的途径。

汉代莎车之所在，历史地理学者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7]

清《西域图志》中首倡汉莎车为今叶尔羌（莎车县），是一个可以信从的结论。

汉代莎车，是西域大国，雄踞于塔里木盆地西缘。人口多、国力强，与于阗、疏勒争强匹敌。地理位置又正处于于阗、疏勒中间，与两者距离近同等因素，可以说，汉代莎车，只有叶尔羌绿洲的地位才能相当，而绝不能在其他地区，甚至到帕米尔山中去寻求。

试看《汉书·西域传》的有关记录。

《莎车》：“莎车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

《疏勒》：“南至莎车五百六十里，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可见莎车西北五百六十里为疏勒；

《于阗》：“于阗……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而皮山又“西北通莎车三百八十里”，这就是说，自于阗至莎车，距离为七百六十里。

综合以上几条材料，可以肯定：莎车在汉代是处于于阗与疏勒间的一个大国。于阗在今和田绿洲，疏勒在今喀什绿洲，人们均无异词，则其间的较大绿洲，只有叶尔羌一处。叶尔羌南至和田、北至疏勒的距离与《汉书·西域传》中所记可以说是约略相当。^[8]而如果莎车不在今叶尔羌绿洲内，则它与于阗、疏勒的距离就会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因此，今天的叶尔羌绿洲地区（包括莎车、泽普、叶城毗连一起的三县），应该就是汉代莎车国之所在。

前提肯定，可以进一步分析自莎车进入帕米尔的具体路线。

自莎车绿洲进入帕米尔，从古今都不能不受局限的山口、河谷分析，有以下三条道。

其一，当是最主要的一条通道，即清代驿路^[9]交通工具、运输组织与更早的古代比较，当无大异。具体路线是：

自莎车县西南行，约80公里，到牙克艾日克。更西稍偏北行至托乎拉克（清代驿站名）。结合实地考察，线路是逐渐进入山区，至科拍达坂。自此，山路不能通车，必须以骑代步，尤其牦牛是最合适的高原之舟。过科拍山口后，经科克牙，于第三天到阿普里克（今阿克陶县阿尔帕勒克），行程70里。全线处山峡中，巨石纵横，行道不便。第四站从阿尔帕勒克至“开子”（清代驿站名，当为今阿克陶县克孜尔达坂）。全程约70里地，道路险陡，人须步行，但一路有山泉。至“开子”后，更一站为八海，再一站为塔希代客，第三天到“切里贡拜孜”，全程200多里。由于这一路未亲历，经向塔什库尔干县邮运工人调查，其

路线走向应该是：过克孜尔大坂后，沿山溪向南行，经卡尔隆，到达“切里贡拜孜”（40座坟墓），其得名实际是这里存在一片古代废墟，也包括古代墓地。塔什库尔干县人大常委会委员马达尔汗曾经走过这一条路，^[10] 对这里古代驿站废墟留有相当深的印象。A.斯坦因在穿行这条路线时，对这里的废墟也曾有过记录。^[11] 过切里贡拜孜再走70里，至托鲁布伦（吐尔布隆），又70里至塔尔巴什，再70里至奇恰克，再80里至申底里，抵塔合曼。这一路，除塔合曼与今天地名一致外，余均有异。其实际走向是离吐尔布隆后翻越奇奇力克大坂，斜向西南，至塔合曼。这过程中，最困难险阻地段是翻越奇奇力克大坂一途。最后一站，从塔合曼至蒲犁（今塔什库尔干），行程80里。全驿路程共需12天，而且只能晚春夏初通行，盛夏洪水、严冬冰封，均无法穿越，12天也是按正常的情况。稍有风雪，道路即被阻断。因此，这一路程，往往须半月左右才能到达。

其二，自叶城县至塔什库尔干。此线个人未曾涉足。1972年在叶城，同年在塔什库尔干均曾注意及此，在群众中进行过调查。据称：自叶城沿提孜那河谷西南行，至却普。可通塔什库尔干县的布伦木莎，进抵叶尔羌河谷（这只能在枯水期进行）。自叶尔羌河谷西南走，进入与塔什库尔干河平行的一条南北向河谷，皮勒、马尔洋、皮羌牙尔特、肖依墩、瓦恰、班底尔、兴迭等村落，在山谷内成一排排列。这一河谷的北半段：兴迭、班底尔、瓦恰、肖依墩，笔者1982年调查中均曾走到，也发现过一些古址、古墓。河谷不宽，最宽处不过二三公里。这一条路线，也是相当难行的隘道，而且路线迂回，作为一条主要通道，可能性不大。

其三，自莎车经塔什库尔干大同公社至县城。此线至今仍然通行。路线是自莎车县卡群、和什拉甫（地图上或标海散勒巴格），至塔尔山。自此，可分南、北两条支道，一走塔尔山之南，二走塔尔山之北。

从塔尔山南缘走：自和什拉甫西南沿叶尔羌河支流行，经达木斯喀拉克、翁古洛克、库干，翻阿尔帕勒克大坂，经潘特尼、下兰干，跨越急流汹涌的叶尔羌河谷，抵达塔什库尔干的大同。沿一小河谷西行，至特其可满。越米拉甫达坂，至阿勒马力克、很祖铁热克、兴迭、提孜那普入塔什库尔干县，后一段路在塔什库尔干河谷内，塔什库尔干河即循此入叶尔羌河，成为其上游干流之一。也可自特其可满斜向西南，翻山至瓦卡、班底尔，入塔什库尔干。

大同公社这一线，高山恶水极难行走。这是塔什库尔干县境内交通最困难的一段路。熟悉路情的同志介绍说全程有三处石栈道。在峭壁悬崖上的石缝中横楔较粗木杆，其上铺树枝、石板，傍峭壁、临悬崖，望之心惊胆战。部分石板经长期摩擦，可见出显明的蚀痕。在没有电钻的情况下凭人力在如此峭壁上建设成这样的栈道，是难以想象的艰巨工程。它以耀眼的光辉显示了人民群众智慧和力量。穿越蒙干河、叶尔羌河谷也是十分艰难的路段。在急流中，人们择大块漂石而前行。由于地势高寒，一年中不少时间冰封雪盖。雪坑，同样是人畜通行的隐患。

从塔尔山北缘走：自和什拉甫、兴迪尔力克向西北至英阿瓦提、卡尔隆（这就避开了大同前后的险山与急流）至库尔奇力克、兴迭、提孜那普到塔什库尔干。此线后半段与前面介绍的第一条路走向路线相同。全程马力快行6天，距约300多公里，但实际要走10多天才能到达。

在这里，附带较细致地说明一下自英吉莎（地理位置居古疏勒王国）至塔什库尔干的通道。在喀什至塔什库尔干公路未修前，喀什绿洲入帕米尔，主要都走英吉莎这条路线。建国初，塔什库尔干少年学生要进一步升入中学，必须到喀什，来去均取此途。少年人随骡帮、马队即可行走，从一个方面也见出通路还不算十分艰难。

路线走向是：县城北向10公里左右，沿塔什库尔干河谷东行，可到兴迭，名新地探沟（狭的沟谷），翻越奇奇力克大坂，经切里贡拜、克孜尔塔尔，沿依格孜也河直向东北，抵英吉莎，马程6~7天可以到达。一路有水、草，每天息宿地均可以得补。除翻越奇奇力克大坂，稍有困难。其余路段在山谷小道中，穿行不难，全程约300公里多。这条路线的走向，穿

越于峡谷之中，翻大坂，与《唐书·地理志》中所提“剑末谷”“不忍岭”，是同样可以联想的。从古代以牲代步的情况分析，这当是较盖孜峪谷更方便的一条通道。疏勒与渴盘陀之间，政治、经济关系密切，联系往来不断，盖孜峡谷艰难的条件是难以承担起这一交通任务的。这一线，除切里贡拜孜曾见过有古代遗址的报导外，其他未深入进行过工作。这是摆在我们考古工作者面前的一项具体任务，沿这条路线踏查，是肯定会有发现和收获的。唐代疏勒与渴盘陀之间的主要通道，会在此基础上得到最后论定。

三

“丝绸之路”南道止于莎车绿洲后，穿越喀拉昆仑、葱岭东缘深沟险谷，可以通达塔什库尔干河谷；北道止于疏勒后，也有山道可以南行进入帕米尔，到塔什库尔干地区。塔什库尔干谷地是东部帕米尔的交通枢纽地带，具有很重要的不能取代的地位。

而从塔什库尔干出发，前往中亚广大地区如罽宾（克什米尔）、大月氏（阿富汗及其附近）等地，也都有天然谷道可行，有地势较低之山口可以翻越。我们在塔什库尔干地区工作时，曾以塔什库尔干为基地，踏查过一些比较有名的山口，它们是进入一些中亚古国的天然孔道。

塔什库尔干地区，抬头是山，开门见岭。所谓平川，只不过是崇山峻岭中相对比较宽平的一块谷地。在这片崇山峻岭之中，据实地勘察，总共有大小山沟七十多道，其中有四十多道可以通达巴基斯坦、阿富汗、前苏联中亚地区，但大部分形势险恶，通行艰难。其中，在少数的自然条件较好、沿途有水草可资补给、适于通行的谷道中，最主要是翻越红其拉甫、明铁盖、瓦赫基里大坂的几条谷道，可以通达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境。经塔合曼、苏巴什大坂，至喀拉湖，前去塔吉克斯坦、乌孜别克斯坦，也是较为便利的坦途。

（一）红其拉甫大坂道

红其拉甫大坂道，就是目前国际知名的中巴公路所行路线。自塔什库尔干至红其拉甫大坂我国边界，全长100多公里。

离县城后，顺塔什库尔干河谷南行，16公里至阿克塔姆，有小块草地。戈壁上见石堆一区，每个石堆略呈圆丘形，高出地表七八十厘米。最大一座圆丘形堆石，四周见约长4米的石围。据在塔什库尔干地区发掘的经验，这是古代墓葬的一种形式。它表明了这里曾是古代人居住的地区。

更南行18公里，至吉尔阿勒（意为驿站）。西傍塔什库尔干河，东为低山。谷地内有一片二三百亩面积的草场，但并无固定居民。在这里一处晚更新世地层内，曾发现三处烧火堆，灰烬中有少量木炭屑、烧骨。傍近，发现一件砍砸器：石英岩，两面交互打击，刃缘呈曲折状。从地层分析，为去今一万年以前的遗存。公路两旁还见到时代稍晚的古代渠道遗址、建筑遗迹、古代墓葬。古代渠道傍山，成南北走向，地表痕迹宽三四米，是塔什库尔干地区有名的法里亚提大渠的一段。^[12]山前高台地上，有两处80平方米（8米×10米）的方形石围。石围内外见古代夹砂陶片，有盆、钵类器型，火候较高。傍近河谷，有圆穹形土屋一处，底座近方形。18平方米（4米×4.5米），门东开。古墓系石棺、石盖、覆土极浅，其上或布小块石。由于处公路边，来去人们翻动、窥视，部分石棺已经破坏，尸骨暴露。我们曾清理这类墓葬两座，系南北向竖穴，石棺（四壁贴石板），人骨架完好，仰身直肢，头北脚南，未见任何殉物。

自吉尔阿勒南行26公里，至达不达尔。这里谷地较宽阔，最宽处有4公里。草场也较好，居民比较集中，均塔吉克族，目前为乡政府所在。由于地势较高（海拔3477米），气候较

冷，农作物只有青稞、油菜。牲畜有羊、马、牦牛等，山地有熊、豹、雪鸡等兽禽。傍塔什库尔干河之台地，同样见到散布之石堆墓，直径一般二三米，微微高出地面。河西岸，有皮斯岭大坂隘道，可通塔吉克斯坦境。

自达不达尔南去，沿塔什库尔干河西岸走，约10公里，至克孜库尔干，即国内外知名的“公主堡”遗址。古堡所在山头名“克孜库尔干吉力克”，海拔约4000米，除东面为临河之峭壁陡岩外，南、北、西三面为高山峻岭，北侧山沟可通皮斯岭大坂。南来的红其拉甫河、西来之喀拉乞库尔河至此汇流北向，成塔什库尔干河，河面宽阔，水势湍急。自克孜库尔干城堡下视河谷，水流如带，相当大一片范围，可以尽收眼底，形势十分险要。实际上，它控扼着南去克什米尔、西南去阿富汗的两条径道，古堡在军事上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古堡遗址的现状是：南面为一道东西向土墙，长约150米，堡墙高约10米，顶宽2.5米，底宽约6米，是用一层土、一层树枝砌筑，土层厚约10厘米，树枝为横、竖交叉叠压。堡墙外侧，山顶有巨石一堆，似礮石类防御设施。

堡墙依地势构筑，西端稍北折，东端见土坯，说明堡墙不是成于一时，而是在不同时代有过增筑、修补。

堡墙内共见建筑遗迹13处，见土墙基，穹顶式、半地穴式土房等，墙厚达2米，是很好的防寒手段。遗址范围内见古代陶器残片，厚至1厘米，当是储水大缸之残片。石磨盘，长50厘米、宽40厘米。

我们在1972年的调查中，曾取土墙上层树枝送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技术研究所^{14C}实验室进行年代测定，结论是距今不到300年，当为清代遗物。但有关公主堡的传说，唐代在此已是十分流行。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所录关于“渴盘陀国”起源于“汉日天种”的故事，危岭孤峰上的“公主堡”古城，又正当西去波斯的孔道，真好像就是目前所见古堡遗迹的历史说明。^{[13]A}。斯坦因在塔什库尔干地区活动中，对此深信不疑。而且提出古堡的建筑特点，同于“公元前2世纪的汉代长城边塞，也是用同样的中国古法筑成的”。^[14]

从古堡所处地理形势分析，古堡主要是一种军事性质的工程，可以控制通克什米尔、阿富汗的几个主要大坂（红其拉甫、明铁盖、瓦赫基里）。其时代，最晚延续到清朝还在使用，颇可以理解。由于使用中不断维修，上层有清朝的遗迹，自然也不奇怪。但由于这些谷道早在汉代或汉代以前就是自塔什库尔干通达大月氏、罽宾的古道，唐代在中亚地区的几次重大军事行动也都与这些古道密切相关，保卫道路的军事堡垒当不会只从清代起，唐代流行在这片地区的“汉日天种”故事，以文艺的形式从另一个侧面表现着这一历史的真实。

自公主堡南行2公里，地名克切克巴依，为喀拉乞库尔河（其上游为火石壁河）与红其拉甫河交汇处。有牧民毡帐三五，另也有用石块与草被土块砌就的小屋（所谓草被土块，是切取草被上层，草根密如蛛网，将土夹结成块状，晾干后既可筑屋，也可作柴）。这里河谷宽阔，草场面积大，是一处交通咽喉。

自克切克巴依去红其拉甫山口，可循红其拉甫河谷（即塔什库尔干河）向南稍偏东行。6公里至库吐苏尼底，又5公里到塔什库尔干县种畜场，再3公里至哈里沙尼地，又3公里到沙热依克，25公里后吾甫浪沟来汇，路线折向西南沿红其拉甫沟行，20公里即可抵达红其拉甫大坂。这段路程中，河谷逐渐狭窄，谷地内、低山丘上均见草被。草虽不高，但青葱可爱，人畜一路水草可不虑乏。询及老乡称：自红其拉甫河谷东行，也有山间小道可通达叶尔羌河谷，进而可抵叶城，但山势高峻，小道崎岖难行。

红其拉甫大坂山口地势平坦，海拔4733米。谷道宽1公里多，翻越甚易。在塔什库尔干工作期间，曾询及自巴基斯坦通过红其拉甫山口入境者，据称：在红其拉甫山口我方一侧，地势上升较缓，交通称便。但越红其拉甫大坂进入巴基斯坦后，山势峻险，高山深谷，人马行走视为畏

途。沿洪扎河上游谷地向西折南行，经过帕苏、坎巨提（罕萨），至吉尔吉特（大、小勃律），进入印度河上游，至塔克西拉（坦叉始罗）、白沙瓦（鞑陀罗首府）。这既是今天中巴公路的走向，同时又因受山势、大坂、谷道等自然因素的局限，同样也是古代丝绸之路南道通向中亚的径道之一，堪谓古道今用。人们称中巴公路为“亚洲的新奇迹”，是很有道理的。

（二）明铁盖大坂通道

自塔什库尔干县城至克切克巴依，即红其拉甫河与喀拉乞库尔河汇流处，路线、走向均同前。只是至汇流处后，转沿喀拉乞库尔河谷西行，经库依尼沙拉木到排衣克检查站。至此，在河北岸小山梁上，见不规则方形土堡一处，堡墙依地势铺展，周长200多米，墙高近3米，顶宽1米，堡墙由泥、石、树枝交叠而成，南临悬崖峭壁，俯视喀拉乞库尔河，正好控制了喀拉乞库尔河谷。堡墙内遗迹保存不多，见红色碎陶片，壁厚达1厘米。古堡时代，曾取城内采集的木板一块，进行¹⁴C测定，时代结论与公主堡近同。清代，在排衣克设有卡伦，或与此有关。但同样不能据此就排斥这里更早也就有军事城堡的存在。

在排衣克土堡调查中，见所在山头野葱连片。高近20厘米，叶扁平，茎圆，开白色小花。帕米尔，中国古称“葱岭”，有其地理背景。

自土堡向西，沿河谷前进。河谷不宽，山前有草。水流比较湍急，夏日，骑马亦不能涉越。经恰特尔塔，至排衣克河入喀拉乞库尔河汇流处，河谷比较开阔。在河南岸一稍高石岗上，有古堡遗迹一处。堡墙近方形，每边宽约4米，残高3米，未见其他遗物。古堡正好控制河口谷道，也正好成了古道具体路线的说明。

由此更西行20公里，罗布盖子河自南来汇。道路至此，沿罗布盖子河向南稍偏西行，明铁盖山雪峰傲然耸立。罗布盖子河谷不宽，一些地段只一二百米。地势虽愈来愈高，但一路水、草不断，青草如茵。再行20公里，抵达明铁盖大坂，大坂海拔高程为4709米，地势较红其拉甫稍高，但路况较好。据曾经穿越过大坂的人们反映：越明铁盖大坂进入巴基斯坦后，道路比较平顺。建国前，塔什库尔干与巴基斯坦地区间的交通往来，均取此途。这条路线，也是中华民国政府规定的英国驻喀什总领事由印度进入塔什库尔干地区时“正式、经常路线”。足见，在有关通道中，这是比较利于通行的一条。进入巴基斯坦境内后，沿明铁盖河谷西南行，经古尔根帕契、波布尔、木库什、帕特，沿河谷转向正南，谷地较为开阔，顺山势直下，至密斯加尔、帕苏、坎巨提与中巴公路路线合。更前，进抵吉尔吉特。国学大师、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研究判定，玄奘返国，进入国门走的就是明铁盖大坂道。在冯先生倡议之下，近年，在这里竖立了一块石碑，揭明了玄奘返国的具体路线。

在中巴公路修建过程中，沿途发现过不少古代遗迹，如岩刻画、摩崖刻石（包括汉文刻石）及佉卢文资料等，可以作为自红其拉甫、明铁盖大坂进入克什米尔地区古道走向的生动说明。

（三）瓦赫吉里大坂通道

此道是通达阿富汗瓦罕走廊的天然孔道，在古代交通史上，是值得注意的相当重要的一条路线。

自塔什库尔干县至瓦赫基里大坂，前段公路路线与翻越明铁盖大坂的道路一致，分道处在罗布盖子河口。至此，前往瓦赫基里大坂，然后，沿海拔4000米的喀拉乞库尔（这一段，亦称火石壁河）继续西行。河谷较宽，达2公里左右，沿途草场颇佳，路线沿河南岸行。距离罗布盖子约5公里处，台地上见一座巨型坟丘，底周约40米，圆丘形，高2米多。火石壁河南岸一处高台地上，还见到土堡一座，是中华民国政府时期守卫这条古道的一处据点。

自罗布盖子西行30公里后，至克克吐鲁克。这是一处交通要隘：西北行，越克克吐鲁克大坂，可抵塔吉克斯坦；斜向东南行，越基里克大坂，可至克什米尔；自北向西偏南行，约15公里，翻越瓦赫基里大坂，即进入阿富汗的瓦罕走廊。这条路线具体情况是：上溯瓦赫基里河谷，约行7公里，路面平坦，人马行走均便，谷道约宽1公里，有草。7公里后，山势陡险，马、牦牛虽均可通行，但跋涉艰难。8公里处，有一不大的高山湖泊，长圆形，长约400米、宽约100米，水色青碧。大坂顶部宽约200米，海拔4800多米。至此，瓦罕走廊即呈现眼底。近大坂顶，有一区小石屋，面积约有20平方米，可供越渡大坂的人们稍事憩息。这一通道，据向当地群众了解，除冬日大雪，基本上均可通行。尤其是夏日，交通堪称便利。

这些翻越大坂的山道傍，如果仔细观察，可以看到高二三十至四五十厘米的小石堆，沿线断续分布。这实际是一种简单的路标，给不谙路线的旅行者们指示途径。这些石堆、石屋，虽没有明显的时代标志，不知垒自何代，但它们确在明确指示古道走向，是清楚无误的。从一路水草情况分析，数十人的商队，自塔什库尔干翻越前述三个大坂通道，沿途给养均无问题。

翻越瓦赫基里大坂后，道路顺势直下，进入瓦罕走廊。南为兴都库什山，北为瓦罕岭。这是一条东西方向、水草均佳的优良谷道，沿途居民点如良加尔、罗宗、良加尔基什特、伊希卡希姆均可供行人沿路休息。由此经萨朗山口翻越兴都库什山，可至贝格拉姆、喀布尔，沿途古迹不少。自喀布尔斜向东南，通过开伯尔山口，可进入巴基斯坦、印度。自喀布尔向南，可入坎大哈。由喀布尔西去，经巴米扬、赫拉特，即可进入伊朗。这些都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名邦。有人说，丝绸之路进入瓦罕走廊之后，可谓全线皆活，这是有道理的。公元727年慧超自印度求法回长安，走的应该就是这条古道。《往五天竺国传》记录他经过这段路的情况是：“从胡密国（瓦罕）东行十五日，过潘密（帕米尔），即至葱岭镇。此即属汉兵马，见今镇押……外国人呼为渴饭檀国，汉名葱岭”，这与经过瓦罕走廊翻瓦赫基里大坂至塔什库尔干的走向完全一致，马可·波罗来华，也曾经通过瓦罕走廊。只是后半段路线与慧超有异。唐代名将高仙芝，也在这片地区演出过十分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了解这些古道，对前述古代各种行记会得到准确的理解，而结合这些历史上的事件，也会使我们对这些古路通道有一个形象的概念。

四

“丝绸之路”南道，从塔里木盆地西缘穿越帕米尔，不论自莎车或叶城出发，受大坂隘道的局限，均必须首先到达东帕米尔的塔什库尔干；“丝绸之路”北道，自喀什噶尔至费尔干纳盆地、阿富汗、巴基斯坦，也有多条路线穿越塔克墩巴什帕米尔抵达目的地，但同样必须先抵塔什库尔干县城所在河谷。由于交通地理上的这一特殊位置，使东帕米尔的塔什库尔干县在“丝绸之路”交通上具有十分不一般的地位。

从自然地理条件看，在东帕米尔地区，塔什库尔干县所在河谷，是谷地最宽阔（宽达六七公里）、草场最广大（3万亩左右），地势较低（海拔只3000多米）的地区。自此南抵达不达尔，北及塔合曼，沿塔什库尔干河谷，草场连片，适宜于牧业发展，也可以进行少量的农业经营，是帕米尔地区自然条件比较优越、人口比较集中的一处所在。

这样的自然条件、交通地理位置，使塔什库尔干县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根据考古调查资料和结合历史文献中的有关记录，有根据认为：目前塔什库尔干县城所在地区，就是唐代渴盘陀国都城所在，亦即唐代葱岭守捉置镇处。

“塔什库尔干”为突厥语，汉意为“石头城”。县城附近，也确实保存一处石头城废

址（不少文章、图件均把清朝蒲犁厅城与“石头城”相混同，这是一个明显错误。石头城范围较大，蒲犁厅城坐落在“石头城”东隅，它们是两区时代不同、性质各异的遗址）。我们先后两次曾对这一石城废墟进行过仔细调查。1982年在城内进行了试掘。

石城遗址，处于目前县城北部一处石岗上，与县城居民点紧紧相连。经纬位置是：东经 $75^{\circ}13'$ ，北纬 $37^{\circ}6'$ ，海拔3100米。石岗西依萨雷阔勒岭，东临宽阔的塔什库尔干河。河谷至此十分开阔，可分叉为四五道支流，自河滩至山前，均为草场。夏日绿草如茵，牛、马、羊散处其间，极富草原生活情调。

古城遗址依石岗形势构筑。石岗西高东低，南北城墙下为岗峦，中部为凹沟。高下相差达二三十米。由于受地势局限，城墙为起伏曲折的不规则形象，但略近方形。北、南、西三面墙垣仍非常清楚，东面为陡岩峭壁，而且大部分为清代蒲犁厅城叠压。

城垣全长1300多米。块石夹土、土石相间叠砌成墙，残高6米上下，顶部宽1~3米。每层土石厚约20厘米。北墙、西墙仍保存有马面，共见14座。彼此间距40~50米，测其完整者，顶面矩形，30.6平方米（6.8米 \times 4.5米）。马面与城垣构筑办法不同，是用土坯修砌，土坯规格有二。其一：40厘米 \times 30厘米 \times 13厘米；其二：30厘米 \times 20厘米 \times 7厘米。四角有角楼，西北角楼台基高6米，顶面16平方米（4米 \times 4米）。其余三处坍塌成高大土石墩，规模远过于城垣的宽度。

随岗峦起伏布局的不少房址，仍然可以见出当日情状。建筑主要集中分布在南、北两块地势稍高的石岗上。居室一般略呈矩形，长边一般4米上下，短边3米上下。部分居室随岗势高下互相错落，房址内见灶坑。

从古城址现状分析，出入古城的通路，主要在面向河谷的东部，依地势顺岩沟出入。城内用水，来自源于西面高山雪岭的新甘沟，沟水曲折，自西北角流贯城中，形成深沟。出东城后泻入塔什库尔干河。这一自然形势，至今仍然清晰，贯穿城中的小沟仍然流水不断。

为探明古城年代，我们曾在城中偏北一处石岗上稍事清理，见集中分布的20多间居室，试掘其四。出土了部分陶片、一枚乾元重宝，文物较少。与之同时，于蒲犁厅城内地面，也曾开一深沟。面积6平方米（3米 \times 2米）。试掘表明蒲犁厅城坐落在碎石基上。碎石基早期曾经有过人类居住活动。其中杂有碎毛布、树枝、兽骨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叠压在清城下的早期文化层内，出土了一件梵文文书，是克什米尔地区公元3至8世纪时期流行的一种书体。^[15]此层巨石纵横，清理工作相当艰难，受开拓面积、工力之局限，并未清理至底。在试掘点稍南，居古城东偏南部位，有古代佛教寺院遗迹，见塑像残部。由于蒲犁厅城整个坐落在早期的石头城东部石岗上，部分地段叠压关系显明。早期地层中文物（如毛织物、丝织物、树枝、兽骨等），从剖面断层中也清晰可见。我们曾利用这一自然叠压关系，取早期地层中的木炭送请文物局文保所¹⁴C实验室进行年代鉴定，结论为：早期地层（亦即石头城活动阶段）的年代为距今1390年 \pm 70年，经树轮校正，其年代为距今1325年 \pm 75年，相当于唐代。

古城所在地理形势（背山面河）具有明显的汉式筑城技法特点（马面、角楼），它们与本地土石相间筑城技法相结合，马面、角楼用土坯，明显是在原城墙上增修、补建等，根据这些特点，而且古城又废弃在唐代，结合前述这片地区在交通史上的地位，比较良好的自然条件等因素，使我们不能不做出具体结论：它就是原为渴盘陀国都城，后为（唐）葱岭守捉所遗迹。

《新唐书·西域传》中关于葱岭守捉事，曾有比较明确的记录：“渴盘陀，或曰汉陀，曰渴檀檀，亦谓渴盘陀。由疏勒入剑末谷、不忍岭六百里，其国也（按：自疏勒西南行六百里，正当塔什库尔干河谷）。距瓜州四千五百里，直朱俱波西、南距悬度山、北抵疏勒、西护密、西北判汗国也（按：其四至，东叶城、南喀拉昆仑山、北为喀什噶尔，西通瓦罕，西北至费尔干纳，这都与塔什库尔干十分切合）。治葱岭中，都城负徙多河（按：塔什库尔

干河为叶尔羌河上游之一，故同样可称徙多河。还有一点值得一说的是在向当地塔吉克群众询及塔什库尔干河的称谓时，有称此河为“沃西多”的，与“徙多”同音）。胜兵千人。其王本疏勒人，世相承为之。西南即头痛山也（按：指兴都库什山）。葱岭俗号极崑山，环其国。人劲悍，貌、言如于阗……贞观九年，遣使者来朝。开元中破平其国置葱岭守捉（按：公元8世纪初叶，渴盘陀国王降附吐蕃，国亡，唐为阻抑吐蕃势力进入塔里木盆地，于此置葱岭守捉。足证，葱岭守捉置在渴盘陀国，并取其政治、军事、经济中心所在的都城为置镇之所，自然是情理中事。石头城原来用石块夹土砌城墙。土石建就之城垣上，后增了唐王朝以土坯砌就的马面、角楼，使军事防卫职能更加完整，颇可以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具体说明）。安西极边戍也。”这一记录，颇为准确地说明了今塔什库尔干地区，唐代确为渴盘陀国之所在，而葱岭守捉置镇之所也就在这里。

为更好地理解现存石头城遗址确为渴盘陀国之都城，还可以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的有关记述作印证：“渴盘陀国，周二千余里。国大，都城基大石岭，背徙多河。周二十余里。山岭连属、川原隘狭，谷稼俭少，菽、麦为多，林树稀，花果少。原湿丘墟，城邑空旷”。这段文字，除说都城“周二十余里”一句，失之过大外，其余记录，真可以说是十分准确地描述：石头城正处一大石岭上，临徙多河。从总体观察，帕米尔地区确实也是川原隘狭、谷稼俭少。由于地势高寒，直至今日，农业生产仍以青稞、豌豆为主。10~20年的树木，山下早已成材，在这里却才只有小碗粗细。这一切，玄奘的描述都非常贴切。都城处在临河的大石岗上，正是我们今天所见石头城遗址的形象。“渴盘陀”，系伊朗语，意为“山间平地”。对于塔什库尔干河谷这一片地区来说，也是很准确的概括。而在这片河谷内，塔什库尔干石头城是在最重要的地理位置上最大的一座古城遗址，只有渴盘陀都城才能与之相当。

渴盘陀国存在时间颇长。其境域，为汉蒲犁国地。但作为葱岭守捉城，存在的时间却是相当短暂的。开元中始设葱岭守捉，安史之乱以后，河西、陇右为吐蕃所据，新疆大部分地区也都一度在吐蕃的统治之下。葱岭地区是吐蕃进入新疆的重要隘道之一，葱岭守捉之置，就有阻抑吐蕃自葱岭进入塔里木盆地之目的在内。在这一形势下，葱岭守捉城很快没于吐蕃，是并不奇怪的。

葱岭守捉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其政治意义却不应轻估。它是唐王朝政权在我国西部边境直接设镇并派兵戍守的一个边远地点，说明了葱岭所在地当时是唐王朝直属版图。我们通过考古调查、试掘，明确了葱岭守捉的所在；通过考古资料进一步论证了这里原是渴盘陀国的都城，对研究帕米尔地区的历史、地理、中西交通情况，也有很大意义。今后应加强对塔什库尔干石头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弄清楚城的始建时期，进一步通过考古资料，分析这一遗址与汉蒲犁的关系，这其中的意义是不能轻估的。前面曾经谈到的香巴拜古墓区，出土了金、铜、骨质珍贵文物，说明了墓葬主人已经进入文明、处于奴隶制发展阶段。^[16] 这些考古资料，具体表明塔什库尔干河谷的这一地区，很早已得到了开发；进入战国时期，已有了相当发展的古代文化。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再作深入一步的工作，古代蒲犁国的考古文化应该是不难得到澄清的。

五

我们在塔什库尔干河东地区，还进行了一般的考古调查，有关具体资料，同样有益于我们认识、研究塔什库尔干地区历史与丝绸之路交通情况。

自塔什库尔干县城，过河而东，翻越坎达尔山，经兴地到下班底尔、阿克塔木、瓦卡、肖依墩，再翻越一不大高的大坂，到马尔洋。这是一条与塔什库尔干河谷走向平行的南北向

山沟。河谷不宽，只一二公里。沿一道小河顺坡而进，沿途见到石堆墓、土城堡，大都分布在河谷两岸低山地上，古墓地表均为石堆，每一区墓葬数量不多，墓葬分布中的这一特点，与存在定居与农业的地区，形成很鲜明的对照。

班底乡所在山沟沟谷很狭，谷底一水中流，草场不大。全乡人口才1000稍过。入班底沟不远，近乡政府所在，低山坡上见一小土堡。土堡呈长方形，东西长80米、南北宽40米，地面不见更多遗迹、遗物。墙垣构筑方法是底部为石基，上层为土坯夹泥，层层砌垒，现高只2米左右。古堡外见古墓葬，同样是表面堆石。考古所曾试掘其一，竖穴土室，人架仰身直肢，随殉一件陶器，饰刻划之三角纹，明显具有早期特征。古堡下，近河滩之台地上，有石棺，上部为石盖板，部分已暴露于地表。从形制分析，与塔什库尔干县城南34公里处吉尔阿勒墓葬近同。此土堡俯临班底河谷，控制着去班底、瓦卡、马尔洋的隘道。堡塞虽不大，但形势十分险要。

班底峡谷，宽不过一二公里，两侧秃山屏列，不见树木，只河谷底部，稍有小块草场。至瓦卡，峡谷较此稍宽阔。瓦卡沟内，河西岸第二台地上，亦见土堡、古墓，外部形制与班底近同。古墓数量较多，亦较集中。由于河谷狭、地势坡度大，夏日每天下午至第二天上午，山上雪水流泻至此，形成汹涌急流。不谙有关地势、道路的行人，不敢随便行走。

由于地势高寒，农作物只有青稞、豌豆、油菜。河谷狭窄，水草局限，牲畜数量也不多。

去马尔洋翻越大坂途中，因汽车故障，中途折返。但在高山坡上却又见到一片野葱，漫布在一条较浅凹的泄水沟内。葱高可40厘米，叶扁平，每株有六七片叶，对称展开。时在七月底，野葱的紫色球状花成簇开放，远望成带，在荒山顶上成为显目景观。据老乡讲，这类野葱，在地势较高的高山夏牧场内，随处可见。生长较低处者，见者采食，逐渐少了。《汉书·西域传》称帕米尔为“葱岭”。《西河旧事》中云：“葱岭，其山高大，上悉生葱，故以名焉”，颇为正确地说明了汉代所以名“帕米尔”为“葱岭”的原来。“葱岭”，这是一个典型的汉式地名。“丝路”早开，并越葱岭而西行。从“葱岭”之名早在汉代已见之于史籍，就已清楚地透示了丝路的历史消息。

在介绍有关塔什库尔干地区考古文化情况时，还有一处值得一提的线索。现属塔什库尔干县达不达公社三大队热斯卡木，是一处十分值得注意的地区。它地处叶尔羌河谷，自达不达骑马4天可以到达。不大的热西卡木河，是叶尔羌河上游的一条小支流，沟谷不宽，七个小居民点沿热西卡木河谷分布，河谷宽不足1公里，约20多万平方米的平地，成东西向展开，海拔4000米，俗称“穷托卡依”。从地理位置看，这里与马尔洋谷地相去不远，河谷可以相通。关于热斯卡木的遗迹遗物，塔什库尔干地区不少人曾从各个角度反复强调，相当丰富。在阿克迭列克见过古代城堡，玉素坎有铜矿，古文物、陶片、金银饰物等，常有所见。目前由于山高谷深，交通不便，一般情况下，与外界联系十分稀少。如从叶城西行，顺叶尔羌河谷走，可以通达热西卡木地区。从热西卡木翻越西岩大坂（海拔4900米），可以进入塔什库尔干河谷，这样，与红其拉甫、明铁盖、瓦赫基里大坂通道可以相连通。因此，它也是一条值得注意的交通孔道。这一古道，结合热斯卡木地区已见的古堡、古址，对我们分析自莎车西入葱岭的路线及葱岭大地的古代文化遗存，均不失为重要线索。由于时间不宜和交通条件局限，我们两次均未能前往，颇以为憾，但愿近年可以得机会实现此行。

注释

- [1] 《前汉书·卷九十六上·列传第六十六上》。
- [2] 笔者在帕米尔踏查中，多处见到漫山野葱，“葱岭”之名，是与此密切关联的。
- [3] 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版；冯承钧原编、陆峻岭增订《西域地名》，中华书局，1980年版，有关条目。
- [4] 新疆博物馆考古队：《新疆疏附县阿克塔拉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考古》1972第2期。
- [5] 古城址坐落在乌帕尔公社乌布拉提村。笔者1972年曾进行试掘，出土文物特征及¹⁴C测定资料（结论为距今1605年±85年），均表明古城毁于魏晋时期。资料现存新疆考古所。
- [6]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帕米尔高原古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
- [7] 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版，323-339页。
- [8] 自莎车至和田，今天公路里程距300多公里；自莎车至喀什，公路里程近300公里。
- [9] 《大清一统志·卷四一九》。
- [10] 笔者两次塔什库尔干调查，马达尔汗均全程一道工作，他是当地塔吉克族中的大知识分子，对有关地理、民俗十分熟悉。他小学毕业后至喀什读中学，走的就是这条路，沿线情况，娓娓道来，如在眼前。
- [11] A·斯坦因：《在通过帕米尔的古道上》，《喜马拉雅学刊》，第四卷，1932年，4月，1-24页。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研所编、吴泽霖译《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历史、地理、民族英文参考资料汇编》。
- [12] 法里亚提大渠，笔者曾进行调查，对源头、走向、渠道平面和、剖面情况均作了观察、分析，将另文介绍。
- [13] 《大唐西域记·渴盘陀国》条。
- [14] 向达：《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北京：中华书局，1936年，第34页。
- [15] 此件文书承库尔班·外力帮助鉴定，特此说明，并致谢意。
- [16]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帕米尔高原古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

致 谢

特别感谢在本书的校改、出版过程中，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周伟洲教授的大力支持。

参加撰写的专家简介：

李建超 河南洛阳人，生于1933年10月。1957年西北大学地理系毕业后留校，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94年退休。1959年至1960年参加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组织的中国西部地区南水北调综合考察队，进入我国西南横断山区的大小凉山、金沙江谷地，对彝、藏、纳西等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进行调查。1971年至1973年借调陕西省军区司令部，进行陕西省军事历史地理的研究和编著工作。1979年由地理系调西北历史研究室，除襄助我国著名地理学家王成组教授撰著《中国地理学史》外，还致力于我国西北历史地理研究工作。1990年应邀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国际丝绸之路考察队，与20多个国家的40多位著名学者一道考察了从西安到喀什噶尔的古代丝绸之路，并在考察结束后撰写了《丝绸之路中国境内的自然地理及其变迁》的论文。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对汉唐两京（长安、洛阳）的历史地理研究中，侧重于两京坊里的人文结构和布局以及两京与西域、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文化交流，并撰写了多篇中国佛家文化地理的论文发表于我国台湾和韩国、日本的报刊上。主要著作有《陕西地理》、《增订唐两京城坊考》、《陕西省经济地理》（合著）、《陕西农业地理》（合著）、《中国近代史学家学术史》（合著）。主要论文有《汉唐长安城、明清西安城地下水的污染》、《唐代凌山地理位置考辨》、《霸上与长安》、《丝绸之路中国境内沙漠路线的考察》、《唐翠微宫遗址考古调查简报》和《关于周秦汉唐帝王陵》等60余篇。

孙福喜

男，汉，1964年11月生于内蒙古乌兰察布，理学博士、史学博士后。曾任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西安市文物局副局长、西安曲江大明宫遗址区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文物局局长、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所长、研究员，曾任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郑州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曾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理事、中国社会史研究会理事、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西安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常务理事。1986年至1990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师专任教，1990年至2000年在西北大学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曾长期从事周秦汉唐历史、文献、考古、文物保护研究，承担并完成过教育部、国家文物局、陕西省政府、西安市政府8项科研课题。曾出版《鸱冠子研究》、《中国古代皇家礼仪研究》、《唐金乡县主墓》等8部专著，主编《西安市文物精华》丛书（12本）、《走向市场》丛书（5本）、《中国文物小百科》等5部，在《历史研究》、《考古学报》、《考古》《文物》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6篇。先后获“夏鼐考古学提名奖”、2004年中国“最佳考古发掘报告奖”“陕西省第七次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2006年“西安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侯外庐史学一等奖”、西安市“七个一工程”优秀著作一等奖和二等奖、西北大学学术成果一等奖各一次。

田亚岐

男，1960年11月出生，陕西乾县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文化，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汉考古部部长、研究员。长期致力于早期秦文化研究。先后参与和主持雍城秦公陵园、凤翔孙家南头断年宫和仓储建筑遗址、陇县店子秦墓地、千阳泮头新石器时代遗址、宝鸡石嘴头龙山文化遗址、大荔李氏家族墓地、华县东阳墓地等处古遗迹的发掘。曾先后合作或独立出版《陇县店子秦墓》、《大荔李氏家族墓地》、《秦物质文化史》、《大荔清代石刻艺术》、华县东阳墓地》、《自古黎姓多英杰》、《雍城秦汉瓦当集粹》等专著，以及学术论文30余篇。

李久昌

男，山东菏泽人，1960年10月生。先后毕业于河南大学、西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现为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古都学会常务理事，西北大学兼职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城市地理、古都学和区域史及文化遗产。主持和参与国家及省级规划课题多项，著有《国家、空间与社会——古代洛阳都城空间演变研究》、《虢国历史与文化》、《中原名人墓祠文化》等著作，发表论文30余篇。

李并成 男，1953年6月生，山西浑源人，1972年参加工作。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硕士学位。现为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一、二层次人选、甘肃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和省宣传文化系统拔尖创新人才。担任甘肃省政协常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长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甘肃敦煌学学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敦煌学、历史地理、西北历史文化等的研究和教学，为西北师范大学专门史（西北史）、历史文献学（敦煌学）和人文地理学三个博士学位点的主要创建者和带头人之一。独著、合著出版学术著作12部，主要有《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瓜沙史地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敦煌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07）、《大漠中的历史丰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丝绸之路文化大辞典》（红旗出版社，1996）、《丝绸路上》（地质出版社，1989）等；主编《敦煌学百年文库·地理卷》（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等。在《求是》、《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中国史研究》、《考古》、《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资源科学》、《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吐鲁番研究》、《文物与考古》、《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农史》《旅游学刊》、《北京大学学报》、《北京图书馆馆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中国科技史料》、日本《オアシス地域研究会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独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河西绿洲历史时期的开发与沙漠化研究》（00BZS030）和《历史时期我国沙暴研究》（08BZS050）、国家教委“九五”规划重点项目（96JAZ770018）、国家教委专题科研基金资助项目等；并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合作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河西地区环境变迁与人地关系研究》（49731010）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973项目）《中国北方沙漠化过程及其防治研究·历史时期沙漠化过程研究》等。荣获甘肃省社科优秀成果二、三等奖6项，甘肃省高校社科优秀成果一、二等奖8项。他负责的“敦煌学”课程荣获国家级精品课程称号。

雍际春 男，汉族，甘肃清水人，生于1961年9月。现为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历史学教授，任天水师范学院科研管理处处长、陇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学术研究主要涉及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地理、西北史地等领域。现已出版专著、合著及教材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专著《天水放马滩木版地图研究》一书获甘肃省“五个一”工程奖、教育部第四届全国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等多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秦早期历史及其文化形态研究》等国家、省（部）级各类项目20余项。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罗 丰 男，1962年9月出生，宁夏固原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大专毕业。政协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八届委员会委员，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兼任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1978年至1980年在固原师专中文系学习。1980年至1998年在宁夏固原博物馆工作，历任考古队长、陈列部主任、保管部主任、副馆长等职。1999年至2000年任宁夏博物馆副馆长。2000年11月到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1993年被评为副研究员。1996年入选自治区“313”人才工程。1997年被评为研究员。是中国唐史学会理事，美国唐研究基金会（The Tang Research Foundation）学术委员会委员。多年来主要研究历史时期考古，在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发表论文50多篇，其中有五篇（部）获自治区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奖。著有《固原南郊隋唐墓地》（1996年，文物出版社）、《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2004年，文物出版社）等专著数部，参与撰写专著多部。1997年获国家文物局首届郑振铎——王冶秋奖。1998年被评为文化部部级优秀专家。2001年被批准享受自治区政府特殊津贴。作为访问学者数次出访日本、美国、台湾等地，进行学术研讨、交流。

王炳华 男，汉族，江苏人，著名考古学家。1935年11月出生，江苏南通，民盟成员。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到新疆从事考古，历时40年。曾任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现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两次被评为新疆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发现、发掘了罗布淖尔古墓沟、哈密五堡、天山阿拉沟、呼图壁生殖崇拜岩画，开拓了考古研究的许多新空间、新概念。曾5次进入楼兰，连续7年主持中日合作的沙漠古址——尼雅的调查、发掘。1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著作有《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天山生殖崇拜岩画》、《吐鲁番的古代文明》。合著有《新疆历史文物》《乌孙研究》；主编《法国西域敦煌名著译丛》、《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主要论文有《塞人历史文化钩沉》、《罗布淖尔古墓为发掘及其研究》、《唐安西拓擲关考》等近百篇。提出了塞、乌孙、沙漠考古文化新概念。是新疆文物考古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杨曙明 男，汉族，1976年出生，陕西凤翔人，现为中共宝鸡市委办公室干部，宝鸡周秦文化研究会理事、宝鸡炎帝研究会理事、陕西省社科院宝鸡分院特约研究员。著有《秦文化解读》、《凤翔史话》和《凤翔东湖》、《雍城秦公一号大墓》（合著）。主要从事历史文化和区域经济研究。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科研资助项目



定价: 98.00元

ISBN 978-7-214-08404-0



9 787214 084040 >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世界遗产
公约



The World Heritage Institute of Training and
Research for the Asia and the Pacific Region
under the auspices of UNESCO

亚太地区世界遗产
培训与研究中心